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中国城市地理

顾朝林等 著

商务印书馆

封面设计/张金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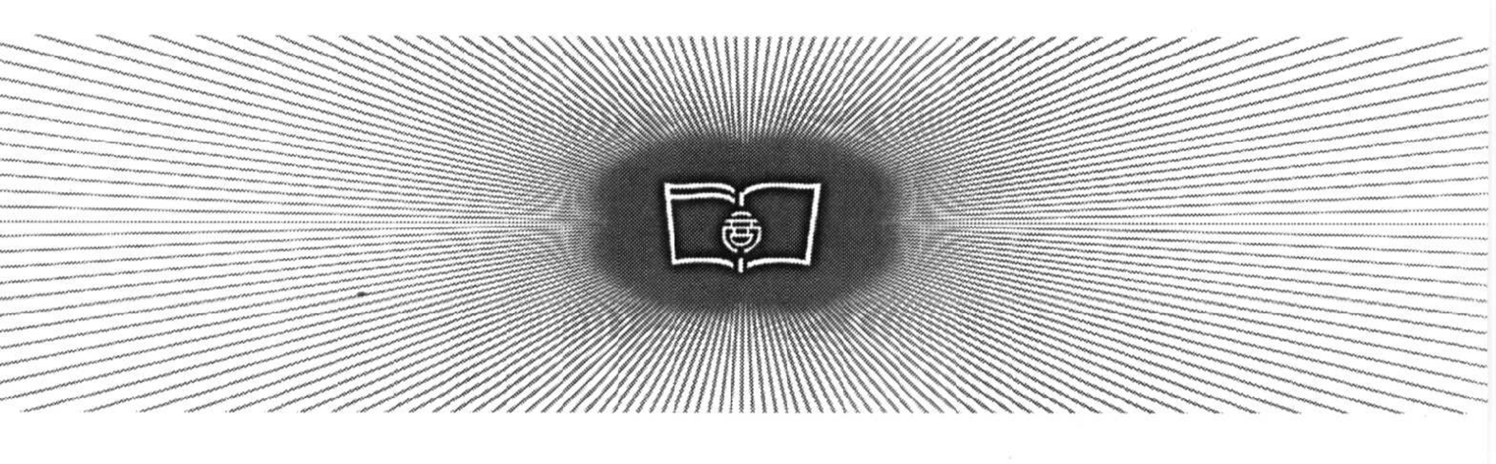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ISBN 7-100-02600-8/K·550
定价：31.00元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中国城市地理

顾朝林　柴彦威　蔡建明　牛亚菲
孙樱　陈田　叶嘉安　著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地理/顾朝林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商务印书馆文库)
ISBN 7-100-02600-8

I. 中… II. 顾… III. 城市地理—中国 IV.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01328号

ZHŌNGGUÓ CHENGSHÌ DÌLǏ
中国城市地理

顾朝林 柴彦威 蔡建明 牛亚菲
孙樱 陈田 叶嘉安 著

责任编辑 叶 冰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ISBN7-100-02600-8/K·530

1999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2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22 5/8
印数 3 000册
定价：31.00元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

本馆自 1897 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

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

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

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为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

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

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7 年 10 月

前　言

《中国城市地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城市与人文地理研究室组织编写，主要编写者包括顾朝林、蔡建明、牛亚菲、孙樱、陈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柴彦威和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中心叶嘉安。

《中国城市地理》是国内计划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城市地理著作，力图全面反映国内中国城市地理的最新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服务。全书共6篇26章，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篇：城市起源与发展过程。由中国城市起源与产生、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分布、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分布、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与分布4章组成，重点论述中国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和历史基础。首先通过古地理环境和古文化溯源，中国城市起源假说以及原始聚落形式，回答中国城市的起源与产生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其次，重点论述中国城市发展与空间分布历史过程，注重每个时期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贡献。

第二篇：城镇化与国家城市体系。由中国城镇化、中国城市体系地域空间结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国城市体系职能组合结构和中国建制镇发展5章组成。前一章重点论述中国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机制、城镇化道路、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差异等；中间3章重点论述中国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

规模结构和职能组合结构特征，展现中国城市体系的全貌；中国建制镇发展作为前3章的补充，重点论述中国建制镇发展过程、空间分异和演化特征。

第三篇：区域城市体系与城市影响范围。由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中国城市经济区组织、中国城市影响区、中国大都市密集区、中国国际化都市5章组成。前2章依据中国城市实力指数进行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并按照城市经济区组织思路对各城市经济区区域城市体系发展进行详细的研究。中间1章通过济南市实证研究展示中国当代大中城市影响区范围。后2章主要介绍了中国的沪宁杭、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沈(阳)大(连)4个城市密集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香港、台北、广州、大连等建设中的国际化都市。

第四篇：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由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经济结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极化与社会空间分异、中国城市边缘区、中国城市形态6章组成，通过城市建成区、城市边缘区和城市腹地3个不同层次论述中国城市单体的结构特征。前4章论述城市内部结构，后2章分别论述中国城市边缘区特性和中国城市主要形态特征。

第五篇：城市土地与城市扩展。由中国城市土地及其利用、中国城市住房、中国城市更新与郊区化、中国城市开发区和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5章组成。本篇以城市土地为主线，重点论述了转变中的中国城市土地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并围绕城市土地开发论述中国城市更新和城市郊区化的趋势，中国城市开发区的发展现状，中国城市郊区化的趋势以及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第六篇:城市发展与展望。本篇通过新城市设置和现有城市发展预测,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第一、二、三、四、六、九、十、十一、十二、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由顾朝林撰写,第二十三章由顾朝林、孙樱撰写,第五、七章由蔡建明撰写,第八章由牛亚菲撰写,第十四、十六章由孙樱撰写,第十三章由牛亚菲、柴彦威撰写,第十五、十七章由柴彦威撰写,第二十四章由顾朝林、牛亚菲撰写,第二十五章由叶嘉安撰写,第二十六章由陈田撰写。全书总体策划:顾朝林、柴彦威;文字总纂:顾朝林、柴彦威;图表监制:牛亚菲。

该书编写过程得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前任所长郑度、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基金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　者

1997年1月6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城市起源与发展过程

第二篇　城镇化与国家城市体系

第三篇 区域城市体系与城市影响范围

第四篇　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

第五篇　城市土地与城市扩展

第六篇　城市发展与展望

第 一 篇

城市起源与发展过程

第一章 中国城市起源与产生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城市的起源一直是城市史学家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到实际歧见横生、扑朔迷离的难题。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德福在城市起源问题上的看法似乎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他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①] 一书中指出："要详细考察城市的起源，我们必须首先弥补考古学者的不足之处：他们力求从最深的文化层中找到他们认为能以表明古代城市结构秩序的一些隐隐约约的平面规划。我们如果要鉴别城市，那就必须追溯到其最早的形态，不论这些形态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距离已被发现的第一批人类文化丘有多么遥远。须知，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在中国，《墨子》就曾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这说明中国远古人类最原始的居民点形式，并不存在今天的城市和乡村。那么，中国城市是何时起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

① [美]刘易斯·芒德福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一、城市起源的一般条件

刘易斯·芒德福设想在所有人类聚落形式产生之前,也许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他把城市起源溯源到如同动物(蜜蜂)构巢一样的人类的生物性,溯源到远古人类对死者墓地的定期膜拜,把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妇女地位变化、农业定居、游牧民族的进击等等都看作为城市起源的推动因素。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作为人类住区的延续,其源泉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

然而,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毕竟不是人类整个的社会发展史,毕竟不能等同于全部的人类住区历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城市起源最起码应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1. 定居生活的确立

城市最基本的表现在于集中(包括人口、财富等)和稳定。那种群集的逐水草而生活的游牧时代是不可能产生城市的。从游牧和狩猎到居有定所必须基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必须在一定的固定地域开展,从采集野生果实而意识到自己能够种植的生产者必须守着这块土地,观察四季的变迁和植物的生长,盼望果实成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农业的出现就谈不上定居,没有定居就不可能出现城市。

2. 劳动分工的出现

在人类定居下来之后,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之间出现了专门

化,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劳动分工的出现。这种专业分工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

3. 社会阶层的分化

人们因婚姻或生存需要而自然群集的氏族组织，在简单的采集或渔猎生活中形成的那种平衡关系，经生产力、尤其是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偏移，大家公认而服从的习惯权力终于成为首领的特权，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人类社会阶层开始分化。

4. 社会财富的集中

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财富向特权者集聚。这样，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随着剩余产品和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一部分富有者的财富,也为了保护氏族和部落联盟的安全,也就有了最原始的城市。

二、中国城市起源舞台

城市的起源除了上述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外,还与特定的地理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是特定地域范围内城市起源的关键所在。

（一）史前中国地理结构

中国文明孕育在黄河流域，从地缘史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产生是中北亚大陆文化和东南亚海洋文化波锋交接冲撞的必然结果。

在遥远的史前时代，黄河下游并不存在现在的黄淮海大平原。黄河一出三门峡可能很快就流入由辽河指向冀中的沉降轴海沟。也就是说，在大约1万年前的中国地域范围内，不仅黄河下游的华北大平原是一个浩瀚的海湾，而且江淮平原也多遭海浸，大别山以东几乎是一片汪洋。

现在的所谓黄土高原，当时应是一片个性与今完全不同的侵蚀平原。马兰期的黄土堆积以及世界冰期过后的海面上升，气候转趋温湿，使黄河不断加积并推向开封以东，形成一个巨大的冲积扇。到史前时代，这一地区逐渐发育起一片茂密的华北大森林。但太行山以东，仍是沧溟的烟波无际的古渤海。

只有林缘、滨河地带才是远古先民容易生聚、活动的场所，所以中国最早的原始聚落大都散布在一些开敞的山前冲积平原上。这样，太行山东麓的滨海走廊无疑成为北方部族南下的通道。从地貌结构看，从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地势逐渐递减；因气候降水作用，从阴山迤逦到兴安岭西端围上了一条宽宽的淡绿色草原缎带。从这里往北看，蒙古高原千里戈壁；向南望，一系列由几次造山运动铸造的东北—西南和北北东—南南西走向的断层地堑群，若断若续地由东向西延伸。这里不仅形成了部族迁移的通道，而且也成为先民栖息的好处所。再向南，汾渭盆地无疑是一个相当

突出而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它西起宝鸡，南切秦岭，北以吕梁、陇山作两翼，东与山西高原鞍部南南西行的汾河地堑斜交，是一个可攻可守的安全地带和非常适宜的文明策源地。从这里往东是一片平芜、没有险阻的山东，向南3000公里绿色平原可直达云梦洞庭，而东南江浙一带的水浸导致与黄河文明的自然阻断。

这样，黄河轴线实际就成为中国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交绥的界面，成为中国文明的策源地和早期城市的起源地。

（二）华夏文化溯源

中国文化是世界仅见的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文化系统，它以卓异的风格、多方面的成就令世人叹为观止。在古代、中世纪、近代，中国都曾集中能工巧匠，修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宫殿、巍巍壮观的城堡，创造了色彩斑斓、仪态万方的城市文明。

中国文化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当我们沿着这条大江溯流而上、追寻源头时，便会领悟到它那“纳细川于巨流”的宏大气魄。而这正是中国文化气象万千，始终保持喧腾活跃机制的所在。

中国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多根系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文明发展的轨迹得力于不同文化的冲激和辐合。现在的中国文明必然是随东西文化交流而变质；元明清人所意识的中国文明，显见渗入不少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东传带来的中近东和西欧文化的成份；六朝及唐宋人意识的中国文明，则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秦汉人意识的中国文明则是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的纽结。而原生的中国文化——华夏文化的源泉又是什么呢？

据1949年前后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在24个省、市、自治区,新石器时代的6000多个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在氏族社会后期(约公元前2700年左右),游徙于关中平原、晋西南盆地和豫西河洛沿岸的各氏族部落,为传说中居于陕西的部落联盟首领黄帝所统一,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以后,作为炎、黄两帝胄裔的夏人、商人、周人相继进入奴隶社会,先后建立夏、商、周3个王朝,并与黄河中下游其他各部族相互融合,形成“华夏”族。

华夏族的形成,孕育了与本民族经济、政治相适应的观念形态及其制度的集合体——华夏文化。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精美的青铜工艺;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执干戈、挥羽籥的武舞、文舞;瑟笙钟磬鼓齐奏,堂上堂下众声俱作的音乐;最早的散文与诗歌——《尚书》与《诗经》;开始从宗教意识里脱颖而出的哲学:这些都标志着华夏文化雏形的形成。而作为华夏文化载体的中国城市,则随着它的文化的繁荣,历数千年,构筑成今日雄浑壮大的城市文化气派。

中国文化发达于黄河沿岸,这里“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①,“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遵天命循天理为主”②。冯天瑜等概括养育中国古文化的土壤是一种区别开放性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环境;是一种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以及和印度种姓

①② 伦仓:“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第13卷,第7号。

制相区别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1]。中国城市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总格局下孕育、发展和走向辉煌的。

三、中国城市起源假说

关于中国城市的起源，历史学家(包括考古学家)、社会学家、城市学家有各自的见解与假说。

1. 防御说

这一假说认为，中国城市的起源，尤其是城堡的产生，是统治阶级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防御敌方侵袭需要而兴建的。“筑城以卫君”（《吴越春秋》）正是早期城邑建设的主要目的，即“君”是城之“本”，城为“君”而筑。由于防御是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所以，高墙深池和择险而筑遂成为中国早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2. 集市说

这一假说认为，城市是作为初期市场中心地而产生、兴起的，它起源于贸易和市集之地。中国古代《易经》中的“日中为市”，《国语》中的“争利者于市”，以及《史记》颜师古“注”中的“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等，都是这一见解的说明。很显然，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导致了集市的出现，而集市交

① 冯天瑜、周积明:《中国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换的经常化，在一定地点便形成了以交换为主的城镇。从这种意义上说，城市的起源，“市”在先，“城”在后，其契机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

3. 宗教中心说

这一假说认为，中国最早期城市的起源是以宗教中心面貌出现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社会维系社会经济的聚合力仍然是血亲制度。这种血亲制度，使狩猎部落酋长逐渐变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神的化身，作为部落联盟中心的一条无形的纽带——宗教制度将其周围居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中心和最早期的城市建设，便是以宗庙作为“先王之主”的。因此，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的宗教中心也可能是中国早期城市产生、发展的另一因素。

4. 地利说

这一假说认为，有些城市的兴起是由于这里是水陆交通中心或河川渡口；有些城市兴起是由于地势的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些则与该地区自然资源（如矿产）有关。正如《管子·乘马》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毋庸置疑，在中国远古时代，作为城市产生的起始，防御设施的建立，剩余产品的交换，以及血亲制度维系的氏族中心地的确立，都是中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激发因素，但其最本质的因素则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难设想，若离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述3大激发因素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只有社会生产力

发展到一定水平，人类社会出现了3次社会大分工后，才具备了早期城市起源的基本条件。

四、中国城市产生前的原始聚落形式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传说记载说明，劳动分工的分化过程为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提供了先决条件，使人类居民点形式从原始群、原始村落、原始市集、原始集市进一步演化为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和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城市。

1. 原始群

据考古资料，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属于中国“古人”阶段的原始人类，即已分布于西北（大荔人）、华南（马坝人）、华中（长阳人）和华北（丁村人）等地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古人类更广布于内蒙古河套，广西柳江、来宾，山西朔县，台湾台东的卑南，四川资阳，江苏泗洪，云南丽江、路南以及东北的榆林等地。但其时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属于中国“新人”阶段的原始人类，还处于“穴居野处”的阶段[①]。相传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巢氏“构木为巢”（《韩非子·五蠹篇》）以避群害，靠采集野生果实和植物根茎度日，还没有固定的住所；其后燧人氏发明了火的使用方法，“钻木取火”得以

---

① 北京猿人显然长时期占据着周口店的山洞，作为防御野兽袭击和保护生命的处所。后来山顶洞人的住地虽然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仍然没有摆脱穴居的束缚。就是麒麟山（来宾）和马坝遗址的发现，也一样和洞穴有关。中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地方也还是在洞穴里面，广西桂林武鸣的发掘就是例证。

御寒、照明和烤炙食物,在天然洞穴的基础上略加改造形成穴居处所,但终因谋生不易仍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直到新石器时代,由于弓箭的发明,原始人才能获取更多的野兽作为生活资料,同时也具备了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为更多的人定居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神农氏用木制作耒耜,教民从事农业生产,使原始的狩猎文化逐渐向重视生灵、圈养牲畜的新石器文化进化,出现了"以佃以渔"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各个原始群。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居住地点已遍及全国各地。从考古发掘看,北至内蒙古满洲里、海拉尔,西至天山南北和罗布泊沿岸,甚至远在西南的云南、贵州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据徐中舒研究,其时中国大陆上已普遍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公社,其中有氏族公社、农业公社。这许许多多的公社当时都是在交通阻塞、人口稀少条件下,各自孤立、不相往来的群体。

2. 原始村落

大约在6000～7000年以前,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首先进入比较繁盛阶段,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较巩固的基础。据考古发掘资料,其时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了窟室。如在河南浚县大赉店南门外的一条南北路沟里,就曾发现了10多个竖穴底部的残迹,推测可能就是人类由穴居发展而成的居住窟室。在同一时期,西安半坡村、开端庄、华县柳子镇、郑州林山岩、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出现了房子的遗迹,其中以半坡村遗址最为典型①。

---

① 半坡村人们居住在遗址的中心,东边是烧制陶器的窑址,北边是埋葬死者的公墓地,在公墓地和居住区之间还隔有一条沟渠,显示了这一时期村落的一般特征。

若干处早期的房子共同组成萌芽状态的村落,并逐渐发展成为定型的原始村落。

据资料表明,在农牧业较发达的地方,已有不少这类新型的村落陆续出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东部,南达汉水中上游,北到河套地区和宁夏,西及渭河上游以至洮河流域,已经散布着许多母系氏族公社的村落。尤其是中心区域,其村落规模与分布密度均已相当大。如西安附近的沣河中游一段长约20公里的河岸旁,两岸相望,共建立了十几处村落,若扣除村落本身的范围,则两村间隔不过1公里左右。即使在这一地区南部边缘的长江流域,当时也出现了以定居生活为特征的氏族村落,农业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落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籼稻谷和蒿叶,以及大量家猪骨骼。这是6000年前这里的居民栽种水稻、饲养家畜、以农业为主的原始村落的明证。

3. 原始市集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约4000～5000年前),原始农业开始进入"耒耜农业"时期[①],繁重的农业劳动大大削弱了妇女的领导地位,对偶婚姻[②] 逐渐解体转变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母系氏族公社也相应被父系氏族公社所取代,从而使农业生产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与垦田结合起来的水利建设共同形成了沟洫制度,为农业生

---

① 《易经·系辞下》也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之说。

② 对偶婚姻是一种比群婚制进步的成对配偶的婚姻形式,普遍存在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其特征为世系从母、族外婚,以女子为中心,实行男嫁女、从妇居的居住制度。

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正是由于农耕文化的进步，这一时期，一方面相对发达的农业为畜牧业提供了更多的饲料；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部门的重心已由渔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从事游牧的部落不断减少，牧业反而繁盛起来。正是这两个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畜牧业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从而完成了中国人类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和牧业的分离。

这次社会大分工使得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有比较显著的提高，农业和畜牧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一基础上，农业、畜牧业各自都有了少量的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的出现又为即将出现的早期产品交换提供了可能。

据《易经·系辞下》记载，"庖牺氏设，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作篇》也有颛顼时"祝融作市"的记载[①]。当然其时交换场所主要在"市井"[②]，即所谓原始市集。这种原始市集，概括起来具有："日中为市"，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交换场所；"以物易物"；交换的物种比较简单，数量很小，距离不远等特点。

4. 原始集市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又得到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轮制陶器技术的发明和铜器冷制法的相继出现，又导致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之逐渐形成为独立的行业，从而完

① 《史记·货殖列传》、《稽古录》等也有类似的记载。

② 《史记·平准书·正义》。

成了中国人类社会发展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1]。

正是这次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使得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把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交换范围(包括产品数量、品种和交换距离等)，使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越来越多，交换的次数也愈益频繁，交换的场所也由原始市集逐渐形成为固定的集市。

据《淮南子·齐谷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掘"，可表明其时剩余产品交换之正规性和经常性。又据《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传说舜时就曾"作什器于寿丘(今地名不详)，就时于负夏(今山东兖州北)"。《尚书·大传》也谈到舜"贩于顿丘(今河南浚县北)，就时负夏"。可见当时剩余产品交换的距离已比较远。此外，《战国策·齐策》还记有："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和所谓"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罢市掉臂不顾"的集市繁庶景象。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集市与前期市集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换场所已比较固定；交换时间以早晨为主；交换距离比较远，吸引范围更大，等等。

诚然，到原始社会中晚期，尽管这类剩余产品的交换已比较广泛，但其时(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山无蹊径，泽无舟梁。……势利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2]。说明在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

---

① 这时的轮制陶器，如炊具、饮具和储藏食物用具，冷锻法红铜器，以及其它如石器、玉器、骨角、牙器、木器、竹器和丝织物，都成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主要标志。

② 《抱朴子·诘鲍篇》。

力水平下，仍还不具备早期城市产生的条件。

五、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

直到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加，私有制开始萌芽，从而逐步进入奴隶社会时期[①]。正是在这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中国人类社会逐渐分裂成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抗阶级，奴隶制国家也即应运而生，从而开始了中国居民点形式又一个新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的时代[②]，中国早期城市便逐步产生了。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城池的建设是有很大影响的。如仰韶文化时期夯筑技术的萌芽[③]，以及龙山文化中晚期夯筑技术的产生、普遍应用和日趋成熟[④]，都为中国早期城市的产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中国早期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具体地说，起源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都(约公元前 26 世纪初)[⑤]，初形于夏，形成于商代

---

① 根据骆宾基对金文的研究考证，神农炎帝为始的父系社会初期即建立了奴隶主政权，但母权制度残余势力一直很盛，在帝位承嗣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传婿(姐妹之子)与传男(儿子)的流血斗争。直到禹死后，启杀掉准备承嗣帝位的婿方伯益，父系制度的帝位继承法才真正确立起来。因此不难看出，中国奴隶制国家的真正稳固是自夏禹以后才开始的。

② 《礼记·礼运》。

③ 《西安半坡》，第 43 页，文物出版社。

④ 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建筑历史与理论》，第 1 辑。

⑤ 三皇五帝之都可能是部落及部落联盟中心所在。

末期[1]，其间历时1500年左右。

（一）萌芽时期

关于中国远古都城宫室的传说，《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都有记载。最古老的古都记载有所谓“三皇五帝之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宋代《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等书，都对古代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传说进行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表1）。近代学者王国维也对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2]。他认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这一时期，由于奴隶制国家尚未（或正式）建立，加之在目前考古工作中还未发现相当于三皇五帝时期的城址，所以三皇五帝之都不可尽信，但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及部落联盟的中心所在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中国最早城市的传说和记载，从现有史料看是鲧城和禹都。关于鲧城的记载颇多，《世本·作篇》有“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记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3]，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吕氏春秋·君守》有“夏鲧作城”；《吴越春秋》记有“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等等，都反映了“鲧作城”这一历史事

---

① 按照一般城市形成概念，有别于乡村的中国早期城市应具有行政、防御、商业、手工业作坊和集中居住区等五大基本物质要素。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十。

③ ［清］陶方琦《说文仞字八尺考》说：周尺八尺为仞。河南殷虚出土的周骨尺：1周骨尺合今0.2192尺。

实。至于禹都，据传说记载，或平阳，或安邑，或晋阳，或阳翟，不一而足。由此不难推断，鲧、禹之际为中国早期城市产生的萌芽时期。

表1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都

朝代	三皇五帝	年代	都地点及迁徙情况
三皇	伏羲		陈(今河南淮阳)
	神农		鲁(今山东曲阜);又说陈
	轩辕	约公元前26世纪初	有熊(今河南新郑)、又迁涿鹿(今河北涿鹿)
五帝	少昊		穷桑(今山东曲阜)
	颛顼		高阳(今河南濮阳)
	帝喾		亳(今河南偃师)
	尧		唐(今山西翼城西),后又迁平阳(今山西临汾)
	舜	约公元前21世纪	虞(河南虞城县),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

资料来源:(1)《通志·都邑略》;(2)《册府元龟·都邑》;(3)《太平御览》。

（二）初形时期

自鲧作城至夏代桀灭亡，其间共历时约500年(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中国早期的城市已经产生。

近年来，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淮阳县平粮台，以及山东省寿光县边线王等地发掘一批古城址，根据挖掘的资料分析，都证明是夏文化遗址。再结合相当于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

虎山围墙，以及30年代发现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安阳后冈的一段板筑围墙遗址，可以确认在4000年前的夏代，中国即已出现了最早期的城市[①]。

诚然，作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与一般城市所具有的基本物质要素还相差甚远，故又称之为"早期城市"的"初形时期"。据王城岗城址的挖掘报告，整个城址系由东西两座小城组成，西城呈方形，边长西墙为92米，南墙82.4米（若加上东端缺口10米，其长为92.4米）。可见其时城市规模不大，也许根本还不存在定居城堡的居民，只能视作中国早期城市的雏形。

（三）形成时期

商灭夏以后，中国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且伴随着手工业、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这样，便大大地促进了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根据考古资料分析，河南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都城（隞或亳），晚商王都殷等，都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城市。

然而，从大量考古资料看，如上所述，夏城规模很小，还没有具备一般城市拥有的基本物质要素；与其同期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发展水平也并不高（只发掘有青铜礼器）。而据现代发掘资料，商城已比夏城具备了一般城市的基本要素。很显然，中国早期的城

① 这一时期出现的城堡可能是部落的中心，而不是国家的中心，从规模和性质上分析，它们也只是一些筑有防御设施的一般聚落遗址。

市基本上形成于这一时期，而且构成城市的基本要素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构成城市的城市中心建筑、城市防御设施、城市商业和手工业，以及城市居住区的形成、发展几方面来看，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1. 城市中心建筑：由宗庙到宫室

宗庙在古代不仅是统治者供奉祖宗的地方，而且也是重要的行政统治场所。《墨子·明鬼篇下》有："昔日虞、夏、商、周四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宗庙"。《吕氏春秋·慎势篇》也记有："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些都说明最早期城市建设，"宗庙"为"先王之主"[①]。

至于宫室，最早有"禹作宫室"之类的传说与记载，但从现有夏城考古挖掘材料看，建筑上还没有出现宫殿的痕迹，因此，这一传说迄今仍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印证。

本世纪60年代，中国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早商都遗址，挖掘出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基址。据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大型建筑群是由堂、庑、门、庭等单体建筑组成的廊庑形式的建筑群，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首开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到了商代后期王都殷，"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商代帝乙、帝辛[纣]的别都)，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相传殷纣于此筑台，畜养禽

---

①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

兽),皆为离宫别馆"[1]。根据考古资料,其王宫的基址已有一定的布局,成组排列。建筑物的台基方向或是正南北向,或是正东西向,互相呼应,形成了系统的建筑群;而且整个王城以宫寝为中心,作了全面的王都规划,充分体现了商代的文明。

再如在平粮台城址研究中,发掘者将这一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存细分为平粮台二、三、四期文化层,发现其城墙修筑于平粮台二期,城内的一些大型建筑遗存分别属于平粮台三、四期,证明平粮台城基的修建早于房基,城内建筑是城基建成后许多年才逐渐建设而成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时至商代,中国早期都城,其具有表征性意义的建筑——宫室,是在更早期宗庙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成的。城内建筑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其布局从杂乱无章到规划成组排列。

2. 城墙与城池:由城池分设到合二为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城堡的产生是很早的,张澍补注的《世纪》引《吴越春秋》即有:"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礼记·礼运》也有"城郭沟池以为固"的记载。这些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为作者主观推想,但它毕竟反映了传说中尧、舜、禹时代,即已有出现城堡的可能。

据现有考古资料,表征所有中国传统城市特征(城市构成要素之一)的城墙,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河南淮阳

---

① 《竹书纪年》。

平粮台城址部分城墙是迄今考古发掘中最古老的城墙[①],整座城址呈方形,边长 185 米,而在进一步的挖掘中,并没有城壕遗存的迹象。

与此相对应,中国早期城市城壕的最早发现,见于郑州南关外遗址。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宽 2.5～4.0 米、深 2.15～3.5 米的壕沟,呈东南、西北斜列,已发掘的部分有 3000 米长。但是,从郑州商城所在南关外形文化层看,这一城壕被明显地压于城墙下面。不难断定,其时城壕的修建早于城墙的建设,而且也没有发现城壕、城墙处于同一文化层的现象。

直到盘庚迁殷前,郑州商城才在原有城壕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筑城墙。据 1972 年进行的钻探考查结果,初步获知这一时期的郑州商城夯土城垣已达 6960 米,其中东墙长约 1700 米,西墙长约 1870 米,北墙长约 1690 米,南墙长约 1700 米,城墙横断面呈梯形,平均底宽约 20 米,顶宽约 5 米,高约 10 米,四周留有 11 个缺口(可能为城门),成为迄今发掘的最早的传统城墙城市。

据此不难发现,中国早期城市的防御设施建设具有先建城堡,再建城墙或城壕(城池分设),最后合二为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3. 城市商业:市场由农村到城市

"殷人善贾",商业始于商代。《尚书·酒诰》称妹士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反映了其时人们开始从事经商谋生。这一时期,商代货币的使用,大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由于

① 考古研究表明,平粮台城址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遗存。

早期城市的产生，掌握商业大权的奴隶主贵族又都居住在城市，为了经营上的方便，市场区位也由早期“日中为市”的“市井”之地逐渐转移到城市中来。正是由于这种早期城市商业兴起，遂使中国早期城市渐次形成为一定地域的商品交换中心。

据《六韬》[①] 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太平御览·帝王世纪》也记有“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诗经·商颂》也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不难看出，尽管商城中商业刚刚由农村转移而来，但其盛况已是过去原始市集和集市所无法比拟的了。

4. 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由城郊到城缘

这一时期，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工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专业生产队伍。原来依附于农业的手工业部门，不仅分化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由于商品交换的发达和城市商品交换中心的形成，也渐次进入城市，手工业作坊布局表现为由城郊向城缘移动的特征，最后成为构成早期城市的又一个基本要素。

据湖北黄陂盘龙城和郑州二里冈遗迹考古分析，这些早商城址的用地布局，手工业作坊都是分布于城市的郊区。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在城墙和宫殿附近的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早期陶器和陶片。又如郑州商城，其手工业作坊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分布在商城外围，在西郊有成群的陶窑；南、北郊有多处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而东南郊则为酿酒作坊分布地区等等。

---

① 中国古代兵书，传为周代吕望（姜太公）作，现存6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5. 城市居住区:“内城外郭”的地域结构

如前所述,在商代以前,中国早期城市的地域结构只是围绕宫殿的城墙。依据城墙遗址资料考察,发现至这一时期后,逐步开始出现围绕宫殿区的“子城”,以及围绕百姓居住区、作坊区的“大城”,即所谓“外郭城”的地域结构。这种城市地域结构的出现,固然与军事职能需要而重视城郭构筑有关,但其激发的因素仍在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铁制农具及牛耕的普及发达等因素有关。

六、中国早期城市特征

概括中国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 城市分布范围不广,数量不多

据不完全统计(根据传说、考古和文字记载),到商代末期,中国计有早期城市共26座。就其地域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其中以晋南、豫北和豫东最为集中(图1)。仅在河南省范围内即有沬(今淇县境内)、牧(今汲县境内)、封父(今封丘境内)、历(今禹州市境内)、洛(今洛阳东)、杞(今杞县境内)、蔡(今上蔡境内)等城市,约占当时城市总数的一半左右。

2. 城市规模较小,职能比较单一

据作者综合现有考古资料,中国早期城市用地规模一般都不大,但从其发展看,有逐步增大的趋势,表现为商城大于夏城,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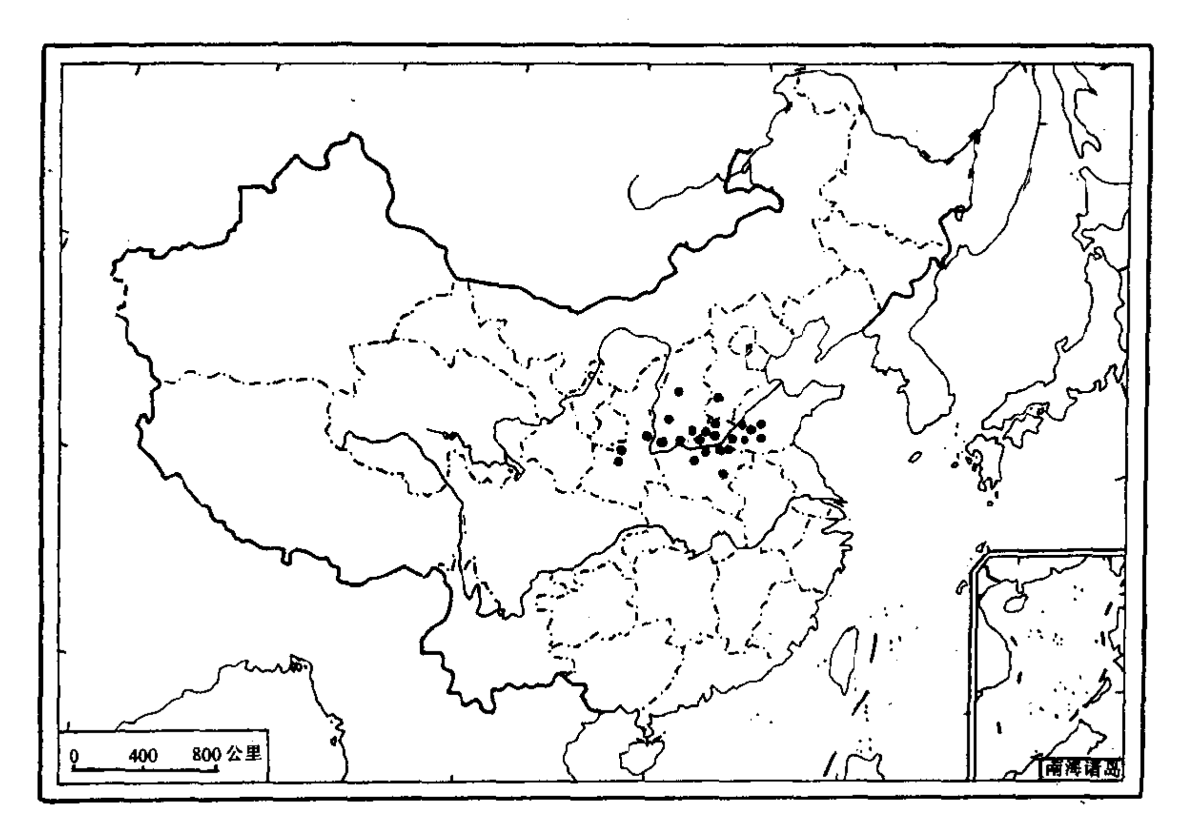


图 1 商代城市分布简图

注:本书地图均以中国现代版图为准,下同。

大于地方城市的总特征;同时还可以看出,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城市规模差异很小。例如夏城王城岗城址和章丘城子崖城址的城市范围分别为 0.2 平方公里和 0.18 平方公里;早商都城郑州城址和晚商都城安阳殷墟的城市范围,也分别为 24 平方公里和 25 平方公里(表 2)。

总的说来,中国早期城市职能比较单一,即以政治职能为主。殷墟是商代后期全国的政治统治中心,而其它商城一般也都是地方政治中心。这种以政治职能为主的早期城市,一直延续到以后几千年的城市发展之中,成为中国城市区别于其它国家城市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表2　中国早期城市等级与用地规模比较表

朝代	古城名称	推测等级	用地规模		
			城市范围（平方公里）	地区范围（万平方米）	宫殿区范围（平方米）
夏	王城岗城址	夏代禹都	0.2	1.6～1.7	
	平粮台城址	夏初城垣		0.2139	
	边线王城址	夏初城垣		4.4	
	章丘城子崖城址	夏城垣	约0.18		
商	偃师二里头城址	早商都城			10000
	晋南垣曲古城址	商　城		12.0	
	黄陂盘龙城	早商城市	1.0	7.0	
	郑州商城	早商都城	24.0	302.55	60000多
	安阳殷墟城址	晚商王都	25.0		50000多

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整理。

3. 城市之间联系不多,城址迁移频繁

中国早期的城市由于其职能类似,还谈不上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且其时交通条件很差,城市之间联系不多,若有联系,也只是它们之间在层次关系上的上、下变化;而且这种联系始终是以血缘纽带相联结,以氏族贵族统治为特征的。城市之间不存在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交往,只是依靠那种若即若离的血缘纽带关系贯串其中,使其维系、联络而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夏、商两代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剧烈,而且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薄弱,城址迁徙相当频繁。如在夏代,夏后氏都城即发生十迁(表3)。至于商代则更“不常厥邑”。据统计自成汤

至帝辛的商王朝，共历600余年，城址迁徙即达6次之多[①]，仅仲丁以后到盘庚迁殷前100多年中，虽持续5世9王，却曾5次迁都(表4)。

表3　夏都十迁简表

	年代(公元前)	迁都地名	今　地　名　、
禹	约21世纪初	安邑	山西夏县
		阳城	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王城岗
		阳翟	河南禹州市
启	约21世纪初	安邑	山西夏县西北
太康、仲康	约21世纪初	斟鄩	河南巩县稍柴村
相		帝丘	河南濮阳市西南
少康	约21世纪中	阳翟	河南禹州市
帝杼	约21世纪末	原	河南济源县四里原村
		老丘(又作邱)	河南开封县陈留北
桀	约17世纪初	斟鄩	河南巩县稍柴村

资料来源：(1)方酉生："夏都探索"，《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3)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4)许顺湛："夏代文化探索"，《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

① 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帝促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奄"，"盘庚迁于殷"。这6个都城，除河南安阳小屯一带早已证明为"盘庚迁于殷"的都城遗址外，其余5个都城均未得到考古发掘证实。

表 4　商都五迁简表

	年　代（公元前）	历经王位变更情况	迁都地点及参考文献		
			《竹书纪年》	《尚书序》	《殷本纪》
成汤—太戊	约 16 世纪初	5 世 10 王	亳（今河南偃师二里头）		
仲丁	15 世纪中	5 世 9 王	嚣（同隞）	嚣	隞（今河南荥阳东北）
河甲			相	相	相（今河南内黄东南）
祖乙			庇（山东）	耿（今河南温县东）	邢（同耿）
南庚	约 1395 年		奄（曲阜旧城东）		
盘庚			殷（安阳小屯村）	殷	亳
盘庚—帝辛	约 11 世纪	8 世 12 王	殷		

第二章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与分布

中国早期城市经过夏、商两代约1000年时间的形成和发展，在进入奴隶社会末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即已具备了古代城市的一般特征。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可以划分为如下6个时期。

一、西周城市发展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作为奴隶制国家，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昌盛的奴隶制国家，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末代奴隶制王朝。西周社会经济的进步，政治统治上利用血缘宗族关系进行的分封，为都邑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1. 分封制与诸侯国

西周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在王畿之内是天子直辖，之外则分封诸侯统治。西周分封制与西周都邑有极大的关系，受封者不但得到姓氏、土地、人民，同时还要建立自己的据点——都邑。

自西周开国之初直到春秋战国，历时约八九百年，地域经济得到了逐步开发，人口不断增长，社会生产力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出现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的两次城市建设高潮。第一次在西周300余年间，中央统治者竭力推行分封制，据史料记载，其分封的诸侯国由最初的71个发展到1200个之多。这些诸侯国的统治中心——首邑城市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第二次下及春秋战国（历时549年），随着周王朝统治的衰落，特别是由于各地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各诸侯国不断增建新城，形成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据资料表明，到西周末年，尽管经过诸侯间的互相兼并，仍存有140多个诸侯首邑城市。与商代中国早期城市数相比，城市数量无疑有了急剧的增加。

2. 三级城邑网

作为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周代，奴隶主贵族宗法组织有大小之分，其政治关系有君臣之别，体现在城邑建设上就产生了城邑建制的不同等级之别。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中，周王朝统治者为了推动这次大规模城邑建设活动，本着城邑建设为分封政治服务的目的，曾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城邑建设制度，即“营国制度”[①]，把全国各级城邑的统属关系视若人体各部分的关系，有主有从，以大制小，用城邑规模等级关系来强化其宗法、政治上的统属关系。在这一体制下，基本形成了全国以政治职能为主的3级

① 详见《考工记》中《匠人·营国》。

城邑网络，即：王城居首，为全国宗法血缘政治中心；诸侯城（诸侯封国国都）列第二，是周王朝在一个地区的宗法血缘政治大据点；卿大夫都（采邑城）为第三级，是周王朝宗法血缘政治的基层据点。这种等级系列关系，可视为中国从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以政治为中心，从上而下的等级规模关系的张本。

3. 都城和诸侯首邑

从考古资料来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可以确定为西周时期周人所筑的都邑遗址。比如丰镐遗址考古，在结合文献确定位置之后，没有发现诸如大型宫殿和王陵遗址。1962 年以来，在北京西南郊房山琉璃河镇北 3 公里处，位于董家林村周围的高台地上发现一座古城，已知北城垣长 829 米，东西城垣的北段各长 300 米左右，宽约 10 米，城垣外有壕沟，沟深 2 米多。根据此城的考古测定年代、位置以及其它因素判断，这座古城遗址应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但其内部出土物及建筑基址尚未有别的发现。据此，笔者只能从先秦文献中寻找西周都邑的蛛丝马迹，力求能观其大概。

（1）丰、镐两城

考古发现丰京总面积约 6 平方公里，城内有辟雍（举朝会、命事的地方），有“大池”、“莽京”、“湿宫”，还有灵台、灵囿、灵沼。程大昌《雍录》中载：“灵台遗址至贞观尚在，故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雍、灵沼，今悉无复处，唯灵台孤立高二丈，周围一百二十步’”。

（2）成周

成周是周公摄政五年即周成王五年三月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的，其规模在《逸周书·作雒》中有详细记载：“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立城方

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京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而土方千里”。但迄今为止，在瀍水以西、以东考古发掘中都未找到成周遗址。

二、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 年～前 221 年），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城市由萌芽、起源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正是在春秋战国社会急剧变革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城市开始大批涌现并发展起来。

1. 郡县制试行及其治所设置

西周末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依附于农民阶级产生的土地占有关系——赋税制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封建关系便在奴隶社会母胎中孕育、成长起来。反映这一变化的是公社（邑）组织形式和建立在公社之上的分封制社会政治组织的解体，以及郡县制的试行[①]。

郡，在周代其原意是指边陲地区的行政单位。而“县”则是王畿和邦国之内六遂的“遂”以下一个行政单位[②]。可见当时郡、县

① 中国井田制瓦解后，农村公社演变成自由小农的私有制，然后，或者通过小农的两极分化，出现“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租佃制；或者通过庇护制使自由民沦为“宾客”、“佃客”一类的农奴；或者通过土地还授与食封制度，成为依附于封建国家的“编氓”。

② 六遂的遂是远郊之地的行政区划。周代制度，离京城百里之外，二百里之内为六遂。《周礼·地官·遂人》：“大丧，师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

原为同级行政单位，而只是按其距京城的远近而划分的。但到战国时，县制首先在西周、春秋以来分封食邑制的基础上，逐渐以至彻底改变了其原有的性质。如《史记·晋世家》，“六卿乃遂法尽灭其族，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等，都反映了中国县制产生的历史演变情况。与此同时，大国争霸，卿大夫的崛起，战争的频繁，以及井田制的破坏，诸侯常以郡、县赏赐其有功之臣，即所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①]，也加速中国郡县制的形成和推行。而且从《左传》这段记载看，推测当时的郡县制度存在着两种可能，即县大于郡，所以“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郡同级，但郡较县偏僻，地广人稀，所以“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具有封建关系的郡县制已经试行，并作为一级行政单位保存下来了。

随着中国这种早期郡县制的试行，郡、县治所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从而作为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心城市，也开始形成、发展起来了。

2. 围墙城市的出现

到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分封政体迅速瓦解，郡县制封建社会政体也在奴隶制的母胎中逐渐孕育成长起来。在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体下，建城不再意味着“建国”，而是建立这一政体下地方建制的治所，例如郡城、县城等等。换言之，即按封建制国家政体，以郡县制的城市建设体制代替原来奴隶制国家以宗法分封政体为基础的3级城邑建设体制。郡县治的城市建设体制设置，除政治因

① 《左传》哀公二年。

素外,更多的是取决于经济因素的要求,哪里经济发达,哪里必然人口集中,交通也必然方便,蔚然成为一方重镇,郡治或县治每每即设于此,形成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样,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即出现了以围墙城市为特色的蔚为壮观的景观。

3. 城市群组地域结构特征

战国时代,由于井田制彻底瓦解,土地私有制确立,城市形制由规整转向"不必中规矩",蒙上了个体经济自由经营的色彩。不仅手工业区扩大了,还出现了城市商业区,而且增辟了闾里,扩大居住区,城市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某个特定区域或城市而言,由于城市建设形态不同,职能分工明显,主、辅城池相互依托,联系紧密,从而组群地域结构成为明显特征。总的说,各城市组群有如下几种群组形态(表5)。

表5 中国早期城市组群类型表

类型	城市形态	组群模式	特征	例
洛邑型			只有一个城圈,没有内外城之分。	东周王城洛邑,中山国都灵寿。
安邑型			由套在一起的大、小二城	夏县卫都安邑等。
新郑型			由两个连接的城组成,或东西并列,或大小相联,中间有一城垣将其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单独的城,但又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	新郑燕下都,临淄故城等。
邯郸型			系由王城,东郭城,北郭城组成。	邯郸故城。
新田型			王城居中,四角和一城相望。	晋国新田(山西侯马)

注:洛邑原有王城、成周2城,有人认为二者原为一地,但也不否认有2城,其布局为"□L"型。

4. 春秋战国城市分布

春秋时期城市,一方面保存了西周分封时建立的一些城邑,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国军事上的需要大建新城,以及驿道、运河的修建,新形势下的人口流动,大大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到春秋时代,究竟形成了多少城市群难以有准确的回答,但从文献记载看主要有以下几个:

(1) 以王城为中心,由郑、宋、卫等组成的城市群

该城市群城市数量多,且分布密,城市间距离多在10～20公里左右,包括管、蔡、陈、温、滑、息、申、郰、虢、商丘、沫、许等。

(2) 齐鲁城市群

该城市群以曲阜和临淄为中心,城市间距离多在20～30公里以内,包括极、须句、根牟、鄟、郚、向、牟、娄、防、兹、郠、郜、訾、绎、漆、闾丘、滥、启阳、平阳、鄢陵、培夏、灵父丘、五鹿、中牟、邺盖、社丘等,其交通发达,又地处资源地,商业繁荣。

(3) 邯郸城市群

该城市群以邯郸为中心,包括邯郸以南、太行山以东、平原西部和泰山以西平原东部,这些城市相距70～80公里,处在黄河改道和泛滥区,因此其分布散、发展慢。

(4) 长江流域城市群

该城市群以楚国郢都和吴王阖闾姑苏(今苏州)为中心,包括吕、阵、蔡、东西不羹、郧、蒋、申息、复城、巫丽城、麋湖城、檷、溪城、古城、鸭城、摇城、鸿城、云阳城、平陵城和淹城等。这些城市相距较远,但俱在长江沿岸地区,联系还算方便。

从总体上来看,到春秋时,城镇分布向南扩展,达到了汉水谷

地，甚至山东半岛也出现了许多都城。到战国末期，城市分布范围更广，除主要集中于陕西关中的泾渭谷地到潼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带，以及淮河流域外，长江流域巴（重庆）、蜀（成都）、吴（苏州）、越（绍兴）、楚郢（江陵）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三、秦汉时期城市发展与分布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统一天下到东汉末年(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共历时44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及走向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建立起封建郡县制度，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和文字，大大促进了全国经济、商品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新兴了一批具有以行政、商业职能为主的城市。

1. 郡县制与行政中心城市发展

秦、汉两代，国家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行政上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等，构成了全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中心体系网络。这种行政中心网络对全国城市体系的发展最明显的影响，是其职能组合结构中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开始占绝对优势。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初，设三十六郡[①]，设县数不详，估计有800～900个左右，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西汉时实行郡、国并行制，设郡十五，封诸侯国十[②]。

---

① 秦初设三十六郡，以后逐渐增至四十余郡。

② 自北而南有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淮阳、长沙10个诸侯国。

汉武帝时,为了增强抵抗匈奴的力量,曾迁山东、河南居民至河北、山西等地。同时,中原居民也逐渐向未开发区的四川盆地、两湖、江西和两广等地迁移,从而在这些地区新建置了一批县城。据记载,至西汉末,“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①,可见当时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已达 1690 个,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主体。

这些行政统治中心,在其后的历代中,绝大多数被延续下来,表现为规模不等的行政中心城市。它们虽然具有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但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其政治组织又进一步吸引了城市的经济职能,表现为行政中心层次愈高,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职能愈发达的特点。

2. 交通发展与商贸城市兴起

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政治、经济统治,曾动员了巨大民力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等“驰道”,并开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直达九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的“直道”,以及开发岭南的“新道”。同时在水运航道方面,不仅疏浚了鸿沟,通济、汝、淮、泗四水,形成当时北方的水运骨干网络,而且在南方吴、楚、蜀的长江流域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藉以行船和灌溉。即使在当时比较偏僻的岭南地区,也开辟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的天然水道。

下及汉代,正由于这些交通路线的畅通,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批商贸城市的兴起与繁荣。据史书记载,其时临

---

① 《汉书·地理志》。

淄、洛阳、邯郸、宛、成都是长安以外并称的五大都会。其中临淄"市租千金……巨于长安"[1];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2],东汉时期成为首都,商业更加繁盛,其时"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3];邯郸在战国时已是大商业城市,"北通燕、涿,南有郑、卫"[4];宛,西经武关入长安,北经阳翟通洛阳,东南临汉水、淮河、长江流域,"俗杂好事,业多贾"[5],成为当时南北交绥的大商业中心;至于成都也是其时西南最大的交换中心,西汉末年其居民有70000多户,仅次于临淄。此外,等而下之的还有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6]。番禺则是对外贸易的大都市,因为"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7]。再次一级的都会还有陈(今淮阳县)、睢阳(今商丘县)、陶(今定陶县)、杨(洪洞县)、平阳(今临汾)、寿春(今寿县)、合肥、江陵、彭城(今徐州)、桂林和真定(今石家庄东北)等城市。

3. 以小城市为主的等级规模结构

秦、汉时期,郡、县为中国一、二级行政区。秦时全国即已形成了首都—郡城(诸侯国都)—县城3级城市等级系列。到了汉代,为了强化地方统治,又增设了13～14个司隶部、刺史部统领各郡县,形成了首都—司隶校尉部、十二州刺史部驻所—郡、国(王国)、属国都尉都城—县、邑、道、公国、侯国治所驻地的4等级系列。

---

①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后汉书·仲长统传》。
④⑤⑥ 《史记·货殖列传》。
⑦ 《汉书·地理志下》。

东汉时期县城以上城市共有1076个，其等级规模结构具有明显的早期城市体系特点：其一，以小城市（县级城市）为主体，根据统计，其时有县级城市966个，已占全国总城市数90%左右；其二，层次分明，这一时期的城市等级系列除都城统领12个刺史部外，全国平均1个刺史部约统领9个郡级城市，1个郡级城市又统领9个县城，表明了等级系列层次分明这一早期体系特征。

4. 早期城市经济区与城市地域分布

秦、汉时期，随着上述全国性城市网的形成，相应地出现了依托于已兴盛起来的“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城市，对其腹地的经济起着沟通联系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间由大道或沟渠相通，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开发各有特色，矿产、海产、山林等资源利用各具所长，大体上形成了“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的十大早期城市经济区域（表6）。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全国虽然出现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十大经济区，但它们仍然是建立在自然分工、自然经济基础上的。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一方面，戍边和开发新区，组织了一系列的强制性移民；另一方面，城市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相应发展，从而促进了全国城市网的形成。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资料，至东汉永和年间，全国13校尉部、刺史部均已建立了郡—县2级城市网。从城市分布的地域空间结构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5省），其城市数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5；其次为淮河流域（约占14%）；而东南沿海分布最少。再以郡、县城比看，由于中国秦、汉时期是郡县制全面推行的初期，一般地说，经

表 6　秦汉时期的城市经济区域

城市经济区域	中心城市	《史记·货殖列传》及《盐铁论》记载的区域特征及地位
1. 关中地区	长安	南控巴蜀,西北控甘陇,“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是富庶的农业区,物产丰饶,“为九州膏腴”。
2. 陇右地区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地	“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是著名的畜牧区,“地亦险要”,以关中地区为交通要道。
3. 巴蜀地区	成都	“沃野”,是农业、矿业、手工业区。“南御滇楚”,“西近邛笮”,多粟,“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蜀刀、蜀布、漆器久负盛名,与关中经济联系特别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附属联系。
4. 三河地区	河东:扬、平阳;河内:温、轵;河南:洛阳	河东“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地边胡”,有盐铁之饶;河内“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是关中与中原联系的枢纽。
5. 燕赵地区	邯郸、燕	“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商贾错于路”;燕“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代田畜而事蚕”,“不事农商”,有较盛畜牧业。
6. 齐鲁地区	临淄	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鱼、盐、丝织天下闻名,制铁业也较发达。“邹、鲁、滨、洙、泗”,“好农而重民”,“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俗俭啬爱财”。
7. 梁宋地区	陶、睢阳	“好农”而“加以商贾”。睢阳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定陶在汉代不但商业发达,而且也是丝麻织物的著名产地,定陶汉代为织丝、织布手工业城镇,绯与齐齐名。
8. 颍川、南阳地区	颍川、宛	颍川即战国时的阳翟,是商货来往的集散地。宛是南阳地区的都会,“俗杂好事”,商业繁盛。
9. 三楚地区	西楚:江陵、陈 东楚:吴 南楚:寿春、合肥	江陵靠江背湖,水系交至,多木材可为船,西汉时已为造船中心;物产丰富,商贾转贩往来不绝,成为江陵与宛交通线上的鱼盐集散地。海盐、铜、鱼在吴集散,“江东一都会也”。合肥受南北潮(江淮之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地广人稀”,农业手工业还不发达。
10. 南越地区	番禺	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龙眼等)、布之凑”,“经商贾者多取富焉”。

济开发水平愈高，县城建制愈多，城市分布愈密，郡县城比也就愈小。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城市发展与分布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公元220～907年），是中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时期。尤其是长江流域，至南朝时已开发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重的经济区域。国力较秦、汉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强，从而大大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一）商品性农业与手工业城市兴起

自东汉末年起，中原地区由于陷入战乱状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向长江以南移民。下及南北朝时，长江流域农产品的市场流通量开始增加，尤其在南朝刘宋初年和北朝魏孝文帝时更为明显。其时就流通的农产品品种来说，木棉布、麻织品、漆器、茶叶等均成为常见的商品。就产品流通量而言，南方以粮为大，北方以绢为多。

到隋、唐两代，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南移，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生产更见发达。这一时期作为新商品进入市场的有蔗糖、煤炭、粮食、桑叶、蔬菜和水果等项，瓷器已与陶瓷分开，并逐渐代替金、银、漆器成为重要日用品，茶叶也由先前的次要商品一跃而成为重要商品，其种植范围已遍及长江

流域及江南许多地区。

正是由于商品性农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这一时期以新兴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兴起。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形成的手工业中心:纺织中心有定州(河北定县,主产绫)、宋州(河南商丘,主产绢)、益州(成都,主产棉、麻、纸)等;陶瓷中心有越州(绍兴一带,青瓷)、邢州(河北内丘,白瓷)、越鼎(陕西泾阳)、婺州、岳州、寿州以及洪州昌南镇(景德镇)等;制茶中心有安徽祁门、四川剑南等;其它手工业中心,如扬州(铜镜)、宣州(宣纸)、襄阳(漆器)、徽州(墨)、湖州(笔)以及长安(刻版印刷)等。

(二) 商品流通与港口城市繁荣

中唐以后,商品性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国力开始强大,经济上走向鼎盛繁荣时期。其时不仅商业兴盛,而且商品流通较前更为频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河港城市(以商品流通为主)和海港城市(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兴起与发展。

1. 以商品流通为主的河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唐代的水运较陆运发达,素有"江河帝国"之称。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看,长江流域已经成为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经济重心区,"给京师,备水旱,常漕东南之粟"①。黄河、淮河、长江和大运河即成为全国这两大经济中心区物资交流、汇集的主要通道,沿岸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批交通贸易型河港城市。据《旧唐书·崔融

① 《新唐书·食货志》。

传》记载，唐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诣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河运发达的盛况。在黄河流域，长安、洛阳自不必说，仅汴州就“……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瓯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铬，人安以舒，国赋应节”[①]，一派河港城市繁荣兴盛的景象。在长江流域，下游扬州，地处南北运河和东西长江交汇点，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和太湖流域物资交流的主要枢纽，“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②]，成为唐代漕运及盐转运中心；中游鄂州，“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③]；大运河沿线余杭（今杭州）、吴郡（今苏州）、楚州（今淮安）、宋州（今商丘）等也因水运得到很大发展。

2. 沿海贸易港口城市兴起

隋、唐是中国封建经济最强盛时期，对外贸易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就全国而言，扬州以北比较重要的海港城市有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楚州（今淮安）、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和莱州（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今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旅顺附近）；扬州以南主要海港城市有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及上海松江等。其中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世界最著名贸易港口城市。扬州、登州、莱州是唐代中日、中朝以及对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港口。作为制糖中心和茶叶市

---

①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
② 《唐会要》卷八六，《市》。
③ 《唐语林》卷八，《补遗》。

场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往来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

（三）军镇与草市的出现

国土开发范围扩大，地域经济繁荣，导致了边防军事重镇和大城市外围草市的兴起，成为中国小城镇发展的伊始。

1. 军事重镇的设置

据记载，中国军镇设置始于北魏。其时沿长城一线自西而东即设有沃野（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固阳西南）、武川（今武川西土城）、抚冥（今四子王镇东南）、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张北县境）6 个防御柔然等漠北民族的军镇。到唐代，这类军镇除仍在北方设置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西北、西南、东北地区。中宗景龙二年（公元 708 年）在呼和浩特至河套狼山一带边防地区筑了东、中、西"受降城"[①]；玄宗开元之后（公元 713 年），又先后沿边境设立了 9 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掌管一个地区的军事，也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有别于行政中心城市的军事重镇。

2. 草市的兴起

作为中国小城镇前身的草市，兴起于南北朝时期[②]，其起源为城市城门外供农民出售草料（饲料、燃料）等农产品的场所。如《南

---

① 东受降城即今托克托城。
② 《贞观政要》卷一，《论政体》第二。

齐书》就有建康(今南京)城外有草市,专设草市尉进行管理的记载。但这种草市直到唐代前期数量仍然很少,“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即使州、县以上治所,其置废也仍一秉于政府。

中唐以后,由于经济繁荣集中表现在手工业、商业的兴盛上,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商品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并且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置市的规定,在广大农村交通要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如荆州沙头市(今荆沙市)因地处水上交通要冲,而成为“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草市②;四川盐亭县雍江因产盐而成盐市,等等。

(四) 城市等级系列与百万特大城市开始出现

隋、唐两代,各种经济因素逐渐渗入到城市,改变和调整了过去城市体系等级序列,形成了由都城—道级驻所城市—府、州级驻所城市—县城—镇及草市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系统。在这一时期,不仅被毁的长安、洛阳得到了规划重建,而且新设州、县治所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魏晋南北朝全国共新设县城近220个。公元589年2月隋灭陈,得州30、县400。并在此基础上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③ 的原则,裁减了部分郡县,把州、郡、县三级制改

① 《唐会要》卷八六,《市》。
② 《舆地纪胜》卷六四。
③ 《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为州(郡)、县两级制。唐初承袭隋制,实行州、县二级制。中唐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又新设置道制作为监察区,后逐渐成为位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单位。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资料统计,其时都城2处(西京、东都)、道驻所12处、府州治所城市314处、县城及县级州治所城市1348处,城市(镇)总数达1676个,其数量远远超过历史上其它任何时期。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的兴起,从孙吴开始,经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东晋初年(公元317年)全城约有居民4万户,每户以4人计,人口规模不足20万。梁武帝时(公元502～548年)"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①],每户以4人计,总人口亦逾百万,成为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城市[②]。

其次,北魏都城洛阳的复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长期荒凉的面貌迅速改变,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据《唐六典》记载,"今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隋代洛阳在遭受战火破坏的基础上重建,规模巨大,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工商城市。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全城人口也达百万以上,成为继南京后,第二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

① 《太平寰宇记》引《金陵记》。

② 南朝梁时,都城颇小,都城附近的小城则更小,且不相接。文中所述范围,其中包括大量农民,所以人口超过百万之说,尚可斟酌。

其三,都城长安的重建。隋、唐长安都城在被毁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建设,城垣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城周长37.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其中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11条,东西南北大街交错,形成108坊。白居易形容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堪称“世界首都”。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仅天授二年,武则天即徙关内七州数十万人实“神都”。估计当时人口至少也在百万左右,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其四,东都洛阳虽始筑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谓之新都,但至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改为东都。其宫城在皇城北,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十二里二百四十一步。皇城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十五里二百五十步。城中南北四街,东西四街。东京城隋大业元年筑,曰罗郭城。唐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增筑改称金城;其周达五十二里,城内纵横各十街,坊一百十三,市三。若按长安城市人口密度计,人口亦在百万左右。

(五) 水运网形成与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

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经济基地。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逐渐超过了其它流域,成为全国首富的农业地区,形成了“国家财赋,仰给东南”的局面。与之相对应,长江水运网包括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如赣江、湘江、沔水(汉水),以及郁水(今珠江水系)和大运河的水运网,共同构成了中国南方及东部发达的水运系统,把众多的城市联结在一起。至唐末,

中国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开始出现了沿运河和沿长江两条城市发展轴线。

1．运河城市发展轴线

隋大运河的开凿，把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与仍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黄河流域以通畅便捷的水运联结起来，成为中国主要商品流通通道和经济发展的命脉。沿河两岸，一方面因其腹地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因商品流通便捷，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一些通都大邑由此兴旺起来。沿岸的楚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当时并称四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镇江）、常州也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形成了中国第一条南北向的轴线。

2．沿江城市发展轴线

汉、魏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成为当时主要的交通路线，其沿岸以及“三吴”地区的经济繁荣，大大小小的水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小城市融为一体，逐渐成为中国又一条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在这一时期，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为长江下游大港，秦淮河两岸市集众多，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夏口（汉口）、江陵、成都与南京并称长江流域六大都市；沿江浔阳（九江）、豫章（南昌）和下游地区及周围的吴郡（苏州）、毗陵（常州）、会稽（绍兴）、余杭（杭州），以及沔水（今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港口城市。至中唐时期，长江干流（上游至重

庆)沿江即有州城15处，县城19处，重要集镇18处。长江流域城市发展轴线初步形成。

五、五代宋元时期城市发展与分布

五代、宋、元时期(公元907～1368年)，是中国城市发展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将近500年的历史时期内，尽管国力不及唐代，但就生产力水平而言仍有较大的提高。如在农业方面，犁、秧马、耘具等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改进，圩田和棉田的大面积建设，南方稻麦轮作制的施行，以及茶叶、棉花、蚕桑、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推广等都取得了进展。在手工业方面，随着胆水浸铜法的推广，冶铁铸造业中煤的应用，印刷术的发明，火药用于军事，指南针用于航海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又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中国城市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一) 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与政治经济中心形成

在宋代，由于农村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职能有了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上传统的坊里制度被打破，出现了临街设店的景象；商品流通中产生和推广了交子(纸币)[①]；财政收

---

① 宋太宗和真宗年间开始发行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其流通范围很广，《马可波罗游记》卷二记有“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

入方面开始征收商税[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许多原先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已逐渐演变为政治、经济职能并重的城市[②]。

从经济类型看,这一时期的经济性城市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3种类型。

1. 工商型城市

这类城市通常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它们既可以利用周围农村提供的原料发展手工业生产,又可以吸收周围乡村集市的商品和自身生产的商品来发展商业贸易。如平江(苏州)在南宋时,既是府治所在,又是全国纺织生产基地和商品交换中心,成为江南地区工商业都十分繁荣的都会;又如成都,在北宋时,既是成都府治,又是历代全国的纺织生产基地,进一步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都会。此外,还有西南的梓州、果州(纺织兼商业)、遂州(冰糖、纺织和商业),以及长江下游的扬州、镇江、吴江、吴兴以及绍兴等,也都是这类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城市。

---

①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全国征收商税的城市达310个,其中商税超2万贯的州城42个,县城4个。

② 如四川梓州(今三台县)就是唐、宋之际由政治性城市发展成为经济性城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唐肃宗时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梓州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政治地位与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所的成都相等。但经济地位则是"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个大县"(《舆地纪胜》卷一五四),完全是个政治性城市。到了宋代,梓州不仅发展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而且已有"纺织户数千家"(《宋会要·食货》卷六四),成为与成都相匹敌的纺织中心。梓州路的井盐生产特别发达,井盐产量为全川之冠,是成都地区食盐的主要供应地,药材贸易也相当繁荣,还是川中地区交通枢纽和商业贸易中心。到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商税收入即达5.5万余贯,仅次于成都府城的商税收入,居四川州城税收第二位,其经济职能已相当明显。

2. 商业型城市

这类城市多出现在水陆交通要道，由于货物中转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而形成。如在大运河沿岸，随着大运河疏浚，临安（杭州）、汴京（开封）[①]、大都（北京）等大的政治中心也发展成为全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其规模之大，人口之众，在当时是无出其右的。长江沿岸也出现了许多商业性城市，如京口（镇江）、芜湖、江州蕲口、鄂州、荆州等。其中鄂州尤盛，其商业影响范围东及海，西至于川，南抵珠江，北达淮水，“盖川、广、襄、淮、浙贸迁之会”[②]，“市邑雄富，列肆繁错”[③]。真州（今仪征），在北宋时即已代替了隋唐时期扬州的地位，成为两淮、江浙诸路货物集散地，至元代，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其商税收入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3. 手工业型城市

这类城市与魏、晋、隋、唐时期手工业城市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起源既非行政中心，又非交通冲要，而主要依赖于手工业或矿业形成发展起来。五代、宋、元时期，中国在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军器、冶金、制盐的生产规模、品种、数量和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些手工业型城市排除原有政治方面的因

---

① 《汴都赋》曾有汴京“竭五都之环富，备九州之货贿”的记载。据周宝珠“宋代东京城市经济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交流中的地位”（载《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一文认为，宋代东京城市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工商业人数在城市人口中比重扩大，坊市合一的新型市容面貌的形成和坊厢制度得以建立，手工业和雇佣劳动制也相应有所发展。并经考证，推出元丰年间东京工商业及其它服务行业共约有 1.5 万多户。

② 范成大：《吴船录》下。

③ 陆游：《入蜀记》卷四。

素而独立发展起来。首先,这一时期造纸技术已进入成熟时期,北宋都城开封、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等都发展成为印刷业的中心;至元代套色印刷、活字排版技术的应用,使福建建宁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印刷中心。其二,陶瓷历为中国传统工业产品,宋、元时期,无论在产量还是在技术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时除定窑(河北曲阳)、汝窑(河南临汝)、官窑(北宋在开封,南宋在杭州)、钧窑(河南禹县)、哥窑(浙江龙泉)等五大名窑外,还新兴了景德镇和建阳等名窑。尤其是景德镇,自北宋中叶后已成为扬名中外的瓷器产地。其三,棉纺织业这一新兴手工业部门,至元代有了重大发展,几乎取代了原有的麻织业和丝织业的地位,成为农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为明清棉纺织为主的市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四,盐业、矿冶业这一时期也见发达,如四川陵井监(今仁寿)、大宁监、富顺监,淯井监等井盐产地,也逐渐发展为以生产井盐为主的手工业城市;邢台(今河北邢台)、彭城(今江苏徐州)、繁昌(今安徽繁昌)和同安(今福建同安)等地建成为冶铁中心,江西丰城、萍乡煤矿也开始开采。

(二) 农村商品经济发达与草市演变

宋代商业性集镇繁荣,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标志。这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较大发展,实行特殊的赋税制度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一方面,农业生产技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大进步。农村江东犁、踏犁、銐刀、龙骨车、筒车、秧马的应用日益普遍,不仅陂泽(围田)、荒滩(涂田、沙田)、江湖水域(葑田)得以开

发，而且陡坡（梯田）也出现了“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①] 的坡地农业局面。农作物稻麦、茶叶、甘蔗、棉花、桑树、果蔬的栽培日益普及，既为手工业提供了充沛的原料，又成为商业性集镇发展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宋代的折变、支移、税钱等特殊的赋税制度，也迫使纳税对象更加广泛地与市场取得联系。熙宁后（公元 1077 年后）又加征麦苗、免役、无额上供等税务；宣和（公元 1119 年）又创立经制，绍兴（公元 1131 年）增设总制，月桩、板账、绢估种种钱色目，以致穷乡僻壤的农民不得不“为了官租才出市”，促进了商业性集镇的形成与发展。综观这一时期集镇的发展，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1. 草市大量涌现

如前所述，草市始见于南北朝文献，南朝、隋、唐各代都已有了初步发展。至唐末，在某些商业繁荣的城市开始出现夜市和附城草市，农村中定期开放的小市也越来越多。五代开始，北方陷入战乱，附城草市反见发达。到了后期，有些草市即开始向镇市发展了[②]。到了北宋，由于城市建设彻底冲破了坊、市之间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导致了城市内部集市的产生；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不少城市由于规模扩大，限于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敷使用，商业区因此扩大到城外，也加快了草市的大量兴起。

2. 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

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

---

① 楼钥：《攻媿集》卷七。

② 如后晋天福二年设置的无锡竹塔市就是南方早期的镇市。

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通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在早期，中国的市和镇之间有着比较严格的界线，“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1]。不难看出，其时“市”仅具有经济职能，“镇”则是镇守的地方，具有军事、行政的职能。即使到唐末五代时，大多数镇仍是军事驻防要地，县以下的镇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工商业职能。

北宋开国后，镇市完全摆脱晚唐五代时期军镇色彩，纯粹以贸易镇市出现于经济领域。于是在县治与草市之间也就有了镇的建置，促进了商业性集镇的发展。市和镇之间的区分标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2]，二者并无质的不同，仅有量的差异而已。

南宋时，随着商品货币关系渗入农村，在县以下出现了很多这类市镇，成为农村商品交换中心和城乡物资交流的连结点，而且其分布范围几乎遍及南方各省区。如浙江嘉兴的濮院镇，南宋建炎前只是一个草市，后来随着丝织业的兴盛，日益增多的丝织品流向濮院镇，出现了专门为城市大商人收购土绢的绢庄和牙行，濮院就由草市发展成为著名的丝织业集镇。

3. 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

在宋代，市镇尽管经济职能较强，但“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3]，各色工匠的“工业”生产活动，也是市镇经济的一个组成

---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
③ 《宋会要·食货》。

部分。在个体手工艺生产的同时,一批手工业作坊也逐渐在市镇萌生。如饶州浮梁景德镇,其时陶瓷生产就相当兴盛,据元人蒋祈《陶记》,宋代已有"三百余座"瓷窑,生产工艺已有陶工、匣工、土工、利坯、车坯、釉坯、印花、画花、雕花这些工种及工艺程序类别。又如徐州白土镇"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可见这一时期随着市镇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与生产进一步扩大,在原有商业性集镇的基础上,又涌现了一批具有手工业专业倾向色彩的市镇。除上述陶瓷专业镇外,还有筠州清溪市矿冶专业镇,陵州赖爨盐业镇,彭州蒲村茶业镇,遂州凤台、兴化军龙华糖业镇,泉州安海、秀州青龙航运业镇等。这批市镇的出现,不但显示了宋代经济作物、手工制造与商业的高度发展,同时还标志着草市镇经济自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 外贸发展与东南沿海海港城市繁荣

宋代国力水平虽不及唐代,但手工业、商业繁盛,海上交通也更趋发达。北宋时,东至朝鲜、日本,南至南洋、印度,西到波斯、阿拉伯,远达非洲,都有海上贸易往来。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海港城市获得了很大发展。北宋时曾于杭州、明州、泉州、密州板桥镇、秀州华亭县(今上海嘉定县内)等设市舶司。南宋时又新设温州、江阴军、秀州海盐县澉浦为市舶司。这些地方都是宋时的重要海港。其中广、泉、明、杭、密 5 州尤为重要,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额几乎占全国的 90% 以上。此外,还有长江口以北的通(南通)、楚(淮安)、海(连云港海州镇)诸州,长江以南的越(今绍兴市)、台(今浙江临海县)、福、漳、潮、雷(今广东海康)、琼等州,以及

镇江、平江(苏州)两府也都是通航海港。

但应指出,宋代由于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定,海港城市兴废盛衰较频。北宋时,山东半岛渤海湾北岸属辽,有航海之禁。盛唐主要海港登、莱2州一蹶不振,与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同降为次级的海港城市(镇)。南宋时由于金兵劫掠,南宋与金又长期南北对峙,扬州大港也很快衰落,国内贸易为真州(仪征)所代替,国际贸易分别退让于杭州、明州(宁波)。东南沿海海港城市发展迅速,广州、泉州和明州成为南宋三大贸易港。到宋末、元初,泉州因地处杭州、广州之间,港口条件良好,晋江流域又是丝、茶、瓷器的主要产区之一,成为国际著名大港,全国对外贸易中心也由广州逐渐移至此。至于福州也以交通条件优越,成为“工商辐辏之所”,国际贸易也很发达。

元时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宋代诸海港仍为主要的对外贸易站点。据记载,元时先后曾于长江以南的广州、泉州、温州、庆元(今宁波)、杭州、澉浦、上海等处设立市舶司。至于长江口以北的海上交通运输则以漕运为主。总之,这一时期海上贸易仍以广州、泉州和明州为中心,其中泉州且被堪称为“世界最大港口”。

(四)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网络出现

在宋代,由于城市经济职能加强,相应地形成了一批经济实力比一般城市雄厚的地区性经济中心(中等城市)。这些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不仅是该地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中心、手工业生产中心和交通要地,而且也是商品交换、物资集散或对外贸易的中心。根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全国各主要城市商税额最高(40 万贯以上)的有东京(开封)、兴元(汉中)和成都 3 个城市;10～40 万贯的有 24 个;5～10 万贯的有 30 个;3～5 万贯的有 51 个;1～3 万贯的有 95 个;1 万贯以下的有 108 个。可见,当时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已普遍出现。

(五) 核心城市的频繁转移

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转向东南,出现了全国性都城建于北方,而经济重心则南移到东南沿海地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的局面。南宋政权南迁以后,更进一步加速了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而且使政治中心也从中原转移到江南。辽建南京是燕京(今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前奏;金建中都,将其发展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到了元代,大都(今北京)终于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元大运河的重新开通,成为联系北方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通道,对全国城市体系内部结构的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明清时期城市发展与分布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公元 1368～1840 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停滞的时期,但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全国城镇仍表现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一）江南市镇的蓬勃兴起

在封建农业社会中，商业和手工业与城市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商品性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首推江南地区。宋代以后，江南地区由于商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新兴市镇开始萌芽生长。明、清两代在江南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早期的“城镇化”正是伴随着这种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以吴江县为例，在弘治前，全县共有 4 镇、3 市、249 村①；嘉靖时上升为 4 镇、7 市②；到康熙年间，更进一步上升为 7 镇 11 市③，其中 3 个市发展为镇，1 个村发展为市。可见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发展非常迅速。乾隆《吴江县志》记载，“自明初至我朝（清）三百余年间，民物滋丰，工商辐辏，月异而岁不同。……市镇所以递有增易，而村则小者日多，名亦益俗，固不可得而复增矣”④。这些都说明了明、清以来商品化程度相当高的吴江县市镇成长过程，市镇数量越来越多，相对地村的数量越来越少，这种乡村人口向市镇流动，大量变乡村为市镇的“城市化”过程，是中国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勃兴的两个重要特征。

根据城镇经济特点，可将这些城镇划分为 3 种不同类型。

1. 商业市镇

这一时期这类市镇是地方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所，它

---

① 弘治《吴江县志》。
② 《濮川所闻记》卷四；明孝培：《翔云观碑记》。
③④ 《濮镇纪闻》卷首，《风俗》。

们大多位居交通要道，而且与所在各府的大、中城市有密切联系。其分布尤以江南太湖流域最为典型。如杭州府的北新关镇、塘栖镇；苏州府吴县的甫里镇、浒墅镇；常熟的福山镇、支塘镇；吴江的同里镇、黎里镇；嘉兴的新丰塘镇；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桐乡的皂林镇；松江的魏塘镇、三林塘镇、新塘镇等。

2. 手工业市镇

这类市镇是宋末、元代商业集镇向手工业专业城镇转化的继续。从分布上看，仍以江南地区苏、松、杭、嘉、湖五府最为突出。如嘉兴府的濮院镇，在宋、元时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商业性市镇，而自明隆庆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极工，丝紬之名，遂著远近"，"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囊群至"[1]，号称"绸市"。

3. 手工业—商业市镇

这类市镇是在前期手工业市镇发展的基础上，城镇手工业间、城镇之间交换不断增多，以及城乡间和国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如湖丝贸易中心菱湖[2]，蚕丝贸易中心嘉兴石门[3]，"绫罗纱绸出盛泽镇"[4]，"绫（线）、布（三梭）二物衣被天下"的上海[5] 和常熟[6]，陶瓷"鬻于四方"的景德镇[7] 和宜兴[8]，糖"商贩四方货卖"的

---

① 《濮镇纪闻》卷首，《风俗》。
②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三一。
③ 王稚登：《客越志》。
④ 康熙《吴江县志》卷十，《物产》。
⑤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⑥ 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
⑦ 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
⑧ 王稚登：《荆溪疏》。

泉州与漳州[1]，以及竹纸“行天下”的福建顺昌和茶市安徽霍山等[2]，都是由于手工业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成为贸易交换中心市镇的。

（二）沿江、沿运河城市发展轴线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大运河是中国明、清时期东西、南北两大通道。基于这一时期沿海各大、中港口开放关闭不一，因而河港城市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唐代以来形成的沿江、沿运河两条城市发展轴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 沿江城市发展轴线

这一地域由于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全面开发，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前，不仅它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棉、麻、茶、桑等经济作物主要产区，而且手工纺织业也繁盛起来，从而促进了沿江商业、手工业、交通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其时长江与运河交会的浒墅关、镇江、扬州等都是著名的城市，沿江的江宁（南京）、芜湖、安庆、汉口以及重庆等也发展为重要商埠城市。据史料记载，其时镇江“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百物以通有无”[3]；扬州不仅是淮南盐业集散中心，而且是江北商业中心，“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4]；芜湖也“市廛鳞次，百物翔集，布帛鱼盐、繈至而辐辏，市声

① 万历《闽大记》卷一一，《食货考》。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③ 康熙《江南通志》卷九。
④ 乾隆《淮安府志》卷一三，《盐法》。

若潮,至夕不得休”[1];汉口则兴于明而繁于清,为“九省通衢”,“商贾之牙侩,丝帛之廛肆,鱼米之市,肥其妻子,雄视里闬”,“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2],是长江中游地区食盐、粮食、棉布、木材、药材等的主要集散中心。

2. 沿运河城市发展轴线

由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再次分离，大运河成为全国经济的主要命脉，通都大邑林立两岸。如通州、天津、德州、聊城、张秋、济宁、韩庄、淮阴、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均以人物殷阜著称于世。即使俗称“肠梗阻”的山东运河段，其城市发展也盛况空前。如德州“水陆所交，轮帆毕集，人烟稠密，商货纷纭”[3]；临清“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华萃止，两河则万艘安流”[4]；济宁也商贾负贩，“阛城溢郡，辐辏鳞萃，无虑数十万”[5]；淮安更是“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户寄居不下数十万”[6]。可见这一时期沿运河城市已相当发达。

（三）边陲地域城镇分布的扩展

明、清两代对边疆地带移民,推行屯田政策也较为重视。据

---

① 嘉庆《芜湖县志》卷一,《风俗》。
② 《清高祖实录》卷二四七。
③ 吴锡麟:《还京日记》。
④ 康熙《临清州志》序。
⑤ 乾隆《济宁州志》卷三二。
⑥ 乾隆《淮安府志》卷一三。

《明史·食货志》记载,“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在在兴屯矣”。在这种形势下,当时全国城镇及其体系的地域空间分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图 2),主要有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台湾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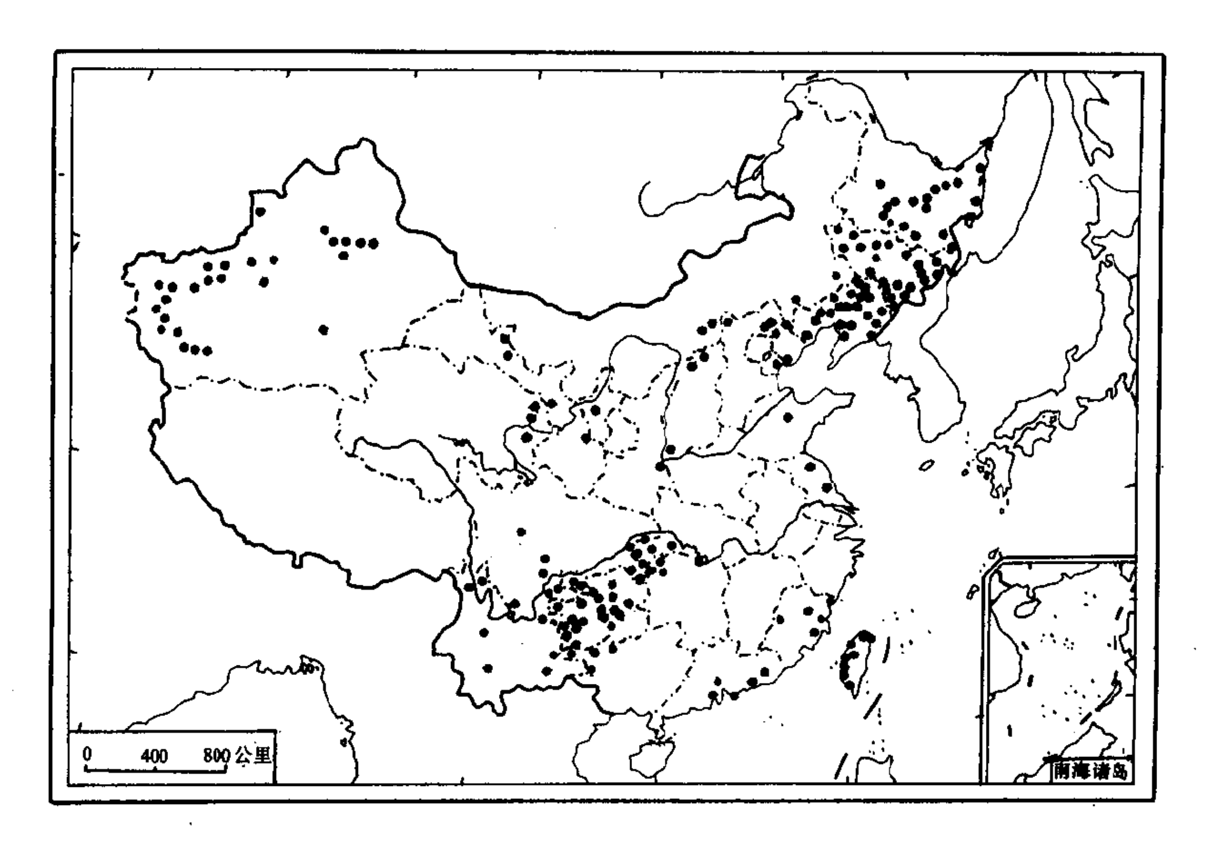


图 2 清代新设城市(包括县城)分布示意图

1. 西南地区

明、清两代随着政区不断推进,在云、贵、川、湖、广等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平定了土司叛乱后又广建府、县治所。如云南“地产银、锡、铅、白锡”,其时“商贾辐辏,烟火繁稠”,“东川府属之汤丹、大水、碌碌三厂最旺,武定府属之多那厂次之

……"[1];又如贵州的"毕节,为黔滇两省铜运总汇处,市集甚盛"[2]。即使在西藏高原,其时拉萨也成为西藏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少寺庙也成为重要的贸易市集。"四川打箭炉(康定)为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3]。可见这一时期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城镇也开始形成发展起来了。

2. 西北地区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首先打退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平定准噶尔和"回部"上层分裂势力的叛乱,在新的安定统一的历史条件下,蒙古、乌梁海、"回部"地区各族人民"聚族而居者日益加繁"[4]。西北各地也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如归绥(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迪化(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回城、伊犁、哈密、阿克苏和西宁等地,逐渐成为"内地商人、外蕃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5]的城镇。

3. 东北地区

一般地说,东北是中国地域开发最晚的地区。直至明代中叶为了抵御后金重兵压境,才开始在"切肤要镇"沈阳修筑城池,加强军事防卫。其时为了沟通关内外经济,吸引海西、蒙古、建州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参加贸易,又在开原、抚顺和广宁(北镇)设三大马

---

①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全厂行记一》第八帙,第39页。
②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蜀徼纪闻》第八帙,第7页。
③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打箭炉商务》,第十七册。
④⑤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新疆纪略》第二帙,第70页。

市。明末时，后金曾将首都自东京（辽阳）迁至沈阳，使沈阳一举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嗣后，奉天地区的辽阳、海城、凤凰城、熊岳、锦州、宁远（兴城）、广宁（北镇）、新民、金州、复州、盖平、镇江城（今丹东）、抚西城（今抚顺）、清原、铁岭、开原、昌图，吉林地区的吉林、宁古塔、伯都纳、阿勒楚克、三姓拉林、珲春，黑龙江地区的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布特哈、呼伦贝尔、呼兰等城镇，分别兴起各种手工业作坊，商号商铺林立，商贾云集。据《黑龙江述略》记载，"纳貂之期，各部大会于齐齐哈尔，卓帐荒郊，皮张山积，商贾趋之如骛"。但其后，因满清入关统治中国后，视东北为祖宗发祥之地，禁止汉人出关，人口骤减。尽管盛京仍定为留都，而城镇的发展则长期停滞于衰落的常年贸易之中。

4. 台湾地区

清朝初年，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开始在台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统一台湾，翌年设 1 府 3 县，府治台湾（今台南），凤山（今高雄县）、嘉义、彰化 3 县城，以及其它城镇开始兴起。据记载，其后至 1895 年日本侵占台湾前，有清一代在台湾省又新建了 5 座县城①。

（四）行政中心城市网更趋完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比较均衡

明、清两代由于政治上统一，随着国土资源的开发，全国行政

① 这一时期在台湾北部设淡水厅（今新竹）、南雅厅、噶玛兰厅（今宜兰）；东部设花莲厅（今花莲）以及澎湖群岛设澎湖厅等。

中心网络更趋于扩展和完善。从行政体系设置看，明、清两代继承了宋、元体制，明设布政使司，清置省(均相当于元代中书省制)，下及府、州、县、镇4级。无论在内地，还是在边远地区，这种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和政令统一的全国行政中心城市网已经基本形成。与之相对应，全国首都—省城—府(州)城—县城—镇5级行政中心城市网也更加完善。

这一时期由于小城镇的发展，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渐趋均衡，小城市(包括县城和镇)占绝对优势，中等城市居中，大城市相应发展，呈金字塔形的等级规模分布特征(表7)。

表7 明清时期全国城镇等级规模统计表

等级规模	城镇数	城市(镇)名称
特大城市(人口大于100万)	3	南京、北京、苏州
大城市(人口50～100万)	约9	扬州、杭州、广州、汉口、福州、佛山、天津、上海、厦门
中等城市(人口20～50万)	约100	松江、镇江、淮安、常州、仪真、湖州、嘉兴、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阴(临汾)、浦州(永济)、成都、重庆、泸州、九江、浒墅(苏州西)、芜湖、宁波、廉州(合浦)、沙市、河间、保定、宣化、西安、徽州、东昌(聊城)、池州、徐州、泉州等
小城市及镇(包括县城)	约2000多	略
农村集市	4000～6000	略

第三章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分布

1840～1949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在这109年间，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国家城市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一、近代城市发展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叩关而入，打开了中国历时2000余年的闭关自守的门户。中国被迫开放对外贸易口岸，大量倾销外国商品和输入资本，引进西方近代工业、交通技术等，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

（一）商埠开放与贸易口岸城市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帝国主义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短短的60多年时间里，通过这些条约，首先迫使中国沿海、沿江地区，以及南方珠江流域和东北

黑龙江流域开港开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这类城市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沿海贸易港口城市相比,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城市(镇)经济贸易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并为其服务,表现为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征。岳阳、汉口、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等13个城市,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北沿海、东西沿江两条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

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西南、西北的内陆边疆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陆路商埠城市也得到了一定发展。这类城市在北方地区主要有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西北地区有甘肃的嘉峪关,新疆的喀什、伊犁、塔城;在西南地区有云南的河口、思茅、蒙自,广西的龙州,以及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共13个城市(镇)。这些城市与上述沿海、沿江两条贸易港口城市(镇)轴带相结合,共同组成与世界商品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经济特性的贸易商埠城市体系。

(二) 铁路、公路建设与交通型城市兴起

在门户洞开,贸易商埠城市产生、发展的同时,全国近代陆路交通(铁路、公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自1876年第一条铁路——淞沪轻便铁路建设,到1913年第一条公路——长(沙)(湘)潭公路建成,是中国近代陆上交通的嚆矢。

在铁路建设方面,1895年法帝国主义第一个掠夺了中国的筑路权,把铁路从越南修到了中国境内龙州;随后英、俄、德、日等帝国主义也攫取了在中国建设铁路的筑路权。据资料记载,自中日

甲午战争后(1896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内,全国共建设35条铁路主要干线,使中国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零星建设到部分地区骨干线路形成,促进了中国新型的铁路枢纽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城市(铁路与主要河流交会口城市)的兴起。

从中国新兴铁路对城市兴起、发展的影响看,可以分为3种情况:①由于铁路修建而形成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石家庄、蚌埠和株洲等,为数虽不多,但对以后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②由于铁路通过而促进了原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如北京、济南、徐州、南昌、衡阳、柳州等。③由于铁路建设,改变了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使原有交通性城市停滞乃至衰落,如大运河沿线的扬州、淮阴、临清,上海附近的浏河、嘉定,浙江的南浔等。此外,铁路的兴建还带动了一系列县城、小城镇的发展,其数量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在公路建设方面,中国的公路建设与铁路、水运相比,其兴起较晚,而且由于中国东部地区这一时期主要交通方式是水运和铁路运输,公路大多作为集散物资的辅助运输线,因此对城市(镇)的发展影响一般较小。而在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这里缺乏水运干线,另一方面还没有兴修铁路,因而将公路作为主要交通方式,故其发展就相应地促进了沿线一些城市(镇)的兴起。如陕西的宝鸡、双石铺,甘肃的天水、华家岭,四川的广元,云南的腾冲等。

(三) 工矿业发展与工矿城市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者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并进一步由原来的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充分利用港口及交通

优势,恣意掠夺矿产、农副产品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纷纷兴办近代工矿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僚买办工业、民族工业也相继出现,从而促进了一系列近代工矿城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1. 近代工业城市(镇)的兴起

中国近代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据初步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50年中,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及民族资本先后共兴办100多个大小企业。在这些早期的近代工业中,外国资本主要兴办了一些与港口、贸易相联系的船舶修造、出口加工等加工工业;官僚、买办及民族资本则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包括机器工业)为主体,其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的上海、香港、广州、福州、天津,以及沿江地带的汉口、九江、南京等城市。其后直到19世纪末叶,中国近代加工工业进一步发展,其分布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周围的无锡、南通、崇明、常熟、江阴、杭州、萧山和宁波等城市或县城,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

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新建的铁路成为生产和消费联系的主要通道,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以及旧式钱庄、票号初步转为银行资本,为中国近代加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进一步扩张,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这一时期近代工业的发展。到抗日战争前,由于中国加工工业的发展,在南方除上海、武汉、广州三大城市仍得到发展外,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典型的民族工业形式的较大的工业城市,如无锡、南通等;在北方沿海地区,则又形成了天津、青岛以轻纺为主的两大工业中心,大连、沈阳、济南的新

兴加工工业也有所发展。从当时工人数量分布看,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5城市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0%,其中上海即达25%。可见这5城市已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加工工业城市。此外,这一时期,沿江中下游的南通、芜湖、九江、安庆、长沙,津浦、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济南、石家庄、郑州、宝坻等的棉纺织业,大连的食品工业,也都有了发展,于是基本上奠定了抗战前旧中国加工工业城市(镇)的地域空间分布总格局。

2. 近代矿业城市(镇)的兴起

自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工、矿、交通等新兴事业发展,引起了对煤炭的大量需求。至70年代中叶,采用新法采煤的首先是台湾的基隆煤矿,继之而起的还有直隶的开平,湖北的广济、兴国,安徽的池州,山西的阳泉,河南的焦作,河北的唐山、井陉、滦州,辽宁的阜新、抚顺、本溪,内蒙古的扎赉诺尔,江西的萍乡,山东的淄博、峄县(枣庄)的中兴等煤矿,先后纷纷建成投产。

与此同时,与军事工业相联系的金属矿也采用新法开采。其时开采的金属矿首先是制造子弹所急需的铅矿及铜矿,其次是铁矿及其它金属矿。20世纪以前,中国用新法开采、冶炼的金属矿中,比较重要的有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其它如张家口外科尔沁山铅矿、山东淄川铅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以及发展稍晚的铜仁汞矿等。山东招远金矿局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设厂开矿,极盛时期曾雇用3000多人,监工130多人,可见规模相当大①。

总的看来,中国早期矿业城市(镇)的兴起,主要是由于煤炭、

① 招远县地名办公室:《招远县地名资料》,1982年。

铁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而且与外国资本输入、官僚买办资本投资和民族资本聚集等密切相关，但与早期的商埠城市联系则相对薄弱。这一时期兴起且对中国以后影响较大的城市主要有抚顺、唐山、焦作、大冶、萍乡、玉门等。

二、近代城市规模的变化

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中国经济面貌比19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外贸口岸由60处增至100处以上，铁路由370公里增至1.4万公里，等等。这一切也带来了中国近代城市规模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大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与封建社会时期相比，整个规模结构呈两极分化、畸形发展的趋势。

(一) 大城市畸形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一批新兴的商贸、工矿城市人口规模急剧扩大，有些城市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即由原来的蕞尔小村一变而为大、中型城市。从其职能看，主要有4种类型。

1. 殖民地型港口贸易城市

这类城市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源掠夺、经济侵略的据点和桥头堡。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如香港，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黑龙江的哈尔滨等城市，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城市人口规模

均由原来的数百人(最多数千人)上升为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2. 新兴矿业城市

这类城市是凭藉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得到迅速发展的。如河北的唐山,辽宁的抚顺、本溪、鞍山,河南的焦作,江西的萍乡等城市,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加到二三十万人。

3. 新兴铁路枢纽城市

这类城市是随着铁路的建设而兴起的。如安徽蚌埠市原来仅是一个500户人家的渔村,而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后即开始迅速发展,至1926年的18年时间内,人口规模就达到20万人以上。河北的石家庄,1900年时也是一个仅有800余人的小村庄,自(1904～1911年)京汉、石太铁路建成后,便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铁路枢纽,1933年市区人口达6.3万,至1949年更达到28万人,在40多年内,人口增长了300余倍。

4. 新辟商埠的老城市

这类城市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由于开辟通商口岸而发展起来的,多分布于沿海或沿江地带。如地处江海之会的上海,自1843年辟为商埠后,帝国主义者陆续侵入,强行设置租界,城市规模得到了较大增长。尤其是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切断了广州通往内地的商路,1857年帝国主义又取得长江航运权,自此上海便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城市。此后上海又由于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工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首屈一指的经济都会,其

人口规模从1852年的54.5万人激增到1910年的130万人,1933年达到340万,而到1949年初竟达545.5万。又如天津市,自1860年被迫开埠后,工商业得到了相应发展,到1935年,人口规模由开埠初的30万猛增为106.8万。此外沿海地带的广州、汕头、营口等,沿江的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岳阳、沙市、宜昌、万县、重庆、泸县、宜宾等,其人口规模也都有了显著的扩大,进入了大、中城市的行列。

(二)小城镇增长迅速

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洋货"大量倾销中国市场,如"洋纱"、"洋布"代替土纱、土布,使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业等自然经济解体;与此同时,又由于商品流通的增大和农产品商品化,大大促进了中国小城镇的普遍发展。按照其职能的不同,增长迅速的小城镇大体上可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 农村小市集

这类小城镇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一部分衣食所需和日常杂用仰赖市场的情形下,逐步形成的农村地区小城镇。如《川沙县志》记有:"文兴镇,……旋有张炳华、曹翔青等开设南北杂货、花米行,渐见发达。于是,各商闻风咸集,至光绪30年间,异常兴盛。文兴镇成为川沙各镇之冠"[1]。又如黑龙江呼兰"县属之松浦镇,旧为一片荒甸,民国九年

[1] 民国《川沙县志》。

始辟市场,……商贾渐集,……商业日称盛矣”[①]。又据江苏松江府、浙江杭州府、河北滦州和山西代州等四府州统计,嘉庆年间(1796～1820年)共辖县21个,有市镇235个(其中荒废的仅9个),可见农村小市集在上述经济条件影响下,其发展是相当快的。

2. 近代交通小城镇

随着中国近代交通兴起,许多近代交通小城镇也发展起来。如“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中俄新约成立,俄员依万年克在开原境内购买铁路用地,指定城西南距城18里之小孙家店设立火车站,……从前之荒僻小村,竟易为全境商务之中心点矣”[②]。黑龙江呼兰县“康金井镇,在县东北,距县治70里,旧为一小村屯,自呼海路于此设站,乃渐发达”[③]。浙江杭州府拱宸桥市,“地本荒凉,墟墓所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辟其地为商埠,……市廛栉比”[④]。

3. 近代工矿业小城镇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期,帝国主义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中国纷纷兴办工矿企业。在这种社会经济形势下,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投资工矿企业。但民族资本由于经济力量软弱,不得不依附于封建官僚资本经济,而且其资金短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因此它们必然多在大城市外围发展,逐步形成新兴的近代

---

① 民国十九年《呼兰县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② 民国六年《开原县志》卷三,《人事志·商务》。
③ 民国十九年《呼兰县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④ 民国十五年《杭州府志》卷六,《市镇》。

工矿小城镇。如江苏嘉定县"周家桥在法华西北四里许,本一小村落,民国五年,有无锡富商荣氏傍吴松江购地数十亩,开筑申新纺织厂;八年,欧战发生,纱价大涨,富商购地设厂者接踵而至,地价骤贵,亩值千金,百工麇集,遂成市焉"[①]。再如"曹家渡,同治三年,是为城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招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不数年间,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电灯厂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②]。

正是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使得中国这一时期小城镇数量有了大量增加,据中国东部地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含上海)、浙江和广东 7 省 36 州县地方志不完全统计,道光及道光前(1850 年前)共有市镇 630 个,而到抗日战争时,市镇数已增加到 1106 个,几乎增长了一倍(表 8)。从地区增长情况看,总体上表现为北方较少,中部最大,南方次之的特点。但总的说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市镇数量都有了增加。

又据 1933 年资料统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 45000 万,城镇人口中小城镇(2500～10000 人)人口约达 10000 万,而大、中、小城市人口才共约 4600 万人。由此可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中,小城镇这一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 城市规模结构特征

根据 1933～1936 年全国城镇人口资料统计,中国近代城市规

---

①② 民国十一年《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表 8　1840～1937 年中国部分地区市镇增长统计汇总表

地区	1850 年前	1851～1937 年	增长情况(%)
河北 2 州县	32	34	106.3
山西 2 州县	19	19	100.0
河南 4 州县	96	153	159.4
山东 6 州县	110	175	159.1
江苏 9 州县	110	281	253.2
上海 4 州县	70	164	234.3
浙江 6 州县	48	111	231.3
广东 3 州县	145	169	116.6
合计 36 州县	630	1106	175.6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地方志统计。

模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1. 小城市为主体

人口 5～20 万的小城市不仅占城市总数的 85.2%,而且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 45.9%。这类小城市,根据其规模的大小又可分为两个亚级,即 5～10 万和 10～20 万。这一时期 5～10 万人口的小城市达 112 个,占城市总数近 60%,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 25%;10～20 万人口的小城市也有 48 个,其数量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 1/4 和 1/5(表 9)。

2. 大城市首位度高

由表 9 可见,其时上海市人口规模已达 348 万,约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 10.8%。若与第二级城市总人口比,其城市体系的首位

度很高(达0.725)。

表9　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1933～1936年)
(其中统计年份不等)

等级规模(万)	城市数		人口数		城市名称
	(个)	%	(万)	%	
大于200	1	0.50	348.0018	10.8	上海
100～200	4	2.12	480.2877	14.9	北平、广州、天津、南京
50～100	5	2.70	316.5665	9.8	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
20～50	18	9.52	598.3210	18.6	成都、长沙、大连、济南、武昌、滨江(吉林)、苏州、福州、保定、开封、重庆、南昌、无锡、宁波、长春、镇江、温州、周口店
10～20	48	25.40	665.8614	20.7	如皋、徐州、扬州、南通、常熟、盐城、海门、绍兴、嘉兴、芜湖、安庆、蚌埠、景德镇、汉阳、沙市、宜昌、老河口、湘潭、衡阳、万县、自流井(自贡)、厦门、澳门、汕头、潮州、佛山、潮阳、昆明、贵阳、威海、济宁、烟台、临沂、太原、长安(西安)、汉中、兰州、安东(丹东)、普兰店(新金)、营口、旅顺、锦州、抚顺、牛庄、永吉(吉林省)、张家口、西宁、拉萨
5～10	112	59.79	814.5125	25.2	松江、青浦、淮阴、常州、灌云、嘉定、泰县、高邮、阜宁、宝应、沛县、仪征、沭阳、江阴、兴化、淮安、台州、金华、衢州、余姚、常山、亳州(安徽亳县)、阜阳、合肥、六安、宣城、九江、宁都、赣州、瑞金、建昌、南丰、鄱阳、常德、益阳、邵阳、津市、澧县、耒阳、叙州、泸县、三台、阆中、达县、涪陵、乐山、南充、大竹、遂宁、武胜、延平、晋江、建瓯、宁德、龙溪、江门、梅县、合浦、揭阳、石岐、黄冈、高要、南宁、梧州、桂林、腾越、个旧、遵义、唐山、山海关、石家庄、潍县、诸城、黄县、掖县、泰安、益都、莒县、蓬莱、周村、胶县、临清、郑州、洛阳、商邱、安阳、许昌、汾阳、大同、大荔、三原、渭南、安康、故市、天水、临潭、平凉、新民、辽阳、洮南、铁岭、扶余、双城、龙江、归绥(呼和浩特)、包头、宁夏、迪化(乌鲁木齐)、沙车、疏附(喀什)、奇台、和田
合计	188	100	3223.5536	100.0	

资料来源:据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第4卷,第1期,1937年)资料整理。

3. 大城市比较发达

这一时期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10个。其中除上海外，人口100～200万的有4个(北平、广州、天津、南京)，50～100万的有5个(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十大城市人口数已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35.5%。

4. 中等城市很少

这一时期作为地方区域中心城市的中等城市数量偏少，全国仅有18个，其人口仅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18.6%，这也充分表明了当时城市两极化的总特征。

三、近代城市分布

在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自然、经济、地理条件的影响，全国地域生产力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城镇地域空间结构上沿海和内地不平衡的加剧，形成了中国现状城镇地域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

1. 东北城市集聚区的形成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俄、日本和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东北，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逐步形成。自1861年营口开港，1894年京奉铁路延长出关，以及1898年东清铁路建成和大连港对外开放，营口的地位遂为大连所取代。尤其是1904～1905年

间日俄战争后，帝俄势力退居“北满”（长春以北），日本帝国主义以大连为据点，大肆进行南部地区矿产的开发和资源掠夺，本溪、鞍山钢铁工业开始发展。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占领全东北，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长春，工业中心沈阳、哈尔滨，掠夺东北资源的港口大连，军事基地牡丹江、旅顺，扩建了钢铁工业中心鞍（山）本（溪），煤炭中心抚顺，使它们都变成为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沈阳的加工工业，辽阳、金州、安东（丹东）的轻纺工业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这样在短短 40 多年间，形成了辽中为核心，哈大铁路为纵轴，滨绥铁路和沿海港口城市为两翼的，以重工业为主体、兼及部分轻工业为特点的东北地区城镇分布地域空间结构。

2. 沿海城市带的兴起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城镇的空间分布重心，自唐宋以来，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缓慢推移。但东部沿海地带的海岸港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北而南虽然发展了一些河口港城市（如天津、上海、宁波、泉州、广州等），沿海地带经济的开发仍处于“孤岛式”发展时期。从整体上看，大量沿海地带始终是城市分布空白地带。

鸦片战争以后，东部沿海地带由于特殊的自然、经济、交通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水上通道和优良港址，遂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经济入侵，近代交通设施（尤其轮船、码头）建设首当其冲之区，成为他们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的场所，从而极大地刺激了这一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从全国城市分布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主要城市几乎集中于沿

海地带,形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分布的一大特点,这在其它国家是鲜见的。如表10所示,全国50万以上人口的10个大城市全都集中在沿海地带,19个中等城市也有16个分布于这一地区,其时全国193个城市,有147个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占总数的76.2%。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网密度为中部地区的3.3倍,为内陆地区的41.3倍。

再从历史统计资料看,其时上海、北平(今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等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除汉口、沈阳外,均集聚沿海地带,形成了中国华北沿海的(北)京(天)津唐(山)城市群地区;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轻工业城市区(包括威海卫、龙口、石岛、连云港等);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锡、常、通、杭、嘉、湖、宁、绍等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东南沿海包括温州、泉州、福州、厦门、漳州的沿海港口城市带;珠江三角洲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轻工外贸城市区;以及潮汕平原城市(镇)群,共同组成了中国沿海城市密集带。

表10　中国近代沿海区城市分布状况表(1933～1936年)

区域	面　积		城市数		城　市　规　模　分　布					城市网密度
	(平方公里)	(%)	(个)	(%)	100万以上	50～100万	20～50万	10～20万	5～10万	(城市数/10万平方公里)
沿海区	2963429	26.5	147	76.2	5	5	16	39	82	4.96
中部区	2569330	23.0	39	20.2	0	0	3	8	28	1.52
内陆区	5640799	50.5	7	3.6	0	0	0	1	6	0.12
合　计	11173558	100.0	193	100.0	5	5	19	48	116	1.73

说明:沿海区为大兴安岭、太行山、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西界以东地区;内陆区为内蒙高原东部边缘、阴山、大青山、贺兰山、甘肃、青藏高原东缘及云贵高原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表1、表2整理。

3. 沿江城市轴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历来为中国主要“黄金水道”。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强迫中国开放沿海大量海港，而且深入沿江地带，开辟通商口岸，逐步形成为一条与沿海并驾齐驱的城市发展轴。

正是由于这类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据点，导致了沿江各港口腹地的重新划分，使重庆成为川、滇、黔西南地区物资集散中心；武汉成为华中地区农副产品集中转口港；上海、南京则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对外贸易港。从而改变了历时数千年的“扬一益二”沿江城镇分布的地域空间结构，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集区。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沿江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2/5 以上(41.5%)，城市网密度高于沿海地区，约为全国的 4 倍，而且集聚了 2/5 的大城市(人口 50 万以上)和近 1/2 的中、小城市，成为中国当时城市发展最密集的城市轴(表 11)。

表 11　中国近代沿江区域城市分布状况(1933～1936 年)

区域	面积(%)	城市数		城市规模分布					城市网密度
		(个)	(%)	100 万以上	50～100 万	20～50 万	10～20 万	5～10 万	(城市数/10 万平方公里)
沿江地区	11.78	80	41.45	2	2	8	22	46	6.08
全国	100	193	100	5	5	19	48	116	1.73

4. 台湾地区城市的发展

中国宝岛台湾，这一时期随着地域经济的开发，城镇也有了很大发展。据历史资料记载，开发初期的商港以安平为主要门户，城

镇主要聚集于此。1872年后,由于安平港口淤塞,淡水发展成为全岛最大商港,台北府遂成为全岛城镇分布密集的地区。日本占据台湾以后,由于海运轮船的发展,现代港口开始建设,基隆因其港口天然条件较佳,日本人重点经营,故不久即代替淡水而成为全岛第一港口城市。高雄也基于同样的原因逐渐取代安平的地位,发展成为仅次于基隆的全岛第二大港口城市。与此相对应,台北盆地、台南平原发展成为台湾南北两大城市(镇)密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基隆、高雄二港囊括全岛大宗对外贸易,台湾南、北两大地区的台北、高雄、台南、基隆、台中成为全岛人口增长中心,奠定了今日台湾城市(镇)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

5. 沿海与内地城市分布的不平衡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城镇空间分布的发展趋势(表12),具有如下特点:①自1840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包括长江下游区)是中国城镇最集中分布的地区,沿江带次之,内陆地区很少。②城镇地区发展有所扩展,但分布很不平衡。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较快,在后40年中城市数量增长了2倍(由35个增加到105个);沿江地区次之,城市数增长1倍(由34个增加到79个);内地城市处于停滞和衰落之中,城市数在40年中减少了3个。③沿海、沿江两大城市发展带逐渐形成。在1843年,中国沿海、沿江地区城镇网密度达到4.3～6.1个/万平方公里,约为内地的4.6倍。到1893年,沿海城镇网密度进一步上升为6.89个/万平方公里,沿江地区则略有下降,为5.81个/万平方公里。至1936年,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网密度相当,仍高于内地约6.7倍。

表 12 中国近代部分地区城市(镇)发展趋势(1843～1936 年)

区域		面积(平方公里)	1843 年			1893 年				
			城镇数(个)	城镇网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数(个)	城镇网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比重(%)	大城市(大于 50 万)	
									(个)	(万平方公里/个)
内地	西北	746470	119	1.60	4.9	114	1.53	5.4	1	74.65
	云贵	470570	52	1.10	4.0	81	1.72	4.5		
	小计	1217040	171	1.41	-	195	1.60	-	1	121.7
沿江	长江上游	423950	170	4.01	4.1	202	4.76	4.7		
	长江中游	699700	303	4.33	4.5	293	4.19	5.2	1	69.97
	长江下游	192740	330	17.12	7.4	270	14.01	10.6	1	49.27
	小计	1316390	803	6.10	-	765	5.81	-	3	43.86
沿海	东南沿海	190710	125	6.55	5.8	138	7.24	6.4		
	岭南	424900	138	3.25	7.0	193	4.54	8.7	1	42.49
	华北	771300	416	5.39	4.2	488	6.33	4.8	1	77.13
	小计	1579650	679	4.30	-	819	6.89	-	2	52.66
合计		3920340	1653	4.22	5.1	1779	4.54	6.0	6	65.34

说明:(1) 城镇均指 2000 人以上的居民点。

(2) 统计范围不包括东北、台湾、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

(3) 长江下游区包括江淮分水岭以南的江苏、安徽 2 省,以及上海市及浙江省的钱塘江和甬江流域;岭南区包括广东(除韩江流域)和广西;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福建及前述浙江、广东 2 省的剩余地区;西北区包括宁夏、陕西 2 省的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 3 省,并包括陕南、黔北及河南、广西的长江流域;华北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 3 省大部(京、津在内)、山东全省及江淮分水岭以北的江苏、安徽 2 省;长江上游区包括四川大部、甘南及黔北;云贵区包括云南、贵州 2 省大部分地区。

(4) 沿海小计包括长江下游区城镇。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施坚雅《城市及地方体系的等级系统》表 3,以及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中的中国 5 万人口以上都市表编译整理。

续表

				1933～1936年							
中等城市(20～50万)		小城市(5～20万)		城市数	城市网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大城市(大于50万)		中等城市(20～50万)		小城市(5～20万)	
(个)	(万平方公里/个)	(个)	(万平方公里/个)			(个)	(万平方公里/个)	(个)	(万平方公里/个)	(个)	(万平方公里/个)
2	37.32	7	10.66	7	0.09					7	10.66
2	23.53	3	15.69	5	0.11					5	9.41
4	30.43	10	12.17	12	0.099					12	10.14
1	42.40	6	7.07	16	0.38			2	21.20	14	3.03
3	23.32	10	7.00	27	0.39	1	69.97	3	23.32	23	3.04
3	6.43	8	2.41	36	1.87	3	6.42	4	4.82	29	0.66
7	18.8	24	5.48	79	0.60	4	32.9	9	14.63	66	1.99
1	19.07	4	4.77	15	0.79			2	9.54	13	1.47
2	21.25	7	6.07	11	0.26	2	21.25			9	4.72
6	12.86	18	4.29	43	0.56	2	38.57	4	19.28	37	2.08
9	17.55	29	5.45	69	2.29	4	39.49	6	26.33	59	2.68
20	19.60	63	6.22	160	0.41	8	49.00	15	26.14	137	2.86

第四章　中国现代城市发展与分布

中国现代市制源于清代，始置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曾于1912年颁布《市乡组织法》试图建立欧洲式的市镇制度。1921年内务部又以"大总统敕令"的形式颁布了《市自治制》，从国家意义上正式开创了中国的城市市建制，并设立了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无锡、杭州、宁波、安庆、南昌、汉口、广州、梧州为普通市。1924年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命上海绅商起草《淞沪特别市公约》，1925年初北洋政府欲将上海改为淞沪市，但终究只是过眼烟云未能实现。而当时地处南方革命政府之下的广州，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设市政局，1921年成立市政厅，1925年正式成立广州市，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市。尽管如此，但严格说来，这一时期设置的城市，仅是一种自治团体，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实体，各自有不同的暂行条例，而无共同适用的组织法，且没有明确的区划界线。

自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而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城市的蓬勃发展。据资料统计，1949年底全国仅有城市136个，到1993年增加到570个，城市数量增加了4.19倍。

一、中国现代城市的发展过程

（一）1949 年前设市简况

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后，对原来的市建制进行了改革，将市定为地方行政区域，兼为自治团体，于民国十七年（公元 1928 年）七月，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普通市组织法》，从法律上确定了现代市制的依据。其后，市作为行政区划的一种建制，历经演变，沿袭至今。据资料记载，1928 年曾设北平（今北京）、天津、哈尔滨、上海、南京、青岛、汉口、广州 8 个特别市和苏州、杭州、蚌埠、芜湖、长沙等 17 个普通市。后来又于 1930 年 5 月公布了《市组织法》，废止特别市、普通市之分，而以其隶属关系决定其地位差异，即以较大的市直隶于行政院，余者隶属于省政府，前者称为直辖市或院辖市，后者则称省辖市。由于《市组织法》提高设市标准，市的数量有所减少，截至 1932 年底，全国设有北平、上海、南京、青岛 4 个院辖市和天津、杭州、济南、汉口、广州、汕头、成都、贵阳、兰州 9 个省辖市。直到 1942 年抗战胜利前夕，全国的建制市数量才恢复到 1928 年的水平，设有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青岛、重庆 6 个院辖市和包头、连云、杭州、厦门、南昌、济南、武昌、汉口、长沙、广州、汕头、桂林、成都、自贡、贵阳、昆明、兰州 17 个省辖市。在抗战期间，全国设置城市共约 26 个。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省收复，全国设置城市数量猛增为 43 个；到 1947 年由于收回东北几省，设置城市的数量上升到 69 个。根据《中国之行政督察区》资料，截止到 1948

年4月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7个,其中直辖市12个,省辖市50个,专署辖市5个(表13)。

表13 1948年中国设市城市一览表

等级		城市名
直辖市		北平、南京、上海、天津、青岛、重庆、大连、哈尔滨、沈阳、西安、汉口、广州
省辖市	江苏	连云、徐州
	浙江	杭州
	安徽	蚌埠
	江西	南昌
	湖北	武昌
	湖南	长沙、衡阳
	四川	成都、自贡
	福建	福州、厦门
	台湾	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广东	汕头、湛江
	广西	桂林
	云南	昆明
	贵州	贵阳
	河北	唐山、石门
	山东	济南、烟台、威海
	山西	太原
	甘肃	兰州
	青海	西宁
	绥远	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陕坝
	察哈尔	张垣(今张家口)
	新疆	迪化(今乌鲁木齐)
	辽宁	锦州、营口、鞍山、旅顺
	安东	通化、安东(今丹东)
	辽北	四平
	吉林	长春、吉林
	松江	牡丹江、延吉
	合江	佳木斯
	黑龙江	北安
	嫩江	齐齐哈尔
	兴安	海拉尔
合计		66个

说明:(1) 资料来源:根据张国华《中国之行政督察区》整理。
(2) 资料截止1948年4月(即民国三十七年四月)。

（二）1949 年后设市简况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社会政权的建设和巩固、经济的复兴成为共和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行政因素也就成为市镇设置的重要标准。中共中央规定凡人口 5 万以上的城镇可以设市，到 1949 年底全国共有设市城市 136 个，其中中央直辖市 12 个，省辖市 55 个，专署辖市 69 个。新中国成立后 45 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设置也有很大的发展。由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条件变化的侧重点不同，可将新中国设市城市发展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健康发展时期(1950～1957 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以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为特征，尤其在 1949～1954 年之间，新中国的市镇建制还处于创设、整顿阶段。1955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这是建国以后第一部关于市镇设置的正式法律文件。这个文件强调了人口因素和经济、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的因素，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市的行政地位和隶属关系，规定市“是属于省、自治区、自治州领导的行政单位”。这一时期设置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在广大东部地区撤销一批小城市，有重点地建设了一批枢纽城市；②在广大中西部地区新建了一批工业城市，城市体系处于比较稳定而且健康的发展之中。据资料统计，自 1949 年至 1957 年的 9 年中，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0.6%上升到 15.4%，年平均递增率高达

70.5%。这一时期累计新设城市71个，主要分布在湖南、四川、河南、云南、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安徽、福建等省区。与此同时，在安徽、山东、浙江等省连续撤销了23个城市。上述新设的71个城市中，河北峰峰，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湖北老河口，四川北碚、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等8城市因种种原因相继撤销市建制。因此，到1957年底，全国已有城市176个，比1949年的136个增加了29.4%，平均年递增5个新城市(表14)。

表14　1950～1957年城市设置及撤销统计表

地区	新设城市		撤销城市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北京	1	通州(1953)		
天津	1	汉沽(1953)		
河北	3	邯郸(1952)、泊头(1953)、邢台(1953)	2	山海关并入秦皇岛(1953)、宣化并入张家口(1955)
山西	3	榆次(1954)、阳泉(1951)、长治(1951)		
内蒙古	3	通辽(1951)、集宁(1956)、巴彦浩特(1956)	1	赤峰(1952)
辽宁			1	金州(1956)
吉林	2	公主岭(1956)、延吉(1953)		
黑龙江	3	鸡西(1956)、双鸭山(1956)、伊春(1957)		
江苏	2	清江(今淮阴,1950)、常熟(1950)		
浙江			2	衢州(1950)、兰溪(1950)
安徽	3	淮南(1951)、马鞍山(1956)、铜官山(铜陵,1956)	8	阜城(1950)、亳城(1950)、三河(1950)、当涂(1950)、大通(1950)、宣城(1950)、界首(1953)、宿城(1953)

续表

地区	新设城市		撤销城市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福建	3	泉州(1950)、漳州(1950)、南平(1956)		
江西	2	上饶(1950)、景德镇(1950)	1	萍乡(1950)
山东	1	临清(1954)	5	石岛(1950)、羊口(1950)、龙口(1950)、博山与张店、周村合并为淄博(1954)
河南	5	商丘(1950)、焦作(1953)、三门峡(1957)、平顶山(1957)、鹤壁(1957)	1	朱集(1951)
湖北	2	黄石(1950)、襄樊(1951)		
湖南	7	湘潭(1950)、常德(1950)、津市(1950)、邵阳(1950)、益阳(1950)、洪江(1950)、株洲(1951)		
广东	2	潮州(1952)、石岐(中山,1953)	1	肇庆(1951)
广西	2	北海(1950)、凭祥(1956)		
四川	7	万县(1950)、泸州(1950)、南充(1950)、雅安(1951)、内江(1951)、宜宾(1951)、五通桥(1952)		
贵州	1	遵义(1950)		
云南	2	个旧(1951)、下关(1951)		
陕西	1	咸阳(1952)	1	榆林(1950)
甘肃	4	天水(1950)、平凉(1950)、临夏(1950)、玉门(1955)		
宁夏	1	吴忠(1950)		
新疆	2	伊宁(1952)、喀什(1952)		
合计	63	-	23	-

说明:(1) 地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2) 河北峰峰,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湖北老河口,四川北碚、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等8城市,曾一度设置并撤销(包括与其它城市合并),故未列入。

(3) 表中暂未列入台湾省,下同。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年)第192页,地图出版社,1980年版。

2. 起伏发展时期(1958～1965年)

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工业发展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农业战线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致使全国城市人口从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073万,新设城市44个,3年中城市人口净增31.4%,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跃达19.7%,使许多城市负担太重,市政建设欠债增多。由于“大跃进”中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工农业比例失调,国民经济出现巨大波动,导致城市的就业、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国家不得不压缩城市人口,减少市镇建制。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当前城市若干问题的指示中作了调整市镇建制的决定:凡是人口在10万以下的城市,即使是重要林区和矿区,都应撤销市的建制。1963年12月中央又作出了“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决定”,颁布了新的市镇设置标准。与1955年的市镇建制标准相比,主要是提高了设市镇的人口规模标准,而且在市镇建制中提出了非农业人口的标准。1961年以后,全国陆续撤销了52个城市,动员了近3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相当于当时城镇人口的25.7%)。从1958～1965年城市统计资料看,这一时期累计新设城市54个,其中河北宣化,山西侯马,内蒙古巴彦高勒,辽宁朝阳,黑龙江北安,江西新余,山东泰安、聊城、临沂、菏泽、新汶,湖北鄂城、沙洋,湖南岳阳、冷水滩、东江、娄底、冷水江、安江、郴州,贵州安顺、都匀、六枝,甘肃白银、酒泉、张掖、德乌鲁,宁夏青铜峡,青海冷湖、格尔木、大柴旦,新疆哈密等32个城市在这一时期又相继撤销市建制。与此同时,在1957年的176个城市中也有29个城市相继被撤销市建制(表15)。到1965年底,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逐步

表15 1958～1965年城市设置及撤销统计表

地区	新设城市		撤销城市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北京			1	通州(1958)
天津			1	汉沽(1962)
河北	1	沧州(1958)	1	泊头(1958)
山西			1	榆次(1963)
内蒙古	3	赤峰(1958)、乌达(1961)、海勃湾(1961)	2	巴彦浩特(1958)、乌兰浩特(1964)
辽宁			1	旅顺(1960)
吉林	3	白城(1958)、浑江(1960)、图们(1965)	1	公主岭(1960)
黑龙江	1	安达(大庆,1960)	1	伊春(1964)
江苏			1	常熟(1958)
浙江			4	金华(1962)、绍兴(1962)、嘉兴(1962)、湖州(1962)
安徽	1	濉溪(淮北,1959)	1	屯溪(1963)
福建	1	三明(1960)		
江西	1	萍乡(1960)	1	抚州(1964)
山东	1	枣庄(1960)	1	临清(1963)
河南			3	驻马店(1958)、周口(1958)、平顶山(1964)
湖南			2	津市(1963)、洪江(1963)
广东	3	惠州(1958)、肇庆(1958)、茂名(1959)	2	潮州(1959)、石岐(1959)
四川	1	渡口(1965)	2	雅安(1959)、五通桥(1959)
云南	1	东川(1958)		
西藏	1	拉萨(1960)		
陕西	1	铜川(1958)	1	汉中(1964)
甘肃	1	嘉峪关(1965)	1	平凉(1964)
宁夏	1	石咀山(1960)	1	吴忠(1963)
新疆	1	克拉玛依(1958)		
合计	22	-	29	-

说明:(1) 安徽省铜陵市1964年撤销市建制记载不一,故表中按未撤销计入。
(2) 地区按现行行政区划分。
(3) 城市名后括号中数字为市设置和撤销年代。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1949～1979年),地图出版社,1980年版。

下降为14%,城市总数也下降为169个,与1957年相比还少7个城市。

3. 停滞发展时期(1966～1976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处于“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年代。一方面,盲目地下放城镇居民、干部和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大搞“三线”建设,把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力量“靠山、分散、进洞”,致使新城市很少建成,老城市无力发展,城市体系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据资料统计,在这11年中,全国城市人口增长极为缓慢,仅由1966年的9965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11342万人,年平均递增率1.3%,明显低于同期城市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1.75%。这一时期,新设城市也很少,11年中累计设置新城市21个,撤销城市1个,合并城市1个,净增城市19个,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设市城市188个,年平均递增1.7个城市(表16)。

4. 恢复发展时期(1977～1985年)

1977年以来,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实,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城市经济中心作用加强,市领导县新型城乡经济体制形成,城市建设和规划也逐步走上了科学轨道,中国城市设置也进入恢复发展时期。据资料统计,在1977～1985年的9年中,累计新设城市139个,其中湖南、山东、新疆、浙江、湖北、四川、甘肃等省区设置城市较多,仅辽宁铁法、山东新汶、湖南冷水江3个城市相继撤销市建制,城市净增数达136个,年平均递增15.1个城市。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城市324个,城市非农业人口达1.1825亿(表

17)。

表16 1966～1976年城市设置及撤销统计表

地区	新设城市		撤销城市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山西	3	榆次(1971)、侯马(1971)、临汾(1971)		
内蒙古	1	二连浩特(1966)	1	乌达、海勃湾合并为乌海市(1975)
黑龙江	3	伊春(1967)、七台河(1970)、绥芬河(1975)		
安徽	2	屯溪(1975)、阜阳(1975)		
江西	1	抚州(1969)		
河南	1	平顶山(1969)		
湖北	1	十堰(1969)		
湖南	2	冷水江(1969)、岳阳(1975)		
四川	2	绵阳(1976)、达县(1976)		
贵州	2	安顺(1966)、都匀(1966)		
陕西	1	延安(1972)		
甘肃			1	临夏(1973)
新疆	2	奎屯(1975)、石河子(1976)		
合计	21	-	2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

5. 快速发展时期(1986年至今)

1986年,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指出:切实防止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有重点地发展一批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年,国务院批准试行新的市镇设置标准。这次市镇设置标准调整内容主要在于:①降低了市镇设置的人口标准,由前两次的10万降低为6万人(非农业人口);②提出了市镇设置中的国民生产总值标准,体现了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点;③试图通过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办第三产业等手段打破城乡之间业已根

表 17　1977～1985 年城市设置统计表

地区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河北	3	衡水(1982)、泊头(1982)、廊坊(1981)
山西	3	运城(1983)、晋城(1983)、忻州(1983)
内蒙古	7	乌兰浩特(1980)、牙克石(1983)、扎兰屯(1983)、锡林浩特(1983)、东胜(1983)、临河(1984)、霍林郭勒(1985)
辽宁	7	朝阳(1979)、铁岭(1979)、盘锦(1984)、瓦房店(1985)、海城(1985)、锦西(1985)、北票(1985)
吉林	3	公主岭(1985)、梅河口(1985)、敦化(1985)
黑龙江	5	黑河(1980)、北安(1982)、绥化(1982)、五大连池(1983)、安达(1984)
江苏	2	盐城(1983)、常熟(1983)
浙江	8	椒江(1981)、余姚(1985)、兰溪(1985)、嘉兴(1979)、湖州(1979)、绍兴(1979)、金华(1979)、衢州(1979)
安徽	5	六安(1978)、宿州(1979)、滁州(1982)、巢湖(1982)、黄山(1983)
福建	4	龙岩(1981)、邵武(1983)、莆田(1983)、永安(1984)
江西	4	新余(1983)、鹰潭(1979)、宜春(1979)、井冈山(1984)
山东	10	泰安(1982)、滨州(1982)、东营(1982)、聊城(1983)、临清(1983)、临沂(1983)、菏泽(1983)、莱芜(1983)、新泰(1983)、日照(1985)
河南	4	周口(1980)、驻马店(1980)、义马(1981)、濮阳(1983)
湖北	8	鄂州(1979)、荆门(1979)、老河口(1979)、随州(1979)、恩施(1981)、孝感(1983)、咸宁(1983)、丹江口(1983)
湖南	11	郴州(1977)、怀化(1979)、洪江(1979)、津市(1979)、娄底(1980)、永州(1982)、吉首(1982)、资兴(1984)、冷水滩(1984)、醴陵(1985)、大庸(1985)
广东	7	梅县(1978)、深圳(1979)、珠海(1979)、潮州(1979)、中山(1983)、三亚(1984)、东莞(1985)
广西	5	合山(1981)、钦州(1983)、河池(1983)、百色(1983)、玉林(1983)
四川	8	西昌(1979)、乐山(1979)、德阳(1983)、涪陵(1983)、雅安(1983)、广元(1985)、遂宁(1985)、华蓥(1985)
贵州	2	六盘水(1978)、凯里(1983)
云南	7	昭通(1981)、开远(1981)、曲靖(1983)、保山(1983)、楚雄(1983)、畹町(1985)、玉溪(1983)
陕西	3	汉中(1980)、渭南(1983)、韩城(1983)

续表

地区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甘肃	8	金昌(1981)、平凉(1983)、临夏(1983)、白银(1985)、西峰(1985)、武威(1985)、张掖(1985)、酒泉(1985)
宁夏	2	吴忠(1983)、青铜峡(1984)
青海	1	格尔木(1980)
新疆	9	哈密(1977)、库尔勒(1979)、昌吉(1983)、阿克苏(1983)、和田(1983)、吐鲁番(1984)、塔城(1984)、阿勒泰(1984)、博乐(1985)
合计	136	-

说明:1977～1985年间,辽宁铁法,山东新汶,湖南冷水江3个城市曾一度设市后又撤销市建制。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1949～1983年),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86年),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深蒂固的人口身份界定;④提出了县改市的标准。这一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1991年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领域,新设市标准扩大了非农业人口的范围并适当地降低了条件,设市模式从以镇设市改变为撤县设市,适应了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市建制的发展。据统计,1986～1993年的8年中全国共新设城市248个,平均每年新设城市31个,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设置增长最快的时期,其中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北等沿海地区省份设置新城市数量最多(表18)。1993年全国设市城市达570座,城市人口也达17609.1万人。

概括新中国城市的发展,在这44年中,累计新设城市471个,合并与撤销城市37个,其中宣化与张家口、山海关与秦皇岛、峰峰

表 18　1986～1993 年城市设置统计表

地区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河北	18	定州(1986)、辛集(1986)、南宫(1986)、任丘(1986)、涿州(1986)、沙河(1987)、武安(1988)、黄骅(1988)、藁城(1989)、霸州(1990)、河间(1990)、安国(1991)、晋州(1991)、遵化(1992)、新东(1992)、三河(1993)、高碑店(1993)、冀州(1993)
山西	7	朔州(1988)、古交(1988)、霍州(1989)、孝义(1992)、介休(1992)、高平(1993)、原平(1993)
内蒙古	1	丰镇(1990)
辽宁	11	铁法(1986,恢复)、兴城(1986)、开原(1988)、普兰店(1991)、凌源(1991)、庄河(1992)、盖州(1992)、大石桥(1992)、凌海(1993)、新民(1993)、东港(1993)
吉林	13	洮南(1987)、扶余(1981)、集安(1988)、珲春(1988)、桦甸(1988)、龙井(1988)、大安(1988)、九台(1988)、蛟河(1988)、榆树(1990)、舒兰(1992)、和龙(1993)、临江(1993)
黑龙江	14	镜泊湖(1986)、肇东(1986)、同江(1987)、阿城(1987)、富锦(1988)、铁力(1988)、尚志(1988)、双城(1988)、密山(1988)、海伦(1989)、海林(1992)、讷河(1992)、宁安(1993)、五常(1993)
江苏	22	仪征(1986)、张家港(1986)、江阴(1987)、淮安(1987)、兴化(1987)、宿迁(1987)、丹阳(1987)、东台(1987)、宜兴(1988)、昆山(1989)、启东(1989)、新沂(1990)、溧阳(1990)、如皋(1991)、高邮(1991)、吴江(1992)、邳州(1992)、泰兴(1992)、太仓(1993)、通州(1993)、靖江(1993)、金坛(1993)
浙江	20	丽水(1986)、海宁(1986)、临海(1986)、舟山(1987)、萧山(1987)、江山(1987)、瑞安(1987)、义乌(1988)、东阳(1988)、慈溪(1988)、奉化(1988)、诸暨(1989)、黄岩(1989)、龙泉(1990)、平湖(1991)、建德(1992)、上虞(1992)、永康(1992)、桐乡(1993)、乐清(1993)
安徽	5	亳州(1986)、宣州(1987)、贵池(1988)、界首(1989)、天长(1993)
福建	10	石狮(1987)、宁德(1988)、福安(1989)、武夷山(1989)、福清(1990)、漳平(1990)、晋江(1992)、建瓯(1992)、龙海(1993)、南安(1993)
江西	6	丰城(1988)、樟树(1988)、瑞昌(1989)、德兴(1990)、乐平(1992)、高安(1993)

续表

地区	数量	城市名及年份
山东	24	曲阜(1986)、青州(1986)、龙口(1986)、胶州(1987)、莱阳(1987)、诸城(1987)、莱州(1988)、滕州(1988)、乐陵(1988)、文登(1988)、荣城(1988)、即墨(1989)、平度(1989)、莱西(1990)、胶南(1990)、蓬莱(1991)、招远(1991)、肥城(1992)、章丘(1992)、兖州(1992)、邹城(1992)、寿光(1993)、乳山(1993)、禹城(1993)
河南	13	汝州(1988)、济源(1988)、禹州(1988)、辉县(1988)、卫辉(1988)、邓州(1988)、沁阳(1989)、舞钢(1990)、巩义(1991)、灵宝(1993)、长葛(1993)、堰师(1993)、项城(1993)
湖北	17	应城(1986)、蒲沂(1986)、仙桃(1986)、石首(1986)、麻城(1986)、利川(1986)、洪湖(1987)、天门(1987)、安陆(1987)、武穴(1987)、枝城(1987)、枣阳(1988)、潜江(1988)、广水(1988)、当阳(1988)、黄州(1990)、钟祥(1992)
湖南	8	湘乡(1986)、耒阳(1986)、涟源(1987)、汨罗(1987)、沅江(1988)、韶山(1990)、临湘(1992)、浏阳(1993)
广东	24	汕尾(1988)、河源(1988)、阳江(1988)、清远(1988)、揭阳(1991)、顺德(1992)、台山(1992)、番禺(1992)、云浮(1992)、新会(1992)、南海(1992)、潮州(1993)、开平(1993)、三水(1993)、普宁(1993)、罗定(1993)、花都(1993)、高州(1993)、四会(1993)、鹤山(1993)、东源(1993)、高要(1993)、增城(1993)、廉江(1993)
广西	3	贵港(1988)、防城(1993)、宜州(1993)
海南	3	通什(1986)、琼海(1992)、儋州(1993)
四川	12	广汉(1988)、江油(1988)、都江堰(1988)、峨眉山(1988)、阆中(1991)、永川(1992)、江津(1992)、合川(1992)、资阳(1993)、万源(1993)、巴中(1993)、彭州(1993)
贵州	5	铜仁(1987)、兴义(1987)、赤水(1990)、清镇(1992)、毕节(1993)
云南	3	瑞丽(1992)、思茅(1993)、景洪(1993)
西藏	1	日喀则(1986)
陕西	4	榆林(1988)、安康(1988)、商州(1988)、华阴(1990)
甘肃	1	敦煌(1987)
青海	1	德令哈(1988)
新疆	2	阿图什(1986)、阜康(1992)
合计	248	

说明：1986 年辽宁铁法恢复市建制；1987 年安徽黄山和屯溪合并升为黄山地级市，驻地屯溪。

资料来源：19871994 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地图出版社。

与邯郸、旅顺与大连、北碚与重庆、五通桥与自贡、屯溪与黄山合并；内蒙古的巴彦浩特，辽宁的金州，安徽的三河、当涂、大通，山东的羊口、石岛，广东的石岐，河南的朱集等9个城市衰落为镇；内蒙古的巴彦高勒，辽宁葫芦岛，河南汝南，四川合川，云南河口、麻栗坡，湖北沙洋，湖南东江、安江，甘肃德乌鲁，青海冷湖、大柴旦等12个城市曾一度设市后即被撤销。此外，河北的泊头，山西的榆次、侯马，内蒙古的赤峰、乌兰浩特，辽宁的朝阳、铁法，吉林的公主岭，黑龙江的伊春、北安，江苏的常熟，浙江的兰溪、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安徽的铜陵、屯溪、六安、阜阳、宿州、界首、亳州、宣州，江西的抚州、新余，山东的泰安、聊城、临沂、菏泽、新汶、临清、龙口，河南的平顶山、周口店、驻马店，湖北老河口、鄂城，湖南郴州、洪江、津市、岳阳、冷水滩、娄底、冷水江，广东的潮州，贵州安顺、都匀、六盘水，陕西的汉中、榆林，甘肃的临夏、平凉、白银、酒泉、张掖，宁夏的青铜峡、吴忠，青海的格尔木和新疆的哈密等61个城市都曾经历了设置—撤销—恢复市建制的过程。

二、中国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变化

新中国成立45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已使历史遗存的原有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城市性质的变化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城市的最显著特征是：①城市大

多以行政中心为主;②一些不成系统的殖民地式的近代工业与商业贸易旺盛;③倚之而兴的城市服务业特别发达。新中国建立以来,城市(镇)首先成为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地域中心,城市的经济职能也进一步由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转变。概括45年来新中国城市职能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行政中心城市进一步加强

新中国成立不久,快速的经济建设就沿用了历史上行政中心替代经济中心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使中国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得到进一步加强。

(1)省会城市。它是中国传统的地方政治、文化中心,各省(包括自治区首府)利用省级财政纷纷在省会及其周围发展钢铁、机械、农机、化工等工业部门,致使这类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2)地级市。从地理位置来说,这类城市一般多处在地区中心位置,具有与地区内各县(旗)交通方便的优势,同时再借助于行政优势吸引投资较多的建设项目,也必然发展成为具有综合性职能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县级市。由于这类城市都是县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并陆续兴办了“五小工业”(小水泥、小钢铁、小水电、小化肥、小农机),因此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2. 矿工业、加工业新城市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重点始终放在能源、原材料工业上,涌现了一大批矿业、矿工业新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在新设置的469个城市中,采矿

(伐)城市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煤电城市44座，铁矿和有色金属采掘与加工城市24座，石油采掘、加工城市14座，林业采伐城市8座，水电开发城市4座。这些城市大多数(约占60%)都是在原为乡村或无居民点的情况下平地起家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今天的鸡西、大庆、伊春已进入大城市行列，乌海、双鸭山、淮北、枣庄、平顶山、合山、六盘水、铜川、马鞍山、渡口、牙克石、浑江、十堰等也发展成为中等城市。

与此同时，由于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一批加工工业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93年底在新设置的469个城市中，有轻纺食品工业城市44个，机械电子工业城市22个，化工城市8个，轻工业城市19个，建材与建筑业为主的城市7个。如邯郸新型钢铁纺织基地，淄博煤炭冶金石化工业基地，齐齐哈尔、洛阳、十堰、咸阳、无锡、苏州、常州、南通、景德镇、黄石、沙市、湘潭、泸州等加工工业城市也都发展成为大中型城市。

3. 新型交通枢纽城市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交通运输业获得很快发展，改变了旧中国交通运输线路少而偏，车船老而旧，大部分地区交通闭塞的面貌。初步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相配合的全国交通运输体系。与此相对应，新型交通枢纽城市也获得了相应发展：①随着现代交通路线的形成，调整了部分省人民政府驻地，如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天津、再迁石家庄，吉林省会由吉林迁至长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由张家口迁至呼和浩特，黑龙江省会由齐齐哈尔迁至哈尔滨等。②东北沈阳、哈尔滨，华北北京、天津，华东南京、徐州、上海，华中郑州、株

洲、怀化、襄樊，华南广州、柳州，西南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铁路枢纽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③在青藏高原、新疆等边远地区，拉萨、格尔木、雅安、林芝、日喀则、喀什、库尔勒等公路枢纽城市(镇)也得到相应发展。④自 1950 年、1951 年畅通了北方航线，恢复了南方沿海航线，开辟了远洋航线以后，中国港口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其中有深水泊位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黄浦、湛江、八所等 10 个港口，拥有万吨级泊位 150 多个。⑤在边境地区，结合各地区的优越地理位置，陆续新建了二连浩特、图们、绥芬河、深圳、珠海、凭祥、畹町等口岸城市。

4. 旅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绚丽，风景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 1983 年 10 月先后设置了以火山地貌为特色的五大连池市，以革命纪念地为主的遵义、延安、井冈山等名城胜地，作为风景旅游后方基地的黄山、大庸等城市，成为中国城市体系中第一批以旅游职能为主的城市。

5. 特大城市周围卫星城的发展

1958 年以来，中国为疏散特大城市工业和人口，在上海、天津、北京、沈阳、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周围建设了一批卫星城镇。

(二) 等级规模结构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 45 年来，中国城市数量增长迅速，到 1993 年底，城市数已达 570 个，其中新设城市 469 座，几乎是老城市数的 3.5

倍。从设市人口数量的增长看,45 年来(1949～1993 年)增长 6.2 倍,其中 1993 年非农业人口 17609.1 万人,城镇总人口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大、中城市数仅及城市总数的 25%左右。新中国成立 45 年来,由于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原有大、中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且又有一大批县改为小城市。从总体看,45 年间中国特大城市数量增加,但城市数和城市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变化不大;大城市数和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的比重经过上升过程后又逐渐下降;中、小城市数和人口近年来开始呈迅速增长趋势(表 19,图 3、4、5)。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结构已从小城市发展期进入大城市发展期。

表 19 中国大中小城市数量及人口比重逐年对照表
(1955～1993 年)

等级规模	1952 年		1957 年		1965 年		1976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3 年	
	n.	p.	n.	p.	n.	p.	n.	p.	n.	p.	n.	p.	n.	p.
100 万以上	5.7	43.8	5.6	42.1	7.6	42.5	7.0	38.3	6.8	38.9	6.8	40.1	5.6	37.9
50～100 万	6.4	15.2	10.1	21.5	9.4	16.4	13.4	23.9	13.6	24.6	9.3	18.5	6.3	13.6
20～50 万	14.6	16.1	20.2	17.9	25.1	19.7	28.5	22.6	31.8	23.5	29.0	24.5	28.2	27.4
20 万以下	73.3	24.9	64.1	18.5	57.9	21.4	51.1	15.2	47.8	13.0	54.9	16.9	59.8	21.1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1) n. 表示不同规模城市数量比重(%)。
(2) p. 表示不同规模人口比重(%)。
(3) 按城市非农业人口统计。

(三) 城市空间分布的演化

旧中国的城市分布过分偏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据统计,在 1947 年的 58 个城市中,就有 29 个(50%)集中分布在面积不到全国 14%的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 45 年来,中国在内地修铁路,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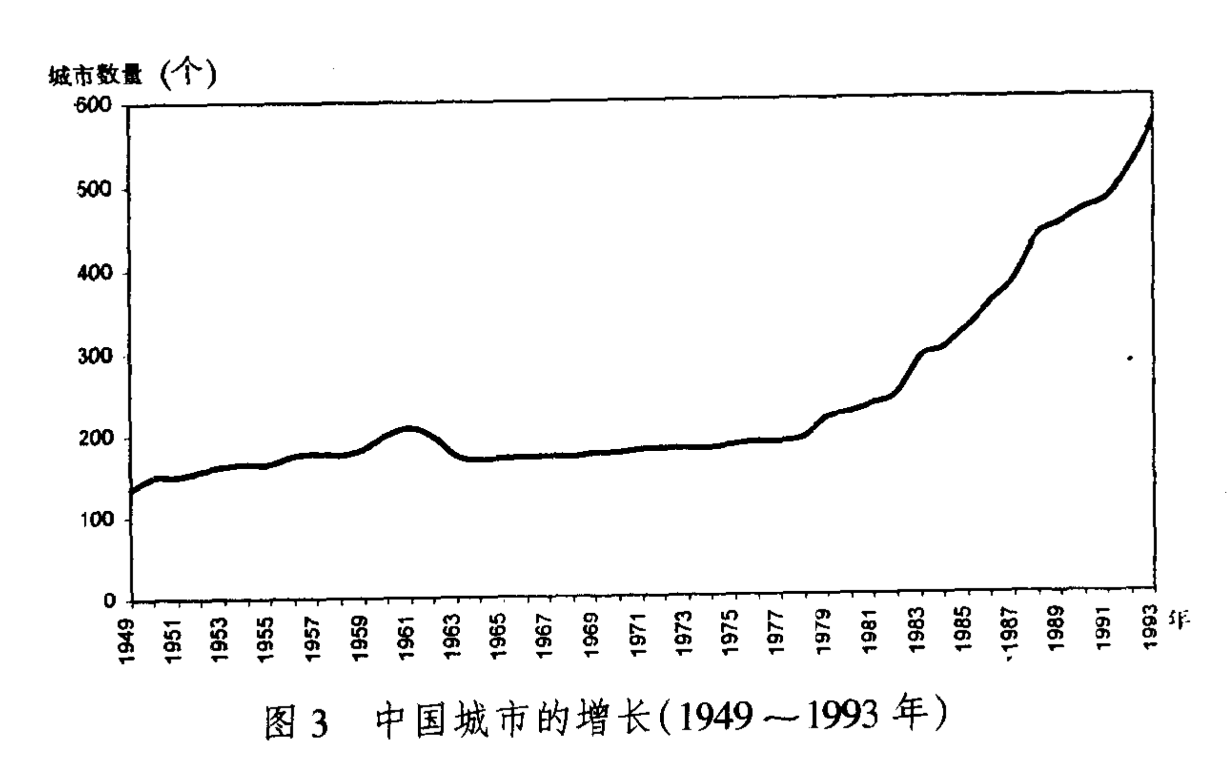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城市的增长(1949～199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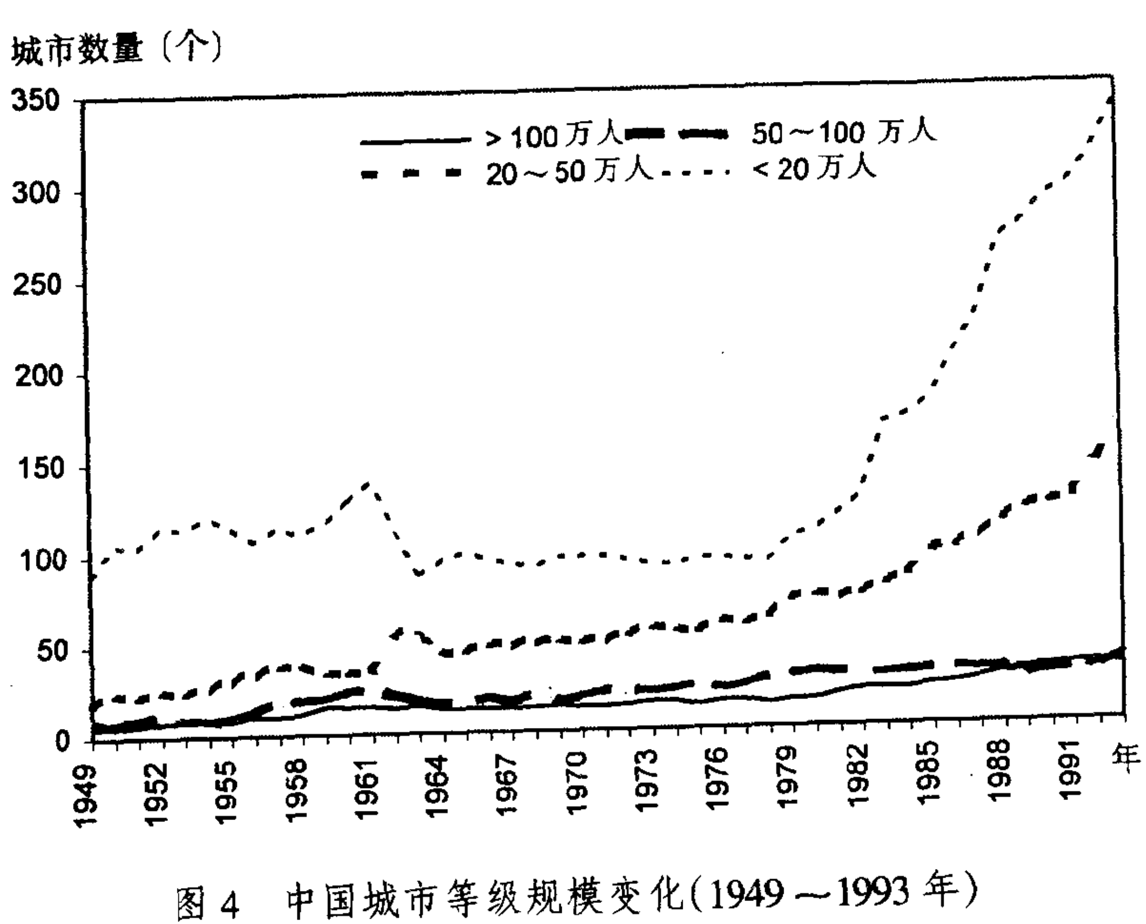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城市等级规模变化(1949～199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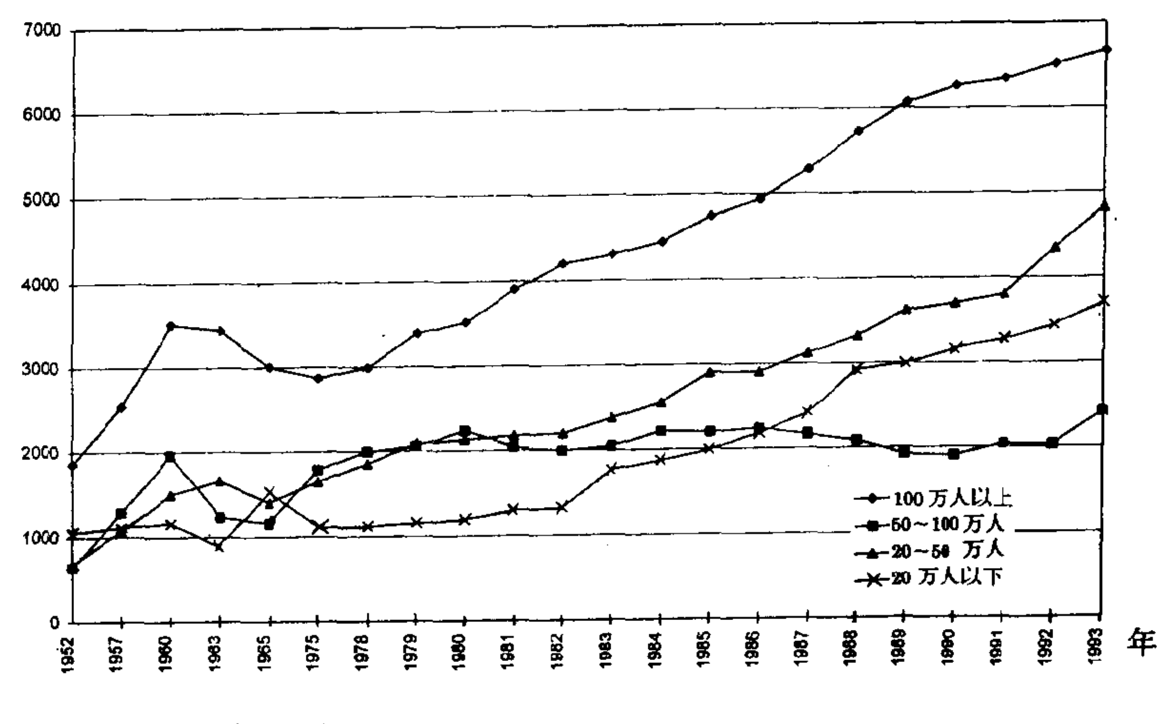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城市等级规模、人口的变化(1952～1993 年)

工厂,开矿山,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从而大大改观了城市偏集东部地带的不平衡状态。据 1993 年资料统计,中国西部地带城市网密度比 1949 年增长 9.85 倍,中部地带增长 3.84 倍,而东部地带仅增长 3.19 倍。城市数量分布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西部地带增加了一些城市,东部地带城市数量增加最多,中西部城市数稳步增长。城市网密度递增迅速,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带的辽中南城市集聚区,京津唐城市集聚区,沪宁杭芜城市集聚区,珠江三角洲城市集聚区,密度增加日趋明显。

第 二 篇

城镇化与国家城市体系

第五章　中国城镇化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镇聚集，同时又在聚集过程中不断地将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周围扩散，并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前提下，衍生出崭新的空间形态和地理景观。

一、中国城市人口与户籍制度

城镇化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人口不断从乡村地区涌入到城市中来，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活动，其结果是使地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职能发生变化。因此在研究城镇化过程中，有必要首先从城市人口角度来探讨。

（一）中国城市人口的定义及其特权

1. 中国城市人口的界定

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公认一致的"城市"定义，对城市人口

的定义也就存在着区域间的较大差异。就中国城市人口的定义而言，在不同的时段亦具有不同的内涵，并不存在一个连续不断的统一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主要是作为消费性场所而存在的，并无生产或经济职能上的再区分。当时凡居住在城市区内的人口，一般均被认作为城市人口，此时的城市人口统计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城市人口规模。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大规模的城市工业建设带来了城市职工队伍的迅速扩大，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壮大了城市的现代产业大军，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同时又给城市带来了诸如交通、住房等方面的沉重负担。为此，在1953年之前，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但由于此时期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城乡间人口流动仍相当活跃，城市人口的增长也相当平稳而迅速。此时的城市人口仍是以居民的实际居住地来衡量的，户口只是管理上的需要，并不影响城市人口在数量上的统计。自1957年底开始，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迁移人口进行干预和制止，从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壁垒，使户口登记第一次成为控制城市人口数量的强有力杠杆，城市人口也开始基本缩变为城市非农业人口或城市吃商品粮人口。1984年之后，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户口登记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城镇中出现了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的人口。但由于这部分人口难于统计，计算城镇人口时一般仍不将其列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采取新的市镇人口统计标准，即第二统计口径。该统计标准既考虑了城市的空间范围，又考虑了城市的人口经济特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其中的市镇人口是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不设区的市所辖街道人口和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以及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

口。但从目前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区人口分布来看,此统计标准仍然偏小,因为相当数量的从事非农活动并享受城市基础设施的那部分人口被忽略了。根据若干典型调查,这部分人口约占市镇人口的10～20%。

2. 中国城市人口的特权

在城市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中国城市人口所具有的特权便逐步显现出来,尽管随着近年来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深入,城市人口的特权正在日益缩小,但中国城市人口的特权仍几乎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

(1) 劳动就业制度

中国自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城镇安置待业人口,首先以有正式户口的常住人口为对象。无户口即意味着无工作。即使在目前劳动就业制度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一些工作条件好和待遇高的就业岗位仍旧以城市正式户口为其基本条件。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和国有大中型企业里更为普遍。这种以城镇户口为基本出发点的劳动就业制度,无疑不断提高了城镇户口的价码。中国若干城市一度出现的卖户口热现象正是这种制度下最突出的反映。

(2) 住房制度

中国在实行工资制的同时,又对具有正式户口的城市职工进行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福利补偿,其中以实行象征性房租的住房制度最为突出。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中的月房租费用仅为每平方米0.08～0.13元,其房租只占职工月收入的1/30左右;即使在住房改革的今天,其月房租一般也仅为每平方米0.5～1.50元,仍只占

职工家庭收入的1/20左右。如此低廉的房租,造成了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和城乡居民间巨大的实际差异。因为在农村,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要用于建设房屋。

(3) **各种补贴制度**

除低廉房租之外,城市居民还享有各种各样的隐形补贴,如粮油补贴、蔬菜和副食品补贴等。比如北京市每年用于每个居民身上的各种补贴即高达860多元。

(4) **经济收入差别**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为2583元,而同年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仅为922元,相差2.8倍。从1985～1993年的增长幅度来看,城镇居民亦快于农村居民,前者增长了2倍多,而后者只增长了1倍多。

(5) **消费水平差别**

消费水平差别体现了经济收入差别的一个侧面。1993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的消费性支出为2111元,其中,用于食品、衣着、娱乐、居住的支出分别为1058元、301元、194元和140元,分别占消费性支出的50.12%、14.26%、9.19%和6.63%。而同年农村居民每人平均消费性支出为770元,其中用于食品、衣着、娱乐、居住的支出分别为447元、55元、58元和107元,分别占其消费性支出的58.05%、7.14%、7.53%和13.90%。

(6) **教育水平差别**

由于办学条件、教师素质、教育投资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城乡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一般来说,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优于城镇、城镇优于集镇、集镇又优于农村。并且,目前的中国教育体制仍是以户口为基础招收学生,这在无形中更加增强了城

镇居民的特权。

(7) 其它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异

除上述几个方面的特权外,城市居民在其它方面亦享有与农村居民难以比较的优越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有:生活能源、交通邮电、商品供应、社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保险等。

总之,从社会结构上看,国家赋予城镇居民的实惠和特权使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价倍增,从而在城市居民中产生某种天然优越感,同时这也加剧了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的渴求和向往,导致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巨大,作为城市人口的特权十分明显。这也是乡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的重要根源所在。

(二) 中国户籍制度与城市人口管理

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筑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成为一道无形的长城,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此在研究和探讨中国城镇化问题时,应当首先考察中国所特有的户籍管理体制。可以说,通过户籍管理,中国曾相当有效地对其城市人口进行了控制和管理,使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避免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贫民窟和城市贫穷等现象。

中国户籍管理的核心是对户口迁移的有效管理。所谓户口迁移,是指国内常住人口改变居住地、跨越一定行政区域、将户口迁往它地注册落户的一种迁移。这项制度是伴随着中国新生政权的建立和适应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建立的。

1. 户口自由迁移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有必要对城市人口进行登记和调查。为此早在1951年7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即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凡在城市之中的居民,均需向公安机关申报户口,居民若有户口变动,则首先需到当地公安机关申报迁移、注销户口并领取迁移证,然后再到迁入地向当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入户。1955年6月9日,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要求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建立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制度。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公共户口等。户口管理制度对于公民迁出迁入只要求办理登记手续,并未提出任何限制,因此城乡居民在城乡之间或城镇之间可随意迁移。此时由于工业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城镇确实吸引和吸收了大量自发进入城镇的农民就业,城镇化获得了空前的快速发展,市镇人口比重由1952年的12.46%上升到1957年的15.39%。在人口迁移的形式上,则表现为自发性自组织迁移和计划性有组织迁移两种形式并存。

2. 限制户口迁移阶段(1958～1984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11.3%),使城镇企业招收了大量农村劳力,但源源不断流入城市的众多农民却无法被完全吸收,于是政府在1953年、1954年和1957年3次发出文件,劝阻或防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由于大跃进失利,国民经济被迫

进行调整,加之城镇劳动适龄人口已能基本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城市人口进入饱和状态,城市中粮油副食供应紧张,住房、交通、就学、就医等市政基础设施均呈现供不应求现象,因此自1958年起,政府即改变了最初的"自由迁移"政策而开始实施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在1958年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已明确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机关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迁出手续"。

1960～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等原因,国家曾把数以万计的城镇职工遣返回农村,从而出现了中国首次城乡间人口倒流的现象。

从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数以百万计的国家机关干部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此期间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其结果是1975年的市镇人口比重仍停留在1962年的水平(17.34%),尽管由于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但城市人口总数仅从1962年的11659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7245万人。

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要求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它城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3市的要严加限制;从集镇迁往城市、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要适当限制。但从市镇迁往农村、从市迁往镇、从大城市迁往小城市以及同级市、镇、农村间的迁移,凡理由正当的,均应准予落户,不得限制。同时对招收职工、录用学生、调配干部、转业等人员均办理入户手续。这一规定的基本原则至今仍在执行,它对控制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

用。但是,1979年以后,大批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从而使城市人口有了较快增加。1980年全国市镇人口数量达到19140万人,市镇人口比重上升为19.39%。

总之,这一阶段人口迁移的特点是终止了自由迁移政策,实行了较强的限制人口迁移政策。由城市到农村的迁移流总体上看大大超过了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流。

3. 户口迁移转型阶段(1984～1995年)

1980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步入新的阶段。以农村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而使相当数量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为此,国务院于1984年发出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准许农民及家属到集镇务工、经商和办服务业,对"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粮食部门可发给《加价粮油供应证》,地方政府要为他们建房、买房、租房提供方便。这是中国自1958年实行限制自发性人口迁移政策以来对户口迁移政策所进行的最重大调整,但仍旧附加了一定的限制条件,一是只允许有条件的农民迁入,二是只允许迁入到县城以下的集镇中来。

1988年以后,中国粮、油及副食品价格逐步放开,以户口为基础发放的各种票证被取消,户口对从农村流入人口的限制作用也随之减少,导致城市中长期暂住人口的大量增加。据估计,目前中国城市中长期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约在7000～10000万之间。随着城乡人口迁移的日趋活跃,中国城镇化亦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

按第四次人口普查口径,1983年中国市镇人口数为22274万人,市镇人口比例为21.62%,到1993年,分别上升到33351万人和28.14%。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曾长期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将发生重大变革。户籍管理的职能将侧重在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上,而不在对迁移人口的控制上。但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十分庞大,而城市的吸纳力有限,因此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户籍管理仍将会成为城市人口管理的一个强有力措施。尤其对大城市而言,户籍管理所具有的限制作用仍将会保留下来。

二、中国城镇化政策与特征

中国城市人口管理政策与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是相辅相成的,而城镇化特征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的结果。

(一) 中国城镇化发展政策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方针政策。城市(镇)发展实际上只是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计划的一种附属产物,并同时受制于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行政区划范围的较大影响。因此,中国城镇发展随工农业发展政策的波动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在城市发展上,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过多过快,而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特别是小城镇发展未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许多地区的小城镇甚至趋于萎缩。1953年,中

国有城镇 5402 个,1962 年下降至 3148 个,1982 年更下降至 2660 个。除东北地区此阶段城镇数略有增加以外,其它几个大区的城镇数都几乎降低了一半以上。

1980 年以后,中国才正式而明确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尤其是 1984 年中央政府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实施新的市镇设置标准后,中国小城(市)镇才获得了长足发展。在 1985 年公布的第七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建议中,中国政府更明确指出:"坚决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重点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从而为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增加了推动力。其结果,中国小城镇的数量从 1984 年的 6122 个增加到 1994 年的 17000 多个。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不断发达,中央政府又强调指出了要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从而促使城市体系朝着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心城市是现代化建设中主要物质技术和各种专门人才的集中地,具有多种功能。如能积极发挥这种功能,扩大这种功能的辐射范围,就能更有利地带动乡镇经济的发展,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为此从 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方针又被调整为:"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并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若干区位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198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把政府的这一城市化政策确定下来,并在《城市规划法》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粮油副食品价格已基本放开,

从而使城镇户口的限制作用有所减少,导致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到大城市中来,给大城市发展带来了若干负面影响。为此从1994年以来,中国有些大城市陆续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以期通过对长期暂住人口的有效管理,使诸如"民工潮"的无序人口流动变为有序的人口流动,促进城市的快速稳定发展。这些地方性法规的逐步实施,必将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产生许多重大影响。

(二) 中国城镇化基本特征

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直接反映,因而表现出强烈的阶段性和波动性,即在不同时期,中国城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 国家计划控制的影响大

首先,由于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决策机构和工业化的发动者,所以中国城镇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由政府支配的,从而形成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两位一体的城镇网络。在某些时期,城市发展的政治指向甚至优先于城市发展的经济指向。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长期指导方针下,各级政府的投资重点一般均放置在所在城市或其周围地区,其结果是各级行政中心也就自然成为所在地区的最大经济中心,中央直辖市、省会城市、县城所在地的发展都是如此。这种城镇网络的优点是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本、人力和各生产要素,发展若干急需发展的产业,形成便于统一管理的城市体系;其缺点是容易形成政府对企业的过多行政干涉,挫伤企

业的积极性,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

其次,利用政府的主体地位,政府便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过度流入,从而使城镇发展限定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避免像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形成城市失业大军和城市贫民区。但是这些措施却造成了城乡壁垒,强化了城市居民所具有的世袭性特权,限制了乡村青年的发展。

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获取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即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进行隐性积累,用来发展工业和城镇。同时通过资本投入的调控和户籍政策的变动,实现政府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加速或减缓城镇化发展过程。"一五"时期和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的慢速发展,正是政府推动城镇化的结果。

2. 城镇化进程的波动性

根据城镇人口的变化特点,可将中国城镇化阶段大体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 **恢复和起步时期**(1949～1957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较快时期,城镇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到1954年的994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7%,是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2%的3倍多。这一时期可再细分为两个时期:①1949～1952年的3年恢复时期。该时期城市经济迅速恢复,安排了大量失业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较多,1951～1953年间年均人口净迁入率为33.1‰,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为7.5%。②是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也是中国

工业化的起步时期。为满足工业建设项目的需要,"一五"期间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达1500万之多,加上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至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2400万,年均增长7.0%左右,成为城镇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2) **超高速城镇化阶段**(1958～1960年)

这一时期强调赶英超美,提出了以钢为纲、全民大办工业的总路线,致使出现了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城镇化过程,3年间新设城市33座,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

(3) **停滞时期**(1961～1976年)

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②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盲目大跃进,至1961年时中国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大滑坡,中央政府不得不大力调整工业结构,通过提高设市设镇标准而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其结果,城市数由1961年的208座下降到1965年的171座,同时期内的城镇化率也由24.7%下降到18.0%,出现了城镇化的大回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出现强烈的政治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出现了第二次城镇化的大回落,其显著特征是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的城市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在工业建设方面,过份强调国防意识,导致"三线"企业的布局过于分散,阻滞了基建投资对城镇建设的促进作用,造成城镇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完全由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致。

(4) **城镇化增长阶段**(1977～1983年)

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并适时适度地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允许知青回城、允许下放干部返城等,从而使城镇机械人口、特别

是大城市的机械人口增长加快，出现了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5) **城镇化高速增长阶段**(1984～1995年)

1984年，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进镇落户，同时又修正了19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从而使全国城镇数量迅猛上升。1984年，全国设市城市数为300个；到1994年底，设市城市数即增加到622个，平均每年增加32个。按第四次人口普查口径，城镇化水平也由1984年的23.01%上升至1993年的28.14%。

3. 城镇化发展缓慢

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是以轻纺工业为主导展开的，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却同前苏联一样，是从发展重工业开始的。按照目前中国所具备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整体水平，城市化程度似乎应较高些。但由于重工业技术构成较高，所需资本投入量大，所以一定数量的资本对工业劳动力的吸纳力就相对较低，这就使城镇化的发展逐渐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镇工业化的分散进行，又使中国的乡村城镇化进一步滞后于工业化。

并且，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中国的城镇化是以工业为核心的，而不是像拉美和亚洲若干国家那样，把城镇化一开始就建立在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基础之上，因此中国各级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都相当薄弱，从而大大降低了城镇第三产业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吸纳力和消化力，减慢了城镇化的应有发展步伐。

4. 城市构成独特

中国城市规模结构中的大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而小城市的人

口增长较慢,与世界其它一些国家形成鲜明对照。据各国最新的普查资料计算,全球 10～25 万人口的小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9%,而同期全球城市总人口的年增长率却只有 2.76%。相反,中国在 1957～1984 年间,小城市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84%,是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2.08%的 0.88 倍。近 10 多年来,中国小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主要是由于行政区划变化使然,表现为明显的城市个数增加,而实际上考虑到长期暂住人口趋于分布在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仍旧要慢于大、中城市。

中国城市构成的独特还表现在功能上过份单一化,即不论城市大小,均程度不同地偏集于工业,这是长期实行先工业化而后城市化的自然结果。近年来,随着城市房地产业和其它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但由于工业体系的改造相当艰难,城市功能单一化的格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会继续存在。

5. 二元城镇化结构

中国在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举的前提下,强调和突出了中国式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城镇化结构。一方面,由中央和各级政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过程是在强调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设市城市的技术构成一般都比较高,且城市的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发展都较为有序。另一方面,由乡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转移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却是在资金不足、人才匮乏和技术构成较低的情况下起步的,因此表现为明显的小规模、分散化特征,城镇的基础设施较差,城乡差异不大,劳动力转移更多的表现为职业上的转变,而不是空间上的转变。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过程

中国农村城镇化大体经历了以下 4 个发展阶段。

1. “亦工亦农”阶段

1978 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土地联产承包制的顺利实施，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从而使土地对劳动力的吸纳强度大大减弱，产生出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由于城市工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力也相当有限，所以，农民不得不自发地从事某些工副业，通过“亦工亦农”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获得生产发展。由于此阶段对土地的依赖性仍相当强烈，绝大部分农民仍不愿完全放弃农业生产，所以城镇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始，而只显露出若干苗头。这一阶段大体上介于 1978～1980 年之间。

2. “离土不离乡”阶段

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稳妥实施使农民对中央农村政策有了新认识，部分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开始不断从土地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在若干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大城市周围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开始获得较快发展。而在集体经济不够发达，但素有经商传统的地区，如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个体经济则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侨乡和毗邻港澳地区，若干以合资联办为主体的村办企业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一阶段，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实现了职业上的转变过程，但限于

户籍管理上的限制,城镇的发展仍相当缓慢。这一阶段大体上介于1980～1983年之间。

3. "离乡不背井"或"进厂不进镇"阶段

这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实质性的起步阶段。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乡镇工商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集镇务工、经商,他们迫切要求解决迁入集镇落户问题。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并要求各有关部门在各方面给进镇农民以帮助。这一措施大大加快了城镇化的步伐,但由于户口限制的解除仅限于县以下集镇,而这些集镇在地域上仍与乡村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在形态上、设施上也与乡村没有本质差别,所以对周围农民的吸纳力较弱,没有形成乡村到城镇的地域转变过程,大部分从事第二产业的职工仍然居住、或仍然愿意居住在集镇周围的乡村地区。但无论如何,这一阶段小集镇的发展却使产业在空间上获得了一次集聚过程,从而使产业的规模扩大,导致农村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这一阶段大体上介于1984～1988年。

4. "进镇又进城"阶段

乡镇企业的规模化发展要求企业进一步向区位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镇聚集,从而促进了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导致了人口向较大城镇、特别是县城和城市的迁入。同时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也加速了土地规模经营的紧迫性,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加入到流动人口的行列。1988年以来出现的"民工潮"实质上只是中国城镇化加速的一个序曲,真正的城镇化

过程还会更加强烈。可以预测,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会更大。据估计到2000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当在2亿左右。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外户籍制度的改革也会引起现有城市的人口发展,加速人口的空间转换过程,实现农村人口进镇进城的梦想。中国这一阶段的农村城镇化过程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动力也是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变化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动力结构。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既有相同于世界各国的一面,又有区别于他国的独特一面。

(一) 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1. 产业的空间集聚

同其它国家发展趋势一样,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也是由于产业的空间集聚,而产业的空间集聚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过程。18世纪后期爆发的产业革命,使工业化成为近代经济的主要内容。工业化的根本特征是生产的集中性、连续性和产品的商品性,所以要求经济过程在空间上要有所集聚。正是这种工业化的集聚要求,才促成了资金、人力、资源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有限空间上的高度组合,从而促进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中国

近代工业城市上海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这一过程的缩影，而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所显现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城镇化的基本动力确实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形成的。

2. 产业的结构转换

产业的结构演进会改变城镇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主导产业均为劳动密集型，如纺织、煤炭、基本工业消费品生产等，产业间的联系较少，依存度低，因此城镇规模一般均较小，城镇化过程相对缓慢。到工业化中期，主导产业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如钢铁、机械、电力、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业等，产业间的依存度提高，导致产业在空间集聚范围上迅速扩大，引起城镇化过程加速。在工业化后期，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如电子、计算机、生物制药等），工业生产过程的管理步入到更现代化阶段，致使工业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力大大下降。但同时又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对城镇生活产生了新要求以及生产现代化对城镇服务设施的需求更多，因此城镇的地域范围会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第三产业的发展赋予城镇新的活力，会使城镇化进入到更高层次。中国城镇的经济成分多元化，各发展阶段的特征均有所表现，但在不同地域和不同规模城镇，其特征是极不相同的。在特大城市或沿海若干发达地区的城市中，工业化后期的特征已相当明朗，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城镇里，却还明显存在着工业化初期的特征。

3. 城乡间以及城市间的相互作用

城乡间、城市间的相互作用是城镇化发展的又一基本动力。

乡村人口向城镇的不断流入导致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城市或城镇间的相互作用则会使一个地区形成新的城市体系。相互作用的大小体现为：①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引力；②空间交通网络的主导轴；③小城镇对中心城市辐射和扩散的吸纳力与传递力；④乡村地区对人口的推力。中国现有的7000多万乡村流动人口，其中的绝大部分生活在现有大、中、小城市中，尤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这些流动人口是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巨大力量。

4.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深厚而久远，是城镇化发展归根结蒂的原动力。无论是产业的集聚，还是产业的结构演进，抑或是城市的空间相互作用，无一不是技术发展的最终体现。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最初的产业革命和城镇化发展，汽车的普及引出了城市郊区化，计算机的应用则强化了城市的服务功能，这些都说明技术进步对城镇化的深厚影响力。中国开辟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和新技术，也大大促进了这些区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步伐。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若干独特因素

1. 行政中心的辐合作用

自秦代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其行政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管辖和辐射着周围隶属地区。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行政中心的发展一般都远远超过其周围的聚落。至近代，中国出现了若干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城镇，但这些城镇的发

展均受制于行政中心的支配，难以具有自立性，波动性也较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注重工业化建设，力图通过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局面。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对经济建设具有绝对的控制权，通过投资、流通和分配等领域的指令性计划，政府往往可以将生产项目配置在自我熟悉、易于管理的周围地区，从而使行政中心的发展无论在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社会服务功能等方面均出现乘数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职能开始出现明显转变，行政中心的地位在整体上有所下降。但鉴于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行政中心的这种辐合作用仍会在一定时期内主宰或主导中国城镇化过程。换句话说，中国城镇化发展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依赖于行政中心的发展。

2. 政策因素

各种政策对城镇化发展均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在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的中国，政策对城镇化过程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直接起作用的两个政策即为人口户籍管理政策和设市、设镇标准的变化。前者像一只无形的手，使城乡间筑起一道壁垒，阻碍了城镇化的自然发展；后者使市镇的数量和人口规模常随之波动。

3. 行政区划变动因素

行政区划变动实质上是政策的执行过程，它时时体现政策的意志，又反过来影响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在中国，由于行政的作用巨大，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也是多层面的，除设市、设镇标准变

化对城镇化产生的影响以外，市镇行政区域大小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城镇化过程。一个市的市域范围的扩大会增强该市的直接影响区域，从而促进该市的总体发展实力和发展速度，相反一个没有发展余地的城市，其发展步伐会相应变慢。另外，由于中国城市具有鲜明的等级层次，不同层次的市具有不同的权限，如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因此通过行政区划来改变城镇等级层次，也会影响到该城镇的发展和所在区域的城镇等级。

4. 大型项目建设驱动因素

大型项目具有投资多、回报期长、影响部门广等特征，一旦布局在某一地区，即会对该地区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国家级、甚至省级的大型项目建设一般都会给所在地的城镇发展带来巨大促进，有时甚至会形成新的城镇和新的中心。如大型水电枢纽工程、大型钢铁基地建设、大型石化基地建设、大型港口建设，一般都会形成新的城市或大大改观已有城市的发展格局。

5. 外资带动因素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的作用似乎比其它生产要素更为重要，因此一个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注入的多少。外资的流入无疑对流入地区的各种结构均产生作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外资的作用强度越来越大，在沿海率先开放地区，这种影响的结果已相当清晰，作为空间变化的显著标志，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过程都大大加速了，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福厦经济带、山东半岛等地区。

6. 人口密集区的自发因素

在具有手工业传统和经商传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不同的内动力。由于乡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巨大,而城乡间壁垒又阻碍了过剩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乡村剩余劳动力便自发地寻求出路,先亦农亦工,再亦工亦农,再从事非农产业,再进而谋求产业上的空间集聚,逐渐推动城镇化发展。

7. 若干特殊因素

(1) 国防要求

为着国防安全,有时需要在若干战略要地建立中心城镇,加速这一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国若干边境重镇的设立和发展正是这一因素促成的。

(2) 边贸要求

中国市、县的权限不同,因此为了边境贸易的对等要求,有时需要加速边贸城镇的设置,以提高其综合辐射力。

(3) 旅游要求

为加速旅游区的开发,有时需要及早建立一些旅游城镇,以提高旅游区的综合服务水平,带动经济发展。

8. 文化与价值观因素

文化与价值观因素是根植于人们心灵的一种无形的潜在力量,巨大而且持久。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熏陶,以农为本,奉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贯重农轻商。而城市的发展恰恰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在整个封建社会是缓慢

之极，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较工业化过程有较大的滞后。

四、中国城镇化模式

依据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似可将中国城镇化模式作如下归类。

（一）自上而下模式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过程能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转移至城市中或新的工业镇中，其转移途径主要是通过3种形式进行的：①通过国家大型企业或重点项目的建设；②通过新型工业城市的建立和发展；③通过既有城市经济发展的扩散。这种方式的城镇化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制约：①国家的财力、物力状况；②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和工业技术构成的高低；③农业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及国际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等。这种方式的城镇化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行政指向型

是中国自上而下城镇化的主要模式。中国行政中心的乘数效应使各级行政中心均成为中国城镇化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因此一般情况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首都具有全国意义，省会具有全省意义，县城具有全县意义。一旦某一区域的行政中心迁移，则迁出地的城镇会相对有所衰落，而迁入地的城镇则会飞速发展。

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即引起了河北省城镇化中心地区的迅速变迁。另外，低级层次行政中心的升格，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也加速城镇化过程。相反，一个地区如果没有自我独立的行政中心，比如有县无城的话，即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过程也会相对缓慢，如福建省的莆田县、江苏省的无锡县等。

2. 重点项目带动型

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工业项目（如交通枢纽、大型港口、大型工矿企业建设等）的布点，有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崭新的城镇，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如攀枝花（钢铁）、包头（钢铁）、大庆（石油）、克拉玛依（石油）、六盘水（煤）、朔州（煤）、伊春（林）、黄骅（港口）、龙口（港口）、钦州（港口）等。

3. 大城市扩散带动型

随着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大城市的若干产业项目即有可能扩散到周围地区，从而使项目接受地的工业化过程加快，城镇化过程加速。如天津静海县的大邱庄镇，起初就是由于接受了天津市钢铁工业的扩散而发展起来的，目前它吸纳的外来乡村劳动力人数已超过 15000 人。另外，大城市的卫星城发展也可归为这一类。

（二）自下而上模式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形成的一种独特过程，在中国人口稠密、商品经济和商品意识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在这一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非农

产业的形成主要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二是发展乡镇企业；三是发展个体工商企业；四是劳务输出。而人口的地域转移则多种多样，有“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继续留在农村的；有“离乡不背井”，进入城镇或边远地区的；也有“进厂又进城”，进入城镇或小城市的。这种方式的城镇化，深刻地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和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扩散能力。这种城镇化过程可再细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 苏南模式

主要发生在江苏南部地区，以苏锡常地区最为典型。该地区开发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历史上素有农工相辅之传统，手工业一向发达。该地区城镇密度高，中心城市辐射力强，人多地少，乡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剩余劳力过多的问题，在原有集体经济的社队企业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以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系，城镇化得以较快发展。目前在市场经济驱动之下，乡镇企业出现了向更大城镇集聚的新趋势，从而有可能使城镇化步入到新阶段。

2. 温州模式

主要发生在浙江沿海地区，以温州和宁绍地区为典型。该区地少人多，交通不便，但该区素有经商传统，因此一俟改革开放，该区即以商促工，发展起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农村个体经济体系，在生产领域发展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专业市场，并通过个人外出经商，使生产与消费结为一体。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浙江人聚落，以及遍布各边远地区的浙江人，无疑加速了中国城镇化的

步伐和浙江本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但由于个体经济的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益难得发挥，技术构成难得提高，这种方式的城镇化面临一定的困难。

（三）外力推动模式

这种方式的城镇化是在外力推动下起步和发展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因此包括外资、外贸和旅游在内的外向型经济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从而带动了城镇化飞速发展。这种城镇化模式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外资带动型

主要发生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区，以珠江三角洲最为典型。在这些地区，三资企业聚集，形成了较强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这些三资企业成片、成带布局，对乡村剩余劳动力引力巨大。深圳从十几年前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的特大城市，正是外资带动的结果。近几年来，整个珠江三角洲、福厦经济发展带以及若干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也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

2. 边贸激发型

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以内陆口岸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为其典型。如中俄边境的黑河、额尔古纳，中缅边境的畹町、瑞丽等。双边贸易的增加，需要设立相应的物资集散地和口岸，而贸易量的进

一步增大,则有可能使口岸发展成为城市,促进城镇化过程。

3. 旅游促动型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能有效地刺激商业、房地产业、娱乐业、饮食业以及服务业等的发展,从而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国近年来新设市当中,即有以旅游业为其主导产业而设置的,如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市、宁安市,福建的武夷山市,江西的井冈山市,安徽的黄山市,山东的曲阜市,海南的三亚市,四川的峨嵋山市以及甘肃的敦煌市等。

五、中国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是一个具有广泛含义的概念,但狭义上的城镇化,一般是指人口城镇化。所谓城镇化水平,即指一定区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一) 现状人口城镇化水平

中国城镇化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前的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户籍管理制度,中国城镇化过程受到严格控制。当时,工业化是中央计划的优先目标,因此城镇化过程实际上就成为国家非农化过程的一种附带产物,非农化程度的高低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尽管由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被低估了。根据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计算，中国 1949 年的城镇化程度为 10.6%，1957 年为 15.4%，1975 年为 12.2%，1978 年为 12.5%，具有较强波动性。

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城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一是投资渠道多元化；二是城镇人口政策相对灵活化；三是城镇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潜力增大；四是市镇建置标准发生了变化，使经济增长点分散化；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大，进一步提高了城镇吸引力和吸纳力；六是乡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剧增，对城镇化形成巨大推力。在这些新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人口城镇化过程大大加速了，城镇中那些不被公安部门登记为城镇非农业人口而实际上从事城镇经济活动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使统计上的人口城镇化程度与实际上的数值背离较大。为此在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中国使用了新的城镇人口统计标准，从地域上划分了城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从而较好地修正了先前人口城镇化统计上的偏差。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市镇总人口是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不设区的市所辖街道人口和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以及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根据这一标准，中国 1982 年的市镇人口比重为 21.13%，1984 年为 23.01%，1988 年为 25.81%，1990 年为 26.41%，1993 年为 28.14%。由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所用的统计标准仍然未包括城镇中的长期暂住人口，所以中国目前的人口城镇化程度实际上要高出普查时所使用的市镇人口比这一标准。根据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大约要高出 10%左右。由此判断，1994 年中国的现状人口城镇化程度约为 32%左右。

（二）未来城镇化水平预测

1. 原始数据

鉴于以往的统计数据波动较大，为确保资料的系统性、可比性和有效性，我们采用 1982～1993 年以来的数据进行预测（表 20）。

表 20 中国人口城市化预测基本数据

年份	总人口（万人）	市镇人口（万人）	市镇人口比重（%）	现价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按 1993 年可比价计算		
					指数	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人均 GNP（元/人）
1982	101654	21480	21.13	5193.0	2.88	14956	1471
1983	103008	22274	21.62	5809.0	2.61	15161	1472
1984	104357	24017	23.01	6962.0	2.28	15873	1521
1985	105851	25094	23.71	8557.6	2.02	17286	1633
1986	107507	26366	24.52	9696.3	1.86	18035	1678
1987	109300	27674	25.32	11301.0	1.67	18873	1727
1988	111026	28661	25.81	14068.2	1.51	21243	1913
1989	112704	29540	26.21	15993.3	1.44	23030	2043
1990	114333	30191	26.41	17695.3	1.38	24420	2136
1991	115823	30543	26.37	20236.3	1.28	25902	2236
1992	117171	32372	27.63	24378.9	1.13	27549	2351
1993	118518	33351	28.14	31342.3	1.00	31342	2644

2. 预测模型及结果

对基本数据，我们采用 4 种模型进行预测。

（1）时间序列模型

基本数据表明，市镇人口比重具有随时间直线上升的趋势，为

此我们对其进行直线回归,有方程:

$$Y = -1219.59 + 0.6262t \qquad \text{(模型 1)}$$

其中:相关系数 R = 0.98　标准差 S = 0.49

检验值 $F = 283.68(>F_{0.01}(1,10) = 10.04)$

据此模型预测,到 2000 年和 2010 年,中国市镇人口比重将分别达到 32.92%和 39.08%。

(2) **S 型曲线模型**

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所经历的轨迹显示,城镇化发展速度与现有城镇化水平和尚未城镇化水平的乘积成正比,即城镇化的发展是由拉力和推力共同作用而成,呈 S 型曲线。为此对基本数据进行 S 型曲线模拟。有方程:

$$Y = \frac{100}{1 + 2.774e^{-0.0328(t-1990)}} \qquad \text{(模型 2)}$$

其中:$R = 0.71 \quad S = 26.47 \quad F = 10.92(>F_{0.01}(1,10) = 10.04)$

据此模型预测,到 2000 年和 2010 年,中国市镇人口比重将分别为 33.35%和 40.99%。

(3) **灰色系统模型**

为减少原数列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可用数列的累加值替代原数列进行分析,然后再将累加值预测复原成原数值系列。一般地,累加值序列呈非线性。

对基本数据进行灰色系统的一阶线性动态模拟,可得如下递推公式:

$$X_{(t+1)} = 986.655e^{0.02262t} - 965.525 \qquad \text{(模型 3)}$$

其中:检验值方差比 C = 0.1367(良好)　小误差概率 P = 1(良好)

模型还原值与原始数据关联度 S = 0.7147　式中:t = 1 时为

1982年值,余类推。

据此递推公式,可求得至2010年的各年预测结果(如表21)。

表21　城市化水平灰色系统预测结果

年份	累计预测值	市镇人口比重(%)	市人口比重(%)
1994	328.84	28.95	20.84
1995	358.45	29.61	21.32
1996	388.74	30.29	21.81
1997	419.72	30.98	22.31
1998	451.42	31.70	22.82
1999	483.84	32.42	23.34
2000	517.00	33.16	23.88
2001	550.91	33.91	25.43
2002	585.61	34.70	26.03
2003	621.10	35.49	26.62
2004	657.40	36.30	27.23
2005	694.53	37.13	27.85
2006	732.51	37.98	28.49
2007	771.36	38.85	29.14
2008	811.09	39.73	29.80
2009	851.74	40.65	30.49
2010	893.32	41.58	31.19

(4) **相关分析模型**

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为此我们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市镇人口比重进行相关分析,有对数回归方程:

$$Y = -56.628 + 10.835Ln(X) \qquad (模型4)$$

式中:Y = 市镇人口比重　X = 人均GNP(元/人)

其中:$R = 0.95$　$S = 0.73$　$F = 112.70 (> F_{0.01}(1,10) = 10.04)$

依据上述回归方程,拟用3种可能性进行分时段预测。首先根据近年来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未来GNP增长速度作如下假设:2000年之前高、中、低年增长率分别为9.5%、9.0%和8.5%,2001年至2010年间分别为8.0%、7.5%和7.0%。然后再依据回

归方程对各假定值进行预测(表22)。

表22　不同时段城市化水平相关分析预测

方案	GNP增长率%		2000年		2010年	
	1994～2000年	2001～2010年	人均GNP(元/人)	市镇人口比重(%)	人均GNP(元/人)	市镇人口比重(%)
高	9.5	8.0	4638	34.84	9155	42.21
中	9.0	7.5	4492	34.50	8465	41.36
低	8.5	7.0	4350	34.15	7823	40.51

3. 预测结果及评价

以上4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基本趋同,但后3种模型的结果更为接近。为此,我们以这后3个结果作为预测值概数,即到2000年,按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统计标准计,中国市镇人口比重将达到34%左右,2010年约为42%。

如前所述,由于暂住人口的影响,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程度要高于市镇人口比。若高10%,则2000年和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当为37%左右和46%左右。若2000年以后,暂住人口的比重占到市镇人口的20%左右,则2010年时,中国城镇化水平将可能达到50%左右。

S型城镇化发展轨迹显示,城镇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90%时达到最高点,因此可以前瞻性地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

六、中国城镇化地域差异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势地貌形态多样,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一)三大地带差异

中国三大阶梯的地势形态构成了中国三大地带的明显差异。就城镇化发展而言,三大地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 **城镇化水平不同**

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而中部地区则介于两者之间。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市镇人口比看,东部地区为27.68%,中部地区为24.93%,西部地区为20.45%。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东、西部之间城镇化水平的差距更大。

(2) **城镇分布密度不同**

据1994年资料分析,中国设市城市共计622个,其中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为278个、231个和113个。按每万平方公里的城市数计算,东部地带为2.04个,西部地带为0.21个,相差9.7倍以上。

(3) **城镇规模结构不同**

从整体上看,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在全国73个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东部地带占50.68%,而西部地带仅占10.96%。从各地带内部结构看,东部地带的城市体系较完备,大、

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比值为 37 :80 :161。而西部地带相应的比值为 8 :27 :78。从城市的平均规模上看，东部地带为 35.26 万人，西部地带为 24.83 万人，相差也较悬殊。

(4) **人口迁移格局不同**

改革开放之前，西部地带是中国主要的人口迁入地，而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带则成为净迁入地，且伴随着大量的乡村人口迁入。

(5) **城市增加数量不同**

近年来，随着东部的经济飞速发展，城市的数量增加也相应加快，从而导致了东、中、西地带间城镇化发展差异的进一步加大。从 1986～1994 年间设市数量上看，全国共设市 300 个，其中东部地带 145 个，占设市数量的 48.33%，中部地带 121 个，占 40.33%，西部地带 34 个，占 11.33%。

未来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城镇化水平会出现更大差异。根据近十几年来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和三大地带的固有差异分析，运用上述建立模型的相同方法，可以对三大地带的未来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表 23)。

从表 23 可见，东部地带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要继续明显快于西部地带，前者平均每年增长 1.18 个百分点，而后者则只有 0.78 个百分点。

表 23　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城镇化水平预测

地带	总人口(万人)			市镇人口比重(%)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东部	43198	47514	51790	27.68	40.09	51.24
中部	40789	45743	50804	24.93	32.69	42.64
西部	26043	29324	32713	20.45	27.48	36.14

说明：东部地带计算值未包括京、津、沪 3 市。

（二）省际差异

中国省际城镇化水平差异较三大地带更明显。1990年人口城镇化水平最高的辽宁省为50.86%，而最低的西藏自治区却只有12.59%，相差4倍多。

中国省际城镇化水平呈下列分布：城镇化水平大于40%的省有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大于30%、小于40%的省区有内蒙古、浙江、广东和新疆；大于20%、小于30%的省区有山西、江苏、福建、山东、湖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小于20%的省区有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和西藏。可以看出，大多数省区的城镇化水平目前仍旧较低。

尽管如此，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多数省区的城镇化过程还是明显加快了，其中城镇人口比重提高8个百分点以上的省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和广东；增加6～8个百分点的省区有山西、江苏、湖北、青海和宁夏；增加3～6个百分点的有河北、内蒙古、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增加3个百分点以下的省区有广西、贵州、云南和西藏。

为了比较各省区未来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我们运用各省区1978年以来的城市非农业人口数和人均GNP指标，对各省区2010年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时间序列和经济相关分析预测（表24）。可以看出，未来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的省区将是河北、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其年平均增加数为1.15个百分点以上；提高较慢的省区将是内蒙古、吉林、黑龙江、贵州，其年平均增加数为0.6个百分点以下。但总体上看，省际间城镇化的差异将趋于缩小。

表 24　中国各省区城镇化水平预测(%)

省区	1990 年实际值	2010 年			1990～2010 年增加幅度
		时间序列	经济相关	综合值	
河北	19.08	29.50	48.23	42.61	23.53
山西	28.72	42.21	45.87	44.04	15.32
内蒙古	36.12	52.61	42.92	47.77	11.65
辽宁	50.86	73.00	55.80	67.84	16.98
吉林	42.65	56.60	50.41	53.51	10.86
黑龙江	47.17	59.42	51.17	55.30	8.13
江苏	21.24	31.89	56.05	48.80	27.56
浙江	32.81	53.45	56.13	54.79	21.98
安徽	17.89	25.18	41.96	36.93	19.04
福建	21.32	28.03	53.23	45.67	24.35
江西	20.39	27.20	43.56	38.65	18.26
山东	27.34	50.42	53.51	51.97	24.63
河南	15.52	22.42	44.77	38.06	22.54
湖北	28.91	43.56	48.99	46.28	17.37
湖南	18.23	27.10	45.59	40.04	21.81
广东	36.77	62.09	58.44	60.27	23.50
广西	15.09	20.59	46.93	39.03	23.94
四川	20.25	28.56	42.98	37.21	16.96
贵州	18.93	22.05	34.37	29.44	10.51
云南	14.72	18.73	39.98	33.60	18.88
西藏	12.59	12.15	38.93	30.90	18.31
陕西	21.49	30.17	43.77	38.33	16.84
甘肃	22.04	29.85	39.75	34.80	12.76
青海	27.35	38.50	41.54	40.02	12.67
宁夏	25.72	34.16	42.22	38.19	12.47
新疆	31.91	39.43	49.70	45.59	13.68

说明:海南省、台湾省资料暂缺。

第六章　中国城市体系地域空间结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反映到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上，也充分表现了体系内城市分布、排列、组合的地域差异和不平衡特征。狭义的城市分布密度，是指城市的地域空间分布状况。导致这种空间分布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理基础的影响。因此，中国城市体系地域空间结构具有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两大特征。

一、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分布近代以来一直呈现自东而西由密到疏的空间分布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尽管加强了中、西部地带城市的建设，但东密西疏的城市分布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概括起来，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具有如下特征。

1. 空间分布东密西疏

中国城市的空间分布偏集于沿海,尤其集中分布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城市密集区。据1993年资料,中国无论城市数量还是城市人口都偏集于东部沿海地带。这一地带占全国14.2%的国土面积,却分布有43.5%的城市数和51.2%的城市人口,是中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地带。中部地带占全国29.2%的国土面积,分布了37.7%的城市数和33.9%的城市人口;而西部地带占全国56.5%的国土面积,仅仅分布了18.8%的城市和15.9%的城市人口,城市分布密度仅是东部沿海的1/9和中部地带的1/4,是中国城市分布稀疏地带。从城市等级规模来看,东部沿海地带集中分布着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人口分别占全国的59.7%和56.5%;在中部地带,大、中、小城市分布比较均衡,它们的城市数和城市人口均占全国各类总数的30~42%;而在西部地带则表现为以小城市占优势的地域分布特征(表25)。

从1949~1994年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空间分布变化看,东部地带城市数量进一步增加,城市网密度增加3.6倍;中部地带城市数量增加了177个,但比重却由1985年37.8%下降为37.14%;西部地带城市数量从13个增加到113个,45年间增加100个,占全国城市总量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9.1%增加到1994年的18.17%。以上说明,中国城市空间分布偏集沿海地带的格局已有所改变。

表 25　中国三大地带城市分布表(1993 年)

指标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		%		%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960.0	136	14.2	280	29.2	544	56.6
城市数(个)		570	248	43.51	215	37.72	107	18.77
其中	特大城市	32	15	46.88	10	31.25	7	21.88
	大城市	36	20	55.56	15	41.67	1	2.78
	中等城市	161	71	44.10	65	40.37	25	15.53
	小城市	341	142	41.64	125	36.65	74	21.70
城市人口(万人)		17609.1	9014.9	51.19	5962.5	33.86	2631.0	14.94
其中	特大城市	6673.3	3983.7	59.70	1599.4	23.97	1090.2	16.34
	大城市	2404.1	1361.0	56.61	986.9	41.05	56.2	2.33
	中等城市	4824.1	2108.6	43.71	1983.3	41.11	732.2	15.18
	小城市	3707.7	1544.1	41.65	1392.5	37.56	753.8	20.33

说明：东部地带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 12 省市区；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9 省区；余为西部地带。

2. 省际分布差异明显

从 1994 年全国分省区城市网密度看(图 6)，江苏省是中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的省区，每万平方公里有 3.9 个城市；浙江、山东、广东、海南 4 省是城市分布次密集地区，城市网密度均在每万平方公里 2.3 个城市以上；河南、辽宁、湖北、福建、河北、上海、安徽 7 省市城市网密度居中，达每万平方公里 1.5 个城市以上；吉林、湖南、山西、江西 4 省城市网密度也在每万平方公里 1～1.5 个城市之间；天津、广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四川、宁夏、北京等 8 省、市、区城市网密度达每万平方公里 0.6 个城市以上，其中天津、广西、陕西 3 省市区均超过了全国城市网密度每万平方公里 0.65 个城市的水平；而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6 省区城市网密度最疏，每万平方公里不足 0.4 个城市(表 26)。与 1985 年分省区城市网密度(图 7)对比，广东、海南 2 省城市网密度增长最快，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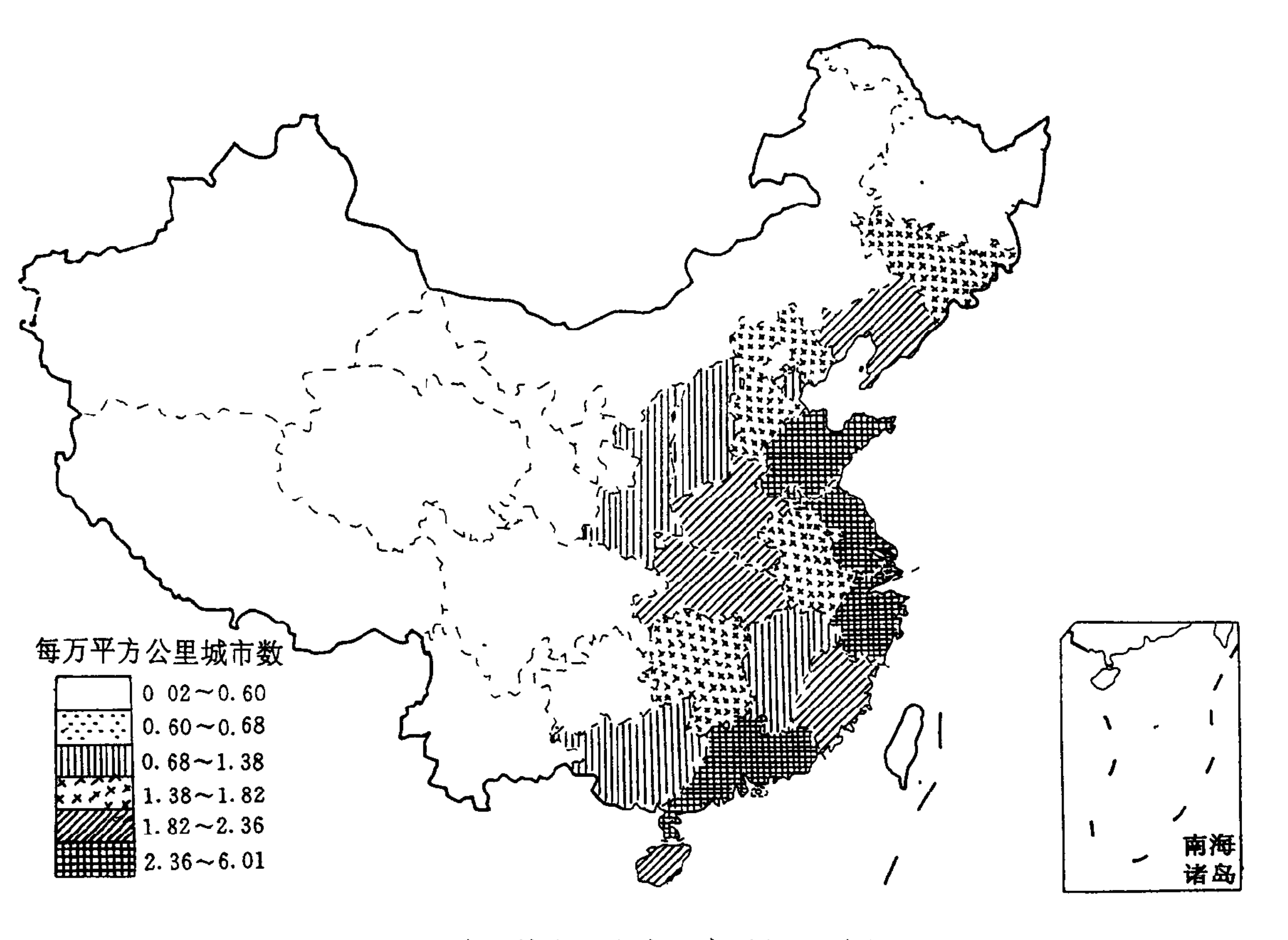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城市网密度示意图(1994年)

说明:台湾省暂未列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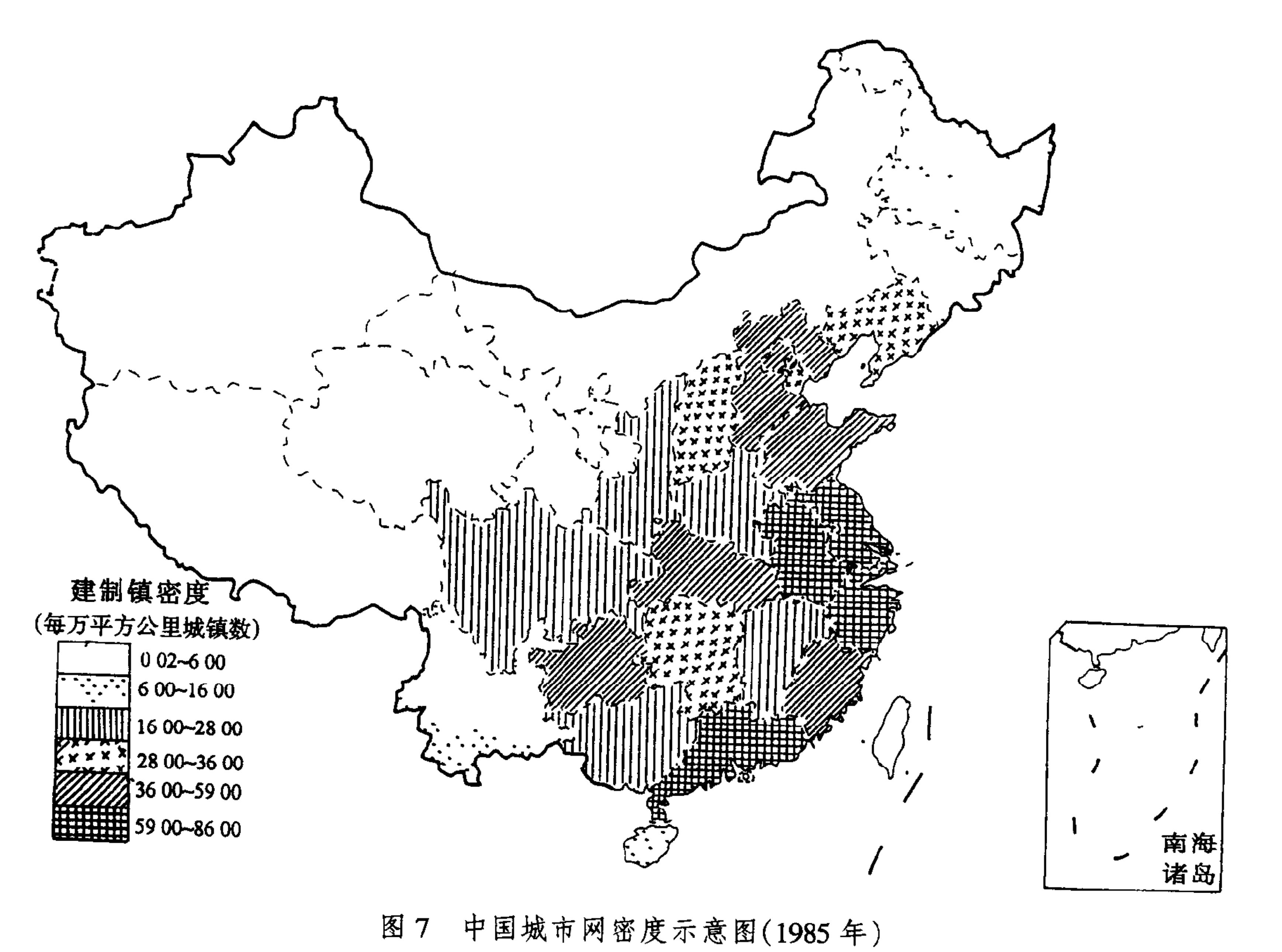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城市网密度示意图(1985 年)

说明:台湾省及港澳地区暂未列入。

省次之；而湖南、山西等省区城市网密度增长较慢。从全国城市网密度看，10 年中已经从 1985 年的每万平方公里 0.36 个城市增加到 1994 年的每万平方公里 0.65 个城市，城市网密度几乎翻了一番。

表 26　中国城市网密度分析表（1985～1994 年）

省市区	1985 年		1994 年		省市区	1985 年		1994 年	
	城市数	个/万 km²	城市数	个/万 km²		城市数	个/万 km²	城市数	个/万 km²
辽宁	17	1.13	29	1.93	内蒙古	16	0.15	19	0.17
北京	1	0.60	1	0.60	安徽	15	1.15	20	1.53
天津	1	0.91	1	0.91	江西	12	0.75	19	1.19
上海	1	1.72	1	1.72	河南	18	1.13	36	2.25
河北	12	0.63	33	1.73	湖北	14	0.78	33	1.83
山东	19	1.27	46	3.07	湖南	20	0.95	29	1.38
江苏	13	1.30	39	3.9	四川	19	0.34	35	0.62
浙江	11	1.10	33	3.3	云南	11	0.29	15	0.39
福建	10	0.83	22	1.82	贵州	6	0.35	11	0.64
广东	18	0.81	51	2.36	西藏	1	0.008	2	0.016
广西	11	0.48	16	0.70	陕西	8	0.42	13	0.68
海南	1	0.38	6	2.31	甘肃	12	0.31	13	0.33
黑龙江	16	0.35	29	0.63	青海	2	0.03	3	0.04
吉林	12	0.67	26	1.44	宁夏	4	0.61	4	0.61
山西	10	0.67	20	1.33	新疆	15	0.09	17	0.11
全国	344	0.36	622	0.65					

资料来源：民政部行政区划与地名司。

3. 城市偏集中纬度地带

城市空间分布测度的另一形式是经纬网内分布状况。中国疆域辽阔，所囊括的经纬度跨度较大（自南而北跨纬度 49 度多，从东

到西跨经度60多度)。从中国城市体系的地域分布看,城市主要集中于北纬20～40度及东经105～125度的地区(表27)。

表27 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状况(1994年)

纬度(N) 经度(E)	大于50	45～50	40～45	35～40	30～35	25～30	20～25	小于20	合计
130～135		8	2						10
125～130	1	13	23						37
120～125	2	9	26	17	32	13			99
115～120		3	6	56	47	39	15		166
110～115			6	36	50	39	46	2	179
105～110			2	11	20	19	11	3	66
100～105				7	11	15	5		38
95～100				4		1	2		7
90～95			2	1		1			4
85～90		1	6			1			8
80～85		2	4						6
小于80				2					2
合计	3	36	77	134	160	128	79	5	622

(1) 经向分布特征

从城市的经向分布看,中国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东经110～125度内,约占总城市数的71.39%;东经100～110度间城市分布数量次之,占总数的16.72%;东经125～135度间再次之,约占全国城市总量的7.56%,而东经100度以西的广大地区,城市数量很少,仅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34%,城市分布寥若晨星(表28)。

从中国城市经向分布变化中可以看出,新城市的设置也主要集中在东经110～125度之间,1985～1994年的10年中共新增城市215个,占同期全国新增城市总数的77.3%。从相对数量看,东

经105度以西的地区和东经120～125度之间以及东经130～135度之间虽然城市数绝对量略有增加，但相对量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仅仅东经110～120度和东经125～130度之间城市数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表28 中国城市经向分布统计表(1985、1994年)

经度	1985年		1994年		1985～1994年年间变化	
	城市数	%	城市数	%	城市数	%
小于80	1	0.29	2	0.32	1	0.03
80～85	6	1.74	6	0.96	0	-0.78
85～90	7	2.03	8	1.29	1	-0.74
90～95	3	0.87	4	0.64	1	-0.23
95～100	5	1.45	7	1.13	2	-0.32
100～105	25	7.27	38	6.11	13	-1.16
105～110	43	12.50	66	10.61	23	-1.89
110～115	88	25.58	179	28.78	91	3.20
115～120	79	22.98	166	26.69	87	3.71
120～125	62	18.03	99	15.92	37	-2.11
125～130	19	5.52	37	5.95	18	0.43
130～135	6	1.74	10	1.61	4	-0.13
合计	344	100.00	622	100.00	278	-

(2) **纬向分布特征**

从城市的纬向分布看，中国城市以北纬25～40度间最为集中，其间共有城市422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67.78%。其次是北纬20～25度和40～45度间，分别占全国城市的12.7%和12.38%。再次是北纬45度以北的地区，现有39个城市，占城市总量的6.27%。北纬20度以南的地区现有城市5个(未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的0.80%(表29)。

表 29　中国城市纬向分布统计表(1985、1994 年)

纬度	1985 年		1994 年		1985～1994 年年均变化	
	城市数	%	城市数	%	城市数	%
大于 50	1	0.29	3	0.48	2	0.19
45～50	23	6.69	36	5.79	13	-0.90
40～45	49	14.25	77	12.38	28	-1.87
35～40	69	20.05	134	21.54	65	1.49
30～35	78	22.67	160	25.72	82	3.05
25～30	74	21.52	128	20.58	54	-0.94
20～25	48	13.95	79	12.70	31	-1.25
20 以下	2	0.58	5	0.80	3	0.22
合计	344	100.00	622	100.00	278	-

若与 1985 年中国城市纬向分布相对照,其分布格局大体一致,但北纬 30～40 度间城市数增加最多,达 147 个,占新增城市的 52.88%;其次是北纬 25～30 度间增加了 54 个城市。从 1985～1994 年间城市纬向分布变化看,仅北纬 30～40 度和北纬 20 度以南和北纬 50 度以北的地区相对数量增加,而北纬 40～50 度和北纬 20～30 度间城市分布的相对数量都在下降。

(3) 空间分布重心

根据中国城市体系的经向、纬向分布特征,求得 1994 年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坐标为东经 114.48 度,北纬 33.36 度(较 1985 年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坐标东经 116.06 度,北纬 33.43 度向西南偏离),大约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附近地区,明显向东南偏离中国国土的几何中心(约东经 103 度,北纬 37 度,即甘肃省兰州市东北方向约 20 公里处),表现为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偏集东南沿海的基本倾向(表 30、31)。

表 30　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经度计算表
（1985、1994 年）

平均经度（E）	1985 年		1994 年	
	城市数(n_1)	$E\times n_1$	城市数(n_2)	$E\times n_2$
77.5	1	77.5	2	155.0
82.5	6	495	6	495.0
87.5	7	612.5	8	700.0
92.5	3	277.5	4	370.0
97.5	5	487.5	7	682.5
102.5	25	2562.5	38	3895.0
107.5	43	4622.5	66	7095.0
112.5	88	9900	179	20137.5
117.5	79	9282.5	166	19505
122.5	62	7595	99	12127.5
127.5	19	2422.5	37	4717.5
132.5	6	795	10	1325
合计	344	39925	622	71205

表 31　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分布重心纬度计算表
（1985、1994 年）

平均纬度（N）	1985 年		1994 年	
	城市数(n_1)	$N\times n_1$	城市数(n_2)	$N\times n_2$
52.5	1	52.5	3	157.5
47.5	23	1092.5	36	1710.0
42.5	49	2082.5	77	3272.5
37.5	69	2587.5	134	5025
32.5	78	2535.0	160	5200.0
27.5	74	2035.0	128	3520.0
22.5	48	1080.0	79	1777.5
17.5	2	35.0	5	87.5
合计	344	11500	622	20750

二、中国城市体系的地理分布特征

上述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一方面固然是各地区社会、经济、人口和历史等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则又是受地理条件深刻影响的反映。因此，中国城市体系的地域空间结构也具有相应的地理分布特征。

1. 平原丘陵地区多，高原山区少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西部的山地和高原面积很大，而东部丘陵和平原占地比重相对较多。中国主要城市集中分布于海拔高度小于500米的东部丘陵、平原地区，平均海拔高度500～2000米的中部低山、中山地区分布较少，西南内陆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中、高山地区分布更少。城市体系地域空间分布表现为“低密高疏”的垂直分异规律和“东密西疏”的水平分异规律（表32）。

表32　中国城市垂直分布统计表（1994年）

地形阶梯（海拔高度）	西←——东		
	第三阶梯（大于2000米）	第二阶梯（500～2000米）	第一阶梯（小于500米）
土地面积占全国%(A)	37	47	16
城市数占全国%(B)	1.4	15.8	82.8
u值(B/A)	0.038	0.336	5.175

说明：城市数系城市和人口规模大于5万的镇数。

根据上表，中国第一阶梯的u值分别为第二阶梯的15.4倍和

第三阶梯的136倍左右,可见中国主要城市(镇)偏集海拔高度小于500米的丘陵、平原的倾向非常突出。

2. 偏集于亚热带、暖温带地区

由于季风和降水的影响,中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不但不像世界同纬度许多地区那样是荒漠或干草原,而是由夏季风在高温季节带来丰沛的降水,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农业发达地带,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分布的集中地区。此外,暖温带、中温带地区也是中国城市分布比较密集区域(表33)。

表33 中国气候区城市分布统计表(1985～1994年)

气候区		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中温带	寒温带	青藏高原区	全国
占全国国土面积(%)(B)		1.6	26.1	18.5	25.9	1.2	26.7	100.0
1985年	城市数	8	169	86	78	-	3	344
	%(A)	2.3	49.1	25.0	22.7	-	0.9	100.0
	u_1值(A/B)	1.44	1.88	1.35	0.88	-	0.03	1.00
1994年	城市数	14	302	179	122	-	5	622
	%(C)	2.25	48.6	28.8	19.6	-	0.80	100.0
	u_2值(C/B)	1.41	1.87	1.54	0.75	-	0.03	1.00

说明:暖温带包括河南、河北、山西、辽宁、陕西、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亚热带包括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分地区,贵州和四川省;热带包括海南、广东和云南部分地区;青藏高原区包括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余为中温带。

由上表可见,1994年中国城市主要分布于亚热带、暖温带和中温带,尤其在亚热带几乎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城市。从城市分布数与国土面积u值比率可见,亚热带最高,其次是热带和暖温带。再从城市等级规模的地域分布看,在亚热带,中、小城市比例高于大城市;在暖温带,大、中城市比例高于小城市;在中温带,则大城市比例高于中、小城市;热带地区尽管在中国分布面积不大,

但城市分布密度较大,仅次于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寒温带和青藏高原地区城市分布密度最低,现仅有5座城市。

与1985年相比,中国气候区城市分布变化不大,仅暖温带城市数由25%增加到28.8%,中温带城市数则由22.7%下降为19.6%。

3. 资源指向分布明显

中国目前还有不少资源型城市。它们主要分布于资源赋存地。山西煤炭资源居全国之首,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煤炭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省13个城市有9个以开采煤炭为支柱产业,占城市总数的7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由于气候干燥,城市发展对水资源依赖性大,现状多数城市分布在前冲积洪积扇或河流三角洲地带,如阿克苏、喀什、石河子等;另一部分则位于河谷盆地,如伊宁、博乐、阿勒泰等市,具有绿洲型城市的特征。全区绝大多数城市受"三山夹两盆"地貌格局的影响,都围绕盆地光热水土最丰富的地带呈串珠形分布。在某些大盆地呈圆形或"C"字型分布,如吐哈盆地边缘的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阿图什和和田市,准噶尔盆地的昌吉、石河子和奎屯市等。五大连池、黄山、武夷山、井冈山、桂林等旅游城市也都是依赖风景旅游资源的开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4. 交通指向分布为主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与交通条件密切相关。中国城市分布现状具有沿海、沿江、沿线(铁路和公路)和沿边(境)的特征,这种空间格局是城市分布的交通指向结果。据统计,中国约70%左右城

市的区位由交通指向决定，尤其近代以来形成和发展的城市大多与铁路、港口的建设相关，其中京沪铁路、京广铁路、哈大铁路、胶济—蓝烟铁路、陇海—兰新铁路、滨洲—绥滨铁路、长江及大运河沿线、宝成—成昆铁路、襄渝—川黔铁路、成渝铁路、黔桂铁路、贵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枝铁路、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带是城市串珠状分布的主要地区。

三、形成中的城市集聚区

中国沿海和沿江地区，由于拥有多方面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始终是中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也是各城市集聚区形成、发展的主要区域。中国东部地带自北而南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城市集聚区① 如图 8 所示。

(1) 辽中南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沈阳、大连为核心，已形成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鞍(山)—营(口)—盘(锦)—瓦(房店)—大(连)块状城市连绵带。

(2) 首都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京、津、唐为核心，正逐步形成包括内圈(京—津—唐—廊坊)、外圈(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沧州)的首都块状城市圈。

(3) 长江三角洲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为辅心，已形成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南京)、镇(江)、扬

① 台湾省暂未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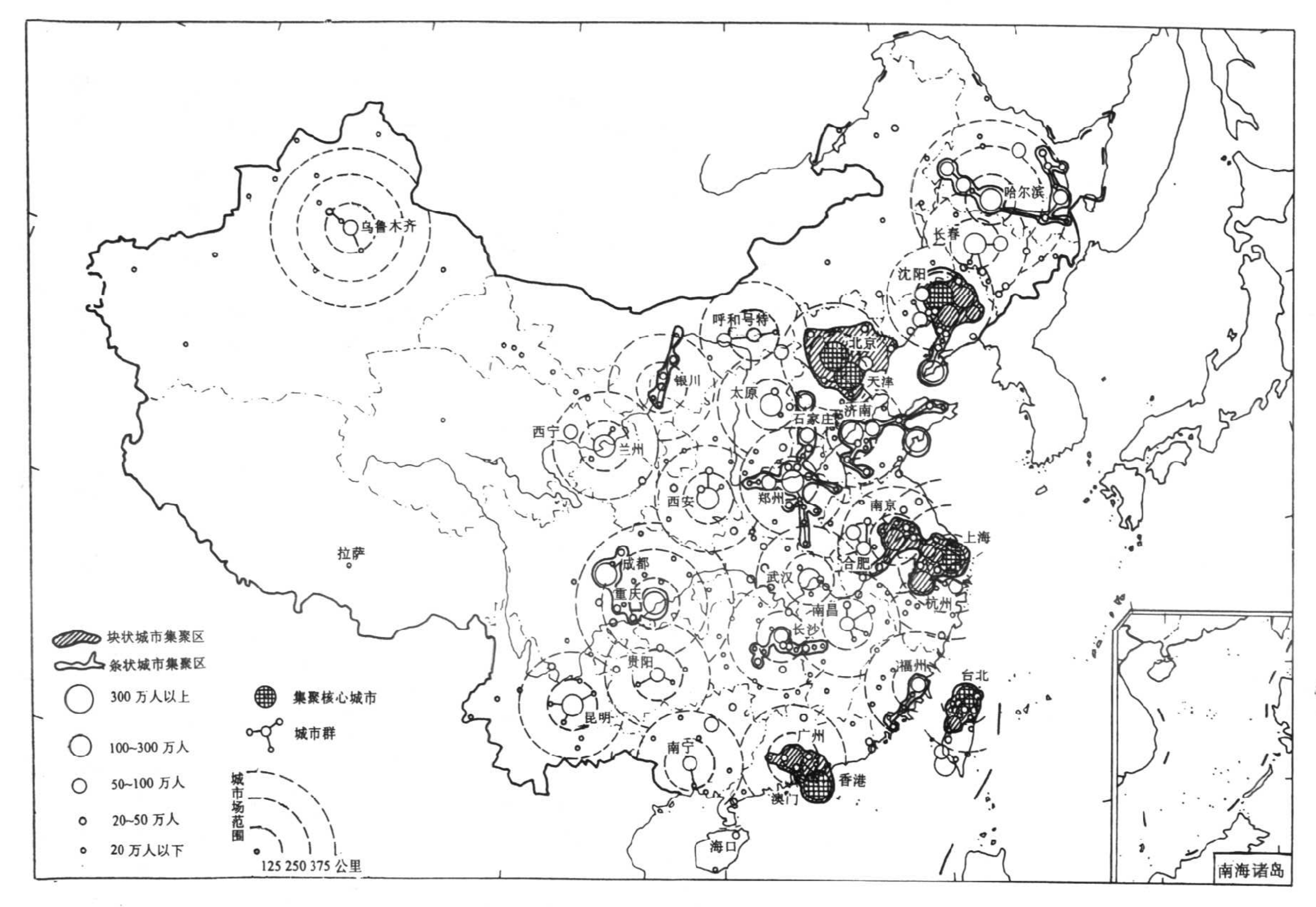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城市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类型图

(州)—马(鞍山)、芜(湖)、铜(陵)的巨型城市连绵带。

(4) 珠江三角洲块状城市集聚区。本区以广州为核心,正在形成包括东莞、佛山、中山、深圳、江门、肇庆、珠海等城市组成的块状城市集聚区。

(5) 胶济—津浦(山东境内济南以南)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济南、青岛为两核,以胶济、兰烟和济南以南津浦铁路为骨干,正在形成龙(口)、烟(台)、威(海)、莱(阳)、青(岛)—淄(博)、青(州)、潍(坊)—济南—泰(安)、(莱)芜、新(泰)—济宁、兖(州)、曲(阜)等城市密集区。

(6) 闽东中部沿海城市密集区。本区以福州、厦门为两核,正形成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城市组成的沿海条状城市密集区。

(7) 滨洲—牡佳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哈尔滨为核心,以滨洲铁路、牡佳铁路为骨干,正形成包括齐齐哈尔、大庆、安达、肇东、哈尔滨、阿城、牡丹江、绥芬河、鸡西、七台河、佳木斯、双鸭山、鹤岗等城市组成的"一"字形条状城市密集区。

(8) 郑州京广—陇海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郑州为中心,以京广、陇海"十"字形交叉铁路为骨干,正在形成包括三门峡、义马、洛阳、郑州、开封、新乡、许昌、漯河、平顶山等城市组成的"十"字形条状城市密集区。

(9) 湘中湘黔、浙赣铁路为枢轴,正形成包括江西省新余、宜春、萍乡,湖南省醴陵、娄底、邵阳、冷水江、新化等城市组成的条状城市密集区。

(10) 成渝铁路沿线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成都、重庆为两极,成渝铁路为枢轴,正形成包括绵阳、德阳、简阳、资阳、内江、自

贡、泸州等城市(镇)组成的条状城市密集区。

(11) 宁夏黄河灌区条状城市密集区。本区以银川为中心,包兰铁路为轴线,正在形成包括临河、乌海、石咀山、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等新城市组成的内地条状城市密集区。

此外,以长春、太原、西安、合肥、武汉、南昌、南京、贵阳、昆明、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也正在形成之中。

第七章　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

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各类城市的规模层次分布特征，以及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组合特征和发生发展规律，并通过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动态模拟，指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制订城市体系发展战略服务，充分发挥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中心地作用。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关系

1. 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系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城市形成和发展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自秦汉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城市便一直保持着生命活力。而在欧洲，自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消亡以后，长达600年的古代西欧城市化过程便告结束，出现了中世纪时期城市发展的大衰落。

中国封建时期城市的发展之所以没有像西欧那样，随着封建

帝国的更替而兴衰,其原因正是由于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和地理环境。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一直将县制作为其行政管理的最基本单位,通过中央集权式的任免制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各级行政管理中心,而城市作为管理中心的所在地,不仅成为文化中心、宗教中心和商贸中心,而且也成为代表一定管理级别的中心。正是由于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的这种高度结合与统一,中国的城市才在历代王朝的更替中保持着发展的活力。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虽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单纯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不断出现,但城市体系的等级系统却相当鲜明,依然体现着经济与政治管理的高度一致性。与中国行政管理体系相对应,目前中国的城市体系有如下 7 个等级层次,即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市——省会——地区中心或省辖市——县级市或县城——建制镇。截止 1994 年 12 月 31 日资料,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系统如表 34 所示。

2. 城市体系的规模系统

城市规模,可以用若干个指标来刻划,如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经济规模等。但纵观世界各国的研究可以看出,尽管城市等级的划分标准随各国国情的不同而不同,但在研究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时几乎都是从人口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的。在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现有理论模型中,无论是统计模型、等级模型、随机模型,还是经济模型或其它模型,也基本上是以城市人口研究为其主要内容和依据的。

在中国,现行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是以人口规模为基本依据的,其中设市城市共分为 4 个等级:第一级为特大城市,城市非农

表 34 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系统(1994 年)

层次	等级	城市数	城市名称
首都	1	1	北京
直辖市	2	2	上海、天津
副省级	3	16	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
省会	4	17	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地级市	5	171	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包头、乌海、赤峰、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盘锦、铁岭、朝阳、锦西、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松原、白城、齐齐哈尔、鸡西、鹤岗、双鸭山、大庆、伊春、佳木斯、七台河、牡丹江、黑河、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阴、盐城、扬州、镇江、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芜湖、蚌埠、淮南、马鞍山、淮北、铜陵、安庆、黄山、滁州、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黄石、十堰、宜昌、襄樊、鄂州、荆门、孝感、荆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韶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肇庆、惠州、梅州、汕尾、河源、阳江、清远、东莞、中山、潮州、揭阳、云浮、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三亚、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万县、南充、六盘水、东川、铜川、宝鸡、咸阳、嘉峪关、金昌、白银、天水、石嘴山、克拉玛依
县级市	6	415	略
建制镇	7		略

业人口规模大于 100 万；第二级为大城市，其人口规模介于 50 万至 100 万之间；第三级为中等城市，其人口规模介于 20 万至 50 万之间；第四级为小城市，其人口规模小于 20 万。由于以上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中，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跨度较大，为了研究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因此这里将特大城市再分为两级，即人口数大于 300 万和介于 100～300 万之间两级。这样，中国设市城市的规模等级即可被重新划分为 5 级，按人口规模依次为 300 万以上、100～300 万、50～100 万、20～50 万和 20 万以下。1994 年

底，中国设市城市数共计622个，其中各规模等级城市的个数分别为6个、26个、41个、177个和372个，各等级城市数的比例大体上为1∶4∶7∶30∶62。

3. 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关系

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与规模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一般呈正相关关系，即城市的等级层次愈高，城市的规模也愈大。对中国1994年622个设市城市的统计分类，即可得出如下的关系表(表35)。

表35 中国城市等级层次与规模交叉关系(1994年)

规模(万人) 层次	≥300	100～300	50～100	20～50	<20	合计
首都	1 100.0%					1 0.2%
直辖市	2 100.0%					2 0.3%
副省级	3 18.8%	10 62.5%	2 12.5%	1 6.3%		16 2.6%
省会		9 52.9%	5 29.4%	2 11.8%	1 5.9%	17 2.8%
地级市		7 4.1%	34 19.9%	99 57.9%	31 18.1%	171 27.5%
县级市				75 18.1%	340 81.9%	415 66.7%
合计	6 1.0%	26 4.2%	41 6.6%	177 28.5%	372 59.8%	622 100.0%

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体系中等级层次与规模间的关系相当明显。第一层次的首都北京和第二层次的直辖市上海、天津，其人口规模均位居第一级，大于300万以上；第三层次中共有16个副省

级市，其中81.3%的城市人口规模大于100万，属特大城市之列；第四层次为省会城市，共有17个，其中52.9%的城市位于特大城市之列，29.4%的城市位于大城市之列；第五层次为地级市，共171个，其中19.9%的城市位居大城市之列，57.9%的城市位于中等城市之列；第六层次为县级市，共415个，均为中等城市规模以下，其中81.9%的城市位于小城市之列。

为进一步论证等级层次与规模间的关系，可以对622个设市城市进行独立性卡方检验和区间数据的相关性测量。检验结果表明，皮尔逊(Pearson)卡方统计量为813.16，在自由度20的情况下，其显著性水平为0.00000，因此在近乎100%置信度情况下，可以否定“两个变量彼此独立的假设”，也就是说，城市等级层次与规模之间是存在相关关系的。通过区间数据的相关性测量，可以得到皮尔逊的R系数(Pearson's R)为0.78，这进一步表明，等级层次与规模之间不仅存在着相关关系，而且存在着较高的相关关系。

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讲，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层次的高低即表明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即等级层次高，人口规模就大，城市的数量也就少。另一方面，人口规模的大小也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城市所在的等级层次，即人口规模小，其等级层次一般也较低。当然，由于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差异，这种相关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如拉萨市，尽管其人口规模不大，但其等级层次却较高。

二、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一般说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

关:经济发展水平高,则等级规模分布曲线趋于直线状;经济发展水平低,则等级规模分布曲线有可能趋于偏态状,或出现以首位城市为主体的下凹式的首位型分布,或出现以众多小城市为主体的上凸式的次位型分布。

1. 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

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分布特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由于设市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下面分别就其等级规模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和描述。

1994年中国共有设市城市622个,其中城市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的特大城市共计32个,占城市总数的5.14%;大城市共计41个,占城市总数的6.59%;中等城市共计177个,占城市总数的28.46%;小城市共计372个,占城市总数的59.81%;特大和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的比例结构大体为1:2.4:5.1,呈正金字塔型分布特征。但从城市非农业人口的比例结构上看,等级规模分布却呈倒金字塔型:特大城市、大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数为9607.2万,占622个设市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19131.8万的50.22%;中等城市非农业人口为5352.4万,占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的27.98%;小城市非农业人口数为4172.2万,占城市非农业人口总数的21.81%。其等级规模的结构为2.3:1.3:1(表36)。

由表36可见,不同等级层次的平均人口规模差异较大。从相邻等级的平均人口规模上看,特大城市平均人口规模为大城市的3.1倍,大城市为中等城市的2.3倍,中等城市为小城市的2.7倍。各等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结构为:19:6.1:2.7:1。

表 36　中国设市城市等级规模分布(1994 年)

(万人)

等级规模	城市数	比例(%)	城市非农业人口	比例(%)	平均人口规模
≥100	32	5.14	6820.6	36.65	213.1
50～100	41	6.59	2786.6	14.57	68.0
20～50	177	28.46	5352.4	27.98	30.2
<20	372	59.81	4172.2	21.81	11.2
合计	622	100.0	19131.8	100.00	30.8

2. 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曲线

为了更加形象和直观地表示中国城市的等级规模分布特征，这里对其分布特征图型描述如下(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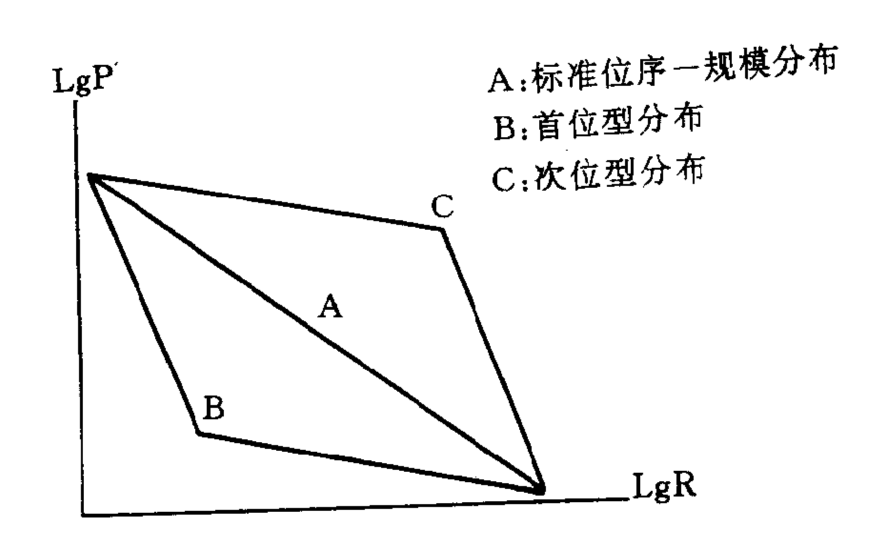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设市城市等级规模分布(1994 年)

图 9 反映出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具有明显的特征。即中国设市城市已由首位型分布向直线型转移，金字塔结构较明显，即大城市等级层次高、城市数量少、城市人口比重大，小城市城市数量多、城市人口比重低。

三、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齐夫(G.K.Zipf)在其《人类行为和费力最小的原则》一书中，曾运用对立统一的分析方法，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的一般特征，并通过统计分析，推论出等级规模分布的理论模型：

$$P_R = K/R^q = KR^{-q}$$

式中：P_R 为第 R 级城市的人口规模，R 为按人口规模排列的城市顺序，q 和 K 为常数。

上式中，q 的取值大小可以用来表示城市体系的不同结构，当 $q<1$ 时，表示体系中中小城镇占优势，城市首位度低，称为次位型分布；当 $q>1$ 时，表明大城市占优势，城市首位度高，称为首位型分布；当 $q=1$ 时，表明体系内各级城市的规模为首位城市规模自然序列倒数的倍数；当 $q=0$ 时，表示体系内各城市规模相等；当 $q\to\infty$ 时，表示体系内只有一个城市存在。

1. 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根据 1984 年、1985 年、1993 年和 1994 年 4 年份的资料，对中国城市等级规模分布进行回归分析，可求出各年份的幂函数分布模型如下：

(1) 1984 年：$P_{1984} = 1400.03R^{-0.874}$

式中：样本数 $N=228(P\geqslant10$ 万)，相关系数 $R=-0.99$

(2) 1985 年：$P_{1985(1)} = 1717.84R^{-0.887}$

式中:N = 192(P≥15 万),R = −0.998

$$P_{1985(2)} = 1975.27R^{-0.9988}$$

式中:N = 307(P≥5 万),R = −0.987

(3) 1993 年:$P_{1993(1)} = 1207.42R^{-0.7556}$

式中:N = 311(P≥15 万),R = 0.998

$$P_{1993(2)} = 1370.68R^{-0.7875}$$

式中:N = 416(P≥10 万),R = 0.996

$$P_{1993(3)} = 1791.60R^{-0.8509}$$

式中:N = 529(P≥5 万),R = −0.986

(4) 1994 年:$P_{1994(1)} = 1276.34R^{-0.7524}$

式中:N = 346(P≥15 万),R = −0.998

$$P_{1994(2)} = 1460.81R^{-0.7855}$$

式中:N = 465(P≥10 万),R = 0.996

$$P_{1994(3)} = 1905.22R^{-0.8468}$$

式中:N = 587(P≥5 万),R = 0.986

从上述各回归模型看,城市体系中所选 的最小人口规模标准对回归结果有较大影响。从各年份的结果来看,均以大于 15 万人口以上的回归模型相关程度高,且其 q 值均小于相应的其它两组值,说明从大于 15 万人以上的城市来分析,中国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更趋于首位型,即城市的首位度趋于更高。

之所以造成上述的回归结果,与中国现行的设市标准相关。中国设市标准以非农业人口 10 万人为其下限,但出于其它种种特殊原因,有一些设市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未达到这一最低线。所以在中国设市城市中,人口小于 10 万的城市数并不能真正体现实际上这一规模所具有的数量。而用 10 万或 15 万人以上的城市来进

行分析,更能反映出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所具有的内在规律。

2. 中国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运用与上述相同的理论模型和回归方法,对中国分省区人口规模大于10万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进行统计回归,结果如表37。

表37 中国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

省区	1985年				1994年				q变化值
	城市数	K值	q值	负相关系数R	城市数	K值	q值	负相关系数R	
河北(含京津)	14	819.94	1.645	0.969	15	872.02	1.527	0.983	-.118
山西	10	154.86	1.364	0.993	11	167.27	1.188	0.995	-.176
内蒙古	16	153.09	1.289	0.871	13	108.94	0.828	0.992	-.461
辽宁	17	347.90	1.008	0.989	27	658.71	1.210	0.988	0.202
吉林	12	152.17	1.004	0.968	25	150.52	0.796	0.979	-.208
黑龙江	16	476.09	1.561	0.807	25	266.20	0.923	0.982	-.638
江苏(含上海)	14	682.90	1.688	0.989	36	436.31	1.028	0.985	0.662
浙江	11	112.52	1.096	0.990	19	113.16	0.819	0.989	-.277
安徽	15	114.14	0.998	0.876	15	115.46	0.765	0.960	-.233
福建	10	66.82	0.954	0.970	13	78.88	0.839	0.975	-.115
江西	12	107.62	1.180	0.886	14	93.54	0.807	0.987	-.373
山东	19	166.65	0.994	0.973	44	227.45	0.764	0.990	-.23
河南	18	138.69	0.948	0.958	23	167.85	0.841	0.971	-.107
湖北	14	157.19	1.083	0.943	29	192.91	0.870	0.973	-.213
湖南	20	112.82	1.001	0.982	20	122.08	0.813	0.990	-.188
广东	17	145.11	0.954	0.947	50	150.29	0.627	0.961	-.327
广西	11	103.86	1.356	0.925	12	101.45	0.929	0.985	-.427
海南	(缺资料)				4	33.81	0.858	0.979	-
四川	19	198.43	1.027	0.971	28	190.25	0.852	0.966	0.175
贵州	6	88.132	1.259	0.994	6	106.99	1.215	0.966	-.044
云南	11	100.06	1.624	0.815	7	86.67	1.237	0.949	-.387
陕西	8	134.28	1.402	0.964	8	152.17	1.228	0.967	-.174
甘肃	12	64.20	1.065	0.954	7	94.55	1.216	0.962	0.151
新疆	15	74.47	0.987	0.955	10	70.31	0.747	0.906	-.240

注:(1)1985年结果取自顾朝林:《中国城市体系——历史·现状·展望》,第239—24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西藏、青海、宁夏3省区样本数太少,故删除。
(3)1994年样本数为人口规模大于10万以上的城市。

根据齐夫理论模型中对 q 值的讨论以及表 37 的结果，这里对中国不同年份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特征进行归类：第一类 $q>1$，首位城市占优势，城市首位度高；第二类 $q=1$，为均衡型分布，各级城市数量符合直线型分布；第三类 $q<1$，中间城市占优势，城市首位度低，为次位型分布（表 38）。

表 38　中国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类型

类型	1985 年	1994 年
$q>1$ 首位型 首位城市占优势	江苏（含上海）、河北（含京、津）、云南、黑龙江、陕西、山西、广西、内蒙古、贵州、江西、浙江、湖北、甘肃、四川（共 14 个）	江苏（含上海）、河北（含京、津）、云南、陕西、山西、贵州、甘肃、辽宁（共 8 个）
$q\approx1$ 均衡分布	辽宁、吉林、湖南、安徽、山东（共 5 个）	
$q<1$ 次位型 中间城市占优势	新疆、福建、广东、河南（共 4 个）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四川、新疆、海南（共 16 个）

四、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区域差异

中国疆域辽阔，各省区的自然条件、历史基础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城市体系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1. 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系列的区域差异

中国分省区城镇等级的规模系列存在着明显差异。根据

1993 年市镇统计资料，可将各省区的等级规模系列统计如表 39。

表 39　中国分省区城镇等级规模系列（1993 年）

地区	≥300万人	100～300万人	50～100万人	20～50万人	10～20万人	5～10万人	2～5万人	1～2万人	0.5～1万人	<0.5万人	合计
东部地带	5	10	20	72	91	120	290	235	276	3228	4347
辽宁	1	3	5	7	10	14	18	14	16	195	283
河北（含京津）	2	2	3	4	5	11	48	71	22	520	688
山东		3	2	17	19	6	53	10	13	328	451
江苏（含上海）	1	1	4	13	16	25	26	21	69	294	470
浙江		1	1	4	11	13	34	24	37	387	512
福建			1	4	4	12	30	19	23	289	382
广东	1		2	19	19	30	34	35	59	818	1017
广西			2	3	5	7	37	38	32	261	385
海南				1	2	2	10	3	5	136	159
中部地带	1	9	15	64	78	132	379	234	245	2484	3641
黑龙江		2	6	9	8	30	28	15	25	164	287
吉林		2		10	12	18	14	12	26	165	257
山西		1	1	4	4	8	23	51	28	306	426
内蒙古		1	1	4	6	5	47	32	23	108	227
安徽			2	8	6	12	47	22	41	532	670
江西		1		5	7	6	54	28	20	221	341
河南		1	3	8	7	22	82	17	8	252	400
湖北	1		1	10	17	16	30	24	33	340	472
湖南		1	1	6	11	15	54	33	40	396	557
西部地带		7	1	24	33	60	170	249	283	2221	3048
四川		2		11	12	19	82	48	84	1138	1396
云南		1		2	1	11	12	45	57	184	313
贵州		1		2	3	5	8	42	34	542	637
西藏					1		1	3	2	26	33
陕西		1		3	5	7	26	43	37	235	357
甘肃		1		2	4	5	12	25	32	90	171
青海			1			2	7	7	8	13	38
宁夏				2		2	4	9	6	33	56
新疆		1		2	7	9	18	27	23	44	131
全国	6	26	36	160	202	312	839	718	804	7933	11036

从上表可见，经济发达省区的城镇等级规模系列相对完整，各层次的城市均有发育；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城镇系列的发育则不完整。依据表39的城镇系列分布，可以将中国各省区划分为如下几类：①城市等级规模系列相当完整，它们是辽宁、河北（含京、津）和江苏（含上海）；②城市等级规模系列相对完整，除没有100～300万人口的城市外，其它各级城镇均有，它们是广东和湖北；③城市等级规模系列相对完整，除没有300万以上特大城市外，其它各级城镇均有，它们是浙江、山东、黑龙江、山西、内蒙古、河南和湖南；④城市等级规模系列相对不完整，缺少2个等级的城市，它们是福建、广西、吉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和新疆；⑤城镇等级规模系列不完整，它们是海南、青海、宁夏和西藏，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

2. 分省区城市首位度地域差异

首位城市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个地区整个城市体系的总体发展特征，因此在衡量一定地域内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关系时，常常会用到城市首位度（Urban Primacy）的概念。所谓城市首位度，是指首位城市与第二大城市间的人口规模比例关系。

根据1985年和1994年各省区的城市首位度（表40），可将中国省区城市体系划分为如下三大类型。

（1）**双核型**

城市首位度较低，一般均介于1～1.6之间。这些省区或由于省内自然条件的明显地域差异，或由于国家交通网络变化所导

致的经济新发展格局，或由于国家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发，省区城市体系发展出现了双中心型。这些省区有河北（石家庄—唐山）、山东（济南—青岛）、广西（南宁—柳州）、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吉林（长春—吉林）、安徽（合肥—淮南）、河南（郑州—洛阳）、四川（重庆—成都）、宁夏（银川—石嘴山）。

表 40　中国分省区城市首位度（1985 年，1994 年）

省区	1985 年			1994 年			变化幅度(%)
	首位城市	二级城市	首位度	首位城市	二级城市	首位度	
辽宁	325.3	137.8	2.36	376.2	185.5	2.03	-33
河北	93.8	93.2	1.01	115.9	111.0	1.04	3
山东	116.2	116.0	1.00	166.0	158.4	1.05	5
江苏	191.9	72.7	2.64	221.1	93.7	2.36	-28
浙江	101.8	55.2	1.84	118.5	61.2	1.94	10
福建	78.4	34.4	2.28	95.2	45.9	2.07	-21
广东	257.0	48.9	5.26	311.4	71.9	4.33	-93
广西	59.9	52.4	1.14	82.9	70.7	1.17	3
海南	20.9	7.0	2.99	36.5	16.0	2.28	71
黑龙江	225.2	97.0	2.32	250.5	110.4	2.27	-5
吉林	147.4	90.6	1.63	181.0	111.8	1.62	-1
山西	139.1	70.4	1.98	164.2	84.5	1.94	-4
内蒙古	90.5	56.8	1.59	103.3	68.3	1.51	-8
安徽	62.5	61.9	1.01	86.7	76.9	1.13	12
江西	91.0	36.9	2.47	116.9	45.2	2.59	12
河南	100.3	65.0	1.54	132.4	86.3	1.53	-1
湖北	296.4	40.0	7.41	352.0	68.3	5.15	-226
湖南	95.9	41.9	2.29	119.8	54.3	2.21	-8
四川	208.0	159.1	1.31	237.8	193.3	1.23	-8
云南	107.7	19.4	5.55	124.2	22.0	5.65	10
贵州	89.3	36.4	2.45	113.1	40.8	2.77	32
西藏	9.5	-	-	11.8	2.5	4.72	-
陕西	173.2	28.6	6.06	211.5	40.2	5.26	-80
甘肃	106.3	20.9	5.09	129.6	27.5	4.72	-37
青海	50.4	5.40	9.33	57.0	6.4	8.91	-42
宁夏	26.8	22.5	1.19	41.3	29.8	1.39	20
新疆	93.5	30.5	3.07	113.0	31.2	3.62	55

(2) **极核型**

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城市首位度高,一般大于4.5以上。这些省区主要分布在落后边远地区。受自然条件制约和人口、经济总规模的影响,这些地区往往只能把有限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发展条件更为优越的个别大城市中去,从而拉大了这些大城市与其它城市间的差距,导致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这类省区有湖北、青海、甘肃、陕西、西藏和云南等。

(3) **均衡型**

这类省区城市体系发育较完整,城市首位度一般介于1.6～4.5之间,其经济发展程度一般也较好,或者地域城市经济发展较均衡。这类省区有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黑龙江、山西、江西、湖南、贵州和新疆。

五、近10年中国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变化

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迅速发展的新局面,城市体系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近10年,这种变化尤其迅速。

(一) 全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变化

1. 等级层次变化

近10年来,中国设市城市的等级层次发生了若干变化:①增加了副省级城市这一等级;②若干小城市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

经济职能的多样化升格为地级市;③尽管有一定数量的城市升格,但绝大部分城市仍保持原来的等级层次。

为了从量上刻画近10年来设市城市等级层次的变动情况,可以对1985年和1994年的资料进行等级交叉分析(表41)。分析表明,在1985年的324个设市城市中,首都和直辖市城市共3个,占城市总数的0.9%;省会城市27个,占城市总数的8.3%;地级市和县级市分别为137个和157个,分别占城市总数的42.3%和48.5%。10年后的1994年,没有一个城市的等级层次降低,反之,省会城市中有10个上升为副省级城市,有6个地级市上升为副省级市,有29个县级市上升为地级市,升格城市分别占到了各自原等级城市数的37.0%、4.4%和18.5%。

表41 中国1985～1994年设市城市等级层次变动关系

1985年＼1994年	首都	直辖市	副省级市	省会	地级市	县级市	合计
首都	1 (100.0)*						1(0.3)
直辖市		2 (100.0)					2(0.6)
省会			10 (37.0)	17 (63.0)			27(8.3)
地级市			6 (4.4)		131 (95.6)		137(42.3)
县级市					29 (18.5)	128 (81.5)	157(48.5)
合计	1 (0.3)	2 (0.6)	16 (4.9)	17 (5.2)	160 (49.4)	128 (39.5)	324(100.0)

说明:括号内数字为占1985年各等级层次城市数的百分比。

2. 人口规模等级变化

城市等级层次的变化与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变化相关。自1985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发生了如下变化。①1985年时100～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有2个到1994年时上升到300万人以上,占这类城市的11.1%;②50～100万人大城市中有10个上升到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行列,占这类城市的33.3%;③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中有19个上升到大城市行列,占这类城市的20.2%;④小于20万人的小城市中有2个上升到大城市行列,有57个上升到中等城市行列,分别占这类城市的1.1%和32.0%。在全部324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近10年来的人口规模等级出现下降趋势(表42)。

表42 中国1985～1994年设市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变动关系

1994年 / 1985年	≥300万人	100～300万人	50～100万人	20～50万人	<20万人	合计
≥300万人	4 (100.0)					4(1.2)
100～300万人	2 (11.1)	16 (88.9)				18(5.6)
50～100万人		10 (33.3)	20 (66.7)			30(9.3)
20～50万人			19 (20.2)	75 (79.8)		94(29.0)
<20万人			2 (1.1)	57 (32.0)	119 (66.9)	178(54.9)
合计	6 (1.9)	26 (8.0)	41 (12.7)	132 (40.7)	119 (36.7)	324 (100.0)

3. 等级规模结构变化

从等级规模模型上看，中国近10年来城市等级规模更趋向于次位型分布，即中间城市越来越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主体，而首位城市的主体作用则相对越来越低。以模型中大于10万人以上城市的 q 值来看，1983年为0.879，1984年为0.874，1985年为0.9255，1993年为0.7875，1994年为0.7855，有趋于越来越小之趋势，这也表明中国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趋于上凸式的次位型分布。1985年 q 值的升高，可能与1984年中央政府的城市人口政策的调整有关。当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后，必然伴随着一定数量的迁移人口流入到城市中来，而这些迁入人口首先愿意迁入到大城市中来，从而使大城市人口增长加快，城市首位度提高；当流入城市人口达到一定限度后，新迁入人口便不得不迁入到其它各级城市中，从而引起中间城市的较快发展和等级规模结构的总体变化。另外，近10年来中国设市城市的较快增加也提高了中、小城市在城市中的比重，导致了 q 值的降低。1985年，中国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人口比重分别为40.14%、18.53%、24.52%和16.81%；到1994年，其比重相应变化为35.65%、14.57%、27.98%和21.84%。中、小城市比重有较大增加，而特大城市比重却有较大下降。

从城市首位度角度分析也可以看出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上述变化趋势。为避免单个城市的偶然性，可以3个直辖市的平均规模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而将其余100万人以上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作为次位城市，来求解中国的城市首位度。其结果是，1985年，中国的城市首位度为539.27/107.91=5.00；而到1994年，

城市首位度降低为635.8/169.42=3.75。

（二）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变化

1. 等级规模分布模型变化

通过对表37和表38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分省区近10年来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的变化，其主要趋势是均衡型分布向首位型或次位型分布演变和首位型向次位型分布演变。依据q值的变化区分，1985年，中国首位型分布的省区共有14个，占省区总数的60.9%；均衡型分布省区5个，占省区总数的21.7%；次位型分布省区4个，占省区总数17.4%。而到1994年，相应的省区数则分别变为8个、0个和15个，次位型分布省区数明显增多。这说明，经过10年的发展变化，中国大多数省区的中间等级城市都获得了较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其以往首位型分布的格局。

从表37和表38中可以看出，如下省区发生了等级规模上的变化：①从首位型分布变化为次位型分布的省区有内蒙古、广西、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黑龙江；②从均衡型分布变为次位型分布的省区有吉林、湖南、安徽、山东；③从均衡分布变化为首位型分布的省区有辽宁。

从q值的变化上看，除辽宁和甘肃省1994年的值比1985年大一些外，其余省的差值均为负值，表明绝大多数省区的等级规模分布即使还未出现类型上的质变，但都向次位型演变了。其中差值变化较大的省区为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含上海）、江西、广东、广西和云南等，这些省区的差值均大于0.3。差值变化较小的省区有河北（含京津）、福建、河南、贵州等，这些省区的差值均小于

0.15。

2. 城市首位度变化

城市首位度变化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变化。从表40可以看出,近10年来,中国大部分省区的城市首位度下降了,少部分省区的城市首位度上升了。在26个可比较省区中,首位度下降的省区共计15个,占57.5%,上升的11个,占42.3%。从变化幅度上看,下降的幅度总体上远比上升的幅度大,表明10年以来中国城市的等级规模分布向次位型方向演变。

分省区而论,下降幅度较大的省区有湖北、广东、陕西、青海、甘肃、河北、江苏和福建,它们的下降幅度均大于20%。上升幅度较大的省区有新疆、海南、贵州和宁夏,它们的上升幅度也均大于20%。

第八章　中国城市体系职能组合结构

城市职能指城市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承担的任务和作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职能是城市的三大基本职能。社会政治职能体现的是城市的行政管理作用；经济职能是城市主要经济部门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以外区域的作用和地位；文化职能分为有形与无形两种，有形的文化职能指城市的科学、教育等职能，无形的文化职能指城市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城市以外空间的影响力。不同城市受其发展历史、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职能组合，形成城市职能体系。

城市职能的有机组合，共同构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地域综合体。这种城市体系内部各城镇职能的有机组合，通称为城市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

地域城市体系职能组合结构的形成，是以一系列不同职能城市的结合为基础的。各地域城市由于发展条件的差异和开发历史的不同，相应地形成了以地域组织为特色的不同地域城市体系的职能组合类型。因此，地域城市体系职能组合结构研究主要有3个方面：①城市基本职能类型研究；②城市职能组合系统研究；③

以及城市职能地域分布系统研究。

一、中国城市职能类型

（一）城市职能类型的划分方法

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认为，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活动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为本地居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另一部分具有超越本地的区域意义，为外地服务。前者叫城市的非基本活动部分，后者叫基本活动部分。

城市职能的作用空间包括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辐射区。城市某一职能辐射区域愈广，这一职能就愈强。衡量城市某一职能强弱的指标主要有两个：①这一职能在城市职能组合中的地位，以比例关系来表达，指示城市的专业化程度；②职能规模，以输出城市以外的量来表达，指示城市职能在国家或区域的地位。

城市职能的划分包括3个方面：

（1）**专业化部门**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其中专门化工业部门是划分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依据，专门化工业部门可能包括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

（2）**职能强度**

若城市某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则该部门产品的输出比重也高，职能强度也高。职能强度体现的是城市基本活动部分与非基本活动部分的关系。

（3）**职能规模**

有些小城市某个专业化部门的职能强度虽高，对外服务的绝对规模却不一定大；而有些大城市某个部门在城市工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产品输出的绝对规模却可能很大。在职能强度很高的专业化的工业城市之间，职能规模的差异常常退居次要地位。但在专业化程度并不高的综合性城市，职能规模往往构成城市工业职能差异的主要因素。职能规模反映城市某一职能在城市体系中的职能地位。

城市职能分类研究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很多城市地理学家为城市职能分类方法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英国的卡特(H. Carter, 1972)按发展顺序把城镇职能分类的方法论分成5种类型。最早的是一般描述方法，40年代盛行统计描述方法，50年代多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和城市经济基础研究方法。最近发展起来的是多变量分析法，最常用的分析技术是主因素分析和聚类分析。这些方法的发展，总的说来是一个由简单向复杂、由单一变量向多变量、由主观向比较客观的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中国城市职能分类中，较多用的是统计描述方法。这一方法较简单、直观，主要用城市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和职能规模来表述。也有的学者利用聚类分析对中国城市工业职能进行了较系统的分类[①]。

（二）中国城市职能类型

现代城市是经济、社会（含政治、文化等）和物资三位一体的有

---

① 周一星，R. 布雷德肖："中国城市（包括辖县）的工业职能分类——理论、方法和结果"，《地理学报》，43卷4期，1988年。

机实体。因此，中国城市体系中城市基本职能类型的划分，主要依据以下3个主要方面：

1. 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城市作为社会实体，3000多年来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系统，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社会活动，也就具有显著的政治职能和文化职能。这种强有力的政治（行政）职能对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具有相当明显的地域中心作用。因此，我们将其划分为以行政职能为主的综合性城市，其中包括全国性、区域性和地方性3个层次。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市带县"管理体制的全面铺开和落实，这类以行政为主的综合性城市职能将逐步向以行政—经济职能（或经济—行政职能）为主转化，而且将进一步得到发展，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坚部分。

2. 作为物资实体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城市作为物资实体，不仅是物资（商品）的生产者，而且也是消费者。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流和流通发生紧密的联系，城市必然具有交通和流通的职能。自先秦以来，中国城市体系内这类城市即有所发展。至近代，由于轮船、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的发展，交通型和流通型城市已成为中国现代城市体系对外开放、物资和"能量"交流的所在。根据城市体系内各城市对交通方式的不同依赖性，可将这类城市划分为以交通职能为主和以流通职能为主两种城市。

3. 作为经济实体的城市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尤其在现代城市体系内，城市作为经济实体，是现代生产力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上有着高度集中、高度专门化分工和高度协作的经济网络，它在地域上的地位和作用必然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具有突出的经济职能。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中，这类城市不多，其经济职能大都是寄生于行政职能为主的城市上的。自近代以来，尤其是现代城市体系，由于近现代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城市几乎都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据点。因此，这类城市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并且，依据制成品原料采集、加工和流通三大环节，又可细分为矿业城市、加工业城市和流通城市。流通城市由于对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对行政中心的依附性，可以划为另一类城市。

此外，在中国城市体系内，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及不同的历史发展基础，还有一批有特殊职能的城市（镇），如旅游城市（含历史文化名城）、科学城等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城市。

根据中国城市现状特征，城市职能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表43）。

（三）中国城市职能形成特点

1. 受到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

中国城市悠久的发展历史造就了城市职能的历史性，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中国城市强有力的政治职能。历史上城市政治职能的演化成为城市兴衰的重要因素，使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文

表 43　中国城市基本职能类型表

地域主导作用	城市基本职能类型	
1. 以行政职能为主的综合性城市	行政中心城市	全国性中心城市
		区域性中心城市
		地方性中心城市
2. 以交通职能为主的城市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水陆空综合运输枢纽城市
		水陆运输枢纽城市
		陆空运输枢纽城市
	部门交通性城市	铁路枢纽城市
		港口城市
	口岸城市	水运口岸城市
		空运口岸城市
		陆运口岸城市
3. 以工业职能为主的城市	重型工业城市	煤矿城市
		石油工业城市
		冶金工业城市
		电力工业城市
		化学工业城市
		建材工业城市
	轻型工业城市	机械(含电子)工业城市
		食品工业城市
		纺织工业城市
		森林工业城市
		皮革工业城市
		造纸工业城市
		其它类型轻工业城市
4. 以流通职能为主的城市	贸易中心城市	地方贸易中心城市
		对外贸易中心城市
		旅游城市

化职能高度集中,融为一体,在地域上有很强的一致性。城市经济、文化职能的强弱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治职能的强弱,一旦城市政

治职能确定,必将使相应的经济、文化要素向城市集中。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城市的经济职能已大为加强,许多沿海城市的经济辐射范围已超出其行政范围,但政治职能仍在城市职能构成中起重要作用。

2. 受到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取向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40多年是中国城市经济职能形成与发展的最主要阶段。这一阶段,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取向经历了一个从沿海向内地,又从内地向沿海的演化过程。其中最明显变化的两个时期是1964～1980年的大规模"三线"建设时期和其后转而实行沿海开放政策时期。"三线"建设时期,生产要素大规模向内地转移,内地矿产资源得到大规模开发,各种工业部门也得到相应发展,内地原有工业城市经济职能大为加强,如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城市汇集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同时,一批新生的高度专业化的城市得以发展,如攀枝花(冶金)、金昌(冶金)、十堰(机械)、六盘水(煤炭)等城市都是这一时期形成与发展的。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大城市再次成为全国经济建设重点地区,经济职能迅速加强,并向全国辐射。同时,一批新型加工业城市迅速发展,如深圳、珠海、海口、三亚等城市成为现代电子工业集中发展区。1985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沿海向内陆沿边扩展,沿边城市的商贸职能迅速发展,形成一个新的职能体系——边境贸易城市职能体系,如黑河(中俄贸易)、满洲里(中俄贸易)、畹町、瑞丽(中缅贸易)等城市已发展为以边贸为主要职能的城市。新兴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新的职能体系的形成,中国城市保险业、咨询业、金

融业的发展使城市的金融职能、信息传输职能迅速形成,北京、上海、天津正向全国性和区域性金融中心发展。旅游业的兴起使城市成为旅游接待中心,一批高度专业化的旅游城市迅速出现,形成旅游城市职能体系。

3. 城乡差异强化了城市的文化职能

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的巨大经济差异使城乡之间也同时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科学、教育集中于城市,城市文化对周围地区起着示范与引导作用,使城市具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城市成为地区文化中心。

二、中国城市职能体系

由于城市职能复杂多样,相互交织,大部分城市兼有若干种城市职能类型。但总的看来,中国城市职能体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综合职能为主的综合性城市,这类城市按城市行政等级形成城市管理等级网络,共同构成满足各种社会需求的综合职能体系。但是在综合性城市中,职能类型组合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城市职能体系划分的标志。第二类是由于资源开发、交通区位或某种专门化产业发展而形成的专业化城市。

(一)行政中心城市体系

中国历史上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形成了具有严格等级层

次的行政管理系统,并由此而形成多级行政中心城市。中国行政中心城市体系,按行政区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首都,省会城市,地区级中心城市,县城和县级市。中国城市现代行政职能的地域划分格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延续,是一种较为稳定的行政管理网络,不同等级城市之间有界线分明的从属关系。

1. 第一级行政中心——首都北京

首都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行政管理中心、对外国际交往中心。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都和现代文化名城,丰厚的历史遗迹与现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相融合,构成北京特有的文化职能。北京是全国第二大综合性产业城市,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许多工业部门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加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城市的职能,北京的城市职能正发生着显著变化。首先,北京的金融职能、信息中心职能不断加强,各种金融机构、大型投资公司不断向北京汇集。其次,重型工业比重下降,向低耗能、少污染的机械电子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耐用高档消费品工业发展。北京还是全国最大的交通和通讯枢纽,是国际、国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集散中心。

2. 第二级行政中心——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是中国各省区的行政管理中心。大部分省会城市都具有上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历史上也多为各种行政管理中心。省会城市由于其行政职能产生的强大的辐射力和向心力,形成与其行政职能相一致的经济职能;大部分省会城市都是省域内最大的综合性产业城市和省域文化中心。省会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

为一体的特征，体现了中国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规律。

各个省会城市作为省域行政中心，其行政职能等级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省会城市由于自然环境、发展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其经济职能类型与职能规模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些省会城市已发展成为大区域经济中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和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些城市包括沈阳、哈尔滨(东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武汉(华中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广州(华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西安(西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而另一些位于偏远地区的省会城市，城市规模较小，经济辐射范围也较小，在全国职能体系中影响力较弱，如拉萨、西宁、银川。

除上述省会城市外，上海、天津两个直辖市和重庆市、大连市、宁波市、厦门市、青岛市、深圳市等6个计划单列市，是非省会城市中具有大区域经济及文化职能的城市，在中国城市职能体系中占有省会城市或比省会城市更为重要的地位。

3. 第三级行政中心——地区级行政中心城市和地级市

地区级行政中心城市是省会城市以下的次级行政管理中心城市，同时也是省域内次级经济、文化中心。到1994年，全国共有地区级中心城市168个(不包括省会城市)。在地区级行政中心城市中，大部分是由传统州府发展而来的，是历史行政区划的延续。这类城市历史悠久，长期以来是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职能多样，多为综合性城市，与周围地区有密切的传统联系，有较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综合服务职能较强。另一类地区级城市是由于某种专业化产业部门的发展而聚集了一定的人口、设施、资金，或借助于国防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属新兴工业城市。这类城市发展历史

短，职能单一，与周围地区联系较松散，地区中心职能较弱，如石油工业城市克拉玛依、煤炭工业城市六盘水等。在地区级行政中心城市中，有一些是省内几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有的城市位于省区边界地区，对邻省相邻地区也有较大的经济、文化辐射作用，是跨省区中心城市。有的地区中心城市一方面是地区级行政管理中心，同时又是某一经济部门职能较强的专业化城市（表44）。

表 44　中国地区级中心城市（1994 年）

省区	地区级中心城市
河北	（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廊坊、[衡水]
山西	（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忻州、（榆次）、（临汾）、运城**、侯马]
内蒙古	（包头）、赤峰、[集宁、（锡林浩特）、海拉尔、通辽、（东胜）、临河、乌兰浩特]
辽宁	（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葫芦岛）、营口、盘锦、（阜新）、辽阳、铁岭、朝阳
吉林	吉林、四平**、（辽源）、通化、白山、松原、白城**、[延吉]
黑龙江	齐齐哈尔*、（鹤岗）、（双鸭山）、（鸡西）、（大庆）、牡丹江、佳木斯*、（伊春）、（黑河）、[绥化]
江苏	（徐州）、连云港、淮阴、盐城、扬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浙江	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台州、舟山、[丽水]
安徽	芜湖、蚌埠、安庆、滁州、（淮南）、（黄山）*、[宿州、巢湖、宣城、贵池、六安、阜阳]
福建	漳州、泉州、莆田、南平、（三明）、[宁德、龙岩]
江西	九江、鹰潭、（景德镇）、[上饶、宜春*、临川、吉安、赣州*]
山东	（淄博）、潍坊、烟台、威海、济宁、泰安、（东营）、日照、[德州、滨州、临沂*、菏泽、聊城*]
河南	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安阳、焦作、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

续表

省区	地区级中心城市
湖北	襄樊*、荆沙、宜昌、黄石、孝感、(十堰)、[黄州、咸宁*、恩施]
湖南	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益阳、(张家界)、[郴州、永州、娄底、怀化、吉首]
广东	珠海*、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佛山、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
广西	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百色*、河池、玉林*]
海南	三亚*
四川	(泸州)、自贡、内江、南充、遂宁、德阳、绵阳、广元、万县、乐山、(攀枝花)、[西昌、雅安、宜宾、涪陵**、达县*、巴中]
贵州	[遵义*、铜仁、毕节、安顺*、兴义、凯里、(都匀)]
云南	[昭通**、曲靖、玉溪、思茅、保山、(个旧)、景洪、楚雄、大理]
西藏	[日喀则]
陕西	宝鸡、咸阳、(铜川)、[延安*、榆林、渭南、商州、安康、汉中]
甘肃	天水*、(白银)、[平凉、武威、张掖、酒泉**、临夏、西峰]
青海	[(格尔木)、德令哈]
宁夏	(石嘴山)、[吴忠]
新疆	[奎屯、伊宁、塔城、阿勒泰、吐鲁番*、哈密*、库尔勒、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和田、昌吉、博乐]

说明:表中除[ ]内为县级市外,其余均为地级市。内蒙古乌海,黑龙江七台河,安徽淮北、铜陵、马鞍山,江西萍乡、新余,山东枣庄、莱芜,河南鹤壁,湖北鄂州、荆门,广东中山、东莞,广西防城港,贵州六盘水,云南东川,甘肃金昌、嘉峪关,新疆克拉玛依等20个地级市因不具地区中心作用,均未列入表内。

* 省内大区(几个地区)中心城市。

** 跨省界的地区级中心城市。

( )内为有特殊专业职能的地级市。

4. 第四级行政中心——县城和县级市

县城是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县城是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初级加工中心，是国家对农业地

区执行具体行政领导的中心，长期以来为农业服务是县城的主要职能。近10多年，随着农村工业经济的发展，县城成为农村工业的集聚点和生长点，一部分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撤县建市，成为县级市。中国目前已有县级市410个，其中313个县级市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部分县级市是70年代以后设立的，除少数高度专业化的县级市外，大部分县级市为综合性小城市（表45）。

表45 中国县级城市(1994年)

省区	总量	非地区中心的一般县级市数量与城市名	
河北	22	21	遵化、晋州、新乐、三河、安国、高碑店、冀州、涿州、辛集、沙河、泊头、霸州、武安、藁城、定州、河间、南宫、平南、深州、[黄骅、任丘]
山西	14	9	原平、介休、永济、河津、孝义[古交、雷州、洛城、高平]
内蒙古	15	8	丰镇、扎兰屯、[二连浩特、满洲里、霍林格勒、根河、额尔古纳]
辽宁	14	14	普兰店、凌源、凌海、庄河、黄州、新民、瓦房店、开原、海城、[东港、兴城、大石桥、北票、铁法]
吉林	18	17	梅河口、大安、九台、舒兰、榆树、公主岭、蛟河、洮南、桦甸、敦化、德惠、[临江、和龙、集安、图们、珲春、龙井]
黑龙江	18	17	海林、讷河、安达、海伦、五常、肇东、阿城、富锦、双城、北安、[宁安、绥芬河、五大连池、密山、同江、铁力、尚志]
江苏	28	28	通州、宿迁、东台、太仓、兴化、淮安、靖江、新沂、溧阳、如皋、金坛、高邮、吴江、邳州、泰兴、启东、丹阳、常熟、江阴、昆山、宜兴、泰州、扬中、江都、海门、姜堰、[仪征、张家港]
浙江	23	22	桐乡、瑞安、江山、乐清、北溪、诸暨、建德、永康、上虞、龙泉、义乌、东阳、萧山、奉化、海宁、兰溪、余姚、临海、平湖、温岭、余杭、富阳
安徽	10	4	天长、界首、亳州、明光(嘉山)
福建	15	13	晋江、南安、龙海、建瓯、福安、福清、永安、漳平、长乐、建阳、邵武[武夷山、石狮]
江西	13	8	瑞昌、乐平、高安、樟树、丰城、瑞金、[德兴、井冈山]

续表

省区	总量	非地区中心的一般县级市数量与城市名	
山东	33	28	寿光、清城、乳山、莱州、文登、招远、即墨、胶南、蓬莱、荣成、章丘、乐陵、禹城、临清、莱阳、青州、胶州、莱西、平度、高密、昌邑、[兖州、邹城、滕州、肥城、新泰、曲阜、龙口]
河南	22	18	济源、偃师、辉县、灵宝、长葛、项城、邓州、卫辉、沁阳、汝州、禹州、新密、荥阳、新郑、[舞钢、义马、巩义、登封]
湖北	24	21	随州、广水、当阳、安陆、麻城、武穴、石首、天门、钟祥、利川、洪湖、仙桃、蒲圻、应城、枝城、老河口、枣阳、宜城、[大冶、潜江、丹江口]
湖南	20	15	湘乡、耒阳、汨罗、临湘、涟源、洪江、沅江、浏阳、津市、武冈、[醴陵、资兴、冷水江、冷水滩、韶山]
广东	30	30	顺德、台山、番禺、南海、新会、花都、增城、潮阳、开平、鹤山、三水、廉江、高川、高要、四会、罗定、普宁、英德、吴川、晋州、乐昌、阳春、惠阳、连州、恩平、澄海、高明、兴宁、化州、[云浮]
广西	9	6	宜州、合山、桂平、北流、[贵港、凭祥]
海南	4	4	琼海、儋州、通什、琼山
四川	22	16	广汉、永川、合川、江津、阆中、资阳、彭州、万源、江油、简阳、南川、邛崃、崇州、[都江堰、峨嵋山、华蓥]
贵州	9	2	清镇、赤水
云南	13	4	开远、宣威、[畹町、瑞丽]
陕西	9	3	兴平、华阴、[韩城]
甘肃	8	2	[玉门、敦煌]
宁夏	2	1	[青铜峡]
新疆	15	2	石河子、阜康
合计	410	313	

说明:[ ]内指具有某些专业性特殊职能的县级市。

(二) 交通中心城市体系

交通运输职能是城市的重要职能。中国交通枢纽城市主要位于这些纵横通道的结点上。

1. 交通中心城市职能类型

按交通方式，中国城市体系的交通中心职能可分为4个亚系，即铁路枢纽、港口城市、航空中心、公路网中心。许多交通枢纽城市都是具有全国、大区、省区和地区意义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同时兼有若干种交通职能，是综合性运输枢纽。

(1) **铁路枢纽城市**

尽管铁路建设在中国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但作为新兴的铁路枢纽城市，它既是铁路运量的集中地和列车交接站，又是组织铁路运输生产的中心环节。它们大都形成具有全国、大区和省区意义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和水陆联运中心。这些城市与国家铁路网结合，共同形成了中国自近代以来比较完整的一种新型交通中心体系。中国现已形成铁路网络结点170个，其中干线结点66个，在干线结点处形成45个铁路枢纽，这些铁路枢纽承担着中国铁路绝大部分的车流集散、解编和客货集散任务(表46)。

(2) **港口城市**

港口城市分为海港城市和河港城市。

沿海港口城市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991年，中国年货物吞吐量10万吨以上的海港城市共有41个，其中年吞吐量在1000万吨以上的大型港口城市12个(其中上海港口吞吐量超过亿吨)，100～1000万吨的较大型港口城市14个，10～100万吨的中小港口城市15个。大型和较大型港口城市集中了全国海港货物吞吐量的绝大部分。港口城市在交通中心城市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和地位，并且形成与铁路交通干线相衔接的腹地范围(表47)。

表 46　中国铁路枢纽城市

枢纽城市	连结干线方向	枢纽等级	枢纽城市	连结干线方向	枢纽等级	枢纽城市	连结干线方向	枢纽等级
1. 北京	8	中心枢纽	16. 佳木斯	3	3 级枢纽	31. 郑州	4	1 级枢纽
2. 天津	4	1 级枢纽	17. 长春	4	3 级枢纽	32. 武汉	4	1 级枢纽
3. 石家庄	4	2 级枢纽	18. 吉林	4		33. 柳州	4	2 级枢纽
4. 大同	3	3 级枢纽	19. 济南	3	2 级枢纽	34. 贵阳	3	1 级枢纽
5. 太原	4	2 级枢纽	20. 徐州	4	3 级枢纽	35. 成都	3	1 级枢纽
6. 集宁	3	2 级枢纽	21. 芜湖	4		36. 重庆	3	1 级枢纽
7. 沈阳	5	1 级枢纽	22. 蚌埠	3	3 级枢纽	37. 昆明	3	2 级枢纽
8. 锦州	4	2 级枢纽	23. 南京	3	2 级枢纽	38. 西安	3	2 级枢纽
9. 大连	2	3 级枢纽	24. 上海	2	1 级枢纽	39. 宝鸡	3	3 级枢纽
10. 本溪	4		25. 杭州	3	3 级枢纽	40. 兰州	4	1 级枢纽
11. 四平	4		26. 南昌	3	2 级枢纽	41. 洛阳	4	
12. 丹东	3		27. 鹰潭	3	3 级枢纽	42. 乌鲁木齐	2	
13. 哈尔滨	5	1 级枢纽	28. 衡阳	3	3 级枢纽	43. 襄樊	4	3 级枢纽
14. 齐齐哈尔	4	2 级枢纽	29. 广州	2	1 级枢纽	44. 怀化	4	3 级枢纽
15. 牡丹江	4	3 级枢纽	30. 株洲	4	1 级枢纽	45. 西宁	2	

1991 年中国拥有年货物吞吐量 10 万吨以上的河港城市 114 个,其中年货物吞吐量大于 1000 万吨的城市 10 个。武汉、南京是中国年货物吞吐量最大的内河港口城市。年货物吞吐量为 100～1000 万吨的较大型河港城市有 59 个,10～100 万吨的河港城市有 45 个(表 48)。

表 47　中国沿海城市港口职能

港口组合区名称	港口城市	港口的职能	城市与地区对外开放区范围与性质	所在重要工业地区	腹地大致范围
东北沿海	大连	中心枢纽港	①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②大连开放城市;③辽东半岛开放地区	辽中南	东北地区全部;内蒙古东部
	营口、丹东	分流港与地区港			
华北沿海	天津	中心枢纽港	①天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②天津、秦皇岛开放城市	京津唐	华北地区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
	秦皇岛	能源输出港和地区港			
黄淮沿海	青岛	中心枢纽港	①青岛、烟台、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②青岛、烟台、连云港开放城市;③胶东半岛开放地区	胶济沿线	华北地区南部及其以南至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西北地区东南部
	连云港	煤炭输出和地区港			
	烟台、威海、龙口	分流港和地区港			
华东沿海	上海	中心枢纽港	①上海的浦东、虹桥和闵行,以及南通和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②上海、宁波、南通开放城市;③长江三角洲开放地区	长江三角洲	长江流域大部;浙江省大部
	宁波、南通、张家港、舟山	江海中转港、分流港和地区港:宁波			
东南沿海	厦门	地区港或未来可能的中心枢纽港	①厦门、汕头经济特区;②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③福州、温州开放城市;④闽南开放地区		福建省全部;浙江省南部;广东省东部;江西省的东部和东南部
	福州、温州、汕头、泉州、东山	地区港			
华南沿海	广州	中心枢纽港:黄埔—广州	①深圳、珠海经济特区;②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③广州开放城市;④珠江三角洲开放地区	珠江三角洲	广东省的中、北部;江西省的西部和西南部;湖南省南半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深圳	工业港			
	海口、珠海、江门	地区港			
西南沿海	湛江	中心枢纽港	①海南经济特区;②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③湛江、北海(含防城)开放城市		西南地区大部;海南省全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广东省西部;湖南省西部
	防城、北海	地区港			

注:参考陈航等:《中国交通运输地理》,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表 48　中国主要河港城市(1991 年)

港口吞吐量(万人·吨)	特大城市(100 万人以上)	大城市(50～100 万人)	中等城市(20～50 万人)	小城市(20 万人以下)
4000 以上	南京			
2000～3000	武汉			
1000～2000	杭州、重庆		扬州、镇江、南通、九江	赤水、天门
500～1000		徐州、长沙、无锡、苏州	安庆、岳阳、马鞍山、芜湖	

说明:数据不包括市辖县。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年版。

(3) 航空交通中心城市

航空运输是城市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距离和国际客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990 年,中国大陆民航航班专用机场已发展到 94 个,其中 47 个可起降波音 737 以上机型,旅客年吞吐量大于 200 万人次的有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城市。中国重要的航空港城市有 7 座,包括广州、北京、上海、成都、桂林、厦门、西安(表 49)。

表 49　中国七大航空港城市

城市	机场名称	职能特点
广州	白云机场	华南地区民航枢纽,一级国际航空港,中国起降架次最多,客流量最大的机场
北京	首都机场	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航线最多的一级国际航空港
上海	虹桥机场	华东地区航空枢纽,一级国际机场
成都	双流机场	西南地区航空枢纽
桂林	奇峰岭机场	以为旅游服务为主的一级机场
厦门	高崎机场	华南沿海重要的国际机场,港澳台同胞进出口岸
西安	西关机场	西北地区航空枢纽

2. 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职能组合

中国已形成的主要交通枢纽城市大多数是具有全国、大区、省区意义的综合性中心城市，是多种运输方式在空间上的组合节点，运输职能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类型的综合交通枢纽(表 50)。

城市规模与交通枢纽等级和类型组合有密切关系。中国非农业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特大型综合性城市有 32 个，其中 28 个是交通枢纽城市，占特大城市数量的 87.5%。50～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36 个，其中 20 个是交通枢纽城市，占大城市数量的 55.5%。20～50 万人的中等城市有 161 个，其中 25 个为交通枢纽城市，占 15.5%。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有 341 个，仅有 13 个为交通枢纽城市，占小城市数量的 3.8%。城市规模越大作为综合枢纽的运输职能越完善，一般都是主干枢纽城市。

表 50　中国综合性交通运输枢纽城市

职能类型	城市名
各种运输方式兼备型	天津、大连、青岛、重庆、哈尔滨、吉林
水陆空运型	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杭州、宁波、连云港、徐州、福州、厦门、湛江、烟台、宜昌、九江、南昌、株洲、长沙、合肥、昆明、齐齐哈尔、佳木斯、丹东、南宁、(北海、汕头、海口、南通、温州)
陆空管运型	北京、成都、济南、石家庄
水陆管运型	秦皇岛、锦州、镇江、扬州
陆空运型	沈阳、郑州、兰州、太原、长春、西安、宝鸡、乌鲁木齐、贵阳、包头、呼和浩特、西宁、银川、牡丹江、通辽、延吉、图们
水陆运型	芜湖、衡阳、柳州、襄樊、岳阳、枝城、宜宾、黄石、贵港、日照、营口、蚌埠、无锡、(安庆、北海、梧州、万县)
陆管型	洛阳

注:( )内为无干线铁路相连的枢纽。

资料来源:参考陈航等:《中国交通运输地理》,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3. 口岸城市职能体系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城市体系职能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1985年，中国口岸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大中城市。1986年以来，中国恢复和扩大开放了边境口岸，一些边陲小镇变成了新兴城市。同时，长江沿江河运口岸，安徽芜湖、江西九江、湖北武汉、江苏江阴等港口相继对外开放。内陆城市则开辟航空口岸，促进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口岸城市与其运输网络系统相结合形成口岸城市交通职能体系。按出入境运输方式，口岸分为水运口岸、空运口岸和陆运口岸，其中海运口岸是中国进出口运输的主要方式(表51、52)。

表51 中国对外开放一类口岸的发展(1992年7月为止)

年份	水运口岸	空运口岸	陆运口岸	
			铁路	公路
1978年以前	上海、天津、秦皇岛、大连、青岛、烟台、连云港、温州、福州、厦门、广州、湛江、汕头、汕尾、海口、八所、北海、黑河	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昆明、南宁、哈尔滨、乌鲁木齐	二连*、满洲里*、丹东*、图们*、集安*、绥芬河*、深圳、凭祥*、河口*	临江*、南坪(和龙)*、三合、开山屯(龙井)*、拱北、友谊关(凭祥)*、水口、东兴、畹町*、瑞丽*、樟木、普兰、吉隆、红其拉甫、霍尔果斯、吐尔尕特
1979年	宁波	杭州	广州	
1980年	重庆、武汉、黄石、城陵矶(岳阳)、芜湖、九江、南京、舟山、营口、绿化岛、黄星岛(舟山)、大陈岛(台州)、洞头外轮海面交货点			

续表

年份	水运口岸	空运口岸	陆运口岸	
			铁路	公路
1981 年	泉州、蛇口(深圳)、九洲(珠海)	桂林、西安、成都、南京		
1982 年	南通、张家港、梧州、江门、肇庆、东山、秀屿外轮海面交货点(莆田)	天津、福州		文锦渡
1983 年	三亚、防城、海门、西冲、三埠、太平	海口、厦门	沙头角(深圳)	
1984 年	赤湾、威海、龙口、湾仔、中山、梅沙旅游口岸(深圳)	大连		
1986 年	同江*、安庆、镇江、容奇(佛山)	汕头		日屋
1987 年	东角头(深圳)、斗门(珠海)	湛江、武汉、重庆		
1988 年	鹤山(江门)、柳州、水东、石岛(荣成)、渤中原油海面交货点(天津)	青岛、郑州		珲春*、皇岗、塔克什肯
1989 年	岚山(日照)、锦州、黑山头、室韦(额尔古纳右旗)*、富锦、哈尔滨、佳木斯、漠河、逊克	梅州		东宁
1990 年	妈湾(深圳)、洋浦、清澜、盐田、大安、马鞍山	合肥、南昌、长沙、济南	阿拉山口	
1991 年		呼和浩特		
1992 年	南沙、贵港、江阴、抚远	深圳、长春、贵阳、宁波	佛山	老爷庙、乌拉斯台、红山咀、阿日哈沙特、甘其毛道、珠恩嘎达布其、磨憨

说明：* 号为边境口岸城市；
( )号内为口岸所在城市。

表 52　中国口岸城市口岸外贸进出口运输量(1990 年)

(1) 海运口岸外贸进出口量　　单位:万吨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丹东	39.9	芜湖	8.6	九洲	85.5
大连	3820.4	安庆		海口	77.6
营口	305.6	锦州	4.0	八所	9.9
秦皇岛	1994.3	宁波	1221.8	三亚	7.5
天津	1721.4	舟山	25.8	海南其他	22.0
龙口	113.6	海门	9.9	北海	77.3
烟台	621.9	温州	17.5	防城	225.3
威海	17.2	福州	132.3	梧州	44.1
青岛	1521.7	厦门	307.6	九江	15.7
日照	367.1	马鞍山	0.2	重庆	15.1
荣成	4.9	广州	1225.9		
连云港	711.1	湛江	811.4		
上海	2983.1	汕头	71.4		
南通	181.6	赤湾	286.3		
张家港	178.7	蛇口	335.0		
镇江	84.5	东角头	5.0		
南京	371.9	妈湾	64.8		

(2) 公路口岸外贸进出口量　　单位:万吨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新疆	42.0	同江	0.6	绥芬河	5.0
黑河	10.8	东宁	0.7	广东	2238.4
满洲里	4.4	丹东	3.4		
图们	8.7	逊克	0.5		

(3) 铁路口岸外贸进出口量　　单位:万吨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满洲里	247.5	绥芬河	103.0	集安	4.8
丹东	172.9	图们	117.3		
深圳	217.0	二连	34.1		

(4) 空运口岸外贸进出口量　　单位:万吨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口岸	数量
北京	5.8	天津	0.1	武汉	0.1
上海	5.3	厦门	0.2	杭州	0.2
青岛	0.2	广东	0.3		
福州	0.2	大连	1.1		

中国边境口岸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是一新兴城市职能体系。1985年以前,中国开放口岸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从1986年开始,中国开始恢复和扩大开放边境口岸,到1992年,已经开放的国家一类边境口岸(含界河)已有48个,并有一批边境口岸还将陆续开放。边境口岸的开放和边贸的发展促进了边境口岸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到1994年全国已有边境口岸城市25个,形成边境口岸城市体系。

(三) 工业城市体系

在现代城市职能构成中,工业职能是内部构成最复杂、分类难度最大的职能系统;同时,工业职能也是进行城市职能分类的主要依据。城市工业职能分类的主要指标是:工业专业化部门的类型、规模和职能强度。中国各级行政职能城市大多数为综合性城市,这些城市虽然也有主导产业部门,但一般工业门类齐全,没有突出的职能强度很高的专业化部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受特种因素影响,某种或数种产业部门在城市职能组合中占突出地位,形成专业化城市。

1. 能源(煤炭、水电)工业城市

中国能源资源以煤炭为主体,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新中国成立后能源工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相应形成了一批以煤炭、水电开发组成的能源工业城市。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原煤产量居世界首

位。中国煤田相对集中于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北部、河南和滇、黔两省，山西省煤炭储量最多，相当于全国煤炭探明总量的30%。煤炭工业城市主要分布于上述地区，是在煤炭资源开采、利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类能源工业城市。从现状工业部门结构看，这类城市职能结构可分为3种类型：①单纯型煤炭工业城市；②以煤炭开采为中心的多职能复合型城市；③煤炭开采逐渐衰落、其它职能替而代之的变异型城市（表53）。另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建成了17处主要水电站，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椒江、三门峡、宜昌、丹江口、青铜峡等5座新兴的水电城市。

表53 中国煤炭工业城市及专业化程度（1991年）

省区	城市	煤炭开采业产值（万元）	占城市工业总产值（%）	产值排序	类型
河北	唐山	89346	9.1	4	变异型
	邯郸	86732	10.1	2	复合型
山西	太原	72083	5.4	4	变异型
	大同	287842	47.2	1	专业型
	阳泉	91122	41.2	1	专业型
	长治	55901	22.1	1	复合型
	晋城	68896	63.4	1	专业型
	朔州	121811	65.1	1	专业型
	古交	41083	63.1	1	专业型
	霍州	28316	47.3	1	专业型
内蒙古	乌海	33332	34.9	1	专业型
	满洲里	26609	60.1	1	专业型
	霍林郭勒	15559	83.8	1	专业型

续表

省区	城市	煤炭开采业产值（万元）	占城市工业总产值（%）	产值排序	类型
辽宁	抚顺	141139	10.6	3	变异型
	阜新	95928	33.8	1	专业型
	铁法	53662	80.8	1	专业型
	北票	17637	31.4	1	专业型
黑龙江	鸡西	162025	58.1	1	专业型
	鹤岗	168949	69.8	1	专业型
	双鸭山	85586	53.2	1	专业型
	七台河	108325	92.9	1	专业型
江苏	徐州	155860	18.23	1	变异型
安徽	淮南	106827	24.2	1	复合型
	淮北	112177	42.8	1	专业型
江西	萍乡	38844	22.2	1	复合型
	丰城	33997	45.5	1	专业型
山东	淄博	60794	3.3	8	变异型
	新泰	102788	44.9	1	专业型
河南	平顶山	151325	33.9	1	专业型
	鹤壁	37463	34.0	1	专业型
	义马	43426	85.6	1	专业型
湖南	耒阳	19910	31.6	1	专业型
广西	合山	14290	37.2	1	专业型
贵州	六盘水	56172	33.6	2	复合型
陕西	铜川	29344	30.5	1	专业型
	韩城	19875	31.2	1	专业型
宁夏	石嘴山	47299	29.4	1	专业型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2. 石油和化学工业城市

中国石油工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50年代初发现和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冷湖油田。1959年发现了著名的大庆油田,此后又相继开发了大港、胜利、冀中、辽河、江苏、河南、江汉等油田,已形成20多个油气生产基地。在石油开采和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石油城市(表54)。除专业化石油城市外,中国一些大中城市石油加工工业在城市职能体系中也占重要地位,是中国石油工业重要的生产基地。

表54 中国石油工业城市及专业化程度(1991年)

城市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万元)	石油加工业(万元)	合计占城市工业总产值比重(%)	职能性质
任丘		165678	84.0	高度专业化
锡林浩特		45256	72.4	高度专业化
抚顺	473608		35.9	专业化
锦西	199809		35.6	专业化
盘锦		346914	56.9	高度专业化
大庆	632192	1953746	95.0	高度专业化
安庆	194405		48.3	高度专业化
淄博	662223		36.3	专业化
东营		933806	94.7	高度专业化
濮阳		225444	68.4	高度专业化
潜江	9663	28772	22.6	
荆门	144610		47.6	高度专业化
岳阳	287299		56.5	高度专业化
茂名	47877		79.6	高度专业化
玉门		92324	77.5	高度专业化
克拉玛依	207105	245752	97.0	高度专业化

化学工业常与其它工业部门组成联合企业,如石油—化工、钢

铁—煤化工、有色冶金—基本化工、煤炭—煤化工等类型的联合企业，所以化学工业在中国大型工业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化工城市数量较少(表55)。

表55　中国化学工业城市(1991年)

以化学工业为主的特大型综合性工业城市	化学工业占重要地位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专业化化学工业城市
吉林、南京、大连、青岛	北京、天津、上海、石家庄、沈阳、哈尔滨、杭州、合肥、福州、南昌、济南、长沙、南宁、成都、昆明、兰州、西宁、银川、广州、桂林、威海、开封、吉首、梧州、连云港	辽阳、运城、赤水、泸州、衡水、二连浩特、格尔木、衢州、河池

3. 冶金工业城市

冶金工业城市包括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铜、铅、锌、铝、钨、金、银等)。中国专业化冶金工业城市与相应的矿产资源分布相对一致。中国铁矿资源主要分布于辽宁鞍山和本溪、山西五台和岚县、河北冀东、北京密云、内蒙古白云鄂博、四川攀枝花、辽宁铁岭、河北邯郸、山东莱芜、湖北大冶、海南石碌等地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是一个从沿海向内地扩展的过程，“一五”期间改、扩建鞍钢，“二五”期间建设了包钢、武钢，“三五”以后建设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其它内地钢铁工业基地，一批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部门的城市迅速发展(表56)。专业化有色金属工业城市也是随相应

矿产资源开发而形成的。铜矿资源主要分布于江西德兴、湖北大冶、安徽铜陵、云南东川，在这些地区形成相应铜矿开采和冶炼生产基地。云南个旧是主要的锡矿产地，形成著名锡都。甘肃金昌拥有中国最大的硫化镍矿床，在世界同类矿床中居第二位，“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开发形成新兴冶金工业城市。甘肃白银也是中国著名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表57)。

表56　中国钢铁工业城市(1991年)

城市	冶炼及加工业(万元)	开采业(万元)	占城市工业总产值(%)
唐山	262057		26.8
邯郸	215215	30660	28.7
武安	9434	19069	46.2
临汾	42345		43.0
包头	312421	13994	39.1
鞍山	1177544	6293	69.9
本溪	481387	1359	63.1
凌源	53392	809	55.5
马鞍山	297152	642	66.4
三明	71299		27.3
新余	168039		67.9
莱芜	97939		36.2
舞阳	44296		82.6
黄石	139423	2062	28.9
鄂州	74491	3153	43.1
攀枝花	267552	47150	74.1
江油	168393		58.9
嘉峪关	87231		87.7
安阳	153714		29.7
通化	89781		42.7
娄底	92877		62.8

除专业化冶金工业城市外，中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大型有色金属冶炼企业主要位于大型综合性工业城市，虽然其产值在城

市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较低，不是专业化职能很强的产业部门，

表 57　中国专业化有色金属工业城市(1991 年)

城市	冶炼及加工业(万元)	开采业(万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锦西	120618	27016	26.3
兰溪	72873		29.5
铜陵	114600	2063	41.4
个旧	107306	17524	68.9
东川	139402	21274	
金昌	154848		97.2
白银	128165	2830	53.2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年版。

但在全国同类工业中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全国性生产基地，其职能规模大于或相当于专业化冶金工业城市。这些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太原、武汉、成都、重庆、西宁、乌鲁木齐、湘潭、江油、张家口等。有色金属工业占重要地位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有天津、沈阳、淄博、郑州、黄石、株洲、贵阳、昆明、兰州等。

4. 机械、电子工业城市

中国城市机械工业占较大比重，1991 年全国 479 个城市中，机械工业产值占全部城市工业总产值的 20%。综合性工业城市职能构成中，机械工业都占相当比例，现已形成了上海、北京、哈尔滨、长春、洛阳、西安、兰州等大型机械工业生产基地。但从城市的主要职能看，这些城市大都是中国大型综合工业基地，不属于以机械工业为主的专业化工业城市。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三线”地区重点投资建设了一批机械工业企业，一批专业化新兴机械工业城市由此兴起，如十堰、安

顺等城市(表 58)。

表 58　中国机械工业城市

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特大型综合性工业城市	以机械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	专业化机械工业城市
长春、哈尔滨、西安、齐齐哈尔、沈阳、南昌、济南、郑州、长沙、成都、重庆	邢台、长治、洛阳、湘潭、朝阳、安阳、济宁、镇江、合肥、西宁、宝鸡、泰安、随州、咸宁、渭南、汉中、西宁、柳州、烟台	侯马、安顺、临夏、十堰、泊头、德阳、天水

中国电子工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兴高技术产业。由于机械工业与电子工业之间有密切的产业关联,所以机械工业发达的大城市同时也是电子工业生产基地。“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三线”地区重点投资建设了一批电子军工企业,奠定了内地电子工业的基础,同时也形成了若干电子工业城市,典型的如四川省的绵阳市。80 年代起,南方沿海开放城市大力发展电子工业,形成新兴电子工业城市,如深圳、珠海、海口等都已发展成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电子工业城市(表 59)。

表 59　中国电子工业城市

电子工业占重要地位的城市	专业化电子工业城市
福州、海口、吉安、恩施、绵阳、都匀、南京、无锡、苏州、厦门、广州、佛山、成都、惠州	怀化、三亚、深圳、凯里、珠海

5. 轻加工工业城市

轻加工工业城市主要有纺织工业城市、食品工业城市、造纸工业城市、皮革工业城市、森林工业城市。

(1) 纺织工业城市

纺织工业是中国传统的而且分布特别广泛的轻加工工业部门,已形成了以下六大纺织工业城市集聚区(表 60)。

表 60 中国纺织工业城市的地域组合

地区	纺织工业城市		特征
	主要纺织城市	一般纺织城市	
长江三角洲地区	上海	苏州、无锡、常州、常熟、南通、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仪征(化纤)	中国历史最久,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工业、丝纺织工业基地。
华北大平原地区	石家庄、郑州	天津、邯郸、廊坊、承德、东胜、新乡、周口、驻马店、青岛、德州、潍坊、烟台、滨州、聊城、临清、菏泽、呼和浩特等	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江汉平原、鄱阳湖地区	沙市	武汉、襄樊、益阳、津市	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州	佛山、中山、东莞	丝织工业基地
关中平原地区	西安	宝鸡、银川、西宁	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和西北羊毛纺织工业基地
四川盆地地区	重庆	南充、万县、遂宁、成都、合川、广元、达县	传统的丝织中心,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此外,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伊宁、和田,西

南的昆明、贵阳等城市也发展了毛纺和棉纺织工业，尤其伊宁、和田的纺织工业已成为城市的主导工业部门。就目前全国毛纺织工业看，上海、天津和北京三大城市仍不失为中国三大毛纺织工业中心。东北哈尔滨是中国亚麻集中产区，历来为全国最大的亚麻梳、纺、织、染中心。随着中国新兴化纤纺织工业部门的兴起，金山卫、仪征、辽阳等城市正形成为中国化纤纺织工业中心。

(2) **其它专业化轻工业城市**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有相当一批中小城市在当地农牧资源加工利用基础上发展成以某一轻加工行业为主导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职能体系，主要包括食品工业城市、造纸工业城市、皮革工业城市、森林工业城市。食品工业城市包括粮食加工、食用油脂、肉类加工、制糖、制盐、制茶、卷烟、罐头等众多类型，专业化食品工业城市在中国城市体系职能构成中占较大比重。造纸、森林、皮革等专业化城市与相应原材料分布有很大的一致性，具有区域性特征(表61)。

表61　中国轻加工工业城市

类型	占重要地位的城市	专业化城市
食品工业城市	商丘、枣阳、延吉、永州、蚌埠、漳州、湛江、津市、龙岩、滁州、延安、周口、内江、南充、阜阳、绥芬河、漯河	昭通、玉溪、宿州、许昌、郴州、常德、曲靖、钦州、保山、奎屯、阿克苏
造纸工业城市	沅江、吴忠、佳木斯、南平、宜宾	扎兰屯、图门、井冈山
皮革工业城市	集宁、雅安、平凉、伊宁、海拉尔、昌吉、漯河、泉州、万县、沁阳	锡林浩特、阿勒泰
森林工业城市	绥化、北安、牡丹江、三明、邵武、浑江、永安、敦化、铁力、尚志	牙克石、伊春

（四）旅游中心城市体系

中国旅游业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是从1978年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1978年以来，中国评定了11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开放城镇已达644座。旅游业的发展首先促进了一批大中城市旅游职能的形成。旅游中心城市是中国旅游业的管理中心、旅游交通中心、旅游服务中心和旅游景点集中分布区。随着中国重点旅游区的开发和旅游配套设施的大规模建设，迅速形成了一批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专业旅游城市。不同区域层次的旅游职能城市共同构成中国旅游活动组织网络。

中国旅游城市职能体系中职能规模与专业化程度相互背离，具有较强旅游中心职能的城市都为特大型和大型综合性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广州等城市都是中国一级旅游中心城市。专业性旅游城市大多数为80年代以后新发展起来的小城市，是一个新的专业化城市职能体系（表62）。

表62　中国旅游中心城市（1993年）

<table>
<tr><th>接待入境人数</th><th>重要的旅游中心城市</th><th>专业化旅游城市</th></tr>
<tr><td>>100万人</td><td>北京、上海、广州、深圳</td><td rowspan="4">承德、五大连池、兴城、黄山、武夷山、泰安、曲阜、登封、张家界、都江堰、峨嵋山、大理、敦煌</td></tr>
<tr><td>>40万人</td><td>杭州、珠海、桂林、西安</td></tr>
<tr><td>20～40万人</td><td>南京、厦门、泉州、昆明、苏州</td></tr>
<tr><td>10～20万人</td><td>天津、大连、福州、武汉、汕头、海口、成都、重庆、无锡</td></tr>
</table>

三、中国城市职能的地域组合类型

由于各个地区自然环境背景、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不同地区城市体系的职能类型与职能结构有较大差异,每一地区城市体系职能结构都有几个反映本地域城市体系职能特点的主要产业部门,形成城市体系职能地域组合类型。

影响中国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特点的主要因素有:

(1)对区域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大型矿产资源开发

大型矿产资源开发促进相关加工行业的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组合特点的地域城市体系职能结构。如山西能源生产基地、辽中南钢铁工业基地,城市体系职能构成与大型矿产资源开发直接相关。

(2)区域自然资源条件

区域城市体系职能最初形成与区域自然资源条件密切相关,尤其是农业生产条件对轻加工工业型城市体系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如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职能中,轻加工工业占重要地位。

(3)国家产业政策

由于区域城市体系职能地域分工的需要,国家产业政策中常将某些产业向某些地区倾斜,形成不同区域的城市体系职能组合类型。如电子工业布局,80年代以前重点布局于西南地区,80年代以后转向东南沿海开放区,形成电子工业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体系职能类型。

在上述主要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城市职能的地域组合形成了

工矿和重加工工业型，机械、化工工业型，机械、化工、轻加工工业型，综合型等多种类型(表63)。

表63　中国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类型

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类型	主要区域	职能组合结构
工矿和重加工工业型	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南地区	钢铁、煤炭
	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陕北及内蒙古西部地区	煤炭、冶金
	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煤炭、电力、机械
	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	原材料、重化工
机械、化工工业型	以长春、吉林为中心的东北中部地区	机械工业、化学工业
	以哈尔滨、齐齐哈尔为中心的东北北部地区	石油、化工、机械工业
机械、化工、轻加工工业型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农产品加工业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电子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化学工业
	闽南沿海经济开放区	电子工业和轻加工工业
综合型	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地区	石油、煤炭、冶金、机械、化工、轻工
	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	冶金、机械、轻工
	西南地区	冶金、化工、机械、轻工

第九章　中国建制镇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75%的人口生活居住在乡村；中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集镇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因此，小城镇的发展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人类住区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建制镇发展过程

中国设镇历史悠久，早在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时即始"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魏书·韩均传》），市镇、集镇直到宋代才真正开始。宋代高承所著《事物纪原》卷七《库务职局》："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而直到近代，镇才作为基层行政建制拥有相应的行政区域和基层行政组织[①]。但从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这类城镇数量不多，名称不一，建制比较混乱，中国还处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建制镇发展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

① 见清末宣统三年（公元1909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一）调整时期（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城市较多的山东、安徽等东部地区撤销了一批小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底有24个小城市撤销降格为镇，它们是安徽省的阜城、亳城、三河、当涂、大通、宣城、界首、宿城等，以及山东省的石岛、羊口、龙口等。1953年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些以粮食经营为主的专业镇（如苏南地区吴江县和无锡县的一些米市镇）开始衰落。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镇作为中国县辖基层政权建制被确定下来。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经过多次变更和整顿，其时全国有镇5400个，其中人口在2000人以下的镇有920个，2000～5000人的有2302个，5000～10000人的有1373个，10000～50000人的有784个，人口在50000以上的有21个[①]。1955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和标准》，建制镇被规定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镇，其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1956年国家又对城镇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行业公私合营，取消个体商贩和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分别进入到集体合作商店的手工业合作社。农村商品流通完全通过国营、集体和供销合作社经营的单一的流通渠道，从而限制了一些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这些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对

---

① 张文范："中国的镇"，载《山东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

已有的建制镇进行审查、调整，至 1958 年全国建制镇数量被调整为 3621 个。

（二）衰落时期（1958～1978 年）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问题的决议》，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一些建制镇被撤消而成立人民公社，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回落。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改变，冲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计划供销、产品计划经济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城市工业中心、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功能，从而导致了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建制镇的停滞和衰落。尤其在合作化、公社化以后，除公社驻地（集镇）有所发展外，其余小城镇均处于萎缩、衰落之中。如无锡县原有建制镇48个，1958年后全部撤销，使建制镇数锐减。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60～1962 年），农业生产（主要粮食生产）大面积歉收，导致全国范围内口粮短缺，尤其是 1958 年“大跃进”安排城市人口就业和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城而带来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城镇人口增长过快，致使城镇居民粮油副食供应异常紧张。其后，国家不得不采取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建制镇数量的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196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发出《关于调整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通过提高镇设置标准，规定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对不符合镇标准的建制镇一律撤销，划归人民公社领导。

1965 年国家鼓励发展“五小工业”，促进了县城和一些人民公社驻地集镇的发展。镇上的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文化教育

等公益事业都有一定发展，各类公共建筑如卫生院、中小学校、邮电所、供销社、农机站、运输公司等相继在镇上兴建，使街容镇貌有一定改观，但大部分小城镇由于商品流通不畅而处于衰落之中。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1966～1976年)，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盲目地下放一批拥有城镇户口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到农村接受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为适应"反修"、"防修"的需要，让一批干部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地区锻炼成长。此外，国家从"备战"、"备荒"的角度出发，大搞"三线"建设，促进了内陆地区工业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上述诸多政策的作用，"文革"十年间中国建制镇衰落的趋势有增无减。据资料统计，到1978年政社分开恢复乡制之前，全国仅有镇2687个，建制镇发展处于低谷时期。

(三) 恢复时期(1979～1984年)

在1979～1984年期间，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城镇化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建制镇进入了一个带有补偿性的迅速发展时期。1979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进入80年代，首先，由于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工业小区的建设促进了建制镇的发展；其次，农村改革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加上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允许经商、务工、办服务行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带来了建制镇的繁荣；第三，1984年11月国务院转发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进一步促进了广大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人

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建制镇的发展。据公安部三局资料,截止 1984 年底全国有建制镇 6215 个[①],其中大于 10 万人的有 21 个,5 ～10 万人的有 393 个,3 ～5 万人的 1022 个,1 ～3 万人的 3059 个,0.5 ～1 万人的 943 个,小于 0.5 万人的 777 个。与 1954 年相比,建制镇数量已经恢复到 50 年代水平,而且建制镇人口规模有了明显的扩大,由 50 年代以 0.2 ～1 万人的城镇占主体(约占建制镇总数的 68%)变为以 1 ～5 万人的城镇为主体(约占建制镇总数的 65%)。

(四) 发展时期(1984 年以后)

1984 年后,中国建制镇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建制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变迁。1984 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对建制镇的标准重新进行了修订: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或总人口在 20000 人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 2000 人的,或总人口在 20000 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 10%以上;或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区、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 2000 人,确有必要,都可建镇。同时,在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时,凡是具备建镇条件的乡,撤乡建镇后实行镇管村的体制,也促进了建制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建制镇的增长可划分为 3 个阶段:①1984 ～1989 年。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积极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据统计,到 1989 年,中国乡镇企业

① 此数不包括市辖镇 612 个,暂缺人口资料的县辖镇 497 个。

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由 1980 年的 14%增至 28%,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 1 亿多人,相当于过去 30 年间城市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总和。而乡镇企业中新增就业岗位的 50%集中在县城和建制镇。乡镇企业发展积极推进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城市化。②1989～1991 年。在这一阶段,由于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和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劳动收入迅速提高,受国家大市场和整体经济形势影响,单位职工在乡镇企业就业的成本迅速提高,全国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转化趋缓,年均转移 99 万人,仅为前阶段的 18%,因此,建制镇增长速度也逐渐放慢。以山东省为例,1979～1988 年间设建制镇 812 个,平均每年设镇 81 个;而 1989～1991 年间仅设建制镇 62 个,每年设镇仅 21 个。③1992 年以后。由于国家鼓励发展第三产业、非农产业发展,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进入一个全方位大规模转移阶段,建制镇的发展速度也有明显加快的趋势。据建设部村镇司资料统计,1992 年全国建制镇 13737 个(含 1752 个县城关镇),是 1984 年的 2.2 倍。

概括新中国建制镇的增长,不难看出,它是一个渐进的城市化的过程。1954～1958 年间,尽管中国建制镇数量由 5400 个减为 3621 个,但其实质并不是建制镇自身的因素,而是统一标准后产生的误差。据资料统计,自 1949 年至 1957 年的 9 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0.6%上升到 15.4%,年平均递增率高达 70.5%,城市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1958～1965 年间,是中国城市化最快、起伏最大的时期。在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城镇人口从 1957 年的 9949 万猛增到 1960 年 13073 万,3 年中城镇人口净增 31.4%,事实上中国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大跃进"时期。1961～1962 年的 3 年自然灾害,从城镇居民口粮和就业角度又动员了近 3000 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使城镇人口数量基本维

持在1957年的水平。这种城镇居民返回农村,是城市化过快过猛,与社会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所造成。1966～1976年间,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城市新增就业岗位极少,加上城市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形成事实上的城市劳动力过剩,青年就业困难,迫使采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基层锻炼等措施以缓解城市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中国城市化过程也处于停滞时期。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尤其农村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的高增长,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中国分省区市镇人口比增长状况看(表64),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均快于建制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图10),可见中国城市的发展还要快于建制镇的发展。据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反城市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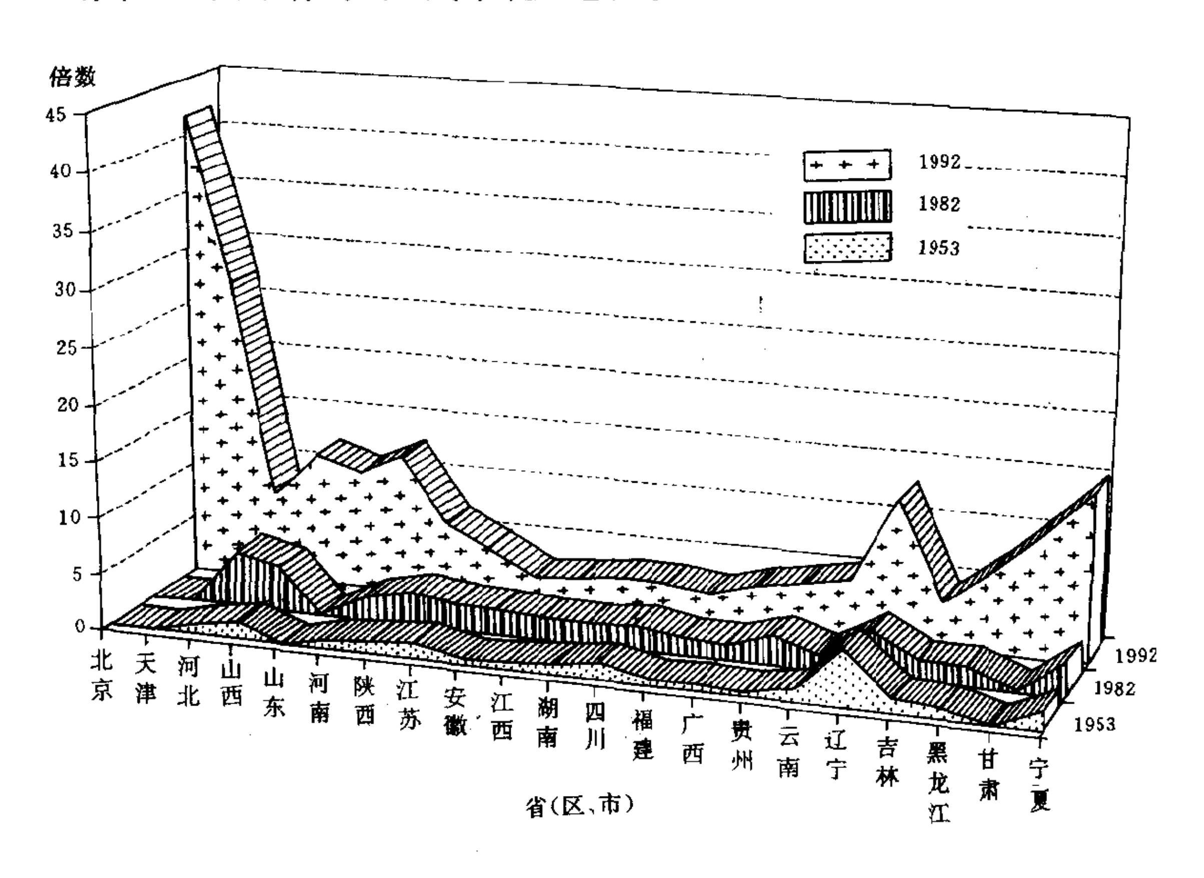


图10　中国部分省、市、区市镇人口比变化图

表 64　中国部分省、市、区建制镇发展对照表

省、市、区	1953 年		1982 年		1992 年	
	建制镇数	市镇人口比	建制镇数	市镇人口比	建制镇数	市镇人口比
北京	38	(缺)	14	(缺)	71	41.667
天津	16	(缺)	7	(缺)	33	27.027
河北	351	0.923	50	4.882	561	7.744
山西	112	1.439	48	4.000	402	11.809
山东	283	(缺)	97	(缺)	792	10.484
河南	336	0.905	112	2.003	284	12.42
陕西	144	1.222	81	2.846	291	6.617
江苏	365	1.564	114	2.333	610	4.711
安徽	262	0.667	118	2.226	743	2.550
江西	202	0.724	106	1.941	244	2.784
湖南	358	1.000	186	1.857	565	3.367
四川	459	1.632	309	2.226	1425	3.188
福建	244	0.639	119	1.500	454	2.647
广西	(缺)	0.695	(缺)	1.381	311	3.761
贵州	162	0.429	13	2.571	569	4.478
云南	145	1.326	128	1.326	235	5.214
辽宁	67	5.25	93	3.762	424	12.849
吉林	96	1.381	101	1.632	261	4.079
黑龙江	138	1.000	101	1.778	313	7.304
甘肃	180	(缺)	46	(缺)	105	11.026
宁夏	18	1.703	14	3.083	29	14.883

说　　明：市镇人口比＝城市非农业人口/建制镇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1)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表 7～12，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2) 建设部村镇规划司《1992 年村镇建设简要汇总情况》。

(3) 建设部城市规划司《1992 年全国市镇及其人口统计资料》。

二、中国建制镇等级规模结构

中国小城镇具有县城、镇和集市 3 级系统，建制镇包括县城和

镇两个部分。

1. 县城镇规模结构

中国1992年有县城镇(包括自治县、自治旗驻地)1752个,其中638个缺乏统计资料。依据这1114个县城镇资料分析,人口规模大于10万的县城镇有42个,占县城总数的3.77%;5～10万的县城镇333个,占29.9%;3～5万的县城镇357个,占32.05%;1～3万的县城镇353个,占31.69%;小于1万的县城镇29个,仅占2.6%。从县城总人口看,大于10万人的县城镇占全国县城总人口的比例为10.98%;5～10万人县城镇占45.37%;3～5万人县城镇占28.28%;1～3万人县城镇占14.96%;小于1万人县城镇仅占0.42%。由此可见,中国县城镇人口规模一般都在1～10万人之间,且以1～5万人为多。县城镇人口的近一半集中在5～10万人县城镇内(表65)。

表65 中国县城镇规模等级对照表(1984～1992年)

等级规模	县城数(个)				县城总人口(万人)			
	1984年		1992年		1984年		1992年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大于10万	21	1.09	42	3.77	258.19	4.61	536.1	10.98
5～10万	218	11.34	333	29.89	1423.44	25.44	2216.2	45.37
3～5万	467	24.31	357	32.05	1786.15	31.92	1381.2	28.28
1～3万	1010	52.57	353	31.69	1987.74	35.52	730.7	14.96
小于1万	205	10.66	29	2.60	140.12	2.39	20.1	0.42
合计	1921	100.00	1114	100.00	5595.64	100.00	4884.3	100.00

说明：1992年638个县城镇缺乏资料未列入统计。

从表65中1992年与1984年县城镇规模对照看,3万人以上人口规模的县城镇数量增加比较多,1万人以下人口规模的县城

镇大量减少,改变了80年代中期以1～3万人口的县城镇为主体的规模结构特征。县城总人口分布也从1～5万人口的县城镇转向5～10万人口的县城镇。

2. 镇规模结构

中国1992年拥有除县城镇以外的建制镇11985个,其中835个建制镇因人口资料暂缺未统计,镇(除县城)人口规模结构特征为:大于5万人口的建制镇占14.1%,3～5万人口的建制镇占30.6%,1～3万人口的建制镇占50.01%,小于1万人口的建制镇仅占5.2%。与1984年镇规模结构相比,1～3万人口建制镇为主体的格局没有改变,但大于3万人口的建制镇比例明显上升,小于1万人口的建制镇比例明显下降(表66)。从建制镇人口看,98%以上的建制镇人口居住在1万人口以上的建制镇,尤其在1～5万人口的建制镇居住了71.23%的建制镇人口。与1984年相比,比例略有下降,但居住在大于5万人口的建制镇人口却有明显的增加。

表66 中国镇规模等级对照表(1984～1992年)

等级规模	镇数(个)				镇总人口(万人)			
	1984年		1992年		1984年		1992年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大于5万	175	4.07	1574	14.11	1288.05	16.03	10310.72	27.39
3～5万	555	12.92	3419	30.65	2075.88	25.83	13827.4	36.73
1～3万	2049	47.71	5578	50.01	3860.99	48.05	12987.25	34.50
0.5～1万	783	18.23	393	3.52	577.62	7.18	460.46	1.22
小于0.5万	732	17.03	189	1.69	231.94	2.87	61.83	0.16
合计	4294	100.00	11153	100.00	8034.48	100.00	37647.66	100.00

说明:(1)1984年612个市辖镇,497个县辖镇因人口资料暂缺未列入。
(2)1992年835个建制镇因人口资料暂缺未列入。

三、中国建制镇职能类型

根据中国建制镇的职能特征，可划分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

(1) **行政中心**

这类建制镇都是一定行政区的政治中心，为县、镇政府所在地。镇内除配置比较齐全的行政机构和文化设施外，也兴办一定的第三产业和加工制造修理业。

(2) **工业镇**

这类建制镇的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乡镇工业有一定规模，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有一定的水平，产品质量较高，产品品种能够占领一定的市场，而且全镇工业产值比重大，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也大。

(3) **渔业镇**

沿海、沿江河流域、沿大型湖泊的建制镇，以捕捞、养殖、水产品加工、贮藏等为主导产业，一般多建有加工厂、冷冻库和运输站等。

(4) **工矿镇**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而形成的建制镇，其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为矿区服务的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也较发达。

(5) **旅游镇**

具有名胜古迹或自然风景资源，以发展旅游业及为其服务的第三产业或无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的建制镇。这类建制镇的交通运输、旅馆服务、饮食业等都比较发达。

(6) 交通镇

这类建制镇具有交通区位优势,多位于公路、铁路、水运、海运的联结点,能形成一定区域内的客流、物流中心。

(7) 贸易镇

以商品流通为主的建制镇,其运输业和服务业比较发达,设有贸易市场或专业市场、转运站、客栈、仓库等,并配置相应的金融、公安、税务、工商等机构。

(8) 口岸镇

这类建制镇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大多位于沿海、沿江河的港口口岸,或与邻国有边境贸易的建制镇,一般都设有海关、动植物检疫站和货物贮运站等。

(9) 历史文化名城

这类建制镇具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民族风格的或鲜明地域特点的建筑群,它们都是拥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文物的城镇。

四、中国建制镇空间分布

(一) 建制镇地带分异

依据中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条件,在保持各省、区、直辖市行政区完整性的基础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在这三大地带内,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域分异十分明显(表67)。

中国东部沿海地带虽然仅占国土面积的14.2%,却集中了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2.7%,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接近中部地带的2倍、西部地带的2.5倍。在这一地带,农业内部结构中种植业的比重约占一半,非农业总产值是中部地带的3倍和西部地带的4倍多。

在这样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大背景下,中国建制镇的分布存在什么规律呢?依据1992年资料分析,中国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43.4%,却集中了75.8%的建制镇,建制镇密度中部地带是西部地带的2.64倍,东部沿海地带为中部地带的2.8倍和西部地带的7倍,其差异程度与经济地带差异相似(表68)。

(二)建制镇省际差异

中国建制镇省际差异与人口总量、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据1992年资料,中国省区中四川省人口最多,已超过1亿人,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湖南、安徽和湖北等省区,人口总量在5000万～1亿人之间;广西、浙江、黑龙江、辽宁、江西、福建、陕西、云南和贵州再次之,人口总量在3000～5000万之间;其余省区人口总量均在3000万以下。就人口密度而言,上海、天津、北京和江苏是中国人口分布最密集的省、市,每平方公里在600人以上;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次之,每平方公里在400～600人之间;福建、辽宁、广东、湖北、湖南、河北、江西、海南再次之,每平方公里在200～400人之间。在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上,上海、北京、天津最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000元以上;广东、辽

表 67 中国三大地带农村经济分异表(1992 年)

指标		东部沿海	中部	西部
国土	面积(万 km^2)	136	280	544
	%	14.2	29.2	56.6
农村社会总产值	产值(亿元)	15904	6327	3155
	%	62.7	24.9	12.4
	人均(以西部为 1.0)	2.97	1.37	1.0
农业总产值(以西部为 1.0)		1.47	1.16	1.0
非农业总产值(以西部为 1.0)		4.84	1.63	1.0
农业结构	种植业(%)	50.9	60.2	59.0
	林牧副渔业(%)	49.1	39.8	41.0
劳动生产率(劳均创造农村社会总产值,元)		8858	4323	2814
土地生产率(每公顷耕地提供农作物产值,元)		7190	4270	4552
农村工农业产品商品率(%)		75	62	57
家庭经济	每农民纯收入(元)	1002	695	605
	每农民总支出(元)	752	536	485

资料来源:刘存星、唐圣玉:"东中西部农村差距有多大",《中国农民》,1993 年第 1 期。

表 68 中国三大地带建制镇分布表(1992 年)

指标	全国	东部 沿海	中部	西部
建制镇数(个)	13737	6026	4387	3324
%	100.00	43.86	31.94	24.20
建制镇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14.3	44.3	15.7	6.1

说明: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宁、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及广西 12 省市区;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9 省区;余为西部地带。

宁、浙江、江苏、黑龙江、新疆次之,在2000～3900元之间;山东、福建、河北、吉林、海南、青海、湖北居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500～2000元之间;山西、内蒙古、湖南、江西、河南、西藏、陕西、四川、云南、甘肃、广西和安徽等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1500元;贵州最低,仅为890元。

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建制镇的省际差异相当明显。据1992年资料统计,全国共有建制镇13737个。四川省人口最多,也是全国拥有建制镇数量最多的省区,建制镇数达1588个,占全国建制镇总量的11.56%;广东省是中国除上海、北京、天津以外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建制镇数量达1257个,占全国建制镇总量的9.1%;山东省第三,建制镇数达866个;此外,浙江、安徽、湖北3省也成为建制镇聚集省区,建制镇数量均超过840个,分别占全国建制镇总量的5%以上。从建制镇密度看,浙江省建制镇密度跃居榜首,达86镇/百平方公里;江苏、上海、广东、安徽、山东建制镇密度次之,分别达到55镇/百平方公里以上;北京、湖北、福建建制镇密度也分别达到40镇/百平方公里以上(表69)。

从中国建制镇分布密度图(图11)上可以大致看出,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以及安徽、河北、湖南是中国建制镇密集分布的省(市)区,它们相互联接构成中国沿海、沿江城镇密集带。

(三)建制镇地理分布

中国建制镇的形成与发展均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也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

表 69 中国分省、市、区人口、经济、建制镇区际差异表(1992 年)

省、市、区	人口		经济		建制镇	
	总量(万人)	密度(人/平方公里)	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总量(个)	密度(个/百平方公里)
北京	1102	670.8	709.0	5781	79	48.1
天津	920	821.1	411.2	3944	38	33.9
河北	6275	334.3	1156.1	1545	681	36.3
山西	2979	183.1	518.2	1467	495	30.4
内蒙古	2207	18.6	378.4	1466	251	2.1
辽宁	4016	247.8	1297.7	2707	456	28.1
吉林	2532	132.6	514.8	1718	286	15.0
黑龙江	3608	75.5	855.9	2099	367	7.7
上海	1345	2319.0	1065.9	6675	35	60.3
江苏	6911	673.6	1977.9	2143	651	63.5
浙江	4236	421.0	1220.7	2310	865	86.0
安徽	5834	429.3	724.9	1052	803	59.1
福建	3116	257.1	705.2	1803	506	41.7
江西	3913	234.4	558.0	1212	318	19.1
山东	8610	549.4	1980.0	1876	866	55.3
河南	8861	527.4	1213.2	1141	382	22.7
湖北	5580	300.0	1003.6	1584	846	45.5
湖南	6267	295.9	920.1	1280	639	30.2
广东	6525	310.4	2293.5	2823	1257	59.8
广西	4380	185.4	572.3	1058	387	16.4
海南	686	202.2	141.7	1645	205	6.04
四川	10998	193.8	1492.4	1180	1588	28.0
贵州	3361	190.8	331.7	890	640	36.3
云南	3832	96.8	510.0	1147	349	8.8
西藏	228	1.9	33.3	1388	3	0.02
陕西	3405	165.6	494.5	1292	376	18.3
甘肃	2314	50.9	301.9	1133	168	3.7
青海	461	6.4	84.3	1592	28	0.38
宁夏	487	94.0	78.6	1451	45	8.7
新疆	1581	9.5	382.3	2047	127	0.77
合计	117171	122	2397.3	-	13737	14.3

说明:资料来源:①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版;②建设部村镇规划司:《1992 年村镇建设简要汇总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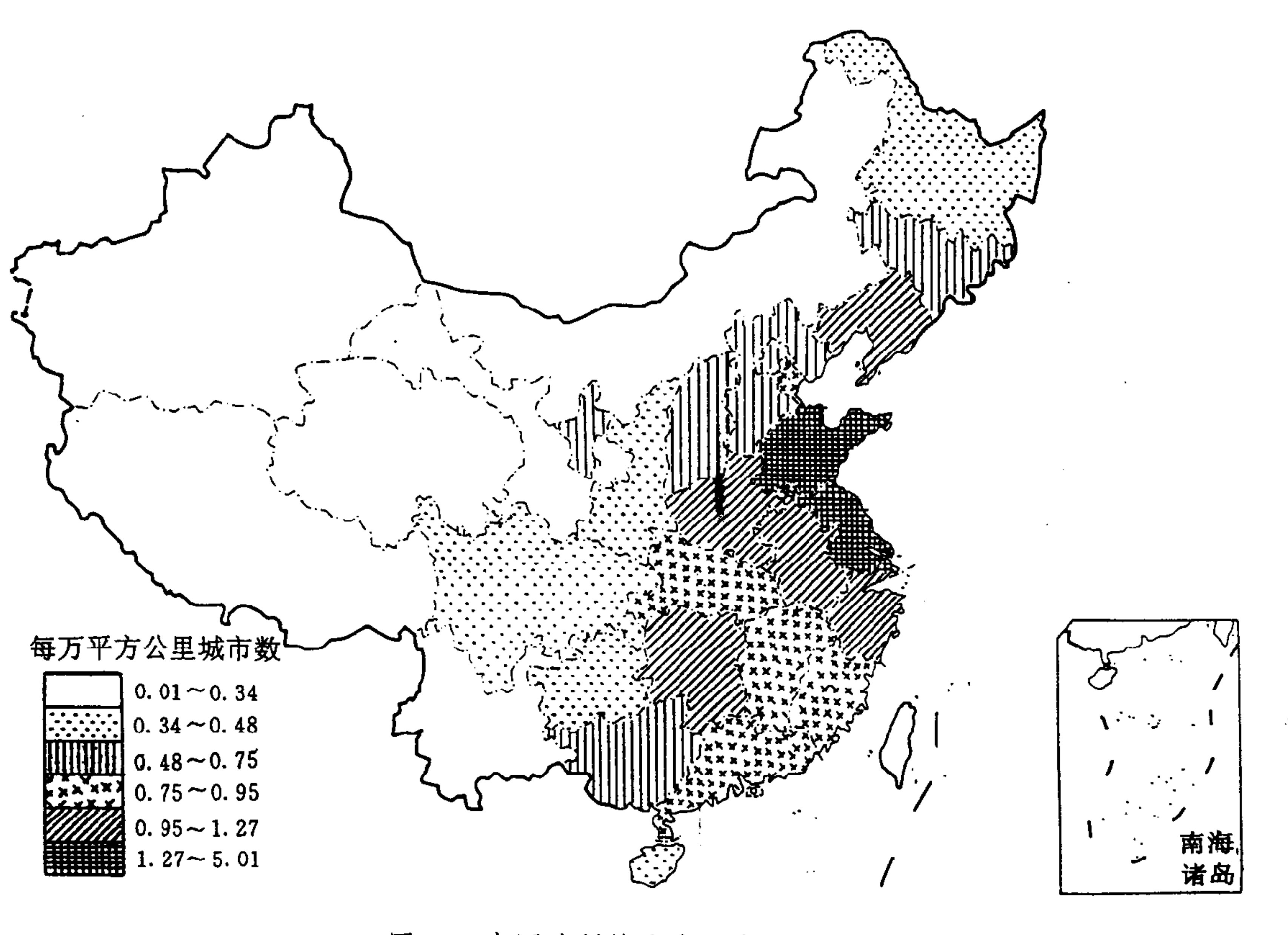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建制镇分布密度图(1992 年)

1. 平原、丘陵地区分布密,高原、山区分布疏

据统计,中国80%的建制镇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和丘陵地区,约17%的建制镇分布在海拔500～2000米的中、低山地区。城镇的地域分布表现为“低密高疏”的垂直分布规律。

2. 在暖温带至亚热带地区分布密集

中国广大的暖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雨水充足,气候温暖湿润,农业发达,形成了中国小城镇分布密集地区;温带中的中温带平原地区也是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小城镇分布密度也较大。热带在中国分布面积虽然不大,但由于高温多雨,是中国热带林果的生产基地,其小城镇的分布仅次于上述两个地区(表70)。

表70 中国小城镇按气候区域分布表(1992年)

气候区 / 指标	亚热带—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	寒温带	高寒带	合计
小城镇数(个)	3456	2408	13619	4550	1106	1543	48355
区域面积(万 km^2)	54.48	169.33	85.41	293.62	33.43	176.77	813.04
占小城镇总数比重(%)	7.15	49.80	28.16	9.41	2.29	3.19	100.00
城镇密度(个/1000km^2)	6.34	14.32	15.95	15.50	3.31	0.87	5.95

说明:(1) 小城镇包括建制镇和集镇。
(2) 根据1992年公安部统计资料和农业区划资料整理。

3. 沿海、沿江河、沿路分布密集

江河是中国建制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它既是这类城镇生活和生产用水的源泉,又是交通运输的主要通道之一。中国的建制镇,在长江、珠江、淮河、黄河、京杭运河、海河、辽河、黑龙江等江河

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分布最密集。

五、中国建制镇综合发展水平

以上分析了中国建制镇空间分布的地区差异，而建制镇本身的综合发展水平又如何呢？我们通过1992年资料，运用能够反映建制镇发展水平的主要因子进行综合评价如下。

1. 自来水普及率

充分的自来水供应是城镇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自来水普及率是衡量一个城镇供水设施和居民饮水条件的综合指标，自来水普及率越高，城镇供水设施和居民饮水条件越好。依据1992年资料，中国建制镇自来水普及率达65.7%，其中上海、天津、北京3个直辖市建制镇自来水普及率最高，达90%以上；江苏、浙江、河北、四川4省次之，建制镇自来水普及率在80～90%之间；广东、湖北、广西居第三位，自来水普及率在70～80%；海南、吉林、山西、山东、青海5省自来水普及率居全国平均水平，在60～70%之间；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福建、新疆10省区自来水普及率在40～60%之间；安徽、江西、内蒙古、宁夏、西藏等省区建制镇自来水普及率最低，在40%以下。

2.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是反映建制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之一。一般而言，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愈大，生活水平愈高。1992年中国

建制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78.12升，绝大部分省区低于这个水平。据资料分析，上海、广东建制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最高，在130升/人·日以上；江西、湖南次之，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在110～130升/人·日；广西、湖北再次之，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在90～110升/人·日；福建、浙江、新疆、四川居第四位，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在70～90升/人·日；北京、江苏、安徽、辽宁、吉林、内蒙古、山西、云南、海南居第五位，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在50～70升/人·日；山东、河南、河北、甘肃、贵州、天津、黑龙江、陕西、宁夏、青海最低，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在50升/人·日以下。

3.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反映了建制镇绿化和居住环境的舒适程度。1992年全国建制镇实有园林绿地面积34951公顷，其中公共绿地面积12157公顷，人均公共绿地1.68平方米。其中，广西人均公共绿地超过8平方米，海南也在5～8平方米之间，是中国建制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最多的省区；陕西、新疆、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山东、山西、黑龙江、内蒙古、甘肃等省、市、区居第二位，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2～5平方米；河南、四川、吉林居第三位，人均公共绿地与全国平均水平(1.5～2.0平方米)相当；江西、天津、辽宁、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1～1.5平方米之间；河北、湖南、贵州、云南、青海5省最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在1平方米以下。

4. 农村城镇化水平

农村城镇化水平为一个地区建制镇驻地总人口占乡村总人口

的比重，城镇化水平愈高，建制镇数量和城镇人口愈多。据1992年资料，浙江、吉林2省农村城镇化水平最高，建制镇驻地总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达20～25%；湖北次之，在18～20%之间；广东、福建、天津等居第三，城镇化水平在15～18%之间；江苏、北京、安徽、山东、贵州和内蒙古6省市区建制镇驻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10～15%；海南、上海、湖南、河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市建制镇驻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仅为5～10%；广西、江西、河南、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等省区农村城镇化水平最低，建制镇驻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在5%以下。

5. 自理口粮人口比重

自理口粮人口占建制镇人口比重是一项反映各省区建制镇农民进城状况的指标，其比重愈高，农民进城数愈多，建制镇发展也就愈快。据1992年资料，全国建制镇自理口粮人口341.18万人，占全国建制镇人口的4.7%。其中，福建省建制镇自理口粮人口占建制镇总人口比重最高，在20～25%之间；广东、浙江、湖北三省达15～18%；安徽、河北、四川和新疆4省区为10～15%；天津、江苏、山东、河南、山西、贵州、陕西、广西、海南、江西、湖南、宁夏和黑龙江等省市区自理口粮人口比重仅为5～10%；北京、上海、辽宁、吉林、内蒙古、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市区自理口粮人口比重最低，在5%以下。

6. 单位国土面积年排放污水量

单位国土面积年排放污水量反映了建制镇环境污染程度。据

1992年资料，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为建制镇单位国土面积年排放污水量最多的省、市，排放量达2200～4850吨/平方公里·年；山东、天津、河南、湖北、福建次之，排放量为1000～2200吨/平方公里·年；河北、陕西、安徽、湖南、贵州居第三位，排放量在500～1000吨/平方公里·年；辽宁、广西和四川居第四位，排放量为300～500吨/平方公里·年；山西、江西、吉林、黑龙江、甘肃和云南居第五位，排放量在50～300吨/平方公里·年；宁夏、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建制镇单位国土面积年排放污水量最少，排放量在25吨/平方公里·年以下。

7. 综合发展水平

通过上述建制镇自来水普及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农村城镇化水平、自理口粮人口比重、单位国土面积年排放污水量的省际分析，不难看出，广东、湖北两省区建制镇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广西、上海、吉林、浙江、四川、新疆次之，江苏、福建、黑龙江、山西、江西、河北、北京、天津、湖南、海南、山东居第三位，辽宁、陕西、甘肃、青海、河南居第四位，贵州、河南、西藏建制镇综合发展水平最低(表71)。

六、中国建制镇空间演化特征

中国建制镇增长的空间过程，从宏观角度看，东部快于中、西部，沿海快于内地。中国建制镇增长与空间演化具有如下特征。

表 71　中国分省、市、区建制镇综合发展水平评价表(1992 年)

省、市、区	自来水普及率	人均生活用水量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城镇化水平	自理口粮人口比重	年排放污水量	合计
北京	6	2	4	3	1	1	17
天津	6	1	2	4	2	2	17
河北	5	1	1	2	3	3	15
山西	3	2	4	2	2	5	18
内蒙古	1	2	4	2	1	6	15
辽宁	2	2	2	3	1	4	14
吉林	3	2	3	6	1	5	20
黑龙江	2	1	4	3	2	5	17
上海	6	6	4	2	1	1	20
江苏	5	2	2	3	2	1	15
浙江	5	3	1	4	4	1	20
安徽	1	2	2	3	3	3	14
福建	2	3	1	4	6	2	18
江西	1	5	2	1	2	5	16
山东	3	1	4	3	2	2	15
河南	2	1	3	1	2	2	11
湖北	4	4	4	5	4	2	23
湖南	2	5	1	2	2	3	15
广东	4	6	4	4	4	1	23
广西	4	4	6	1	2	4	21
海南	3	2	5	2	2	4	18
四川	5	3	3	2	3	4	20
贵州	2		1	2	2	3	10
云南	2	2	1	2	2	5	12
西藏	1	1		1	1	6	10
陕西	2	1	4	2	2	3	14
甘肃	2	1	4	1	1	5	14
青海	3	1	1	1	1	6	13
宁夏	1	1	1	1	2	6	12
新疆	2	3	4	1	3	6	19

说明:每项指标按 6 级划分,第 1 级得 6 分,第 2 级得 5 分,依次类推。年排放污水量指标相反,污水排放量愈多,得分愈低。

1. 进一步偏集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带

从1984年资料看,中国建制镇的71.46%集中在占全国国土面积43.4%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带。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带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2%,却集中了全国38.13%的建制镇。而西部地带占全国国土面积56.6%,建制镇数量仅占全国的28.54%。到1992年,中国建制镇总量增长了1倍,但其空间分布格局基本没有改变,而且有进一步偏集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带的趋势。据1992年资料统计,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带建制镇数量比重已由1984年的71.46%上升为1992年的75.80%,西部地带则由28.54%降为24.2%。从建制镇分布密度看,1984年中部地带建制镇密度是西部地带的2.3倍。东部沿海地带又是中部地带的2.3倍;到1992年,中部地带建制镇密度已是西部地带的2.6倍,东部沿海地带是中部地带的2.8倍。与1984年相对照,近10年来,中国建制镇增长与空间演化趋势是沿海快于中部,中部快于西部,建制镇分布重心趋向于偏集东部沿海地带(表72)。

表72 中国大陆建制镇三大地带分布表

地带		全国	东部沿海地带	中部地带	西部地带
1984年	建制镇数量(个)	6211	2368	2070	1773
	%	100.00	38.13	33.33	28.54
	建制镇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6.5	17.4	7.4	3.2
1992年	建制镇数量(个)	13737	6026	4387	3324
	%	100.00	43.86	31.94	24.20
	建制镇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14.3	44.3	15.7	6.1
1984年~1992年增减情况	建制镇数量(个)	7526	3658	2317	1551
	%	-	5.73	-1.39	-4.34
	建制镇密度(个/万平方公里)	7.8	26.9	8.3	2.9

2. 集中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省区

从1984～1992年间中国建制镇增长情况来分析，中国建制镇的空间演化特征如表73。四川省新设建制镇最多，达1224个；广东省次之，建镇931个；安徽、浙江再次之，分别为684个和648个；江苏、湖北建镇数量也均超过500个以上，这些省区都是近10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区。与此同时，云南省撤销168个建制镇，是建制镇净减少最多的省区；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建制镇数也略有减少。从各省区建制镇数量占全国建制镇总量的比重看，13个省区相对增加，其中增长较多的省区是四川、广东、安徽、浙江和江苏5省，其增长率均在2%以上；17个省区相对减少，其中云南、山西、吉林、山东、陕西相对减少较多，均在-2%以上。从建制镇密度增减状况看，浙江、江苏、广东、安徽、北京等5省市每百平方公里建制镇密度均增加40个以上，尤其浙江省增加最多，达64.4镇/百平方公里；天津、福建、湖北、四川4省市每百平方公里建制镇密度增加20个以上；辽宁、上海、江西、山东、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市增加10个以上；而云南、青海等省区每百平方公里建制镇数略有下降。

3. 增长类型多样发展潜力大

据山东省烟台、威海地区115个建制镇1984～1992年的跟踪调查，建制镇增长类型多样。其中：①激增型建制镇17个，占总建制镇的14.78%。这类建制镇绝大多数为县城和县级市驻地镇，在9年中大多数均由1984年的1～3万人口增长到1992年的5～10万人口，也有一些重点建制镇由原先的0.5万以下规模激

表 73　中国分省、市、区建制镇分布与增长(1984～1992 年)

省、市、区	1984 年			1992 年					增减状况		
	镇数[①](个)	%	镇密度(个/100 km^2)	镇数[②](个)	县城数[③](个)	合计(个)	%	镇密度(个/100 km^2)	镇数(个)	%	镇密度(个/100 km^2)
北京	14	0.23	8.5	71	8	79	0.57	48.1	65	0.34	39.6
天津	8	0.13	7.1	33	5	38	0.28	33.9	30	0.15	26.8
河北	369	5.94	19.7	561	120	681	4.96	36.3	312	-0.98	16.6
山西	445	7.16	27.4	402	93	495	3.60	30.4	50	-3.56	3.0
内蒙古	170	2.74	1.4	181	70	251	1.83	2.1	81	-0.91	0.7
辽宁	262	4.22	16.2	424	32	456	3.32	28.1	194	-0.90	11.9
吉林	254	4.09	13.3	261	25	286	2.08	15.0	32	-2.01	1.7
黑龙江	178	2.87	3.7	313	54	367	2.67	7.7	189	-0.2	4.0
上海	26	0.42	44.8	26	9	35	0.25	60.3	9	-0.17	15.5
江苏	150	2.42	14.6	610	41	651	4.74	63.5	501	2.32	48.9
浙江	217	3.49	21.6	820	45	865	6.30	86.0	648	2.81	64.4
安徽	119	1.92	8.8	743	60	803	5.85	59.1	684	3.93	50.3
福建	173	2.79	14.3	454	52	506	3.68	41.7	333	0.89	27.4
江西	125	2.01	7.5	244	74	318	2.31	19.1	193	0.30	11.6
山东	564	9.08	36.0	792	74	866	6.30	55.3	302	-2.78	19.3
河南	118	1.90	7.0	284	98	382	2.78	22.7	264	0.88	15.7
湖北	291	4.69	15.6	798	48	846	6.16	45.5	555	1.47	29.9
湖南	370	5.96	17.5	565	74	639	4.65	30.2	269	-1.31	12.7
广东	326	5.25	15.5	1180	77	1257	9.15	59.8	931	3.90	44.3
广西	240	3.86	10.2	311	76	387	2.82	16.4	147	-1.04	6.2
海南	19	0.31	0.56	189	16	205	1.49	6.04	186	1.18	5.5
四川	364	5.86	6.4	1425	163	1588	11.56	28.0	1224	5.70	21.6
贵州	312	5.02	17.7	569	71	640	4.66	36.3	328	-0.36	18.6
云南	517	8.32	13.1	235	114	349	2.54	8.8	-168	-5.78	-4.3
西藏	9	0.14	0.07		3	3	0.02	0.02	-6	-0.12	-0.05
陕西	327	5.26	15.9	291	85	376	2.74	18.3	49	-2.52	2.4
甘肃	80	1.29	1.8	105	63	168	1.22	3.7	88	-0.07	1.9
青海	30	0.48	0.42	11	17	28	0.20	0.38	-2	-0.28	-0.04
宁夏	17	0.27	3.3	29	16	45	0.33	8.7	28	0.06	5.4
新疆	117	1.88	0.7	58	69	127	0.92	0.77	10	-0.96	0.07
合计	6211	100.00	6.5	11985	1752	13737	100.00	14.3	7526	–	7.8

资料来源:①建设部村镇规划司:《1992 年村镇建设简要汇总情况》;②公安部三局:《中国城镇人口资料手册》,地图出版社,1985 年版;③民政部:《行政区划简册》(1992),地图出版社,1993 年版。

增到 3～5 万人口规模。②渐增型建制镇 28 个，占总建制镇的 24.3%。这类建制镇经济发展较快，人口规模也有迅速的增长。③停滞型建制镇为主体，约占建制镇总量的 55.65%，说明中国建制镇发展潜力还相当大。此外，衰落型建制镇较少，仅占 5.2%（表 74）。从烟台、威海地区建制镇等级规模结构变化中也可发现，在 1984～1992 年间，这一地区 10～20 万、5～10 万和 0.5～1 万人口建制镇占总镇数比重有所增加，1～3 万、3～5 万和 0.5 万以下人口的建制镇占总镇数比重有所下降（表 75）。

表 74　山东省烟台、威海地区建制镇增长类型表

（1984～1992 年）

等级规模		建制镇数 1992 年						
		10 万以上	5～10 万	3～5 万	1～3 万	0.5～1 万	0.5 万以下	
1984 年	10 万以上							
	5～10 万	1						
	3～5 万	2	2	2				
	1～3 万		6	1	3			
	0.5～1 万				3	6	3	
	0.5 万以下		1	3	5	27	53	3
激增型						渐增型	停滞型	衰落型

说明：(1) 建制镇规模为镇政府驻地聚居总人口。
(2) 参照《山东省城镇预测与规划》(1993)、《山东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资料整理。

表 75　山东省烟台、威海地区建制镇等级规模结构变化

（1984～1992 年）

等级规模（万）	1984 年 建制镇数（个）	1984 年 %	1992 年 建制镇数（个）	1992 年 %	变化状况（%）
>20	1	0.85	1	0.56	-0.29
10～20	-	-	2	1.12	+1.12

续表

等级规模（万）	1984 年		1992 年		变化状况（%）
	建制镇数(个)	%	建制镇数(个)	%	
5～10	1	0.85	8	4.47	+3.62
3～5	6	5.13	5	2.79	-2.34
1～3	11	9.40	11	6.14	-3.26
0.5～1	21	17.95	41	22.91	+4.96
0.5 以下	77	65.82	111	62.01	-3.81
合计	117	100.00	179	100.00	-

第 三 篇

区域城市体系与
城市影响范围

第十章　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

城市经济区，从其结构形态看，它是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并由与之紧密相连的广大地区共同组成的、经济上紧密联系、生产上互相协作、在社会地域分工过程中形成的结节地域。从城市经济区内在特性的规定性看，它具有五大构成要素，即中心城市、城镇网络、联系通道、空间梯度和经济腹地。其中，中心城市规定了城市经济区的层次，经济腹地展示了城市经济区的范围。传统经济腹地的划分往往注重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之间各种流态(如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等)的分析，但在实际工作中资料的获取却相当困难。有鉴于此，这里借用数学方法进行简化研究。

一、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理论与方法

1. 结节区域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

区域，用图论的语言可表述为：在球面上(包括地球)用简单曲

线画出的图 G=(V,U),它们各边的交点均为顶点,并且可以把这张图展示在平面有限图上。

按照图论原理,对于平面图来说,最简单的区域图,其有限面的边界(围道)为:

$$V(G) = 1$$

连接分支 $\rho=1$,参照圆空间秩数 V(G)定理:

$$V(G) = m - n + \rho \tag{1}$$

不难看出,满足式(1)的充分必要条件为 m=n。

此外,在简单完全图中,点和边的关系又必须满足公式(2)。即:

$$m \leqslant n(n-1)/2 \tag{2}$$

根据式(1)令 m=n 并代入式(2),很容易求得简单平面完全图的点数和边数至少为3。即:

$$\begin{cases} m \geqslant 3 \\ n \geqslant 3 \end{cases}$$

城市经济区是由中心城市与各城镇组成的城镇网络,从图论的角度看都可以认为是单纯无向图。中心城市 a,对于周围地区图 G 中任一其它城镇 V∈G 都存在由 a 到 V 的基本连接线 $P_{a,V}$,按图论的表述法,我们称这一(区域)图 G(V,U)为有根树,中心点 a 为树的根。很显然,在以 a 为根的树 R 上,a 作为节点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图上顶点的连接次数大于或等于 3。也就是说,只有当 G=(V_a,U)为一个连接图时,并设有 U_1 与 U_2 的弧集的一个分割,即

$$\begin{cases} U = U_1 \cup U_2 & (3) \\ U_1 \cap U_2 = \Phi & (4) \end{cases}$$

中心城市 a 才能形成为(区域)图 G 的节点。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纯几何学的角度说,一个平面图形(区域)最彻底的划分是三角形(三点三条连接线),它是编制一个紧致网的最小单元。要形成具有节点的结节区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三角形组成连接图。

2. R_d链城市经济区组建方法

根据上述图论原理,城市经济区的组建可运用 R_d链方法。

(1)应用经济地理学地域集聚原理,将某一地域的社会、经济、科技、教育和交通线结合在一起的整体地理结构为一个 d 系。很显然,这种 d 系是随着社会经济核心区的形成而出现,并且随着中心城市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各种流通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在实践中我们很自然地以城市为节点构造 d 系,并按中心城市实力指数划分为不同层次的 d 系。

(2)按照图论原理,可以把 3 个 d 系组成一个三角区,形成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我们称之为 $d_{\triangle}$ 系。按照不同层次的 d 系,进一步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d_{\triangle}$ 系联接起来,我们称之为 R_d链。

(3)进行基层 d 系的社会经济技术流态分析,划分与其对应的腹地范围。

这样,从理论上讲,一个 R_d链的范围就是组建城市经济区的大致范围。

3. 中心城市实力指数评价方法

在现代交通运输状况下,每个城市与其周围的城市一般都有 3 条以上的连接通道。为了比较准确地反映各城市的节点层次,

我们运用主因子 R 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实力指数的多指标定量评价分析。

假定对 n 个城市进行 m 项指标综合评价，其指标集矩阵为 X_{ij}（其中 $i=1,2,\cdots\cdots,n$；$j=1,2,\cdots\cdots,m$）。为了除去量纲对评价的影响，我们可对原指标集矩阵标准化。

$$Y_{ij} = (X_{ij} - \bar{X}_i)/\sigma_i \tag{5}$$

其中：

$$\bar{X}_i = \frac{1}{n}\sum_{i=1}^{n} X_{ij}$$

$$\sigma_i = \sqrt{\frac{1}{n}\sum_{i=1}^{n}(X_{ij} - \bar{X})^2}$$

计算 Y_{ij} 的相关数矩阵 Γ_{ij}。

$$(\Gamma^{ik})_{m\times m} = \frac{1}{N}\sum_{i=1}^{N} Y_{ij}Y_{ik} \tag{6}$$

$$(j,k = 1,2,\cdots\cdots,m)$$

对相关系数矩阵 R 进行向量内积求出特征值 λ_i，求解求逆紧凑变换求得相应的特征向量 I_{ij}。

按照特征值的累计百分率确定主因子数，并求每一主因子的贡献率。

$$P_j = \sum_{j=1}^{P} \lambda_j \tag{7}$$

按照主因子 Z_k 与原因子 Y_i 的相关关系，计算第 σ 因子在第 k 个主因子上的载荷量（因子载荷量）。

$$\rho(Z_k, Y_j) = \sqrt{\lambda_k} \cdot I_{kj} \tag{8}$$

城市综合实力指数（Q_i）为：

$$Q_i = \sum_{\substack{k=1 \\ j=1}}^{\substack{m \\ p}} \rho_{kj} Y_{ij} (i = 1,2,\cdots\cdots,n) \qquad (9)$$

4. R_d链组建的城市经济区特点

按照 R_d链方法组建的城市经济区具有明显的特点：①城市经济区以经济重心区和通道网为骨架，而不是一种中心—腹地体系骨架。② 城市经济区没有排它性边界，不同层次的城市经济区可以互相交叉重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通道网缺乏的地区甚至可以出现轮空现象。③ 城市经济区随着经济重心区的转移、通道网的变化其范围也会相应变动。由于中心城市实力和通道网时刻处在变化之中，所以用这种方法组建城市经济区时准确把握中心城市和通道网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二、中国城市实力评价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9 年）选取反映经济发展水平、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的 33 个指标，对全国 434 个城市进行城市实力综合评价。

1. 评价指标体系组成

中国城市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 3 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包括经济实力和物质实力指标。第二层次将上述两方面的实力进

一步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三个指标集。第三层次为33个具体统计指标。

2. 因子分析法计算结果

通过建立城市综合评价指标数据库(434×33),经计算和运算得相关系数矩阵,并通过相关矩阵计算特征向量和特征根(表76)。我们取累积贡献率为92%的前6个因子进行R型分析,R型因子载荷矩阵如表77。依据因子载荷量表计算434座城市综合实力指数(表78)。

三、中国$d_{\triangle}$系和R_d链

按照R_d链理论,国家城市经济区的划分主要在于:①构建Ⅰ级$d_{\triangle}$系和有效地扩展一级R_d链,组建国家经济发展地带;②用尽可能少的代价构建Ⅱ级$d_{\triangle}$系,并以尽快接通各级R_d链为目标,组建国家级城市经济区。

1. 中国Ⅰ级$d_{\triangle}$和R_d链

根据上述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分析可见，中国现已构成Ⅰ级d系的城市为上海、北京、天津和广州（香港暂未包括）4座城市，它们均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以北方京津、中部上海、南方广州为顶点组成了中国Ⅰ级$d_{\triangle}$系，成为中国东部经济发展地带。与之相对应，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为西部经济发展地带。

表 76　特征根表

主因子	特征根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24.5588	0.7442	0.7442
2	1.8831	0.0571	0.8013
3	1.4798	0.0448	0.8461
4	0.9519	0.0288	0.8750
5	0.8353	0.0253	0.9003
6	0.7062	0.0214	0.9217
7	0.5248	0.0159	0.9376
8	0.4437	0.0134	0.9510
9	0.2723	0.0083	0.9593
10	0.2563	0.0078	0.9670
11	0.1799	0.0055	0.9725
12	0.1623	0.0049	0.9774
13	0.1540	0.0047	0.9821
14	0.1140	0.0035	0.9855
15	0.1067	0.0032	0.9888
16	0.0746	0.0023	0.9910
17	0.0671	0.0020	0.9931
18	0.5010	0.0015	0.9946
19	0.0471	0.0014	0.9960
20	0.0312	0.0009	0.9969
21	0.0255	0.0008	0.9977
22	0.0208	0.0006	0.9984
23	0.0175	0.0005	0.9989
24	0.0124	0.0004	0.9993
25	0.0076	0.0002	0.9995
26	0.0054	0.0002	0.9996
27	0.0024	0.0001	0.9997
28	0.0022	0.0001	0.9998
29	0.0017	0.0001	0.9998
30	0.0017	0.0001	0.9999
31	0.0015	0.0000	0.9999
32	0.0011	0.0000	1.0000
33	0.0008	0.0000	1.0000

表 77　R 型因子载荷量表

主因子 评价因子	第一主因子	第二主因子	第三主因子	第四主因子	第五主因子	第六主因子
1	0.9788	-0.0715	0.0430	0.0120	-0.0145	0.0320
2	0.8564	0.0312	0.2462	-0.0727	-0.0589	-0.0120
3	0.2700	0.2136	-0.2541	0.7001	-0.5237	-0.2165
4	0.9798	-0.0508	-0.1343	0.0028	0.0418	0.0385
5	0.9808	-0.0721	-0.1132	-0.0027	0.0444	0.0388
6	0.9881	-0.0595	-0.0708	-0.0110	0.0274	0.0224
7	0.9717	-0.0556	-0.1636	0.0119	0.0442	0.0352
8	0.9751	-0.0534	-0.1711	-0.0044	0.0371	0.0316
9	0.9553	-0.0891	-0.1665	-0.0551	-0.0113	-0.0050
10	0.9743	-0.0474	-0.1066	-0.0583	-0.0060	0.0052
11	0.9397	-0.0637	-0.1197	-0.0975	-0.0238	-0.0086
12	0.9437	-0.0751	-0.0747	-0.0980	-0.0318	-0.0101
13	0.9782	-0.0527	-0.1774	-0.0187	0.0139	0.0152
14	0.9579	-0.0362	-0.0830	-0.1113	-0.0557	-0.0552
15	0.8065	-0.0249	-0.5059	0.0192	0.0415	0.0473
16	0.8662	-0.0001	-0.3766	0.0738	0.1304	0.1001
17	0.4445	0.7505	-0.2191	-0.1299	0.1166	-0.1877
18	0.8864	0.0485	0.0132	0.0355	0.0681	0.0582
19	0.3392	0.8014	-0.0829	-0.2688	0.0002	-0.2000
20	0.9786	-0.0539	0.0935	-0.0082	-0.0367	-0.0015
21	0.4759	0.3426	0.3100	0.3207	0.4424	-0.1731
22	0.9205	-0.0914	0.0049	0.0269	0.0644	0.0348
23	0.9078	-0.0363	0.1835	-0.1051	-0.1483	-0.1463
24	0.9350	-0.0547	0.2011	-0.0928	-0.1500	-0.0973
25	0.9687	0.0053	0.0092	0.0085	0.0292	0.0046
26	0.9792	-0.0321	0.0201	0.0054	-0.0086	0.0024
27	0.7378	0.1916	0.2543	0.3288	0.2577	0.1056
28	0.8178	-0.0319	0.2655	0.2374	0.1463	0.2393
29	0.2264	0.6211	0.1520	-0.0685	-0.3261	0.6150
30	0.8942	-0.0315	0.2404	0.0378	-0.0649	-0.0236
31	0.9087	-0.1487	0.1819	-0.0932	-0.1657	-0.1048
32	0.9372	-0.0310	0.1805	0.0519	0.0042	0.0272
33	0.7724	0.0146	0.4995	-0.1274	-0.1872	-0.1923

表 78 中国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分析表(1989 年)

序号	城市	实力指数	实力指数差	d 系层次
1	上海	214.997	-	Ⅰ$_1$
2	北京	170.927	44.07	
3	天津	102.225	68.702	Ⅰ$_2$
4	广州	94.483	7.742	
5	沈阳	77.406	17.077	Ⅱ$_1$
6	武汉	67.657	9.749	
7	南京	51.359	16.298	Ⅱ$_2$
8	哈尔滨	49.696	1.663	
9	大连	46.318	3.378	
10	重庆	45.150	1.168	
11	成都	41.173	3.977	
12	西安	39.941	1.232	
13	青岛	32.110	7.831	Ⅱ$_3$
14	济南	30.516	1.594	
15	长春	30.035	0.481	
16	太原	29.967	0.068	
17	杭州	28.349	1.619	
18	深圳	28.280	0.069	
19	大庆	27.779	0.501	
20	鞍山	27.419	0.36	
21	淄博	25.526	1.893	
22	兰州	22.866	2.66	
23	石家庄	22.091	0.775	
24	抚顺	21.322	0.769	
25	吉林	20.744	0.578	
26	昆明	20.610	0.134	
27	郑州	20.178	0.432	
28	贵阳	19.549	0.629	
29	无锡	19.081	0.468	
30	唐山	18.637	0.444	
31	长沙	18.195	0.442	
32	苏州	15.211	2.984	Ⅱ$_4$
33	福州	13.729	1.482	
34	乌鲁木齐	13.689	0.040	
35	南昌	13.550	0.139	

续表

序号	城市	实力指数	实力指数差	d系层次
36	宁波	13.393	0.157	Ⅱ4
37	合肥	12.860	0.533	
38	洛阳	12.373	0.487	
39	包头	12.190	0.183	
40	徐州	11.744	0.446	
41	本溪	11.349	0.395	
42	常州	11.223	0.126	
43	邯郸	10.195	1.028	Ⅲ
44	大同	9.859	0.336	
45	齐齐哈尔	9.772	0.087	
46	东莞	9.320	0.452	
47	潍坊	9.036	0.284	
48	汕头	8.776	0.260	
49	东营	8.747	0.029	
50	锦州	8.630	0.117	
51	柳州	8.612	0.018	
52	南宁	8.064	0.548	
53	厦门	8.038	0.026	
54	佛山	6.627	1.411	
55	中山	6.508	0.119	
56	烟台	6.414	0.094	
57	珠海	5.774	0.640	
58	辽阳	5.694	0.08	
59	南通	5.506	0.188	
60	枣庄	5.008	0.498	
61	湛江	4.875	0.133	
62	呼和浩特	4.760	0.115	
63	张家口	4.498	0.262	
64	丹东	4.060	0.438	
65	株洲	3.817	0.243	
66	牡丹江	3.700	0.117	
67	宝鸡	3.654	0.046	
68	保定	3.403	0.251	
69	芜湖	3.218	0.185	
70	常熟	3.191	0.027	

续表

序号	城市	实力指数	实力指数差	d系层次
71	盘锦	3.128	0.063	
72	西宁	3.114	0.014	
73	宜昌	3.083	0.031	
74	黄石	2.950	0.133	
75	衡阳	2.832	0.118	
76	湘潭	2.798	0.034	
77	营口	2.754	0.044	
78	淮南	2.665	0.089	
79	平顶山	2.604	0.061	
80	蚌埠	2.534	0.07	
81	镇江	2.389	0.145	
82	开封	2.373	0.016	
83	新乡	2.370	0.003	
84	温州	2.301	0.069	
85	江阴	2.028	0.273	
86	秦皇岛	1.916	0.112	
87	扬州	1.903	0.013	
88	佳木斯	1.647	0.256	Ⅲ
89	襄樊	1.581	0.066	
90	伊春	1.534	0.047	
91	阜新	1.371	0.163	
92	江门	1.364	0.007	
93	韶关	1.248	0.116	
94	攀枝花	1.216	0.032	
95	桂林	1.163	0.053	
96	萧山	1.061	0.102	
97	十堰	1.027	0.034	
98	安阳	0.920	0.107	
99	湖州	0.746	0.174	
100	马鞍山	0.730	0.016	
101	鸡西	0.546	0.184	
102	岳阳	0.269	0.277	

说明:其余332座城市实力指数小于0.2从略。

2. 中国Ⅱ级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

根据表 78 分析，中国现有Ⅱ级 d 系城市 38 座，它们在通道网的组合下构成了中国的Ⅱ级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从而形成了中国Ⅰ级城市经济区的基础(表 79)。

表 79　中国Ⅱ级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组合表(1989 年)

R_d 链	$d_{\triangle}$ 系
沈阳	大连、沈阳、鞍山 $d_{\triangle}$ 系，鞍山、沈阳、抚顺 $d_{\triangle}$ 系，长春、沈阳、吉林 $d_{\triangle}$ 系，哈尔滨、长春、吉林 $d_{\triangle}$ 系
京津	太原、京、津、石家庄 $d_{\triangle}$ 系，石家庄、京、津、济南 $d_{\triangle}$ 系，郑州、太原、石家庄 $d_{\triangle}$ 系，济南、石家庄、郑州 $d_{\triangle}$ 系，淄博、济南、青岛 $d_{\triangle}$ 系，济南、郑州、徐州 $d_{\triangle}$ 系
上海	南京、上海、杭州 $d_{\triangle}$ 系，合肥、南京、南昌 $d_{\triangle}$ 系
武汉	郑州、武汉、长沙 $d_{\triangle}$ 系，南京、武汉、重庆 $d_{\triangle}$ 系
广州	深圳、广州、香港 $d_{\triangle}$ 系，武汉、广州、上海 $d_{\triangle}$ 系
重庆	贵阳、重庆、成都 $d_{\triangle}$ 系，成都、昆明、贵阳 $d_{\triangle}$ 系
西安	西安—兰州轴系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 d 系

3. 中国Ⅲ级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

中国现有Ⅲ级 d 系城市 102 座，按照它们间的通道网进行组织将形成中国Ⅱ级城市经济区基础(表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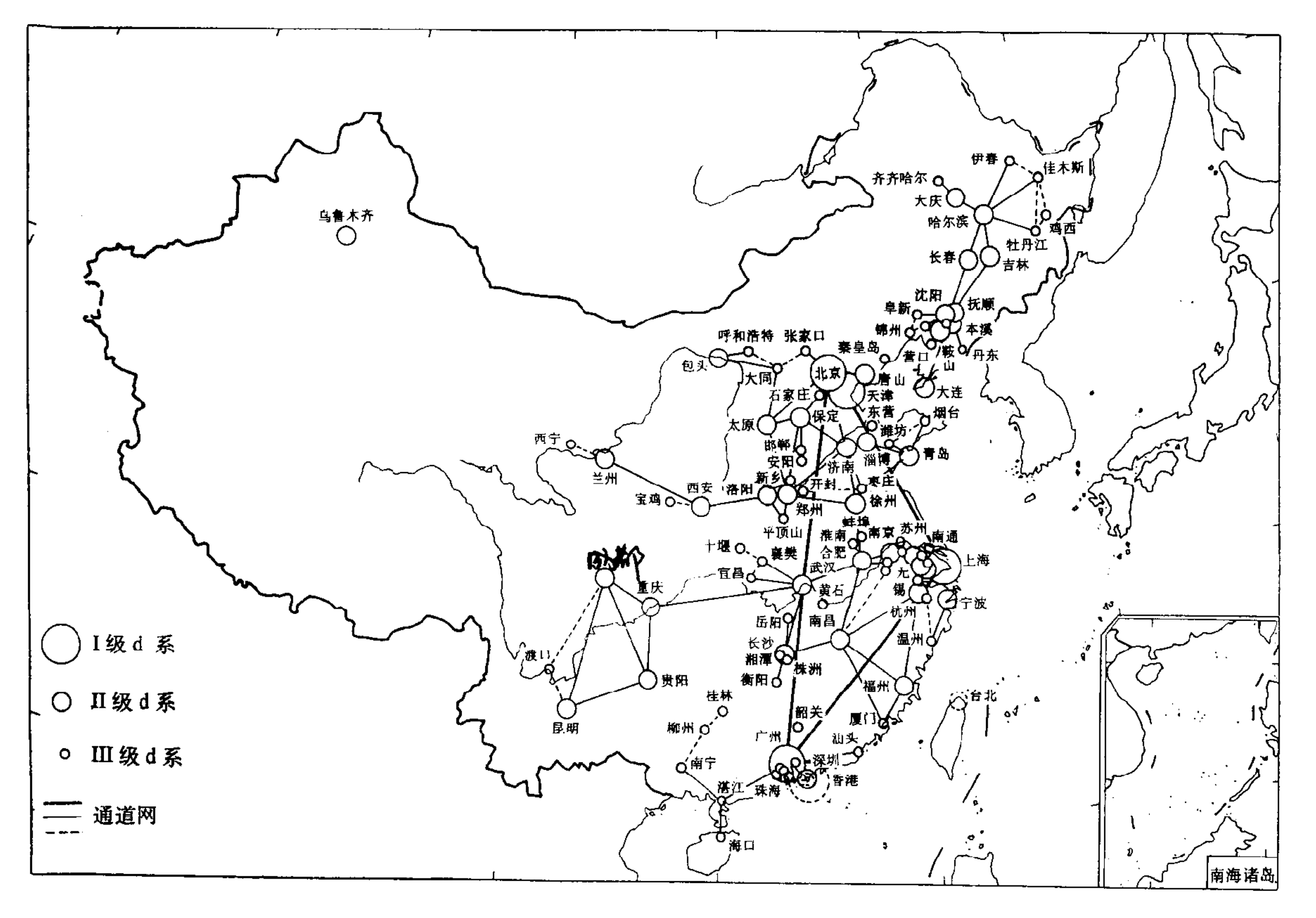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 $d_{\triangle}$ 和 R_d 链示意图

中国现状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可用图 12 表示。

四、中国城市经济区组建方案

依据中国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现状基础，中国城市经济区组建方案设想为：两大经济发展地带、三条经济开发轴线、九大城市经济区。国家城市经济区的组织具体为：① 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中心，包含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 4 个Ⅱ级经济区。② 京津经济区。以京津为中心，包含京津、石家庄、济南、青岛、徐州、郑州、太原、包头 8 个Ⅱ级经济区。③ 西安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包含西安、兰州 2 个Ⅱ级经济区。④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包含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南昌 5 个Ⅱ级经济区。⑤ 武汉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包含武汉、长沙 2 个Ⅱ级经济区。⑥ 重庆经济区。以重庆为中心，包括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大理 5 个Ⅱ级经济区。⑦ 广州经济区。以广州为中心，包括广州、海口、南宁、福州、台北 5 个Ⅱ级经济区。⑧ 乌鲁木齐经济区。⑨拉萨经济区。

就 9 个Ⅰ级城市经济区而言，乌鲁木齐经济区和拉萨经济区实力最弱，还没有形成 $d_{\triangle}$ 系和 R_d 链。但考虑到乌鲁木齐已形成一定实力，其周围城市发育良好，近期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昌吉自治州和塔城地区的乌苏县所辖地区，远期可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柴达木盆地在内的西北广大地区。此外，中国青藏高原远离大经济中心城市，且地广人稀，雅鲁藏布江谷地和拉萨市地区经济已有一定基础，暂时也将其列为Ⅰ级城市经济区。Ⅱ级城市经

表80 中国Ⅲ级$d_{\triangle}$和R_d链组合表(1989年)

R_d链	$d_{\triangle}$系
哈尔滨	伊春、哈尔滨、佳木斯$d_{\triangle}$系,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d_{\triangle}$系,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d_{\triangle}$系,佳木斯、牡丹江、鸡西$d_{\triangle}$系
长　春	长春、吉林、哈尔滨$d_{\triangle}$系,长春、吉林、沈阳$d_{\triangle}$系
沈　阳	大连、沈阳、鞍山$d_{\triangle}$系,鞍山、沈阳、抚顺$d_{\triangle}$系,锦州、沈阳、阜新$d_{\triangle}$系,辽阳、沈阳、本溪$d_{\triangle}$系,丹东、本溪、辽阳$d_{\triangle}$系
京　津	北京、天津、唐山$d_{\triangle}$系
石家庄	石家庄、邯郸、衡水$d_{\triangle}$系
包　头	包头、呼和浩特、大同$d_{\triangle}$系
太　原	太原、大同、石家庄$d_{\triangle}$系
济　南	淄博、济南、东营$d_{\triangle}$系,枣庄、济南、青岛$d_{\triangle}$系
青　岛	烟台、青岛、潍坊$d_{\triangle}$系,潍坊、青岛、淄博$d_{\triangle}$系
徐　州	枣庄、徐州、开封$d_{\triangle}$系,枣庄、徐州、蚌埠$d_{\triangle}$系
郑　州	洛阳、郑州、平顶山$d_{\triangle}$系,焦作、郑州、新乡$d_{\triangle}$系,开封、郑州、新乡$d_{\triangle}$系
上　海	上海、苏州、无锡$d_{\triangle}$系,上海、南通、苏州$d_{\triangle}$系,苏州、无锡、常州$d_{\triangle}$系
南　京	镇江、南京、马鞍山$d_{\triangle}$系,扬州、南京、蚌埠$d_{\triangle}$系
合　肥	蚌埠、合肥、芜湖$d_{\triangle}$系,淮北、合肥、蚌埠$d_{\triangle}$系
杭　州	湖州、杭州、宁波$d_{\triangle}$系,杭州、宁波、温州$d_{\triangle}$系
南　昌	芜湖、南昌、湘潭$d_{\triangle}$系,杭州、南昌、福州$d_{\triangle}$系
无　锡	苏州、无锡、江阴$d_{\triangle}$系,江阴、无锡、常州$d_{\triangle}$系
广　州	广州、东莞、深圳$d_{\triangle}$系,中山、佛山、广州$d_{\triangle}$系,深圳、广州、珠海$d_{\triangle}$系,湛江、广州、汕头$d_{\triangle}$系,韶关、广州、深圳$d_{\triangle}$系
南　宁	南宁、柳州、桂林$d_{\triangle}$系
海　口	海口、洋浦、三亚$d_{\triangle}$系,海口、湛江、南宁$d_{\triangle}$系
福　州	厦门、福州、南昌$d_{\triangle}$系,厦门、福州、台北$d_{\triangle}$系
武　汉	(黄石、武汉)(十堰、襄樊)宜昌$d_{\triangle}$系
长　沙	长沙、株洲、湘潭$d_{\triangle}$系,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d_{\triangle}$系
西　安	西安、宝鸡、铜川$d_{\triangle}$系
兰　州	兰州、西宁、银川$d_{\triangle}$系
成　都	重庆、成都、攀枝花$d_{\triangle}$系
重　庆	达县、重庆、内江$d_{\triangle}$系
贵　阳	遵义、贵阳、六盘水$d_{\triangle}$系
昆　明	攀枝花、昆明、个旧$d_{\triangle}$系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d系
拉　萨	拉萨d系

济区，齐齐哈尔经济区、大理经济区和海口经济区中心城市实力都相对较弱，但从地域生产力布局、对外开放等多种因素考虑，也暂将它们划为Ⅱ级城市经济区。

根据经济发展地带、经济开发轴线和城市经济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城市经济区区划体系为：① 两大经济发展地带。由沈阳、京津、上海、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经济区组成东部经济发展地带；重庆、西安、乌鲁木齐、拉萨四大城市经济区组成西部经济发展地带。② 三条经济开发轴带。由沈阳、京津、上海、广州四大城市经济区组成沿海经济发展轴带；上海、武汉、重庆三大城市经济区组成沿江经济发展轴带；京津和西安两大城市经济区组成黄河—陇海铁路沿线经济发展轴带。

中国城市经济区区划方案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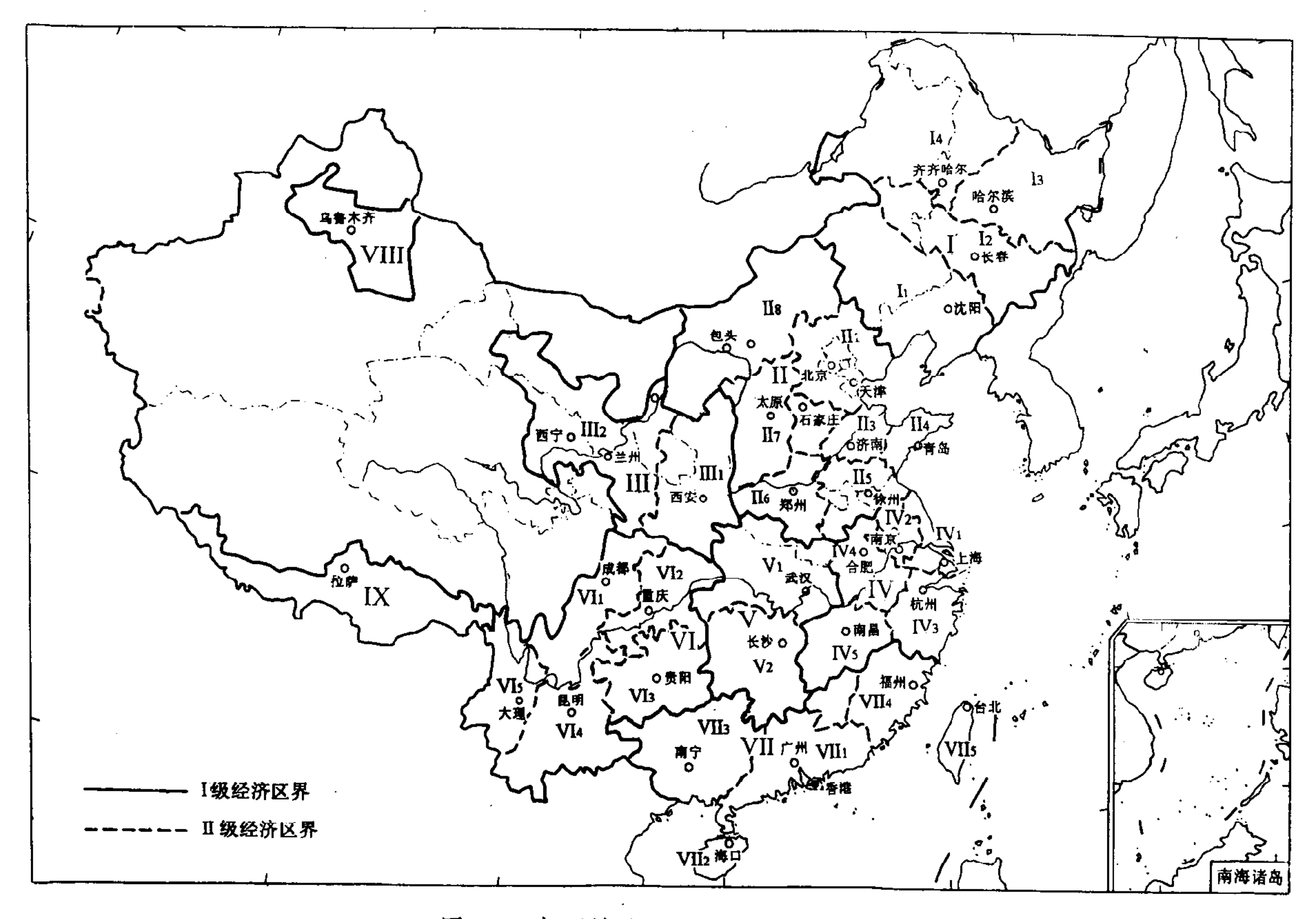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城市经济区区划示意图

第十一章　中国城市经济区组织

国家城市经济区的形成和组建是以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形成、发展和组织为基础的。其过程是:在生产力合理分布的基础上,将历史上形成的现状基础进一步利用改造成完整的Ⅱ级城市经济区,由多个Ⅱ级城市经济区构成国家Ⅰ级城市经济区,再将这些Ⅰ级城市经济区联结成国家经济开发轴线和经济发展地带。根据中国地域经济开发顺序和城市经济区的差异性及类似性,近期(2020年前)拟先建设沈阳经济区、沿江经济区带(包括上海、武汉、重庆3个经济区)、沿河经济区带(包括京津、西安2个经济区)和广州经济区,重点发展沿江经济区带和沿河经济区带,并通过沿海经济的开发将这几个经济区带联为一体。远期(2020年后)建成乌鲁木齐经济区,下世纪中叶(205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开发拉萨经济区。中国城市经济区组织,是两大经济发展地带、三条经济开发轴线、九大城市经济区。

一、中国两大经济发展地带

1. 地域经济开发现状特征

中国地域经济开发是以现状经济发展面为基础的。概括现状经济发展面具有如下3个特征。

(1) **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梯度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客观上存在三大经济地带,最突出的是东、西差异。总的说来,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低,并且由东向西逐步递减。据资料统计,东部沿海地带不仅经济技术水平高,而且财政盈余,地方经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能力较强;而西部地带经济、技术水平低,地方经济效益差,财政拮据,地方经济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较差;中部地带无论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还是经济效益、财政收支状况,均介于东、西两大地带之间。

在中国地域经济开发中,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的硬件和软件也呈东密西疏,由东而西依次递减。所谓硬件是指固定资产、基础设施等的构成状况;所谓软件是指智力、技术、经营管理等的现状基础。据统计,在中国占国土面积71%的中西部地区,只拥有分别占全国37.3%和39.7%的铁路和公路,东部沿海地带的平均铁路网密度和公路网密度分别是中、西部地带的4.7倍和4.6倍。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中、西部每万人平均拥有科技人员的数量明显少于东部地带,如果与国土面积相联系,拥有科技人员的差距则更加悬殊。如按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统

计,西部地区平均约每4平方公里有1人,而东部沿海地带平均每平方公里有3人,其间相差12倍之多。再从劳动者平均文化程度看,在西部人口中不仅大学毕业文化程度者比例小(每1000人中西部为4.2人,东部为10.6人),而且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也显著低下。

(2) **沿海和内地差距继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区域开发资金由原来的依赖政府拨款为主转变为政府拨款、地方自筹、外国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多渠道筹措,东部沿海地带投资环境优越,回报率和经济效益好,重新成为中国区域开发的重点地区。据1980～1987年中国投资分布的空间变化分析,不论是中央、地方和外资在东部沿海的投资均从1980年的46%、49%和55%上升到1987年的56%、57%和81%,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在逐年减少(表81)。再从外国投资看,1979～1992年以来中国实际吸引外资705.3亿美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452.9亿美元,占89.6%,尤其集中在广东、上海、福建、辽宁、北京、江苏、山东、天津等省市。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资本投向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据1992年资料,东部沿海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5%,人口占全国的41.2%,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已经占全国56.5%左右;80年代全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9.3%,而沿海地区达10.3%;1992年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3%左右,而沿海地区却超过18%。这样,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开始起飞,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再加上原来就有的不少差距,沿海和内地空间不平衡进一步扩大。

表 81 中国投资分布的空间变化(1980～1987 年)

区域	中央政府投资(%)			地方政府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		
	1980	1985	1987	1980	1985	1987	1980	1985	1987
东部沿海地区	45.6	50	55.5	48.8	56	56.3	54.7	76	80.9
中部地区	40.7	40	35.5	41.8	35	34.9	23.6	19	12
西部地区	13.7	10	9.0	9.4	9	8.8	21.6	5	7.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内部统计报表(1980),(1985),(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

(3) 中心城市极核作用增强

在中国地域经济系统中,以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城市网络正在形成。从中心城市的辐射强度看,中心城市腹地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与交通运输距离成比例递减,但城市间递减率明显小于所依托省区间的梯度差,表现为中心城市极核作用明显的特征。

就全国而言,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南方高于北方,东部高于西部;中心城市与省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北方大于南方,西部甚于东部。

2. 两大经济发展地带

根据上述中国现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及其地域经济开发程序,可将中国经济发展面划为东、西两大经济发展地带①。

① 这里的东、西两大经济发展地带,不同于"七五"计划中划分的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其划分的依据除考虑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外,更多地考虑资源组合条件和地域经济开发程序,东部发展地带基本上与"七五"计划中东部沿海、中部两大经济地带相吻合,西部发展地带与西部经济地带基本吻合。

（1）**东部经济发展地带**

中国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地域经济开发已具有一定的基础、能源及矿产资源储藏丰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差，今后的发展重点拟逐步建设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和海洋开发基地；重点开发沿江、沿海、沿黄河——陇海铁路线地区的煤炭、石油、水能等能源，以及钢铁、有色金属原材料资源；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贯通沿海、沿江两条主要对外运输通道；改造现有传统工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在产品上打入国际市场，在技术上支援西部经济发展地带的开发。

（2）**西部经济发展地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地带具有极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以及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广阔空间，但这一地带自然环境条件较差，水资源分布不均，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交通通讯设施落后。因此，在地域经济开发程序上宜晚于东部经济发展地带，开发内容以发展交通为先行，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发能源和矿产原材料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加工工业，逐步形成若干地域经济开发的“点”及小型“轴带”。

二、中国三条经济发展轴带

中国现状生产力布局基础，已经形成了纵贯南北的沿海经济轴线和横贯东西的沿江经济轴线的“T”字形空间结构。这也是本世纪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地域开发的两条最主要的经济发展轴线。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战略看，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是中国生产

力布局的重要部门。作为下游油气资源、中游煤炭资源、上游水力资源十分丰富的“能源之河”——黄河及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无疑也将成为中国地域经济开发的第三条潜在轴线。

1. 沿海经济发展轴

沿海经济带是中国现状工业基础最雄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交通通讯线网密集,与国内外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自 1979 年设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1984 年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1985 年初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厦门—漳州—泉州)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来,中国沿海自北而南成为全国地域经济开发最得力、对外最开放的地区。目前,又拟建环渤海湾经济圈,试图实现华北、东北交接地带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体联合。不难看出,加强沿海经济轴带开发,将对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进程,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2. 沿江经济发展轴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水系纵横所及 18 个省、市、自治区,流域面积几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1/5。这里积累和聚集了巨大的生产力,人口占全国 1/3 强,工农业产值则占 2/5。将来长江势必成为中国以至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密集带,其开发潜力极大,发展前景无比广阔。沿江经济发展轴的地域经济开发目标,将以长江为枢轴,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优势,积极开发流域经济,逐步建成内外相联、各具特色、综合发展、开放式的大流域经济轴带,成为中国生产力布局从东向西推进的重要通道。

3. 黄河—陇海铁路沿线经济发展轴

黄河—陇海铁路沿线是中国石油、煤炭、水力等能源资源富集的地带。在这一地带,陇海铁路和黄河横贯东西,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途经苏北、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陕西和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地区,东西长达数千公里。黄河,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又堪称"能源之河";陇海铁路与兰新铁路相接,已成为中国唯一的一条东西两头可能双向开放的陆上大交通线,有横跨欧亚两大洲、沟通三大洋的"大陆桥"美称。在今天,源远流长的黄河和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已将沿线的淮海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黄河上游经济区连为一体,形成了中国仅次于长江流域经济轴带的第二条东西向"经济轴带",将成为中国潜在的仅次于沿海、沿江的第三条经济发展轴线。

三、中国九大城市经济区域

从国家城市分区体系入手,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逐步建立以城市为依托的九大城市经济区域系统。

(一) 沈阳城市经济区

沈阳城市经济区，地处中国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及内蒙古东三盟一市所辖的地区。这一地区无论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特征上看，还是从区域经济联系和历史发展上看，都

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和经济实体，经过长期的地域经济开发，现已成为中国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城市经济区域之一。

沈阳城市经济区，山环水绕，沃野千里，具有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优越条件；全区矿产、森林、农副产品等资源丰富，为区域经济开发提供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区内铁路网密度在全国占居首位，而且还有广阔的海上空间和漫长的海岸线，现已通过铁路网形成一个统一有机的经济网络系统。沈阳城市经济区又是中国最早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基础雄厚，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全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1/10，钢铁和钢材产量占全国1/4，原油产量占全国1/2以上，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1/5，汽车占1/4，机床占1/5，全区固定资产原值居全国各城市经济区之首，是中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鉴于沈阳城市经济区中部经济过分密集，依据现状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表82），区域经济发展拟向辽宁沿海及辽西，吉林东、西部和黑龙江东、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的3盟1市地区推进，建立以沈阳为中心，哈尔滨、大连、长春为辅心的哈大经

表82　沈阳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1989年）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d系	1	沈阳	77.406	Ⅱ级d系	8	吉林	20.774
	2	哈尔滨	49.686		9	本溪	11.349
	3	大连	46.318		10	齐齐哈尔	9.772
	4	长春	30.035		11	锦州	8.630
Ⅱ级d系	5	大庆	27.779		12	辽阳	5.694
	6	鞍山	27.419		13	丹东	4.060
	7	抚顺	21.332		14	牡丹江	3.700

说明：Ⅲ级d系从略

济发展主轴和北部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东部佳木斯—牡丹江—延吉—通化—丹东、西部加格达奇—齐齐哈尔—白城—通辽—锦州的3条经济发展辅轴。整个经济区按4个Ⅱ级城市经济区组织。

1. 沈阳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该区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大连还是全东北主要的对外经济联系、出口贸易窗口。全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由4个城镇群组成。

(1) 大连城镇群

辽东半岛（包括大连市、丹东市、营口市和盘锦市）三面环海，具有辽阔的海域、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众多的港湾，现状加工工业基础较好，是发展海洋经济、建成东北地区出口贸易中心和外引内联前沿阵地的理想地区，拥有外向型经济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随着大东港的建设和后方疏运干线的贯通，将建成全东北东部出海捷径，形成以丹东为中心，大东港、大孤山、凤城、岫岩、宽甸等城镇组成的轻纺、电子工业为主的工业—港口综合体。随着大连港口城镇群的进一步建设，将逐步形成以大连为中心，旅顺、金州为辅心，包括瓦房店、庄河、普兰店等城镇组成的以机械、轻纺、石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外贸和旅游基地，以及全东北最大的金融信息中心和综合港口群。随着辽河油气田的开发和辽东湾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将形成以营口为中心，包括盘锦、盖州、鲅鱼圈、大石桥、大洼、田庄台、熊岳等石油化工为主体的子城镇群。

(2) **沈阳城镇群**

辽中地区(包括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铁岭市、辽阳市和本溪市)矿产资源特别丰富,铁矿资源占全国的20%以上,菱镁矿占全国84%,硼矿占全国的54%,煤、石油、天然气、油页岩、铜、铅、锌等有色金属矿储量也很丰富。沈阳是东北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机械工业基地,区内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最大的石油化纤公司辽化,最大的炼油联合企业抚顺石油公司。现已形成以沈阳为中心的冶金、机械、化工地域生产综合体。目前这一地区大城市密集、水及能源供应紧张、环境污染严重,今后除严格限制大耗水、大耗能企业布局外,拟向辽河流域发展,利用辽河水源、铁法动力煤及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重点建设新台子、铁法、法库、开原、昌图、八面城等城镇。

(3) **锦州城镇群**

辽西地区(包括阜新市、锦州市和朝阳市)素有"辽西走廊"之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随着沿海港口、海洋资源和内地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形成以锦州为中心包括锦西、大凌河、南票、华山、杨家杖子、葫芦岛、大笔架山、兴城等沿海子城镇群和以朝阳为中心包括义州、阜新、北票、凌源等煤炭、有色金属开发为特色的内地子城镇群。

(4) **赤峰城镇群**

内蒙古赤峰市、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与辽宁省邻近,煤炭资源相当丰富,畜牧业和农业都较发达,将形成以赤峰为中心,通辽为辅心,包括霍林郭勒等城镇组成的东北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

2. 长春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吉林省和内蒙古的兴安盟。该区是中国东北大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比较发达,还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森林和有色金属资源,但现状经济开发程度还比较低。全区由长春、白城和通化—延吉城镇群组成。

(1) 长春城镇群

这一地区是长春城市经济区的经济重心所在，农业比较发达，也是中国以行走机械、基本化工为特色的重工业基地，将形成以长春为中心，包括公主岭、四平、双辽（郑家屯）、九台、农安、德惠等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子城镇群；以吉林为中心包括口前、蛟河、舒兰、榆树等以基本化工、煤炭为主的子城镇群；以辽源为中心包括梅河口、烟筒山、磐石、辉南、东丰等以能源开发为主的子城镇群。

(2) 白城城镇群

白城市及内蒙古兴安盟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农牧资源，但现状经济开发程度较低。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和农副产品资源加工业的发展，将形成以白城市为中心，包括洮安、大安、扶余、乌兰浩特和阿尔山等能源、旅游、农副产品开发为主的城镇群。

(3) 通化—延吉城镇群

通化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长白山、龙岗山地及以东地区,区内拥有丰富的森林、有色金属及农副产品资源,是东北亟待开发的主要地区之一。随着和龙—白河段铁路的联通,区内交通状况有重大改观,林业、土特产品资源、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资源

将逐步得到开发，可相应建成以通化为中心，包括浑江、集安、松江河等组成的子城镇群和以延吉为中心，包括龙井、图们、珲春、和龙、汪清、敦化等组成的子城镇群。

3. 哈尔滨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黑龙江省除齐齐哈尔市和黑河地区的大部分地区。该区位居松花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农副产品资源极为丰富，哈尔滨市还是东北北部中心城市。全区由哈尔滨和牡丹江—佳木斯两个城镇群组成。

(1) 哈尔滨城镇群

哈尔滨市、大庆市、松花江地区和绥化地区位居松花江流域，是东北大平原重要的组成部分。区内工农业生产发达，是东北北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工业中心地带，呼兰河流域和大庆市还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开采、加工基地。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包括大庆、安达、绥化、五常、尚志、肇东、肇源、双城、阿城、呼兰、海伦、明水、青冈、望奎等以石油、化工、精密机械为主体的东北北部最大最密集的城镇群。

(2) 牡丹江—佳木斯城镇群

在小兴安岭以东的北部为三江平原地区，农副产品资源极为丰富；南部为长白山余脉地区，是东北林业、煤炭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牡丹江、佳木斯为中心，牡佳铁路为轴线，包括鹤岗、伊春、双鸭山、富锦、名山、同江、饶河、宝清、依兰、七台河、鸡西、密山、莲花、林口、八面通、绥芬河、镜泊湖等城镇组成的以能源(煤炭、电力)工业为主体，森林、建材为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为基础的城镇群。

4. 齐齐哈尔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包括齐齐哈尔市、黑河市、大兴安岭地区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该区是中国重要的林业、畜牧业基地,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和重型机械生产基地。全区由齐齐哈尔、加格达奇和海拉尔3个城镇群组成。

(1) 齐齐哈尔城镇群

齐齐哈尔市和北安市、黑河市的德都县和嫩江县位居中国东北大平原北端,不仅农业发达,也是中国"一五"、"二五"时期的重点建设地区,重型机械、机床、冶金(尤其特种钢)已形成一定的基础,将形成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包括北安、嫩江、讷河、克山、拜泉、依安、富裕、龙江等城镇组成的中国重型机械生产基地城镇群。

(2) 加格达奇城镇群

大兴安岭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林业资源富集地区。随着区内森林资源开发和加工利用,将形成以加格达奇为中心,包括牙克石、扎兰屯、根河、满归、黑河、五大连池、呼玛等城镇组成的林业采伐加工城镇群。

(3) 海拉尔城镇群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是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和煤炭资源富集地区之一。随着区内煤炭、畜产品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利用,将形成以海拉尔为中心,包括满洲里、大雁、伊敏河及呼伦湖等城镇组成的煤炭开采、农畜产品加工城镇群。

（二）京津城市经济区

京津城市经济区，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历史发展上，都是以黄淮海河流域为主体，包括整个华北大平原为统一体而发展、形成的城市经济区。其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5省市区和河南大部分(南阳、信阳地区除外)，内蒙古、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京津城市经济区拥有十分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机械、轻纺、化工工业比较发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棉花、油料、果品生产基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能源诸领域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京津城市经济区位居中国沿海和黄河—陇海经济发展轴线的结合部，从发展的眼光看，这一区域将派生出北部首都经济区和南部青岛经济区。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表83)，整个经济区按8个Ⅱ级城市经济区组织。

1. 京津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和沧州市(不包括吴桥、东光2县)。该区包括了历史上京畿地区及天津、沧州市域范围，是中国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拥有丰富的石油、煤炭、钢铁、农副产品和海洋资源，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它以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华北经济中心和以冶金、能源、化工(盐化工和石油化工)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海洋开发基地为经济发展主要方向。全区由下列6个城镇群组

成。

表 83　京津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1989 年)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 d 系	1	北京	170.927	Ⅱ级 d 系	15	潍坊	9.036
	2	天津	102.225		16	东营	8.747
	3	青岛	32.110		17	烟台	6.414
	4	济南	30.516		18	枣庄	5.008
	5	太原	29.967		19	呼和浩特	4.760
	6	淄博	25.526		20	张家口	4.498
	7	石家庄	22.091		21	保定	3.403
	8	郑州	20.178		22	平顶山	2.604
Ⅱ级 d 系	9	唐山	18.637		23	开封	2.373
	10	洛阳	12.373		24	新乡	2.370
	11	包头	12.190		25	秦皇岛	1.916
	12	徐州	11.744		26	安阳	0.920
	13	邯郸	10.995		27	焦作	0.020
	14	大同	9.859				

说明:Ⅲ级 d 系从略。

(1) 北京城镇群

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市域外围的廊坊、涿州、兴隆及北京卫星城通州、昌平等,组成以政治、文化职能为主的城镇群。

(2) 天津城镇群

以天津为中心,塘沽为副心,包括杨柳青、汉沽、大港、任丘、沧州、泊头、黄骅等城镇组成的华北经济中心,形成以港口贸易、石油开发、海洋化工为主体的滨海城镇群。

(3) 唐山城镇群

冀东具有丰富的煤、铁、建材、旅游资源和良好的建港条件,将形成以唐山为中心,包括秦皇岛、王滩、坨子头、昌黎等城镇组成的以煤、铁、建材、旅游和港口综合开发为特色的城镇群。

(4) 承德城镇群

冀东北文物古迹资源丰富，如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围场及岱尹城址、隆化木兰围场、丰宁凤山戏楼、滦平小城子城址等。随着这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承德为中心，包括隆化、丰宁等以旅游为主的城镇群。

(5) 张家口城镇群

冀西北地理位置优越，是内蒙古高原、晋北地区与京津地区物资交流中转地区，将形成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张北、宣化等城镇组成的皮毛资源加工为特色的城镇群。

(6) 保定城镇群

冀中地区农业发达，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将形成以保定为中心，包括定州、望都、新城等城镇组成的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2. 石家庄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石家庄、邢台、邯郸3市和衡水地区及沧州市东光、吴桥2县。该区是河北省主要农业基地，邯郸市还是中国钢铁煤炭综合基地之一。但本区也是中国主要缺水区之一，据水资源平衡估算，平水年缺水约3.2亿立方米，偏枯年缺水近5亿立方米。根据资源开发条件，区域经济将形成河北省政治、科技、文化、轻工业中心，以能源、冶金、建材和轻纺工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全区由下列两个城镇群组成。

(1) 石家庄城镇群

冀中石家庄市自然条件好、农业发达、交通便捷，为全国铁路三大编组站之一和全国八大纺织工业基地之一，也是中国最大规

模的综合性医药工业基地，将形成以石家庄为中心，包括井陉、辛集、衡水、南宫等城镇组成的以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的城镇群。

(2) 邯郸城镇群

冀南素有“棉海”之称，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著名的焦煤、动力煤和铁矿产区之一，将形成以邯郸为中心，包括邢台、沙河、武安等城镇组成的能源、冶金、纺织工业为主的城镇群。

3. 济南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济南市、泰安市、德州市、淄博市、东营市、滨州地区、聊城地区、青州市、潍坊市的寿光、临朐2县和河南省范县、台前2县。该区是中国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区之一，山东省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所在，也是山东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全区由两个城镇群组成。

(1) 济南城镇群

鲁西北是山东省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省内交通枢纽、政治和文化中心所在，现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机械和食品工业，将形成以济南为中心，包括泰安、德州、聊城、临清、莱芜、新泰等城镇组成的以机械、农副产品加工、交通为特色的城镇群。

(2) 淄博城镇群

鲁西北是中国重要的石油、盐化工基地，淄博现已成为山东省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将形成以淄博为中心，东营为辅心，包括青州、寿光、滨州、乐陵等城镇组成的以石油、盐化工和重工业为特色的城镇群。

4. 青岛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除青州、寿光、临朐)、临沂市沂水县和日照市。本区是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海陆交通方便,经济实力雄厚,工农业生产基础较好,以黄金为主的矿产资源储量丰富,是中国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区之一。全区由以下两个城镇群组成:

(1) 青岛城镇群

鲁东（青岛、潍坊2市）是山东经济最发达地区，青岛既是中国著名的优良港口，也是山东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潍坊还是中国新兴的电子工业城市之一。随着地区“贸—工—农”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形成以青岛市为中心，包括日照、潍坊、诸城、高密、平度、胶州、即墨、安丘、昌邑等城镇组成的外向型经济城镇群。

(2) 烟台城镇群

胶东(烟台、威海2市)三面环海、海岸线绵长、港湾众多、黄金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加工工业基础良好,也是中国主要的海洋捕捞和浅海养殖基地。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将形成以烟台为中心,包括威海、龙口、荣成、文登、莱州、莱阳、招远、石岛、桃村等城镇组成的以轻工食品加工业为主、黄金开采为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城镇群。

5. 徐州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山东省菏泽地区、济宁市、枣庄市、临沂市(除沂水县)，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淮阴市的沭阳、灌云、灌南3县,宿迁市

和盐城市响水县，安徽省阜阳地区、宿县地区和河南省商丘地区。该地区跨苏鲁皖豫4省，是中国重要的两淮兖滕煤炭基地和商品粮基地（现状粮食产量和煤炭储量均占全国1/10左右）。本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黄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今后区域经济将以煤炭开采和粮油生产为主要发展方向。全区由以下5个城镇群组成。

（1）临沂城镇群

鲁南地区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不便，现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沂蒙山区金刚石矿、建材、花生等在山东省占有重要地位，今后将建成以临沂为中心，包括沂水、苍山、台儿庄、岚山头等组成的以建材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2）济宁城镇群

鲁西南煤炭资源、油气资源储量丰富，是山东省新兴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随着资源开发和利用将逐步形成以济宁为中心，包括菏泽、兖州、滕州、曲阜、枣庄、东明、定陶、成武等城镇组成的煤炭、油气资源开采利用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3）商丘城镇群

商丘市域东部煤炭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将形成以商丘为中心，包括永城、夏邑等城镇组成的煤炭开发、烤烟等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4）淮北城镇群

皖西北（包括宿县地区、阜阳地区和亳州市）煤炭资源丰富，酿酒业久负盛名，也是安徽重要的粮、油、果产区，将形成以淮北为中心，包括临涣、宿州、淮西、灵璧等城镇组成的煤炭子城镇群和以阜阳为中心，包括亳州、涡阳、界首等城镇组成的农副产品加工为主

的子城镇群。

(5) 徐州城镇群

徐州煤田是华东煤田的组成部分,连云港建材资源和港口是本区发展的重要优势,将形成以徐州为中心,连云港为出口,包括宿迁、新沂、运河、沛州等城镇组成的煤炭、建材、重型机械、海洋化工和对外贸易为特色的城镇群。

6. 郑州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开封市、郑州市、洛阳市、三门峡市、平顶山市、许昌市区、周口地区、驻马店地区、濮阳市、鹤壁市。该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棉花、烟草等农副产品基地和煤、铁、石油、水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区。区域经济将以煤炭、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要方向,由3个城镇群组成:

(1) 新乡城镇群

豫北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接界处,煤、铁、石油、水资源丰富,既是河南重要的工业区,又是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将形成以新乡为中心,包括安阳、鹤壁、焦作、济源、辉县、濮阳、范县、内黄等能源和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城镇群。

(2) 郑州城镇群

河南省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京广线以东的大片华北平原地区(除商丘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棉花、烟草等农副产品基地,也是中国煤炭、铝土矿资源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将形成以郑州为中心,开封、漯河为副中心,包括平顶山、许昌、驻马店、周口、淮阳、密县等城镇组成的以煤炭、原材料、烤烟等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3) **洛阳城镇群**

河南偃师以西到灵宝县沿陇海铁路两侧黄土分布区,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三门峡、小浪底等水力资源,灵宝金矿、栾川钼矿、铅锌矿等也较丰富,伊洛河谷地还是河南重要的棉花粮食产地,将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包括三门峡、义马、伊川、临汝、陕县、巩义、卢氏等城镇组成的以能源、原材料为特色的城镇群。

7. 太原Ⅱ级城市经济区

山西省和陕北神木、府谷2县是中国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仅山西省探明储量约占全国1/3,预测储量达8700亿吨,主要有大同、宁武、西山、霍西、河东、沁水等六大煤田。区域经济发展以煤炭开发利用为主要方向。全区由5个城镇群组成。

(1) **长治城镇群**

晋燕南沁水煤田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田之一,已探明储量约占中国的1/9,其中无烟煤约占中国的1/2,是中国今后能源开发的最重要地区,将形成以长治为中心,包括安泽、潞城、晋城、阳城、高平等城镇组成的煤炭、电力、煤化工城镇群。

(2) **临汾城镇群**

临汾和运城盆地矿产资源丰富多样,尤以煤炭、铜和芒硝为主,又是山西省重要的粮棉基地,将形成以临汾为中心,包括侯马、河津、垣曲、运城、平陆等有色冶金、盐、煤化工城镇群。

(3) **太原城镇群**

太原、忻定两大盆地拥有山西省92%的铁矿和22%的煤炭资源,现已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串珠式城镇分布体系。随着这一地区西山、古交、阳泉、离石、孝汾、汾西、霍县等大型煤田开发,将进

一步发展为以太原为中心，包括榆次、忻州、古交、清徐、阳泉、离石、孝汾、汾西、霍县、介休、平遥等煤炭、钢铁、机械、化工城镇群。

(4) 大同城镇群

大同盆地是山西省平川最大、水源条件较好、交通方便、地区经济开发水平最高的地区。随着平朔、河保偏、小峪等煤矿及铝土等原材料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大同为中心，包括五寨、原平、平朔、五台、浑源、神府等煤炭、电力、煤化工城镇群。

8. 包头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除东、西乌珠穆沁旗)、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该区草场资源丰富，煤炭资源最为丰富(总储量达1700亿吨)，有色金属、贵金属资源、天然碱、非金属矿和石油等分布广泛，蕴藏量也相当丰富。此外，黄河流域种植业发达，是内蒙古重要的粮油糖产区。全区按两个城镇群组织。

(1) 包头城镇群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既是自治区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是煤炭、铁矿、有色金属、贵金属资源集中分布地区，河套平原是自治区重要的小麦、甜菜、油料作物产区，呼和浩特现已形成中国重要的毛纺织工业基地，包头市是自治区最大的新兴工业城市。随着当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形成以包头为中心，包括呼和浩特、临河、集宁、乌海、东胜、准格尔、白云鄂博等煤炭、钢铁、有色冶金为主的城镇群。

(2) 锡林浩特城镇群

锡林郭勒草场资源丰富，区内石油、天然碱、煤炭储量比较丰

富,此外还拥有内陆口岸城市二连浩特,为发展中蒙贸易和外向型经济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将形成以锡林浩特为中心,包括二连浩特、查干诺尔等组成的牧区城镇和能源、无机化工、皮毛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三) 西安城市经济区

西安城市经济区,在地理上属于中国的内西北区域,包括陕西(除汉中、安康地区)、甘肃、宁夏和青海部分地区。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农耕文化比较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区域之一,只是在封建社会晚期由于政治、经济、自然等方面的因素,地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持续大范围的衰退。新中国建立以来,十分注重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中心城市西安和兰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将来开发大西北的经济增长极地区。

西安城市经济区北部拥有丰富的煤炭、油页岩资源,黄河上游自青海龙羊峡至宁夏青铜峡河段,水头落差 1324 米(其中可利用水头 1084 米),可建成总装机容量达 1300 万千瓦的水电站组群(年发电量在 500 亿度以上),是中国水力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本区有色金属资源也非常丰富,金川有色金属公司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支柱。此外,本区也是中国新兴的电子工业区,西安、咸阳、宝鸡、天水等城市高技术产品和微电子技术开发都已形成相当的基础。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表 84),整个经济区按 2 个Ⅱ级城市经济区进行组织。

表 84　西安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1989 年)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实力指数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实力指数
Ⅰ级 d 系	1	西安	39.941	Ⅱ级 d 系	4	西宁	3.114
	2	兰州	22.866		5	咸阳	-0.416
Ⅱ级 d 系	3	宝鸡	3.654		6	银川	-1.324

注:Ⅲ级 d 系从略。

1. 西安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陕西省、甘肃省的平凉地区和庆阳地区。该区位于中国内陆腹地,是东部和西部两个经济发展地带的结合部,又是连接东北、华北、华东通向西北、西南的交通要地,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现已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全区北部煤炭资源仍较丰富,远景储量 2348 亿吨,探明储量 1000 多亿吨,水力资源也有 1200 万千瓦,是中国能源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本区南部旅游资源也特别丰富,尤以文物古迹荟萃著称;同时也是中国新兴的电子工业区,机械和纺织工业也比较发达。全区由五个城镇群组成。

(1) 西安城镇群

关中盆地是陕西重要的小麦、棉花产区,西安、咸阳、宝鸡已成为中国主要的电子工业基地,将形成以西安为中心,包括咸阳、渭南、商县、宝鸡、金堆等以电子工业为主,机械、纺织、有色金属等为特色的城镇群。

(2) 铜川城镇群

渭北东起韩城,西到彬县、陇县,是著名的“渭北黑腰带”煤炭

基地。随着这一地区煤炭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铜川为中心，包括韩城、合阳、澄浦、大荔、黄陵、彬县、陇县等煤炭城镇群。

(3) **延安城镇群**

陕北煤炭、油页岩资源丰富，随着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延安为中心，包括榆林、绥德、靖边、吴旗等能源型城镇群。

(4) **汉中城镇群**

陕南盆地是西北粮棉茶丝林土特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水力资源丰富，阳安、襄渝铁路通过区内，交通比较方便，将建成以汉中为中心，包括安康、勉县、石泉等城镇组成的农副产品加工和水电城镇群。

(5) **平凉城镇群**

陇东农业基础较好，能源资源丰富，华亭煤炭和长庆油田在甘肃省都占有重要地位。但现状农业结构不合理，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今后这一地区应大力发展能源工业，并充分利用农产品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将形成以平凉为中心，包括西峰、华亭、庄阳、长武等能源和农副产品加工城镇群。

2. 兰州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甘肃省(除平凉、庆阳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的西宁市和海东地区。该区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和有色金属资源，区域经济以水电和有色金属资源开发为主要发展方向。全区由5个城镇群组成。

(1) **天水城镇群**

陇南农业比较发达，水能蕴藏量390万千瓦，成县厂坝铅锌矿、西和县崖湾和礼县白河的锑矿储量丰富，是甘肃省人口分布最

密集地区和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天水市还是中国西北新兴的电子工业城市。今后将形成以天水市为中心,包括成县、西和、礼县、武都、武山和固原等电子、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城镇群。

(2) 银川城镇群

宁夏能源和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丰富的煤炭和黄河水能资源有机组合成为中国西部发展电力工业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银川地区既是宁夏农业发达的引黄灌区,又是贺兰山区煤、水电及有色金属资源集中开发地区。随着地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银川为中心,包括青铜峡、大柳树、石咀山、石炭井、灵武、吴忠、中卫等能源和有色金属工业城镇群。

(3) 兰州城镇群

陇中是黄河上游水电资源最集中分布区,总装机容量可达1000万千瓦。区内有色金属、煤炭资源也比较丰富。随着这些资源的开发,将逐步建成以兰州为中心,包括刘家峡、盐锅峡、白银、靖远、宝鸡、临夏、定西、永登、黑山峡等城镇组成的以能源、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城镇群。

(4) 武威城镇群

河西走廊地区土地资源丰富,现有可耕地约200万公顷,可垦荒地130万公顷,水利资源比较丰富,石洋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总出山地表水达70亿立方米。金川镍矿、塔尔沟钨矿、镜铁山铁矿、玉门油田、山丹和九条岭煤田等矿产资源丰富。今后将形成以武威为中心,包括金昌、山丹、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敦煌、安西等城镇组成以有色冶金、钢铁、石油、机械和农副产品加工为特色的城镇群。

(5) 西宁城镇群

青海东部为黄河源头，水力资源极为丰富，除龙羊峡外还可建设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积石峡、寺沟峡等大中型水电站。此外，本区热水、大通的煤炭、赛什塘和德尼尔的铜矿也比较丰富。西宁市也已形成机械、纺织、缝纫、皮革、食品为主的工业城市。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逐步建成以西宁为中心，包括大通、热水、青海湖、龙羊峡、赛什塘、同仁、门源、平安等城镇组成的以水电开发为主、有色金属开采为辅的城镇群。

（四）上海城市经济区

上海城市经济区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在地理环境、经济开发和历史发展等方面都是一个内部具有密切联系、外部界线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其范围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除徐州、连云港）和安徽省（除阜阳、宿县2地区）。

上海城市经济区，以沪宁杭芜城市连绵带为核心，是中国最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最大的农业基地和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资源开发比较充分，经济实力雄厚，外向型经济发达，科技文化昌盛，专业人才荟萃，人口和城镇密集，具有发达的现代农业（种植、水产、养殖为主）和以轻型加工为主的综合性工业体系。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和d系层次（表85），整个经济区按5个Ⅱ级城市经济区组织。

1. 上海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上海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盐城市。该区是中国人多地少、城镇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既有沪宁铁

表 85　上海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1989 年)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 d 系	1	上海	214.997	Ⅲ级 d 系	12	常熟	3.191
	2	南京	51.359		13	淮南	2.655
	3	杭州	28.349		14	蚌埠	2.534
Ⅱ级 d 系	4	无锡	19.081		15	镇江	2.389
	5	苏州	15.211		16	温州	2.301
	6	南昌	13.550		17	江阴	2.028
	7	宁波	13.393		18	扬州	1.903
	8	合肥	12.860		19	萧山	1.061
Ⅲ级 d 系	9	常州	11.223		20	湖州	0.746
	10	南通	5.506		21	马鞍山	0.730
	11	芜湖	3.218		22	张家港	-0.433

路、长江横贯东西,又有大运河沟通南北,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这里既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源地,又是目前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既是全国以纺织、轻工机械和工艺品等多种生产部门组成的具有综合特征的轻工业基地,也是全国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而且区内还拥有全国著名的风景旅游资源。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如下城镇群。

(1) 上海城镇群

上海地处长江口,沿江濒海,背倚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系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居沿海航线中心,扼长江航运咽喉,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外贸基地,最大的科技中心、信息中心和最大的对外开放港口城市。现在上海核心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今后应改单一中心城市布局模式,走近郊小城市化、远郊中等城市化的道路,逐步建成以上海市区为中心,金山卫和吴淞(宝山)为两翼,包括嘉定、安亭、青浦、松江、闵行、浦

东、高桥、朱家角和芦潮港等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城镇群。

(2) 苏锡常城镇群

苏锡常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南岸(拟包括扬州市、靖江市),沪宁铁路、江南运河贯穿其间,水陆交通便捷,技术力量雄厚,经济繁荣,是江苏省重要外贸出口基地和外向型经济地区,将形成以无锡为中心,苏州、常州为两翼,包括江阴、张家港、昆山、常熟、宜兴、溧阳、靖江等城市组成的轻纺电子工业城镇群。

(3) 通盐城镇群

通盐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北岸、苏北沿海平原东南部,包括南通市所属6县和盐城市区及大丰、东台、阜宁、建湖、射阳、滨海6县,是江苏省重要的粮棉产区,将形成以通榆公路为骨干,南通港为窗口,包括南通、如皋、海安、东台、盐城、阜宁、射阳、洋口等组成的轻纺城镇群。

2. 南京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除靖江市)、淮阴市、马鞍山市、滁州市。该区地处中国东部地带与长江流域交汇处,同时又是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过渡的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京交通中心地位突出,机械、电子、化工工业发达。全区还是中国重要的粮油副食品生产基地。全区由2个城镇群组成。

(1) 南京城镇群

宁镇马地区由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和安徽省滁州市、马鞍山市组成。本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具有比较突出的交通优势,在中国轻重工业综合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将形成以南京为中心，包括镇江、马鞍山、滁州、丹阳、六合、大厂、龙潭、浦口、江浦、板桥、东山和尧化等组成的以机械、电子、化工、石油、原材料、港口为主的城镇群。

(2) 扬州城镇群

淮扬地区是江苏省新兴的商品粮油基地，农业非常发达，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此外，淮阴还拥有中国巨大的地下卤水矿，苏北油田也有良好的开采前景。随着区域农副产品资源和卤水、油气资源的开采，将形成以扬州为中心，包括淮阴、淮安、仪征、泰州、高港、兴化等城镇组成的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3. 杭州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浙江省。该区人多地少，人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良好。全省水能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可开发水力资源 350 万千瓦，但煤炭和黑色金属十分短缺。浙江依山傍海有许多良港可建，综合性农业比较发达，丝绸、机械、食品和饮料加工比较发达。全区由 4 个城镇群组成。

(1) 杭嘉湖城镇群

浙北杭嘉湖平原不仅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蚕丝、茶叶、水产等生产基地和“丝绸之府”，而且区内山川湖海风景秀丽，是中国重要的风景游览胜地之一，将形成以杭州为中心，嘉兴、湖州为辅心，包括萧山、富阳、临平、盐官、德清、长兴、桐乡、海宁、海盐、平湖、嘉善、乍浦等城镇组成的丝绸和外贸加工型城镇群。

(2) 宁波城镇群

宁绍平原地区具有“农、渔、港、景”四大优势，是中国著名的商

品粮、蚕丝、茶叶、水产等生产基地，北仑、舟山海域还是中国难得的深水港和全国重要的海洋水产基地，可成为长江三角洲对外贸易联合港的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将形成以宁波—北仑为中心，包括绍兴、上虞、诸暨、余姚、慈溪、舟山、奉化、宁海等城镇组成的外贸型城镇群。

(3) 金华城镇群

金衢盆地是浙江中部以粮食、生猪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基地和新兴的工业地带，浙赣铁路贯穿区内，交通比较方便，将形成以金华、衢州为中心，包括义乌、永康、兰溪、新安江、淳安、龙游、江山等城镇组成的食品、纺织、化工城镇群。

(4) 温州城镇群

浙东南是中国重要的海洋水产基地、柑桔基地和山林木材之乡，将形成以温州为中心，椒江、丽水为辅心，包括临海、天台、黄岩、龙湾、瑞安、紧水滩、龙泉等城镇组成的以海洋水产、柑桔等农副产品出口加工为特色的城镇群。

4. 合肥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除宿县地区、阜阳地区和亳州市以外的安徽省。该区地处上海城市经济区腹地，襟江带淮，属于沿海地区向广大西部过渡的中间地带。本区农林牧渔全面发展，铁、铜等金属矿产储量丰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全区由4个城镇群组成。

(1) 蚌埠城镇群

淮河流域是安徽省重要的农业地区，以粮食等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饲料和纺织工业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制造工业比较发达。此外，淮南、寿县、叶集、霍丘等地煤炭资源也十分丰富。随

着地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将形成以蚌埠为中心，包括淮南、寿县、叶集、霍丘、明光等城镇组成的食品、煤炭城镇群。

(2) 合肥城镇群

皖中巢湖平原农业发达，轻工基础雄厚，淮南铁路和刚建成的京九铁路都通过本区，合肥市又是安徽省省会和全国四大科技中心之一，将形成以合肥为中心，包括六安、巢湖、庐江等城镇组成的农副产品加工城镇群。

(3) 芜湖城镇群

安徽沿海地带不仅农业发达，而且也是铁、铜、硫铁矿等有色金属富集地区之一，将形成以芜湖为中心，包括铜陵、安庆、当涂、裕溪口、荻港、贵池、宣州、望江、潜山等城镇组成的轻纺、有色金属和港口为主的城镇群。

(4) 黄山城镇群

皖南山区是中国著名游览胜地黄山、九华山所在地，具有风景旅游和林茶土特两方面的突出优势，将逐步建成以黄山为中心，包括屯溪、宁国、祁门等组成的风景旅游兼林茶特产为特色的城镇群。

5. 南昌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包括除赣州地区以外的江西省。该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农业区，也是中国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及许多非金属矿物资源最富集的省区之一。全省具有可开发水力资源 610.9 万千瓦，目前仅开发总量的 14.2%，开发潜力很大。全区由 3 个城镇群组成。

(1) 南昌城镇群

赣北地区北倚长江，鄱阳湖水系在全省扇形展开，河网密布，是江西工业化水平最高、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这一地域经济开发，将形成以九江为中心，包括庐山、星子、湖口、瑞昌、德安等城镇，建立在港口和滨湖农业基础上的建材、石化、纺织、食品工业和风景旅游城镇组群；以南昌为中心，包括樟树、丰城、进贤、临州、南城等城镇组成的机械、纺织、食品为主的城镇组群。

(2) 景德镇城镇群

赣东北交通方便，矿产资源丰富，是江西最重要的铜、铅、锌、陶瓷、机械及粮油茶水产品生产基地。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形成以景德镇为中心，包括鹰潭、波阳、乐平、德兴、贵溪、上饶等城镇组成的全国最大的铜生产基地和驰名中外的瓷器生产中心。

(3) 新余城镇群

赣西地区是江西省重要的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分布区，也是江西煤炭、钢铁、电力的主要生产基地及重要的粮油产区。随着本区煤铁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新余为中心，包括宜春、吉安、井冈山、上高、万安等城镇组成的以煤铁开采冶炼为主的城镇群。

（五）武汉城市经济区

武汉城市经济区，地处长江流域中游，包括湖北、湖南 2 省及豫南盆地。这一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共性明显，彼此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经济联系，它们在中国地理位置“得中独厚”，自然条件“得水独优”，经济比较发达，科技力量相当雄厚，在全国是“承东启西、南北对流”，中心辐射地位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

武汉城市经济区农业比较发达，是中国粮、棉、油、糖的重要生

产区。区内工交、文教、科技均有相当基础，丰富的有色金属和铁矿资源、巨大的水能资源，共同构成了区域开发的资源优势。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表86），整个经济区按2个Ⅱ级城市经济区组织。

表86　武汉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1989年）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d系	1	武汉	67.657	Ⅱ级d系	6	黄石	2.950
	2	长沙	18.195		7	湘潭	2.798
Ⅱ级d系	3	株洲	3.817		8	襄樊	1.587
	4	宜昌	3.083		9	十堰	1.027
	5	衡阳	2.832		10	岳阳	0.269

说明：Ⅲ级d系从略。

1. 武汉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湖北省、豫南及陕南地区。该区交通便捷，工农业比较发达，铁矿、磷矿、水电资源十分丰富，随着水运及资源优势的利用，将形成如下城镇群：

（1）武汉城镇群

鄂东地区地处江汉平原东缘和武汉以东长江谷地，开发历史悠久，农业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铁、铜、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也较丰富，将形成以武汉为中心，包括黄石、鄂州、广济（武穴）、孝感、安陆、咸宁、蒲圻、麻城、应城、大冶、浠水、兴国（阳新）、黄梅、蔡甸、金口、纸坊、阳逻、葛店、黄陂、新洲等城镇组成，按沿江、京广铁路十字分布，以冶金、机械、港口职能为主的城镇群。

（2）沙市城镇群

鄂中地区地处江汉平原，是湖北农业最发达地区，全国重要的

商品粮、棉花、油料和水产基地。全区农副产品资源相当丰富，将形成以沙市为中心，包括荆门、钟祥、沙洋、京山、天门、潜江、仙桃、石首、洪湖等城镇组成的以食品、纺织等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3) 宜昌城镇群

鄂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地带，以山地丘陵为主，区域开发历史较迟，但水力、磷矿、铁矿和风景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中部、也是长江流域重点开发区之一，将形成以宜昌为中心，宜都为辅心，以巨型水电、大耗电高耗能工业、水陆交通枢纽和具有世界意义的风景旅游为特征的集中连片的发达城镇带。整个城镇群将由2个次级城镇组群构成，即以宜昌为中心，包括当阳、远安、宜都、枝城、古老背(红花套)、长阳、枝江、三斗坪、秭归等城镇组成的以水电水运枢纽、高耗能(钢铁、磷化工)工业为特征，具有风景旅游特色的城镇组群；以恩施为中心，包括来凤、利川等城镇组成的以林特产品加工为特色的城镇组群。

(4) 襄樊城镇群

鄂西北地处汉水谷地平原和武当、荆山、桐柏山地丘陵地区，地近中原，开发历史较早，焦枝、宁渝铁路贯穿，交通地位十分冲要，而且拥有丰富的山林特产资源，二汽还是全国汽车工业中心之一。随着区域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充分利用，将形成以襄樊为中心，包括十堰、老河口、丹江口、浪花、枣阳、随州、广水、神农架、房县、宜城、胡集等城镇组成的轻纺、机械、农林土特产品加工城镇群。

(5) 南阳城镇群

豫南盆地是河南省重要的水稻、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石油、煤炭和多种原材料矿藏丰富，又是河南"小三线"建设工业集中分

布地区之一，将形成以南阳为中心，信阳为辅心，包括邓县、云阳、镇平、潢川、固始、商城、明港等城镇组成的以能源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2. 长沙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湖南省。该区湘江北注洞庭湖与长江相接，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区内锑、锰、钨、煤和瓷土比较丰富，现已形成以冶金、机械、化工、纺织和食品为主的工业体系。整个经济区由下述4个城镇群组成：

(1) 岳阳城镇群

湘北地区地处洞庭湖平原，农业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轻工、食品、石化已具一定基础，将形成以岳阳为中心，包括常德、津市、张家界、石门、慈利、益阳、沅江、汨罗等城镇组成的轻工、化工城镇群。

(2) 长株潭城镇群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经济重心所在，区内工农业已形成一定基础，水陆交通便利，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将形成以长沙为中心，株洲、湘潭为辅心，包括醴陵、浏阳、攸县、湘乡等城镇组成的有色冶金、机械、轻纺、食品为主的城镇组群和以邵阳为中心，包括娄底、冷水江、新化等城镇组成的以煤炭、钢铁、电力为主的城镇组群。

(3) 怀化城镇群

湘西地区尽管近代经济开发最迟，但却拥有多种丰富的林特产品、矿产和水力资源，枝柳、湘黔铁路贯穿全区，是一个新兴的待开发地区。随着地域经济开发，将形成以怀化为中心，包括吉首、

洪江、溆浦、沅陵等城镇组成的水电、林特产加工、风景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群。

(4) 衡阳城镇群

湘南地区以山地丘陵和山间盆地为主,林业基础较好,常宁水口山铅锌矿、郴州钨、资兴煤、衡阳重晶石和水力资源也较为丰富。随着山区资源开发利用,将形成以衡阳为中心,包括衡山、耒阳、常宁、郴州、资兴、冷水滩、永州、道县等城镇组成的以有色金属、水电开发为主的城镇群。

(六) 重庆城市经济区

重庆城市经济区是以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地域单元。范围包括四川、云南、贵州3省。

重庆城市经济区地域辽阔,煤炭、铁矿、磷矿、有色金属与水能资源相当丰富,森林和畜产品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重庆城市经济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线"建设形成的新型城市经济区。在这一地区,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交通运输的落后状况有了初步改善,煤炭、电力、天然气等能源工业有了较大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工业有了一定基础,机械工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电子工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基本上建成为中国战略后方国防工业的生产、科研基地。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表87),整个经济区按5个Ⅱ级城市经济区组织。

表 87 重庆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1989 年)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 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 d 系	1	重庆	45.150	Ⅱ级 d 系	9	泸州	-1.062
	2	成都	41.173		10	六盘水	-1.356
	3	昆明	20.610		11	遵义	-1.750
	4	贵阳	19.549		12	宜宾	-3.542
Ⅱ级 d 系	5	攀枝花	1.216		13	德阳	-3.730
	6	自贡	-0.319		14	江油	-3.729
	7	绵阳	-0.483		15	内江	-4.109
	8	乐山	-0.953		16	曲靖	-4.811

说明:Ⅲ级 d 系从略。

1. 成都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包括成都市、绵阳市、雅安地区、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该区地处成都平原和攀西地区,农业发达,交通便捷,水能资源达 4920 万千瓦,是中国水能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区内矿产资源以铁、钒、钛、钴和芒硝等为主,也是中国综合利用价值很高、全国少有的资源宝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平原已逐步建成中国重要的电子企业群,机械和轻纺工业已占有重要的优势。全区由成都和攀枝花 2 个城镇群组成。

(1) 成都城镇群

成都平原是四川省最重要的商品粮、油、棉、猪基地,已基本建成以机械、化工、食品纺织为主的工业体系,其中电子工业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绵阳、乐山、内江为副中心,包括广元、江油、绵竹、德阳、什邡、广汉、灌县、三台、射洪、遂宁、邛崃、简阳、资阳、资中、眉山、峨眉、雅安、五通等城镇组成的以机械、电子、轻纺工业为特色的城镇群。

(2) **攀枝花城镇群**

攀西地区素有“聚宝盆”美称，现已查明这里矿产多达79种，铁矿储量居全国前列，钛资源居世界之首，煤炭、石灰石、白云石、森林及水力等资源也特别丰富，而且资源集中分布，是中国西部建设冶金、能源、稀有金属等基地的理想地区。此外，西昌还是中国重要的航天中心基地之一。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利用，将逐步形成以攀枝花为中心，包括西昌、德昌、盐原、昭觉、石棉、龚咀、铜街子、锦屏、二滩、桐子林、米易、会(东)宁(南)、雷波、木里等城镇组成的冶金、能源城镇群。

2. 重庆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包括重庆市、自贡市、泸州市、宜宾市、涪陵市、万县市、南充市和达川地区。该区地处川东南，南部天然气、盐卤、煤炭资源丰富，北部煤、铁资源丰富，农副林特产品多样，中心城市重庆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不仅是四川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而且也是开发、建设大西南的重要基地。全区由重庆、自贡2个城镇群组成。

(1) **重庆城镇群**

川东地区地形起伏，属山地丘陵地区，长江河谷地带具有丰富的天然气、煤炭和泥灰岩资源，三峡地区、乌江沿岸和重庆附近也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热区之一。现状区内已形成以机械、食品纺织、化工、冶金等为主的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以机械、食品、纺织、化工、冶金等为主的工业体系，机械工业在全国将占有更重要的地位。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形成以重庆为

中心，包括江津、合川、长寿、涪陵和綦江等机械工业为主的城镇群和以万县、达县、万源、奉节等城镇组成的农副林特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2) 自贡城镇群

川南长江谷地是四川主要的茶叶、烤烟、楠竹生产基地，也是煤、天然气、岩盐、硫铁矿、磷矿分布地区。此外，水能资源也很丰富，仅金沙江最下游段的两个梯级就可开发近1500万千瓦。随着本区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形成以自贡为中心，包括泸州、宜宾、隆昌、荣昌、内江、资中、永川、溪罗渡、向家坝、筠连、叙(永)古(蔺)等城镇组成的食品、化工、能源城镇群。

3. 贵阳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贵州省。该区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丰富，是全国八大能源富省区之一，铝土矿、磷矿、锑矿和锰矿的保有储量分别占全国总储量的14.8%、19%、16%和18.6%，现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基地。此外，贵州还是中国的烟、酒生产基地。全区由4个城镇群组成。

(1) 贵阳城镇群

贵阳市和安顺地区是贵州省商品粮、烤烟、油料为主的综合农业生产基地和最大的综合工业区。区内还拥有开阳—瓮安—福泉磷矿、清镇和修文铝矿等大型矿产基地，将逐步形成以贵阳为中心，包括黄果树、安顺、平坝、清镇、龙里、惠水、修文、息烽、开阳、瓮安、福泉等以有色金属、磷化工、卷烟为特色的城镇群。

(2) 凯里城镇群

都匀、凯里、贵定现已形成为中国重要的电子企业群之一。随

着这一地区资源的利用和经济开发，将逐步形成以凯里为中心，包括贵定、都匀、独山、榕江、镇远和玉屏等城镇组成的以电子、机械、木材加工和造纸为特色的城镇群。

(3) 遵义城镇群

黔东北地处乌江流域，乌江干流从贵州普定到四川彭水沿岸地区，水能蕴藏量丰富，可装机620万千瓦，开发9个梯级电站，铝、磷、锰矿保有储量分别占全国的18%、19%和11%，煤炭资源也较丰富。随着这一地区水力、煤炭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遵义为中心，包括南白、桐梓、松坎、仁怀、正安、印江、铜仁等城镇组成的以冶金、能源为特色的城镇群。

(4) 六盘水城镇群

黔西位于“攀西”和“乌江沿岸地区”两个国家重点综合开发区之间，是中国江南最大的炼焦煤基地，将建成以六盘水为中心，包括纳雍、织金、黔西、金沙、大方、毕节、赫章、威宁、兴仁、兴义、册亨等以煤炭开采为主的城镇群。

4. 昆明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包括昆明市、东川市、曲靖地区、玉溪地区、文山州、红河州、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和楚雄州。该区地处云贵高原西部，交通比较方便，开发历史较早，工农业已有一定基础。区内北部磷、铜、铁、煤矿资源丰富，南部锡、镍等有色金属矿产非常丰富，西南部还是中国大陆唯一的热带地区。本区经济发达，已成为云南经济的核心地带。全区由3个城镇群组成。

(1) 昆明城镇群

滇东北人口稠密，工农业生产发达，煤炭资源丰富，水力资源

蕴藏量大,有色金属、磷、烟草等农副产品资源也很丰富。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形成以昆明为中心,包括呈贡、宜良、华宁、玉溪、晋宁、易门、楚雄、曲靖等城镇组成的机械、卷烟、冶金、磷化工开发为主的城镇群和以东川、一平浪、会泽、田坝、昭通、水富等城镇组成的有色金属、水电、煤炭、化肥城镇群。

(2) 个旧城镇群

滇东南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个旧已成为全国著名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随着区域有色金属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个旧为中心,包括开远、文山、红河、墨江等有色金属开采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城镇群。

(3) 思茅城镇群

滇南是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但本区人口稀少,经济实力薄弱。随着热带作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形成以思茅为中心,包括四家村、景洪等热带作物加工、水电开发为主的城镇群。

5. 大理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丽江地区、大理州、德宏州、怒江州和迪庆州。本区位于闻名中外的横断山纵谷区,交通极其闭塞,但资源丰富,有世界著名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的三江水力资源和闻名于世的兰坪大型铅锌矿,有以暗针叶林为特色的滇西北林业资源和高山草场资源,还有独具一格的高山峡谷和多民族风格融为一体的旅游资源。现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发展潜力较大,又因地形阻隔,故独立划为一个Ⅱ级经济区。全区按地形组成2个城镇群。

(1) 大理城镇群

滇西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贯穿全区的澜沧江具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可开发量达2000万千瓦，其中仅漫湾、小湾和功果桥3个梯级电站装机容量即可达480万千瓦。兰坪金顶铅锌矿是中国最大的铅锌矿，探明储量达1400多万吨。此外，本区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大理名城历史悠久，苍山、洱海久负盛名。随着这些资源的开发，将建成以大理为中心，包括丽江、漫湾、兰坪、小湾、功果、弥渡、永胜、华坪和六库等以水电、有色金属开发为特色的城镇群。

(2) 保山城镇群

滇西南是中国通往缅甸及南亚次大陆的陆上往来的捷径和通道，区内生物资源、大理石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地域资源和地理位置的利用，将形成以保山为中心，包括滕冲、芒市、畹町、云县、临沧等城镇组成的以林特药茶加工、旅游和边境贸易为特色的城镇群。

（七）广州城市经济区

广州城市经济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港澳地区和台湾省[①] 所辖的地区。这一地区在地理上皆以丘陵山地为主，兼有河谷平原和沿海平原，拥有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天然良港及丰富的海洋资源；在经济开发上，自唐宋以来即具有与海外经济、文化、科技的广泛交流历史。

随着港澳回归，大陆与台湾统一，这一地区将成为亚洲东部重要的海运枢纽，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的最重要

---

① 台湾省暂未列入论述。

地区。

广州城市经济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环境基础。具体表现在:①本区地接港澳,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区内已设置厦门、汕头、深圳、珠海、海南5个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带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地带,随着近期港澳、远期台湾省的回归统一,台湾的高雄—基隆、福建的厦门—漳州—泉州和广东的广州及香港地区无疑将成为亚太地区实力雄厚的“金三角”地区之一。②商品经济发展历史悠久,自唐以后,广州和泉州一直就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商业港口城市。鸦片战争以后,从台湾海峡到北部湾海岸逐渐形成为现代港口城市群,初步形成了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中心体系。③广东、福建是中国著名侨乡,旅外侨胞占全国3/4左右,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美洲地区。④丰富的海上石油和水能资源。本区尽管煤炭工业储量共约13.6亿吨,其中具有经济开采价值的不足5亿吨,是中国主要的缺煤地区。但全区水力、海洋能和海上石油相当丰富。据初步统计,水力蕴藏量达3300多万千瓦,总发电能量约相当于每年4500万吨标准煤。仅据福建三沙湾、闽江口、杏林湾等21处港湾初步调查,可供开发利用的潮汐能蕴藏量在1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1200万吨标准煤。沿海北部湾、莺歌海、珠江口、琼东南、台湾西南、管事滩北、巴拉望西北、札东太平、曾母暗沙—沙巴、中建岛西等沉积盆地均存在巨厚含油地层,估计地质储量约6.49～66.2亿吨,是中国继东北、渤海湾后第三大油气田集中分布地区。此外,本区许多名贵的热带和亚热带经济作物及果类、铁矿和有色金属矿产也较丰富。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表88),整个城市经济区

按2个Ⅱ级城市经济区组织。

表88 广州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1989年)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d系	1	广州	94.483	Ⅱ级d系	9	佛山	6.627
	2	深圳	28.280		10	中山	6.508
	3	福州	13.729		11	珠海	5.774
Ⅱ级d系	4	东莞	9.320		12	湛江	4.875
	5	汕头	8.776		13	江门	1.364
	6	柳州	8.612		14	韶关	1.248
	7	南宁	8.064		15	桂林	1.163
	8	厦门	8.038		16	海口	-0.603

说明:Ⅲ级d系从略。

1. 广州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广东省(除湛江市)和江西赣州地区。该区是中国仅次于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的第三大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基地,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粮食、蔗糖、桑蚕、塘鱼和水果产地,其地理位置毗连港澳,水陆交通和商品经济都比较发达,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重要地区。经济区按如下4个城镇群组织。

(1) 汕头城镇群

粤东地处韩江流域沿海平原,是中国著名侨乡(约占全国华侨1/3),汕头港是中国华侨最主要的出入港和对外贸易港之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看,将逐步形成以梅县为中心,包括兴宁、水寨、汤坑等城镇组成的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城镇组群;以汕头为中心,包括榕城、棉城、澄海、黄冈、海门、棉湖、流沙、惠来、甲子、碣石、海丰、汕尾、陆丰等城镇组成的沿海港口出口加工城镇组群。

(2) 广州—香港城镇群

珠江三角洲及三江干流腹地区域是中国经济和城镇都比较发达的地区，外向型经济形成一定的基础，随着港澳回归祖国，将形成以广州、香港为中心，包括深圳、东莞、佛山、番禺、大良、中山、珠海、澳门等城镇组成的珠江口城市圈和三江流域地区惠州、河源、清远、怀集、肇庆、云浮、开平、新会、台山、容奇等城镇共同组成的以出口加工为主体的城镇群。

(3) 韶关城镇群

粤北地处北江流域，北依南岭山地，京广线纵贯中部，是华南、华中交通要冲，广东省煤、铁、钨、烟、茶等资源集中分布地区。随着地区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韶关为中心，包括乐昌、英德、连州、南雄等城镇组成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城镇群。

(4) 赣州城镇群

赣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分布地区和江西省的林业地区，今后将逐步建成以赣州为中心，包括宁都、瑞金、于都、崇义、大余、全南、定南、信丰等城镇组成的以有色金属和森林资源开发为特色的城镇群。

2. 海口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海南省和广东省湛江市。该区是中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中国最大的热带作物区，1988 年建省，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四面环海，本岛岸线长 1617.8 公里，拥有大小港湾 68 个，主要渔港 24 个，不仅有发展海洋养殖、捕捞的广阔前景，而且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方便的海上通道。海南近海还分布有北部湾、莺歌海和琼东南油田，据估计仅天然气可采储量就达 500 亿立方米。此外，石碌铁矿、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莺歌海

盐场、兴峰岭木材、大厂坝水力资源、崖县磷矿和海南风光均有很大开发价值。但全省能源严重不足，交通通讯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投资能力差和科技力量薄弱等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全区由5个城镇群组成。

(1) 海口城镇群

琼北在海南岛开发中历史最早，现已发展成为全岛最主要的粮食和甘蔗产区。海口市不仅是全岛的中心城市，也是海南对外门户。随着秀英港、国际机场的建设和对外开放，将形成以海口为中心，包括洋浦、儋县、白马井等城镇组成的外向型经济、对外出口加工城镇群。

(2) 清澜城镇群

琼东是海南农业生产基础最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海南重要的热带作物产区。沿海有清澜湾，还是全国最主要的钛砂矿产地。此外，文昌、琼海都是海南重要的侨乡。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将形成以清澜为中心，包括长坡、加积、万城、乌场港的城镇组成的东部沿海城镇群带。

(3) 三亚城镇群

琼南具有十分丰富的热带旅游资源，莺歌海盐田久负盛名。随着旅游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三亚为中心，包括通什、陵水等城镇组成的以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群。

(4) 八所城镇群

琼西矿产、土地、水力资源丰富，是中国富铁矿石最主要产地之一，但本区也是海南经济实力最弱的地区。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将建成以八所为中心，包括昌化、石碌等城镇组成的冶金、石化、建材等重工业基地和现代化畜牧业基地。

(5) 湛江城镇群

粤西位居热带地区,拥有丰富的油页岩、磷、海盐等矿产资源和种类繁多的热带经济作物,北部湾石油储量又极为可观,是中国重要的新兴热作基地和石油化工基地,远期将形成以湛江为中心,包括茂名、阳江、阳春、高州、化州、电白、吴川、徐闻等城镇组成的以石油化工、海洋化工、磷化工为主体的城镇群。

3. 南宁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广西全区。该区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东西部发展地带的交汇点,是大西南出海的重要通道。全区水能资源丰富,蕴藏量约达1800万千瓦。区内锰矿储量居全国首位,其它有色金属矿也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桂林山水甲天下",为区内发展旅游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今后应根据资源优势,以开发水电、锰和有色金属、旅游资源为主要发展方向。全区按以下3个城镇群组织。

(1) 梧州城镇群

桂东地处桂江和浔江流域,西江是广西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之一。区内山地丘陵绵亘,锰、锡等有色金属储量丰富,人口比较稠密。随着区域经济的开发,将逐步形成以梧州为中心,包括桂平、玉林、贵县、贺县、苍梧、平南、容城、北流、富川等组成的以有色金属和农副产品为特色的城镇群。

(2) 柳州城镇群

桂北以铁路为主的交通十分便利,现已成为广西最大的煤铁开采和机械工业生产基地。区内水能蕴藏量丰富,全部开发可装机1000万千瓦以上。此外,本区锡保有储量约占全国37%,居全

国之首，锑居全国第二位，均具有大规模综合开发的条件。随着区域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柳州为中心，桂林、河池为辅心，包括全州、平东、合山、来宾、融水、宜山、南丹、鹿寨、融安、兴安、荔浦、阳朔、龙胜等城镇组成的以能源、原材料开发为特色的城镇群。

(3) 南宁城镇群

南宁盆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重要工农业生产基地，区内铅锌、钴、煤等矿产资源比较丰富，还拥有800多公里海岸线，北海港已成为中国南方对外贸易港口之一。随着地域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南宁为中心，包括黎塘、凭祥、崇左、渠黎、苏圩、五塘、钦州、防城、北海、檩圩等城镇组成的以机械、有色金属、化工、食品、造纸等为特色的城镇群。

4. 福州Ⅱ级城市经济区

范围为福建省。该区地理位置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是中国大陆吸引台资、兴办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地区。全区水力资源十分丰富(1000多万千瓦)，铁、铅锌、钼、锰、钨、铀、铜和煤矿都有分布，又是中国台胞最集中的地区。随着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区域资源的开发，也将建立福建省外向型经济体系。经济区按下述城镇群组织：

(1) 福州城镇群

闽东北地当闽江流域与沿海交接地带，沿海地区钼、铜、铅锌、铝土矿资源储量丰富，三都澳、罗源湾、福州琯头等都是中国难得的深水港湾，随着区域资源、港口的开发和外向型经济体系的建立，将形成以福州为中心，包括马尾、沙埕、三都澳、罗源、涵江、宁德、琯头、福清、福安、平潭、南屿、潭头、金峰、海口、龙田、高山等沿

海港口城镇组成的外向型经济城镇群。

(2) 厦门城镇群

闽东南地处九龙江、晋江下游和木兰溪流域，与台湾隔海相望，自然条件优越，沿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浅海滩涂面积广大，是吸引台资、兴办出口加工工业的理想地区，将形成以厦门为中心，包括莆田、湄州湾、德化、南安、泉州、石狮、漳州、东山、诏安等城镇组成的闽南三角区外向型经济城镇群。

(3) 三明城镇群

闽西南是福建仅次于闽北的第二林业和烤烟基地，最大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基地(其中煤炭约占全省总储量85%左右、铁矿占75%、锰和钨矿均占90%以上)，将形成以三明为中心，包括龙岩、永安、漳平、沙县、长汀、河田、坎市等以重工业为主的城镇群。

(4) 南平城镇群

闽西北是福建省最大的木竹、水电和煤炭生产基地，将形成以南平为中心，包括建瓯、建阳、邵武等城镇组成的煤、电、木、竹生产为主的城镇群。

(八) 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区

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区是中国地理上的外西北区。在地理环境上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草原、沙漠、戈壁广布，高山、盆地南北相间，自然资源优势突出，干旱区城镇发展特色明显的特点。这一地区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建设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特殊性。由于这一地区地域空间广大，城市实力比较薄弱，现状经济区的范围还只局限于乌鲁木齐

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塔城地区的乌苏县所辖的地区。远期随着区域资源的开发和中心城市的发展,将逐步分为乌鲁木齐、库尔勒、伊宁、塔城、喀什、格尔木6个Ⅱ级城市经济区。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和d系层次(表89),整个经济区按下述城镇群组织:

表89　乌鲁木齐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d系层次(1989年)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d系层次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Ⅰ级d系	1	乌鲁木齐	13.689	Ⅲ级d系	9	喀什	-6.794
Ⅱ级d系	2	克拉玛依	-0.596		10	昌吉	-7.187
	3	石河子	-3.779		11	吐鲁番	-8.117
Ⅲ级d系	4	哈密	-6.479		12	和田	-8.290
	5	库尔勒	-6.391		13	博乐	-8.439
	6	阿克苏	-6.237		14	阿勒泰	-8.577
	7	伊宁	-6.262		15	塔城	-8.979
	8	奎屯	-6.400		16	阿图什	-9.403

(1) 吐鲁番城镇群

吐鲁番盆地是中国长绒棉、葡萄、水果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区内煤、铁、盐等矿产十分丰富,还有约150～200万亩荒地资源亟待开发。随着新疆经济开发重心南移,将逐步形成以吐鲁番为中心,包括鄯善、七泉湖、大河沿、托克逊等城镇组成的果品酿造和铁、煤、盐等原材料开发为主的城镇群。

(2) 乌鲁木齐城镇群

乌鲁木齐及其周围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重点开发、建设的粮食、棉花、甜菜生产基地和综合性工业基地。这一地区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工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基础。鉴于水资源短缺,中

心城市人口规模应进行适当控制，逐步形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昌吉、阜康、米泉、吉木萨尔、奇台、木垒等城镇组成的煤炭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3) 乌苏城镇群

乌苏是北疆各地、市联系的枢纽，区内农牧业发达。绿洲以奎屯河为主，三河六库总径流量 14.5 亿立方米，地下水总储量 5 亿立方米，现状人均占有水量达 5250 立方米，水资源相当丰富。本区克拉玛依油田储量丰富，还有煤炭、盐类、芒硝、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均具有很大的开采价值。现状兰新铁路已由乌鲁木齐西延乌苏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随着地域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乌苏为中心，包括克拉玛依、石河子、奎屯、独山子、沙湾、玛纳斯等城镇组成的石油开采加工、轻纺机械、交通枢纽、农副产品加工城镇群。

（九）拉萨城市经济区

拉萨城市经济区，位居中国青藏高原，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上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就全国城市经济区发展水平而言，本区最为薄弱。由于城市发育不充分，而且中心城市实力非常弱，现状经济区范围仅仅局限于雅鲁藏布江谷地的拉萨市、林芝地区、江孜地区、山南地区和日喀则地区所辖的范围。

拉萨城市经济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之间，雅鲁藏布江谷地和藏南山地地区。本区是西藏最主要的农牧基地，人口最集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水力、地热、土地、森林资源最富集的地区。西藏重要城镇拉萨、日喀则、泽当、林芝、江孜、扎木、拉孜等都分布于此，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表 90　拉萨城市经济区城市实力指数及 d 系层次(1989 年)

序号	城市名	城市实力指数
1	拉　萨	-6.367
2	日喀则	-10.367

依据现状城市实力指数和 d 系层次(表 90),整个经济区按下述城镇群组织。

(1) 林芝城镇群

雅鲁藏布江谷地东部是西藏水热条件良好的地区之一,在林芝、波密、米林等地为中心的区域,水能资源充沛,交通运输便利,森林蓄积量占全藏 1/3,具有开采和木材加工的优越条件。自 50 年代以来,本区森林资源开始采伐,已成为西藏全区主要用材基地。随着本区水力和林业资源的开发,将逐步形成以林芝为中心,包括八一、波密、墨脱、日敏、日果等城镇组成的以水电、木材采伐加工为特色的城镇群。

(2) 拉萨城镇群

雅鲁藏布江谷地中部一江两河地区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农业区,现状拉萨河、年楚河流域还有大量的宜农荒地有待开垦,是西藏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商品粮基地。本区地热资源丰富,旅游资源富集,传统手工业发达,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网基本形成。随着区域水力、草场、耕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形成以拉萨为中心,包括泽当、当雄、羊八井、尼木、浪卡子、贡嘎、加查、朗县、亚东、帕里等城镇组成的水电、农牧资源加工、传统手工业、旅游职能为主的城镇群。

(3) 日喀则城镇群

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高峰林立，水能资源丰富，农牧业发达，旅游资源得天独厚。随着区域水力、旅游资源的开发，将形成以日喀则为中心，包括仁布、江孜、拉孜、萨嘎、岗米、古如、仁庆顶、帕布、彭错木、定日、聂拉木等水电、旅游、畜产品加工为主的城镇群。

第十二章　中国城市影响区

城市影响区，简单地说，就是中心城市所能达到的影响范围，即中心城市对于周围地区的投资区域选择、市场分配、产品流通、技术转让、产业扩散、信息交流、人才流动等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所及的最大地域范围。

一、城市场及其外部效应

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地，由于城市—区域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在地理空间客观存在着邻接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我们称这种城市—区域系统为城市场，其相互作用为城市场的外部效应。

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即距离城市愈近，外部效应愈强，反之亦然。我们可用简图(图 14)形象地表示如下。

如图 14 示，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去分析，可进一步将城市影响强度曲线表述为随距离衰减的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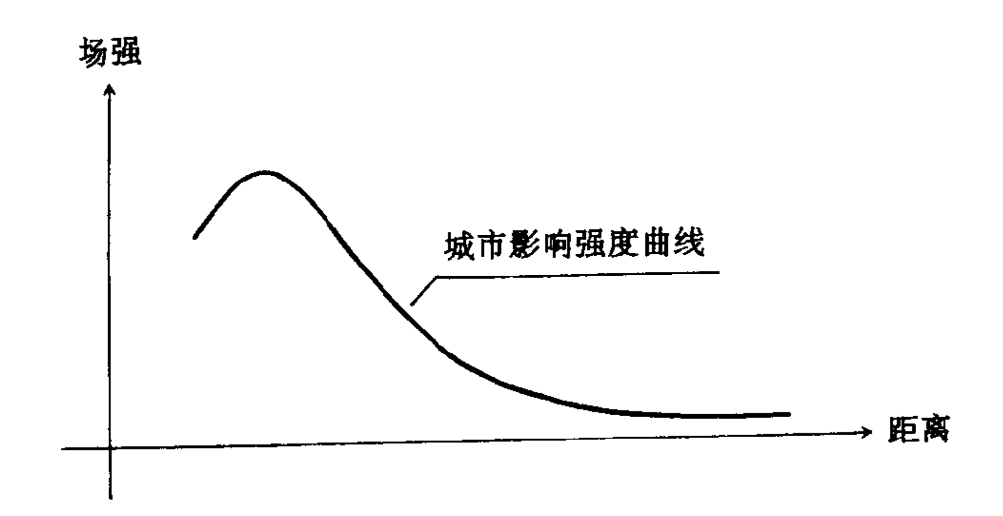


图 14　城市影响强度曲线

$$E = \iint D_0 e^{-b} dD$$

式中：E —— 城市影响强度指数；

D_0 —— 初始城市影响强度；

D —— 距初始点的距离；

b —— 参数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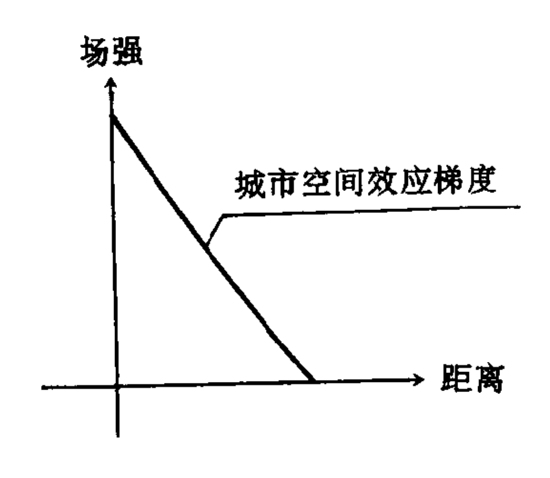


图 15　城市场外部效应梯度

从理论上讲，一个具备区域有益效应的城市，对其周围空间范围的影响是无限的，但是在现实交通通讯技术水平下往往又都是有限的。因为在地理空间中总存在一系列点，当它们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达到一定数值时，由城市所产生的地理空

间外部效应即告消失(图 15)。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向外扩散的有益效应具有各向同性的特性,即从中心开始其效应向外的扩散和传播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都是相等的,将城市空间效应梯度线绕纵坐标旋转一周就形成了城市外部效应圆锥体。如果进一步按照某一阈值范围进行城市效应强度的划分,就能分别获取不同的城市外部效应场(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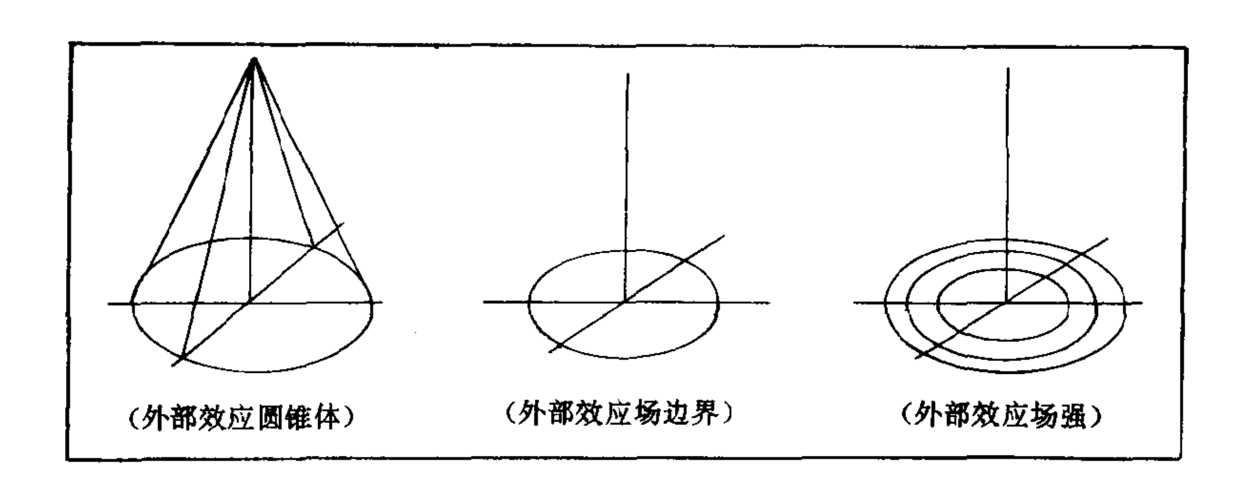


图 16　城市的外部效应场

综上所述,每个城市在地理空间上都存在自己的外部效应场,这种外部效应场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城市影响区。

二、城市—区域系统分析

城市影响区是一个充满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系统内各种流态是维系系统存在的物质基础,系统特性则成为一个系统区别于其它系统的理论基础。

1. 城市—区域系统流态分析

在任何一个有机的实体系统中,都客观存在着各种输入转化输出过程,我们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将这种过程称为“流”(flows)。概观城市—区域系统各种各样的“流”,不外乎人口和物质从分散向集中高密度集聚,能量从低质、低强度向高质、高强度运转,信息从无序向有序连续积累,货币在流通中增殖等 4 个方面。我们可进一步将城市—区域系统的各种流概括分类为下述 5 种流态。

(1) 人流

这一流态主要指城市居民到周围地区,周围地区居民到城市的日常活动。这种流动包括三方面:①有规律的人口流动,如上下班、上学放学等定点活动;②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如购物赶集、旅游出差、探亲访友、就医看病等的流动;③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边缘区的转移。

(2) 物流

这一流态主要指城市为了维持自身的功能,不断地输入输出物质的过程,主要反映在城市到周围地区的货物运输和商品批发等活动。

(3) 技术流

这一流态主要指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技术转移和协作活动。具体表现在 3 个方面:①城市对技术水平较低地区的技术转移;②城市对技术水平较高地区的技术引进;③城市对技术水平相似地区的技术协作。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今天,城市区域间的技术流必然表现为由高到低、由复杂到简单的逐级扩散和流动。

(4) **信息流**

这一流态主要指城市—区域间的信息交换。一方面城市输入大量的分散无序的信息,另一方面城市又输出经过加工集中的有序信息,这种信息的交换将城市及周围地区联为一体。信息流主要通过电信(电话、电报、电传等)和邮递(信函、报纸杂志、包裹)等流量流向反映。

(5) **资本流**

这一流态主要是指城市—区域间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以货币为表现形态的一种运动形态,主要通过银行转账的资金融通量来反映。

2. 城市—区域系统特性分析

城市—区域系统既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又具有地域差异性、区内相似性和发展阶段性等个性特征。

(1) **城市—区域系统的地域差异性**

由于历史和现实情况,不同地区的城市生产水平(包括劳动工具进化程度、劳动对象性质及数量、劳动力素质及组合方式、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不同,资本、物资、信息等要素在城市—区域系统中的输入量、输入方式及作用结果也不相同,产出物的种类、流通渠道和资本周转速率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性构成了各城市—区域系统的基本特征,人们能够根据这些特征将某个城市—区域系统与另一个城市—区域系统区别开来。

(2) **城市—区域系统的内部相似性**

在一个城市—区域系统中,尽管有许多性质不同的城市和城

镇组成,但它们之间职能上互补使城镇群内部联系相当密切,从而也就使这一城市—区域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在运动形式上具有同一性,在经济结构上必然存在一个能够反映区域特点,并能与环境协调一致的主体结构。与此相对应,这一系统内的各个城市,无论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在劳动手段和方式、商品或产品流通形式以至资源和产品的消费状况等方面,都打上了更深一层中心城市影响的烙印。

(3) 城市—区域系统的发展阶段性

城市—区域系统是在动态变化中发展的,任何城市—区域系统都有一个演化过程。由于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展,城市—区域系统的物质内容与数量、城市群经济结构及其内部能量、物质运动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整个城市—区域系统也因此在时序上呈现不同的面貌,在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呈现若干阶段。

3. 城市经济影响区划分方法

正是上述城市—区域系统的流态和个性特征,为城市经济影响区的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依据这个基础,我们在城市经济影响区划分时,除对可能影响范围分析(主要包括区域自然地理特征,行政管理等级系统,社会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等方面分析)外,主要运用流分析法对上述5种流态进行流向流量分析。即,①流向分析,主要包括交通网络、通讯网络、邮递网络等方面的分析;②流量分析,主要包括原材料及半成品流量、资金融通量、产品扩散、技术转让、商品流通、信息传输和客货流量等方面的分析。

三、城市扩散范围分析

中心城市作为周围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系统内部存在5种流态，而且这5种流态对其周围地区的作用范围不尽相同。怎样才能确定一个中心城市的影响区区界呢？我们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进行讨论。

（一）中心城市地位分析

济南市地处山东省中部，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是山东省省会，也是黄河下游最大的城市。

济南市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省重要的行政机构、52所大专院校均集中于此。此外，科研力量雄厚，现有科研机构达122个，其行政、文化、科技服务范围覆盖全省。

济南市也是山东省的重要工业基地，工业具有比较雄厚的基础，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近年来市区工业总产值一直居全山东各市（市区）第二位，已形成了以机械、轻纺、化工为支柱的多门类工业体系，许多产品在全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济南市交通发达，通讯设施先进，北接京津，南通宁沪，东连胶莱，京沪、胶济铁路在此交汇，10条主要公路干线贯通省内外，已经开工建设的遥墙机场和先进的电报（104条）、长话电路（555条）与全国各主要城市联系密切，也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通讯

枢纽之一。

济南市位居齐鲁腹地，北接鲁西北平原，南邻鲁中南山地，东连胶东半岛，自古以来就是全省商品流通、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目前设有11个2级批发站担负直接供应菏泽、惠民、聊城等地区以及河南、河北等近50个县的批发业务，其辐射面远远超出济南行政区域。

根据前述中心城市实力指数综合评价，济南与青岛2市同为山东省第一级中心城市，且城市实力指数略高于青岛市。

（二）可能影响范围分析

城市经济影响区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可能影响范围往往与所处的地理单元相吻合，其形成与发展也是以历代政区演变为基础的。

山东省地形以平原为主体，地势中部高、四周低。从地形的概貌看，全省从东到西分成3个不同的地貌类型区：胶东丘陵区、鲁中南山地区和鲁西北平原区。济南市正位居鲁中南山地区和鲁西北平原区的交叉过渡地带，城市经济影响区的可能范围也是以这两个地理单元为基础，并随着历代政区演变而形成的。

在遥远的年代，济水自中原流来，经过今济南市北面直奔大海。在济水南岸的山区古时地表径流又形成一条武原河汇入济水。城子崖就是作为这一广大流域范围的中心城镇而兴起、发展起来的。殷商以后这一中心城镇虽因战乱城址屡有迁徙，或平陵，或台城，或历城，但作为鲁中南、鲁西北两大地理单元的中心地却

是始终存在的。甚至到晋永嘉以后，历城就一直成为这一地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从济南作为政治中心地统领的行政辖区看，北魏时的齐州就曾领辖东魏、东平原、东清河、广川、济南、太原6郡35县，其范围就与这两大地理单元相当。元时运河漕运大兴，大小清河又是盐运主要通道，其统辖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整个大清河下游各县直至利津海口。明代济南府统领泰安州、德州、武定州和滨州4州26县，其辖区也基本上覆盖了鲁中南山地区和鲁西北平原区。只是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由东明直注菏泽，分流至张秋镇，突穿运河奔大清河入海，从此从交通上阻隔了济南与黄河以北地区的联系。

近代胶济铁路的建设，尤其1912年津浦铁路黄河大桥的建成，济南市又一次冲破了黄河的交通阻隔，进一步形成为鲁中南和鲁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城市。

济南市历代政区范围演变见表91。

（三）扩散范围分析

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人流、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的流动与交换实现的。现在让我们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济南城市经济影响区的划分。

1. 人流影响区

人流是反映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城镇和乡村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联系的标志之一。但是由于中国交通部门仅有客运量统计，缺乏具体的流向流量统计，无法反映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

表 91　济南市政区演变统计表

时间	政区名	政区范围	总面积 (km^2)
汉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	济南郡	（不详）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济南郡	历城等14县	
北魏皇兴三年（公元469年）	齐州	东魏郡、东平原郡、东清河郡、广川郡、济南郡、太原郡共35县	
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	齐郡	历城、祝阿、临邑、临济、邹平、章丘、长山、高苑、亭山、淄川等10县	
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	齐州	历城、章丘、临邑、临济、长清、禹城等6县	
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	济南府	历城、禹城、章丘、长清、临邑等5县	
金（公元1128～1213年）	济南府	历城、临邑、齐河、章丘、禹城、长清、济阳等7县（济南成为路级司法机关驻地）	
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	济南路	济南路直辖历城、章丘、邹平、济阳4县及2州：棣州及所属厌次、商河、阳信、无棣4县；滨州及所属渤海、利津、沾化3县，共2州11县	
明	济南府	历城、章丘、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河、齐东、济阳、禹城、临邑、长清、肥城、青城、陵县；泰安州、新泰、莱芜；德州、德平、平原；武定州、阳信、海丰、乐陵、商河；滨州、利津、沾化、蒲台共4州26县（济南成为山东省省会）	28790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济南府	历城、章丘、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河、齐东、济阳、禹城、临邑、长清、陵县、德州、德平、平原等16处州县	14100

续表

时间	政区名	政区范围	总面积(km^2)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	济南道	历城、章丘、邹平、淄川、长山、桓台、齐河、齐东、济阳、长清、博兴、高苑、博山、泰安、新泰、莱芜、肥城、惠民、阳信、无棣、滨县、利津、乐陵、沾化、蒲台、商河、青城等27县	
1940年	济南道	历城、长清、章丘、齐东、齐河、济阳、邹平	
1957年	济南市	历城1县	
1958年	济南市	历城、章丘、长清、新泰、莱芜、宁阳、泰安7县(市)	12130
1958年	济南市	历城、章丘、肥城、平阴、宁阳、莱芜、新泰、泰安、新汶9县(市)	14182
1960年	济南市	历城、章丘、肥城、宁阳、莱芜、新泰、泰安、新汶8个县(市)	12946
1961年	济南市	历城1县	1913
1978年	济南市	历城、章丘、长清3县	4875
1985年	济南市	历城、章丘、长清、平阴4县	5775

资料来源:《济南市情》(1949～198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客运联系,我们在济南市采用了客运班次流量流向的调查以达到满足济南市人流影响区划分的要求。

据1989年济南市发送客运班车(含个体)调查,日发送客运班次797次,其中除济南4郊县外,泰安、德州、聊城、淄博和菏泽5城市(地区)日发送客运班次最多,共发659次,占总班次82.69%;潍坊、济宁、滨州次之,共发送81次,占总班次10.16%;东营、枣庄、临沂、青岛、威海、烟台最少,仅发班车59次,约占总班次7.4%。从分市县客运班次统计看,尤以章丘、泰安、聊城、张店、德

州、临清、平阴、长清、菏泽、郓城、肥城最多,日发送客运班次均在20次以上,济南市人流影响区大致也就在距中心城市150公里范围内(表92)。

2. 货流影响区

货流是测度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以交通线为载体进行联系的综合指标。从货物流通联系看,济南对其周围地区的货物运输仍以初级产品运输为特色,货流运输方式以铁路为主,公路次之,水运和航空仅占很小比重,表现出公路以短途运输为主,铁路以中长途运输为主的特点。因此,就山东省而言,铁路货运分布基本上代表了中心城市济南到各城市的货流分布特征。

从济南及其周围地区铁路货运流量流向看,境内京沪铁路货流分布最为集中,且下行运量大于上行运量,货运密度超过5000万吨/公里以上;胶济铁路次之,下行运量也大于上行运量,货运密度大约在3000万吨/公里左右。以济南为枢纽的京沪、胶济铁路全路段货流密度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认为济南市的货流影响区大体在德州、淄博和泰安市域范围内。

3. 商品批发区

中国中心城市的商品批发主要有5个部门,它们是五金、交电、百货、纺织和日杂。商品批发区以百货批发范围最为接近。

从济南市商品流通联系看,历史上一直与其周围40多个县有密切往来。据调查,1949年前由于交通不很方便,济南一直就是鲁北以及河北、河南一部分地区农副产品输出、工业品输入的主要商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并建立了相应的

表 92 济南市不同流态空间分布表 （1989 年）

距济南直线距离（公里）	县市名	客运班次（次）	百货批发额（千元）	技术协作项目（项）	《济南日报》发行量（份）	长途电话频度（‰）	银行转账额（万元）
0～25	历城		5849	2		13.39	
25～50	长清	21	592	5	1699	22.10	
	齐河	6	369	27	60	10.03	1314.5
	济阳	13	758	14	16	7.48	1141.6
	禹城		1098		12	4.21	
	章丘	141	1135	8	9610	35.30	
50～75	泰安	53	2489		9	64.31	
	肥城	21	901		79	11.93	3394.0
	平阴	26	1894	4	3112	12.59	
	茌平				9	3.31	
	高唐		970		5	3.45	
	临邑		1039	5	7	3.79	
	商河		704		2	3.79	
	邹平		1046		11	5.68	
75～100	东阿		1030			2.74	
	平原		714	11	2	4.26	
	周村		1055			10.46	
	莱芜		1191		13	7.62	3393.7
	博山		2121			12.07	
	淄川		2098			5.82	
	淄博	38				48.98	
	高青		664		2	0.71	
	陵县		244		3	3.36	
	夏津		418		1	2.41	
	聊城	40	824		12	25.98	
	东平		1681		3	3.03	904.3
100～125	德州	26		24		33.83	
	临清	24	3868		11	6.53	
	汶上		368			2.03	
	宁阳		1904		3	4.83	
	兖州					8.09	
	曲阜				4	6.39	
	泗水		213			1.89	

续表

距济南直线距离(公里)	县市名	客运班次(次)	百货批发额(千元)	技术协作项目(项)	《济南日报》发行量(份)	长途电话频度(‰)	银行转账额(万元)
	新泰		1501		9	10.50	3141.6
	沂源					3.93	
	桓台		627			5.30	
100～125	博兴		686			1.89	
	滨州		1387			13.58	2814.5
	惠民		2610		2	4.26	386.4
	阳信		1192			0.95	198.9
	乐陵		276			2.79	
	宁津					2.08	
	武城		309			1.42	
	庆云		158	10		0.71	
	无棣		883		2	1.70	203.5
	利津		695			0.66	
	青州						
	临朐						
	蒙阴					3.50	
125～150	平邑				5	1.70	
	邹县					5.73	
	济宁					50.02	
	梁山		413			4.07	
	台前						
	阳谷		1243			3.17	
	莘县		732		2	1.47	
	冠县		1185		16	1.14	
	广饶		610			1.61	
	郓城	22	793			1.47	
	菏泽	28				21.58	
	垦利		1601			0.66	
	曹县		445			1.28	
>150	定陶		1056				
	青岛			15			
	烟台			5			
	潍坊			6		51.53	

续表

距济南直线距离(公里)	县市名	客运班次(次)	百货批发额(千元)	技术协作项目(项)	《济南日报》发行量(份)	长途电话频度(‰)	银行转账额(万元)
>150	寿光				16		
	日照				3		
	单县				3	1.75	
	临沂					25.65	
	东营					20.73	
	枣庄					15.33	
	滕州					7.52	
	微山					2.56	
	沂南					2.37	
	薛城					2.13	
	鱼台					1.42	

行业批发站,济南、青岛同为山东省境内两个2级批发站,与济南百货站有直接供货关系地区就包括东至淄博市、惠民地区,西至聊城、菏泽,北至德州地区(甚至南部的兖州和河南商丘也是济南货物的转运站)约42县(有时扩大到46个县)。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渠道,其供货范围进一步扩大,据交电、百货、日杂3个批发站调查,目前济南市与山东省内有业务联系的达八九十个县(市)。我们依据济南百货站和青岛百货文具批发公司1987年1—12月对各市县商品批发额进行分析,济南市百货批发范围囊括了山东省淄博市、东营市、济宁市、聊城地区、泰安市、滨州地区、德州市、菏泽地区的48个县市和河南省范县、台前县以及河北省临西县,其商品批发范围大致也在距中心城市150公里以内。

4. 技术转移协作区

广义的中心城市技术流影响区包括转移区、引进区和协作区。确定城市经济影响区范围时，重点研究转移区和协作区更具有意义。

根据1987年济南市对外技术协作项目和济南市主要企业集团成员厂调查，济南市技术转移协作区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较低的德州地区、聊城地区和菏泽地区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的泰安市域和胶东半岛等地区。转移区以齐河、德州、济阳、平原、庆云、章丘、临邑、长清为主，协作区以青岛、潍坊、烟台为主。从空间分布看，技术转移区一般距中心城市较近，大致在100公里以内；技术协作区分布较广，可达150～200公里(表92)。

5. 报纸发行区

中国现状的报纸发行，大报(日报)以单位订阅为主，小报(晚报)以个人订阅为主。因此，确定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分析中心城市晚报发行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济南市目前除发行《济南日报》外，没有发行晚报。但山东省的《大众日报》社创办有《齐鲁晚报》。我们对1988年全省各地汇订《齐鲁晚报》份数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它的发行范围是全省性的。具体地说，全省117个市县行政区，1988年汇订的市县区就有96个，占总数的82.05%。

鉴于此，我们连续调查了山东省两个中心城市济南、青岛的日报分市县发行量，《济南日报》发行区大于《青岛日报》发行区，其范围大致包括了济南、泰安、德州、滨州、济宁、聊城、临沂、菏泽和潍

坊等市、地区约37个县。报纸发行区以四郊县最为集中，发行范围扩展到距济南市100公里（表92）。

6. 省内长话区

长途电话是中国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联系的一种主要通信手段，而且中国长途通话流量流向抽样调查数据准确可靠，除去行政中心对通话量的影响外，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中心城市的实际影响范围。

依据山东省济南、青岛1987年12月7日至9日长途通话流量流向调查分析，济南、青岛的长途通话范围均是覆盖全省的。考虑济南市是省会城市，行政因素的通话量多于青岛，我们进一步取其相对量（‰）分析，得出济南、青岛2市长话区的模糊带在下列县境内：①淄博市临淄区；②东营市垦利、利津、广饶3县；③潍坊市寿光、临朐、昌乐3县及青州市；④滨州地区的阳信、无棣、沾化、博兴、高清5县；⑤临沂市及其郯城、苍山、费县、沂南、临沭6县市以及菏泽地区各县市。依据各市县与中心城市济南、青岛的长话联系频度对这一模糊带进行再划分，除潍坊市域寿光、临朐、昌乐3县及青州市、淄博市临淄区、临沂地区郯城、临沭2县为青岛市长话区外，其余均可划入济南长话区内。再对济南市长话区内与济南市域接壤但又非郊区县的长话联系强度进行分析，可知原德州市辖的齐河、济阳2县与济南的长话量比与其周围市县的长话量还要多，这说明这两个县与济南市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根据上述一系列分析，可划出济南市省内长话区为：①章丘、长清、历城、平阴、齐河、济阳与中心城市长话联系最为密切，构成了济南市长话区的核心圈；②泰安、淄博、济宁、博山、肥城、新泰、

周村、兖州、莱芜、滕州是除上述6县市外与济南长话联系比较紧密的地区，它们与核心圈共同构成了济南长话区的内层圈；③其余市县共同构成了济南市长话的外层圈。据统计，济南长话区包括了山东省内79个市县，河南省2个县和河北省1个县，共82个市县，这个圈层约在距中心城市200公里的范围内。

7. 资金融通区

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银行转账是资本流作用的具体表现。中国银行系统由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组成，其中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监督和考核其它专业银行工作，本身没有业务活动。中国银行主要办理外贸活动的账目，各市县的外贸原材料收购都由它办理，但它仅是代理业务，故中国银行与外地的金融往来都由其他专业银行办理。据此，我们仅需调查分析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联行业务总量就能充分反映中心城市的资金融通区范围。

8. 综合影响区

我们实地调查了济南、青岛及其周围淄博、泰安、德州、聊城、临沂等7城市1986～1987年对外（山东省内）银行转账额。从这些资料分析可得济南的资金融通区。具体地说，济南资金融通区为：①济南市郊4县；②泰安市辖莱芜、新泰、肥城和东平4市县；③原德州市辖齐河、济阳2县；④滨州地区辖滨州、滨县、惠民、阳信、无棣、沾化6市县，合计共16市县范围，主要分布在距济南约125公里范围以内。

四、中国城市影响区组成及其边界特征

1. 城市影响区组成

综合以上济南经济影响区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国城市影响区由下述4个圈层组成：

(1) 核心区

这一地区包括济南市现辖章丘市和长清、平阴、济阳、商河4县，以及与济南市域接壤的齐河县。目前齐河与济阳2县有黄河大桥相联，从经济联系强度看，齐河与济南的联系大于与德州的联系，现已发展成为济南市的经济核心区的一部分。

(2) 直接腹地

禹城市、肥城市、新泰市、莱芜市与济南市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是济南市的直接经济腹地。

(3) 间接腹地

泰安市辖的东平、宁阳2县，菏泽的郓城县、济宁的梁山县，聊城地区、德州市(除齐河、禹城)、滨州地区的无棣、阳信、惠民、博兴、邹平等市县，淄博市的高青县，与济南都有不同程度的经济联系，它们共同构成济南市间接经济腹地。

(4) 过渡带

由于东部中心城市青岛市的影响，现济南与青岛之间形成比较宽的影响区过渡带。这一地带主要有滨州市、东营市、淄博市、青州市、潍坊市域的临朐，临沂市的蒙阴、平邑等市县组成。

2. 城市影响区边界特征

城市经济影响区作为理性概念时,它并不具有实实在在、固定不变的区界。概观上述济南经济影响区的划分,就边界而言具有如下明显特征:

(1) 模糊性

城市经济影响区是城市经济职能对周围地区作用的综合反映。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空间作用错综复杂,在地域经济系统中,不同的经济因素形成不同的经济影响区。然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影响区,不是以经济区界网络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不同的经济联系方式存在,例如客流区、货流区、商品批发区、报纸发行区、技术协作区、长话区和资金融通区等。每一种经济因素对应相应的作用范围,而且这些作用范围均不可能完全重合。因此,经济影响区界线通常模糊不清,而且往往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一个逐渐过渡的地带。

(2) 动态性

城市经济影响区范围主要受中心城市实力大小的制约。一方面,由于现代城市经济职能日益处于主宰地区经济的地位,各种经济部门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城市经济实力也就处在时时刻刻的变化之中。另一方面,在现代区域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是城市发展的根本规律,市际竞争必然导致区域内城市间的消长盛衰。很显然,这两大因素必然形成了城市经济影响区范围的分化、裂解和蚕食,区域界线并不是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不同因素的变化经历着不断交替演化过程。就山东省而言,随着烟台、淄博经济实力的壮大,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改变济南、青岛2市经济影响区范围。

(3) **重叠性和轮空现象**

城市经济影响区是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作用范围的客观反映。每一个中心城市都有与之等级相对应的经济影响范围。在地域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竞争明显，城市经济影响区边界往往交叉或重叠出现比较宽的经济影响区过渡地带，如济南和青岛两市经济影响区过渡地带即达 50～100 公里左右。在地域经济水平比较低下的地区，由于中心城市实力非常弱，数量比较少，也会出现城市经济影响区范围的轮空现象。但不管经济影响区的过渡地带还是经济影响区的轮空地带，都是周围城市经济发展共同袭夺的区域。

(4) **层次性**

城市经济影响区是中心城市空间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心城市实力受距离衰减规律的作用，城市经济影响区的边界又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如济南市经济影响区就能清楚地划分为经济核心区、直接经济腹地、间接经济腹地和过渡地带 4 个不同的层次。

3. 城市影响区大致范围

根据济南市城市影响区划分，中国城市影响区的核心区大约在距中心城市 50 公里的范围内，直接腹地约在 50～75 公里范围内，间接腹地一般在 75～125 公里范围内，过渡带则可达到 125～200 公里甚至更远。

第十三章 中国大都市密集区

一、大都市密集区的概念

大都市密集区,顾名思义,就是一系列大都市相对集中分布的一定区域,它是区域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大都市密集区的概念与英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Jean Gottmann)的 Megalopolis 密切相关[①]

1957 年,戈特曼把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用原意为巨大城邦的希腊语 Megalopolis 来命名,说明这一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纽黑文、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功能性地域。但是,戈特曼的 Megalopolis 概念比较笼统,这给后来其它大城市密集区域的研究参考带来了一些混乱。

在中国,对 Megalopolis 的译法很多,理解上也不尽相同。如巨大城市、特大城市区、特大城市群、大城市密集区、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带等各种译法和修正说法。由此可见,这里的大都市密集

---

① Jean Gottmann: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Economic Geography*, Vol.33, No.3, 1957.

区还未形成一套严密的学术概念体系,还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

一般来说,大都市密集区的形成要经历以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集中型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人口与产业向城市集聚,形成人口、产业、资本、技术高度集中的大都市。第二阶段是集聚与扩散并行的阶段。一方面,人口与产业继续向大城市集聚;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高度集聚,使中心区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城市用地开始向用地潜力大的郊区扩展,在郊区出现了新的居住区和工业区,即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现象。由此而在中心城市外围形成了与中心城市社会经济联系密切的郊区,与中心城市共同组成了大城市圈或大都市区。第三阶段大都市密集区形成阶段。在一定区域内,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很强的大都市发展而成的多个大都市区基本相连,形成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地域范围相当广的大都市密集区。

可见,大都市密集区的形成与大都市以及大都市区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如何确认和划分大都市区成为研究大都市密集区的关键。

二、大都市区和大都市密集区的划分

如上所述,大都市区是由中心城市和与其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共同组成的城乡一体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确定一般依人口规模而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郊区的划定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有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等各种指标可以帮助划分,但是

实际能收集到的资料十分有限,要明确划分出一个大都市的郊区就相当困难。另外,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的定义与划分

大都市区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美国。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模式和发展规模迅速变化。一方面城市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使人口、资金、技术以更快的速度向大城市和大城市周围地区集聚。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交通高度发达,城市由长期的向心集聚向相对分散的郊区化发展,随城市高收入阶层从中心区外迁后,工业、服务业也出现郊区化倾向。城市集聚和分散的两方面因素造成城市地域迅速扩张,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的、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乡一体化区域,这一区域即为大都市区。引入大都市区概念的最初目的是将大都市区作为一个统计单元,进行城市人口统计。1910年,美国人口统计首次采用了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的概念,规定其人口规模在20万以上。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一统计概念也不断得到修正。1950年提出的"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略为SMA)以及1960年人口普查中使用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略为SMSA)即如此,其基本定义是:至少有一个人口达到5万人以上的中心城市,或者是包括总人口达5万人以上的两个相连城市的县;邻接县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英里150人以上,劳动力的75%以上从事非农业活动,并且15%以上向中心市通勤。与美国的SMSA类似,英国有SMLA

(Standard Metropolitan Labor Areas)，加拿大有 CMA(Census Metropolitan Area)，日本有 REC(Regional Economic Cluster)和 FUC(Functional Urban Core)等。

（二）中国大都市区的划分

1. 中国大都市的人口规模

在中国，除少数特大城市外，绝大多数城市仍处于以向中心城市集聚为主的外延式膨胀阶段，郊区化现象并不明显。一般来说，50 万人口以下的中等城市更表现为强烈的向心集聚，城市边缘组团和卫星城市发育不明显，城市形态呈同心圆块状，不完全具备大都市区的普遍特征。因此在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大都市区是指以大于 5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地区。

2. 大都市区地域界限的划分

中国目前对大都市区的划分，主要依据行政区划界限和区域内部联系程度两方面。

中国大城市行政区分为城区、郊区、市辖市和市辖县 3 个地域层次，这 3 个地域层次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并可反映现代城市与周围地区的联系。市辖县是中心城市的最直接腹地，同时也是中心城市主要卫星城市和副中心的所在地。由于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大城市行政范围是大城市政治经济活动在地域上联系最密切的地区，所以行政区划界限成为确定大都市区界最简便的方法。

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程度，指中心城市与周围卫星城市和其它

小城市在人口、物质、资本、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联系程度，比行政区划界限更能客观地反映大都市区内部结构特征。内部联系程度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口流动规模，由周围小城镇与中心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判定小城市是否位于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内。这方面，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用通勤比率为指标。

在中国城市中，通勤的概念以及通勤现象等与西方国家城市完全不同，有关通勤的统计资料也不具备，因此依据通勤比率来划分中国的大都市区不大可能。

孙胤社以北京市为例，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与通勤率有一定可比性的客流量为指标，划分出了北京大都市区，即是月客流比例在50%以上的邻接县的范围；并且通过客流成因的分析得出，邻接县的非农业人口比例和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是两大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在目前缺少客流量统计、资料收集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用周围县的非农业人口比、非农业劳动力比及非农产业比等容易取得的指标来划分大都市区的范围。如邻接县的非农产业占75%以上，非农业劳动力比例在60%以上等划分方法[①]。

（三）中国大都市密集区的划分

关于中国大都市密集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从大都市密集区的概念到其划分方法等都处于探讨阶段。一般来说，大都市密集区必须是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大都市区在地域上大致相连的区域。

---

① 赵永革：《机制·发展·调控——辽中南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5年6月。

按照孙胤社的大都市区的划分原则以及尝试划定，目前在中国城市最密集的4个地区，大都市区已有了较充分的发展，大都市密集区的雏形已经形成，它们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4个大都市密集区（图17，表93）。另外，中国正在形成的大都市密集区还有以下一些地区：①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及胶东半岛地区，以济南、青岛为核心，以海岸线和铁路干线为轴线，包括烟台、威海、龙口、淄博、潍坊、曲阜等城市；②闽东南沿海地区，以福州和厦门为核心，包括泉州、漳州等城市；③四川盆地地区，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包括绵阳、乐山、内江、自贡、泸州、涪陵等城市；④湘中地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以周围小城镇为外围，包括韶山、湘乡、醴陵等城市；⑤中原地区，以郑州为核心，包括洛阳、开封及周围小城镇；⑥关中地区，以西安为核心，以陇海铁路为轴线，包括咸阳及外围的宝鸡、渭南、韩城等城市；⑦松嫩平原地区，以哈尔滨为核心，以滨洲、滨绥铁路为轴线，包括齐齐哈尔、大庆以及周围其他城市；⑧江汉平原地区，以武汉为核心，以长江为轴线，包括鄂州、黄石等城市和临近小城镇。

表93 中国主要大都市密集区概况

区域	总人口（万人）	特大城市（个）	大城市（个）	中等城市（个）	小城市（个）
长江三角洲	7191.3	8	4	5	27
京津唐	3225.0	3	1	1	44
珠江三角洲	1694.0	1	1	5	11
辽中南	2287.5	4	5	7	1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3～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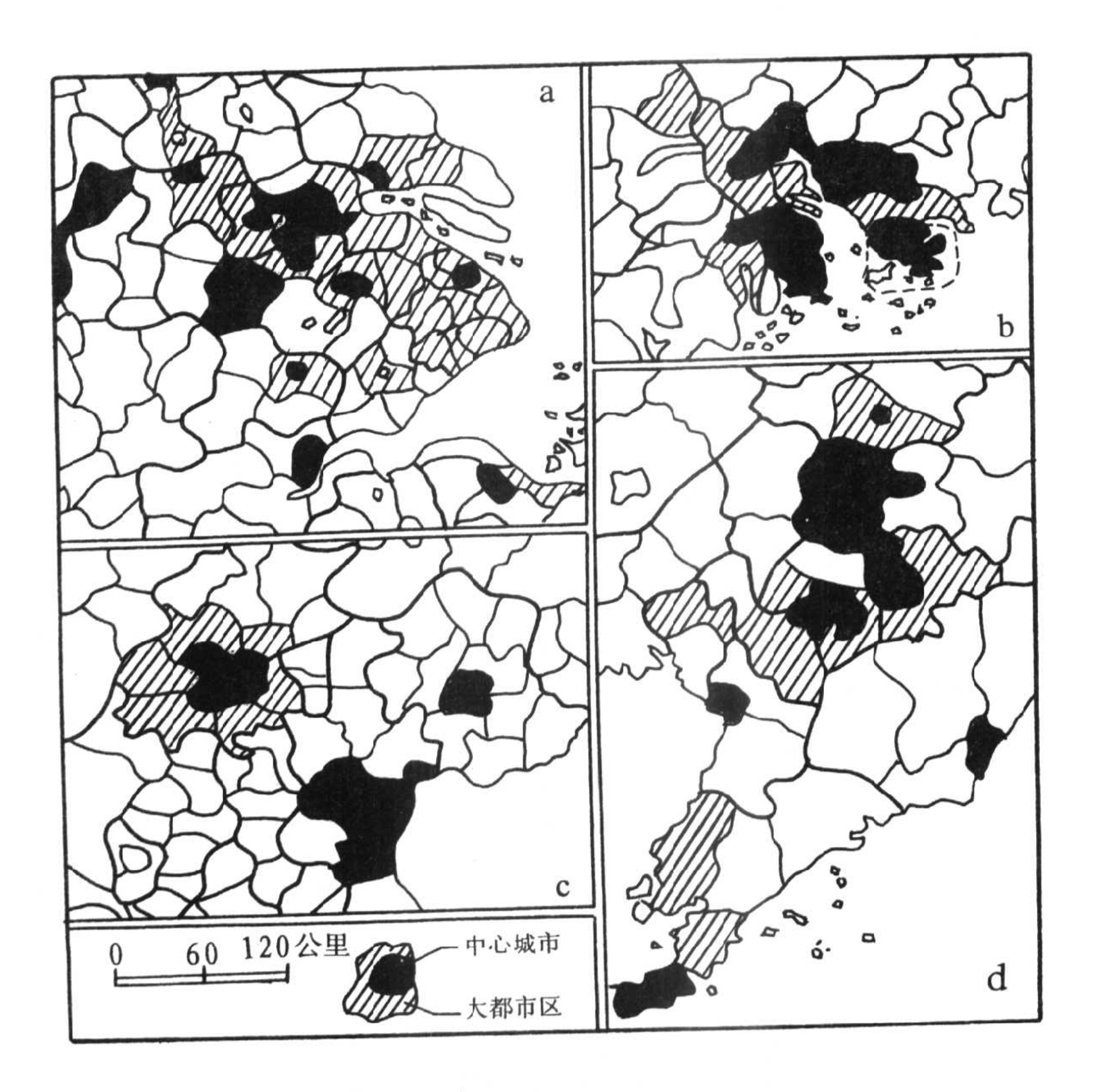


图 17　中国主要大都市密集区

a:长江三角洲；b:珠江三角洲；c:京津唐；d:辽中南

资料来源:孙胤社:“大都市区的形成机制及其界定”,《地理学报》,第 47 卷第 6 期,1992 年。

总的来看，产业与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城市经济向周围地区扩散是中国现代大都市密集区发育的主要因素。在集聚和扩散过程中，大型中心城市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大的中心城市是区域内

经济因素和人口集聚的磁心，也是城市经济向外围圈层扩散的起点。中国目前的主要大都市密集区都有全国性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如京津唐密集区的北京和天津，长江三角洲密集区的上海、南京、杭州，珠江三角洲密集区的广州以及香港，辽中南密集区的沈阳等。在大都市密集区内，城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存关系，相互之间有比与区域以外城市更为密切的经济、人口和文化交流，如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强烈依存关系，天津是北京出海门户，北京是天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与上海之间、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与广州、香港之间，也都存在密切的依存关系。

三、中国主要大都市密集区概况

（一）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包括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并向南延伸至杭州湾沿岸，总面积约9万余平方公里。这一地区以上海为核心，共集中了12个大中城市，27个县级市，42个市辖县，总人口7191.8万人，其中城市人口2476.1万人，占总人口34.4%（表94）。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密集地区。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内城市体系按规模等级分成5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际性港口城市和全国性中心城市上海，构成本区城市体系的核心。第二层次包括两个省会城市南京和杭州，这

两个城市历史上曾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现在分别为江苏和浙江两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第三层次为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扬州、镇江等大中城市。第四层次为湖州、嘉兴等中小城市。第五层次为其它小城市和卫星城市(表94)。

从城市空间分布特征上看，沪、宁、杭三大城市为三大结点城市，联结这三大结点城市的沪宁、沪杭铁路和沿海地带是本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轴线，人口、城市、产业沿轴线集聚。沪宁铁路沿线除东西两端的上海和南京外，中间集中分布了镇江、常州、无锡、苏州4个大中城市，形成中国城市密度最大的大都市密集区。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内主要组成大都市区的划分及其实

表94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城市等级层次

城市等级层次	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辖区、县、市
第一层次				
上海	1294.7	893.4	810.3	14区,6县
第二层次				
南京	514.2	248.9	218.8	10区,5县
杭州	587.1	179.1	115.1	2市,5区,5县
第三层次				
苏州	569.3	155.3	73.4	5市,4区,1县
无锡	426.5	167.2	85.3	2市,5区,1县
常州	329.3	115.1	68.9	4区,3县
镇江	261.5	85.4	89.6	1市,2区,3县
扬州	933.9	161.7	34.0	6市,2区,4县
南通	781.2	191.1	40.6	3市,2区,3县
宁波	502.5	109.8	59.3	3市,5区,5县
第四层次				
湖州	249.4	46.7	22.9	2区,3县
嘉兴	322.6	62.5	22.2	3市,2区,2县
绍兴	419.6	59.9	19.2	2市,1区,3县
总计	7191.8	2476.1	1609.6	

资料来源：同上表。

证研究等工作刚刚起步，这里从定性分析来看，其内部包括以下一些大都市区和城市群。

1. 上海大都市区

由中心城、卫星城、镇3个层次组成，具有典型的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其中有7个卫星城(闵行、吴淞、松江、嘉定、吴泾、奉贤、金山)，33个县城和县属镇。由于中心城市地域不断扩张，原卫星城市闵行已并入市区，在除闵行(人口已超过10万)以外的6个卫星城中，4个人口超过5万人，2个在3～5万人之间。县属镇人口大多在1～3万人之间，总的看上海的都市区内小城镇规模较小。

2. 宁镇扬城市群

包括南京、镇江和扬州以及4个县级市。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内第二大城市，已形成以主城为核心的大都市区；市域内共有建制镇48个，其中浦口、板桥都为规模较大的卫星城镇，人口超过5万。南京大都市区的特点是其内部中小城镇规模较小但密度较高。镇江和扬州都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会处，是重要的内河港口城市。

3. 苏锡常城市群

包括苏州、无锡、常州3市以及9个县级市。小城镇发达，是中国城市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个城市地域几乎连为一片，形成约70公里长的连续分布的产业、人口密集带。

4. 杭州湾城市群

包括位于杭州湾以北杭嘉湖平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市和位于宁绍平原的宁波、海岛城市舟山市，共6个地级市、28个县级市、466个建制镇。这一城市群内人口达2000余万，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00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是浙江省最

发达地区。通过沪杭铁路、杭州内河港口、宁波、舟山港以及公路网等与苏南和上海之间形成密切联系的交通网，共同构成巨大的城市密集区。

（二）京津唐大都市密集区

京津唐大都市密集区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和廊坊市组成，总面积约5.26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约占37%，平原和海滨洼地约占63%。全区1993年总人口3225万人，非农业人口1424.3万人，占总人口的44.2%（表95）。

表95　京津唐大都市密集区城市等级层次

城市等级层次	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辖区，县，市
第一层次				
北京	1056.9	669.7	599.2	10区，8县
第二层次				
天津	898.6	501.9	469.1	13区，5县
唐山	671.8	156.6	108.7	5区，9县，2个农场，1市
第三层次				
秦皇岛	254.7	53.7	39.8	3区，4县
廊坊	343.0	43.4	17.6	1区，6县，2市
总计	3225.0	1425.3	1234.4	

资料来源：同上表。

京津唐大都市密集区内，城市体系结构按等级可分成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区核心城市北京，第二层次由两个特大城市天津和唐山组成，第三层次为中等城市秦皇岛和小城市廊坊，第四层次由众多县城和卫星城镇构成（表95）。可以看出，该区的主要特

征是特大城市多，缺少大城市，中小城市少。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分别以3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外围环绕小城镇的圈层结构，而三大城市圈又成三足鼎立之势。

北京大都市区可被严格定义为月客流比例50%以上的县域范围(图18)。从行政区划来看，北京市所辖郊县是其直接辐射区和腹地，是北京市地域空间扩展的直接影响区。1949年以后，北京城市化首先向近郊推进，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4个近郊区逐渐成为新建工业区、生活居住区和科技文化区。在远郊区发展了一批卫星城市作为副中心，以减轻市中心的压力。北京市的卫星城多为工业城镇，按距市区的距离可分为两个圈层。第一圈层是市辖区以内的卫星城市，主要包括黄村、昌平、通州、燕山、顺义等。第二圈层为市辖区以外的卫星城镇，主要包括廊坊市和涿州市，因离北京较近，许多欲迁京机关和科研单位在此落户。

天津市在全国城市体系中是一级中心城市，由于具有北京市所缺乏的良好的港口运输条件和与北京相当的工业基础，在京津唐大都市密集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949年后经过经济建设，天津大都市区一方面在旧城基础上向外扩展，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在远郊区发展起一批卫星城市和小城镇，先后开辟了东南郊、新开河、白庙、北仓等10多个工业区、点，新建杨柳青、大南河、咸水沽、军粮城等卫星城镇。与港口发展相适应，天津大都市区逐渐向海滨扩展，从50年代开始重点建设塘沽新港，将位于市中心区海河沿岸的港口功能转向用地潜力巨大的海滨区。70年代又重点建设大港工业区。进入80年代，在沿海地带的北塘和塘沽之间规划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新港区和新工业区的建设在沿海地带形成了新的城镇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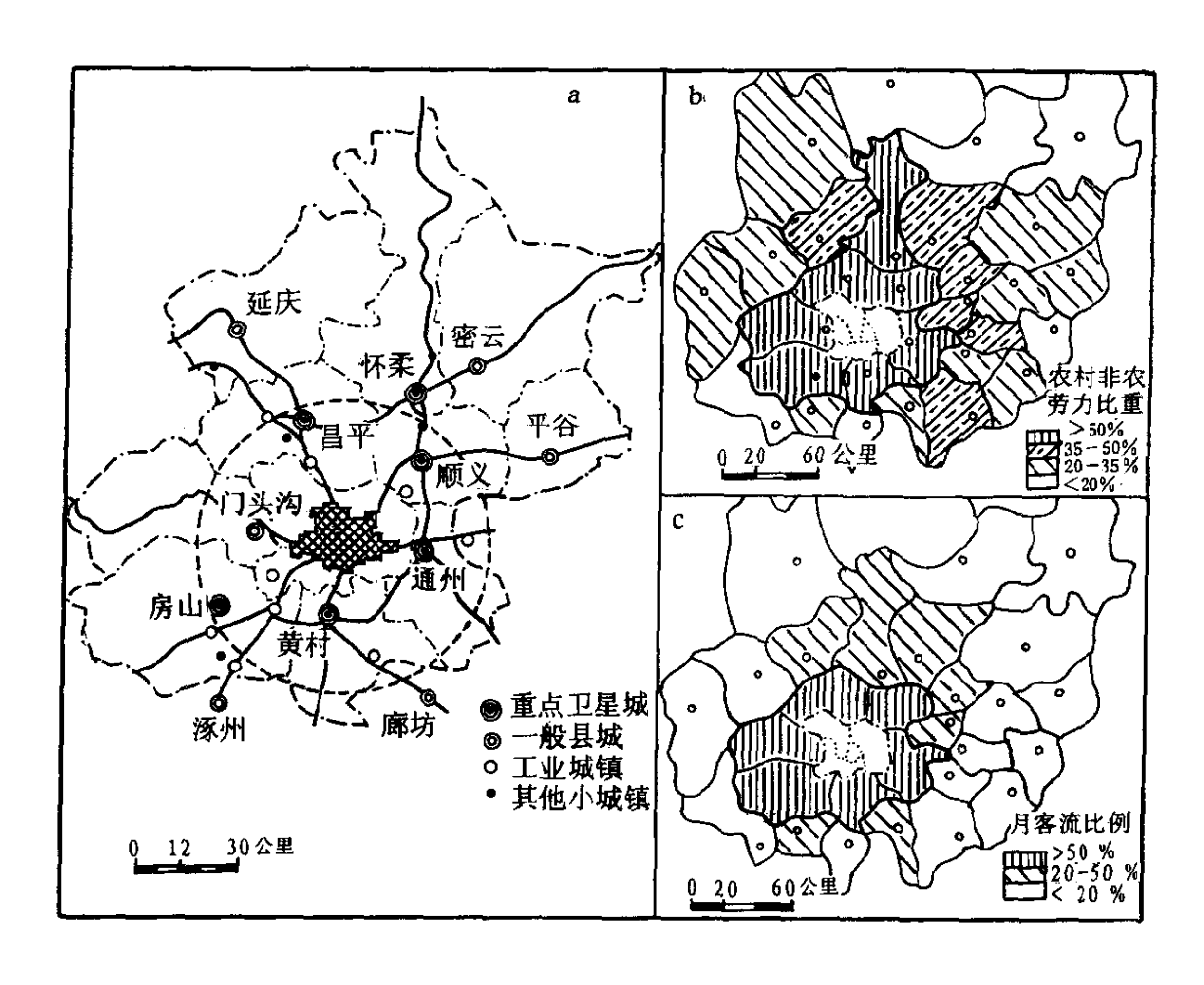


图 18 北京大都市区:因素分布与空间范围

a:卫星城分布; b:农村非农劳力比重; c:大都市区范围

资料来源:同上图。

唐山市是典型的工矿城市,市区的发展格局与最初的煤炭资源开采有关。唐山大都市区分为主城区和东矿区,主城区是在唐山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矿区距主城区 25 公里,由开滦煤矿的 5 个矿区和工人村组成。1976 年唐山—丰南大地震,唐山市遭受了毁灭性破坏。经过以后 10 多年的重建,城市空间布局更为合理。为分散市区人口和用地压力,在市区北部 26 公里的丰润县城以东开辟了搬迁和新建企业新区。唐山市是京津地区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具有综合性工业城市职能特征,行政职能等级相对较

低，在京津唐大都市密集区中的作用和地位次于京、津2市。

（三）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广东省中南部，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包括港、澳在内，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700万。由于毗邻港澳，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本区已成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非农业人口比重达46%。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内，城市体系按等级可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广州、香港、澳门。第二层次为20万人以上的大中城市共8个，主要有深圳、珠海、江门、东莞、佛山等。第三层次是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共11个。第四层次是众多的建制镇(表96)。

表96 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密集区城市等级层次

城市等级层次	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辖区，县，市
第一层次				
广州	623.7	375.4	303.7	8区，1县，3市
第二层次				
深圳	37.7	64.1	64.1	5区
珠海	57.5	30.8	24.1	3区，1县
佛山	299.5	113.6	35.1	2区，1县，4市
江门	365.0	112.5	27.5	1区，29镇
东莞	133.9	33.7	33.7	
中山	121.7	32.0	32.9	
肇庆	576.4	129.2	25.1	
惠州	245.7	71.2	21.8	

资料来源：同上表。

香港是著名国际贸易城市，改革开放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大量资本和一大批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本区转移，形成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澳门虽为一中等城市，但澳门与西方国家有传统的贸易关系，金融、外贸都有一定规模，是珠海及周围地区主要经济合作对象，具有不同于一般中等城市的特殊重要地位。除经济联系外，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还有广泛的文化和人口血缘联系，这更加强了港澳作为本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广州历史上为本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但后来香港超过广州，发展为本区第一位中心城市。但是广州是本区政治中心，是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的核心，背靠广阔的内陆腹地，与港澳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本区城市体系的主框架。

本区大城市仅深圳一个，中小城市构成城市体系第二层次的主体。这些中小城市大多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城市，如1979年设深圳、珠海两市，1983年设中山市，1985年设东莞市，1988年设清远市，1992年设番禺市，整个地区城市发展很快。本区中小城市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均衡，而以广州大都市区周围密度最大，城市之间由准城市化地区相连，几呈连片趋势。

（四）辽中南大都市密集区

辽中南大都市密集区位于辽宁省中南部，是中国东北地区重工业集中地带，以沈阳为核心，包括大连、鞍山、抚顺3个特大城市，本溪、阜新、锦州、丹东、辽阳5个大城市和近20个中小城市（表97）。本区多个大城市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分布，各大都市区基

本相连，形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表 97　辽中南大都市密集区城市等级层次

城市等级层次	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辖区，县，市
第一层次				
沈阳	657.7	405.1	372.1	9区，3县，1市
第二层次				
大连	527.1	240.3	181.3	6区，1县，3市
鞍山	331.5	161.1	124.0	4区，2县，1市
抚顺	224.2	144.3	123.3	4区，3县
第三层次				
本溪	154.8	97.3	79.6	4区，2县
辽阳	174.7	69.7	52.0	5区，2县
阜新	181.5		65.6	5区，2县
锦州	290.3		59.7	3区，4县
丹东	279.3		54.3	3区，4县

资料来源：同上表。

辽中南大都市密集区内大城市数量多且距离近，尤其在以沈阳为中心的100公里范围内分布有数个百万人口城市，使各大都市区的郊区范围相对较小，有的中心市甚至相互连接，如沈阳大都市区和抚顺大都市区等。并且，各大都市区的范围还有相互交叉和重叠之势。特别是在辽宁中部地区，以沈阳大都市区为核心，构成一个有等级层次的、由多个大都市区组成的联合性大都市密集区。

第十四章 中国国际化都市

随着城市间国际交往的频繁与联系的密切,城市发展中资金、技术、产业、经贸、人员、机构等方面国际性因素逐渐增多,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流通设施、文化与服务设施等方面不断同国际水准趋近,城市经济运行规则向国际惯例靠拢,这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科技进步与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走向国际化,而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选择和建设中国的国际化都市。

一、世界城市与国际化都市定义

1. 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World City)概念最初由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得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提出[①]。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也是规划师的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这一概念作了经典解释,专指已对全

① Patrick Geddes: *Cities in Evolution*. London: Benn,1915.

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都市。霍尔对世界城市的概念作了全面概括[①]:①世界城市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它们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各类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有时还是国际权威组织的所在地。而且在这些机构周围集中了一些经营与政府有关业务的机构,如大的专业组织、工会、雇主联合会、大工业集团总部等。②世界城市还是国家的贸易中心。它们是大港口,进出口货物从这里转运到国内各地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国家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枢纽;是大型国际机场所在地。③世界城市是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中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总部、大保险公司总部和一整套专业的金融保险机构均设于此。④世界城市是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有大学、大医院、国家图书馆、博物馆、法院和各类科学、技术、文艺研究机构。⑤世界城市是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有发达的出版业、新闻业以及无线电和电视网总部。⑥世界城市不仅是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从历史上看,这里是奢侈品工业和商店最早发展的地方,新的商业经营形式也最早在这里出现。现在世界城市内制造业的生产线已迁往郊区,工业和贸易的重点也转移到最适合都市发展的行业。⑦随着制造业、贸易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展,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的另一种主要经营业务。彼得·霍尔在书中还具体分析了7个世界城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莱茵—鲁尔区,荷兰西部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等城市组成的城市圈,前苏联莫斯科,美国纽约,日本东京。

---

① Peter Hall: *The World Cities* (third edi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eolson, pp. 1—6, 1984.

2. 国际化都市

国际化都市(Cosmopolis)指人口组成多国籍、多民族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世界性程度高的城市。首先,它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城市,其规模一般很大,功能相对综合,城市经济基础雄厚,在生产、流通、消费及科技、文化服务领域乃至国际政治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国际地位。其次,国际化都市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城市,它既是国际资本和各国商品集散中心,也是国内、国际经济的最佳结合点,又是国际间政治、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的交流中心。按照作用的地域空间范围,可以划分为全球性的(即世界城市)、区域性的和亚区域性的国际化都市;按照功能,可划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国际化都市。

传统的国际化都市是建立在政治、宗教和权力的道德秩序上的,而现代国际化都市完全成为一种集合型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技术的大都市[①]。它意味着城市的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地区性或封闭型的现象,而是通过世界性的经济、贸易与文化科学的联系使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处于国际发展的背景之中,与国际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国际化都市,不仅在发达国家中有重大发展,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迅速崛起,如香港、新加坡、开罗、圣保罗、汉城等。

---

① 徐巨洲:"对我国发展国际性城市的思考",《城市规划》,1993年第1期。

二、世界城市与国际化都市发展背景

世界城市与国际化都市的形成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各国城市体系中顶尖城市发展的总趋势。它们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中心，而且是国际交往和世界贸易中心。早在资本主义前的一些大城市就存在这种功能。

随着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海外丰富的资源，开拓国外市场，从而获得最大利润，一方面输出大批产品，另一方面进口大量原材料，国际贸易得到很大的发展。作为国内工业、商业、科技和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必然作为伸向国外的桥头堡，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化都市。所以，早在 19 世纪初，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城市。

后来，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超过国界，扩大到国际范围，变成了国际分工。同时，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形成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加上交通和通讯事业的迅速发展，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相对距离缩短，世界上一些大城市从此不只是世界贸易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而且也是联系和控制国际生产和资本的指挥部，成为全球性或国际区域性的国际化都市。

当前，世界形势处于大变革之中，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出现，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范围生产力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资本、劳务、技术和信息跨越国界进入国际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处在加速发展

时期。现代国际化都市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1. 国际分工的加深和扩大

近30年来全球生产力正在向世界范围扩散,主要表现为工厂、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化。据美国著名的《财产》(Fortune)杂志统计,美国在1970年全球最大的460家企业中占了260家,在前200家中占了123家,前100家中占了64家,具有绝对优势;而到了1987年,前200家和100家中,这两个数字分别减到77和40家(表98)。由表中可以看出,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仅遭到日本、西德等国强有力的威胁,还受到来自第三世界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如韩国、台湾、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有企业进入全球前460家[①]。但是工厂、企业越是分散,越需要专业化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来配合和协作。经济活动的高层次化通常使第二产业中决策和销售部门(需要输入输出和加工大量信息)与生产车间相分离,并高度集中。一些大公司为了取得最佳经济效益,往往将业务范围扩大到最终为消费者服务的销售领域,产、供、销垄断于一身,把过去分散的小公司经营的业务转变为大公司总部来经营,公司上层管理机构成了调节生产和全面管理的核心。这些高度集约化的大公司总部,又必然集中在一个大城市里,依靠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借助于服务业的效能,组织高效率的指挥系统,再度发挥地理上的区位效应,成为世界经济市场体系中的一个控制点,现代国际化都市因此诞生。

---

① Keith Hoggart: The Changing World of Corporate Control Centres. *Geography*, No.2, 1991.

表 98　世界最大 460 家工业企业的所属国一览表

国　家	占前 100 家的百分比(%)		占前 460 家的百分比(%)	
	1970 年	1987 年	1970 年	1987 年
美国	64.0	40.0	56.5	36.7
日本	8.0	15.0	11.1	20.2
英国	8.0	5.0	10.0	9.6
西德	9.0	13.0	5.8	7.0
法国	3.0	9.0	4.6	5.7
瑞典	0.0	2.0	1.5	2.8
加拿大	0.0	1.0	2.4	2.6
瑞士	1.0	2.0	1.5	2.3
韩国	0.0	3.0	0.0	2.2
其他	7.0	10.0	6.6	11.1

说明：在 460 家工业企业中，1970 年或 1987 年中至少拥有 10 家企业的国家才被列入。

资料来源：Keith Hoggart: The Changing World of Corporate Control Centres. *Geography*, No.2, 1991.

2. 金融业务的扩大

80 年代以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由于各国放宽金融限制，发展电讯技术，货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大大加速，世界范围的投资总额由 1974 年的 8920 亿美元增长到 1986 年的 52000 亿美元(不变价格)，其中有 80%集中在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国际化都市[①]。尽管各个国家的金融和财政体制有所不同，但是金融中心的集中是目前世界范围的动向。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

① 徐巨洲："对我国发展国际性城市的思考"，《城市规划》，1993 年第 1 期。

出国，东京则是日本首要的金融中心。伦敦是欧洲货币市场的主要交易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银行网络。美国是接受外国资本最多的国家，所以也是外国银行进入最多的国家。大约有 300 家外国银行在美国设有 600 多个大小办事机构，包括代表处、代理机构、投资公司、附属机构以及分行。这些业务集中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休斯敦等地，其中设在纽约的最多，达 380 个。1985 年，在美国的国际银行机构已达 160 家，总资产 2610 亿美元；其中 100 家设在纽约，总资产 2010 亿美元[①]。

3. 科技的进步

电子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国家间、城市间的交往距离，促使国际化都市发展成为全球通信和远距离管理中心，并以此加速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变。技术的进步，使越来越多的工业和企业在国际化基础上重新组合。当代一个与早期工厂分工不同的突出现象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集中管理，把城市当作一种从事新服务性产业的生产场所。计算机进入管理系统需要众多的专业服务配合，特别是原来属于制造过程的一部分工作，有相当数量转移到了服务领域中来。

4. 城市发展的规律

从工业化社会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或称为信息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也为城市走向国际化提供了重要背景。后工业化社会

---

① 杨重光："中国对外开放与城市国际化"，1992 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交流论文。

的发展动力是信息革命，其主要特征是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那些首先调整城市结构，掌握先进的高新技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拥有完善而发达的服务设施的城市，就控制了全球形势，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目前，世界各国的城市都在迅速调整它们的全球控制功能和内部空间的分工。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发达国家城市，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城市，如新加坡、圣保罗、香港等。

因此，国际化都市不是原有工业大城市的翻版，它必须依赖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扩张，依赖于大城市如何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变。

三、中国国际化都市建设的条件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国际化迈进，也标志着中国城市走向国际化的宏观背景已经建立。

中国城市国际化既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发展经济的需要与必然趋向，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包括3层涵义：①在中国形成若干个国际化大都市；②城市进一步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建立广泛的国际经济联系，参与国际经济循环；③以国际化都市为核心，形成既同世界经济存在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中国城市体系。其中首要的是选择并建立国际化都市：

首先，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集团化是国际化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中国只有积

极主动参与国际大分工,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融进国际经济大循环,才能实现经济腾飞,走向现代化。国际化都市既是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空间依托,是区域经济集团的支撑点,各类“经济圈”的核心,又是国家实现同国外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基地。如果中国没有几个国际化都市,就难以真正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不利于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其次,改革开放促进城市的发展,也必然促进国际化都市的形成。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建立外资企业等大量对外经济活动都集中于大城市。虽然各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各国大城市始终处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前列,是综合国力的代表。它集中了先进的技术装备、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和科学管理,同时有着较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大城市是理想的投资场所,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是外商首先选中的目标。随着对外关系的扩大和经济交往的加深,其中某些特大城市正在发展成为国际化都市。外国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对中国的大量投资,众多分支机构的设立,中国大型企业集团的成立和外资的引进,中外合营业务以及向海外投资的开展,都要求在国内有国际化都市作依托。

第三,城市的国际化可以促进城市的进一步现代化。随着城市的逐步国际化,国际间资金、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交流进一步扩大,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将在更高层次上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

目前中国已有城市622个(1994年底),按市区的非农业人口规模划分,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有32个,占城市总数的5.6%,土地面积仅占全部城市土地面积的3.7%,但人口却有17609.1万,占全国城市人口的37.9%,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总

产值的34.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城市的38.2%[1],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主力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将加速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主体的对外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也将日益增长,带动全国城镇体系以主动态势进入世界城市体系。就目前中国城市发展水平来看,一些城市已具备建设国际化都市的基本条件。

1. 面临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大好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在政治、经济格局重新组合的历史时期。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重心正在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表现为产业转移、贸易转移和综合实力转移。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却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受日元不断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正在进行产业的结构调整与转移,这给中国城市经济带来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同时,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经济潜力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新的生长极。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转移,在经济增长重心所在区域必然会崛起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在经济高速发展过

---

① 根据《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程中也必然会伴随着崛起若干中心城市，进而发展为国际化都市。

2. 一些城市历史上曾是国际化都市

从历史上看，中国某些大城市有着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同国外城市存在着密切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其经济作用早已超越国界，波及海外。如上海在本世纪上半叶曾经是东亚的国际经济中心，商业功能和繁华程度是远东任何一个城市所不能比拟的，成为远东当之无愧的国际化都市，有东方"巴黎"的美称。

3. 东南沿海城市存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世界上不少学者探讨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同历史背景与文化的关系。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新兴的国际化都市，都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和融汇点。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也具备这一特点，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存在建设成为国际化都市的客观条件。它们背靠资源富饶的内陆，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拥有天然良港，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主要桥梁和枢纽。当前亚太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部分港口城市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

4. 一些特大城市在区域中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随着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地区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开放的确立，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带上已崛起一批经济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对外联系密切，经济综合实力和科技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城市。

80 年代实施开放沿海 14 个城市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使沿

海地区的城市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先发效应，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带动经济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与世界经济融合度最高的城市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的3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群：①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②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③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城市群。

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向内陆纵深推进，以及浦东的开发和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长江流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点。近几年来，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长江沿江14个开放城市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在某些方面已居全国领先地位，有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已明显超过沿海地区。如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集中地。

四、中国的国际化都市

（一）指标选择准则

当代国际化都市的丰富内涵和诸多功能表明，国际化都市首先必须具备现代化城市的一些特征，才能支持和发挥其国际化都市功能。而国际化都市最本质的特征是城市的许多职能国际化，即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综观世界公认的国际化都市，其确立均具有一些共同准则。

1. 城市的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就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装备和管理城市,使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环境质量等方面以及城市的整体素质上都达到国际水平。它是构成国际化都市的现实基础,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具体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1）**雄厚的经济实力**

国际化都市一般由具有国内优势的城市发展而来,有完整的经济体系和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左右着全国、区域、甚至全球的经济状况和趋势。首先城市经济要摆脱不发达状态,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次具有第三产业比重高于50%的现代产业结构;另外失业率低于4%,通货膨胀率低于两位数,市民消费构成的恩格尔系数[①] 低于35%的充满生机的城市。

（2）**完善的服务设施**

完善发达的城市基础和生活服务设施是国际化都市的根本保证。当代国际化都市一般都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比重可达产业总量的60～80%。城市用地结构表现为第三产业和居住用地占绝对比重,如纽约、香港达到70%以上。并且在第三产业的内部构成中,新兴第三产业比重正在赶上或超过传统的第三产业。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离不开批发、仓储、银行和交通运输等传统第三产业。而现代化工业生产除此之外,还要更多地依靠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国际金融贸易等新兴第三产业,尤其信息在国

---

① 恩格尔系数指每个国民的平均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例。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揭示出消费结构变化规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或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将会下降。

际化都市有序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化都市同时也是一个以国际信息知识产业为基础、信息市场为交换枢纽、信息网络发达、信息高度社会化的国际信息中心。

(3) **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

国际化都市必然建立在高效的科学管理和高科技文化基础上。这里不仅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的科研机构、实验设施和场所,以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途径,而且集中大批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因此代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先进水平。它一般都具有合理的劳动力结构,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的国际经济交往人才。

2. 城市的国际化

城市国际化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产物。国际化都市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对世界经济有着广泛的影响。它包含3方面基本内容:

(1) **城市职能国际化**

这是城市国际化的核心与本质内容,表现为城市经济发展从地区分工走向国际分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对国际经济有较高的参与度和较强的竞争、渗透能力。这种循环涉及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因此城市职能国际化必然要求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国际化,生产过程国际化(如国际合作生产)及流通过程国际化(如国际贸易)。

综观世界的国际化都市发展过程,无不以城市职能国际化为主要建设内容。如东京设有全国11%的工厂和一半以上的大公司总部;新加坡的外资约占新加坡制造业固定资产的65%;洛杉矶商业区的70%归外国所有;纽约80年代中期有59家跨国公司

总部和300多家银行代理机构;伦敦有37家跨国公司总部和400多家银行代理机构。这些国际化都市通过建立跨国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掌握着巨额的国际银行业务量,从而控制和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通过跨国公司总部的决策和管理功能,与海外子公司建立生产、销售和金融、信息网络。当代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组织者,它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性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建立区域性、世界性的生产、销售、信息网络,从而加强城市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些机构还能强化城市生产能力,建立外向型经济,有助于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公司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跨国公司37000家,其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有20余万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为21250亿美元,其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5000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商品贸易总额①。因此,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 城市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的国际化

通俗地说就是按国际惯例办事,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经济、社会、文化、行政等各项活动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调控机制、运行方式等与国际化社会的通行惯例相协调、兼容或对接,这是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接轨的基础。

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最直接地

① 储祥银:"跨国投资的新动向",《经济日报》,1994年10月22日。

吸纳和承担对外开放的成果。城市也只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中,才能实现国际化都市的建设目标。

(3) **城市运行环境的国际化**

城市运行环境包括城市各项活动正常进行所必需的各种社会服务、物质设施及城市规划布局等硬环境,也包括政策法规、社会公德和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等软环境。

交通和通信是国际化都市的两个主要标志。由于交通、通信技术的发达,地理条件的优劣已不是国际化都市的决定性因素。现代化交通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城市的空间距离,使城市间的全球联系成为可能。电子计算机和远程通讯技术的应用,更使城市间的国际联系经常化,并拓宽了城市的合作领域。因此,依附范围广阔、分工协作的城市群中,国际化都市的分布呈明显的境外交通指向,多数为港口指向,是连接国内外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一座国际化都市必然与世界有着密切的信息交流,国际电话、图文传真的利用率很高。据1987年资料,前西德一年的国际电话及传真达28000万次,美国达13000万次,英国达13500万次。在日本,50.5%的居民安装有电话、传真、闭路电视等楼内综合信息系统,43.5%的办公楼内安装有遥控会议系统,17.4%有卫星传送天线[①]。

另外,高度开放的城市经济政策是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国际化都市应是以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和相应的人才优势开展国际性科技文化交流的中心,每年定期举办国际会议和展览,高等学校具有一定的接受外国留学人员的能力等等。自 80 年

---

① 陈光庭:"城市国际化研究的若干问题之我见",《北京规划建设》, 1993 年第 5 期。

代以来,国际学术交流日趋广泛而频繁。在1981～1985年的5年间,世界各城市举办的称得上国际性的会议达20913次。巴黎在1981年就举办了292次国际会议,伦敦在1985年举办了238次。近年北京举办亚运会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海每年举办国际电影节,天津已成功举办第43届世界杯乒乓球比赛,都说明中国城市已开始跻身于世界交流的大潮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国际化都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化城市会在一个封闭状态下成长,更难以想象一个国际化都市建立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基础上。

(二) 指标体系

美国地理学家弗里德曼在80年代提出,世界城市的国际性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和程度,并提出7个指标[①]:①重要的金融中心;②跨国公司总部设置;③国际性机构集中度;④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⑤主要制造业中心;⑥主要交通枢纽;⑦人口规模。

我们不能简单地采用以上世界城市的指标来讨论和评价中国城市,因为中国建立国际化都市刚刚起步,面临着城市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目前还没有一座城市成为世界范围的主要金融中心或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机构驻地,商业服务基础与国际化水

---

① Friedman, J.: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17, No.1, pp. 69～83,1986.

平也相差甚远。但中国一些特大城市已因人口规模及生产能力引起世界注目，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区域经济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评价指标体系。

前面已提到，国际化都市反映在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两方面，广泛包含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因此为了全面评价中国大城市的发展状况，并从中选择、建设国际化都市，要尽可能多地采用复合量纲指标，并力求指标精简，相互独立，减少评价次数和计算工作量。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所列指标为基础，并结合实际调查，采用 29 个评价指标，建立 3 个层次的指标体系：第一层次包括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水平；第二层次将上述两个目标进一步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金融资本的国际影响力以及文化科技交流水平等 5 个指标集；第三层次是具体的可定量化的评价指标（图 19）。

（三）中国国际化都市选择

国际化都市的形成是由于高新技术和高水平的信息企业大量汇集在少数几个后工业城市（信息化城市）所在地，使之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城市，从而在国际经济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的后工业城市都是国际化都市，多数城市由于国际行业聚集量不大，影响力不够，还不能称为国际化都市。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低，严格地讲，目前中国真正具备国际化都市标准的城市还没有，只有少数一些大城市的性质正在逐步转变成国际化城市。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国力，到 21 世纪初期，中国有望形成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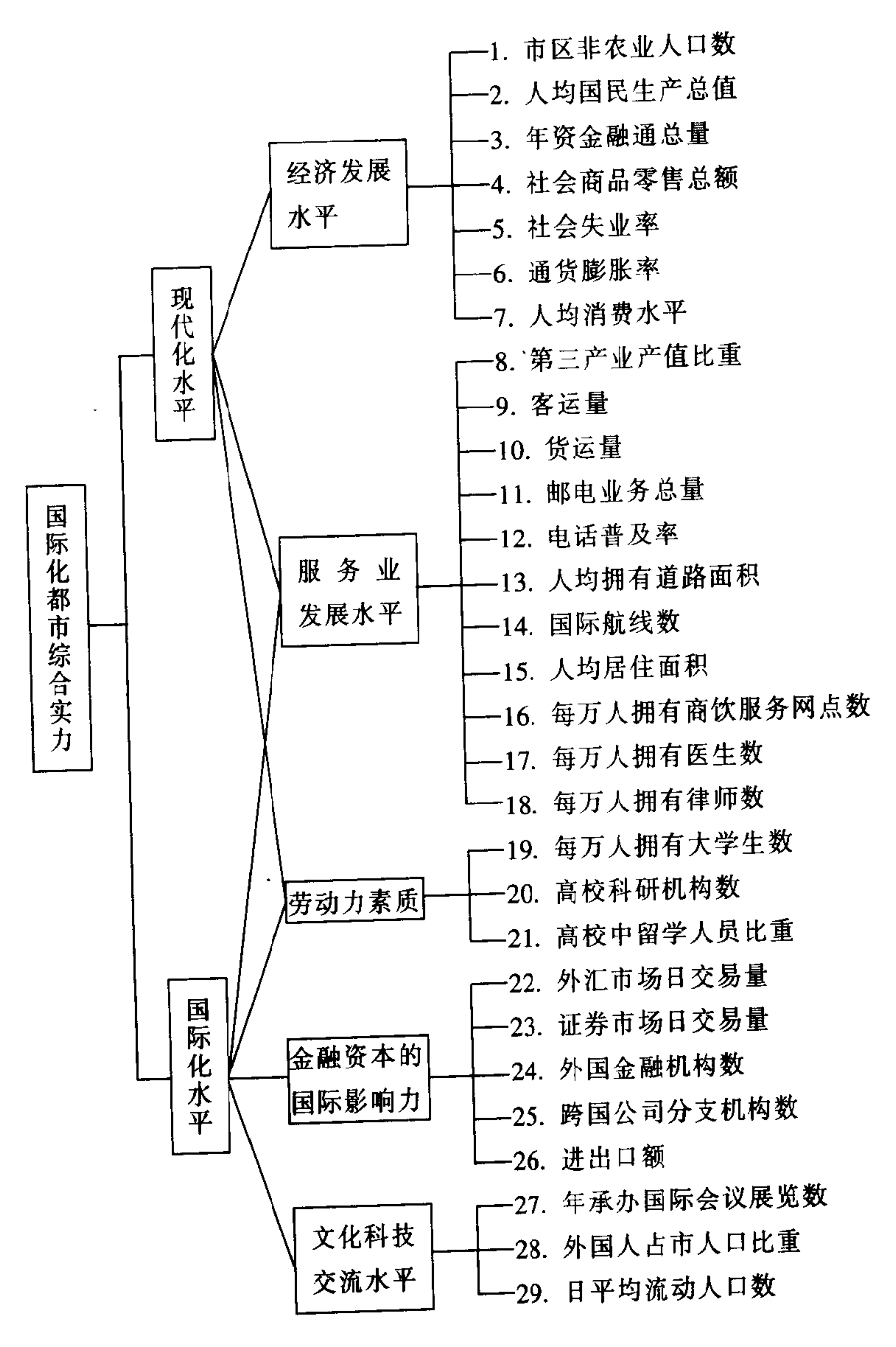


图 19　国际化都市评价指标体系

北、中3个国际化都市。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其经济实力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拥有"世界第一集装箱港"、"第三大黄金市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等众多美称，已是第二级世界城市。1997年回归中国以后，香港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其自由港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市近年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但受到香港的影响，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国际化都市。考虑到香港城市发展用地的限制，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有可能与深圳连成一片，形成多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以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为契机，正在逐步恢复1949年前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地位。上海市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是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跻身于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

北京、天津作为中国第二、第三大城市相距很近，联系密切，都有成为国际化都市的潜力，但由于北京缺乏海运条件，对外贸易和开放发展的优惠条件也不如天津；天津的政治影响、经济和技术基础不如首都，因此如果两市联合，形成一体，发挥整体作用，那么就会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联合型国际化大都市。

中国幅员辽阔，城市众多。随着城市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具备良好区位和经济基础的城市也会发展成为亚区域型国际性城市，如东北亚地区的大连、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台湾省的台北等。

五、中国国际化都市分布及其特征

（一）中国国际化都市沿海分布

很多学者采用各种指标对国内城市进行评价和排序，虽然指标不尽相同，但宏观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相当明显：若干大城市已呈现出国际化都市的雏形，它们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其中港口城市占了绝大多数。比如宁越敏等采用城市非农业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邮政业务量等3个指标作为城市集中性指数，得到得分最高的6个城市是上海(11.39)、北京(8.79)、广州(3.90)、天津(3.40)、深圳(1.66)和武汉(0.87)①，其中沿海地区城市占了2/3。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择39个指标对全国187个城市进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发展评分，得出领先的城市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佛山、昆明、南京和珠海②，其中沿海省市的城市占了4/5。另外，由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联合进行的评价中，通过定量分析获得的综合经济实力前10位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武汉、深圳、大连、沈阳和厦门③，沿海港口城市也占了4/5。造成这

① 宁越敏、严重敏："中国中心城市不平衡发展的研究"，《地理学报》，第48卷第2期，1993年。

② Pang Xiaomin : World City Development in China(会议论文)，1994.

③ Li Rugan: New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Beijing. *China National Conditions Report*, No.1,1993.

种沿海分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沿海地区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加快是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因为:①由于技术和经济进一步发展,远洋巨轮能够便利地输送大量燃料和原料,满足当代工业发展的需要;滨海有建设港口运输条件和利用海水的便利,可以兴建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钢铁工业等基地,发展临海工业。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分工,使沿海地带加快发展加工工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③在经济发展、陆地资源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情况下,人们致力于开发海洋资源,在海滨建立起开发海洋资源的生产和生活基地。④此外,有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城市化地区的人口追求阳光和海水陶冶,来到海滨生活,因此,出现了许多海滨休疗养旅游城市。世界上的国际化都市,无论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这样一级的世界城市,还是处于二级的国际化都市,如香港、新加坡、悉尼、圣保罗等都位于沿海,并且拥有良好的建港条件和先进的港口设施,是联系国际运输和通信网络的主要结点。中国1992年统计年鉴资料也表明,沿海城市在联结国内外交通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最早在沿海地区实行,使这一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内陆地区。如最近评出的国内最佳投资环境的前40个城市中,有33个位于沿海地区,有半数以上为港口城市。这些城市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出口总额、外资合同数目以及实际投资额等国际合作领域中都占有绝对优势。1990年80%以上的外资直接投入沿海地区,仅广

东、辽宁、上海、江苏4省市就占了全部直接投资的52%[①]。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城市借助前几年投入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内陆，经济实力大增，尤其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加迅猛，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服务设施。据统计资料表明，中国最大的500家服务性企业主要分布在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地区中心城市，其中北京市、广东省和上海市位居最前列。目前，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因此，沿海地区若干大城市将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国际化都市的生长点。

（二）中国国际化都市存在的问题

1. 经济实力有待增强

当前，全球权力格局是以美、日、欧为核心的三极竞争，其实质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世界经济体系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为原则，实行以贸易保护主义和跨国投资为手段的全球贸易；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是以经济的合作与竞争谋求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城市只有提高经济实力，才能以主动的态势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国际化都市与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化都市（包括亚太地区一些新兴的国际化都市）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尤其是人均指标和生产效率方面。如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199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439美元，比新加坡1991年的11595

---

① Pang Xiaomin: World City Development in China（会议论文），1994.

美元低87.6%[1]。再比如,中国主要城市每单位土地生产力仅及东京的1/6[2]。普遍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城市经济,大大降低了中国国际化都市的建设水平。

2. 第三产业落后

在近40年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城市建设方针指导下,中国城市产业结构无例外地向第二产业倾斜。近期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到普遍重视,补偿性地发展了一批交通、商业等服务项目,但总体比例仍低于第二产业(表99)。根据1992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第三产业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韩国等。

表99 城市就业结构比较

城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上海	0.9	64.5	34.6	1:0.54
北京	8.6	50.6	40.8	1:0.81
天津	13.5	50.4	36.1	1:0.72
广州	16.9	46.2	36.9	1:0.80
纽约	0.1	17.0	82.9	1:4.88
东京	0.1	29.2	70.7	1:2.42
新德里	0.2	32.8	66.0	1:2.01
墨尔本	0.1	32.3	67.6	1:2.09

资料来源:刘塔:"上海的改造与发展",《城市问题》,1993年第1期。

中国第三产业落后不仅反映在产业结构上,而且更主要的是

①② 上海建成"三个中心"制约条件研究课题组:"我国主要城市经济发展与上海形成'三个中心'的竞争分析",《城市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反映在其内部结构上。传统的服务行业如交通、仓储、旅游、商业等部门，占了全部服务业经济增加值中的65%和全部服务业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而新兴的现代服务行业，如咨询服务、信息产业、技术服务业却刚刚起步，所占比例很低。中国国际化都市要与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接轨，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科技开发、咨询服务、国际金融贸易等新兴第三产业。

3. 城市设施不足

国际化都市需要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城市设施作保障，包括以“大进大出”的港口、车站、机场、道路和桥梁为基础的交通枢纽功能，以大流量、全方位的邮电设施为载体的信息沟通功能，以现代化给排水、供能、防灾和环保设施为主体的社会化生产生活服务功能，以高水平的园林绿化、景观控制、生态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美化净化功能，由展览馆、科技馆、会议服务中心、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及其它文化娱乐设施组成的科技文化教育交流功能。而中国国际化都市的城市设施严重不足。尤其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的宽松化，城市中流动人口剧增对城市设施的压力也急剧加大。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

4. 市场机制尚待健全

健全市场机制不仅是振兴经济、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城市经济国际化的前提，任何不参加市场化的国际劳动分工、不同世界市场接轨的城市，不可能发展成国际化都市。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市场经济机制还不完善，

这就为城市经济与国际接轨、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了难度。因此，中国国际化都市必须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超前完成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早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结点。

5. 建设的自发性、盲目性

目前中国有近40个大中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都市，多是自发性地进行建设，缺乏宏观调控。在建设方向上又趋向综合性，缺乏特色。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化都市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物力和人力，而中国目前的经济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期阶段，经济与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尚低，经济水平与城市实力不强，又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及产业升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所以必须考虑阶段性，不可一拥而上，遍地开花。全国应统一规划，有重点、分层次、按步骤地建设若干个国际化都市。

六、建设中的中国国际化都市

在中国选择并建设若干个国际化都市，无论是从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极"地位、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考虑，还是基于各城市争当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排头兵的角度着眼，其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选择中国国际化都市必须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断，尽可能减少盲目性，并且要加强宏观管理，搞好全国规划。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化都市既应具备现代化城市的

一般特征，还要具有国际化都市的内涵。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形成中的国际化都市有如下几个。

（一） 北京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国首都和第二经济中心的北京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人口和建设过于集中在市区，引起基础设施的全面紧张。为此，1992 年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修订，提出了城市发展的两个战略转移——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市区建设从外延扩展向全面调整改造转移。这不仅是单纯土地使用的调整配套，而且是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的全面调整改造。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建立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第三产业发达、经济结构合理的高效益、高素质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到本世纪末，市区的调整改造和卫星城的建设将取得明显成效，城市水源、能源、交通、通讯的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城乡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际性城市。到 2010 年，北京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科技的综合实力，将达到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等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水平，为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打好基础。

北京建设国际化都市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是其它城市无法取代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全国经济的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以及国际国内交往中心的功能大大加强。目前，北京“三资”企业已达 1300 多家，省级驻

京办事处46个，市县级驻京联络处100多个，另有驻京办事机构1000多个，还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商社、银行和企业设立的近千家办事机构，其中外国银行代办处约有98家[①]。这表明北京已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全国经济信息中枢的作用，并朝着国际化都市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北京已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服务一流、面向全国和世界的第三产业体系，重点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旅游、房地产、咨询服务、内外贸易等新兴第三产业，为此在市区新建了大量的宾馆饭店、公寓、写字楼、银行、保险公司、信息中心、贸易中心、展览馆及商业、文化等设施。另一方面，工业按照附加价值和技术密集程度高，能耗、水耗、物耗、占地、运量少的原则调整，形成适合首都特点的工业结构。

北京现有铁路10余条，成为联结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铁路总枢纽，又是全国航空中心，开辟国际国内航线百余条。同时还是中国层次最高、容量最大、内容最广泛的信息生产和集散中心。这些都为北京进入国际化都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的另一优势是旅游资源。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十分丰富。作为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代表，北京正以她独特完整的文化体制影响着当代世界文明的进程，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旅游中心。

最后，北京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是中国教育和科技事业最发达的城市。这里坐落着众多的高等学府（共67所），并且专业较齐全；国家重点实验室26个，占全国同级实验室总数的37%；

---

① 王绪伟："北京商务中心规划初步探讨"，《城市规划》，1993年第4期。

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 28 个，尤其是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其新技术产业开发项目数就占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项目的一半①。

（二）上海

上海自 1853 年超过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上世纪末人口规模超过北京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100 多年来，上海一直保持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港口城市的地位，具有最雄厚的综合经济实力，最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最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城区工业总产值超过 700 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9 倍②。主要工业产品数量、质量居全国重要地位，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1.5 亿吨，为世界第六位。

上海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两条经济发展带的交汇点——长江三角洲地区。它到东京、汉城、香港、马尼拉等亚洲国际化都市的航程几乎差不多，还有飞往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区的班机，海陆交通都十分便捷，已开始发挥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中所产生的新的极化效应。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国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已形成当前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上海的区位优势和所依托的广阔发展腹地，不仅在国内城市中独有，而且是亚太其它地区各中心城市所不可比拟的。这些进一步提高了上海

---

① 叶舜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竞争和联合——试述京、津联合发展"（会议发言稿）。

② 姚士谋、侯晓虹："试析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地域空间扩展"，《城市规划》，1994 年第 4 期。

在亚太地区城市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上海在世纪之交崛起成为国际化都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开放开发浦东，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以浦东新区为龙头，上海第三产业不断向高度化方向发展。金融、商贸、交通通信、房地产为主的第三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生长点。目前上海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方面已走在全国的前面，如建立了全国性的外汇、证券、期货等市场。上海海关的进口贸易超过300亿美元，为上海发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上海重点发展了汽车、通信、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特别是汽车、通信业的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取得了先发制人的效果。近年来，上海开始进行了产业组织的重组，其结果有可能形成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公司，并进一步向跨国公司发展。

除此之外，上海在人才、科技、教育上的优势，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未来长江口航道的整治，也为上海向国际化都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更值得一提的是，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为上海经济的振兴提供契机，也为城市地域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条件。浦东新区是一个集现代化中心商务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旅游开发区以及海港、航空港和铁路枢纽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区。虽然它在空间布局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仍保持与浦西经济功能的整体性，与老城区共同构成上海的中心城。开发开放浦东是90年代乃至更长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近年来浦东新区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率先与国际市场接轨，发挥以金融、贸易、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功能，建立全方位的开放体系，不

仅增强了上海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还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总之，浦东开发开放形成的推动作用，不仅对上海，而且对长江三角洲乃至长江流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乘数效应。

鉴于上海具有的优势和已取得的成就，上海制定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是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把浦东基本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充分体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特色。

（三）香港

香港是一座除海港外几乎无自然资源可言的海港城市，但拥有远东不可替代的最佳区位、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处、大陆的支援以及港英政府“积极不干预主义”经济政策与管理模式等人文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抓住英、美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机高速发展，现已率先发展成为以国际金融、进出口、制造业和旅游业为四大产业支柱的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化大都市：世界第一集装箱港；第三大金融中心；第三大黄金市场；闻名全球的服装、钟表、电子产品及玩具出口基地和“购物天堂”。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四小龙”之首，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东京。其主要实力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跨国企业地区总部的集中地

由于香港地理位置极佳，基建设施良好，劳工教育水平较高，生活素质优良，并且与中国大陆接壤，所以在香港设立地区级总部

的企业，由1980年的174所增至1990年的602所[①]。

(2) 国际金融及财务中心

目前，多种财经业务均以香港为地区性发展基地，它们包括金融经纪业、银行业、财团借贷、贸易融资、私人银行业务及外汇买卖、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黄金买卖及基金管理。其中世界上排名前100位的大银行中，有3/4以上在香港设有分行；以前200家大银行计算，也有半数以上在香港设有分行[②]。

(3) 地区性电子通讯、大众传播及情报中心

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和高效率的电子通讯系统，包括数码光纤网络、蜂窝式电话及流动电话网络、卫星传送设施等，并且锐意推广有线电视服务。香港有多元化及言论自由的报纸、商业刊物以及专门的资料库，足以为从事国际业务者提供信息参考及使用。

(4) 地区性运输及航运中心

过去10年，香港开辟了许多新的运输线，兴建了许多新的港口和货物转运设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运港。

(5) 地区性专业服务中心

目前香港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并且第三产业内部新兴的现代产业占了较大比例。世界知名的律师行、会计师行、顾问公司、工程公司、建筑公司以及其他专业性产业服务公司多在香港设有分部。它们拥有国际水准的技能，并且深切了解香港当地、中国内地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

---

①② 香港工商专业联会(1993)(香港廿一)，1993年5月。

(6) 地区性旅游中心

香港拥有许多世界级的酒店、餐馆和购物中心。不少大型国际和地区性会议和展览都在这里举行。香港的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目前正在填海造地,建设新机场。除了尽量为商务旅游提供方便外,香港还积极发展旅游业,吸引外来游客,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地区将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与国内各地的联系会更加密切。中国政府大力改革开放、颁布香港基本法,又以"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方针进一步强化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地位,赋予了香港经济实现新一轮腾飞的强大动力,可以保持香港的继续稳定和进一步繁荣。

(四) 天津

天津是国内少数几个最具潜力的城市之一,抓住机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望把天津建成中国北方的商贸金融中心、技术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全方位开放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天津地处太平洋西岸的渤海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重镇,到本世纪初已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广阔的中国北方经济腹地以及现代化的港口设施,都为天津向国际化都市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开放型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截至1994年5月,天津已有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家外商投

资企业[1]。1992年,天津市驻外机构和外商驻津办事机构的拥有量在全国位居第三,另外,还有多家合资或外资银行。

天津对外开放的基础在于天津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设。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出海通道,是太平洋西岸重要的航运枢纽,3条欧亚大陆桥的东端起点。目前天津港可与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互相往来,已初步建成为一个国际化、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大港口,今后还要逐步向自由港方向发展。实行经济特区某些政策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初见成效,正在建成以国际贸易为先导,以现代工业为基础,金融、商贸、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中心,争取成为亚太地区第一流的外向型经济区。按国际上自由贸易区模式建立的保税区,大力发展国际转口贸易,促进国内外市场衔接,形成仓储、运输、加工等配套服务体系,争取建成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窗口。

作为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天津以京津塘高速公路为纽带,大力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经济带,发挥京津联合的优势。京津联合是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密集地区、高度开放地区的联合,不仅有利于克服各自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形成中国北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带,而且将有利于加速环渤海地区的开放和开发,推动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最后,天津是全国技术力量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有各类科技人员59.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人员30.5万人[2]。有一批驰名中

---

① 李传忠:"天津建设国际性城市应当明确的几个问题",载于《国际化大城市与天津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编,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12月出版。

② 叶舜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竞争和联合——试述京、津联合发展"(会议发言稿)。

外的专家学者和国家重点高校。国家批准的在全国成立较早的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已发挥着试验、示范和辐射作用。同时,天津还广泛开展与国外合作,建立了中德、中日等一批专门培养中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具有国际水平的培训中心。

(五) 广州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既是省级行政机构集中地,也是全省经济的指挥和调度中心。目前借助于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优势,其经济影响力早已超过本省而扩散到全国各地,已基本形成了一套接近国际惯例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方式,基本上具备了建立国际化都市的条件。

(1) 改革开放10余年,广州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际化都市奠定了经济基础

1979~199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3.3%,使广州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三[①],目前已成为华南地区轻纺、食品、机械、化工、电器机械及器材、医药、交通装备的生产中心。外向型经济以超前于总量的速度增长,第三产业的增长大大超过第二产业,三大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从而成为全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最高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发达,显示了广州市的交换、扩散和服务功能已有相当的发育,广州的市场结构呈较强的开放和发散特征,综合经济实力得到大大加强。

---

① 雷丽:"扩大开放:广州迈向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广州社会》,1994年第3期。

(2) 金融业十分活跃，居全国大城市的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随着广州市金融系统多项业务的电子计算机联机处理以及“金卡”工程的实施，广州金融业开始由电子化向电子货币阶段起步。到目前，全国 300 多个城市共发行长城、牡丹、金穗、万事达、太平洋等各种信用卡 500 多万张，而广州市占了将近 1/5，平均每 4 个广州人就拥有一张信用卡，几乎接近香港的人均持卡数[①]。并且金融业开放度大，目前已有 7 家外资银行分行和 22 个外资银行办事处，并且有一批金融机构与港澳地区及其他国家建立了代理业务，与国际市场有一定的融合度[②]。

(3) 毗邻港澳，并为华南地区交通枢纽

广州具有规模较大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而成为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白云国际机场是中国旅客流量、飞机起降数量名列第一的机场；港口地理位置扼珠江咽喉，国际航运通世界各地，港口吞吐量达 6477 万吨，成为中国第三大港。广州交通运输的战略地位不仅是经济中心的必然反映，而且反过来又不断强化其中心作用。例如各省、市、县都到广州设立办事处和开办企业，据统计外地在广州办的企业已近千家。

(4) 文化发达，科技与管理人才集中

广州是一座具有 28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地处沿海并从秦汉以来便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商口岸之一。因此历来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带，许多先进的、

---

① 芙蓉：“先进一步的广州市金融电子化建设”，《瞭望》，1995 年第 4 期。
② 雷丽：“扩大开放：广州迈向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广州社会》，1994 年第 3 期。

民主的、革命的思想家在此诞生，独具魅力的岭南文化历史悠久并充满生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市区全民所有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8万人，占市区劳动人数的13.4%，占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的25%，成为华南地区人才资源最为集中的城市。

（六）大连

大连市提出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技术先进的工业基地、东北亚地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对内对外均具有辐射力的现代化国际化都市。这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善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南重北轻”的状态。

（1）大连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国东北地区同东北亚各国进行经贸往来的主要窗口和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

港口条件好，水深港阔，终年不淤不冻，综合性强，功能齐全，年吞吐量已达6000万吨，外贸进出口货物总量居中国大陆各港之首。正在建设中的大窑湾港，年吞吐能力为8000～10000万吨，将成为国家用于国际间中转的重要深水港[①]。目前，大连港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运输关系，已开辟大连至日本、香港、欧洲的杂货班期航线和通往西欧、北美、日本的集装箱班轮航线，为发展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建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金融、信息和生

---

① 马书芳：“大连立足于东北亚再造‘香港’：目标、条件和举措”，《人文地理》第9卷，第1期，1994年。

产要素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大连对外开放已取得可喜成果

大连在全国第一个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后陆续建立了高科技园区、保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又在沿沈大高速公路和黄海岸线、渤海岸线建设若干经济开发小区。其中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外商投资企业500多家。它的占地面积、三资企业投资总额、协议外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出口创汇等五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各开发区中均居于首位。目前大连已同6个国家的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不断地扩大着对外联系和影响;每年定期举办中国东北暨内蒙古出口商品交易会、大连国际服装节等大型涉外活动,大大提高了大连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在东北亚的经济地位。

(3) 大连产业技术基础和科技开发力量雄厚

大连产业技术综合配套能力较强,又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完成国家安排的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项目,使其自身的工业技术总体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且由此推动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起步与发展。

(4) 大连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

从1984年起,用于能源、通讯、宾馆、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累计达100多亿元[①],从而使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大为提高:引进并开通了18万门程控电话,并与国外各大城市开始了直接通话业务;合资兴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宾馆和酒家,还专门开辟了

---

① 马书芳:"大连立足于东北亚再造'香港':目标、条件和举措",《人文地理》第9卷,第1期,1994年。

外国人生活区和旅游景点;完成了大型引水和供电工程,基本上能够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生产和经营的需要;沈大高速公路投入运行,使口岸与腹地的交通联系更加便捷;特别是开通了32条国际国内航线,从而使大连作为国际化都市已初具规模。除此之外,大连的软环境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5) 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大连的投资兴趣越来越浓厚

据统计,到1993年7月,日本在大连共投资兴办各类企业594家,协议外资9.4亿美元①。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后,韩国客商来大连人数逐年增多,韩国企业来大连投资日益活跃,双方进出口贸易额都不断提高。

(七) 台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当局通过土地改革以及美国的"经济援助",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经历了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第二次进口替代3个发展时期后,目前已形成以服务业、工业为主要产业形态,并开始向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体系转化。

1992年台湾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美元,居世界第20位;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居世界第25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居世界第14位;从1991年起外汇储备总金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在亚洲"四小龙"中居于重要地位②。

---

① 马书芳:"大连立足于东北亚再造'香港':目标、条件和举措",《人文地理》第9卷,第1期,1994年。

② 池田哲夫、胡欣:《台湾经济结构重组及其发展前景》,第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台北市作为台湾第一大城市，都市区的发展形态已非常明显，目前从事农、林、渔、牧诸业人口仅占全市总就业人口的5%，工业以电机及电器具制造为主，化学及化学制品、印刷等也占重要地位，集中的大中型工厂在3000家以上，是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基地。商业登记单位约6万家，买卖业占70%，服务业占15%，是全岛的商业中心，40%的商品都在台北市销售；同时还是全岛金融中心，不仅集中了台湾大部分重要银行，如“中央银行”、台湾银行，还有美国花旗银行、商业银行等的分支机构。总之，工商业已成为市内经济的两大柱石，工商业登记家数占全岛20%，而资本额及营业额则占50%以上[①]。

台北市还是岛内及与国际交通联系的重要枢纽；铁路纵贯，设有4个火车站；高速公路纵横，并有高密度公路网。境内松山机场辟有六条航线；距市区40公里的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是全岛第一大航空港，面积1200公顷，主跑道长3660米，停机位置65个，1990年飞行架次56537次，旅客人数达893万人，货运量59万吨[②]。全岛国际航线中的绝大部分都从台北出发。

另外，市内拥有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兴大学、东吴大学、大同工学院等大专院校23所，约占全岛总数的1/4。有各级各类图书馆12所，博物院、各类博物馆、科学教育馆、艺术馆、电影文化城等文化设施和各种体育运动场所，其中“中央研究院”是一个下设17个研究所的综合科研机构，负责全岛的科学研究。此外，全岛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中心亦云集于此。正在筹建的“通讯

---

① 朱铁臻：《中国城市手册》，第38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池田哲夫、胡欣：《台湾经济结构重组及其发展前景》，第1、195、27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埠”(Teleport)将为台北市成为国际化都市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针对近年来金融业发展速度加快,台湾提出将建设“西太平洋金融中心”的大胆构想,为此可以预见,作为全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枢职能管理中心的台北大都市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 四 篇

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

第十五章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经济、文化因素作用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反映，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最常见的方法是以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考察为基础，通过各种城市功能地域的组合状况来说明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特征。但这种从外观上研究城市地域的所谓景观论学派，虽然考察了作为人类活动空间结果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但没有深入去研究形成这种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人类活动本身，因而出现了以城市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注重说明城市发展机制的社会生态学派。但是，社会生态学派把人看得过于机械化和一般化而受到批判，从而又出现了注重人类主观行为的行为论方法。行为论方法仅仅强调了影响人类活动的主观因素这一方面，而忽视了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另一方面，因此，最近的城市地域研究又发展到强调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构主义方法，以及全面探讨各种制约条件、动态地研究人类活动的时间地理学方法。

在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中,与相对较多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研究相比,城市地域及其内部结构的研究却不多,而城市地域方面的研究又主要与城市土地利用研究相关。本章主要从城市内部生

活空间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两方面，论述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点。

一、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

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是城市居民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在城市地域上空间投影的结果，其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本节着眼于“单位”这个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最基本空间组织，通过考察其形成与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等，说明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特点，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管理与规划来解释其形成原因。

（一）由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

1. 单位的形成与作用

单位为工作单位（working unit）的略称，是指给城市居民提供各种就业机会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政府和公共机关等。在中国城市中绝大多数就业居民都有自己的单位，在单位里工作，居住着单位分配的住房，利用单位附属的各种福利设施，正像人们见面时首先互告所属单位一样，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单位比街道、区或者城市名更能反映出市民个人的属性。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中遇到了如何在空间上组织新建工厂和服务业部门的问题，也就是就业地和居住地的空间关系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并且，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城市中还存在着其它

一些难题，如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证社会稳定，百业待兴而投资却极其有限，许多居民从农村流入而没有城市生活的经历，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城市建设中选择了职、住接近为优的原则，单位就成了既能最大效益的安排生产与生活，又能把居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管理统合在一起的一种空间组织。

一般来说，一个规模较大的新单位的形成，往往是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来计划和建设的。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新城区的扩大，主要就是靠单位新建的形式促成的。单位的建设用地来源于近郊农地的征收，新单位成员的来源则多种多样，既有其它单位调入和从学校毕业分配而来的，也有附近招收的农民。并且，随经营规模增大、单位成员增多及住宅需求增加等原因，单位建成后有不断扩大的倾向。

单位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仅提供给职工就业场所，而且提供单位成员及其家属的住宅和其它一些福利设施。并且，职工退休后有继续享用单位住房的权利。以单位为基础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单位间的人员自由流动，从而也起到了限制地区间、城市间人口流动的作用。另外，许多单位都建有围墙和门，使单位内部成为相对闭锁的空间，这样就突出了工作单位和个人的特性，起到保护单位内人员、统合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的家庭生活、经济活动和其它社会生活的作用，并逐渐形成单位的地域归属感。因此，作为居民职、住生活的空间统一体，单位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单位制度也有诸多弊端。在土地公有制的名目下，各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长期无偿占有土地使用权，事实上成了“单位土地所有”。缺少地价机制下的单位往往申请占有更多的土

地，既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率，形成了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又使多占土地和少占土地的单位之间出现不公平竞争。在“重生产，轻生活”的指导思想下，“单位办社会”又使得居民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

总之,单位作为居民生活的基本地域组织,在中国城市社会形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关于单位的地理学研究却很少。美国地理学家 Bjorklund① 研究中国城市时曾对单位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做过考察与描述,但没有涉及到单位的分布特点及其与城市内部结构的关系等问题。日本城市规划学者越泽明②论述过单位在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城市地理学家许学强等③ 在介绍社会区研究时预言中国城市社会区的形成与单位制度有关,但没有关于单位的实证研究。另外,作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时考察过单位组织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也对单位职工及家属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过详细研究。

2. 单位的分类和日常生活

单位一般可分为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前者如工厂等追求利润的营利单位，后者如学校等非营利单位。如果不论大小，一个城市里的单位数可达数千乃至上万，单位的人口数从十几人到数万人，建筑面积从几百平方米到数万平方米，多种多样。表 100

---

① Bjorklund, E.M.: The DANWEI: socio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units in China's urban society. *Economic Geography*, 1986, Vol.62, No.1, pp.19～29.

② 越泽明:“现代中国の都市制度と都市成长(Ⅰ)(Ⅱ)”,《アジア经济》,1980年,第11卷第1号,53～64页;第11卷第2号,第57～70页。

③ 许学强、朱剑如编著:《现代城市地理学》,第179～18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是兰州市内单位一览表。这里，首先按职能把单位分成9类，然后依据单位的所属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及规模又分为4个层次。在所属关系上有中央所属单位、省市所属单位和街道所属单位。在所有制形式上有国有单位（全民所有）、公有单位（集体所有）、私有单位（个人经营）及合资单位。另外，中国工业普查中，把工业企业单位按照其就业人数、固定资产和重要程度分为大型、中型、小型3类。

表100　兰州市区单位一览表

单位类型	总数	层次1	层次2	层次3	层次4
工业设施类	656	中央所属 42	省所属 130	市所属 360	街道所属 124
建筑业设施类	90	全民所有·中央所属 13	全民所有·省所属 23	全民所有·市所属 3	城镇集体所属 51
教育设施类	676	大学 13	专业学校 68	中小学 423	幼儿院 172
医疗设施类	734	综合医院 76	专科医院 5	诊所 628	保健所等 25
文化设施类	51	电影院类 25	专业艺术馆 13	公共图书馆 5	公民馆·博物馆 8
商店	13138	全民所有制 856	集体所有制 2379	合资 1	个人经营 9902
饮食店	5093	全民所有制 52	集体所有制 289	合资 1	个人经营 4751
服务业设施类	2261	全民所有制 52	集体所有制 289	合资 1	个人经营 1919
交通·通讯设施类	57	交通·运输 10	邮电局 46	电信局 1	

资料来源：兰州市统计局：《兰州市统计年鉴》，1989年。兰州市计划委员会：《兰州市国土资源》，1988年。

与上述统计分类不同，这里主要以单位的设施状况进行分类。一般，单位的设施除了工作设施之外主要可分为以下3类：①居住设施：住宅及为其服务的水、电、煤、气等的供给和维修管理设施。②生活设施：职工食堂、商店、浴室等。③教育、文化、卫生等福利设施：附属幼儿园和学校、电影院、运动场、医院等。以这3种设施

的组合可把单位分成3类。3种设施都有的为自己完备型单位，有居住和生活两种设施的为外部弱依存型单位，只有居住设施的为外部强依存型单位。自然而然，3种类型的单位就有3种不同的日常生活类型。从单位和购物种类及其满足情况来看，自己完备型单位只有一部分高级专门用品依赖于外部，其它购物全部在内部完结。而外部依存型单位的购物，却主要是在单位附近的地区商业中心(图20)。

3. 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国城市中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大致是：行政类和商业类单位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工业类单位广泛分布于郊区而有相对集中在建成区边缘部和近郊的特点，文教卫生类单位则集中在特定的地区内。

图21是各种职能的自己完备型单位和外部弱依存型单位在兰州建成区的分布图。可以看出，占地大的自己完备型单位一般离开市中心而分布于新发展的建成区内；相反，规模较小占地也少的外部弱依存型单位则相对集中在市中心及其周围。这是因为旧城区中尚残存着大量的旧住房和小商店，解放后这里主要是充填建设了占地少的小单位，而新建城区在城市规划下开发新建了一些大单位。这些新建的大单位，离各种生活设施多的市中心远且交通不便，往往单位内有许多配套的设施。

（二）以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

从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中还发现，相同职能的单位有相对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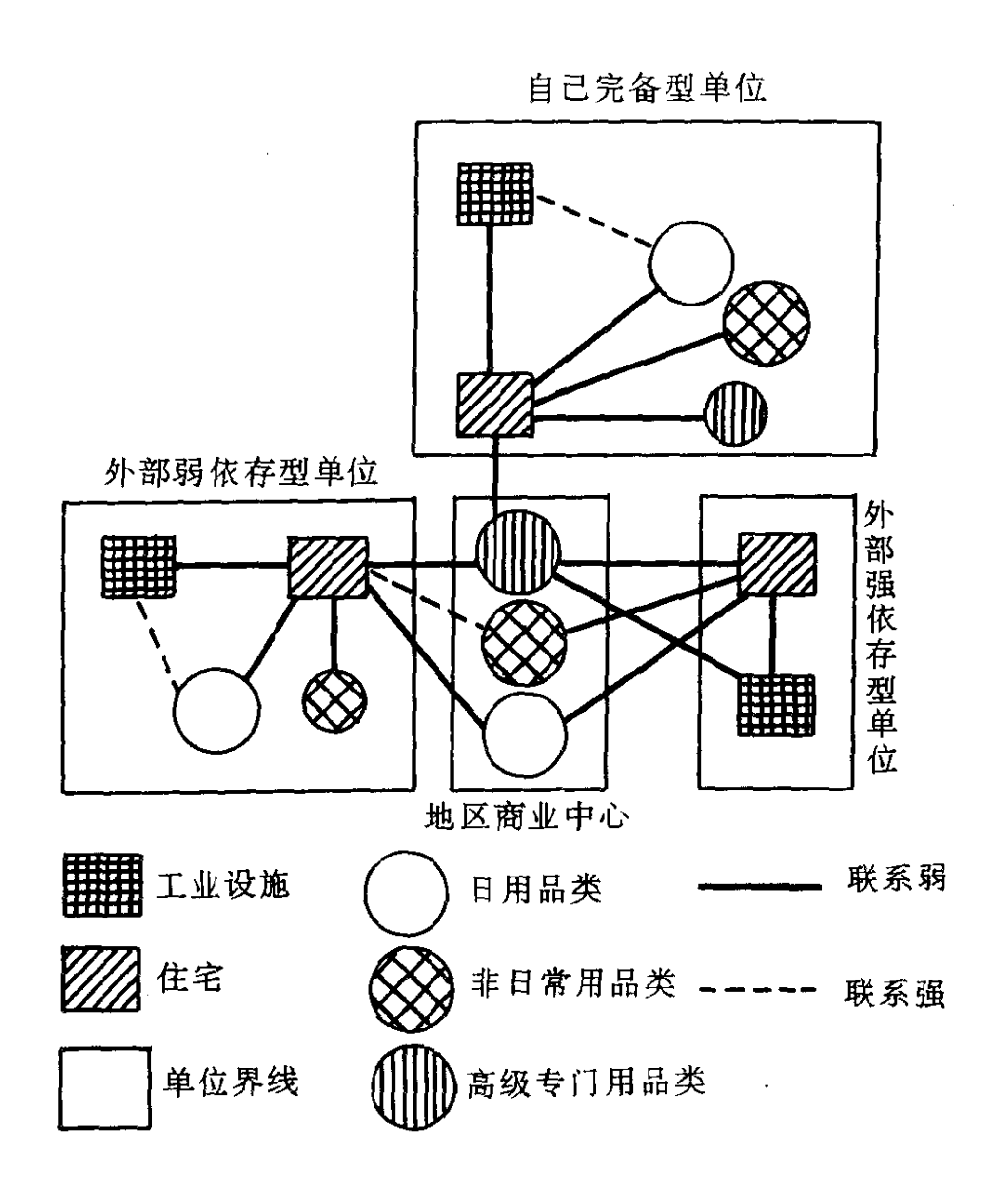


图 20　单位类型与购物的关系

中分布于同一地域的倾向，比如工业类单位相对集中在若干个地域内，形成工业区。这里把空间上相对完整的以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这种生活地域范围称之为低级生活圈。因为不论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所有方面，单位间的相互利用以及单位附近的地区级商业、服务业中心的利用就经常发生。也就是说，居民日常生活是在以单位为中心的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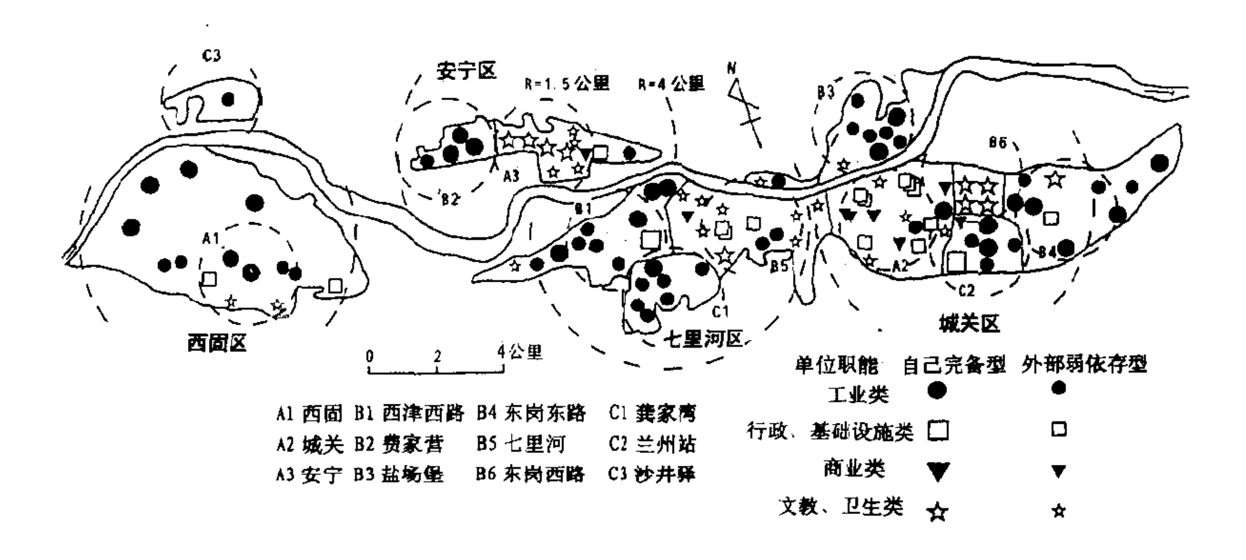


图 21　兰州市建成区的低级生活圈和高级生活圈

注:大圈相当于高级生活圈,小圈相当于低级生活圈。

资料来源:柴彦威:"中国都市内部地域构造",《人文地理》,第 526～545 页,1991 年,第 43 卷第 6 号。

并且,低级生活圈之间存在着差异。根据其拥有主要设施的状况可将它们分成 A、B、C 3 类。A 类低级生活圈内有为数众多、各种各样的单位,是比较成熟的生活圈。C 类低级生活圈的构成单位数少且偏布于建成区边缘部,尚属于成长中的生活圈。B 类低级生活圈则位于两者之间。从图 21 上可以看出,兰州市建成区的 12 个低级生活圈中,工业类单位为主形成的就有 8 个,主要分布在新建成区及市中心区周围的交通便利处,反映了新型工业城市兰州的特点。远离市中心部的西固生活圈(A1)是市区西部的重要工业区,各项基础设施及生活服务设施比较完善,构成兰州市的又一个核心。以文教卫生类单位为主形成的两个低级生活圈(A3、B6)均为大学、研究所集中的文教区。以行政、基础设施类和商业类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A2)位于旧城区,是基于历史惯性而形成的。另外,通过比较还发现越是远离市中心,低级生活圈内的设施完备程度就越高。

（三）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

在中国城市中，区不仅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而且也是组织安排居民生活及各项社会福利设施的基本地域单位。各区之间虽有相互利用，特别是对市中心区有较多的利用，但城市规划中各区相对独立安排各种设施，居民日常生活基本上是限制于区范围内的。兰州市的4个高级生活圈（图21）中，城关高级生活圈由5个不同职能的低级生活圈组成，其中的低级生活圈A2也是兰州全市域的商业中心地。七里河圈有3个低级圈，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工业区。而安宁圈则以文教区，西固圈则以新型的工业区为主构成。这些高级生活圈的特性与城市规划中各区的性质是相互对应的。

（四）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3个层次组成，即由单位构成的基本生活圈，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为了说明这种生活空间结构的形成，在图21上画出了半径1.5公里和4公里的圆。这些圆是根据中国城市规划的标准来划定的，标准规定骑自行车或步行时，要保证单程上班时间在30分钟以内，也即步行上班距离应在2公里以内，骑自行车上班应在4.5公里以内[①]。在中国城市中，居民生活用地是按照

① 许学强、朱剑如编著：《现代城市地理学》，第222～223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生活居住区→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单元)来规划的，而市政管理则以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来组织的。如上所述，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就是在城市规划中生活居住规划和市政管理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低级生活圈相当于半径1.5公里圈的范围，与居住规划中的居住区和行政组织中的街道管辖范围相对应，而高级生活圈则大致在半径4公里圈的范围内，与生活居住区和区政府管辖范围相对应(图22)。

以上通过对单位这个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最基本空间组织的考察，说明了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的特征。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肯定单位制度对组织生产和促进经济发展、管理市民政治、社会及家庭生活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单位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利用不经济及居住生活环境质量难改善等诸多问题。尽管随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单位制度发生着许多改良及变形，但其组织形式在短时期内还不会解体，仍将在组织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形成中国城市社会地域结构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有关单位的地理学研究有待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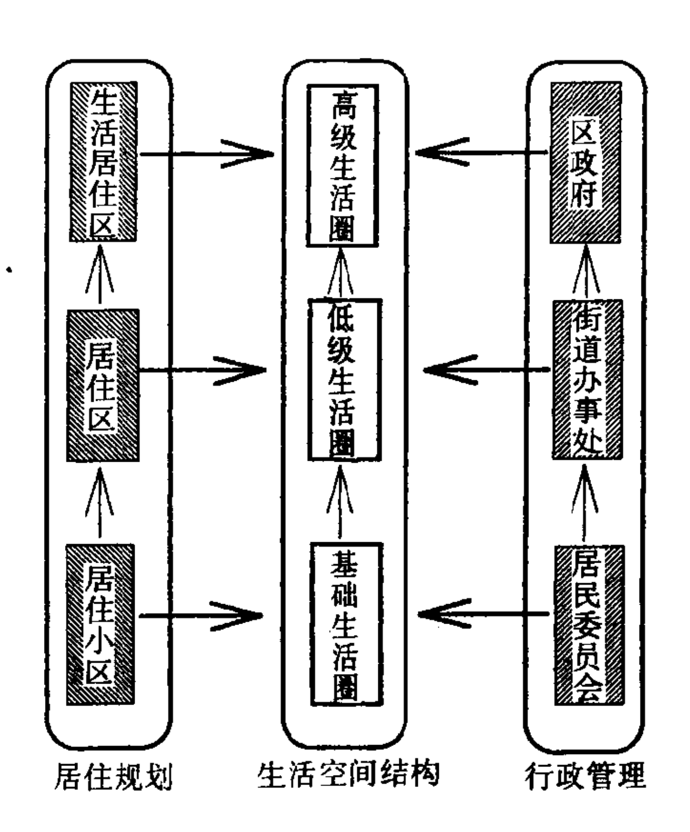


图22 内部生活空间结构与居住规划和行政管理的关系

二、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职能在城市地域上的综合反映结果，构成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骨架。因此，本节从分析各种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及其组合状况出发，说明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

土地利用现状图是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资料，但因它是为城市规划制定的，往往土地利用分类过细，不太适宜于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研究。但是，在建筑物用途现状图、城市住宅地图及地籍图等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如果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按研究目的重新划分土地类型并制图，对从整体上考察城市土地利用的特征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另外，有些城市有房屋普查资料，通过建筑物的用途及其组合状况的考察也能说明城市土地利用的特点①。至于在土地利用现状图、建筑物用途表示图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运用计量方法，如方格法中的三分表示法②和修正韦沃法③等，比较详细地考察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研究则几乎没有，有待今后的研究。

---

① 胡华颖：《城市·空间·社会——广州城市内部空间分析》，第 137 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详见正井泰夫："东京 23 区の土地利用"，《地图》，第 1～7 页，1968 年，第 6 卷，第 4 号。

③ 参阅土井喜久一："ウイーバー组合せ分析法の再检讨と修正"，《人文地理》，第 485～502 页，1970 年，第 22 卷。

（一）城市居住区及其特征

如上所述，中国城市地域是由众多单位地域构成的，而单位既包括有提供工作场所的工业、商业等用地，又都附带有居住用地，因此，居住用地广泛分布且与其它城市用地相互混合是中国城市地域的一大特色。

中国城市中的居住区，自市中心区向外大致可分为旧居住区、单位居住区和新居住区3类。

旧居住区是以旧城区为主的市中心区居住地区。主要由行政机关、商业和服务业设施、一些街道工厂及其家属区组成。1949年以前建设的低层住房多，房屋配套设施差，建筑密度大，各种用地混合严重，居住环境差，并且人口密度大，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相对较多，职、住接近上班方便，利用市中心区各种设施便利等为旧居住区的特点。一般说来，这里的居民对迁往郊区有抵触情绪。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旧城改建，旧居住区的景观和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居住用地的缩小和与之对应的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增加；其次是建筑的高层化和利用上的多功能化，即改建、新建后的中、高层建筑有的全部用于住宅，有的则为住宅和商业、服务业共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研究表明，近年旧居住区的人口密度在下降[①]。但也有一些中等城市，旧城改造不是起了分散人口的作用，而是加速了人口向市中心区的

---

① 胡兆量、福琴(Peter Foggin)："北京人口的圈层变化"，《城市问题》，1994年，第4期，第42～45页。周春山："改革开放以来大都市人口分布与迁居研究——以广州市为例"，中山大学博士生论文，第150页，1994年。

集聚[1]。因此,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城市的旧居住区,经旧城改造后表现出不同的土地利用、居住结构等方面的特征。

单位居住区是指1949年以后的30年间围绕旧城区、以单位的形式建设而成的居住地区。其特点是4～6层的中层住房多,配套设施较全,居住环境质量较旧居住区为好,绝大部分住房是工厂、行政机关、科研教育单位的住宅,就近上班者多。人口密度普遍较大,中层住宅区每平方公里2～3万人,高层住宅楼集中地区每平方公里高达5～6万人。

新居住区是80年代以后在建成区周围开发、建设的郊区居住地区,其最大特点是职、住分离性。中、高层住宅多,配套设施全,生活环境好,核心家庭多。其居住者有两种类型:①自己购房的高收入阶层,趋向于高级住宅及花园式住宅;②单位组织搬迁者,多住中、高层楼群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近年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和住房困难户的住宅为目的的"康居工程"加速了新居住区的发展。这些以小区成片改造、开发为主的住宅建设,增加了城市居住类型的多样性,促进着城市居住地域的分化,形成着独特的中国城市居住地域结构。

(二) 城市中心区及其特征

关于中国城市中心区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随近年许多城市要建设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呼声的提高,出现

---

① 根据1994年11月作者在本溪、铁岭等市的访问调查。

了关于北京市[①]、上海市[②]、广州市[③]、西安市[④] 等大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实证研究。这里以上海市的研究为基础，说明中国城市中心区的特征。

上海市中心商务区的范围一般是指西藏中路以东至外滩、苏州河以南至金陵东路之间的区域，分属外滩、南京东路、人民广场和金陵东路4个街道辖区，总面积4.96平方公里。早在19世纪后期，上海中心商务区已初步成形。发展到本世纪30年代时，已经有以外滩为中心的金融为主的中心事务区和以今南京东路为中心的中心商业购物区。但是，从1937年到80年代初的40多年间，上海中心商务区处于发展停顿阶段，与国外大城市CBD的发展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进入80年代后，中心商务区又再次进入发展期。

根据严重敏等的研究，上海中心商务区的高层建筑比重不高，垂直利用有待调整和开发。中心商务区的主要3条街道中，外滩以六七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为主，南京路南北两侧以3层建筑为主，而西藏路2层以下的建筑占一半（表101）。中心商务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基本上从建筑物的底层利用状况得到反映（表102）。也就是说，底层建筑的55%用于商业，而用于金融的只有2%，用于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办公用房占7%，用于旅馆业为5%，说明

---

① 杨吾扬、谢东晓："北京市中心商务区的现状与预测"，《城市问题》，第16～19页，1992年，第3期。

② 严重敏、宁越敏："略论上海市中心商务区的改造和发展"，《城市问题》，第28～32页，1992年，第4期。

③ 阎小培、许学强等："广州市中心商业区土地利用特征、成因及发展"，《城市问题》，第14～20页，1993年，第4期。

④ 刘彦随："中国内陆大城市中心商业区发展布局探讨——以西安城市中心区为例"，《人文地理》，第14～20页，1995年，第10卷第1期。

上海中心商务区中心商业购物区的性格强，尚未形成金融业和办公业发达的中心事务区。这也是许多中国大城市中心区的共同特征。另外，建筑物的垂直利用特点是，低、中层以商业和居住为主，中、高层以办公和旅馆占优势。

表 101　上海中心商务区沿街建筑的高度分类(%)

层高	1～2层		3层		4层		5层		6层		7层以上		合计	
街名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数量(个)	%
外滩	0	0	3	14.3	3	14.3	1	4.8	6	28.6	8	38.1	21	100
南京路南侧	7	15.2	21	45.7	4	8.7	2	4.4	5	10.9	7	15.2	46	100
南京路北侧	12	16.2	29	39.2	15	20.3	6	8.1	6	8.1	6	8.1	74	100
西藏路	34	50.0	13	19.1	10	14.7	5	7.4	2	2.9	4	5.9	68	100

资料来源：严重敏等："略论上海市中心商务区的改造和发展"，《城市问题》，第28～32页，1992年，第4期。

表 102　上海中心商务区沿街建筑的垂直利用分类(%)

层高＼功能	旅馆	办公	日用商业	高级商业	金融	住宅	其它	合计
6层及以上	61.7	23.4	6.1	0	4.3	0.3	4.2	100
5层	31.8	33.0	11.1	1.6	1.5	7.6	13.4	100
4层	24.9	38.3	9.9	2.8	1.2	12.4	10.5	100
3层	21.1	24.2	9.9	5.8	0.9	17.2	20.9	100
2层	11.7	20.3	12.9	13.5	0.9	22.3	18.4	100
1层	7.6	14.7	20.4	17.2	2.3	22.1	15.7	100
底层	5.0	7.0	39.4	15.9	1.9	1.0	29.8	100
合计	19.3	18.0	19.5	10.6	2.0	11.6	19.0	100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三）城市工业区及其特征

中国城市中工业用地所占比例一般都较大，并且，许多城市里

的工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展起来的,工业用地有围绕市中心区向外扩展分布的特点。

一般来说,中国城市地域中的工业区可划分为3个地带:①市中心区街坊工厂为主的旧工业地带;②包围旧城区由大、中型工业企业构成的混合工业地带;③新兴的郊区工业地带。

旧工业地带中的街区工厂主要是服装和印刷业等典型的城市型工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用地紧张,运输困难。工厂和居住、行政等用地混杂在一起,工业对居民区的干扰大,环境污染严重。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城市的中心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退二进三",部分工厂外迁或倒闭,工业用地大幅度下降,商业、服务业用地比例增大。广州市的研究表明,老城区及其周围的工业区的工厂数和职工人数比重呈负增长,城市工业由城区向边缘区和郊区扩散,工业郊区化趋势不仅加快,而且范围很大[①]。因此,中国大城市中的旧城区工业地带正在逐渐消失。

混合工业地带指的是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建设的、以国营大工厂单位群为主要形式的、包围旧城区的新建成区工业地带。尽管单位内都包括工厂以及住宅等设施,但由于工厂占地大,工厂和住宅之间有一定距离,能明显看出工业区的分布范围。并且,在城市工业用地规划下,一般都有专门化分工不同的若干个工业区。例如,兰州市新建成区工业地带内分布有盐场堡医药、纺织和日用品生产工业区,西站石油机械、交通机械和纺织工业区,安宁电器、电子工业区,东岗机械、钢铁工业区,西固石油精炼、石油化工区

---

① 胡华颖:《城市·空间·社会——广州城市内部空间分析》,第33~4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等。另外,混合工业地带形成期及形成以后,其内部不断充填住宅楼,外部又建设新居住区,以致形成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包围和反包围的“千层糕”式空间结构。

郊区工业地带是80年代以后新建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特色的新型工业区。与前两个工业地带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分离,其主要形式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开发区。例如,有名的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利用海淀区大学和科学院的高智力密集优势以及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促使科研成果产业化、产品化,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这种成功的经验又很快辐射到中国的各大中城市,给城市工业增添了活力,促进了城市工业地带的扩展、更新和合理化。但是,多数郊区工业地带中没有统一的较为完善的生活居住条件和必要的商业、服务业及文化福利设施,职工生活主要依赖城区,导致了只有工业分散而没有人口分散、部分职工从城区向郊区通勤的现象。

(四) 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地结构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在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指导下,不重视发展商业、服务业以及设施网点的配置问题,导致城市商业用地比例极小,商业地域的形成及分化不明显。城市零售商业以国营百货店为主,主要布局在市中心部的传统商业区和各个区的中心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商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各种层次的商业中心逐步建立,形成着中国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地体系。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研究，中国城市内部商业中心地结构分为3级。

第一级是市级商业中心。如北京市的王府井、前门和西单，上海市的南京路，广州市的中山五路等。市级商业中心一般都位于历史上形成的市中心部传统商业区内，其特点是商店数目多，经营商品品种多，并且以高级、专门用品为主，特色店和名店多。这里行人流量大，比如上海市南京路平均每天的行人流量高达100万人次。近年，这些市级商业中心经过旧城改建后，新建、扩建了一些超级购物中心，职能更加齐全化、高档化，加上交通便捷性的改善，吸引了全市和大量域外的购买人口。

第二级是区级商业中心。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中商业设施规划的影响，中国城市地域内各区都有其商业中心，以一家综合性的、经营商品品种丰富的百货商店为中心，集中有日用品、非耐用消费品以及一些中、高档商品的商店，有的还有一些专门性商店，基本上满足了各区居民的购物需求。近年，与人口的分散相对应的郊区商业中心的发展迅猛，有的已接近市级商业中心，可望成为副都心的核心部分。

第三级是小区级商业中心。相当于邻里商业中心和一些大型单位内部的商业设施。主要职能是粮油、食品、果品、小百货、点心、医药、菜场、煤炭、烟酒、理发等，以及一些小修表店、服装店等，起着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购物的作用。其服务范围小，大致为一个居民小区，服务人口为5万人左右。

此外，在中国城市零售商业中不可忽视自由市场的存在。遍及全市域的各种类型的自由市场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蔬菜、果品等饮食类用品的重要购物去处。规模较大的集贸市

场多设在小区级以及区级商业中心内，众多的小自由市场散布在居住区内及交通路口等处。

三、中国城市三维空间结构特征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城市三维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层楼房建设很快，旧城改造后的商业、服务业设施以及近郊新建的住宅楼多为高层建筑，城市形态整体上由原来的低层松散型逐渐演变为中高层紧凑型。但关于城市立体空间的研究积累还极少。

胡华颖曾使用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资料，对150个大体以行政街道管辖范围为基础的小区进行因子分析，考察了广州市三维空间结构特征。总体上看，旧城区1949年以前的低层房屋多，老城周围是五六十年代的4～6层房屋，而城市边缘地带属近20年以来的新开发地带，平房和2～3层房屋占多数。可以说，从城中心向外城市三维结构呈低—高—低的倾向。另外，用于住宅和教学、医疗、科研的4～10层房屋分布较广，但有沿一定方向呈扇状的趋势。分布分散的11层以上的房屋主要用于商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办公业，这是个有趣的结果。办公业用房多为4～6层，且保留集中在历史上行政办公集中的地方。

因此，城市三维空间结构是水平扩展和垂直扩展相结合的产物。广州市的研究中得出，带动城市平面扩展蔓延的是交通、工业和仓库功能，而带动城市垂直扩展的是居住、商业、服务业和办公业功能。

四、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

这里以兰州市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北京市的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城市内部结构的形成过程，并试图提出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模式图。

通过兰州市城市土地利用的考察，其内部地域结构有以下特征（图 23）。总的来看，土地利用有从市中心向外，由商业、行政和旧居住用地向工业、新居住用地转换的倾向。宏观上看，这与阿朗索（Alonso，W.T.）的土地利用模型所表示的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内部地域结构大致相似，可以说这是城市内部结构的普遍规律。但是，其形成机制不同，表现形式和微观特征上有很大差异，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受地价原理作用，所以土地利用地带分化明显，而中国城市以前没有地价，在考虑合理有效利用土地的城市规划和单位土地使用制度下，土地利用混合严重，地带性不明显。

对兰州市土地利用结构模式化后可得出从市中心向外的 4 个地带(图 23)。离市中心 1 公里范围的旧城区，是以商业、行政和居住用地混合组成的都心地带(Ⅰ)；围绕都心地带离市中心约 5 公里的范围是混合地带(Ⅱ)，以居住用地为主，混合有工业、文教卫生等用地；从市中心向东、西方向大约 5～10 公里的地域是以工业用地占优势的工业地带(Ⅲ)，而同地带的西北部是呈扇状分布的文教地区；离市中心 10～13 公里左右的地方是城乡结合部的外部地带(Ⅳ)，分布有新居住区和新工业开发区。另外，远离市

中心的西固工业区与上述四地带相对独立，可以看成是兰州市的又一个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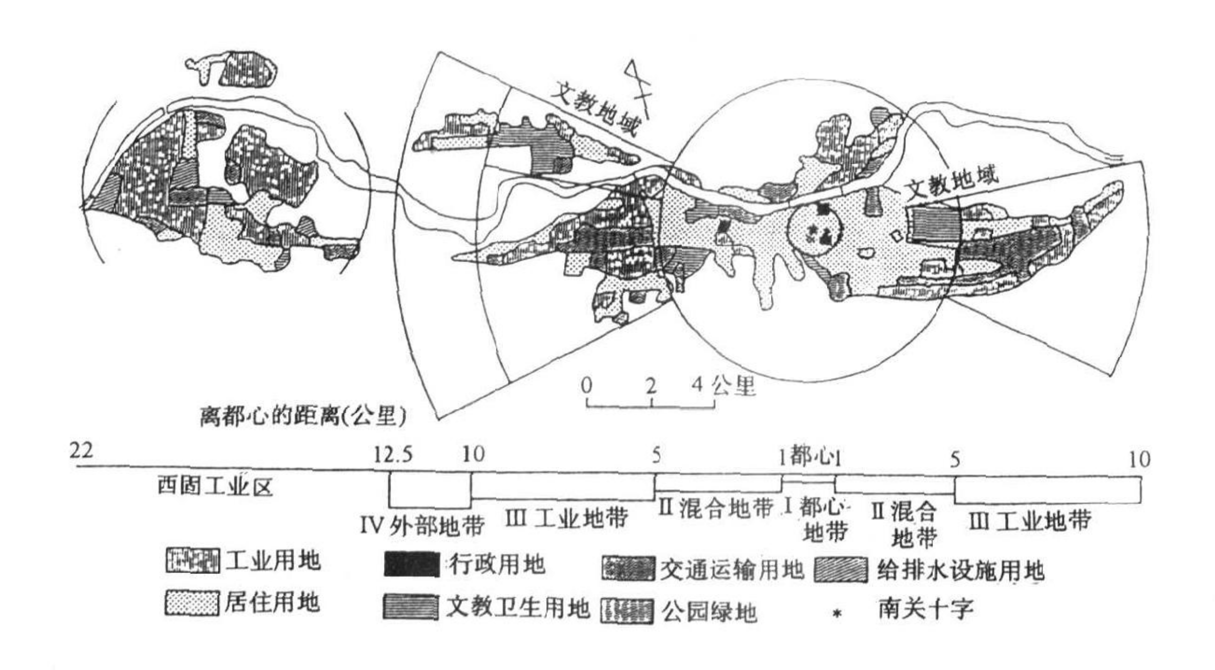


图 23　兰州市土地利用与内部地域结构模式

注：根据《兰州市现状图》(1976年)作成。

资料来源：同图21。

兰州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形成过程如表103所示。40年代时兰州市建成区仅限于城墙里的部分，面积只有3.5平方公里左右，主要是居住和行政用地。进入50年代后，兰州市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内陆城市之一，逐步建设成为以石油、化工、机械制造为主的新型重化工业基地，围绕旧城区、特别是向东、西方向上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工业地带，而都心地带里随政府机构、文教科研卫生等单位的新增和扩充，行政等用地比例有所增加；并且，城乡结合带向外推移。到70年代以后，工业地带继续扩大向外延伸，而原有工业地带里由于居住等用地的填充，变成以工业和居住等其他用地的混合地带；都心地带内居住用地减少而商业用地增加，外部地带

中新建了新居住区及新工业区。

表 103　兰州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形成

离都心的距离(公里)	W← 13	10	5	都心 1 0 1	5	10 →E
1949 年			外部地带	住·商·政	外部地带	
1950～1960 年		外部地带	工业地带	住·政·商	工业地带	外部地带
1970～1980 年	外部地带	工业地带	混合地带	商·政·住	混合地带	工业地带

资料来源:同图 21。

总之,随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大,各种城市用地在空间上相互竞争和扩展的结果,导致了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形成和演变。

另外,北京市内部地域结构的研究也反映出与上述类似的特征。首先,从市中心向外有都心地带、内城居住地带、内城周围地带、新开发地带和外部地带的 5 个同心圆地带(图 24);其次,与 5 个地带相应的居住用地分化依次表现为居住邻里地区、居住地带、混合居住地带、新居住区;再次,文教区、办公地区和新工业区呈扇状分布在新开发地带和外部地带中。

因此,以上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研究为基础,我们试图提出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的模式图(图 25)。首先,作为第一层次的土地利用结构整体上呈同心圆状,由都心地带、混合地带、工业地带、外部地带四地带构成。其次,第二层次是居住用地,从都心向外依次为旧城区邻里旧居住区、单位为主的混合居住区和以职、住分离为特征的郊区新居住区。第三层次是文教、办公和新工业用地等用途专门地区,呈扇状分布在一定地带内。最后是上述 3 层次的重叠,形成不同类型的混合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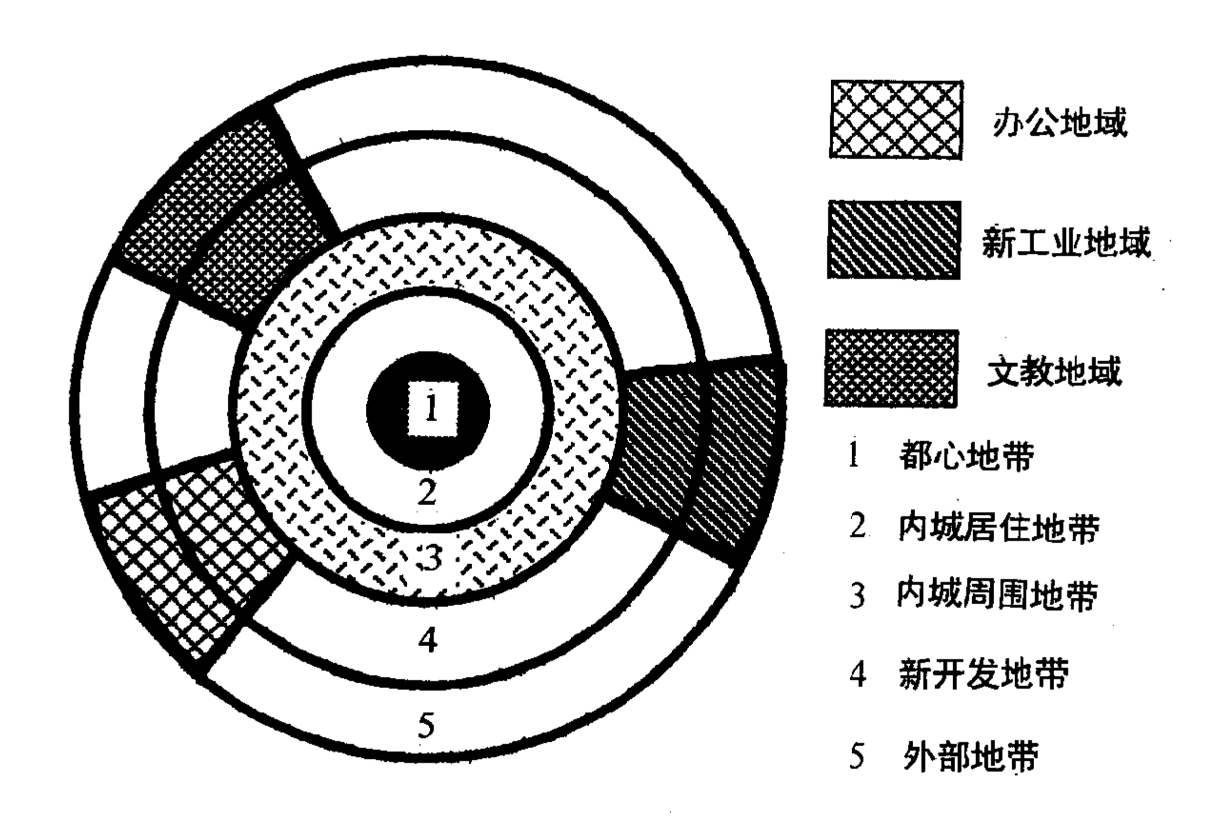


图 24 北京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式

注：根据 Gan, G. H.：Perspective of urban land use in Beijing. *Geo-Journal*, 1989. 作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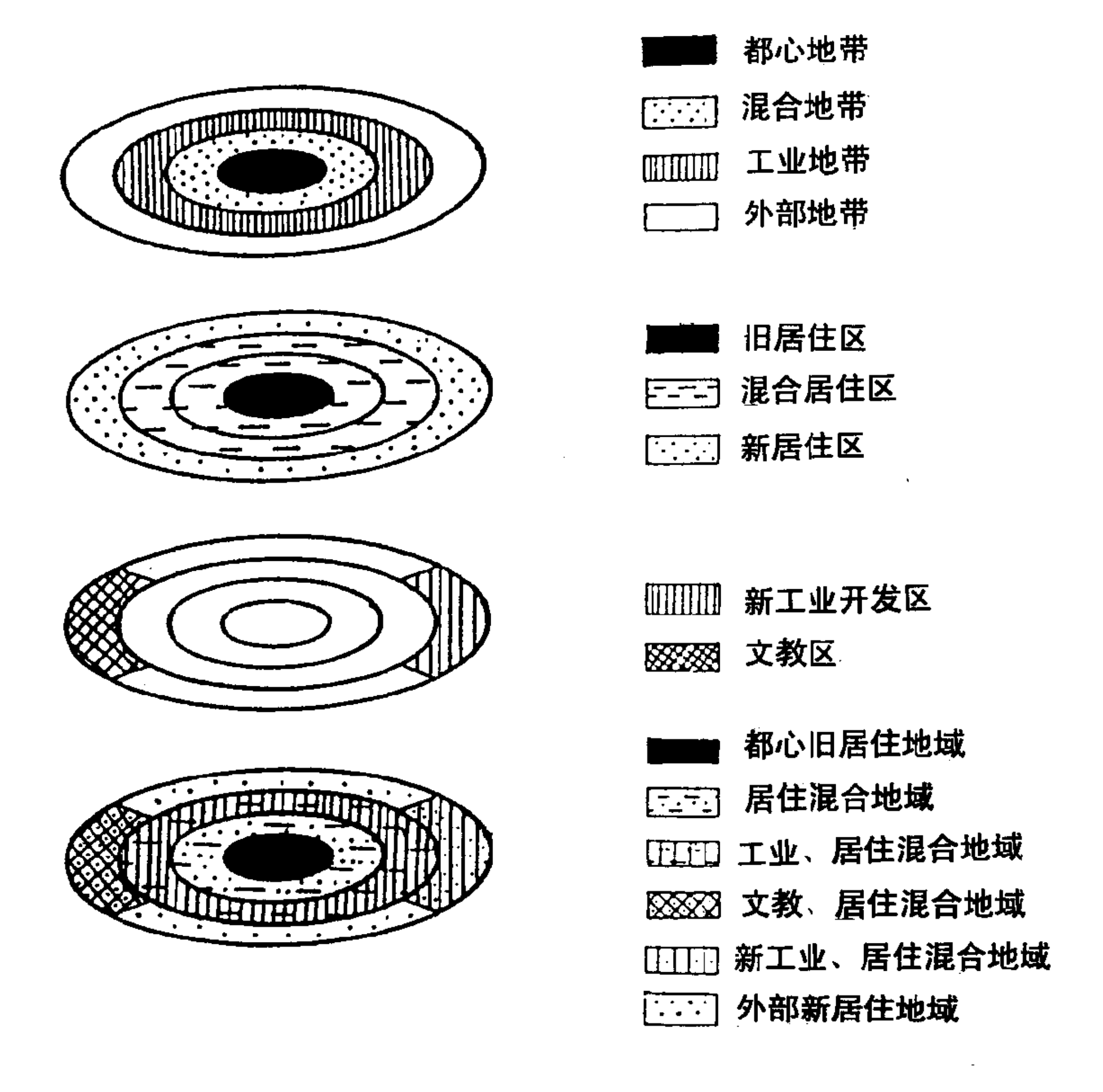


图25　中国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式图

资料来源:同图21。

第十六章 中国城市经济结构

关于城市经济结构的含义,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从城市经济发展来看,城市经济结构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类型和作用的基础及前提;而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分配、流通、消费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组织形式①。

从生产力方面看,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城市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按照产业结构划分,城市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城市的第一产业是城郊区的农、林、牧、副、渔业,它是提供城市农副产品的基础,对保证质量、缩短运输路线、节约社会劳动、减少流通费用、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城市中的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建筑业,一般说来,它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决定着城市的性质和类型。第三产业,一般说来,是为了服务于城市的主导产业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第三产业最发达的地域,几乎包括已经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的所有行业

① 刘歧、张跃庆、梅保华:《城市学》,第192~20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和部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将逐步上升到主要的地位,而且第三产业中的有些部门,也会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

一、中国城市经济结构演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产业结构有了巨大变化和质的飞跃,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但三个产业间结构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 建国初期(1949～1957年):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转变

旧中国的城市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可分为3类:①历史悠久、典型的封建性消费城市,如北京、西安、开封等,几乎没有现代工业;②典型的半殖民地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现代工业基础很薄弱,而且其经济命脉主要被帝国主义所控制;③典型的殖民地性城市,如长春、哈尔滨等,经济发展畸形,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生产能力低下,聚居着大量寄生者、冒险家,消费性强,城乡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当时城市的就业率很低,平均不到20%。

1. 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城市工业的中心任务，各地积极组织生产自救，解决了400万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并同时取缔了妓院、赌窟和其它腐朽、奢侈的服务行业；把上海等大城市一些过剩的商业和服务行业内迁至各地大、中城市，支援内地建设，使第三产业的结构和布局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1949年3月中央政府提出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其主要目标是要为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打好工业基础。在“一五”期间，集中力量进行以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除继续合理利用东北和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外，通过重点发展内地工业，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全国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这一阶段，重工业的比重持续上升，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始终快于轻工业。这是因为建国初期，中国工业落后，重工业基础尤其薄弱。在工业结构中，食品、纺织两个部门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1.6%，比其它所有工业部门之和还大。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一五”期间着重发展了重工业各部门，冶金、电力、石油、化工、机械、建材工业的发展速度都快于整个工业的平均速度；而食品、纺织两大部门的发展速度，虽低于主要重工业部门，但也相当快。到1957年，重工业各部门的比重普遍提高，

纺织、食品工业的比重相对下降，但仍占了40%[①]。结构上的变化反映了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重工业已摆脱原来那种薄弱落后的状态而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应当说，解放初首先发展重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期间各部门的发展是比较协调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也相当高。

2. 初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体系

"一五"期间,初步形成了以国家集中统一为主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系。一是撤销了大区,形成以中央部门为主的管理经济的体制,在工业、基建、物资、劳动、工资、物价、财政、贸易等方面都实行了中央集中的管理,在粮食、棉花、棉布、食用植物油等方面实行了统购统销(即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二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以实物周转为中心、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全国编制和执行计划的最高行政机关,形成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系,指令性直接计划的比重很大。三是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财务体制下运转,建立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这种体制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集中调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较快改变国家和城市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不平衡的地区生产力布局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而且在物质生产和供应不充裕的情况下,保证了城市居民低标准的生活必需。

---

① 孙敬之等:《中国经济地理概论》，第85～9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二）“左”的政策影响期（1958～1978 年）：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产业结构

1. 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极“左”的城市产业政策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建国初期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却显现出它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许多弊端。首先，这种中央高度集中的、按部门（“条条”）和按地区（“块块”）统得过严过死的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基层的生产主动性。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管理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死，对发挥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作用十分不利。尤其是从 1958 年起，国家大力提倡各地建立自成系统、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后，大中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心作用受到很大削弱。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社会生产力的理解狭窄，一般只是指工业和农业，把科学技术、信息流通领域等置之度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第一和第二产业是经济的主体，尤其认为重工业是发展生产资料的决定性因素，而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是服务性的，并且把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看作是非生产性投资而被列入次要地位。这样，过分强调城市是生产基地，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致使城市功能单一，结构趋同。社会需求商品按计划和比例分配给居民，达到自我平衡、自我供给，城市经济的流通职能逐渐削弱，第三产业萎缩。

2. 波动曲折的经济发展

经过 1958～1960 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使生产关系的变化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建设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越了国力和客观的可能性，使中国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再加上与前苏联关系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等，中国经济由此陷于泥沼之中：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生产急剧下降；②财政入不敷出；③管理混乱，经济效益普遍下降；④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率过高，其次是重工业过分超前发展；⑤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

后来，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对重工业生产进行了适当压缩，使农业、工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使中国经济遭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和损失：①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几次大幅度下降；②人口膨胀，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④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⑤对人民生活“欠账”很多。

1976 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但由于没有对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进行清理，对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作了过高估计，继续发生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致使农轻重关系继续畸形发展，重工业的生产和建设过分突出，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3. 过分偏向重工业的城市经济结构

从 1958 年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各地开展“大跃进”

活动,贯彻“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方针,对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发展操之过急。其结果是,虽然重工业在短期内有了很大发展,但经济效益很差,并导致城市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城郊农业遭到削弱,轻工业发展不足,商业被忽视,因此不得不紧接着进行调整。然而此后10余年间,国家仍然偏重发展重工业;在“三五”和“四五”时期更以战备压倒一切,对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建设比以往更加重视。而长期以来轻工业发展不够,不能很好地带动城市第三产业和乡村经济发展,难以实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生产”的良性循环,使城市不能很好地发挥中心作用。

(三) 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至今):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

自1979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模式,充分肯定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围绕搞活企业的中心环节,在计划、财务、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展开,使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逐渐加强,社会主义市场不断扩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方式有所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机制向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方向转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2.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一个城市,要从整体上提高经济活动效益、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功能,除了改革体制之外,还需不断调整整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市场经济之后,为了保障社会的基本需求,经济发展的基础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但市场的作用在迅速扩大。尤其是城市的经济活动已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作为周围地区贸易集散的中心,市场和流通作用更显得重要。因此,城市由过去单一的生产基地式,向具有流通、金融贸易、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旅游休闲等综合功能的城市转变。

3. 第三产业、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各种服务业蓬勃发展,具体表现在:饭店写字楼拔地而起,商业服务业面目一新,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各种银行比比皆是,劳动力、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市场纷纷建立,新兴第三产业如房地产、国际金融、信息咨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与此相应,城市就业结构和居民就业取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以来的重工轻商的观念在淡化,商业服务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其就业比重不断增加。总之,不仅人流、物流、资本流,甚至意识流都在向第三产业集聚。

这时期产业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高新技术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6年以来,中国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园区相继得到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已形成7900多个县级以上的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有300多万高新技术产业人员,其中科研人员近40万人。

二、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现状特征

（一）第一产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城郊农业对保证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经济越不发达，城市所需的农副产品对郊区的依赖程度就越大。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虽然城市对郊区农副产品的依赖程度会相对地缩小，但城市对郊区农副产品的依赖却不会改变。

1. 城郊农业的基础地位

随着城市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郊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并出现不稳定现象。究其原因：①一些领导干部重工重商轻农思想普遍，主张把郊区有限的耕地全部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②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多务工务副，不愿种田，有的租地给内地农民甚至弃荒；③农业投入急剧减少。最突出的是农田普遍少施或不施有机肥，破坏了土壤结构；水利配套设施多年失修，农机老化，抗灾能力下降。

从产值来看，虽然郊区农业所占比重很小，但它仍是基础产业，因为“民以食为天”，不仅城市居民要吃粮，而且市场上许多和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都与农业有联系。郊区农业的健康发展对城市中蔬菜及副食品供应、抑制物价上涨、稳定安定局面的作用十分巨大。

2. 城郊农业的合理化经营

80年代初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调动城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承包田分散零碎，农机利用率下降，家庭个体无力搞农田水利建设、无力积施有机肥等，粮、棉、油生产徘徊不前，并且有日趋萎缩的隐患。为此郊区农业必须提高规模效益，走"高产、优质、高效"的集约化经营道路。而适度规模经营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合作农场、农业合作社、粮食专业队等。

3. 城郊农村市场的建立

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是逐步恢复市场交换，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目前粮食生产除国家收购部分外，农户余粮可自由上市。除农产品市场外，还出现了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市场。这些城郊农村市场的发育是农村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目前已从自发状态步入自觉阶段，市场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如上海市郊区各类批发交易市场已发展到62个，其中1992年以后规划建设的市场多达41个，占现有市场总数的66%①。

（二）第二产业

根据1985年中国统计局颁布的规定，第二产业指工业（包括

① 张燕："加快农村市场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海农村经济》，1993年第12期。

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是目前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主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1. 工业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集中

这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突出特征,从城市的产值结构和劳动就业结构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倾向(表104)。

从产值结构看,全国城市第一、三产业平均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接近,都不足30%,而第二产业却达到46.1%,接近一半;在各类城市中,第二产业都是城市第一大产业,尤其在20万人以上的各类城市中,第二产业产值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50～100万人口城市中更是高达68.1%,与第三产业相差40多个百分点,说明城市产业结构向第二产业严重倾斜。

从劳动就业结构看,全国城市平均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数占总劳动者数的比重为37.18%,在三大产业中居第一位,高于第二产业(36.39%)。这似乎与产值结构的分析结果不相一致,但进一步分析后可知,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者的比例都低于13%,在三大产业比例中最低,而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却相反,尤其是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6.49%。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是因为近年全面推行撤县改市、市县合并的设市制度,使新设立的城市中包含了大批农业人口;二是因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三产业,因此虽然产值比重低,但从业人数的比例并不很低。

另外,从国民收入结构看,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仍然是城市经济中的主项,其中工业一项就占了60%以上的城市国民收入(表105)。

表 104　中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包括市辖县)

指标	全国	城市类别				
		>200 万人	100～200 万人	50～100 万人	20～50 万人	<20 万人
GDP(1991)(亿元)	19854.6	2422.24	1687.92	1174.36	2546.02	2746.6
一产/GDP(%)	26.6	2.3	4.5	4.1	13.5	30
二产/GDP(%)	46.1	56.9	60.3	68.1	58.3	44.8
三产/GDP(%)	27.2	40.8	35.2	27.8	28.2	25.2
社会劳动者(万人)(1993)	23515.5	2719.6	2369.3	2138.8	6635.4	9652.4
一产/总就业(%)	37.18	5.76	12.98	10.06	39.37	56.49
二产/总就业(%)	36.39	51.22	51.88	58.15	35.87	23.93
三产/总就业(%)	26.43	43.02	35.14	31.79	24.76	19.58

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

②郑定铨:"改革开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问题》,1993 年第 4 期。

表 105　中国城市国民收入结构(1990 年)　　(%)

城市类别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业服务业
>200 万人	4.76	68.25	6.69	6.45	13.84
100～200 万人	21.44	58.58	5.79	4.55	9.63
50～100 万人	22.64	57.71	5.98	4.44	9.22
20～50 万人	18.12	57.84	8.00	4.76	11.28
<20 万人	22.69	46.88	9.24	6.98	14.22
全国城市平均	16.68	60.72	6.50	5.10	10.9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计算。

2. 工业内部发展不平衡

在中国工业内部,重工业一直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在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重工业比重远远高于轻工业,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中重工业比重虽然低于轻工业,但两者只相差1.34个百分点(表106)。这主要和中国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许多国家重点投资的工业项目都选建在大中城市里,"重生产,轻生活"的方针使重工业得到了发展,而轻工业却受到抑制。

表106 中国城市工业产值内部结构(1993年)(%)

城市分类	>200万人	100~200万人	50~100万人	20~50万人	<20万人	全国城市平均
轻工业	32.53	29.41	37.35	39.71	50.67	38.24
重工业	67.47	70.59	62.65	60.29	49.33	61.76

资料来源:同上表。

另外,就重工业内部来看,结构也不尽合理。重工业一般分为机器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或者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长期以来,中国原材料工业和采掘工业始终处于落后状态,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影响经济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3. 城市工业职能结构趋同

中国城市工业职能结构的研究表明,在1984年的295个城市中,77%的城市工业部门结构同全国城市工业部门总体结构的相似系数在0.5以上,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越接近。除鞍山以外的100

万人口以上的全部特大城市、60%以上的大城市和近1/3的中等城市，都属于综合性工业城市[①]。

（三）第三产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规定，第三产业是除了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它各业的总称，它既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又包括全部非物质生产部门，所包容的行业既多又广，具体分为4个层次：①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业、公共饮食业、物资供销业、仓储业；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地质勘察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社会服务业、旅游业、信息咨询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水利服务业、水利业；③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事业、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④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对第三产业认识的不断加深，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很多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动力。1992年全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825亿元增加到6622亿元，增长了7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年递增9.9%，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率高出1个百分点。1992

① 田文祝、周一星："中国城市体系的工业职能结构"，《地理研究》，第10卷，第1期，1991年。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3.0%上升到27.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4869万人增加到11742万人,占当年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重由1978年12.1%提高到19.8%。[1]

从宏观上看,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1. 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统计资料表明,90年代初世界各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60%,其中34个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1%,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0%,22个高收入国家平均为65%。而中国1993年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不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除了产值比重分析以外的另一个衡量指标是3个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比较推动力,即3个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中所占的比重。近40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第一、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渐减弱,而第三产业的推动力日益增强,使经济走向高效、低耗、优质的更高水平。目前发达国家除日本外(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众不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均为第三产业,其比重可高达0.7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推动力平均也在0.5左右。但是中国1990—1993年第三产业的推动力只有0.26,而第二产业则高达0.62,仍处于以第二产业为经济主要推动力阶段。

---

① 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编:《第三产业与第三产业普查》,第81,37—4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版。

另外,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考察,1993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支出结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消费性支出,主要是衣着加工、家务服务、医疗、交通、文娱、住房、个人消费和其它服务消费,远远低于食品和衣着,前者仅占总支出的 16%,而后两者之和高达 64.4%(表 107)。

表 107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结构(1993 年)

项目	支出费用(元)	比例(%)
总计	2110.81	100
1. 食品	1058.20	50.13
2. 衣着	300.61	14.24
其中:衣着加工服务费	7.52	0.36
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184.96	8.76
其中:家务服务	12.03	0.57
4. 医疗保健	56.89	2.70
5. 交通通讯	80.63	3.82
6.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194.01	9.19
其中:文化娱乐	42.01	1.99
7. 居住	140.01	6.63
其中:住房	52.93	2.51
8. 杂项商品和服务	95.50	4.53
其中:个人消费	76.14	3.61
其他服务	9.67	0.4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

2. 产业内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

目前,中国城市第三产业的支柱行业仍是交通、邮电、仓储、商饮等传统性行业,新兴行业如信息、咨询、广告、房地产业等开始出现,但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表 108)。

表 108　中国第三产业分行业人员构成(1993 年)

行业构成	从业人员(万人)	结构(%)
1.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仓储业	1688	13.4
2.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3459	27.5
3. 金融保险业	270	2.1
4. 社会服务业	543	4.3
5. 房地产业	66	0.5
6.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416	3.3
7.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事业	1210	9.6
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173	1.4
9. 国家、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1030	8.2
10. 其他	3740	29.7
总计	12595	10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计算。

另外,中国对教育事业一直重视不够,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84 年在 100 个国家中,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百分比为 4.4,而中国只有 2.7,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刚果(5.4)、埃及(4.9)、几内亚(3.3)、坦桑尼亚(4.0)、约旦(7.8)、斯里兰卡(2.8)等经济状况远远不如中国的国家[①]。

三、中国城市企业组织形式

企业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不断向多样化、高级化发

① 徐刚:"中国教育备忘录",《北京青年》,1994 年第 11 期。

展。

（一）企业集团

中国企业集团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截止1994年3月，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集团已有18000多个[①]。

1. 产生背景

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背景和动因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集团并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历了一个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的发展过程。企业由最初单人出资兴办的独资企业，发展到股份公司，进而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其过程长达100多年。但是中国企业集团的形成没有经历这一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是在国家的引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国家以所有者的身份，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遵循专业化和实现规模经济的原则，把在生产、技术、经济上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组合起来构造而成的。

2. 作用意义

实践表明，若干个企业联合为一个企业集团，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①有利于调整企业组织结构，提高规模效益和社会化大生产水平。中国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

① 吴笙："关于发展企业集团若干问题的探讨"，《集团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区域政府，用行政手段组织生产，形成了企业“小而全”、“大而全”、专业化水平低、重复生产严重的格局。组建企业集团以后，使一些相关企业多层次地联合起来，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局面，发展专业化生产，克服分散、重复生产的弊端，逐步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组织社会化大生产。②有利于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企业总是各有优势和劣势，把分散的企业和生产要素以及孤立的经营行为，按照效率、互利、优化等原则重新组合，就可以取得新的优势。③有利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金的效益，用较少的资金支配较多的企业资产开展经营活动。企业要发展，靠投资扩大本企业的规模往往需要很多资金，若向其它企业投资参股或控股，形成企业集团，就可利用其它企业的资产，不仅节省投资还可减少风险。④提高了企业组织的集中度，有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加强宏观调控。中国有上百万个企业，特别是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分散进入市场，增加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通过发展企业集团，以大型企业为核心，打破条块分割的界限，将大批中小企业组织起来，使其经营活动有序化，可以大大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灵敏度。

（二）跨行业公司

1. 产生背景

目前，中国企业联合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服务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集团型企业不仅在工业中继续发展，而且在商业、服务业、运输业和各种知识技术产业中都在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在横向联合基础

上的跨行业公司。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新的组织形式，它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实行跨行业经营的主要目的是：①减少经营风险，通过不同产品或行业间的补偿效应可使整个公司的投资报酬率相对稳定；②充分利用公司内部各类资源，发挥资金效力。中国企业组建跨行业公司的趋势已日趋明显，逐步突破了“所有制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财政上交渠道不变”的束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在较大范围内优化组合，形成较好的整体优势和规模效益，增强了参与大市场的竞争力。例如，首钢目前已横跨 15 个行业，除传统的钢铁行业外，还经营采矿业、建筑、机械、电子、化工、服装等。

2. 联合形式

在国际上跨行业公司（也称多角化经营）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垂直多角化和综合多角化。

目前中国跨行业企业联合主要是集生产、经营、销售于一体的垂直组合形式。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业组合，往往能够降低成本，在竞争中不受制于人。首先，拥有原料供应企业，就可以直接得到原料，不受他人控制，又可以消除生产企业与原料供应企业之间中间商的转手贸易，降低成本。其次，运输是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如果不与运输企业形成集团组合，往往会受制于人。最后，是否掌握强大的销售网对企业来说，既是发展的保证，又是生存的依靠。中国的企业现状，往往存在中间商转手贸易问题，也有原料运输、商品销售等环节受人控制的情况。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采用产、供、销融于一体的

企业组合方式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如贵州的安顺饲料公司,近年来其产品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销路极差,公司便购买了附近一个濒临破产的养猪场。两个企业的组合,使他们都重新获得了生机,以更强大的实力投入了新的市场竞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物质产业部门与知识部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许多知识产业的企业也纷纷进入跨行业公司形成一种新的跨行业组织形式。这为科研、设计与生产相结合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能够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促进科研、生产、流通、服务相结合。中国有不少科研、设计机构及大专院校具有一定的科研、技术力量的优势,却不能很好地用于生产,而一些企业的科技力量不足。通过跨行业企业联合,可以促进科研、设计成果及时转化为商品,使科技与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

跨行业公司的另一形式是涉足金融界。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突出。企业要扩大,要发展,资金往往是最大的制约因素。金融可谓是经商办实业的后盾,有了金融的支撑,就有发展的保证。因此,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也必须要向金融业发展。现代国际上的大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有从事金融业的企业,甚至公司本身就是以银行为核心,通过对有关企业进行系列融资而形成。拥有金融业的跨行业公司,不但能够快速、低成本地筹集资金,而且能够高效地运用企业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为企业集团的公司收购或反收购行为随时提供大量的货币。中国目前经济正处于迅速增长时期,企业对资金需求极为旺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金融业必须向企业开放,企业也必须大胆涉足金融业,否则无法与先进国家的大公司竞争。

（三）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

1. 世界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拥有巨额的资本、庞大的生产规模、先进的科学技术、全球的经营战略、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世界性的销售网络，已经将触角伸向全球各个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对“无国界”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发表的《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目前世界上跨国公司的总数为37000家母公司和20多万个海外分支机构，它们在全球的销售额超过了世界贸易总额，达4.8万亿美元。1992年，按海外资产排名的最大100家跨国公司拥有3.4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40%投入在国外[①]。

2. 中国建立跨国公司的必然性

面对世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建立跨国公司是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首先，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进程，迫切需要我们推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与之相抗衡，以共同分享国际利益；其次，随着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恢复，中国将敞开国门，势

① 储祥银：“跨国投资的新动向”，《经济日报》，1994年10月22日。

必将让出部分国内市场,为此不得不开拓国际市场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可见,跨国公司是90年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 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的跨国公司经营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91年底,全国业已批准在73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港澳地区)建立各类企业近2000家,累计对外投资金额为16亿美元。其中贸易型企业800家,生产性和其它服务性企业1000余家[①]。

企业走向国际化可以获取所需的资源、资金、技术,以及逃避关税的好处。例如首都钢铁公司于1988年和1992年先后兼并了美国麦斯塔钢铁公司70%的股权、加利福尼亚钢铁公司第二转炉炼钢厂的全部产权和秘鲁铁矿公司的全部股权,其投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工程设计技术和铁矿资源。再如北京第一机床厂在美国投资经营"好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后,没有另外支出软件购置费便掌握了该公司原有的先进数控技术及系统,并为母厂进行了配套数控系统改造;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美国公司充足的科技人员和快捷的元器件供货系统开展新型数控机床的研制,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无论是大型企业集团,还是专业外贸公司,其经营规模、行为方式等与世界大的跨国公司相比,均相距甚远,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落后的。目前中国吸收外资与海外投资的比例仅为1:0.05,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1),

---

① 徐惠兰:"跨国公司:我国企业的战略选择",《集团经济研究》,1994年第3期。

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0.13)[①]。为使中国跨国经营的企业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需要完善海外投资法规体系,优化中国跨国公司的宏观环境,培育和发展为跨国公司服务的金融体系,开展对外投资保险业务,完善对外投资的财税政策,赋予企业更多的外贸自主权,而更重要的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

① 徐惠兰:"跨国公司:我国企业的战略选择",《集团经济研究》,1994年第3期。

第十七章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一、中国城市的社会组织形式

（一）行政组织结构形式

现在，中国城市行政组织由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构成。区有建成区内的城区和建成区边缘的包括部分农村地域的近郊区之分，如北京市有4个城区和4个近郊区。区的人口规模从几万至近百万，多种多样。区级政府具有比较独立的行政机构，各区单独安排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区一般可划分为若干个街道办事处，成为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比如北京市海淀区内划分成17个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的范围与公安派出所的管辖范围相一致，其行政机构比较复杂，这里以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为例加以说明。街道办事处的行政人员由党、政两大部分组成，青龙桥街道办事处行政人员共150人，其中党机关16人。街道办事处除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外，还包括生产和服务等部门，比如青龙桥街道的生产服务联社的工业科和商业科有14个企业，劳动服务公司有11个企业，对扩大就业、改善居民生活、增加街道财政

收入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街道办事处又由若干个居民委员会组成。居民委员会是在街道办事处领导下的居民自我管理的组织,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其管辖范围大致与公安派出所的户籍管理区域相对应,一般有100～700户,而居民委员会内又以15～40户为单位分成若干个居民小组。如青龙桥街道办事处居民科管辖14个居民委员会和13个家属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行政机构与街道办事处的有类似之处,如青龙桥居民委员会有5人,包括主任、副主任、党书记、校外指导员、妇联主任。居民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向上级部门陈情、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调解居民间的矛盾和纠纷,管理管辖区域内的卫生、治安、住宅以及计划生育等。近年,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居民委员会又有了一些新的职能,这主要是与积极发展城市第三产业相对应的经济活动及社区服务的导入,如经营便民商店、饮食店、理发店、服装裁剪、托儿所、牛奶站、公用电话等,既方便了居民生活,又增加了就业及财政收入。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在城市社区服务中的作用，这里以南京市挹江门街道及所属居委会建立的社区服务网络进行说明[②]。这里对以街道和居委会为依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实行了系列化和网络化，共建有10个服务网络：①老年人服务网络。街道设老龄委，居委会设老龄组，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使其安度晚年。②妇幼儿服务网络。街道有妇联和关心下一

---

① 立石昌广:“中国の基层行政组织とサービス部门——北京市郊外の‘街道’の调查报告と资料”,《アジア经济》,第63～84页,1992年第33卷第9期。

② 陈润田：“城市区街服务社会化刍议”，《城市问题》，第53～56页，1992年第2期。

代协会，各居委会组建了妇代会和关心下一代协会分会，并办了妇女法律，妇幼保健咨询，孕妇保健班，家长学校，各类托儿组织，各类儿童食堂，按地段配备了校外辅导员。③拥军优抚服务网络。街道民政科在各居委会组建了拥军优抚服务组，对优抚对象上门服务。④残疾人服务网络。建有福利工厂 1 个，残疾儿童福利院 1 个，精神病疗养站 1 个，精神病患者监护组 24 个；还积极组织残疾人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帮助残疾人康复和就业，接受教育，参加社会。⑤便民服务网络。组建邻里互助组 295 个，设便民服务站 15 处，便民服务箱 15 个，有志愿服务人员 1170 人。⑥婚姻与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有婚姻介绍所和计划生育协会等。⑦民俗改革服务网络。成立红白事理事会或民俗改革小组，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移风易俗。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由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驻街道的单位人保部门派人组成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各居委会组织有治保会、民调会、联防组、帮教组等。⑨卫生绿化服务网络。街道有卫生绿化科，居委会有卫生检查员和绿化管护员以及专业保洁队、儿童义务护花组等。10文化教育服务网络。街道有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化中心和社区教育委员会，自筹资金建的文化楼里设图书室、录像室、游艺室等。

（二）城市社区类型及特点

如前所述，中国城市由单位地域社会构成，单位及其空间分布状况基本上决定了中国城市社区的类型和特征。

根据吴缚龙的研究[1],中国城市社区主要有以下4种类型。

1. 传统式街坊社区

主要集中在旧城区。这里发展历史久,人口密度高,居民职业构成复杂。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大杂院式的住宅里,邻里关系密切,居民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纽带。街坊社区中居民的地域归属感和安全感强,邻里互助活动频繁,自愿团体相对较多。随近年旧城改造的进行,这类社区正不断减少。

2. 单一式单位社区

"单位办社会"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单位社区,呈组团状广泛分布在城市地域,特别是新建成区中。居民职业构成比较明晰,居住用地和生产用地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和隔离带,生活环境质量较好。但社区气氛淡薄。由于个人生活和单位组织密不可分,社区活动多被单位活动替代,虽然邻里之间比较熟悉,但参加社区活动的意识不强。并且,单位社区居民在单位中结成了一些非正式结构关系,往往是单位中的职位和人际冲突引到社区之中,而社区活动又诱发单位中的复杂关系。单位社区居民一般对单位的隶属感强,而对居住社区的地域意识淡薄。

3. 混合式综合社区

主要是70年代末开始在建成区边缘以及郊区兴建的居住功

---

① 吴缚龙:"中国城市社区的类型及其特性",《城市问题》,第24~27页,1992年第5期。

能为主的大型居住区。居住环境较好,生活设施配套,往往具有多功能的商业中心。由于建设历史较短,且多数住宅是独门的套房,缺乏公共空间,居民之间来往比较少。社区的空间仍为单位制所分割,形成区中之区或区中公寓,自设围栏,建立门房。但由于利用共同的生活设施,如幼儿园、学校、停车房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气氛在逐步改善中。由于生活角色和生产角色不重合,居民有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另外,这类社区内部出现着阶层和职业的空间分异。

4. 演替式边缘社区

城市边缘地带的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社区。居民职业构成复杂,流动性强,是旧居民(原地农民)和新居民(城市居民和外来居民)的混住地区。传统的乡村式血缘和地缘纽带逐步解体,邻里社会控制减弱,而城市的异质性人际关系尚未完全建立,生活组织管理等方面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共同的社区规范,地域归属感和安全感较差。

目前,上述各类中国城市社区受住宅商品化,家庭劳动的社会化,公共服务设施的社区化,社区服务的制度化,社区和集团的多元化等等因素的影响,正处于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

(三) 民族聚居状况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有55个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和农村地域中。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居的。并且,各

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中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城市少数民族构成中以回族人口所占比例大为特点，如回族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上海市是90%以上，南京市是96.6%，郑州市是97%，开封市是95%，等等[①]。回族人勤劳，智慧，善于经营，有从事流通领域和商品交换，特别是从事清真饮食业、皮毛加工业等产业的特长，其居住区在城市里形成并不断扩大以后，成为一定规模的回族聚居区。像这样聚居在城市内特定街道上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是回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共同的特点。如天津市的红桥回族聚居区，沈阳市的西关回族聚居区和西塔朝鲜族聚居区，兰州市的柏树巷回族聚居区等等。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内一般办有民族小学、幼儿园、民族中学、民族中专等，对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北京市宣武区牛街回民聚居区的调查，回民的文化程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文化程度者从1953年的8.3‰提高到1982年的28‰，高中文化程度者由1953年的23.3‰提高到1982年的226‰；与此相应，12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由1953年的409.2‰下降到1982年的120.3‰[②]。

另外，根据我们1994年10月对兰州市柏树巷回族聚居区的访问调查，回族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很大变化。例如，被访问的3代回民家庭中，尽管礼拜等习惯一样，但3代人之间的生活方式有许多不同。70多岁的父辈住着更具民族传统特色的四合院，一天的时间主要用于念经和做礼拜上。40多岁的儿辈80年代初就

---

① 张崇根："都市中的少数民族及都市对少数民族发展繁荣的作用"，《民族研究》，第3～7页，1990年第1期。

② 张天路："北京少数民族人口的特点"，《人口与经济》，第7～13页，1985年第5期。

辞去电机厂工人的工作,自己兴办经营调味料、食品等的贸易公司,现在住着自建的2层楼房,装有电话,摆着许多现代化电器。到了十几岁的孙辈,初中毕业后选上回族中专,专修英语,毕业后准备去马来西亚或阿拉伯国家留学,将来从事翻译工作,把中国回族生活的巨大变化介绍给其它伊斯兰国家和全世界。

二、中国城市社会区研究

关于中国城市社会区的研究还比较少,其中广州市的实证研究领先一步。许学强等[①]使用1984年广州市居民出行调查中有关人口特征和住户特征的部分数据及1985年广州市房屋普查的部分数据,对以行政街道管辖范围为基础的109个小区,进行了因子生态分析,得出了5种社会区类型(图26),并且把广州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化(图27)。以下,对各种社会区的主要特征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进行说明。

1. 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

位于广州市中心偏西的位置,人口密集,旧住房多且质量较差,家庭规模较大,年龄结构偏老,商业职工、个体劳动者比重较高,居民文化水平较低,是广州市发展历史最早的地区。1949年后对旧城区不是成片改造,而是“见缝插针”,随人口不断增加,居

① 许学强、胡华颖、叶嘉安:“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分析”,《地理学报》,第385～397页,1989年第44卷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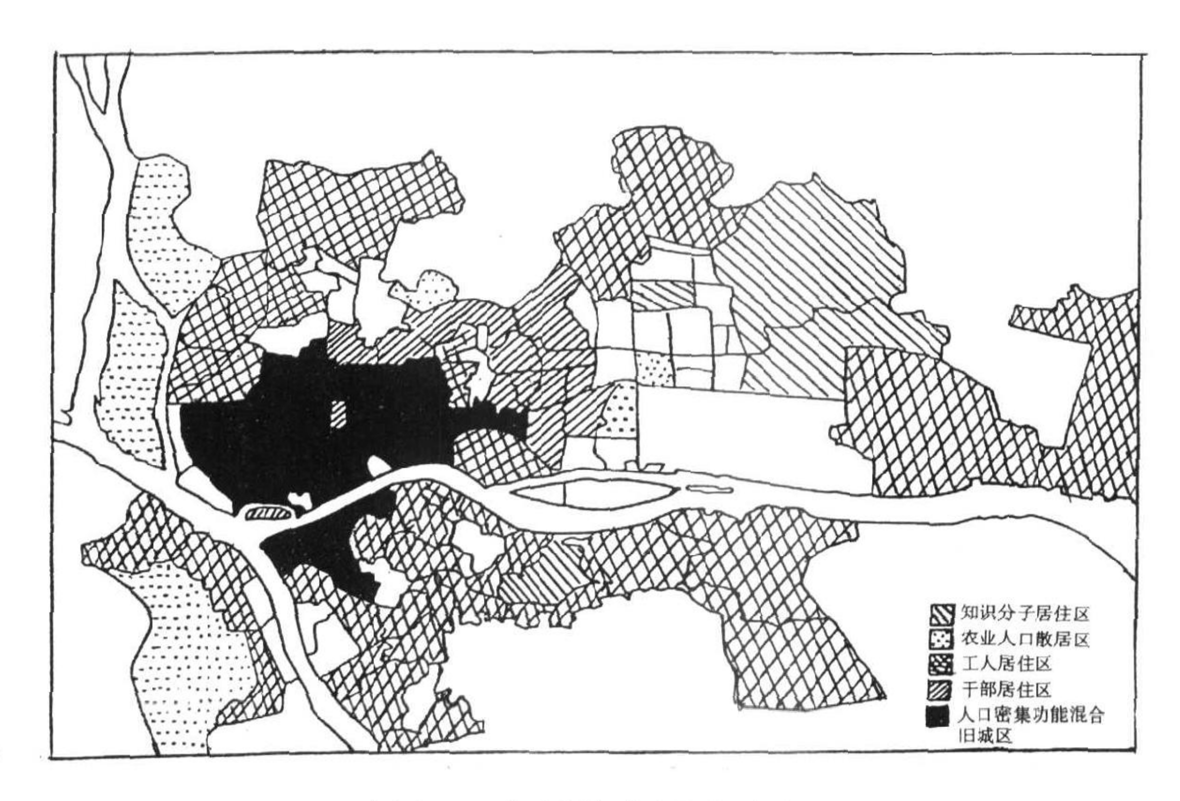


图 26　广州社会区分布图

资料来源:许学强等:"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分析",《地理学报》,第 385 ~397 页,1989 年第 44 卷第 4 期。

民住房状况越来越紧张。另外,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中住宅被作为福利设施,实行按单位建设、按单位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有条件的单位(如政府部门)可以在旧城区周围选点建房,分配给本单位的职工干部,无条件的单位(如老人、个体劳动者)只好留在旧城区。若一个家庭中无一人能分配到房子,只好"几代同堂"形成大家庭。还由于旧城区形成历史长,各种商业和服务设施齐全,生活方便,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形成人口密集功能混合的旧城区。

2. 干部居住区

主要位于旧城区的东部和北部边缘,是广州市新近发展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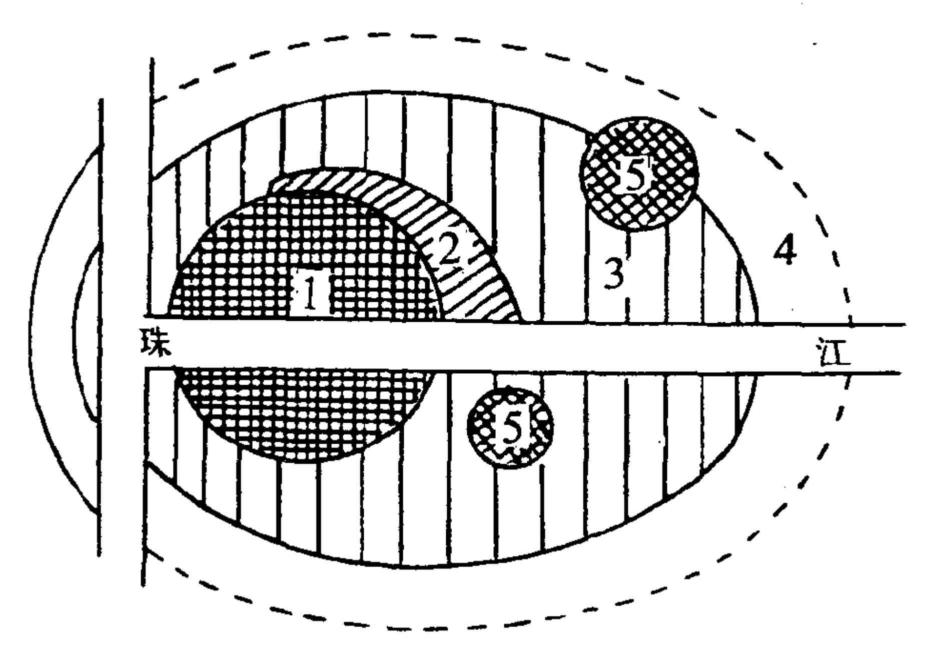


图 27 广州城市社会空间模式

1. 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 2. 干部居住区 3. 工人居住区

4. 农业人口散居区 5. 知识分子居住区

资料来源:同上图。

规模改建的地区,集中了不少新建的高层建筑。干部比重很高,居民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低,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好。这里历史上就是行政机关集中的地区,附近各单位都建有住宅,形成了以干部为主的地区。

3. 工人居住区

位于旧城区和新城区的外围地区,并明显向东延伸。占市域比重大,呈分散团块状分布。由于工厂生产用地比重大,人口密度较低,工人比重很高,其住宅虽多为 1949 年后所建,但标准并不高。另外,住宅多接近工厂,居住环境遭到一定程度污染。居民多从旧城区迁来,家庭规模一般较小,年龄结构偏轻,有 6 岁以下儿

童的户数比重高。

4. 知识分子居住区

呈镶嵌状分布，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中的文教区完全一致。由于校园面积大，师生均住在校园及其附近，所以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地区。

5. 农业人口散居区

位于城市的外围和城市各组团之间，农业用地比重大，以农业人口为主，人口密度低。近年来一方面菜地不断减少，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本地菜农以不同的形式转为非农业经济活动，而耕地转让给外来劳力经营。农民建了不少新房，但缺乏规划，占地多，房屋质量高但周围环境差。外来劳工有的租住当地农民原有旧房，有的自置木屋，环境甚差，秩序混乱。许多农民目前已不从事农业，但仍为农业户口，统计上称农业人口，因此称为农业人口散居区。

6. 讨论与展望

广州市的社会区研究表明，中国城市中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利用及分房制度。前者说明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区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后者一方面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建房和单位分配房屋的制度是中国现阶段城市社会区形成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规划部门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形成社会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居民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很小，上述社会区的形成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的那样是自发的，而往往是由规划决策机关决定的。一个单位可能既有干部，也有工人，还有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的兴趣、生活习惯、经济收入不同，但因按单位分配住房，他们必须住在同一区，其特征取决于本单位以哪类职工为主。因此，有关中国城市社会区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基本研究区的划分问题。目前以街道管辖范围为基础的小区划分意味着街道内部是均质社会区域，而事实上许多街道(尤其是旧城区的街道)内部社会差异很大。因此，有必要进行以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或者以大单位为基础的详细研究。特别是按单位建房，单位购房，按单位分配住房的制度在中国城市社会区形成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单位的社会地理学研究有待深入。其次是中国城市中社会区的特性问题。在就业选择、住房选择自由度很小的情况下，由政府和单位为主导形成的社会区，究竟与西方国家城市中的社会区有何异同，其性质如何，尚有细致考察的必要。另外，有些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形成的社会区有待研究。

三、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空间

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上班、家务、娱乐、睡眠等各种活动构成，而这些活动受到1日24小时的时间制约和交通及城市设施的分布等城市地域结构的空间制约。在时、空间有限资源限制下的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研究，有助于全面、动态地理解居民生活的整

体像，从个人生活上确认城市地域结构分化的发展阶段，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异同。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地区

1. 研究方法

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活动空间的研究，不仅要有关于出行活动的资料，而且更需要1日24小时内所有活动的资料。因此，我们采用了把出行调查和生活时间调查合为一体的活动日志调查法(activity diaries survey)对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每日生活活动的详细情况，即进行了什么活动，什么时间和谁在一起，外出时的出行目的、出行交通工具、出行所用时间等内容。有关家庭的提问有家庭结构、搬迁情况、住房状况等，有关个人的提问包括年龄、职业、单位、上班距离和耗时、各种商品的购物地和购物频率等问题。调查表由“对家庭的提问”、“对丈夫的提问”、“对妻子的提问”3部分构成，选上班日1日和休息日1日计两天，要求以30分钟为单位如实详细填写。

调查表回收后的分析步骤如图28所示。首先是数据库化。分被调查者属性、时间分配、出行基本分析指标、各种活动的时、空间展开情况。其次是分析出行类型和生活节奏。然后是划分时间利用类型，考察居民的时间利用特征。最后是分上班日和休息日来研究日常生活活动空间，并着重于各调查区间的地域差异上。

2. 研究地区

选甘肃省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城市，1992年6月对市内地域特

性不同的4个地区的居民实施了活动日志问卷调查(图29)。调查表通过街道办事处配发,尽可能选取就业夫妇家庭为调查对象。被调查家庭共300户,回收260户,下面分析中使用了有效回答里就业夫妇家庭100户,夫妇计200人,合400日的资料。被调查者的属性特征是,30～59岁者占绝大多数,60%是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从业者(即所谓的白领阶层),80%在单位及其附近上班,向区外通勤者只有11%,步行上班和自行车通勤者占85%,通勤时间在15分以内者为73%。另外,各调查区的特性如下。位于市中心部的贡元巷、广武门地区是行政、商业和居住用地混合地区,市中心部周围的白银路地区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文教、商业和居住混合地区,新城区的敦煌路地区是大工厂集中的地区,而安宁区营门滩地区是近年开发建设的近郊文教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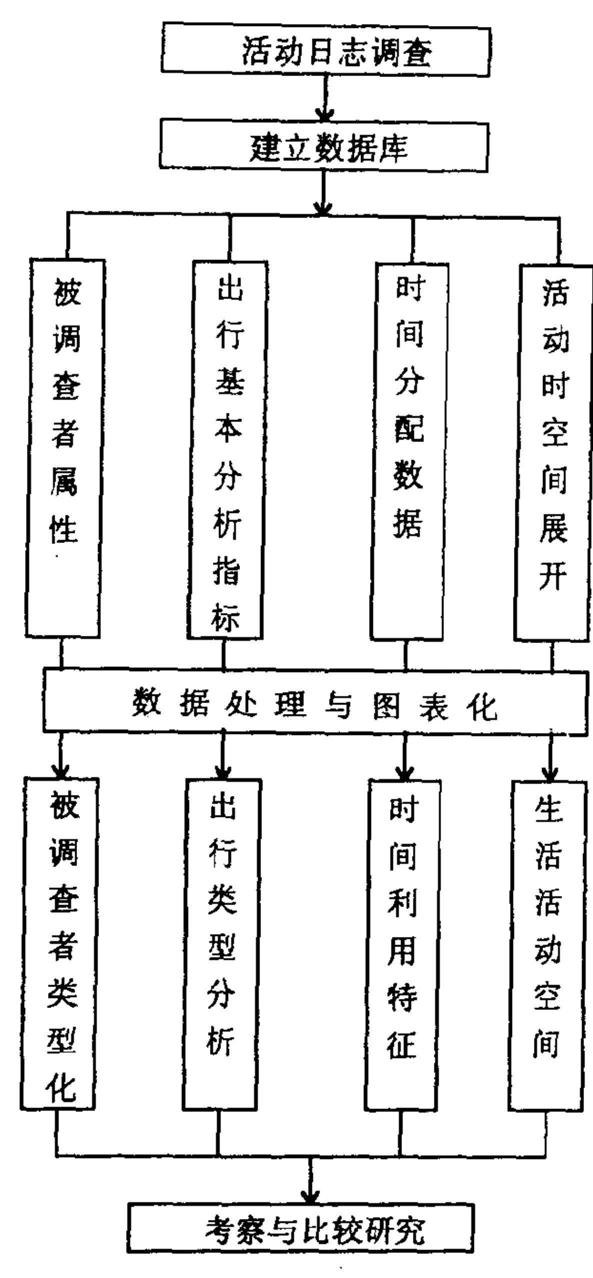


图28　生活活动空间的分析步骤

资料来源:柴彦威:"中国都市住已の日常生活における为活动空间—兰州として",《人文地理》,第1～24页,1994年第49卷第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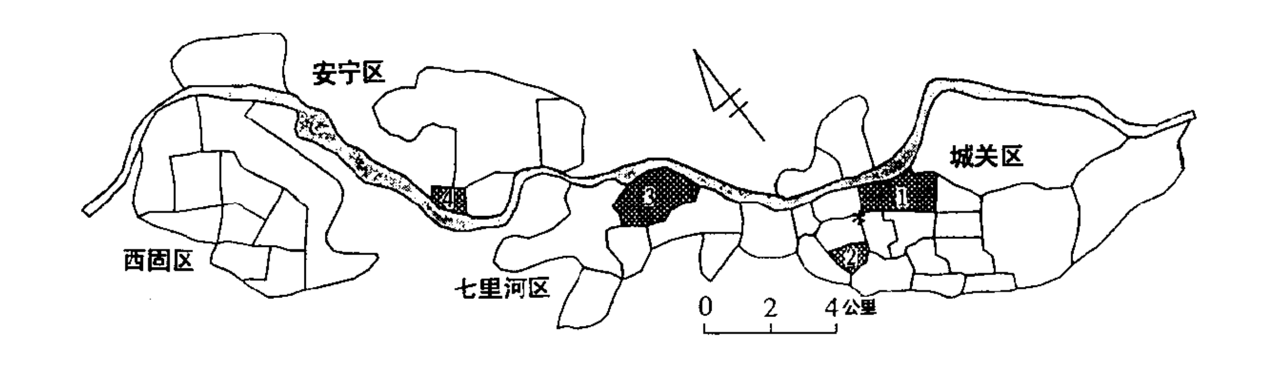


图29 兰州市调查对象地区

1. 贡元巷、广武门地区 2. 白银路地区 3. 敦煌路地区

4. 营门滩地区 * 南关十字

资源来源:同上图。

(二) 居民出行类型

1. 出行的基本分析指标

分析一日出行的基本指标有停留数、出行数、停留目的、停留目的链、移动交通手段、同伴者等。以下,对主要概念进行定义和解释。

所谓停留,是指伴随某种目的的地点间空间移动,而一次出行是指从自家出发又回到自家的一连串停留。如果一次出行中有3次以上停留就称为多目的出行,其在总出行数中的比率为多目的出行比率。被调查者平均出行数、平均停留数和出行率是分析各地区出行特征的基本指标。出行者平均出行数、平均停留数和每出行平均停留数反映出行类型和特征。

2. 上班日的出行类型

上班日出行者平均出行次数(2.3)和平均停留次数(4.7)比较多,但多目的出行比率只有8%,说明上班日具有单一目的、多次出行的特点(表109)。出行目的中"上班"占40%左右,如果除掉"回家"停留数计算可达74%以上,即上班→回家(W—H)的单一出行类型占绝大多数(表110)。这些特点从第一次停留目的中"上班"占绝大多数以及不计"回家"时第二次停留目的很少当中也能看出。而且,很少的第二次停留中又以购物目的为主,反映一部分居民回家途中顺便买东西的行为特点。另外,尽管是上班日,第一次停留目的中仍有20%左右是娱乐,并且以娱乐→回家(R—H)出行类型为主,这说明居民早晚外出锻炼的习惯。由于中国城市中双职工家庭十分普遍,上班日里地区间及男女间的出行类型之间差异较小。

表109 兰州市各调查区的出行指标*

指标	贡元巷·广武门地区		白银路地区		敦煌路地区		营门滩地区		合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出行者平均出行数	2.3 1.7	2.2 1.7	2.3 1.7	1.8 1.6	2.5 2.2	2.3 1.8	2.4 1.7	2.4 1.5	2.4 2.0	2.2 1.7
出行者平均停留数	4.7 3.5	4.6 3.5	4.8 3.6	4.0 3.3	5.2 4.0	4.9 3.8	5.0 3.4	4.9 3.0	4.9 3.8	4.6 3.6
多目的出行比率(%)	6 6	8 0	9 11	12 4	8 5	13 6	2 3	6 0	6 6	10 4

* 上段为上班日,下段为休息日。

资料来源:兰州市问卷调查(1992年)。

3. 休息日的出行类型

休息日出行者平均出行次数和停留次数各为1.9和3.7,与上

表 110　上班日的停留目的和停留目的链

停留目的 ()内为%	贡元巷·广武门地区		白银路地区		敦煌路地区		营门滩地区		合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上班(W)	54(41)	48(37)	35(38)	22(31)	56(37)	35(24)	38(37)	39(38)	183(38)	144(32)
购物(S)	2(1)	2(2)	4(4)	5(7)	7(5)	17(12)	2(2)	3(3)	15(3)	27(6)
私事(P)	3(2)	4(3)		4(6)		5(3)	3(3)		6(1)	13(3)
娱乐(R)	9(7)	14(11)	10(11)	8(11)	15(10)	21(14)	10(10)	11(11)	44(9)	54(12)
回家(H)	63(48)	62(48)	44(48)	33(46)	72(48)	69(47)	51(49)	50(49)	230(48)	214(47)
停留总数	131(100)	130(100)	93(100)	72(100)	150(100)	147(100)	104(100)	103(100)	478(100)	452(100)
第一停留目的和比率%	W52(83) R 9(14)	W47(76) R 14(23)	W35(80) R10(23)	W20(61) R 8(24)	W56(78) R15(21)	W35(51) R21(30)	W38(75) R10(20)	W39(78) R11(22)	W181(79) R44(19)	W141(66) R54(25)
第二停留目的和比率%		S2(40) P2(40)	S4(100)	S2(50)	S6(100)	S8(89)		S3(100)		
停留目的链										
W—H	50(79)	43(69)	31(71)	18(55)	50(69)	26(38)	37(73)	36(72)	168(73)	123(58)
S—H				3(9)		8(12)				11(5)
P—H						4(6)				
R—H	9(14)	14(23)	10(23)	8(24)	15(21)	21(30)	10(20)	11(22)	44(19)	54(25)
W—S—H		2(3)	4(9)		6(8)	8(12)		3(6)	10(4)	13(6)

注:"私事""娱乐"指自家外的这些活动,"回家"包括在家中的私事和娱乐活动以及家务、睡眠等活动。

资料来源:兰州市问卷调查(1992 年)。

表 111　休息日的停留目的和停留目的链

停留目的 ()内为%	贡元巷·广武门地区		白银路地区		敦煌路地区		营门滩地区		合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上班(W)	2(2)	1(1)	7(12)				3(4)	5(10)	12(2)	6(2)
购物(S)	13(13)	12(15)	7(12)	14(25)	16(21)	16(22)	14(20)	7(15)	50(17)	49(19)
私事(P)	4(4)	3(4)	1(2)	1(2)	4(5)	4(6)	3(4)	2(4)	12(4)	10(4)
娱乐(R)	32(32)	26(31)	15(26)	14(25)	19(25)	17(24)	16(23)	10(21)	82(27)	67(26)
回家(H)	48(49)	41(49)	27(47)	27(48)	37(49)	35(49)	35(49)	24(50)	147(49)	127(49)
停留总数	99(100)	83(100)	57(100)	56(100)	76(100)	72(100)	71(100)	48(100)	303(100)	259(100)
第一停留目的	R30(61)	R26(63)	R15(56)	R14(52)	R18(49)	R17(49)	R16(46)	R10(42)	R79(54)	R65(51)
和比率%	S12(25)	S 11(27)		S12(44)	S15(41)	S14(40)	S13(37)	S7(29)	S40(27)	S44(35)
停留目的链										
S—H	11(23)	11(27)	4(15)	13(48)	15(41)	14(40)	13(37)	7(29)	33(23)	44(35)
R—H	30(63)	25(61)	13(48)	17(46)	15(43)	15(43)	10(42)	75(51)	65(51)	

注:“私事”“娱乐”指自家外的这些活动,“回家”包括在家中的私事和娱乐活动以及家务、睡眠等活动。

资料来源:兰州市问卷调查(1992 年)。

班日相比都有减少,多目的出行比率也很低(表109)。出行目的中最多的是娱乐(30%),其次是购物(20%)(表111)。根据问卷调查,休息日的娱乐主要是清早和傍晚以住宅附近为中心的跑步、体操、气功等活动,以及探亲访友、看电影、跳舞、去动物园和公园等。相同的特征也在第一停留目的多为娱乐和购物,且以娱乐→回家(R—H)、购物→回家(S—H)的单一出行类型为主中反映出来。因此,休息日的外出活动不频繁,以娱乐和购物为主的单一目的出行为特征。

(三) 居民生活节奏

运用时间地理学（time-geography）方法，连续表示出一日的所有活动来说明居民的生活节奏。方法是,在活动类型的横轴和以1小时为单位的时间轴内，以某一时空间内从事某种活动的人数比率的大小来表示。并分地区、性别及上班日、休息日绘图。

1. 上班日的生活节奏

图30和图31分地区表示了上班日丈夫及妻子的各种活动的时间推移。上班日丈夫的活动特征是:①上班时间限定在8～12时和14～18时的时间段内,没有加班;②中午休息时间长,有午睡的习惯;③下班后绝大多数人不在外进行娱乐活动而直接回家,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家途中买东西;④回家后有1～2小时的家务时间段。这些特征与在日本广岛市所做同样调查的结果截

然不同[1]。相应的，上班日妻子的活动特征大体上与丈夫的情况类似，但家务时间段长，部分人提前1小时下班去购物或回家做家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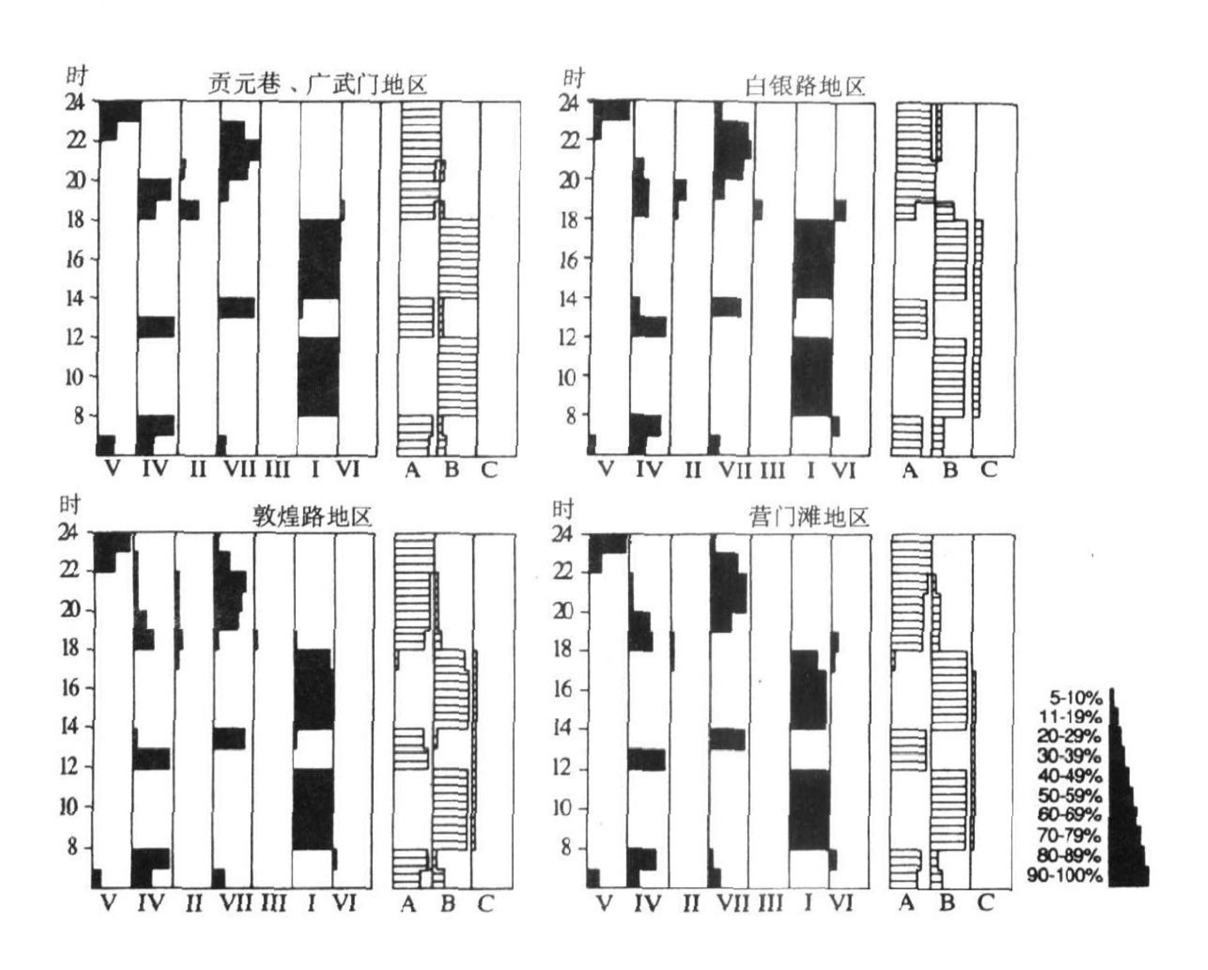


图30　上班日丈夫活动的时间推移

资料来源：同上图。

另外，从图中自家、近邻、本区外所表示的活动的空间展开上看，绝大多数人的上班日活动空间在以自家为中心的近邻地区内完结，出本区的所谓通勤人口很少。

---

① 柴彦威："广岛市民の日常生活における活动空间——壮年层居民の场合"，《人文地理》，第351～373页，1993年第45卷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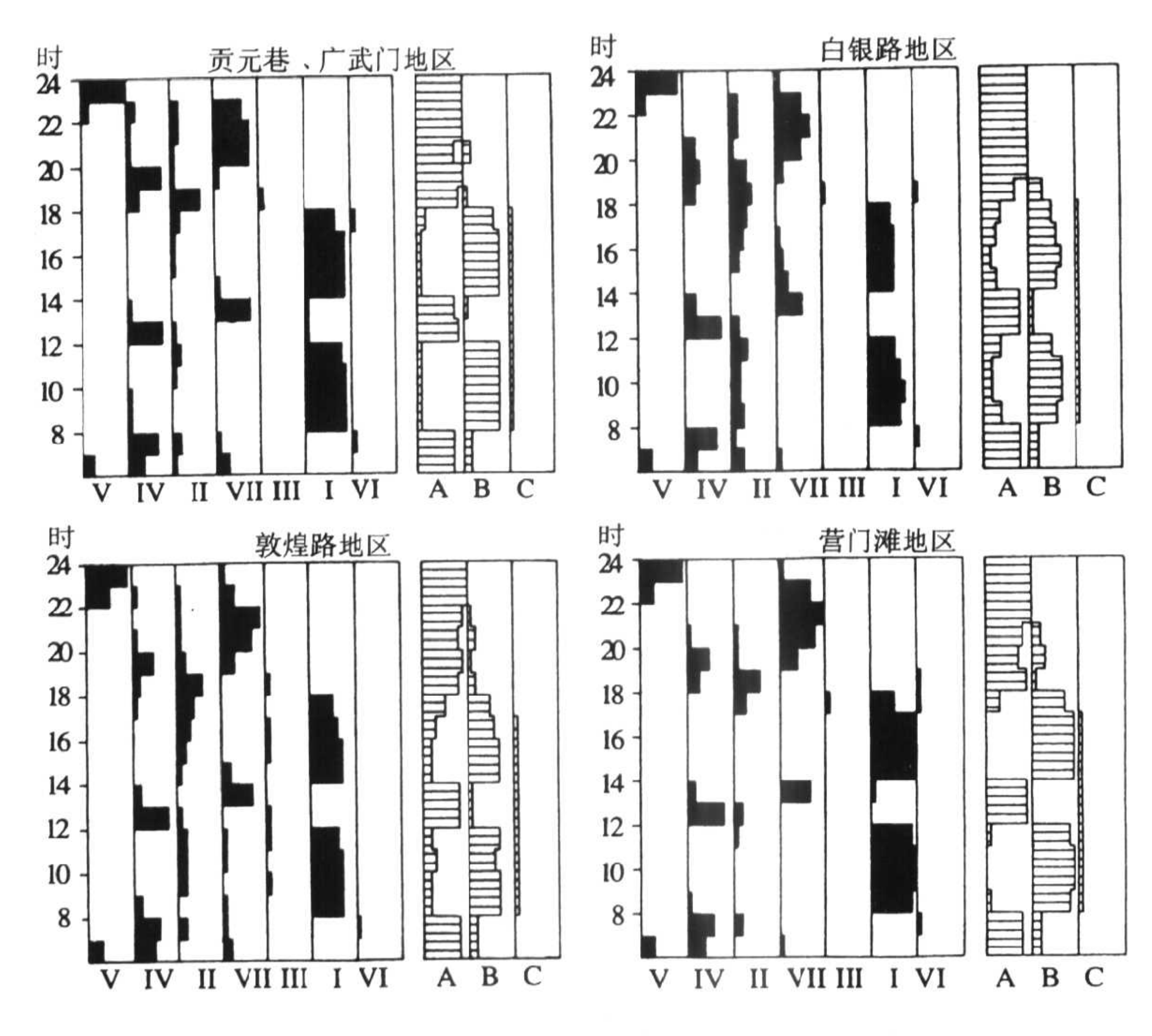


图31　上班日妻子活动的时间推移

资料来源:同上图。

2. 休息日的生活节奏

休息日丈夫和妻子的生活节奏基本类似(图32和图33)。最大的特点是娱乐时间带很长,并有午饭前、午饭后晚饭前、晚饭后的3个高峰,与午饭前和晚饭前的两个家务时间高峰带相间分布。其中妻子的家务时间带及其高峰延长更长。活动空间多限制于自家和近邻。出本区的活动在地区间、男女间有差异,即远离市中心

的地区多，丈夫多。特别是敦煌路和营门滩二地区的丈夫明显有10时左右和16时左右的两个移动高峰，并且伴随有上午和下午的两个购物时间段。这种休息日的生活节奏和活动空间特点与商业、服务业设施集中分布市中心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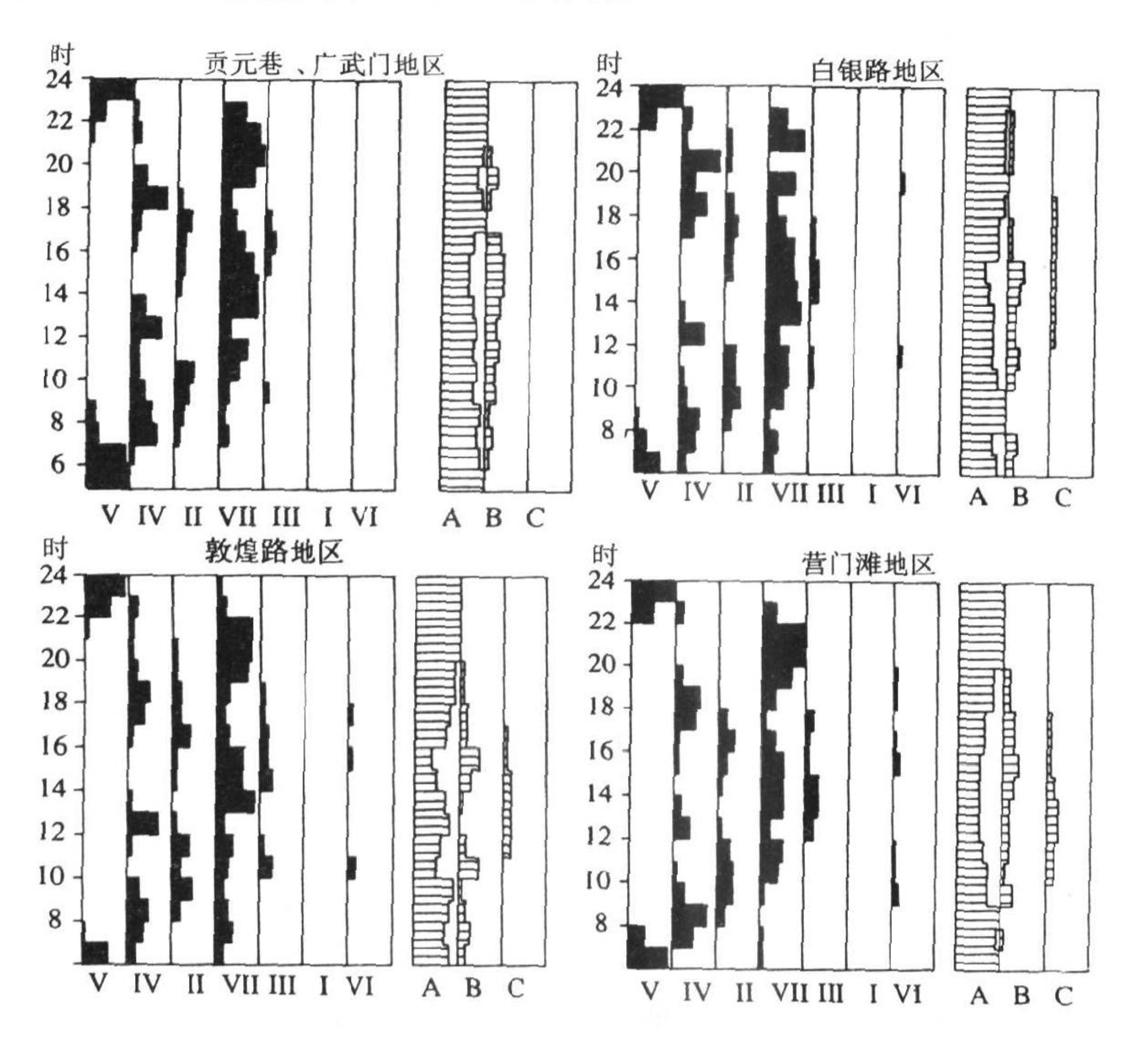


图32　休息日丈夫活动的时间推移

资料来源：同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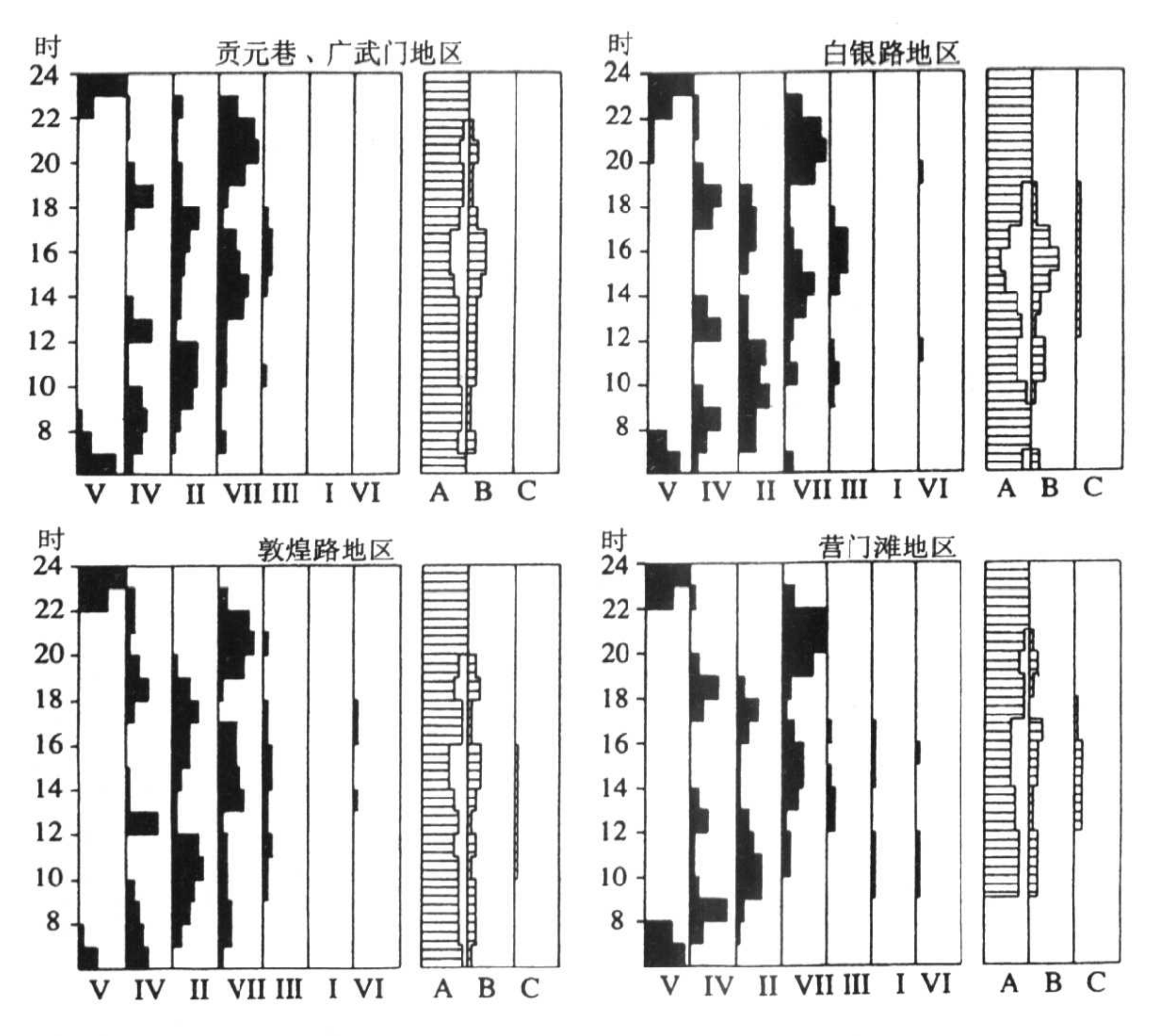


图 33　休息日妻子活动的时间推移

资料来源:同上图。

(四) 时间利用特征

对两日的时间分配数据库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出时间利用类型,再与被调查者的属性相连,考察中国城市居民的时间利用特点。

1. 上班日的时间利用特征

上班日的时间利用类型划分成6种(表112),按是否就业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上班时间的 W_1 ～ W_4 的四组,第二类是没有上班时间但家务时间很长的 W_5 和 W_6 组。下面参照表示回答者个人及社会属性的表113,对各类型的时间利用特点进行考察。

表112　时间利用类型及时间分配的平均值

(上班日)

类型	N	上班	家务	娱乐	购物	私事	移动	睡眠
W_1	70	462(32)	76(5)	188(13)	6(1)	177(12)	43(3)	488(34)
W_2	45	481(33)	0(0)	224(16)	0(0)	215(15)	24(2)	496(34)
W_3	42	476(33)	124(9)	101(7)	11(1)	191(13)	30(2)	508(35)
W_4	17	425(30)	224(16)	150(10)	12(1)	169(12)	27(2)	432(30)
W_5	8	0(0)	488(34)	218(15)	23(2)	191(12)	4(0)	518(36)
W_6	9	0(0)	252(18)	351(24)	54(4)	216(15)	18(1)	549(38)
合计	191	307(21)	194(14)	205(14)	18(1)	193(13)	24(2)	499(35)

(休息日)

类型	N	上班	家务	娱乐	购物	私事	移动	睡眠
H_1	18	17(1)	43(3)	575(40)	13(1)	188(13)	47(3)	558(39)
H_2	34	0(0)	406(28)	195(14)	56(4)	218(15)	15(1)	552(38)
H_3	32	0(0)	155(11)	264(18)	109(8)	272(19)	59(4)	581(40)
H_4	39	0(0)	167(12)	441(31)	34(2)	244(17)	28(2)	527(37)
H_5	33	0(0)	297(21)	351(24)	44(3)	194(14)	16(1)	538(37)
H_6	31	462(32)	93(7)	181(13)	7(1)	181(13)	33(3)	466(32)
合计	187	80(6)	194(13)	335(23)	44(3)	216(15)	33(2)	537(37)

注:单位为分,( )内为%。

资料来源:兰州市问卷调查(1992年)。

W_1 和 W_2 都以上班时间长为特点,但 W_1 的移动时间和家务时间比 W_2 多,而娱乐时间却少。从表112中可以看出,女性比例

表 113　不同时间利用类型的个人及社会属性比较(%)

类　型		W_1	W_2	W_3	W_4	W_5	W_6	H_1	H_2	H_3	H_4	H_5	H_6
样本数(人)		70	45	42	17	8	9	18	34	32	39	33	31
性别	男	59	89	29	12			83	18	59	72	30	55
	女	41	11	71	88	100	100	17	82	41	28	70	45
年龄	20～29 岁	7	2		18		11		6	16	10	9	3
	30～39 岁	30	20	60	29			11	27	41	31	27	23
	40～49 岁	30	29	24	24		11	56	24	25	13	24	29
	50～59 岁	27	38	14	29	100	44	22	41	19	31	33	39
	60～69 岁	6	11	2			33	11	3		15	6	6
职业	W	60	87	50	35			72	41	41	69	55	68
	B	40	13	50	65			28	35	59	23	30	29
	NW					100	100		24		8	15	3
就业地	(1)	50	58	52	82			33	42	69	64	57	90
	(2)	26	42	41	18			56	27	22	28	29	10
	(3)	24		7				11	31	9	8	14	
通勤手段*	1	14	7	7	12			11	22	15	6	7	7
	2	10	4	2				22	11	3		4	
	3	44	56	60	29			44	33	47	58	50	63
	4	33	33	31	59			22	33	35	36	39	30
通勤单程时间	A	67	76	79	82			50	42	78	83	75	93
	B	14	20	14	18			50	31	13	8	11	7
	C	7	4	7					15		6	11	
	D	11							12	9	3	4	
通勤距离	a	36	40	31	53			22	23	72	61	46	87
	b	43	47	50	47			44	31	19	28	36	10
	c	4	13	14				33	15		6	11	3
	d	19		5					23	9	6	7	

注：　W:白领阶层,B:蓝领阶层,NW:无职业及退休者。(1)单位及其附近;(2)职住接近的本区内;(3)本区外。
1:公共汽车,2:通勤专用车,3:自行车,4:步行。A:15 分钟以内,B:16～30 分钟,C:31～60 分钟,D:61～90 分钟。
a:0.9km 以内,b:1.0～4.9km,c:5.0～9.9km,d:10.0～20.0km。 * 复数回答。

资料来源:兰州市问卷调查(1992 年)。

和蓝领阶层比例相对于 W_2 为多的 W_1 中，本区外就业的通勤者占24%，单程通勤超过1小时的占11%，通勤距离10公里以上者占19%，而以男性为主、白领阶层占大多数的 W_2 中这些比例全为零。由此可见，女性就业者和蓝领阶层多为职、住分离型，通勤距离较长。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中的现象截然不同。尽管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但与前述中国城市中的单位制度及单位的空间分布有关。

W_3 和 W_4 为女性就业者比例大的两类，上班时间平均8小时左右，家务时间长而娱乐时间较短，大多数是职住接近型。其中，蓝领阶层相对较多的 W_4 有更多的家务时间，而上班时间比 W_3 要少，反映出 W_4 从事于时间比较灵活的职业。

没有上班时间的 W_5 和 W_6 全为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家务时间长，并且，W_5 的时间安排主要以家务为主，而 W_6 在娱乐及购物等活动上也有较多时间。

总之，上班日就业者的时间安排上，尽管各类型之间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是"三·三·三制"，即上班8小时，睡眠8小时，其它生活和娱乐等8小时的时间安排。

2. 休息日的时间利用特征

休息日时间利用类型的时间分配特征不如上班日的那样明显，除星期日工作的 H_6 外，依据娱乐、家务和购物的时间分配的差异可分为5类(表112)。娱乐时间最长的是 H_1(平均达9.5小时)，其次是 H_4。与此相对，家务时间最长的是 H_2(平均6小时46

分)，其次是 H_5，而 H_5 的娱乐时间也较多。剩下的 H_3 以购物和移动时间长为特点。另外，结合表 113 进行考察得出，男性构成比例高的类型家务时间短而娱乐时间长，相反，女性构成比例高的类型家务时间长而娱乐时间短。但是，休息日的时间利用类型与回答者的其它属性之间没有很强的对应关系。

(五) 日常生活活动空间

生活活动空间用时空三维图来表示，即以活动种类和活动场所的组合为横轴，以一日的主要活动时间带(6～24 时)为纵轴，用特定时空下进行特定活动的人数占各时间利用类型总人数的比率来表示生活活动空间的展开。

1. 上班日的生活活动空间

上班日的生活活动空间在就业者(W_1～W_4)和家庭妇女(W_5、W_6)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就业者间的差异在 4 种时间利用类型之间并不明显，而主要反映在是否通勤上。图 34 表示了上班日各类型的活动时空展开。可以看出，大部分男性就业者的日常活动空间在以单位为中心的近邻地区内完结，只有 W_1 和 W_3 中的区外通勤者活动空间广泛。图 35 是通勤者计 19 人的活动时空展开，与近距离上班者相比，生活节奏及活动空间明显不同。也就是说，通勤者有明显的上班和下班两个移动高峰带，午休时间短，无早晚的娱乐活动，生活活动空间大，但表现为自家和单位的简单二极结构，单位附近的购物或娱乐、私事活动少。这与下班后在中心部进

行娱乐及私事等活动后回家的日本通勤者完全不同①。

2. 休息日的生活活动空间

现在中国城市已实施周休二日制，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多，城市生活中娱乐活动显得越来越重要，但关于城市居民休息日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空间的研究却很少，使休息日的城市总体规划没有充分的依据而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下面对休息日中国城市居民的出行类型及生活活动空间进行考察，为休息日的城市设施规划提供一些基础知识。

图 36 是休息日各时间利用类型的活动空间，总的特征是外出活动少，生活活动空间以自家为中心而构成。但外出活动中各类型之间有差异，H_1、H_3 和 H_4 的一部分人把活动空间扩展到近邻以至于区外，并且男性占多数的 H_1 和 H_4 以娱乐为主要目的，而 H_3 是为了购物。把这些休息日为了娱乐或购物出本区的出行者(计 19 人)单独汇总分析后得知，这 19 人全为敦煌路和营门滩两地区的居住者，而去向全是市中心部，一半以上是利用公共汽车，60% 是全家同行。可见，休息日远距离外出者主要是离市中心部较远的居民，为了在中心部娱乐和购物等而与家人一起乘公共汽车外出。如图 37 所示，10 时前在家做家务和私事，10 时开始有一个移动高峰带，11～15 时之间在市中心部娱乐、购物或办私事，15 时开始又进入移动高峰带，17 时以后主要在家里活动。因此，休息日里一部分郊区居住者把生活活动空间从自家周围扩展到中心部，

---

① 柴彦威："广岛市民の日常生活における活动空间——壮年层居民の场合"，《人文地理》，第 351～373 页，1993 年第 45 卷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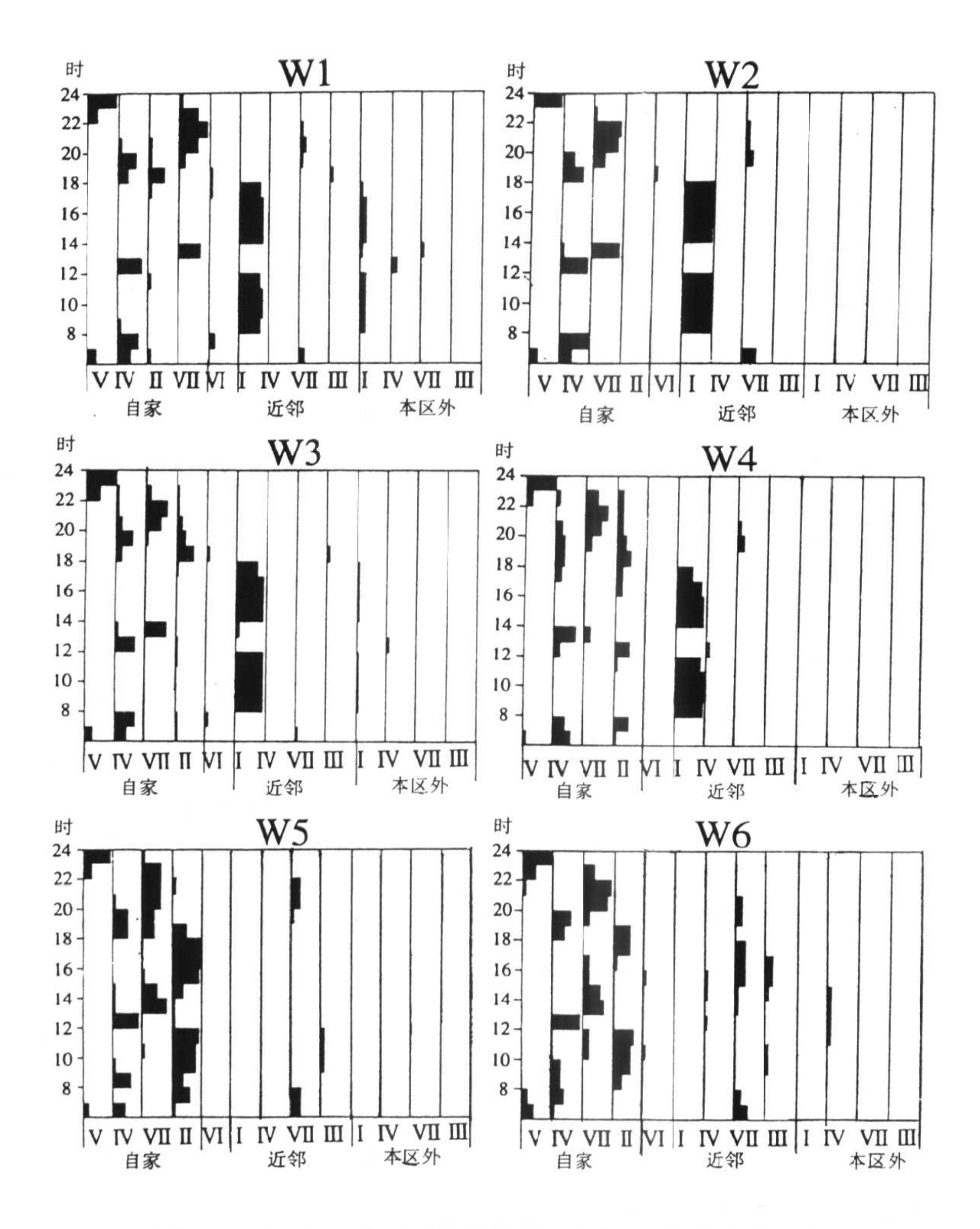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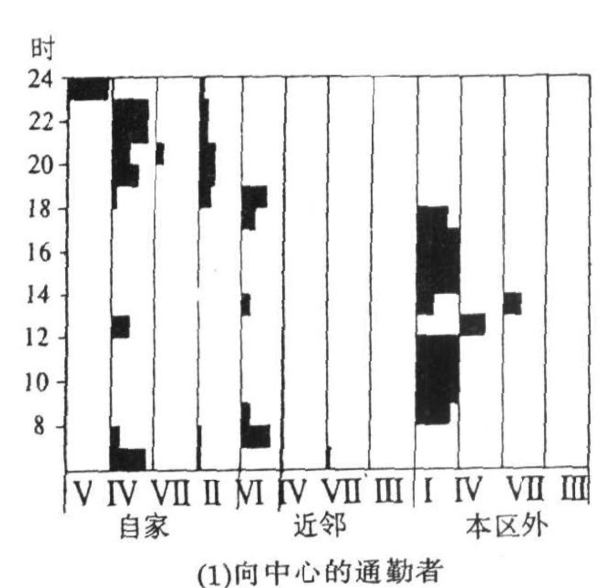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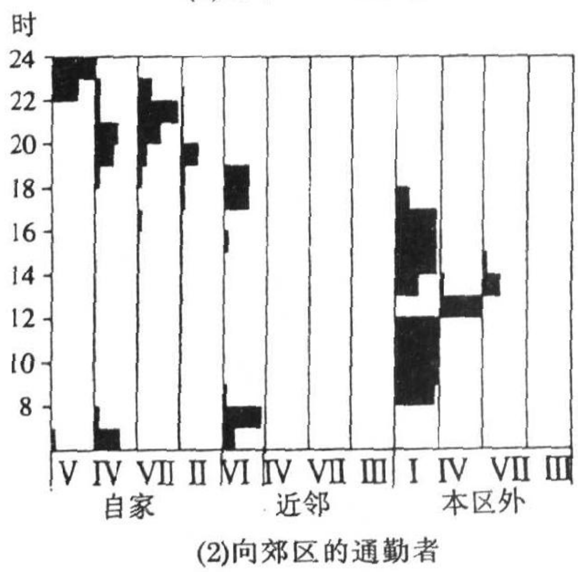
图 34　上班日各时间利用类型的活动时空展开

资料来源:同上图。

而大多数居民外出活动少,以自家及其附近为主要活动空间。这



(1)向中心的通勤者



(2)向郊区的通勤者

图 35 通勤者的活动时空展开

资料来源:同上图。

种休息日生活活动空间的特征,是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与高层次商业和服务业设施高度集中市中心部相关。

以上以兰州市活动日志调查的结果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类型和特征以及生活活动空间的基本结构。但这里主要是以调查地区、性别和时间利用类型来进行汇总及分析的,对各类型和个人的活动路径(path)及其制约因素没有做详细的考察。因此,为了说明这种日常活动类型及生活活动空间的形成机制,了解居民是否满足、或者多大程度上满足于此,以探讨改善方案等,有必要从行为地理、时间地理及社会地理学的多个方面进行更加深人细致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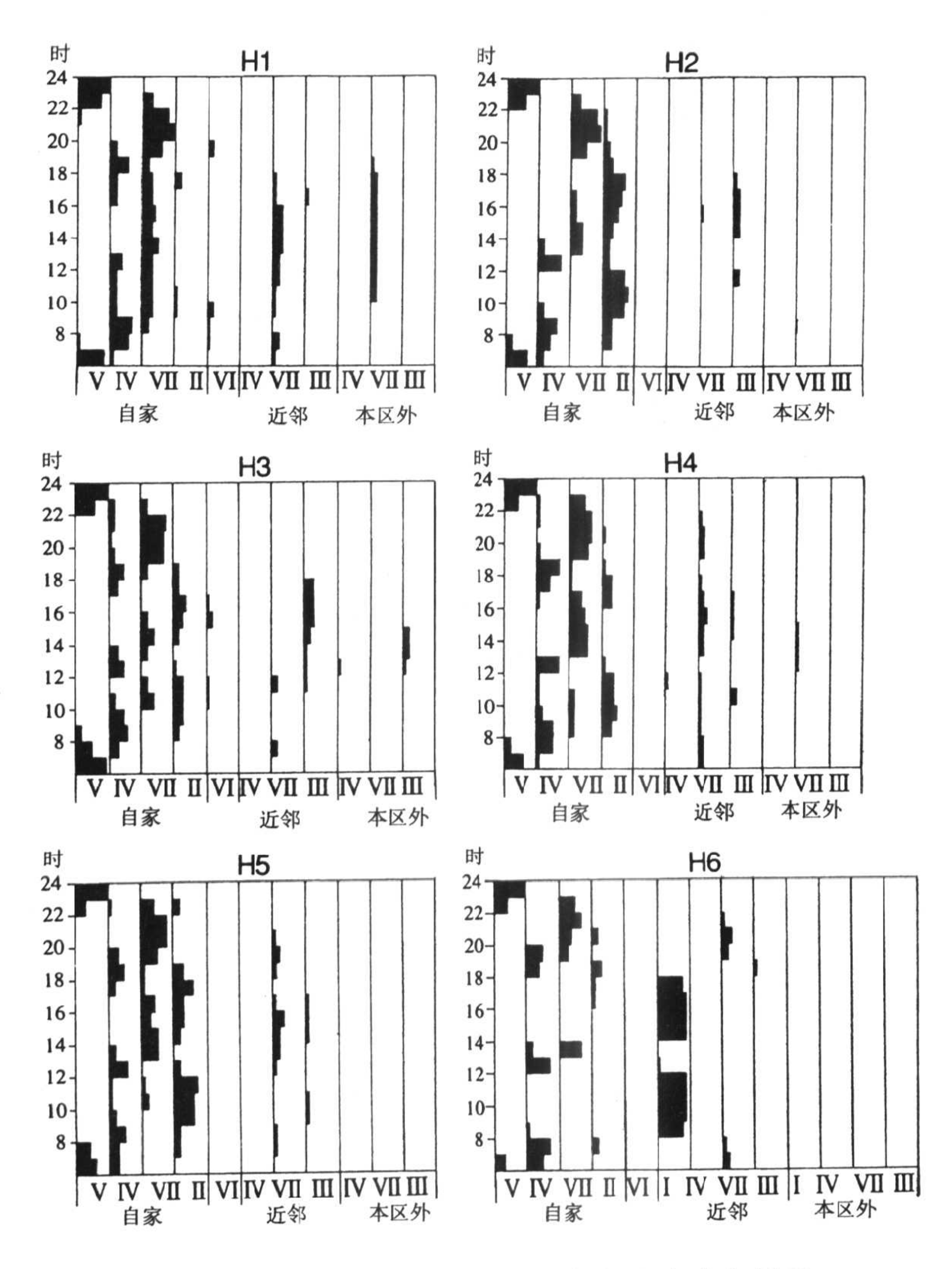


图 36　休息日各时间利用类型的活动时空展开

资料来源:同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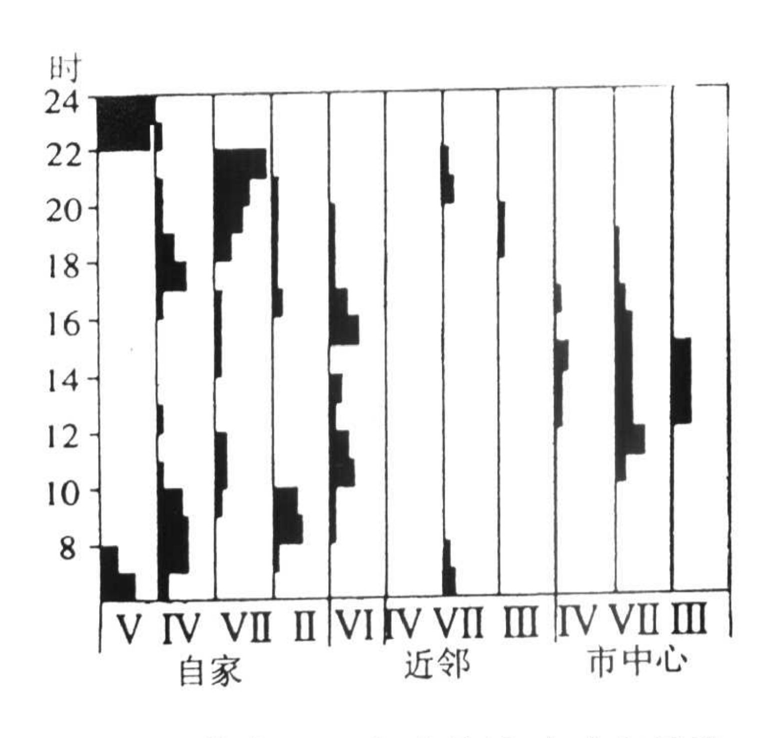


图 37　休息日远出者的活动时空展开

资料来源:同上图。

第十八章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极化与社会空间分异

20世纪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通常与快速的城市化相伴随。西方学者曾公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空间结构差距已经逐步缩小。然而,自从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一个新的城市发展阶段已经出现,尤其1984年以来城市改革被归结为两点:①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和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②取消城市粮食配给制度和实施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住房私有化。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冲击了城市人口迁移控制的基石,如就业制度、户口制度、粮食配给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等。大量的流动人口开始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移。由于在中国专门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巨大的福利制度差距,原先社会主义平等的城市无阶级社会受到极大的冲击。作为一种结果,大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与这些城市改革过程相伴生,尤其在首都北京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其它的城市。

近30年来许多城市研究工作者通过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研究尤其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领域:①城市社会分异(urban social segregation)和城市贫穷(ur-

ban poverty);②城市社会极化与城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城市社会极化现象并没有缓和,正相反,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却一次又一次被突破。这主要在于: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发展;②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NIDL)的出现和城市社会集团的变化;③新全球经济系统重建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由于这些发展和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开始面临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

Soothill、Mote、章生道和侯仁之都曾经描述过传统的中国城市模式。薛凤旋和 Gaubatz 的最近研究,试图通过历史上和 1949 年以来北京的研究,揭示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模式和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然而,1984 年后的北京是它的发展过程中最快的增长时期。本章试图通过北京城市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揭示 1984 年以来由于最近的政治、经济转变形成的变革中的中国城市模式。

一、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

在最近几十年来,许多因素影响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如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要素等等。下面通过五方面概括这些影响:

1. 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便宜的工业化模式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系统,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础上。一方面,几乎所有主要城市与世界市场相

连接的现代工业均毁于战争;另一方面,占95%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在饥饿和贫困的边缘。在3年的战后重建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冷战"使新中国陷人国际孤立的境地。然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新中国的基本目标,如果中国要实现从贫穷的大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国家转变,快速的工业化是唯一的出路。中国在1957年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是前30年社会主义城市重建的主要特征。由于资本、技术、熟练劳动力和世界市场的缺乏,中国曾经放它的重点在便宜的工业化上,即集中几乎所有的资本投资在生产上,尤其在第二产业,其结果是中国城市几乎都成为能源工业(如煤炭、石油和电力)、原材料和低水平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在最早的两个五年计划期内(1953～1965年),北京布局了它的工业基地。从此,电力、纺织、机械和建材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在第三产业(如住房、学校、医院、道路、公共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等)的投资却保持在绝对低的水平。在这个时期,12个工业—居住区,如酒仙桥、东坝、定福庄、垡头、南苑、丰台、石景山、西苑、清河、沙河、黄村和良乡,被布局在城市的近郊区。通过这些新工业—居住区、公共交通网建设和通勤活动,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被从内城区扩大到近郊区。

2. 社会主义平等意识形态与控制人口迁移的城市化道路

社会主义城市化曾经被表达为在社会平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消灭人类社会的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然而,在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系统中,现实世界客观存在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和城乡居民福利制度的不平等,结

果，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事实上被扩大。在这样一个高位势社会经济系统中，农村人向城市的迁移压力必然变得愈益强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国家，一方面，在一个有限的商品粮食增长条件下，为了消灭人类社会的三大差别和养活已有的非农业人口，必须对城市化速度有一个比较强的控制；另一方面，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保持城市化水平和城市非农业人口有一个稳定增长率。结果，作为权宜之计，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通过强有力的城乡迁移控制来维系。自从60年代中国城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城市人口迁移，这些措施包括城市居民户籍管理制度，城镇居民粮食配给制度和城市就业制度等。在北京，每年“调干”或“农转非”的数目总是被公安局和其它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严格限制，即使到1990年“调干”和“农转非”占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也才达6.13%。在60年代，由于粮食和就业岗位的短缺，曾经发生两次“反城市化”运动。一次是60年代早期的“干部下放”，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其结果是来自于人口高增长率的过快的城市空间扩展被控制，原有的城市社会结构也被扭曲，即在城乡之间筑起一堵看不见的“墙”。在城市，由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知青在农村，家庭内部城乡差别突然间被缩小许多。

3. 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影响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失去了借助城市土地市场和城市住宅市场重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能力。由于中国经济管理制度仿效前苏联的模式，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被深深地打上了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烙印。这个模式被概括为：①几何图形堆积，城市中心突出；②市中心由巨大的建筑围成广场，几条主要大道从中心向外辐

射;③强调城市土地功能分区与弱化社会空间分异;④为了减轻人口压力和恶化的环境在大城市地区周围建设卫星城,城市的开敞空间通过郊区公园和绿化带来实现。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对北京的影响,直到80年代中期仍然很强。在北京随处可见这种模式,如天安门广场,新生活居住区,居住区内混杂的居民阶层,新工业区和卫星镇建设等等。

4. 国家主义下的行政中心优先权

考斯特尔曾经将当代社会划分为两种基本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国家主义的特征,它倾向于权力的最大化,而且剩余价值的分配与控制被扩展到所有经济部门。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分配和流通被集中到行政中心。因此,一些强有力的行政中心被重建成综合性城市。因为这些政治和行政中心可以通过它们的行政权力更容易获得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所以它们的发展总比其它类型的城市要快要好。这主要在于政治和行政中心也执行着经济管理功能,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分配权。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它的首都功能具有城市发展的优先权。此外,中央各部委的示范效应也对北京的工业、住房和基础设施给予了重要的支持。所有这些导致北京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

5. 一些其它相关政策

一些其它的相关政策也为北京的城市空间扩展提供了专门的环境。例如,城市政府财政主要依赖于工商利税,这就迫使所有的城市尽力发展它们的制造业和商业。这些产业部门进一步吸引越

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机构、公司和“农转非”,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展它的空间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却十分重视发展它的钢铁工业、石化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和庞大的商业区,而轻视服务业、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心功能的原因所在。此外,许多公共设施的布局,如银行、火车站、通讯枢纽、邮件分检中心以及城市建设维护税制度,都是依据国家城市体系的城市行政等级系统而制定的。

二、北京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

最近10年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变正在改变以往的平等社会状态,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全社会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社会空间分异的日益增长,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开始出现。

(一)社会极化现象

社会极化(social polarisation)最一般的意义可能是一个社会实体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就职于合资或独资公司的高收入职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欧洲国家已经经历了两次向当代发达社会的城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移民。第一次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第二次开始于二战时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Lash and Urry, 1994)。最近的变化已经显示了一个清晰的社会结构,即由于移民

导致城市社会贫富悬殊扩大化(Kesteloot,1995)。很明显,移民是西方城市社会极化的根源。北京,随着两个新的社会组出现,正在经历着一个类似的过程。"贫穷"的一端由流动人口组成,他们是一个无专长和低收入的社会集团;"富裕"的一端由外资或合资公司的老板和职员组成,他们是有专长和高收入的社会集团。

(二) 社会极化动力机制

一般说来,北京社会极化的出现和增长与两个要素相关:①涉及流动人口的是成功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②涉及有专长、高收入社会集团的是开放政策和国际资本、技术引进。当然,这两组也显示了一些相关性,即它们的出现与西方世界的新国际劳动分工(NIDL)相一致。因为新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促进熟练的、高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刺激非正式的、低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的增加(Friedman & Wolff, 1982; Sassen, 1991)。北京的社会极化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1. 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

城市功能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经济转变是城市社会极化的动力源泉。服务业和经济国际化是最近10年世界范围内导致城市社会极化两个基本的要素。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和全球经济重建既营造了城市化新趋势,促进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也导致了城市社会收入和就业岗位分配的极化(Sassen,1994)。一般来说,当经济重建并导致城市就业岗位的改变成为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变化的

主要因素时，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社会经济增长和转变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它的首都北京，也正在发挥一个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

北京，作为潜在的国际化都市，正在转变它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制造业中心功能结构，发挥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将职业划分为有技术高工资类职业和无技术低工资类职业，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功能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转变将导致城市社会极化是不可避免的。近来，尽管北京的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要比中国的其它城市要高，但它的第二产业仍占城市经济的主体(表 114)。1994 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各占 46.1%和47.0%。北京曾经将重点放在第二产业部门，尤其机械、化学、冶

表 114　北京国内生产总值构成(1952～1994 年)

年份	1952	1957	1965	1975	1978	1980	1988	1991	1993	1994
第一产业	22.20	10.60	12.50	6.60	5.20	4.30	9.00	8.10	6.20	6.90
第二产业	38.70	47.80	59.00	66.60	71.10	68.90	53.90	52.20	48.00	46.10
第三产业	39.10	41.60	28.50	26.80	23.70	26.80	37.10	39.70	45.80	47.00

资料来源：(1)《北京 40 年(1949～1989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版。
(2)《北京统计年鉴》1992 年，1994 年，1995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金、纺织和食品等制造业和建筑业。最近，北京的制造业部门开始转向钢铁、化工、汽车与通用机械、电子和文化、运动与教育产品等5 个主要部门。然而，当我们研究城市经济结构的增长过程，发现近 10 年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尤其在金融保险、教育、研究与开发、文化、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一般服务业部门。正如表 115所示，在 1949～1994 年间北京的就业岗位增加近 10 倍，即净增了4284882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

表 115 北京就业岗位增长(1949～1994年)

年代	1949	1949～1952	1952～1957	1957～1965	1965～1975	1975～1980	1980～1990	1990～1994	1949～1994
第一产业	1623	6474	58783	-16827	-2075	32814	-36113	7406	52085
农业	1623	6474	58783	-16827	-2075	32814	-36113	5805	50484
采掘业								1601	1601
第二产业	201064	160512	190727	607290	384440	456866	-708483	19033	1311449
建筑业	110207	46707	5139	38408	121819	226703	-509198	-312	39473
制造业	90857	113805	185588	568882	262621	230163	-199285	19345	1271976
批发与零售	26200	24694	-16485	70116	86708	186394	-24930	48790	401487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34100	94523	84079	29405	86518	179020	-121428	433	386650
社会服务业	3476	6266	14307	14023	19821	138614	49303	87624	333434
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1498	29821	102036	-15370	63368	79519	73554	-73851	260575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45418	75414	74569	-125939	57534	160326	-21869	-21730	243723
公用事业	9312	12086	31088	22589	54666	-233	49592	15809	194909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21245	16161	-2900	23977	34372	43455	-11028	26633	151915
其它	0	0	0	0	0	0	51379	18778	70157
房地产业	0	0	0	0	0	0	52454	7654	60108
金融保险业	2674	2761	-972	-481	8617	25387	9767	5581	53334
供应业	0	0	16137	122	6716	21230	2540	-312	46433
餐饮业	3621	-605	-5407	12238	18231	27947	-24723	7036	38338
总计	350231	428107	545962	621143	818916	1351339	124396	44788	4284882

资料来源：(1)《北京40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2)《北京统计年鉴》1992年,1994年,199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部门(增加2242664工作岗位,占52.34%;其次来自于制造业(增加1271976工作岗位,占29.69%)。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饮食业增长最快(增加401487工作岗位,占9.37%),文化教育居第二位(增加386650工作岗位,占9.02%),社会服务业居第三位(增加333434工作岗位,占7.78%),研究与开发居第四位(增加260575工作岗位,占6.08%),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居第五位(增加243723工作岗位,占5.69%)。非常明显,金融保险业是近10年内北京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的部门。为了促进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北京市计委曾经编制"八五"社会经济战略规划目标是到2000

年服务业部门将达到 GDP 的 50%。80 年代后期在中关村地区开始兴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园区,该园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电子元器件最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毫无疑问,随着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的增加,城市功能的国际化和工资水平差距的扩大,都将进一步导致社会极化。

2. 外国直接投资(FDI)和技术引进

在 1979～1993 年间,中国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约 1100 亿美元,约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 1/3。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 60%投向了制造业,其次是房地产和公共设施。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的 89.6%投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较一般的城市要快许多。

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在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分布,在北京一些老的制造业区出现经济衰退,一些新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区表现为经济繁荣。具体地说,朝阳和海淀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其经济状况出现持续的繁荣;而崇文和宣武则是两个衰退的区。正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管理层的有技术高工资工作岗位和制造业的低工资工作岗位的同时增长,东城、西城、朝阳和海淀正形成新的城市经济繁荣的扇形区;崇文、宣武和丰台等老居住和制造区则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形成老的衰退的扇形区。

3. 巨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潮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从农村向大都市区的流动人口潮,克拉克和葛特勒(Clark and Gertler,1983)在对美国 1958～1975 年间资本与移民关系分析显示资本增长导致移民向经济增长快的地

区迁移。他们依据两个互不相容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学派——资本学派(the capital-logic school)和市场竞争学派(the competitive-market school)——提供了一个结构分析框架。资本学派认为公司对劳动力的迁移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沃尔科曾经认为地方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完全满足,作为流动的专家层总是随资本流动。波罗斯顿和哈利森也曾经认为在新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分散的生产可能需要一些外地劳工。资本增长肯定会刺激劳动力迁移。劳动力迁移总是与资本增长相伴随,尤其外国直接投资(FDI)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更是如此。市场竞争学派则认为资本被设想为从高工资区向低工资区流动。克拉克和巴拉德运用新经典主义和凯恩斯方法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

我们将 1949 年以来北京劳动力迁移过程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①城市居民迁移期(1949～1984 年)。在这一时期,北京几乎没有得到太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城市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或地方政府,所以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经济控制之中。在没有任何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按计划进行劳动力需求分配。北京在 50 年代由于城市经济恢复曾经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然而在 1961～1965 年由于 3 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调整,这些人又陆续返回到农村。在“文革”期间(1966～1976 年),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离开城市,只有非常少的“农转非”和“调干”进入北京。从 1978 年到 1984 年,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和有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大部分知识青年又陆续返回北京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按照统计,这一时期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约 2%,而且劳动力的迁移以城市居民为主。②农村人

口迁移期(1985 年至今)。由于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迁移流由农民为主体。尽管城市户口制度还没有被取消,这些农民却已经突破了种种限制,通过注册临时户口进入城市,并且长时期地呆了下来。1982 年的粮食市场开放使这些农民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粮食得以糊口;私房制度重新确定(尽管土地还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城市公共住房商品化和住宅市场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农民能够通过租或买房找到栖身之处。尽管目前北京存在一些企业开工不足或待业、下岗现象,但大多数流动人口还是找到了他们的工作。正如表 116 所示,自 1985 年以来北京的流动人口增长迅速。可以预见,由于北京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在未来 10 年城市人口增长的主体将是来自于农村的流动人口。

表 116　北京流动人口增长(1949 —1994 年)

年份	流动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1949①	61000	2.9
1958①	270000	4.1
1982①		1.98
1984①	200000	2.26
1985①	312000	3.26
1986①	600000	6.18
1987①	800000	8.10
1988①	900000	8.99
1989②	1310000	11.9
1990②	602131	6.02
1991②	1200000	10.9
1994③	3295000	29.9

资料来源:①首都规划委员会:"流动人口在北京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载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大城市流动人口》,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 年版。

②《北京统计年鉴》(1989,1990,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1994 年 11 月 11 日流动人口普查。

三、北京新城市贫困现象及其原因

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会极化的过程可用两个主要原因来解释。首先,由于城市移民数和高工资职员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家庭收入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其结果是城市空间分异(urban spatial segregation)的出现。其次,住宅市场的变化也导致了社会极化现象。由于这些原因,从事社会极化研究时,首先应该讨论社会极化的"贫穷"一极。

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新城市贫困现象(new urban poverty)主要由"下层人"(underclass)组成。在美国,"下层人"最早由穆尔达尔定义,是指在后工业化社会长期失业的一个社会集团。威尔逊将其归罪于黑人社区的"集中效应"(concentration effect)。在英国,它首先涉及到种族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后来,它被用于工人阶级内部种族的划分。最近,"下层人"这个术语从概念上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它被定义为工人阶级以及在工作年龄但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些穷人或失业者;另一方面,它被用于攻击那些依靠福利制度生活的穷人。在中国,尽管由于一个非常有限的社会福利制度,类似西方的"下层人"社会集团并不能找到他们孳生的"社会温床",但是新的城市贫困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

(一)新城市贫困现象

近年来,由于北京城市功能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技术

产业的转变，在社会顶层的高收入、职业性和管理性工作岗位和在社会底层的低收入、临时的、非正式和部分时间的工作岗位迅速增加。罗姆曾经描述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城市贫困特征为：①日益上升的单亲家庭数目和接受社会救济的比例；②依靠社会救济人数的增长；③失业率的上升和影响中产阶级职业的不稳定的、临时的和无保障的工作岗位的增加；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数的上升；⑤无家可归者的增加。在中国，由于1978年以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到90年代，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衣、食、住、行的贫困。然而，近年来有些农民开始流入城市，他们类似于第三世界大城市的城市移民或者像60年代西方国家的客座工人(guest-workers)，工作在一些非正规的劳动部门，或者作为正规劳动部门的临时劳动力，或者成为快速增长的制造业的合同制工人等。由于大城市地区流动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得这类人口失业率的上升乃至影响国有企业职工的不稳定、临时、无保障工作岗位的增加，结果导致低收入工作岗位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加，一些人重新沦为新的“穷人”。总之，由于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家庭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城市家庭收入基本相等的状态正在消失。

（二）新城市贫困的原因

综上所述，除了传统制造业部门结构调整下岗、社会救济制度、公共和个人保障不完善外，北京新城市贫困被看作大量的流动人口充当劳动力，从事简单的、不稳定的、临时的、无保障的、无技术和低工资的工作。我们试图从新城市贫困阶层的职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教育水平来分析导致新城市贫困的更深层次

的原因。

1. 低薪职业结构

北京的大多数流动人口原籍都在农村，由于他们盲目流入城市而被称为“盲流”。这些人主要从事小商、小贩或者在危险、繁重和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下充当劳动力。表 117 显示了 1994 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的主要职业构成(表 117)。

表 117 北京流动人口职业结构(1994 年)

职业	%
小商小贩	29.0
建筑工	21.4
餐馆和修理服务人员	5.9
制造业工人	5.0
家庭服务员	1.9
科研与培训人员	4.0
农民	0.9
出差	12.5
医院与疗养者或服务人员	1.7
旅游者	2.3
其它	15.4
总计	100.0

资料来源:1994 年 11 月 11 日流动人口普查。

我们能大致概括出如下工作岗位类型:①高劳动强度、低收入正式工。尽管流动人口的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部门，然而他们得到的工资仅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他们中的有些人替代北京本地工人在较差的工作条件下工作，例如纺织工、翻砂工、装配工、建筑工或重污染化工厂的工人等;有些人从事

城市居民不喜欢干的办公室服务、餐饮娱乐服务或私人服务，例如职业打字员、印刷工、售货员、收款员、招待员、家庭服务员等等。②稳定、合同制临时工。有些流动人口与一些小公司签定合同获得一份稳定的合同制临时工，如看门、家庭清洁、保姆、装修住房、修理家具、外卖、街道清扫工、家用电器清洗、搬家、送货等等。③不稳定、临时的、无保障工作岗位。另一些流动人口从事一些户外的服务活动，工作和收入均不稳定，如摆地摊、沿街叫卖、人力车夫、补鞋、修自行车、配钥匙、修理钟表、刻字、磨刀、收旧货等等。④经营自己的公司。最近，一些成功的流动人口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公司、饭馆和工厂。然而，流动人口的传统家庭结构阻碍了这些新企业的成功发展。北京的浙江流动人口的服装行业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尽管服装业已经成为浙江村新移民的主要职业，但由于保持了家庭作坊模式和管理经验的缺乏至今还没有什么人成为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新阿静餐馆则是少数成功的流动人口兴办企业之一，它已经在北京新开了4个分店。

2. 不平等的待遇

根据北京市流动人口普查资料，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7.7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28.5岁)略高于女性平均年龄(26岁)。这一平均年龄要比北京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年轻6.6岁。流动人口工作年龄组(15～59岁)人口数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7.9%，而城市居民的工作年龄组人口数仅占65～70%。就青少年人口组(0～14岁)而言，城市居民占20.8%，而流动人口仅占9.9%；老年人口组城市居民占7.0%，而流动人口仅为2.2%(表118)。表118也显示约45%的流动人口的子女还不能去学校就读，这意味着来

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轻,工作年龄组占主体,但他们还没有争取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城市生活权利,如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分配、就业机会① 等。

表 118　北京流动人口年龄结构(1994 年)

年龄	%	状况
1 岁以下	1.0	出生在北京的新生儿
1～5 岁	5.3	与父母同住
6～14 岁	3.6	45%就学,45%失学,10%工作(10～14 岁之间)
15～44 岁	80.0	工作
45～59 岁	7.9	小商小贩,科技活动,信息服务
59 岁以上	2.2	退休后返回原籍

资料来源:同上表。

3. 低收入高负担的家庭状况

北京的流动人口男性多于女性。1994 年的流动人口普查显示男性占总流动人口的 63.4%,其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往往充当重、脏、累活的劳动力,尤其集中在建筑和制造业部门工作。女性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服务业工作,其中 15～29 岁年龄组的人口占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 59.8%。她们的婚姻状况如表 119 所示,约 63%女性流动人口已婚并有平均 1.3 个孩子。事实上,由于这类妇女的“流动”性质和仅有极少数的流动人口整个家庭流入同一城市从事同类的工作,所以绝大多数的女性已婚妇女家庭沦为事实上的单亲家庭。她们要从不稳定低收入中支付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衣、食、住、行),子女教育附加费,健康保健费等,在流动人口中属于生活相对困难的阶层。此外,对那些未婚的女性流动人

① 无论国营企业,还是合资或外资企业的招工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北京市户口。

口以及男性流动人口,她(他)们流入城市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置办她(他)的婚事,成家立业或在原籍翻建住房等,所以从总体上讲,流动人口由于积攒太多的钱而总是生活在低水平线上。

表 119　北京女性流动人口婚姻状况(1994 年)

婚姻状况	%	子女数
未婚	36.8	—
已婚有配偶	60.9	平均 1.3 个子女,二孩家庭占 28.5%;三孩家庭占 8.1%;其中 13.4%的子女生于北京
丧偶	2.1	平均 1.3 个子女
离婚	0.2	平均 1.3 个子女

资料来源:同上表。

4. 较低的教育水平

由于北京城市功能的转变,越来越多具有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被引进。然而,这些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非常的低,许多新的高收入就业岗位往往被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的人员所获得。表 120 显示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仅为 3.1%,而具有中、小学学历的流动人口却占 79.7%,文盲或半文盲约占 5.5%。1994 年的流动人口普查也显示,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低于男性。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教育水平低的社会阶层,他们要想在激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较好的就业岗位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城市本身存在一个平均高得多的教育水平的社会阶层,其结果必然是一些低工资、无技术、非正式的、城市人不喜欢的工作岗位被流动人口所获取。

5. 巨大的劳动大军与有限的市场之间的矛盾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与原籍地间具有

表 120　北京流动人口文化程度(1994 年)

文化程度	%(总流动人口)	%(女性流动人口)
大专及以上	3.1	2.5
高中	11.7	8.6
初中	54.8	24.3
小学	24.9	54.0
文盲及半文盲	5.5	13.6

资料来源:同上表。

紧密的关系。1925 年芝加哥学派的帕克(Park,1925)曾经描绘了一个类似的现象:移民集团和自然区间的社会劳动分工。按照实地调查,我们发现:①来自江苏、山东和河北的多数男性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建筑业的木工、瓦工和水暖工,而来自河南的多数男性移民则从事收旧货、翻砂工和清洁工等,来自山东的男性流动人口热衷于贩运蔬菜等。②多数来自江苏的女性流动人口喜欢做些小买卖或者纺织工、装配工等,而安徽籍的女性流动人口则进入城市家庭担当管家、保姆、家庭清洁和其它服务;一些来自四川和东北的女性流动人口则主要工作在餐饮娱乐业,如餐馆、旅馆、歌舞厅和其它服务业。③来自于富裕省区的流动人口则创建他们自己的小公司,而来自相对贫困省区的流动人口则开办地方风味的小餐馆或摆地摊经营地方特色的小买卖。例如,浙江籍流动人口的职业以服装、制鞋、修理钟表、配钥匙、刻图章及其它修理服务,而来自福建和广东的流动人口则开办建材贸易公司,如福建人经营木材生意;广东人经营铝合金建材等。一些来自新疆和宁夏的流动人口总是开办穆斯林餐馆,而来自西藏和青海的流动人口则摆地摊出售藏药。表 121 概括了这些特性。

表 121 也显示流动人口数量与流出地区距离呈正比,即流出地区距离愈远,流动人口数量愈少;反之亦然。然而,文化传统和

表 121　北京流动人口主要职业与流出省关系(1994 年)

流出省	流动人口	%	男性	女性
河北	598000	21.1	建筑工,小商小贩	小商小贩,餐饮服务员,家庭服务员
浙江	591200	20.8	小商小贩,服装,制鞋,修理服务	小商小贩,服装,制鞋,修理服务
河南	355900	12.9	小商小贩,建筑工,收旧货	小商小贩,餐饮服务员,家庭服务员
安徽	307300	11.2	建筑工,小商小贩,制造业工人	家庭服务员
四川	141650	5.0	建筑工,小商小贩,餐饮服务员,家庭服务员,医院	
江苏	141650	5.0	建筑工,修理服务	修理服务,小商小贩
山东	141650	5.0	建筑工,小商小贩	修理服务,小商小贩
其它	555650	19.0	建筑工,小商小贩,制造业工人,修理服务,餐饮服务员	

资料来源:同上表。

区域差异也影响了移民的流动。据调查,21%以上的北京流动人口来自于邻近地区的河北省,但来自于浙江省的流动人口数也几乎与河北省相当。

四、北京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及其变化趋势

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城市,由于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社会分异现象日益加剧。贫民窟、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ghettos)以及其它社会空间分异(social segregation)形式是西方城市的普遍现象。最近,类似的城市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城市分层(urban strat-

ification)与“下层人”、“城市贫困”和“社会极化”相结合形成社会空间的分异。在中国城市,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曾经由于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平等思想和新建成区的迅速发展而基本被消灭。然而,近年来,北京新的低收入的农村流动人口和高收入的暴发户正在重建城市社会分层现象,并通过城市社会分异达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北京西北郊沿京汤路从亚运村到小汤山的别墅区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富人居住区,而木樨园周围的浙江村则成为一个较大的新贫民窟区。我们试图运用遥感影像和GIS来分析流动人口和贫民窟的分布,描述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

1. 城市人口的不平衡空间分布

北京人口空间分布(1993年)很不平衡,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87平方公里的4个内城区,即:西城、东城、宣武和崇文。除朝阳以外的3个近郊区,石景山、丰台和海淀的人口密度均在10000人/平方公里以下,尤其三环路以外地区人口密度均在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在内城区有4个街道的人口密度大于43750人/平方公里。宣武区的椿树街道和崇文区的前门街道是两个人口密度最高的街道,分别达到48182/平方公里和44037人/平方公里;丰台区的老庄子、海淀区的四季青和朝阳区的黄港是北京3个人口密度最低的街道,仅为89、152和270人/平方公里(表122)。这种不平衡的人口分布密度构成了流动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的基本框架。

2. 流动人口住所类型

据1994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资料,60%的流动人口已经找到

表 122 北京各区街道人口密度分布(1993 年)

(单位:街道数)

人口密度(千人/平方公里)	40以上	35～40	30～35	20～30	10～20	5～10	3～5	1～3	0.5～1	0.5以下	总计
宣武	2	2	1	2	1	-	-	-	-	-	8
崇文	2	-	1	2	2	-	-	-	-	-	7
东城	-	1	3	5	1	-	-	-	-	-	10
西城	-	1	2	3	4	-	-	-	-	-	10
朝阳	-	1	-	4	6	3	4	14	12	2	46
海淀	-	-	-	-	9	3	1	2	5	7	27
丰台	-	-	-	1	-	2	2	5	3	2	15
石景山	-	-	-	-	1	3	3	2	1	-	10
总计	4	5	7	17	24	11	10	23	21	11	133

了他们的临时住所。普查也显示一些雇佣流动人口的单位也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住房,表 123 显示了流动人口的附属单位和住所间的关系,即大多数的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建筑工地,雇佣单位、农村家庭和旅馆。

表 123 北京流动人口居住地类型及构成(1994 年)

类型	流动人口(人)	%
建筑工地	469000	26.1
机关单位	429000	23.9
农户	256000	14.2
旅馆	208000	11.6
店铺和餐馆	148000	8.2
培训中心	93000	5.2
郊区农业基地	72000	4.0
驻京办事处	54000	3.0
国外机构	44000	2.5
医院和疗养院	25000	1.4
总计	1798000	100.0

资料来源:根据 1994 年北京流动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3. 流动人口空间分布

尽管 1994 年的北京流动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年流动人口数达 287.7 万人,但空间分布数据至今仍不可得。依据 1995 年统计年鉴资料(表 124),约 66.6%的流动人口分布在朝阳、海淀和丰台

3个近郊区。近郊区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为1:6,内城区为1:10。东城和宣武是两个流动人口密度较高的区,朝阳由于近年经济的繁荣无论流动人口总量还是密度,都是最高的区。

表124 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1994年)

区域	总人口(万人)	常住人口(万人)	流动人口(万人)	面积(平方公里)	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比	流动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西城	85.8	78.9	6.9	30.00	0.09	2300
东城	72.0	64.3	7.7	24.70	0.12	3117
宣武	62.2	57.1	5.1	16.50	0.09	3091
崇文	46.5	43.3	3.2	15.90	0.07	2013
城区小计	266.5	243.6	22.9	87.1	0.09	2629
海淀	157.5	140.3	17.2	426.00	0.12	404
朝阳	159.5	136.1	23.4	470.80	0.17	479
丰台	89.1	74.2	14.9	304.20	0.20	489
石景山	35.8	30.9	4.9	81.80	0.16	599
郊区小计	441.9	381.5	60.4	1282.8	0.16	471
总计	708.4	625.1	83.3	1369.90	0.13	608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4.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现象

按照1994年流动人口普查报告,80%从事小商小贩、公共服务、私人服务的流动人口分布在内城区;84%的建筑工人居住在城市边缘的新建筑工地。这两类人代表了社会极化“穷”的一极。新的贫民窟区由于这些人的空间集聚而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在“富”的一极,有些在外企工作的职员居住在二、三环路间的四星或五星宾馆内,有些供职于合资企业或外国专家则居住在较好质量的公寓楼(如亚运村地区)或大学的培训中心,一些生意人和暴发户则开始在远郊区建设他们的别墅。普查结果显示61.6%的新的富裕阶层居住在朝阳和海淀近郊区,19.88%居住在东城区。

5.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异趋势

比较1988年和1994年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可发现北京的流动人口倾向于向近郊区集聚(表125)。这种变化趋势实际上与城市住房制度相关。由于现状城市住房制度的房租太低、住房投资不足和人口过快增长，城市住房始终处于短缺供应的状态。与此同时，在黑市上的城市房租要比正规市场上的房租高出许多，公房的房租高于私房的房租，内城区的房租高于近郊区的房租。此外，单位自管房必须在单位内部分配住房。由于这些原因，流动人口只得在老的内城区或城市外缘区找他们便宜的住所。尽管一些别墅区被建在远郊区，城市外围仍以单位自管房为主体。既然在城市边缘区有一些剩余且便宜的住房供出租，所以流动人口倾向于向这一地区集中。

表125 北京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1988～1994年)

年度	1994年				1988年	
区域	流动人口①	%	流动人口②	%	流动人口③	%
城区	229000	26.17	不详		130000	17.5
近郊区	604000	69.03	2380000	82.7	420000	57.0
远郊区	42000	4.8	不详		188000	25.5
总计	875000	100.0	2877000	100.0	738000	100.0

资料来源：①《北京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②1994年11月11日流动人口普查；

③首都规划委员会。

6. 贫民窟和别墅的分布

我们通过运用SPOT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

贫民窟、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1994年)(图3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老的废弃的村庄由于流动人口集聚正成为新的贫民窟区。

五、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演化

通过上述的讨论,北京社会空间结构及其转变过程大致分为如下3个时期和类型:

1. 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1271～1949年)

北京传统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它基于2500年前所写的《考工记》中理想的城市规划原理。这个原理定义城市空间型式为规则的、具有等级体系、由城墙环绕的矩形空间形态。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被描述成:城市空间被九经九纬大道分隔,中央为皇宫,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居住区围绕市中心布局。老北京城就是按照这个规则建设并且在元代成为比较著名的大都市,称为元大都。它的空间布局形成一个中心点和南北中央轴。皇城位于城中央,居住区被分成50个街区围绕皇城分布。社会和种族的空间分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皇室家庭总是更接近于皇宫居住。北京曾保持这种社会空间结构长达700年直到清末。

北京受欧洲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影响较晚。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流入,西方文明和城市文化开始侵入中国城市。从此,一些沿海城市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被扭曲,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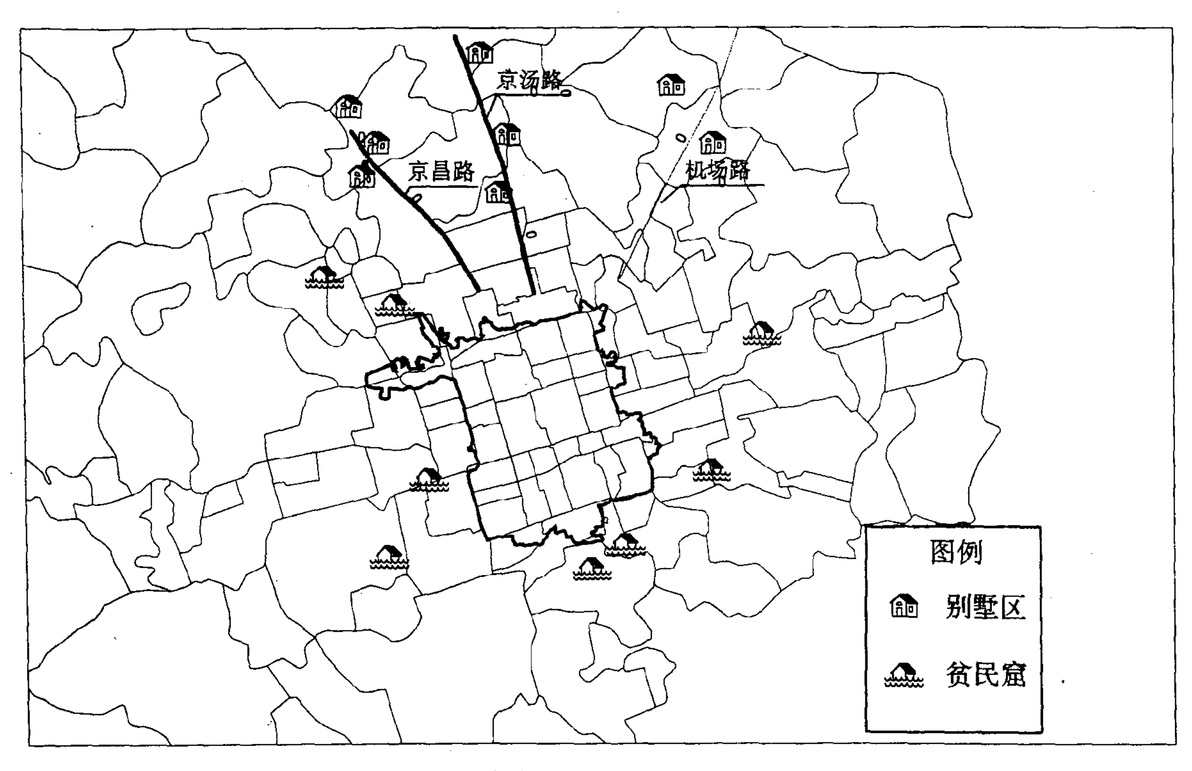


图 38　北京市贫民窟与别墅区分布图(1994 年)

城市的发展模式被从它的传统的轨道中拉出，并被推入西方城市发展模式的轨迹中。然而，有关影响中国城市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并没有转变太多。这主要在于具有商业掠夺性资本为特征的外国资本被高强度地投入在沿海为数不多的贸易港口城市，尤其集中在贸易、房地产和制造业部门，而位于中西部的城市、县城和小城镇仍然保持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传统。与此同时，频繁的战争也中断了这种城市转变过程，尤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城市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即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又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总之，在1911～1949年间，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传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北京仅有两个可见的变化：①天安门广场东南方向出现外国大使馆、银行、写字楼、俱乐部、医院、饭店和驻军、外国人居住区；②在城区建设起来的一些教堂、学校和医院。

老北京城是一个拥有63.2平方公里的围墙城区，它分成两个部分：老的内城和老的外城。老的内城包括皇城，由宫城、湖泊、公园、神殿、藏书楼、主考堂及其它公共建筑和富人居住区（四合院和胡同）组成。宫城位于皇城的中央，主要建筑形成一条南北向轴线。内城的道路系统呈棋盘状。老北京城曾经是一个具有明显的社会和种族分异的城市：①社会分异。宫城被称为紫禁城，围以高墙，仅有4个城门与整个皇城相联；②种族分异。位于内城南部的老外城建于清代，主要用于种族分异目的。在清代取代明代时，所有的汉族居民曾被逐出内城迁到老的外城。到晚清时，老的外城实际上已沦为由穷人居住区和拥挤商业中心组成的城区。直到1949年，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仍然保留了明、清时代的特征（图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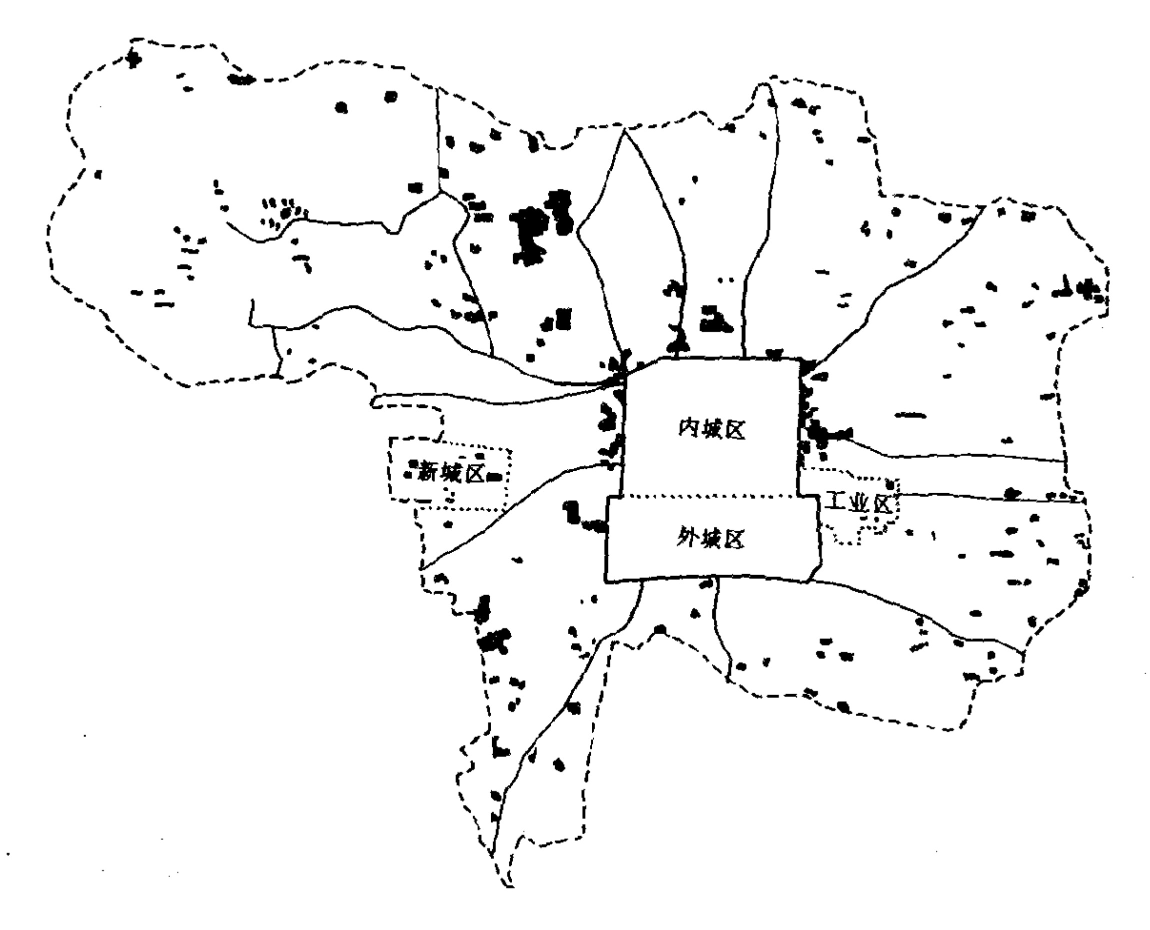


图39　北京市传统社会空间结构示意图

2．过渡的社会空间结构(1949～1978年)

在这一时期,北京,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一方面,为了体现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就,在老的内城区进行一些旧城改造;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解放,城市向边缘区迅速扩展。

在老的内城区,天安门广场被扩建,十大建筑沿长安街布局形成新的东西向城市轴线,与原有的南北向皇城轴线形成鲜明的对照。很显然,这一新轴线的形成是内城区社会空间结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此外,在这一期间,北京也开始进行其它的城市改造。

在最初的20年，城市改造主要集中在开敞空间方面，而棋盘式道路系统、胡同、花园和水系改变不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一些简单的一层临时住房被允许在四合院中建设。从总体上说，直到1978年，老的内城区社会空间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由于新工作岗位总是与工业发展相辅相成，新的分散组团空间结构也导致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以用老城区和新的近郊区的工业—居住区来概括。多数“老北京人”仍然居住在老的内城区，“新北京人”由于单位自管房的建设倾向于居住在老城区外围的新建成区。另一些工作在12个分散组团的城市居民，或选择居住在旧城区，或新建成区，或分散组团内。城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围绕老城区向外扩展，教育和研究区主要集中在中关村地区。整个城市沿主要道路呈辐射状向城市边缘区和近郊区蔓延。

3. 变革的社会空间结构(1978年迄今)

由于近10年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一个变革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已经出现。尽管改革的时间与它的悠久历史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转变是如此之快，如此之深，它既涉及城市用地的重组，也涉及到整个城市社会的变化。在内城区，城市的框架与以前保持相同，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被重构，一些新的城市功能被添加。在郊区，城市空间扩展不仅与房地产市场、住房商品化、住房私有化和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相联系，而且与贫、富两极人口的郊区化密切相关。北京的城市边缘区正在成为社会空间结构快速变化，城市问题最多，贫富差距最大和最活跃

的地区。

4. 形成中的新社会空间结构

由于快速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功能重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结构正在北京形成。这种新社会空间结构的特征被概括如下:①中央商务区(CBD)和国际商务区(IBD)。这将是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最重要转变,由3部分组成:a)天安门广场周围政治、文化中心区;b)王府井—东单和西单将发展为购物中心区;c)朝阳门、建国门外商务与金融管理中心区,老城区也将适当发展一些商务、写字楼、饭店等服务业为主体的建筑。②外国人居住区。为了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地位和外交需要,除东直门、三里屯、建国门外3个使馆区外,将在沿机场高速公路的酒仙桥分散组团附近开发第四个外国使馆、国际机构和外国人居住区。③以研究与开发为特色的高质量居住区。在城市建成区北部的分散组团将逐步发展成为研究与开发基地、高技术园区、科研教学区和高质量的生活居住区。④新制造业区。位于北京东南方向京津高速公路沿线有许多交通便利、限制因素少的用地可用于制造业布局,它将是新建制造业区和老城区制造业搬迁的主要地区。概括起来,北京的空间结构将从同心圆结构向沿高速公路发展的带形走廊结构转变。社会结构将表达成同心圆—扇形模式,即:①在老城区,相对贫困的老北京人和新的移民(流动人口)将集中居住在不太多的受保护的老居住区(胡同)。②在城市边缘区,一些接受过专门训练的高工资雇员、生意人和暴发户将趋向于居住在城市的东北方向,形成北京最富的一个扇形;而一些无技术、低工资的人将选择居住在东南角,形成北京最穷的一个扇形;大多数中等收入的知识分子家庭将

集中居住在西北角，而中等收入的技术工人则集中居住在西南角。总之，城西将成为中等收入家庭集中区，城东北为高收入家庭集中区，城东南为低收入家庭集中区。③在城市近郊区，又将形成低收入郊区农民家庭和新流动人口家庭集中居住的环带。

从本章所述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北京1949年以来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与下述几个因素相关：①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便宜的工业化模式；②社会主义平等意识形态和控制人口流动的城市化道路；③前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影响；④行政中心的优先权等等。近10年来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农村流动人口和工作在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高薪雇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这两个组产生了城市社会极化现象。这种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在于：①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②外国直接投资；③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

北京社会极化最明显的城市问题之一是新城市贫困现象的出现。过快的流动人口增长是这种新城市贫困现象的根源。新的城市贫困现象，除了传统制造业部门下岗职工、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完善、公共福利设施短缺和个人意外事故外，主要在于大量流动人口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简单、不稳定、临时、无保障、非熟练的低薪工作。

北京新的流动人口和高收入的暴发户正在重构城市社会阶层，并且通过社会空间分异影响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就社会结构而言，新流动人口倾向于集中居住在那些拥有过剩廉价房屋出租的城市边缘地带，木樨园附近的浙江村已经成为较大的新的贫民窟地区；而在亚运村以北到小汤山之间的京汤路沿线，新建的别

墅区正在形成新的富裕阶层集中居住区。

就空间结构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向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区位转移,尤其城市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务业在中心集中导致内城区城市更新速度加快。

中国城市改革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但是由于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失业救济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供流动人口居住的公共住房制度等,城市空间演化的动态过程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政府、社区或个人都应该关注城市的社会极化现象,尤其新城市贫困和贫民窟的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强调城市增长的可持续性,通过在住房、供水、卫生和城市交通低价投资项目来改善新城市贫困问题。服务网点和贫民窟翻建也是利于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此外,工资、物价和公共服务设施也是缓和城市贫困现象的重要措施。总之,转变中的中国城市正面临着重建它们的社会空间结构。

第十九章 中国城市边缘区

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外围,从社区类型看,它是从城市到乡村(或者从乡村到城市)的过渡地带;从经济类型看,这一地域也自然成为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渐变地带。

一、中国城市边缘区组成要素

城市边缘区区位决定了城市边缘区的组成要素。一般地说,中国城市边缘区主要由下述要素组成。

1. 近郊工业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工业经历了3次大的发展。第一次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指导思想下，城市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次为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年代，城市五小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水电、小水泥、小农机）尤其得到了普遍的发展；第三次为1967年后街道工业、乡镇工业和新兴大企业的迅速发展。正是由于城市工业的

迅速发展，相应造成了城市核心区用地紧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供水不足和交通堵塞等城市问题。从 70 年代开始，中国大城市先后进行了城市工业布局和城市用地结构的调整，对那些地处城市核心区，污染严重，噪音扰民，处于其它用地规划线内，占用文物古迹以及厂点分散、影响自身生产发展的工厂，采取了向城市边缘区搬迁、疏散的调整措施，新兴的近郊工业区成为中国城市边缘区主要组成要素之一。

2. 住宅新区

5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住宅建筑面积一般都增长 3 ～5 倍，新建的住宅区绝大部分分布在城市边缘区，成为城市中心区向外围扩散的主要因素之一。

3. 城市对外交通港站

城市边缘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城市对外交通港站设置的主要地区。因此，对外交通线路、郊区道路、停车场、长途汽车站、火车站和航空港等对外交通设施，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组成要素。

4. 物资流通中心和仓库区

中国城市边缘区由于上述城市交通枢纽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物资流通中心的产生和仓库区的布局。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边缘区，已经形成有较长期固定经营地点的城乡集市贸易和近郊批发商品市场。城市边缘区由于便捷的交通条件，又成为物资储存的主要仓库区。

5. 科研文教区

50年代前，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相当落后，即使在大城市也没有形成像样的科研文教区，它们大多零星散布于城市中心区。50年代后，中国城市(尤其大城市)科研文教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机构的工作效率，满足科研、设计、试验、生产及高等院校之间联系的要求，以及专门化科研区防尘、防震和无噪声的要求，在中国城市边缘区一般都形成一两个具有特色的科研文教区。

6. 绿色空间

所谓绿色空间，是指包括菜地、农田、公园、林地、苗圃绿化、隔离带、郊区公园和河湖水面等在内的非建筑用地所构成的空间，为中国城市边缘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7. 其它非集约性用地

中国城市边缘区非集约性用地主要包括仓库、航空港、绿色空间、垃圾堆场、污水处理厂和陵园等。此外，诸如奶牛场、畜牧场、养鸡场、煤气泵站、水库水源地、水井、建筑材料采石场等也分布在这一地带。

二、中国城市边缘区划分

城市边缘区的划分，从理论上讲，其内边界应以城市建成区基

本行政区单位—街道为界，外边界以城市物质要素（如工业、居住、交通、绿地等）扩散范围为限，将这一城乡互相包含、互有飞地和犬牙交错的地域划为城市边缘区。关于城市边缘区的划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这里以广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一）城乡结合部划分

在中国大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郊区农村之间，客观存在着一个相互交融渗透、城市化过程最为剧烈的地带。这一地带，一方面通过建立若干现代化居住区，吸引大量城市核心区的疏散人口，使核心区的城市化能量向边缘地区转移集聚；另一方面，当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能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要进一步向外辐射，使核心区向外围拓展扩大，以外延型城市化把边缘区转化为核心区，变郊区农业人口为城区非农业人口。近年来，中国有些大城市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带的管理，改善其脏乱状况，将其称为城乡结合部，划定专门的区域，制定专门的管理条例进行管理。

广州市规划局 1988 年拟定的城乡结合部划分原则是：①近期城市建设发展的地段；②城市居民和农业人口混居的地段；③处于城市重点控制地区附近的农民居住地段；④城市主要出入口公路两旁各 50 米控制地段[①]。按照这些原则，广州市城乡结合部范围如图 40 所示。

由图 40 可见，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全部集中在城区向郊区的过渡地带，尤以天河、白云和海珠 3 区最为集中（表 126）。按 1988 年

① 广州市规划局："广州市关于城乡结合部管理范围的意见"，198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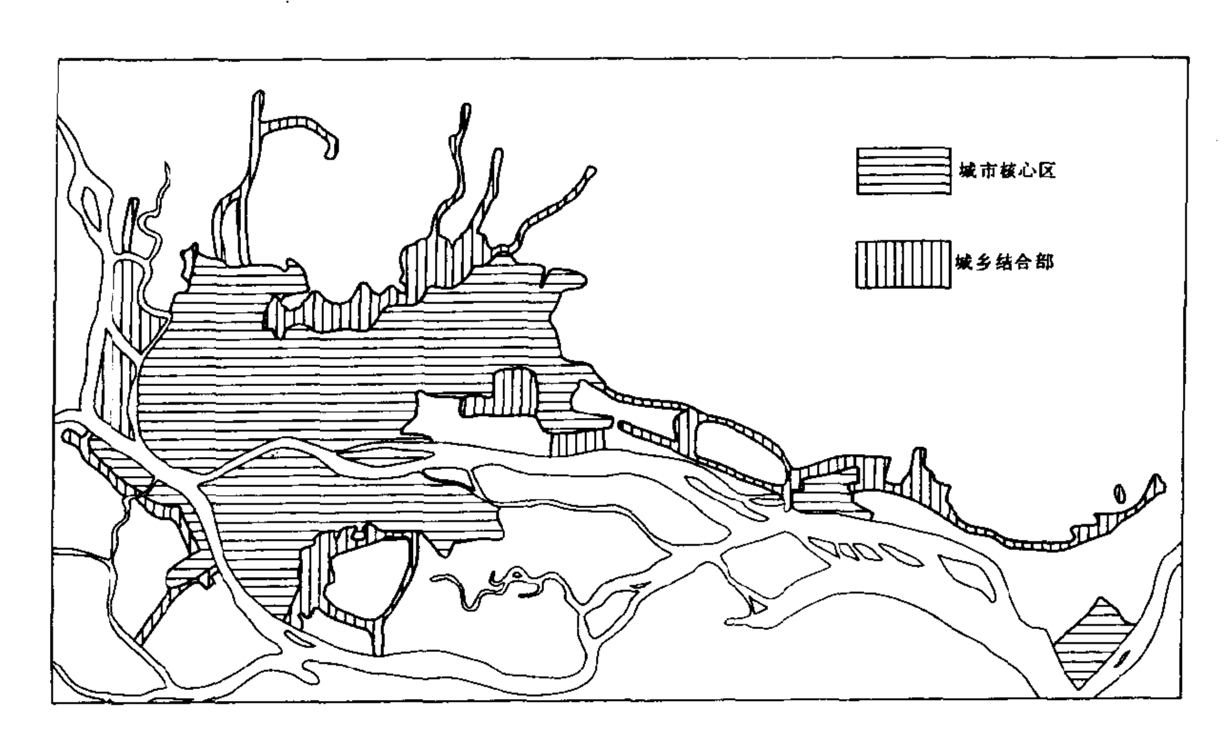


图40 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示意图

表126 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分布范围及其类型(1988年)

区名	面积(平方公里)	类型	分布范围
海珠	9.275	城乡混居	石溪涌向北至沙溪以西，五村、康乐、鹭江村、敦和市、新窖镇、新村以北，七星岗、赤岗桥以西，下渡村、赤岗塔以南地段。
		主要公路两侧	工业大道的石溪涌至广州大道及广州大道的敦和市至沥窖段，两侧各50米。
黄埔	4.825	重点控制	横沙村以西、86中学以东、坑头坊以南地段，乌涌以西、横沙村以东、体育馆以南、广深公路以北地段，加庄路以东、广深公路以北、文冲果园以西、江北村以南地段。
		城乡混居	广深公路以北，夏元铁路立交桥以东，将军山以南，省水电局住宅区以西地段，地质部二海、四海指挥部生活区。
		主要公路两侧	广深公路的大沙地至南岗涌段，中山公路的莲溪至86中学校，黄埔大道的钛白粉厂桥头至鱼珠圩段，两侧各50米地段。

续表

区名	面积（平方公里）	类型	分布范围
芳村	1.59	城乡混居	珠江大桥以南、花地河以北、城区管理范围边界以西200米地段，花地河以南、沙涌以北、城区管理范围边界以西200米地段。
		主要公路两侧	广中公路的坑口村至花地水道段，广佛公路的珠江大桥至黄竹岐市界段，两侧各50米广中公路的坑口村至广中码头路南50米（包括白鹤洞村）地段。
天河	11.4	近期发展	（1）南方面粉厂以东、广东罐头厂以西、广东玻璃厂铁路支线以南、珠江以北地段。（2）长腰玲、广园路、鹿鸣岗以南，永福路以西，鹿鸣岗、西德胜以东地段。（3）天平架以北，广汕公路以西，梅花园、牛和利岗以南，白云山脚以东地段。
		重点控制	广州大道以东渔民新村、石牌村、冼村的农民居住地段。
		城乡混居	中山公路以南，东陂涌以东，黄埔大道以北，市机安公司以西地段。
		主要公路两侧	广汕公路的岭村路口至龙眼洞段，中山公路的玻璃厂铁路支线至莲溪段，黄埔大道的高压走廊至钛白粉厂桥头段两侧各50米地段。
白云	10.645	机场附近	机场铁路以东、柯子岭路、飞鹅岭以西地段。
		车站	京广铁路以西瑶台乡地段。
		重点控制	大坦沙、螺涌围两个岛。
		主要公路两侧	广清公路的硬颈河至槎头段，广花公路的矿泉别墅至电饭煲厂段，机场路的机场南门至新市段，黄石公路的广花路至白云西路段，白云西路的柯子岭至外语学院段，广从公路的梅花园至斯文井段（包括同和镇）、沙太路的省军区招待所至耙齿岭水库段，两侧各50米地段。

统计,全市划定城乡结合部37.74平方公里。

(二)内缘区划分

广州市城乡结合部的划分,主要注重了城市自身的建设和管理,对城市核心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区、基本行政区界线考虑不多,因此,划分的城乡结合部的地域空间上表现为破碎、零乱和不连片的特点,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

按照城市边缘区内缘区的定义,实质上城乡结合部只是城市内缘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外围地区受核心区城市化能量辐射的直接、间接影响仍然很大,是乡村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带。在这一地带,一方面由于直接受核心区"外延型"城市化的影响,经常因核心区拓展扩大而被变为核心区;另一方面,它更多地受核心区"飞地型"城市化的影响,是核心区工作性通勤人口的主要扩散地带。此外,这一地带因受"飞地型"城市就业岗位扩散影响,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速度快,规模也大。因此,我们依据已经划定的城乡结合部,充分考虑核心区对外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基本行政区界线和形成完整的区域等原则,进一步划分广州市的内缘区。

据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外围地区调查,天河区、黄埔区、海珠区以及芳村区和白云区的部分地区,近年来"飞地型"城市就业岗位扩散明显,这一地区正成为城市非农业土地占用和城市指向性土地利用最具优势的地带(表127)。

根据广州市城乡结合部外围地区"飞地型"城市就业岗位分布,考虑行政区界线和相对完整区域等原则,广州市内缘区范围拟包括天河区、海珠区、芳村区花地水道以东、白云区石门金沙度假

村—石井镇—三元里镇—同和镇以南,距市中心一般不超过15公里的地域(图41)。

表127 广州市内缘区土地利用类型

区　　名	用地类型	企　事　业　单　位
天河	工业用地	珠江造纸厂,珠江造船厂,广州油脂化工厂,广州化工厂,广州氮肥厂,广州人造纤维厂等。
	科研教育用地	广东省林科所,市种科所,省农科院,广东民族学院,省林业学校等。
	仓库用地	省物资仓库等。
	公共设施用地	区儿童医疗所等。
	园林绿化用地	华南植物园,市航空俱乐部等。
	郊区农业用地	广州畜牧场。
海珠	工业用地	广州新中国造船厂,广州农药厂,广州耐火材料厂等。
	仓库用地	广州工业公司仓库。
	科研教育用地	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广东商学院,中国海关管理干部学院。
	公共设施用地	市变电站。
	郊区农业用地	市园艺场。
芳村 (花地水道以东)	工业用地	广州钢铁厂,广州造船厂,省土产公司棉花厂,区卫红竹器厂等。
	仓库用地	省外贸仓库。
	科研教育用地	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公共设施用地	市变电所。
白云 (石井至三元里同和以南)	工业用地	市华侨糖厂,广州纺织六厂,广州电风扇厂,洋城水泥厂,人民水泥厂,市元件一厂,市元件四厂,市第三机床厂等。
	交通用地	白云机场等。
	仓库用地	市粮油仓库,省商业北站仓库,省化工原料站。
	科研教育用地	广州外贸学院地,广州外语学院,第一军医大学
	园林绿化用地	铁路疗养院,石门金沙度假村,海角红楼游泳场、梅花园。
	郊区农业用地	白云农场,西郊水果批发市场,竹木市场。
	特殊用地	军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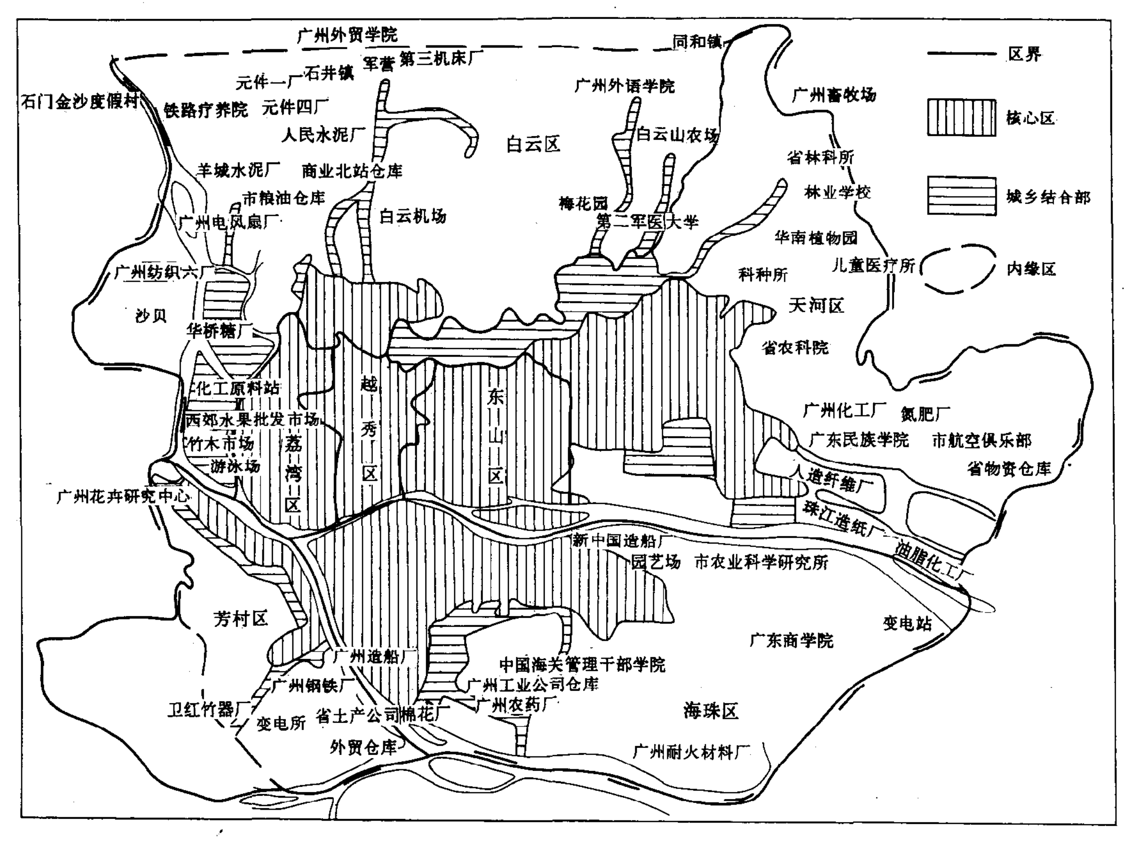


图41　广州市内缘区范围图

（三）外缘区划分

城市外缘区因距城市核心区较远，受中心城市化能量辐射的影响较小，是城市边缘区中较内缘区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的地带。这一地带虽受核心区“飞地型”城市化的影响，但土地利用仍以农业为主，吸收核心区的工作性郊迁扩散人口数量较少，且由于距离较远，其中定居人口比重较内缘区有所上升，相应发展成为一批郊区卫星城镇。从总体上来说，这里比起内缘区，城镇人口密度不高，比重也比较低。鉴于外缘区的功能特性更趋同于城市影响区，其划分一般也采用流分析理论与方法。这里仍以广州市为例。

根据上述广州市内缘区划分，其外围地区由东部的黄埔区、北部白云区（部分）、南部番禺市和西部的芳村区花地水道以西地区和佛山市的南海县组成。

（1） 黄埔区

本区距离市中心约30公里，相对于其它地区而言，是“飞地型”城市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区内现已建成黄埔港区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汽车制造厂、广州石油化工总厂、广州船舶修理厂、为民化工厂、801厂、黄埔造船厂、水泥厂等一批重要工业企业也分布在这里。此外，黄埔港、省外贸仓库、省燃料公司仓库、661研究所、广州热带机床研究所、省第二工人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也有分布。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地区正成为城市用地的主要发展方向。

（2） 白云区（除石井、新市和同和镇外）

本区距市中心也在30公里左右，是广州市重要的郊区农业基

地。例如江高镇,位于广州西北郊17公里处,人口6万余。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利用靠近大都市和河网纵横的地理条件,发挥农民传统养殖技术的优势,建立了以鲜活农产品为主体的创汇农业生产基地。这个镇以镇办鸡场为主要基地,从饲养杂交鸡、竹丝鸡以及驯化珍珠鸡和长白山鸡等优稀品种入手,确立了国际市场导向,1986年家禽上市量263万只,其中出口130万只,创汇1500万港元。1986年联合体又进一步充实和扩大,成立了一个具有集团性质的镇畜牧水产总公司,建立了4个较大规模的猪、鸡、蛋和塘鱼生产基地,拥有8个大型家禽饲养场,643家养鸡大户,1073个专业户,还建立了水产养殖基地、良种种苗场、良种中猪出口生产基地等。近年来又进一步将菜地扩展到1万亩,并与广州铁路部门和中兴公司联合组建南粤果菜公司,一方面为5000多蔬菜专业户提供良种和各种服务,另一方面又把广东的水果、蔬菜、塘鱼运到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再从外省把苹果、葡萄、雪梨、哈密瓜等北方水果运到广州。

(3) **番禺市**

市中心市桥镇距广州15公里,是广州市的卫星城市。全市依托中心城市广州,现已形成了以制糖、造纸、轻纺、食品、建材、电子、玩具、服装等为骨干的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对外贸易活跃,大批鲜活商品供应省内外及港澳,已发展为广东省出口基地之一。

(4) **南海市**

南海市历史上与广州市关系密切,一直作为广州市的远郊区发展。近年来由于佛山市经济的发展壮大,在行政区划上划归佛山市领导,从而人为割裂了南海市与广州市的有机联系和依托关系。但从现状经济联系看,市域的东北部地区(如黄岐、里水、盐

步、和顺、官窑、松岗、大沥等乡镇),仍然是广州市的重要影响地区。

综上分析,广州市外缘区范围拟包括黄埔区、白云区(除石井、新市、同和3镇)、番禺市的沙湾水道以北,芳村区花地水道以西以及南海市的东北部地区,距市中心直线距离约30公里的范围内(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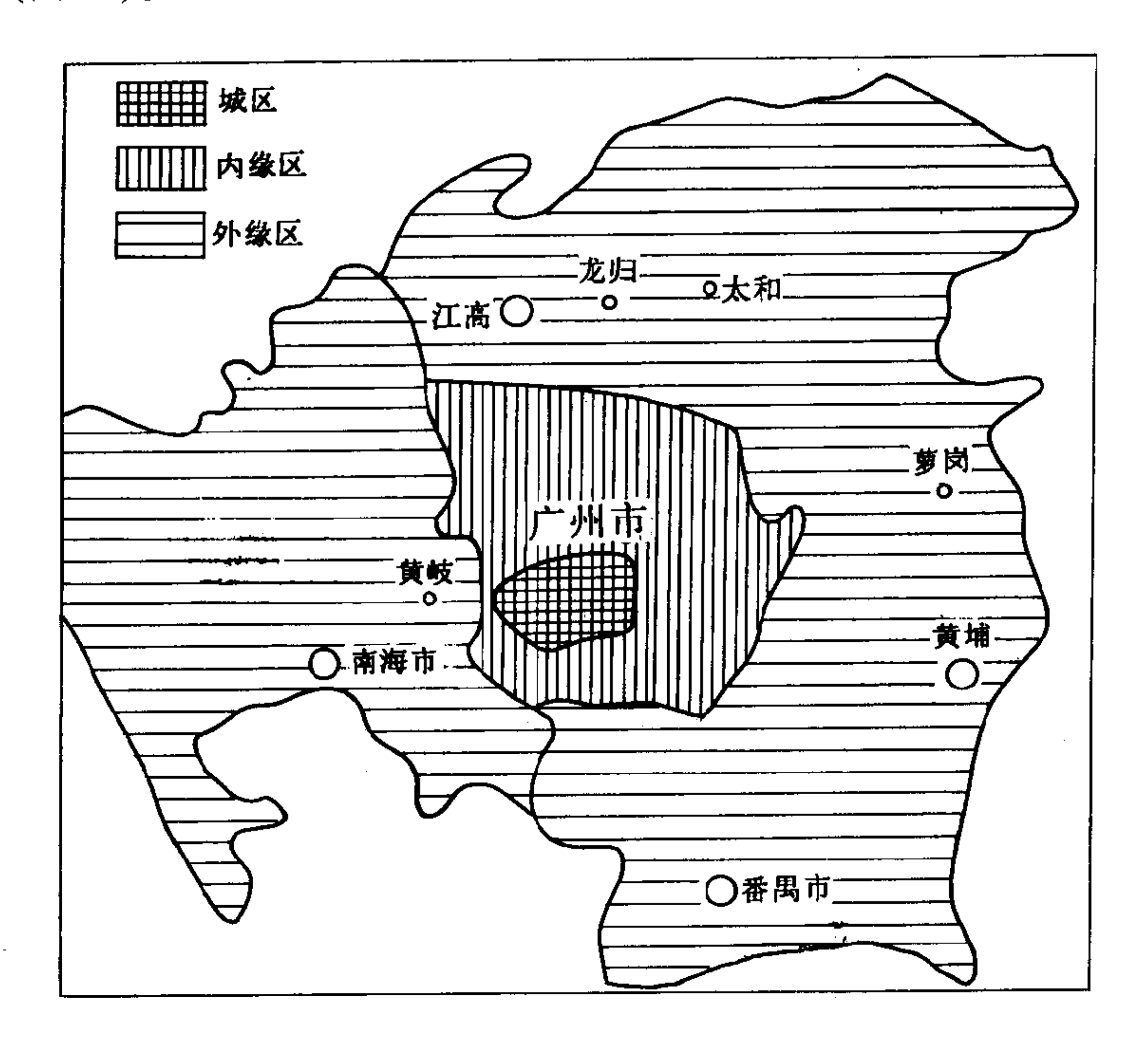


图42 广州市外缘区范围图

三、中国城市边缘区特性

（一）城市边缘区人口特性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人口混居的地带，具有相应的人口学特性。

1．城市边缘区人口密度特性

城市边缘区人口密度特征介于城市与农村两种类型之间，显示出过渡性。这种过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其绝对密度水平与城市及外围农村地区都有显著差异；②人口密度也介于农村和城市二者之间，既不像城市中心区域那么陡峻，也不像外围农村地区那样平缓，形成相对的缓坡区段。

我们假设城市、农村、边缘区分别有下述3种人口密度函数：

$$D_U = D_{U\Phi}e^{-\nu_U L} \quad (1)$$

$$D_R = D_{R\Phi}e^{-\nu_R L} \quad (2)$$

$$D_F = D_{F\Phi}e^{-\nu_F L} \quad (3)$$

3条指数函数在3个范围成立，并相互衔接成城—缘—乡人口密度分布联合模式。

我们进一步定义人口密梯度率为 $\nu = 11/d \cdot dD/dL1$，对于函数 D_U、D_R、D_F，人口密度梯度率就是常系数 ν_U，ν_R 和 ν_F。不难证明，在上述联合模式中存在：

$$\nu_F > \nu_U > \nu_R$$

这就表明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地域人口密度梯度率最大的地带。这种巨大的人口密度梯度率导致了城市人口密度过渡带的出现。

据上海市12区9县研究,城市核心区(包括黄埔、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虹口、杨浦、闸北10个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7900人,相当于全市平均密度的13倍强。人口密度随与核心位置距离的增加而呈迅速下降的陡峻峰态。从核心区到边缘区,平均半径为9.45公里,而人口密度却由每平方公里136400人下降到接近每平方公里2000人。

我们应用模型(1)进行拟合,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与距核心距离的关系为:

$$D = 14.911e^{0.29L} \qquad (4)$$

根据模型(4)计算可知,城市核心区平均人口密度梯度率为每平方公里21.4%,城市边缘区为每平方公里46.6%,农村地区为每平方公里2.3%。

2. 城市边缘区人口构成特性

由于各种外力的综合作用,城市边缘区的人口构成较其它类型区更加复杂,具有如下特性:

(1) 农村人口仍有一席之地

据上海市1989年统计,普陀区中属于城市边缘区的真如镇和长风、曹安两街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5%,虽远远低于上海郊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8.9%,但与核心区0.3%相比仍有一席之地。尽管在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被征用的同时,农村人口也被不断地吸收为城市人口,但与此同时又会有新的郊区乡村“加盟”为城市边缘区,因此,城市边缘区的农业人口和用地具

有动态的相对稳定性。

(2) 流动人口集中

据1988年上海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①],30%的流动人口集中分布在边缘区街道。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这一地带相对城市核心区人口较稀,工厂较多,基建工程面广量大,简单劳动的就业机会较其它地带多,易于外来人口谋生;二是因为城市边缘区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漏洞,有些地方甚至行政边界也不清楚,相应的户口控制也较松弛,便于外地人落脚。

(3) 性别比例偏高,年龄结构偏轻

上海市人口性别比的空间差异特征是:边缘区高于核心区和远郊区,镇高于乡。1990年上海市区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07.8,而郊区9县平均只有98.5。在市区,位于核心区的静安区性别比为99.4,卢湾区为101.4,而位于边缘区的徐汇区为110.8,普陀区为106.2。在郊县中,镇特别是县城的人口性别比显著高于乡,9个县城的平均性别比例为120.2,县城以外各乡镇平均只有90.6。

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年龄构成属城郊过渡型,较城市核心区偏轻。据上海市1985年调查,普陀区人口中位年龄为31.8岁,其中边缘区城乡结合部的街道为29.8岁;而郊县平均人口中位年龄不足28岁。

(4) 文化构成并不落后

城市边缘区的人口文化构成水平与核心区并不存在明显差距。如位居上海市核心区的卢湾、静安两区的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1.5%和13.2%,而位居边缘区的

---

①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流动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徐汇区达 18.0%,长宁区为 13.0%,杨浦区为 12.0%,普陀区、闸北区略低,为 9.9%和 7.8%。但在普陀区内部,属于城市边缘区的长风、曹安、真如 3 个街道的比例则高达 17.8%,而非边缘区街道只有 8.6%。

(二) 城市边缘区社会特性

城市边缘区也是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混合交融地带,以邻里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区形态渐次侵入以传统家庭(包括联户家庭)为基本经济实体的农村社区,直接导致边缘区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1. 城市边缘区社区结构特征

(1) 城乡居民混居地带

在城市边缘区中,城乡居民混居具有独特性。在内缘区,由于城市新区扩展迅速,农村社区很快被城市社区同化,从而形成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社区结构。例如广州市沙河街,从 70 年代以来,每年就以近千人的规模迅速实现农转非,在目前 4.7 万常住人口中,农业人口仅占 1%。其次,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又与农村居民共同组成家庭混居在城市住宅新区中。在外缘区,其人口组成除有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外,还有通勤人口;且常住人口中又有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和自理口粮人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外缘区城乡人口混居的社区结构特征。

(2) 动态的城乡二元社区结构

从动态观点看,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结构被看成是城市社区不

断侵入农村社区,并使农村社区转化渐变为城市社区的演化过程。这种侵入和演化主要通过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占有者更迭来实现。城市边缘区侵入和转化使发达的社区逐渐形成有明确界限的分区,每个分区都具有明确的特征。如广州城市边缘区由城市社区和乡村组成,城市被乡村社区所包围,按其居民分又可进一步分为工人居住区、干部居住区和知识分子居住区等,且具有明显的圈层社区分布结构特征。

2. 城市边缘区社区特性

(1) 核心家庭的增加

随着城市边缘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地带成为吸引人口流入、人口机械增长的主要地区,青年单身者的大量增加导致核心家庭增加。与此同时,传统农村地区城市化,促使联合家庭失去生命力,相继分裂成少数主干家庭和多数核心家庭。此外,在城市边缘区,青年人独立成家获得住房的机会比城市核心区多,农村城市化也使得郊区建房机会增加,从而促进了核心家庭的形成。据上海张家弄、南京夫子庙四福巷城市核心区和北京团结湖、天津尖山街城市边缘区调查表明,城市边缘区较城市核心区家庭呈增长趋势,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呈减少趋势,单身家庭也大幅度下降。

(2) 家庭户与家庭的不一致

在城市边缘区,由于城乡人口变化和就业机会不同,家庭户与家庭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如一些人已在城市核心区居住,但因农村户口不能及时转入城市户口,使得户口不能及时迁移。再如一些人因工作岗位已经长期在城市边缘区,但因不愿意放弃城市核心区的户口而不将户口落在城市边缘区;还有人理论上应当

将户口迁出城市边缘区(如妇女结婚等),但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不愿迁出。据广州市沙河街调查,1989年按户籍统计有46645人,实际上人在户不在的人数达8000多人,户在人不在的人数达5000多人。

(3) 初婚年龄均值小,离婚率低

据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四城市调查,城市边缘区男女初婚均值低于城市核心区。具体地说,男子初婚年龄平均小2岁,女子初婚年龄平均小0.3岁。就离婚率而言,城市核心区为1.59%,而城市边缘区仅为0.09%。

(4) 居民文化素质反差大

城市边缘区由于不同文化水平、不同职业的居民生活、居住在一起,不同信仰交织,多种需求交叠,居民文化素质反差较大。如温州市龙港镇,农民集资兴建了学校、游艺场、电影院等现代文明设施,同时也新建了庙宇、宗祠、教堂和各色豪华型坟墓等等。

(5) 工作地点与生活地点的分离

城市边缘区是一个独特的扩展型的社会经济空间,工作和生活于这一地区的人们是整个城市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活动都是以整个城市为指向的,这就造成了这一地带人们工作地点和生活地点的分离。据北京劲松居住区调查,这个居住区规划建设意图是解决东南郊工业区职工的缺房问题,但实际分配结果,在东南郊工作的只有9.6%,在邻近地区(东郊、崇文区)工作的占20%,而在西城、西郊、西北郊、北郊等地远距离上班的约占47%,另外还有2.5%在远郊县上班。

(6) 犯罪率高、社会丑恶现象集中

流动性大、构筑犯罪黑窝和犯罪团伙作案是城市边缘区社会

犯罪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特点。犯罪类型既具有城市社区型犯罪，也具有农村社区型犯罪，尤以盗窃、抢劫、诈骗、强奸、凶杀、吸毒贩毒、走私物品等几类案件最为突出。社会犯罪率远高于城市核心区和农村地区。据广州市沙河镇调查，在这个不到5万人，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区内，1989年发案1432件，平均每天达4件之多。其次，由于城市边缘区管理不严，流动人口集中，嫖娼、卖淫、赌博、吸毒、乞讨等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

（三）城市边缘区经济特性

城市边缘区，一方面，城市工业不断以集聚工业区形式跳跃渗入，并成为郊区城市化的核心。另一方面，受比较收益规律驱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经济也在迅速地分化和重组，乡镇企业成倍增长，城郊型农业比重不断扩大。

1. 边缘区的经济功能

（1）城市蔬菜、副食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蔬菜、副食品具有消费量大、易腐变、难储运等特点，故在生产布局上要求接近市场，缩短运距，少储快投，增强保鲜。边缘区毗邻城区，交通快捷，自然也就成为大城市蔬菜、副食品的优先发展地带。据有关资料，北京十年“菜蓝子工程”实施的主要项目都集中分布在边缘区，尤以内缘区为重点，在2.2万公顷稳产高产菜地中，50%分布于内缘区（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4近郊区），如包括顺义、通县、大兴等30多个乡镇，其菜地的88%、蔬菜上市量的75%都分布在距市中心仅25公里左右的圈层地域内。13个以肉、

奶、蛋、禽、水产品生产为主的现代化国营农场，有 11 个分布在近郊 4 区的边缘。

（2）城市大工业扩散的重点地区

自 50 年代以来，边缘区尤其是 8～20 公里圈层范围内的内缘区，一直是城市大工业扩散与发展的重点地域。据北京调查，在其近郊区半径约 10～15 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两条城市大工业集中分布的环形地带。其中，沿三环路两侧分布的 8 个近郊片，集中了 600 个工厂和 23 万职工，形成如双井、广安门、大郊亭、东南郊等工业区；沿规划公路两侧分布着 10 个边缘集团，约集中了 1200 多个工厂和 62 万职工，形成如石景山、酒仙桥、丰台、清河等工业区。其次，边缘区的城市工业多数是规模大、占地多或污染较重的石化、冶金、机械、化学等大中型企业。如石景山区，除五六十年代扩建、新建的首钢、石热、高电、北锅、北重等八大厂外，80 年代以来，又迁入了特钢、北钢，以及扩建电机厂、新建 NEC 工程等。全区市属以上大中型企业占 65%，产值占 98%。

（3）大宗商品、物资流通集散中心

大城市边缘区凭借其交通枢纽位置和“开敞空间”等优势，通过开办各种批发市场、货栈、集贸市场、期货与现货交易、二手货交易和各种定期与不定期展销会，逐步确立了其在城乡乃至跨省区物资、商品流通集散的中心地位。具体表现在：①边缘区批发、交易市场数量多、规模大。如广州市 123 个集贸市场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边缘区，年成交额近 30 亿元；另有 22 个专业批发市场也分布在边缘区。②流通集散地域范围大。如兰州市汽车交易市场，武汉粮食市场，鞍山钢材交易市场等，大多辐射数省乃至全国。③流通集散品种多样，已从传统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交易扩大到大

宗原材料、生产资料以及二手货交易。

2. 城市边缘区的经济特征

受城乡经济双向辐射，边缘区经济既显示出发展速度快，产业结构综合，农业集约化与现代化水平高和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具有双向衔接等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1) 乡镇工业发展快、起点高，与大工业联系密切

与一般乡村地区工业发展过程不同，边缘区乡镇工业发展大多依托城市大工业起步，不少乡镇工业从建厂初期就得到城市大工业的资金、技术、设备及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有的是作为大厂的一个车间发展起来的。因此，其发展起点较高，发展快。1991年京郊乡镇工业发展到1.36万个，从业人员达62万，总产值128.8亿元。据调查[①]，约有一半左右的乡镇工业是为大工业进行工艺性加工和零部件配套的，约有2000多个企业成为大工厂的零部件加工协作点；与大厂联合经营的企业超过670家。

(2) 就业机会广、谋生手段多、兼业和流动就业人员比重大

边缘区是多种行业、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模式混合分布地带，又是经济结构变动最为迅速的地区。首先，每年都有大批新、扩建项目落成，不断提供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其次，由于新建居住区的配套商业网点和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尚需数年方能到位，这也为边缘区农村输出劳力或外来谋生人员提供了诸如流动早点

---

① 邬江："北京工业离心扩散对城乡建设的影响"，《北京规划建设》，1990年第2期。

摊，个体饭店，多种修理业务，蔬菜，副食品，日用商品零售，以及个体旅店和家庭住房租赁等多种谋生手段和兼业的机会；第三，由于合作、联营、个体经营的用工制度灵活性大，且形式多样，故农村居民或一业为主、兼从他业，或是在职业选择上表现出追逐比较收益，频繁调动工作，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

(3) 人均收入高、收入差距大，暴发户多、贫困户少

由于兼业机会以及乡村经济的分配制度较城市经济更为灵活，所以在边缘区，尤其是内缘区，人均年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城区和一般乡村地区。如石景山区的八宝山、八角村、八大处等地，劳均收入超过3000元以上，村民家庭人均收入2000～2500元以上，平均为城区职工家庭1.2～1.4倍，为影响区村民家庭的1.6～2倍。其次，与国外城市不同，中国大城市旧城改造缓慢，因此，绝大部分经营性总公司、合资公司、独资公司及其高级雇员、职员都分布在边缘区；企业主、承包商、养殖大户、歌舞厅老板、商贩、投机暴发户以及垃圾大王、手艺人等也都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区。无论是人均收入、家庭财产，还是住房水平、消费水平，这些家庭都与一般职工家庭和本分农户形成强烈反差。第三，由于一般家庭收入中集体收入仍占70%左右，而边缘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一般乡村地区，所以，绝对贫困户极少。据抽样统计调查，北京近郊区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的家庭比重仅占3.3%，朝阳区人均收入600元以上家庭占96.7%。

3. 城市边缘区经济扩展特征

受级差地租及比较收益规律支配，城市边缘区经济的空间扩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1）**圈层经济分布带**

如果说，大城市核心区主体经济（商业、贸易、金融、信息）呈结节分布、乡村经济为均质分布的话，大城市边缘区经济则呈现出特有的圈层分布态势。具体表现在：①农业经济的圈层分异。如北京郊区大致形成3个分异带：即内环带，环宽约5公[illegible]，为城市与农村插花交错地区，是精细蔬菜、花卉、苗圃等园艺农业分布带；近郊环带，环宽约10～15公里，为蔬菜、畜牧（奶、蛋）为主的混合农业分布带；远郊环带，为粮、经、果、牧综合农业分布带。②城市工业扩散的圈层分异。如北京郊区形成的内缘8个片（环半径约4～6公里）、近郊10个边缘集团（环半径10～15公里）和远郊十几个工业卫星城（环半径大于20公里）等3个工业扩散分布环带。③经济发展水平的圈层分异。以朝阳区为例，各乡耕地亩（1亩=1/15公顷，下同）均农村社会总收入的分布，距市中心10公里圈层内，亩均收入15000元以下；在10～15公里圈层内，亩均收入10000元左右；在15公里以外地区，亩均收入降为5000元左右。

（2）**滚动式扩展**

与一般乡村经济不同，边缘区经济不因城市规模扩大、部分内缘区渐次并入城区而缩小。相反，由于城市经济辐射能力增强和影响范围扩大，促使外围更多的乡村经济转化为城郊型经济而并入边缘区。如菜地的扩散，北京近郊4区1990年比1989年蔬菜播种面积虽减少了246公顷，但同期毗邻6区县则增加了2695公顷，增减比为1:0.09。其次，受比较利益驱动，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亦呈现滚动式替代。大田农业逐步为精细农业、园艺农业、设施农业替代，农业用地逐步为工业、运输仓储业用地替代，住房用地

逐步为商贸、旅游业用地替代。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边缘区经济呈现出以城区为中心,由近及远的滚动式扩展和经济收益、发展水平由高至低的梯度分布。

(四)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性

土地利用是一种比较直观地反映城市边缘区发展变化的自然要素。城市边缘区土地具有城郊利用二重性,与城市核心区和乡村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特性。

1.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现状特征

(1) 城乡用地犬牙交错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和利用强度、地域空间结构及地理景观等方面,表现为从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向郊区农村土地利用类型的过渡。理论上讲,这种过渡遵循距离衰减规律,但在实际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不规则的资源区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道路系统、市政公用设施构成的可达性模式的影响,因而形成城市型与农村型用地犬牙交错、轮廓复杂的土地利用形态。

(2) 乡村用地被城市线网严重分割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向扩展迅速增长的地区,也是城市各类基础设施迅速向外延伸、逐步建设的地区,从而也导致了这一地区乡村土地被城市线网严重分割的现象。如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随着城市核心区的扩展已成为城市建设前缘地带,全乡规划建设用地 278 公顷,被 11 条纵横城市道路、铁路环线和几条斜穿乡内的高压线走廊切割成 58 个地块。

(3) **城市建设不断蚕食乡村用地**

城市边缘区是一个最先感受到城市化,并不断被城市同化的敏感区域。在这一地区,最初并不具备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随着城市扩展首先在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的地段建设城市的市政工程和基础设施,然后相继成组成片布局工厂、居住区和学校等。这样,城市边缘区的乡村用地,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产生新的城市用地生长点或轴线,并以这些生长点或轴线为依托不断地被分割和蚕食。

2.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特性

(1) **农业用地集约化程度高**

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与远郊农业用地相比,一方面,由于联系便捷,农产品能及时进入市场,并能及时获得城市的技术和信息,单位面积耕地的产出率和活化劳动均较远郊农区为高;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不断向外扩展、蚕食耕地,农业用地越来越成为宝贵的土地资源,较远郊农区更为精耕细作。从总体上看,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集约化经营水平较一般农区为高。

(2) **城市用地"三大"、"三低"**

占地大、污染大、生产用料大,建筑密度低、用地容积率低、经济效益低,是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基本特性。据上海市调查,从城市核心区到边缘区,仓库、工业用地从小到大,工业污染从轻到重,绿地空间从小型游园到大型游乐场、郊区公园,高校科研单位的数量和规模也呈从小到大的变化。大型工业企业、粮库、铁路编组站、铁路货场、大专院校等均位于城市边缘区。另据调查,广州市核心区建筑密度在52.2%以上,而城市边缘区的建筑密度则一

般在20%左右。就用地容积率而言,上海市中心区用地的容积率是城市边缘区的2倍。个别地段差异更大,如黄浦区广东街道容积率为1.4,而闸北区澎浦街道只有0.028。此外,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城市核心区。

(3) 土地利用楔形增长

城市边缘区的城市用地,由于企业客观上要求成组成片布局,共享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市政设施,其开发均采取连片形式,这与城市核心区"见缝插针",生产和居住"包围"和"反包围"的布局形态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区是个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不断推陈出新的地域单元:老的城市边缘区会逐渐演化为城市核心区,新城市边缘区又从最邻近的农村地域中滋生,如此推动城市地域的扩大。从中国城市边缘区城市土地外向扩展形态看,现已从原来以圈层为主的发展方式进入楔形增长为主的新阶段。这种城市的快速增长带来的"飞地式"用地,呈楔状镶嵌到很远的农村腹地,使得城市边缘区跨度不断加大,城乡梯度逐渐减小。

(4) 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

随着城市的外向扩展,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也发生不断变化,总的趋势是由农村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据广州市调查,城市边缘区外向扩展主要是变农田荒地为城市用地;城市边缘区内城市土地利用性质的改变,最明显的是变园林绿地为生活或生产用地。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性质的变化过程显示出如下的规律:近郊农业用地—菜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充填—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配套。

第二十章　中国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3种环境系统构成的复杂空间系统，它反映了过去和现在城市文化、技术和社会行为的历史过程。城市形态也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人类各种活动与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一）中国古代、近代城市形态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和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传统的文化、宗教以及众多的社会观念等都对城市形态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代表不同时代的城市形态特征。

1. 古代城市形态

在中国古代，"天圆地方"是一种颇为盛行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神居住在天上，人居住在地上。这样，方形就成为人类聚落尤其城池最合适的形态。中国最早的城市建设制度《考工记》就曾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直到战国时代，这种"先王之制"的营国制度才有所突破，《管子·乘马篇》提出了城市形态不一定规整的思想，应"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尽管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城市的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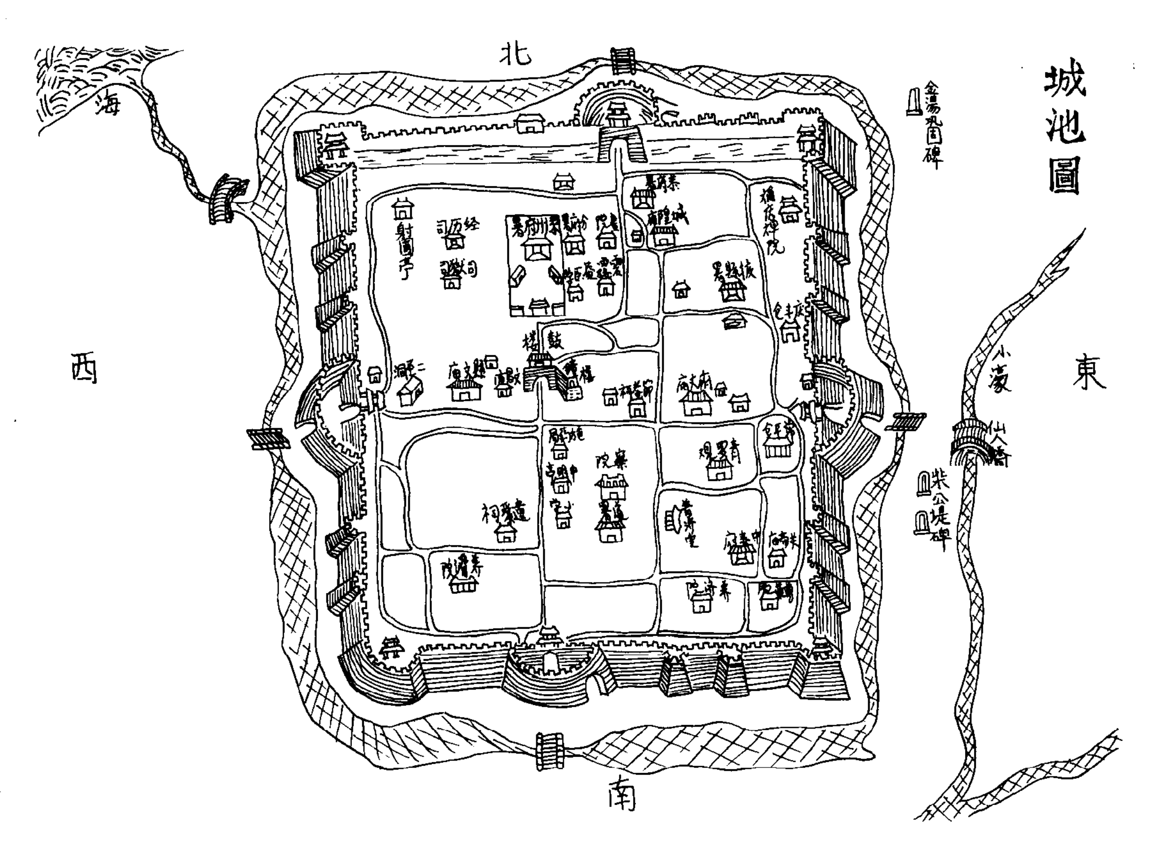


图 43　山东莱州古城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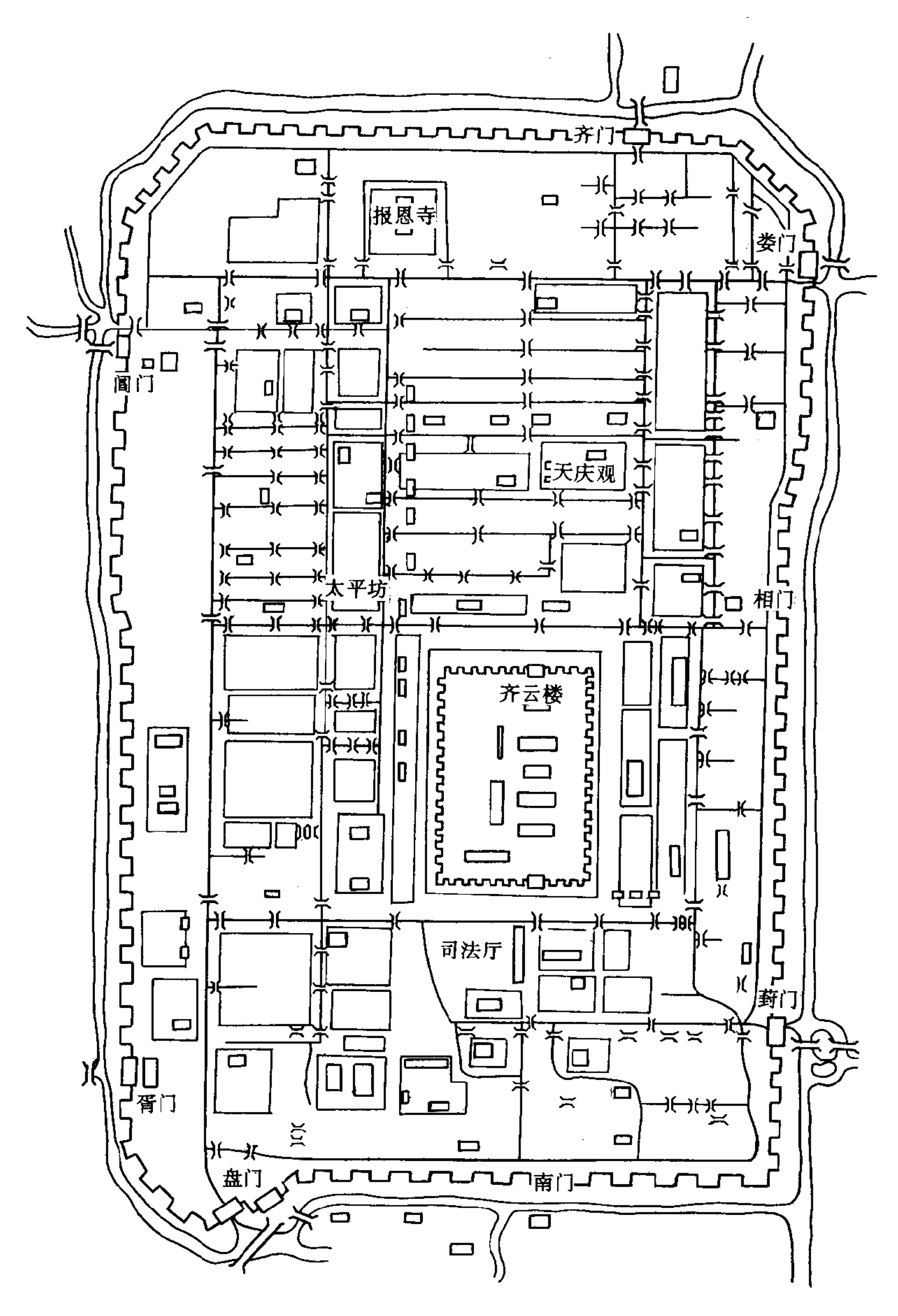


图44　苏州古城平面图

态大多数是方形的，其次是不规则形。

(1) **方形**

这类形态的城市在中国数量最多，尤其在北方和南方的平原地区，它们四周围以高墙，呈矩形，方位多正南北或接近正南北，城门数由城市大小而异，并以城门为入口组成丁字形、十字形、井字形的方格状道路系统。如山东莱州古城就呈正方形(图 43)，江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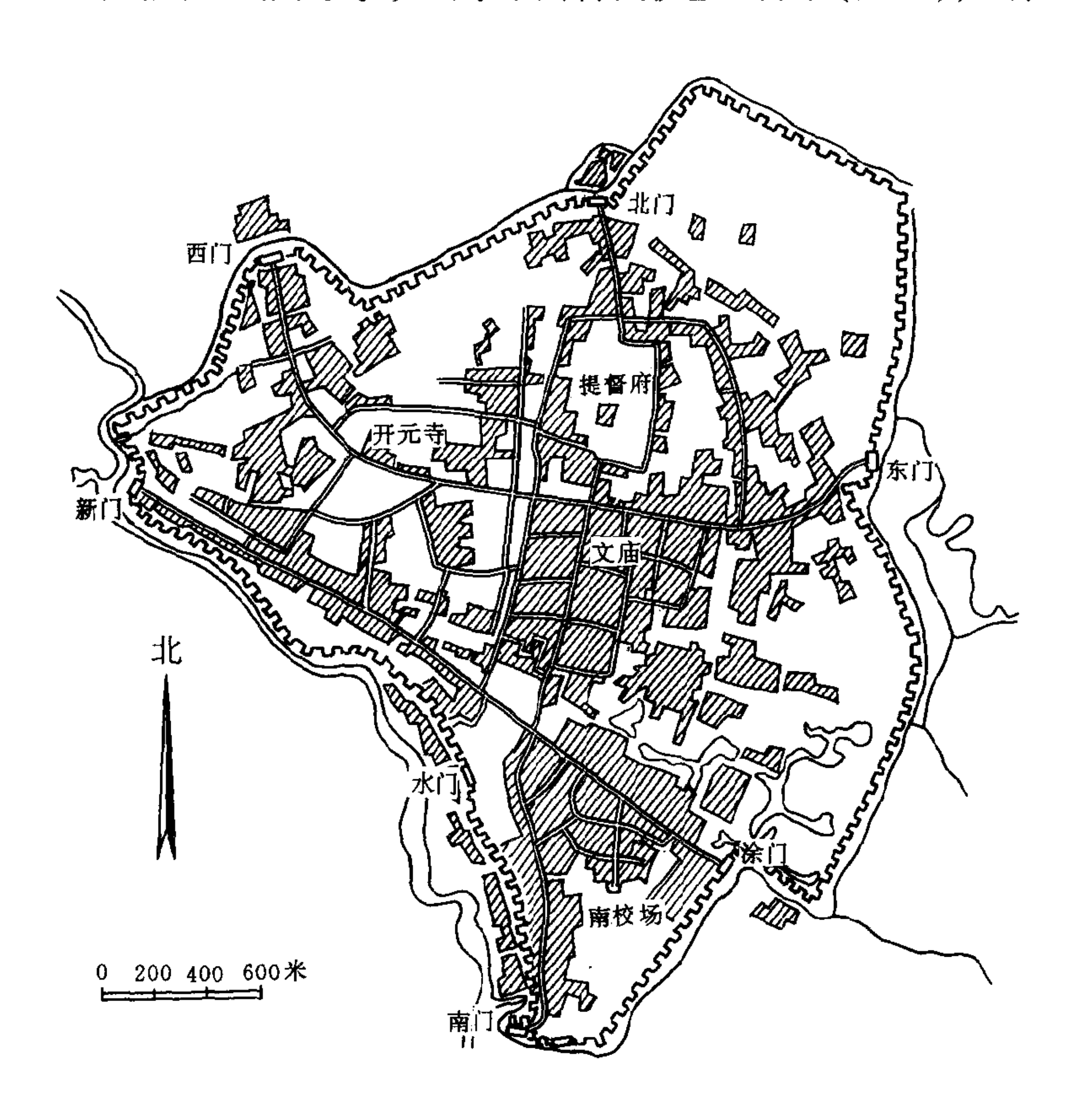


图 45　宋元时期的泉州

苏州古城则呈长方形(图 44)。

(2) **不规则形**

这类形态城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河流山川等地形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其城市布局不是严整规则的,建筑的布置也不规则,未形成以官府庙宇为中心,而是以港口或手工作坊为主体形成不规则形的城区。如宋元时期的泉州(图 45)和明代的江西景德镇(图 46)。



图 46 明代江西景德镇

2. 近代城市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开始逐渐解体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和文化的输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方形城市形态,城市内租界各自畸形发展,形成了以不规则城市形态为主体的局面。如上海,1845 年 11 月英帝国主义与清朝上海地方官员订立所谓“地皮章程”中,

规定划出一定的地界为英国人居住，这就成为后来的租界。1848年美国占据虹口一带为美租界。嗣后，法国也在上海强占租界。日本虽无租界，但却盘踞虹口一带形成势力范围。租界地的不断扩展，使这一时期的上海迅速沿黄浦江伸展，形成倚江而居、自由发展的城市形态（图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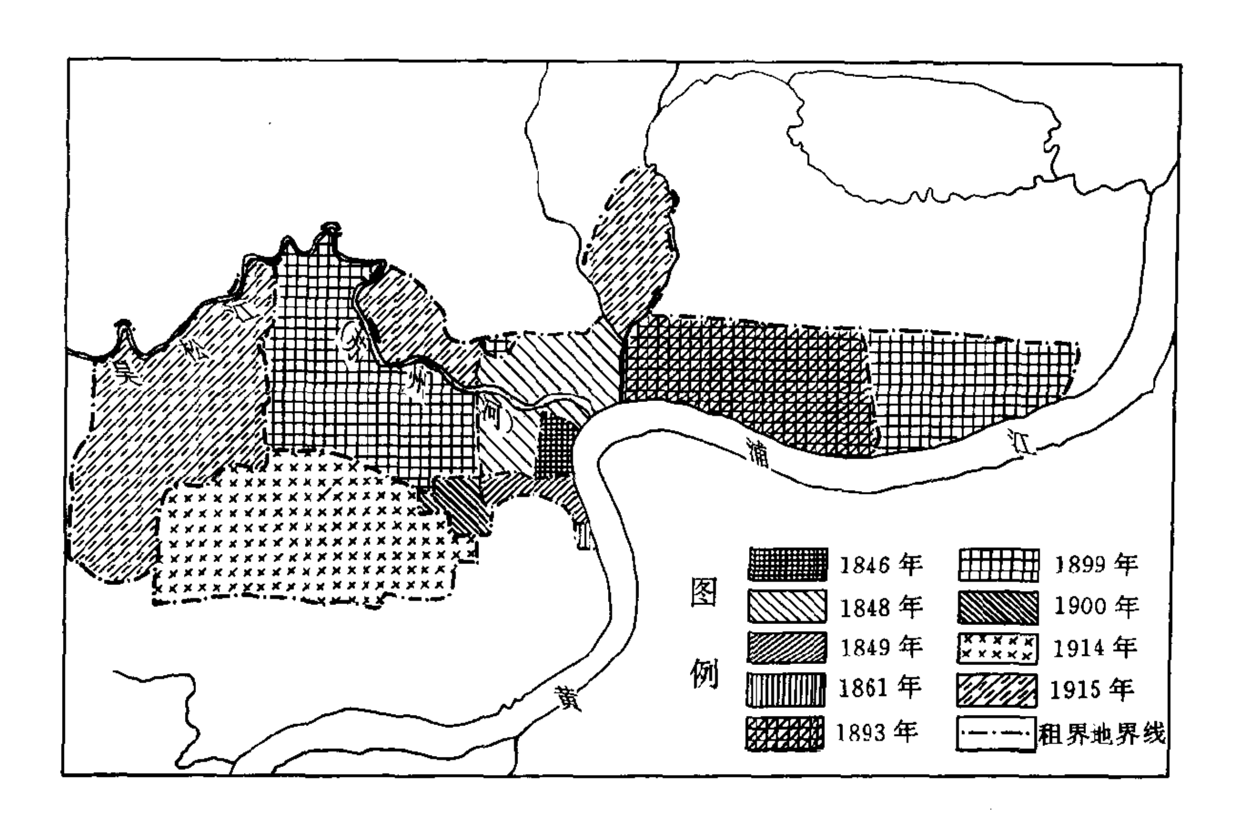


图47　上海租界地的扩展

再如大连市，帝俄占据时期市区面积约4.25平方公里，市区除铁路、码头港口用地外，分为“欧罗巴区”、“中国区”和“行政区”3区。日本占领时期为侵略中国需要又将市区划分为“军用地”、“日本人居住区”及原来的“中国人区”。日本人居住区由原来的“欧罗巴区”和“行政区”组成。“军用地”于1906年即开放，逐渐变成工业、仓库、商业和住宅的混合区。城市发展以港口为主体，沿海滨扩展（图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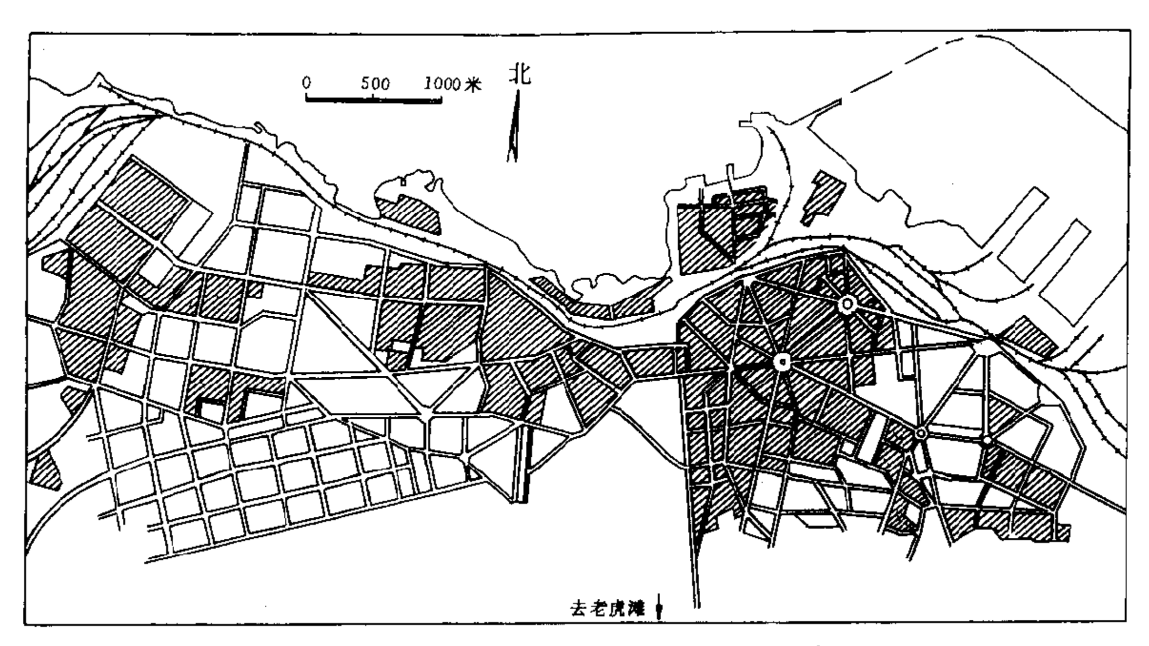


图 48 大连城市平面图(1924 年)

中国传统的老城市也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而突破原先的方形城墙范围向外蔓延发展,同时由于近代交通的发展,又在码头、车站附近形成商业区,形成了子母城的城市形态格局,如福州近代城市形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 49)。

(二) 中国现代城市增长的空间过程

中国大都市地区增长的空间过程,主要表现在城市蔓延、郊区城市化和远郊卫星城建设等方面。

1. 城市蔓延

在中国,由于城市化水平还没有达到饱和状态[①],农村剩余劳

① 在工业化社会,一般将城市化水平 70～80%视为饱和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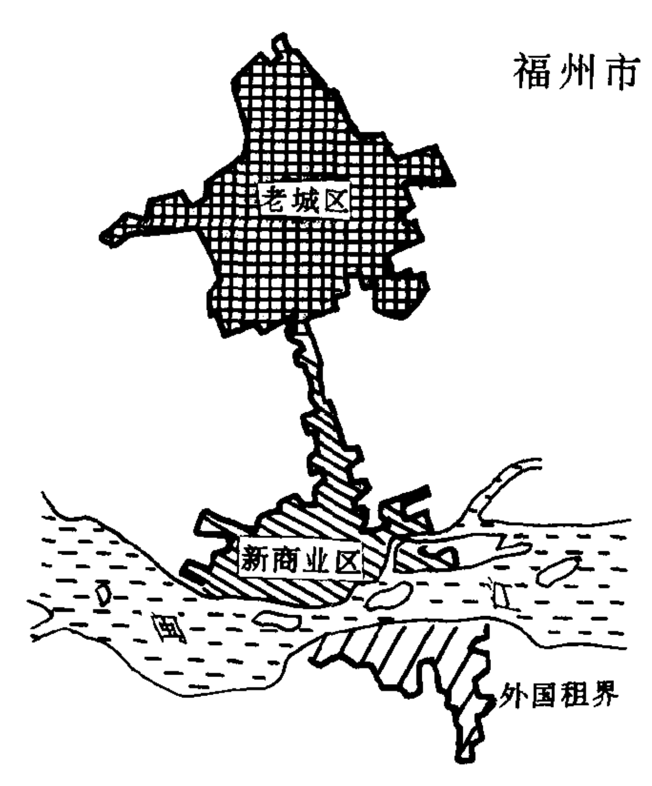


图 49　福州近代城市形态图

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增加的就业岗位远远超过城市建成区人口的合理容量，致使城市不断地向郊区发展。这种城市外围土地利用和开发，尤其表现在单纯建设生活居住区，我们称之为城市蔓延。据北京市调查，近 40 多年全市建成区扩展占用土地达 519.75 平方公里。其中，除了工业用地较为均衡外，大量的住宅区、机关、科研单位、大学等，主要布置在西一西北方向上，使这一方向的城市用地和城市人口增长明显多于其它方向，形成了北京近郊城市化所特有的向西北蔓延的空间形态。

2. 郊区城市化

所谓郊区城市化，一般是指郊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郊区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中国大都市郊区城市化经历了人口、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现象的转变，从广州市、北京市的郊区都可以看到这种郊区城市化的雏型。

3. 卫星城建设

中国大都市外围卫星城以自然发展起来的占多数。在北京，卫星城镇建设开始于 1958 年，先后在远郊 11 个区县扩建、新建了

50多个城镇和工业点。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4个，即通县、燕山、黄村、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怀柔、延庆、平谷、房山、良乡、琉璃河、沙河、南口、新镇、长辛店、庞各庄、周口店、天竺、安定、牛栏山、康庄、埝头等。这50多个城镇分布在距市区中心20～70公里半径的地域内。每个城镇的人口规模，大的6～12万人，小的1万人左右，一般的2～3万人，城镇总人口约占全市的18.5%。在这些城镇建设了1300多个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轻工、仪表、纺织、建材等工矿企业(其中中央、市属企业近250个)，占全市工矿企业总数的37%，工业总产值近60亿元，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如距市区中心仅20公里的黄村就是由自然村发展起来的。目前黄村已容纳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21个，县社办企业33个，年工业总产值约1.5亿元，建成区面积约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5万人之多。

（三）中国大都市空间扩展形式

中国大都市空间扩展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

1. 轴向扩展

所谓大都市区轴向扩展，是指城市沿一定方向扩展形成狭长型的城市地区。大都市区的轴向扩展，不管是自发形成还是有意识地规划建设，它们均依附于城市本体，向周围地区放射扩展。根据扩展轴的性质不同，它有如下3种类型。

(1) **工业走廊**

在大都市外围地区，一些对交通线路依附性强的工厂、仓库沿公路、铁路和水道自由或按规划建设，连续地向外延伸，形成由许多工作岗位组成的“轴”向走廊。这类走廊是在城市核心区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城市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形成的，上下班人流有明显的规律性。如南京市西善桥—小行地区，南北相距 7 公里，沿宁芜铁路、公路呈串珠状布局 12 个中小型地方企业。

（2）**居住走廊**

在大都市入城干道两侧就近布置生活居住区，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居住走廊。如广州市在广州—深圳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规划建设了沿广深公路两侧西自黄埔东至南岗约 10 公里长的生活居住走廊。

（3）**综合走廊**

在大都市外围沿发展轴就近布局居住和就业岗位，就形成了沿轴向的综合发展走廊。如常州市沿大运河、沪宁铁路连续布局工厂、断续布置居住小区，形成西自新闸东至戚墅堰约 20 公里长的东西向城市发展轴。

2. 外向扩展

大都市的外向扩展，是指大都市向周围地区蔓延，或依附于城市本体呈块状向外形成环状或块状城市地区。根据它与城市核心区的关系，它有以下 3 种类型。

（1）**连片发展**

自 70 年代以来，中国大都市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危机，在无强大实力进行大规模的卫星城建设的条件下，一般采取在大都市外围进行综合开发大片居住区的办法。据北京市调查，住宅成片建

设的规模，由50年代的几公顷、10多公顷扩大到现在的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目前正在北郊亚运村附近建设的安慧里、安慧北里、慧忠里居住区，规模都在百公顷以上。

（2）**独立发展**

大型企业由于对资源和建设条件（如水、电、港口等）的要求，一般选择脱离市区独立发展的建设模式。如南京市大厂镇自30年代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建设永利化工厂以来，先后陆续布局了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南京钢铁厂和热电厂三大骨干企业，现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结构合理，服务设施齐全的企业城。据调查，大厂镇距中心城区21公里，现有人口近10万。从职工构成看，三大骨干企业职工占71%，其它职工占29%（包括行政人员）。商业、文教、卫生设施齐全，现有商业职工6000人，医院4所，中小学86所。目前约有90%的职工居住在镇上。

（3）**渐进发展**

大都市地区土地利用由里向外的渐进发展，表现在商业中心地区向城市住宅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农村地区的渐变交替过程。如广州市流花地区民国前是一个纯粹的近郊农业地区。1936年6月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在流花湖西北角开发广州西部，使其成为广州与华中地区的货物和煤炭的转运站。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原低洼湿地整治而成流花湖公园。50年代先后在流花桥一带建起了广州体育馆，中苏友好大厦（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场），友谊剧院，东方宾馆和省、市广播电台等重要城市公用设施。60年代于西华路北侧沿流花湖南岸开辟一条东风西路，成为广州西侧一条交通要道。70年代又在流花湖东岸修筑人民北路，东边还有大北门向北延伸的解放北路。80年代初广州火车站建成，1985

年又增建了环市路上行车高架路，并在车站广场陆续兴建一批公共建筑。1985年以后，这一地带开始建设大片居住区，如罗冲围(西村)、站前路、梓子岗和金贵新村等，与此同时，又有一批公共建筑，如友谊剧院、华南影都、外贸中心商场和多座宾馆等相继建成。昔日的荒僻郊野，现已发展成为广州市以交通枢纽为主要职能的城市核心区地带。

（四）中国大都市空间增长形态

由于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主要在于城市蔓延、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建设，空间扩展主要有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两种形式，中国大都市空间增长形态，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

1. 圈层式

这类大都市的外向扩展过程，突出地表现为呈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具有明显的“年轮”现象。在城市的扩展过程中，一般大工厂、校园、特殊医院、集团住宅等起先行者的作用，随后公共建筑和一般住宅区相继建设，由原来的城市郊区逐渐演化为城市建成区，这时又有一批工厂、学校和特殊医院等被挤到更远的郊区。如上海市50年代至70年代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城市空间扩展按工业区和集团住宅区并列呈同心圆圈层式外向扩展。这一地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是新建的长白、控江、鞍山、曲阳、大连、广灵、沪太、曹杨、天山、虹桥等居住区；第二圈为五角场、彭

浦、北新泾、漕河泾等近郊工业区；第三圈又是新建和在建的居住区。7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上海的港口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黄浦江西侧继续向东北(江湾五角场地区)、向西(虹桥地区)和向南(漕河泾和长桥地区)成同心圆向外推进；90年代初则又开始了浦东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图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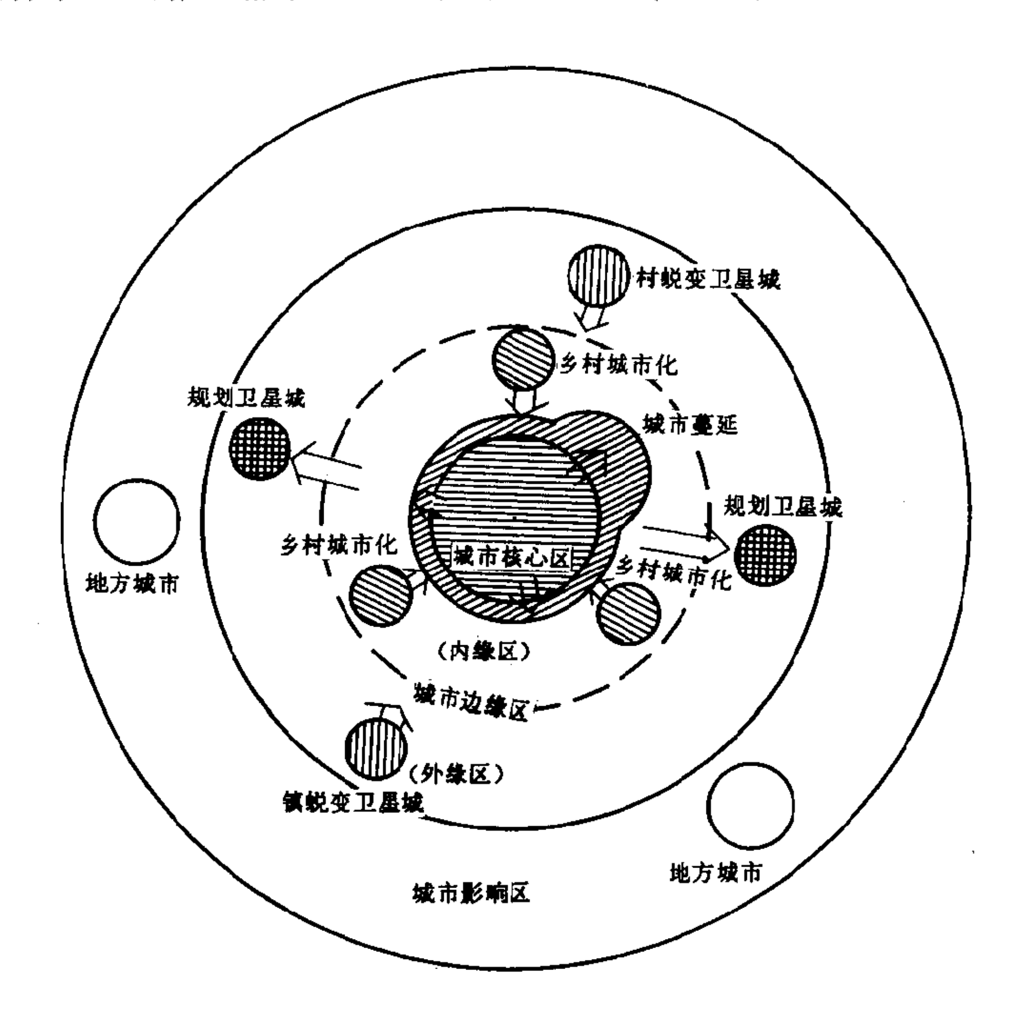


图50　上海城市地域外向扩展的“年轮”现象

2. “飞地”式

这类城市一般首先在“资源点”形成城市“飞地”，然后建成“飞地”与母城间的快速联系通道，再沿通道两侧发展形成指状增长。

如南京市，于公元前 472 年始建，曾为十朝古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 1911 年前建成区面积并不大，主要集中在现在的白下区。而下关码头则作为联结津浦铁路和沪宁铁路的枢纽，成为南京市新的城市增长点。随着中山路和铁路的建设，城区与下关之间形成指状增长带。直到 80 年代南京市的空间增长基本都是沿中山路向西北、向东伸展(图 5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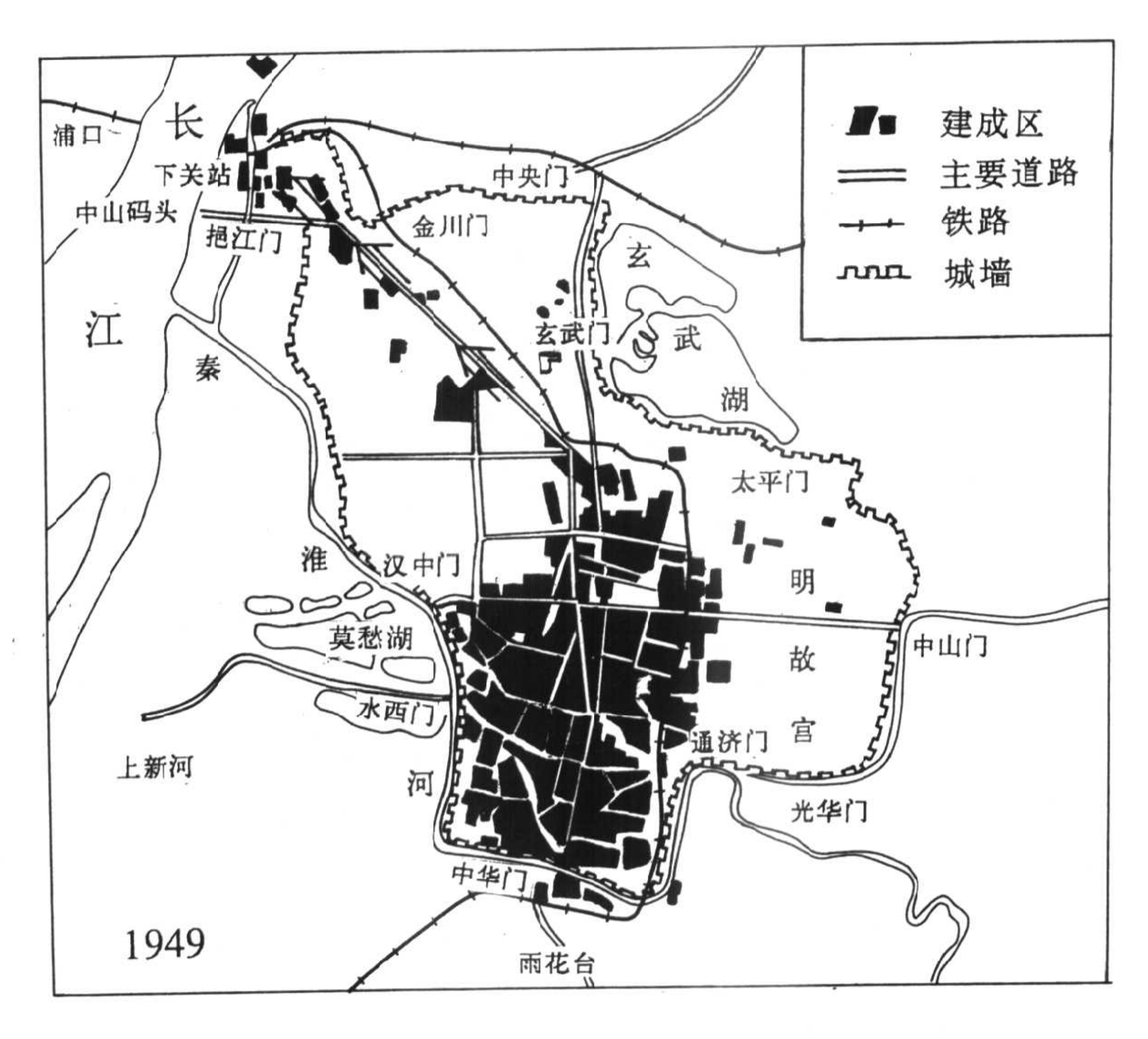


图 51 南京下关"飞地"

3. 轴间充填式

这类大都市沿主要交通线形成两条以上的指状体，当指状体

增长到一定程度时，指状体之间横向联系加强，其间的三角形或梯形空间逐渐被充填。由于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活动主要以"单位"为基本单元，在人员增加、功能膨胀时，往往以单位原在地为母体征用邻近空地，这又导致城市进一步向外蔓延。当建成区发展成为"密实"地区时，城市又开始向边缘地带扩散形成新的指状增长轴，进入新的一轮增长周期。无锡市不同时期城市扩展形态反映了这一空间扩展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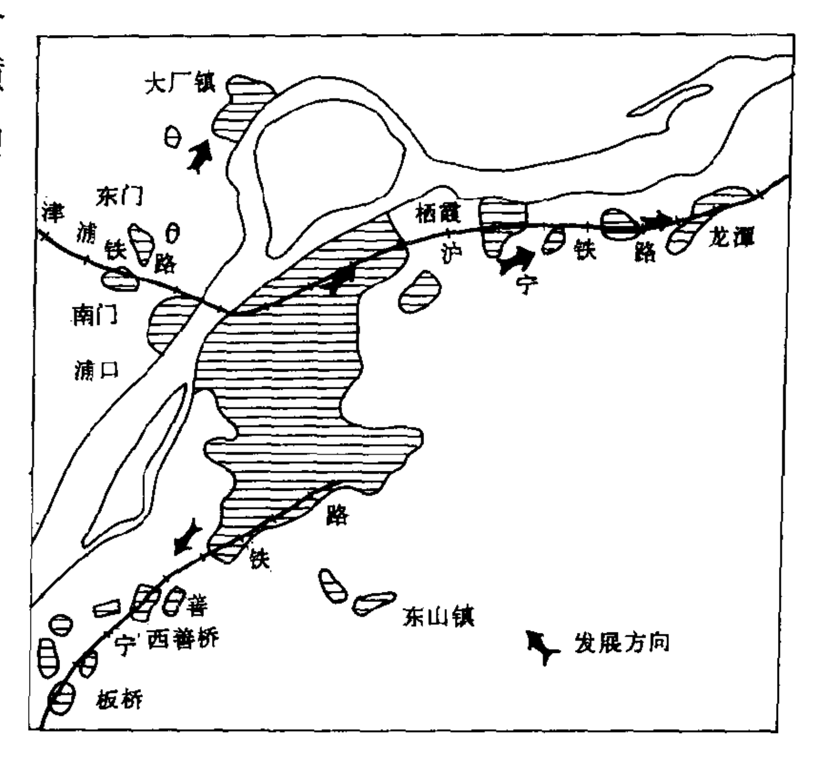


图 52 南京市指状增长

4. 带形扩展式

这类大都市增长过程大致可划分为 4 个时期。①触角期。在这一时期存在一系列城市空间扩展推动力，借助于城市对外交通线的发展，在城市边缘区的快速交通沿线形成一些外展触角。它们由新居住区、工业区、交通枢纽等组成。②分散组团期。一方面，由于城市边缘区菜地保护，环境美化和建设用地紧缺，限制城市进一步外向扩展；另一方面，大型工业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远郊建设，逐步形成分散组团空间结构。③城市走廊期。由于分散

组团间快速通道的建设，大都市沿快速通道形成串珠式工业—居住城市走廊，这一走廊发展成为沿快速通道布局的一系列通勤郊区镇。④带形城市期。随着这些通勤郊区镇的进一步扩展，它们共同形成城市的组成部分，结果城市走廊演化为带形大都市地区。

第 五 篇

城市土地与城市扩展

第二十一章 中国城市土地及其利用

城市土地是城市建成区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非农业用地的总称,是已经实现和将要实现景观城市化的那一部分土地。很显然,城市土地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它既是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和物质条件,又是土地经济和城市房地产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及其变革

在旧中国,城市土地属私人所有,但所有制形式却多种多样。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土地属于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家和大房地产主所有。其中外国资本约占土地的20%左右,其余的城市土地所有者有:个别小业主或个别城市居民占有小块的居住和生产用地;从事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占有一部分住宅和生产经营场所的基地;官僚资本家占有表面上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一部分土地,其数量约占城市土地的10%左右。这些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家和大房地产主凭借对城市土地的私人垄断和土地投机,控制着中国城市的发

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立即接管、接收了旧政权占有的城市土地，同时接管和接收了外国资本家在华的大批城市地产，并根据政务院1951年的规定，在全国各城市里没收了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在城市中的“一切土地”。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占有的城市土地，国家通过对私营企业的厂房、仓库、商店、办公用房以及职工宿合所占有的土地进行核资以后，土地价格作为资本的一部分由国家向资本家支付定息。对城市的其它私有土地采取与农村私有土地一样，可以买卖、出租、入股、典当、赠与或交换。

1954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对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占用市郊土地征收使用费或租金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国营企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的土地，不论是拨给公产或出资购买，均应作为该企业的资产，不必再向企业缴纳租金或使用费。”1954年4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关于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几个问题的综合答复中也规定：“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及公私合营企业使用国有土地时，由当地政府无偿拨给使用，均不必再交纳租金”。私营企业或私营文教事业使用国有土地时，由国家拨给使用，但仍应向政府缴纳租金或使用费，其中合乎减免条件者，可以酌情减免。1953年政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18条规定：“凡征用之土地，产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不需要时，应交还国家，不得转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对城市土地所有制作了明确的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

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就把城市土地国有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很显然，经过30多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城市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存在明显的特点：①土地资源的分配是以行政方式实现的，不经过市场，没有公开的、公平的竞争。②土地的使用是免费的，用地者无需为用地付出代价。③土地使用者长期占用国有土地，没有时间限制。④土地使用者之间不能直接自行解决土地流动。因此，这种土地使用制度也存在如下弊端：①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由于企业无偿占地，必然造成大量的闲置土地。据广州市1982年对用地情况的调查，市内闲置空地占全市总用地19%，在市中心区的越秀区，1978～1980年内有103个单位的75825平方米的土地长期占而不用。②城市土地的低效率利用。由于土地使用者不能自行解决土地流动，必然导致土地利用在空间使用效率上与土地实际具有的使用价值不一致。例如，一般在城市的中心地段最适宜兴办第三产业，但现在各城市中仍有大量的第二产业和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占用。③城市建设基金严重不足。由于城市土地的无偿使用，大量的城市建设资金无法收回，使城市建设欠账越来越多，旧城改造难以进行。

1982年以来，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开始改革。主要包括：①征收土地使用费。深圳特区于1982年开始对城市不同等级的土地向土地使用者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每年1～4元。1984年辽宁省抚顺市进行了全面征收土地使用费的试点工作，把土地分为4个等级，收费标准拟定为每平方米每年0.2～0.6元。同年，广州对部分土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建项目、涉外项目）征收土地使用费，将城市土地分为7级，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每年0.5～4元。②土地批租。1987年9月9日深圳率先试行首块土地批租，冲破了土地供应单纯用行政划拨手段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束缚，让用地者通过竞争并支付实足的地价款获得土地使用权，这一举措为建立中国的地产市场打下了基础。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有关条款，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0年5月国务院又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成片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大大推动了中国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1992年3月13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又发布了《划拨土地使用权暂行办法》，规范和指导城市土地划拨工作。

中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新增土地和转让原来行政划拨土地走入批租制轨道，并对按行政划拨土地征收土地使用税，从而建立了城市用地的自我约束机制，促进了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但从已经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来看，中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主要表现在：①土地使用税征收的税率（标准）低，没有充分反映城市的级差地租，减免范围太广。②国有土地缺乏明确的产权代表。③国有土地收益分配关系不协调。④对土地批租的“个人”干预太多。⑤土地供应计划若有若无[1]。

---

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第246～24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二、中国城市地价评估

1. 城市土地评价因素

城市土地是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综合体，中国城市地价评估一般考虑下述几方面的因素：

(1) 自然因素

在城市建设中，自然条件的差异可以影响城市土地开发的难易程度及投资量。在城市地价评估时，自然因素一般包括土地的承载力、地形坡度、地下水埋藏深度、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条件。

(2) 区位因素

区位对城市土地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通达性和聚集效益两个方面。因此，城市地价评估时的区位因素除了空间几何位置外，还包括该地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是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地理位置在空间地域上有机结合的具体表现。

(3) 人口因素

人口分布对于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类对城市土地使用的强度。人口分布状况主要体现在人口密度，即人口集聚状况。人口的相对集中有利于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更能充分利用公共服务设施。然而，人口密度超过一定限度也会出现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公共设施不足、城市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

(4) 交通便捷程度

交通运输是城市形成的基本因素，直接对城市功能的形成起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水平和居民生活便捷程度,是人们选择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的重要因素。

(5) **城市设施配套程度**

城市设施具有生产和消费双重功能,这双重功能的协调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广义的城市设施分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包括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等;社会服务设施包括饮食业和服务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娱乐、体育等。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直接反映了城市土地的物化劳动量。

(6) **环境因素**

工业化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危及居民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土地的使用。在污染严重的区域地价下跌,而在开阔的空间、广阔的水面和绿色的植物、优美的城市景观地区,则赋予城市土地更高的使用价值。

以上是一般城市地价评估的因素选择,但是城市地域是相当复杂的,除一般的平原城市外,还有山地型组团型等若干类型,分级因素选择时可酌情考虑山地坡度、地面切割度、地面起伏度以及母城与片区之间的距离及关系等。

2. 城市土地评价指标体系及等级标准

根据上述评价因素可归纳确定出城市土地评价的指标体系共3级。第一级为总指标，即因素综合指标；第二级为六大因素组成的指标；第三级为每一因素的各因子。根据《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土地管理试行办法》和南开区土地评估，确定了地基承载力，与市级、区级商业中心的距离，与天津站的距离，人口密

度和人均居住水平（居住用地面积），公交线路和公交站点，社会服务设施指标，绿化覆盖率和环境污染程度等 16 个评价因子[①]。在评价过程中将各项指标划分为 5 个等级，级间距离采用等差级差或等比级差。城市土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等级标准如表 128 所示。

表 128　城市土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等级标准

评价因素 F		等级标准 评价因子 S			评价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F_1	自然因素	S_1	地基承载力	K 千帕	>140	120～140	100～120	50～100	<50
F_2	区位因素	S_2	与市级商业中心距离	米	≤1000	2000	4000	6000	≥8000
		S_3	与区级商业中心距离	米	≤500	1000	2000	4000	≥6000
		S_4	与火车站距离	米	≤2000	4000	6000	8000	≥9000
F_3	人口因素	S_5	人口密度	人/公顷	≥700	550	400	250	≤100
		S_6	人均居住用地	米²/人	≥21	18	15	12	≤9
F_4	交通便捷程度	S_7	公交线路	条	≥7	6	5	4	≤2
		S_8	公交站点	个	≥4	3	2	1	0
F_5	城市设施配套程度	S_9	商业网点占地比重	%	≥6	4	2	1	0
		S_{10}	饮食服务业占地比重	%	≥0.8	0.6	0.4	0.2	≤0.1
		S_{11}	文化设施占地比重	%	≥2.0	1.0	0.5	0.2	≤0.1
		S_{12}	医疗卫生设施占地比重	%	≥2.0	1.0	0.5	0.1	≤0.05
		S_{13}	科教设施占地比重	%	≥40	20	10	5	≤2
		S_{14}	房屋建筑质量	%	完好	基本完好	一般损坏	严重损坏	危房
F_6	环境因素	S_{15}	绿化覆盖率	%	≥25	12	6	3	≤1
		S_{16}	环境质量		良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① 详见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编著：《土地·市场·经营——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第 194～198 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版。

3. 因子权重确定

因子权重反映定级因素对土地质量的影响程度和大小，在城市土地定级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子权重的确定，一般采用特尔菲法或层次分析法。

(1) 特尔菲法权重测定

特尔菲法又称专家赋权法。该方法是先制成专家评估意见征询表，然后分发给有关专家征询意见，每轮征询后，都利用公式(1)、(2)进行分值估价（式中 m 表示专家人数，a_i 表示第 i 个专家分值）。权重确定时要求参加评判的专家在 10～40 人之间，需进行 2～3 轮打分。最后以其平均值为因素权重。

$$E_{均} = \sum_{i=1}^{m} a_i / m \tag{1}$$

$$\delta = \sqrt{\sum_{i=1}^{m} (a_i - E)^2 / (m-1)} \tag{2}$$

(2) 层次分析法权重测定

该方法首先弄清城市土地定级涉及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将待解决的问题分成若干目标层；其次，在同一目标层内求出单权重，它在数值上等于判断矩阵 A 和最大特征根相对应的标准化向量 W 的分量；再次，求同一目标层的综合权重，它在数值上等于同一目标层各单权重的连乘积；第四，进行一致性检验，使一致性指标 D 小于 0.1。

中国城市由于具有不同的特点，其评价因子权重也各不相同。如上海、兰州等大型综合性城市评价因子权重为：交通便捷程度 0.39，居首位；区位因素 0.29，居第二位；城市设施配套

程度 0.125，居第三位；环境质量 0.105，居第四位；人口因素 0.09，居第五位。再如抚顺、宜昌等能源城市，其评价因子权重为：第一位城市设施配套程度，权重 0.325；第二位区位因素，权重 0.275；第三位交通便捷程度，权重 0.270；其它因素权重依次为环境和人口因素。

4. 单元地块划分

单元地块是土地质量相对一致的地域，是城市土地定级的对象和基本单位，它的划分和分值计算是确定土地级别的基础。

单元地块划分难度较大，划多了工作量过大；划少了不能反映城市土地质量的客观分布规律。为了保证单元地块划分合理，一般遵循均一性、完整性、明显性和量力性等基本原则。

单元地块划分的目的是追求特定面积范围内土地质量的均一性。采用主导因素叠置法划分土地单元难度较大，而且也很难保证精度。为此，单元划分一般采用“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两种辅助方法来进行。所谓“同中求异”，即在分值面积较大的主导因素范围内，找出第二个分值面积较大的主导因素的几个分值范围，再从其中每个分值范围寻找第三个分值面积较大的主导因素的几个分值范围，直到找出最后一个主导因素分值范围为止。所谓“异中求同”，即在几个不同的主导因素叠置的分值图中寻找共同交汇面，在数学上就是求若干个主导因素分值集合的交集。

5. 城市土地定级方法

中国城市土地定级的方法可归纳为三类，即：科学描述法、数学分析法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定性—定量分析法。目前全国各城市

的土地定级，多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①]。这种方法一般能够揭示城市土地质量中高级土地和末级土地比重小、中级土地比重大的特点，并且能反映城市内部各区片之间土地级别的联系，而且具有方法简单、操作方便的特点。

这里以天津市南开区东北角街为例，应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说明中国城市土地定级过程。

（1）评价因子和因素权值

根据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得南开区土地评价因子的权重如表 129 和表 130。

表 129　天津市南开区土地评价因子权值

因子代号	S_1	S_2	S_3	S_4	S_5	S_6	S_7	S_8	S_9
权值	0.0447	0.1253	0.0720	0.0568	0.0562	0.0506	0.0800	0.0752	0.0572
因子代号	S_{10}	S_{11}	S_{12}	S_{13}	S_{14}	S_{15}	S_{16}	$\sum_{i=1}^{16} S_i$	
权值	0.0569	0.0494	0.0545	0.0512	0.0510	0.0694	0.0496	1.0	

表 130　天津市南开区土地评价因素权值

因素 F	F_1	F_2	F_3	F_4	F_5	F_6	$\sum_{i=1}^{6} F_i$
权值	0.0447	0.2541	0.1068	0.1552	0.3202	0.1190	1.0

（2）确定单因素评价等级

按单元地块构造土地评价指标的隶属度。表 131 为南开区东北角街评价指标隶属度表。根据表 131 计算单因素评价等级，其

① 详见程连生编著：《城市房地产经营与估价》，第 231 页，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 年版。

公式为：

$$B_{F_i} = S_i \cdot R = \begin{bmatrix} S_1 \\ \\ S_2 \\ \\ S_k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cdots & r_{15}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r_{21} & r_{22} & \cdots & r_{25}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r_{k1} & r_{k2} & \cdots & r_{k5} \end{bmatrix} = (b_1, b_2, b_3, b_4, b_5)$$

然后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取值 b^i，如：

$$B_{F_i} = (0.0447)(0,0.6,0.4,0,0)$$

$$= (0,0.02682,0.01788,0,0)$$

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取值 0.02682，故自然因素 F_1 的评价等级为Ⅱ。

同样方法，求 B_{F_2} 为：

$$B_{F_2} = \begin{bmatrix} 0.1253 \\ \cdots \\ 0.0720 \\ \cdots \\ 0.0568 \end{bmatrix}^T \begin{bmatrix} 0, & 0.8, & 0.2,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 & 0.4, & 0.6,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6, & 0.4, & 0, & 0, & 0 \end{bmatrix}$$

$$= (0.03488,0.15176,0.06826,0,0)$$

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取值 0.15176，故区位因素 F_2 的评价等级为Ⅱ。

以此类推，B_{F_3} 取值 0.03934，人口因素 F_3 评价等级为Ⅱ；B_{F_4} 取值为 0.08，交通便捷程度 F_4 的评价等级为Ⅰ；B_{F_5} 取值 0.1167，城市设施配套程度 F_5 的评价等级为Ⅰ；B_{F_6} 取值 0.06744，环境要素 F_6 的评价等级为Ⅳ。

表 131　天津市南开区东北角街地价评级指定隶属度

代号	评价指标	评价等级(R)				
		Ⅰ	Ⅱ	Ⅲ	Ⅳ	Ⅴ
S_1	地基承载力	0	0.6	0.4	0	0
S_2	与市级商业中心距离	0	0.8	0.2	0	0
S_3	与区级商业中心距离	0	0.4	0.6	0	0
S_4	与天津站距离	0.6	0.4	0	0	0
S_5	人口密度	0.3	0.7	0	0	0
S_6	人均居住水平	0	0	0	0.53	0.47
S_7	公交线路	1	0	0	0	0
S_8	公交站点	0	0	0	0	1
S_9	商业网点占地比重	1	0	0	0	0
S_{10}	饮食服务业占地比重	1	0	0	0	0
S_{11}	文化设施占地比重	0	0	1	0	0
S_{12}	医疗卫生设施占地比重	0	0.6	0.4	0	0
S_{13}	科教设施占地比重	0	0	0	0.3	0.7
S_{14}	房屋建筑质量	0.07	0.08	0.50	0.01	0.34
S_{15}	绿化覆盖率	0	0	0.2	0.8	0
S_{16}	环境质量	0	0	0	0.4	0.6

(3) 多因素综合评价

利用上一层次计算出的六大因素的隶属等级值构成新的评判矩阵，再与因素权重集 F 进行矩阵复合运算，公式为：

$$B_i = F_i \cdot R' = \begin{bmatrix} F_1 \\ F_2 \\ \vdots \\ F_k \end{bmatrix}^T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cdots & r'_{15}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r'_{21} & r'_{22} & \cdots & r'_{25}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r'_{k1} & r'_{k2} & \cdots & r'_{k5} \end{bmatrix}$$

计算过程为：

$$B = F \cdot \underset{\sim}{R'} = \begin{bmatrix} 0.0447 \\ \cdots \\ 0.2541 \\ \cdots \\ 0.1068 \\ \cdots \\ 0.1552 \\ \cdots \\ 0.3202 \\ \cdots \\ 0.1190 \end{bmatrix}^T \begin{bmatrix} 0, & 0.02682, & 0,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 & 0.15176, & 0,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 & 0.03934, & 0,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08, & 0, & 0,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11767, & 0, & 0,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 & 0, & 0, & 0.06744, & 0 \end{bmatrix}$$

$$= (0.0501, 0.0440, 0, 0.0080, 0)$$

按下式进行正规化处理得：

$$B = \left(\frac{B_1}{\sum_{i=1}^{5} B_i}, \frac{B_2}{\sum_{i=1}^{5} B_i}, \frac{B_3}{\sum_{i=1}^{5} B_i}, \frac{B_4}{\sum_{i=1}^{5} B_i}, \frac{B_5}{\sum_{i=1}^{5} B_i}\right)$$

$$= (0.49, 0.43, 0, 0.078, 0)$$

按最大隶属度原则取值 0.49 为评价级，即东北角街为Ⅰ级土地。同理，依次可求出南开区 19 个街道土地的所属等级（表 132）。

根据表 132，我们能勾画出天津市南开区土地等级图（图 53）。从图中可见，南开区土地等级分布的趋势为：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土地等级呈跳跃式递减趋势。其中Ⅰ等地为主的街 2 个：东北角街，八里台街；Ⅱ等地为主的街 6 个：东南角街、西南角街、炮台庄街、南门西街、蓄水池街、西门南街；Ⅲ等地为主的街 6 个：西北角街、万德庄街、六合市场街、兴业里街、东生里街、西营门外街；Ⅳ等地为主的街 4 个：向阳路街、嘉陵道街、澄江路街、王顶堤街；

表 132　天津市南开区土地综合评价结果(经正规化处理)

序号	街道名	土地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1	东南角	0	0.40	0.29	0.31	0
2	东北角	0.49	0.43	0	0.078	0
3	西南角	0.07	0.43	0.12	0	0.39
4	西北角	0.05	0.39	0.40	0.11	0.05
5	炮台庄	0	0.57	0.39	0.05	0
6	万德庄	0	0.02	0.48	0.17	0.37
7	八里台	0.58	0.08	0.29	0	0.05
8	六合市场	0.02	0	0.39	0.21	0.38
9	南门西	0.04	0.96	0	0	0
10	兴业里	0.20	0	0.69	0.10	0
11	蓄水池	0	0.64	0.36	0	0
12	西门南	0.07	0.70	0.14	0.09	0
13	东生里	0.22	0.01	0.58	0	0.19
14	西营门外	0	0.13	0.47	0.40	0
15	向阳路	0	0.01	0.15	0.53	0.31
16	嘉陵道	0.02	0.05	0	0.80	0.40
17	澄江路	0.01	0.15	0	0.79	0.05
18	王顶堤	0	0.16	0	0.80	0.04
19	凌庄子	0	0.02	0.06	0.30	0.62

资料来源: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土地·市场·经营——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版。

Ⅴ等地为主的街 1 个:凌庄子街。

三、中国城市土地市场与地价

在旧中国,城市土地的交易活动较为活跃,土地交易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买卖、典当、抵押、拍卖、租赁、征购以及土地互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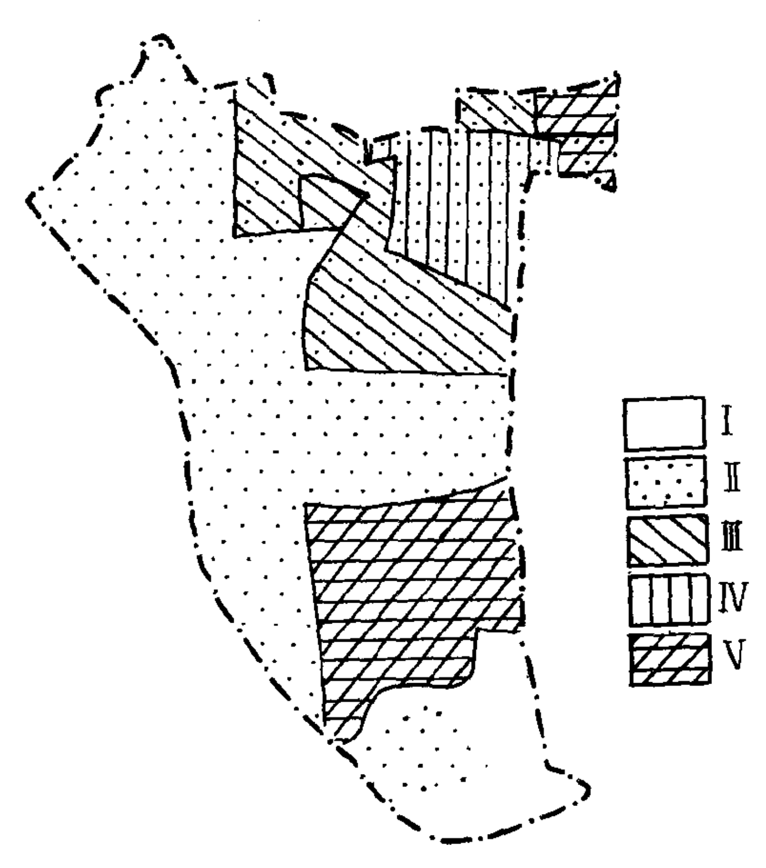


图 53　天津市南开区土地等级图

形式。从城市土地市场看，直到 1928 年城市政府才对地产市场的地价和地租进行管理。在此之前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以自由议价为主，其地租是按当时地产成交价格的百分比计算征收，一般是地价的 1.5%。但在各租界地一般都进行了地产估值，并确定了相应的地价，如天津租界地地产值如表 133 所示。

1949 年后，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城市土地市场运行的外部条件与旧中国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深入，城市土地市场也经历了由兴到衰和复兴的过程。这一时期，城市土地的非市场分配大大加强，政府对土地分配的行政管理逐渐取代经济管理的作用，并对土地交易活动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概括起来，新中国城市土地交易形式主要有土地买卖、互换、抵押、典当和出租等形式。在出售私有土地时，土地所有者应在国家允许上市的土地面积内进行自由买卖，由国家规定土地价格的上限和下限来控制，调整地价的变化。土地互换则采取等量与等价相参考的原则进行。土地抵押实质上是房地产一并抵押，一般

表 133 天津市租界地与市府地价表(1920～1946 年)

(单位:国币)

租界地	地区	最高地价	最低地价
法租界	北区	25000 元/亩	8000 元/亩
	中区	8000 元/亩	3500 元/亩
	南区	10000 元/亩	2000 元/亩
英租界	东北区:①英中街 ②博顺道	20800 元/亩 17900 元/亩	15000 元/亩 12000 元/亩
	中区:①英来道 ②盛茂道	15700 元/亩 6300 元/亩	7600 元/亩 4700 元/亩
	东南区	6000 元/亩	1000 元/亩
日租界	旭街	40342 元/亩	
	河沿	21785 元/亩	
	租界中街	12102 元/亩	
	海光寺	8068 元/亩	
意租界		4000 元/亩	1000 元/亩
市政府官地		10000 元/亩	1000 元/亩

资料来源: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历史资料》,第十期。

视原业主经济情形或交换抵押物,或从其它方面更改履行义务的条件。土地典当的典价以不超过标准地价的 60%为原则,典期一般为 3 年,另有 2 年的缓期。土地出租时出租人不得以地索要高额地租,租期为 5～10 年。在此期间如国家征用土地,其地上房产不归地产主所有,而按出租年限同国家协议解决。空地的出租,在土地归国家所有之后,此块土地无论由谁继续使用,都必须根据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安排地上建设。1952 年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曾对使用公有土地者依据 29 级标准地价计征地租(表 134)。

基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中国城市土地的征用划拨是城市土地使用性质转变的主要手段。城市土地的征用划拨既尊重土地

表 134　天津市各级地价、地产税及各项租金表(1953～1955 年)

(单位:元/年·亩)

土地等级	地价	地产税		地产租金					
		%	金额	%	金额	%	金额	%	金额
1	36864	1.8	663.55	2	737.28	2.5	921.60	3	1105.92
2	29988	1.8	539.78	2	599.76	2.5	749.70	3	899.64
3	27306	1.8	491.51	2	546.12	2.5	682.65	3	819.18
4	23520	1.8	423.36	2	470.40	2.5	588.00	3	705.60
5	19080	1.8	343.44	2	381.60	2.5	477.00	3	572.40
6	16464	1.8	296.35	2	329.28	2.5	411.60	3	493.92
7	14526	1.8	261.47	2	290.52	2.5	363.15	3	435.78
8	12270	1.8	220.86	2	245.40	2.5	306.75	3	368.10
9	11220	1.8	201.96	2	224.40	2.5	280.50	3	336.60
10	9420	1.8	169.24	2	188.08	2.5	235.10	3	282.12
11	8130	1.8	146.34	2	162.60	2.5	203.25	3	243.90
12	7506	1.8	135.11	2	150.12	2.5	187.65	3	225.18
13	6456		116.21		129.12		161.40		193.68
14	5676		102.17		113.52		141.90		170.28
15	4668		84.02		93.36		116.70		140.04
16	3942		70.96		78.84		98.55		118.26
17	3078		55.40		61.56		76.95		92.34
18	2754		49.57		55.08		68.85		72.62
19	2502		45.04		50.04		62.55		65.06
20	2022		36.04		40.44		50.55		60.66
21	1142		27.76		30.84		38.55		56.26
22	1254		22.57		25.84		31.35		37.62
23	708		12.74		14.16		17.70		31.24
24	576		10.37		11.52		14.40		17.28
25	354		6.37		7.08		8.85		10.62
26	318		5.72		6.36		7.95		9.54
27	216		3.89		4.32		5.40		6.48
28	192		3.46		3.84		4.80		5.76
29	114		2.05		2.28		2.85		3.42

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又要考虑国家的经济负担能力。对公共建设使用农业土地的原则是,在处理地上原有建筑物、农作物、坟墓、水井以及树木等地上物时,主要是实行估价补偿,同时采用把主要劳动力转移到用地单位吸收就业安置的办法解决农民的生活出路。1958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又对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做了重新规定,补偿标准以最近2～4年的土地产量的总值为标准,对于茶山、鱼塘……等特殊土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理,遇有因征地必须拆除房屋的情况,应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费。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土地实行了从私有制向国有制的转变。政府在土地国有化完成之后,实际上同时充当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城市土地的分配主要通过国家的行政划拨和土地征用来完成,使原来相对完善的城市土地市场日趋萎缩。这种城市政府的土地使用权、处置权、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一体化,必然模糊了土地作为社会生产要素的经济本质,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城市土地无偿、无限期使用,再加上行政手段的过分干预,使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开始重建土地市场,并从城市土地的有偿使用起步,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不完全竞争的城市土地市场。这种城市土地市场制度既不是完全竞争的土地市场[①],也不是完全垄断的土地市场[②],它不理会理想的完全竞争或政府的硬性规定,而是介于完全的自由放任和不完全的政府协调之间。

---

① 完全竞争的土地市场,即让价值规律单独地在土地市场起作用,任由土地投机进行,而国家不加以直接干预甚至极少加以间接控制。

② 完全垄断的土地市场,即土地仍然是国家所有,部门垄断,官商合一,政企不分。

这种城市土地市场制度，使政府在构筑土地市场方面掌握主动权，并有可能使土地市场制度向垄断成分逐渐减少、竞争成分逐渐增加、政府间接调控作用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中国部分城市土地基准地价如表 135 所示。

表 135　中国部分城市土地基准地价

（单位：元/米^2）

土地级别	基准地价	上海	北京	天津	济南	重庆
Ⅰ	收益	2936.55	206.16	282	167	168.35
	地价	35920	2520	3450	8200	2014.38
Ⅱ	收益	1967.17	128.85	128	559	112.44
	地价	24090	1580	1565	6840	1405.5
Ⅲ	收益	1295.04	80.53	58	447	72.49
	地价	15840	985	710	5470	906.13
Ⅳ	收益	825.27	50.33	26	334	39.54
	地价	10095.0	615	320	4100	906.13
Ⅴ	收益	497.70	31.46	12	224	27.74
	地价	6090	385	150	2740	346.75
Ⅵ	收益	269.76	19.66	5	112	10.22
	地价	3300	240	60	1370	127.75
Ⅶ	收益	110.79	12.29	3	/	/
	地价	1355	150	40	/	/

四、典型城市地价分析

1.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南京城市地价

新中国成立前后南京城市土地利用以空地、居住用地、军事用地为主（表 136），各项土地利用的分布犬牙交错，不如欧美城市那

样功能分区明显。大体说，市中心为最重要的商业区，市中心周围为批发业、少量轻工业及二三等住宅区，再向外则为头等住宅区及文教公共建筑区（城南缺），最后为城内外的空地及北郊下关一带的主要工业区①。

表 136　南京市土地利用类型（1947 年）

用地类型	面积（平方公里）	%	备　　注
军事用地	7.781	15.72	包括限制建筑区
政府用地	4.037	8.15	包括中央、地方及公共行政用地
文教用地	3.001	6.06	包括慈善福利机关
商业用地	0.564	1.13	包括商店连带居住部分
工业用地	0.75	1.19	包括公用事业
交通用地	4.050	8.12	包括飞机场、铁路、码头、仓库及通行车辆道路
居住用地	13.887	26.03	包括别墅、机关宿舍、平民住宅、棚户
公园绿地	0.185	0.37	广场及体育场所
空地	16.445	33.23	池塘及机关保留空地不在内
合计	48.498	100.00	

资料来源：赵松乔等："南京都市地理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50 年，第 17 卷第 3 期。

1928 年南京初为首都时，商业中心尚在城南、三山街（中华路中部）一带，地价约每方丈 200 元，新街口每方丈地价仅 60 元，花牌楼（太平路北部）仅 50 元，鼓楼以北则在 20 元以下（图 54）。

到 1950 年，南京商业中心逐渐向北迁移，新街口成为市中心区，花牌楼可与三山街一带抗衡，而中山路两旁商业亦趋繁华。据当时人民政府公布的地价，新街口最高，每方丈达 1140 折实单位；

① 见赵松乔、白秀珍："南京都市地理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 51 页，1950 年，第 17 卷第 3 期。

其次花牌楼、三山街一带皆为950单位，其余如中山路、中央路、昇州路、中华路两旁地价较四周住宅区为高，邻近城墙的丘陵或耕地，每方丈地价则在100折实单位以下(图55)。

2. 营口市城市土地基准地价[①]

营口市现有主、副3个商业中心，即以第一百货、营口百货和新华百货3个大型综合商店为核心，形成营口市的文化、金融、贸易的集中地和交通枢纽，是全市地价最高地区。围绕这3个中心，沿城市道路又形成了服务职能和规模均不尽相同的商业网络，相应形成不同级别地带。坐落于不同地带的商业中心等服务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其服务功能和营业额也不尽相同，使得不同地区经济效益产生差异，从而也形成了地价差异。城市土地的基准地价如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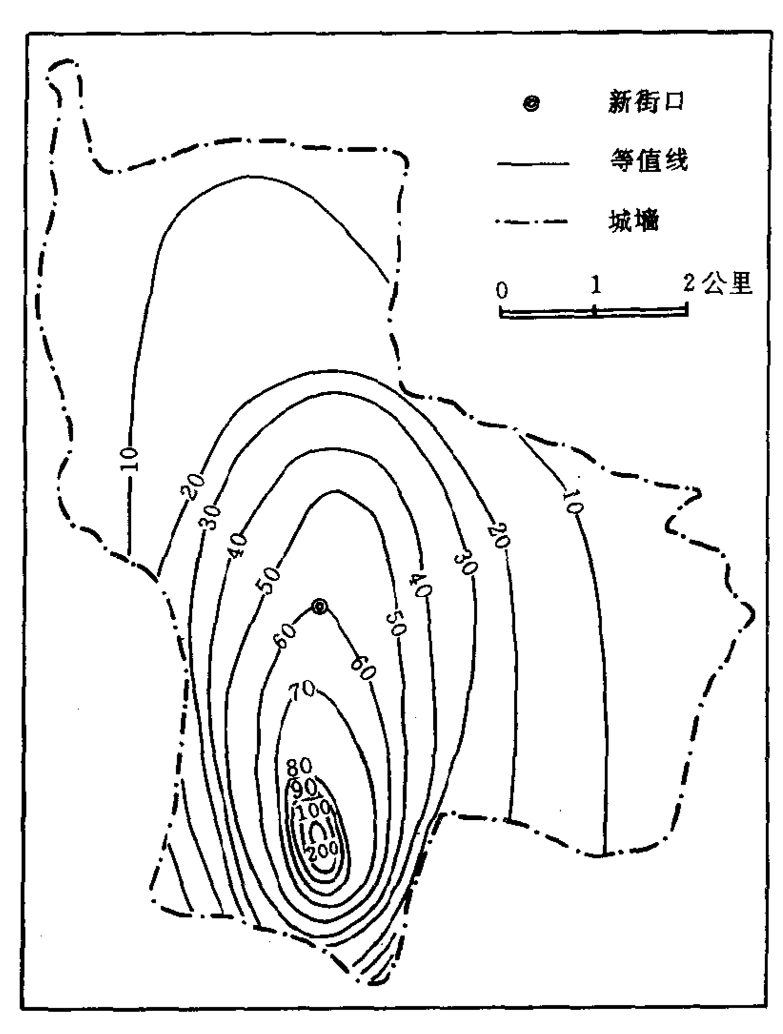


图54 1928年南京城市地价等值线图

① 营口市土地管理局:《营口市城区土地定级估价》,1992年。

137。

表 137　营口市基准地价表(1991 年)

(单位:元/米²)

土地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商业用地	1450	1050	700	500	350
工业用地	330	200	120	90	60
住宅用地	360	240	180	135	95

3. 广州市城市土地使用税

广州市是一个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城市,已形成以老城区的商业和行政中心区为核心的单核心城市地域空间结构。1989 年广州市开始征收城市土地使用税,按经济繁华程度、交通条件、市政设施、城市规划等因素将城市土地划分为 10 个等级,各等级每平方米年税额标准 0.5～7.0 元不等。城市土地使用税等值线如图 5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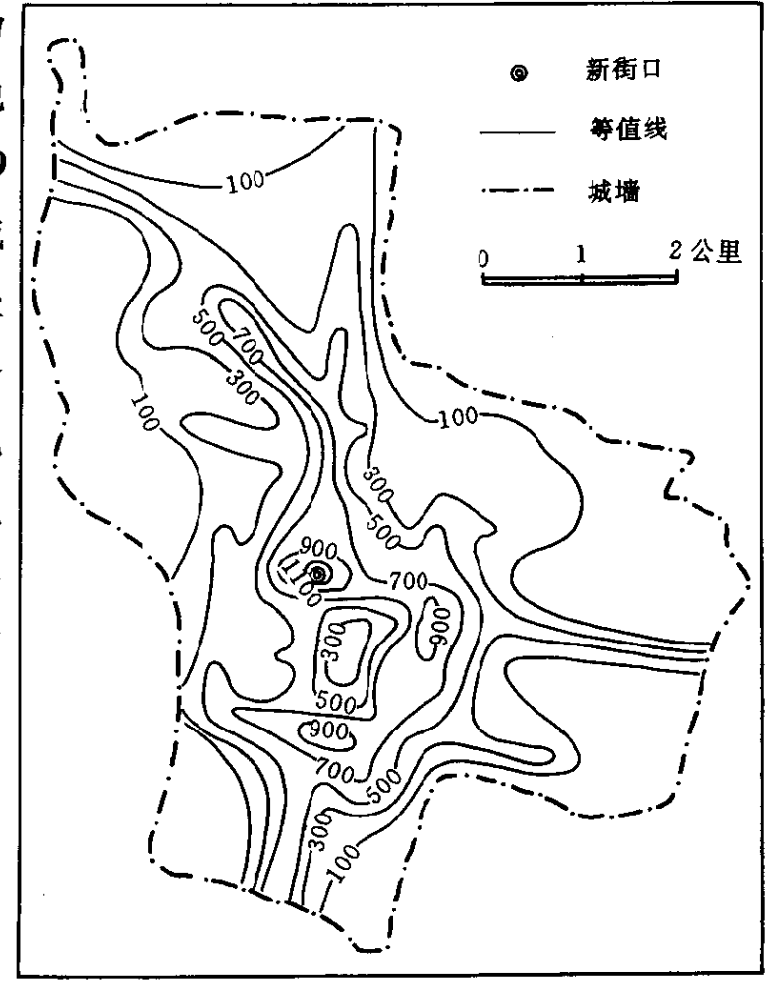


图 55　1950 年南京城市地价等值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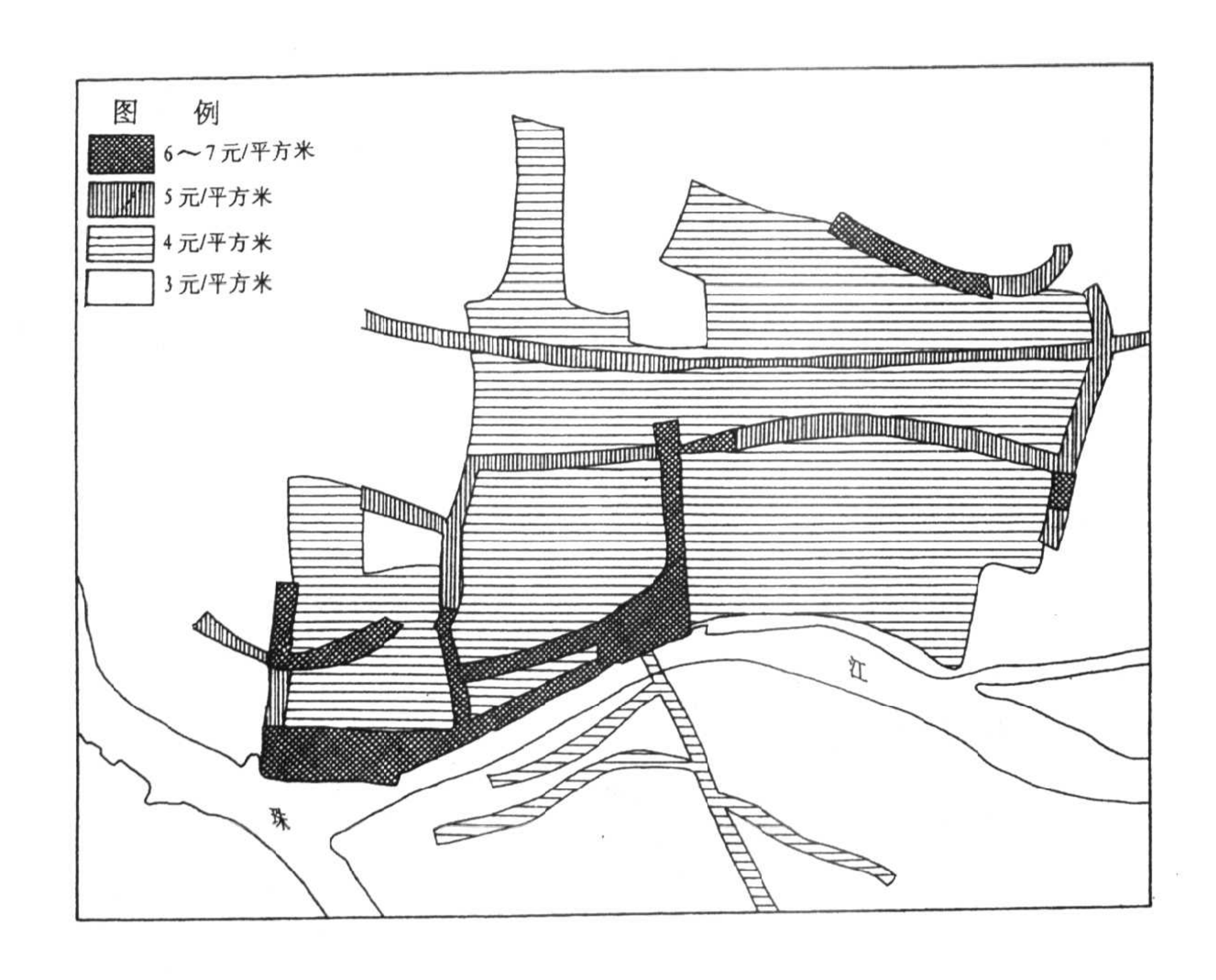


图56 广州市城市土地使用税等值线图

第二十二章　中国城市住房

中国城市住房，如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数量不足、质量较差的状况中。自1949年以后，新中国为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城市住房被当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职工的主要社会福利，且在50年代早期取缔房地产业，使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城市住房短缺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中国城市住宅及所有权类型

1. 城市住宅类型

从建筑的角度看，中国城市住宅一般分为低层住宅、多层住宅和高层住宅3种类型。低层住宅以传统民居和简易民居为主，高层住宅则是近年来兴建的建筑质量较好设施齐全的高层公寓楼宇。就这3种类型住宅而言，多层住宅占绝大多数，具有如下4种形式：

(1) 单元式住宅

又称内廊式住宅。这种住宅门户中部与公共通道连接，不仅

便于组织户内交通系统,也可防止寒风吹袭,达到保持室温的目的。单元式住宅主要有一梯二户、一梯三户、一梯四户等类型。

(2) 外廊式住宅

即通道从建筑物外墙通往室内。它的最大优点是结构简单,通风状况好,住户可使用全进深,但交通通道所占面积大,受外部干扰大。外廊式住宅又有短外廊与长外廊的区别。

(3) 独立单元式住宅

又称点式住宅,是一个单元独立建造,四面临空,不考虑相互拼接的住宅类型,具有日照、采光、通风条件好、外形尺寸小、占地少,可以见缝插针建设,能利用地形坡地等优点,其形体特征和外观处理都具有特色。

(4) 天井式住宅

为传统民居四合院布局形式的住宅型式,它借助于设置内天井为部分房间采光、通风的住宅型式,有利于节约用地。

2. 城市住房所有权类型

中国城市住房的所有权基本上分为公有和个人所有。公有制中又分为单位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

中国城市住房所有制的结构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旧政府及官僚资本家、封建豪绅的住房权收归国有,而对广大市民的私有住房予以保护并鼓励私人拥有住房。1958年起,中国政府对私有住房进行控制,规定一个家庭的私有住房,在大城市不得超过150平方米,中等城市100平方米,小城市为50～100平方米。多余的部分由国家经营出租后付给原房主一定的费用。这样,城市私人拥有住房的面积和比例开始下降。此后,到1976年中国全民所有制城市住宅的比例迅速增大,私有

住房的比例急剧下降。1976～1978年间，全民所有制住房比例相对稳定，而私有住房比例略有回升。到了80年代，充分发挥了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方面的建房积极性，还出现了住房的集体所有、联合占有等形式。从目前情况看，个人拥有城市住房的比例虽然在逐步上升，但仍然较低。

二、中国城市住房发展过程及其特征

（一）住房发展过程

在1949～1994年的44年中，中国住房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1. 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在政府议程中住房供应并没有摆在适当的地位。城市和农村的住房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很小，最初的29年中低于1.5%，导致居住和生活条件下降。50年代住房的发展相当缓慢，原因是国家财力不足。而1961～1971年这段时期，由于受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住房的发展甚至比50年代还慢，城市住房的投资削减到最低点。据统计，来源于政府的住房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为501300万元，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投资了480600万元，而在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投资额为278700万元。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

间(1966～1970年)投资额仅为367700万元。然而此时的城市人口已是1949年的2倍。

2. 1979年至今

1978年后,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城市住房成了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1978年,政府调整了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对城市住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结果,城乡住房投资额和竣工量在10年内稳步增长:全国的住房投资占GNP的比重平均为6.73%,为前29年的4倍(表138);竣工的新房占地面积达122.1亿平方米,年平均落成面积7.6亿平方米。1993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1978年的2倍多。

尽管如此,城市住房仍然供应不足。到1992年底,中国有570个城市,共17700万城市非农业人口,人均居住面积7.1平方米,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二) 住房发展特征

1. 住房条件农村优于城市

农村住房发展和居住条件较城市好。据1990年资料统计,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大约为6.7平方米,相应每户占地面积46.9平方米,而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17.8平方米,每户占地面积94.8平方米。即使到1993年底,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也才达7.5平方米,与农村人均居住水平相距甚远(表139)。

表138 中国城市住房开发(1949～1993年)

年份	住房总投资 (亿元)	占 GNP 比重 (%)	住房竣工面积 (亿平方米)	住宅单元 (百万套)
1949～1977	162.83	1.50	1.0	1.67
1978	70.01	2.01	1.375	2.12
1979	141.78	3.70	4.748	6.61
1980	219.66	5.07	6.021	7.98
1981	295.75	6.39	6.944	9.26
1982	357.11	7.09	7.146	9.53
1983	416.10	7.39	8.645	11.54
1984	465.61	6.89	7.582	10.11
1985	641.63	7.70	9.097	12.13
1986	729.35	7.71	11.766	15.69
1987	872.06	7.89	10.77	14.36
1988	1067.02	7.61	10.48	13.97
1989	1063.84	6.74	8.32	11.09
1990	1164.48	6.58	8.629	11.51
1991	—	—	5.688	—
1992	—	—	6.919	—
1993	2722.40	8.09	7.993	—

表 139　中国人均居住面积(1978～1993 年)

(单位:平方米/人)

年份	城市	农村	年份	城市	农村
1978	3.6	8.1	1986	6.0	15.3
1979	3.7	8.1	1987	6.1	16.0
1980	3.9	9.4	1988	6.3	16.6
1981	4.1	10.2	1989	6.6	17.2
1982	4.4	10.7	1990	6.7	17.8
1983	4.6	11.6	1991	6.9	18.5
1984	4.9	13.6	1992	7.1	18.9
1985	5.2	14.7	1993	7.5	20.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

2. 住房建设农村快于城市

在家庭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以后，农村家庭再次成为生产活动和家庭生活的基本单位。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允许每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一块土地。宅基地的大小由地方政府按可耕农地获取的难易来确定。这一政策还保障每个农户建房、居住和对房产拥有所有权等权利。过去的16年中，城市住房投资平均占GNP的6.5%，而农村地区住房投资和建成的新房占地面积都超过城市。农村人均生活居住面积增加了9.7平方米，而城市只相应增长了3.1平方米。这种差别应归功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

3. 住房服务及基础设施城市优于农村

在80年代，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和包括供水、排污、供气、公共交通、垃圾处理、公共卫生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大大改善。而在农村地区，绝大多数住房由农户家庭自己所建，他们注重房屋的建设和翻新，而忽视了与住房相配套的服务设施的改善。在小城镇和一些村庄，公共设施的服务水平虽有一些改善，但水平仍然不高。

三、中国城市住房制度及其改革

（一）城市住房制度

自1949年以来，住房一直被当作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而不是

一种商品。在这种意义下,城市住房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①住房被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城市住房最初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消费品。分配住房本质上只是提供住所,而不等同于其它任何投资,因为这一时期的住房并不视为个人的投资。②所有的城市住房都由政府提供。自1958年开始,国家就不鼓励城市居民私人建房,城市居民用房由政府和企业分配。结果,在中国城市住房总量中,私有住房比例由1958年的48.2%降到1990年的17%。③低房租。自从中国把住房当作全体工人和职员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以来,就相应地采取了低房租的政策。城市居民只象征性地支付房租,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通常每月付0.2～0.3元即可。这样房租仅仅占到家庭收入的1.0～4.0%。收来的房租甚至不够房屋维护之用,国家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住房维修补贴,有些住房由于长期缺乏维护而陷入破旧不堪的境地。据统计,在全国每年约有600万平方米的标准住房毁坏,这更加剧了中国的住房短缺。④完全缺乏住宅市场。在原有住房体制下,住房不是可以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商品,而由国家来分配,不受市场调节,不允许通过住房出卖和转让来谋利。地方政府在社会范围内实施住房分配,没有房地产业。

事实上,这种城市住房制度是一种住房福利制度。这一制度给中国城市社会带来了大量矛盾和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城市住房短缺和给生活环境带来负作用。概括起来,这种住房福利制度的致命弱点和主要弊病有:①这种住房制度需要大量政府补贴,这不仅是政府的沉重负担,而且住房投资没有丝毫收益,阻碍了投资的循环利用,因此城市经济很难维护和续建城市住房。②房租不足支付维护费用,加速了住房单元的老化。③低房租和

高补贴挫伤了城市居民建房或买房的积极性，相应限制了通过各种投资渠道（国家、集体、个人）来加快住房开发。④低房租的福利制度使城市人口偏离了对真正必需品的消费，把钱花在奢侈商品上而非住房上，导致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畸形发展。⑤低房租的福利制度容易产生住房分配不公，驱使人们侵占尽可能多、尽可能好的超过实际需要的住房，进一步加剧了住房的短缺。

（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

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台了许多新的住房改革政策。此外，还实施了许多同住宅开发相配套的重要政策。诸如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城市规划法第4条）；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和户籍登记制度。新的住房改革政策主要包括：

1. 城市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

近10年来，中国进行了城市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即住房商品化。不同的改革方案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①以补贴价出售住房；②提高房租，实施房租现金补贴；③居民集资建房；④通过征集职工和单位抵押金建立住房基金。这样，城市住房分配制度就同国家的工资制度联系起来，也同孕育住宅市场机制的价格制度相联接。

2. 房地产业的复兴

今日中国，房地产业重新开始被视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分。尽管还处在初创时期不太成熟，但作为市场关键要素的商品房开发公司已受鼓励，大多数房地产公司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有的还直接置于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

3. 城市住房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国城市住房投资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城市发展资金似乎总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原因是中国城市的财政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在许多西方国家，城市发展资金可从税收中获得稳定的来源（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以上）。但中国城市住房发展资金除政府预算外，并无固定来源渠道。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了财政总额包干责任制，资金问题可以在市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资金和城市土地收费等项目中得到解决。当前，城市住房投资渠道正在扩展，从政府预算为主发展到四级投资结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个人。这一政策能把企业、机关和个人的储蓄投资于新房建设。这样，提供居民住房的直接人由政府转向居民的主管单位，诸如政府部门、企业及大学等机构。

（三）城市住房改革面临的矛盾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总的说来，中国当前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存在4个主要矛

盾：

1. 住房归工作单位所有与住房供给机会不平等之间的矛盾

扩大住房投资来源的政策导致不同工作单位职工住房供给的差别，工作单位住房所有制无疑会产生同社会福利一样的住房公正与否的问题，即因为工作单位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的住房供给机会和居住水平。

2. 开放的房地产市场与封闭的土地市场之间的矛盾

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城市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再次开放房地产市场。然而，由此产生了当前住宅租赁和购买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房主拥有的只是住宅所有权，既无权出租土地又无权收取地租。在现实中，正是这些住户长时间实际占用这块土地，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这表明开放的住宅市场与封闭的土地市场之间存在矛盾。

3. 公开合法的住宅市场与非法黑市的住宅市场相并存的矛盾

由于住房短缺，黑市上的房租要比公开市场上的房租高出很多。其根源主要在于这两种市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房租估价方法。在公开市场上，房租标准基于4个部分：①根据某种方法计算出的理论上的房租；②反映房主利益的基本租金；③为约束租赁市场发展的失控而标出的房租最高限额；④根据法规应付的税金。在这样的市场上，既没有竞争机制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黑市市场，房租由租赁双方根据附近的住宅情况经过激烈谈判而商定，这种房租实际上是房租和地租的合成租金，不仅反映了房主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也反映了租赁者的承担能力。

4. 商品房价格过高与大多数人收入过低的矛盾

因为在住宅市场上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对商品房没有价格限制，一般来说，商品房价格太高，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资料表明，近三年来全国有5000多万平方米商品房待售，其中居民住宅1260万平方米，其余为别墅、高档公寓、写字楼等，但却有440万住房困难户，其中人均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便有29万户。这种反供求规律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商品房售价过高。1980年一套55平方米的二室一厅住房售价约在1～1.5万元，大致是同期职工年工资收入的15倍；1993年，同样一套商品房售价已相当于同期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5倍。近年房价急剧上升的原因，一是各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热衷于经营利润高的豪华住宅和别墅，互相攀比，档次越搞越高；二是许多公司与外商兴建外销商品房，由于供大于求，只好“出口转内销”；三是杂税多，有的地方商品房价构成共有70多项，合理的不到20项；四是一些“皮包公司”东炒西炒，楼价越炒越高。另外，商品房大都处在离市区较远的开发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不齐全。资料表明，一般中等城市的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售价已涨到1200～1500元，也就是说，年收入在1万元以内的家庭要购买50平方米的住房，即使不吃不喝，起码要积蓄6年。商品房售价过高，大多数人收入过低，从而导致了商品房“待字闺中”与大量“无房户”、“拥挤户”同在的不合理现象。

四、西方国家的主要住房政策

在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首先经历城市化影响,接着又因工业社会的刺激,后来又是战争的摧残和战后重建,尤其战后,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都面临着相似的一系列有关住房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因此,发达国家制定的住房政策有许多经验可供中国借鉴。

在西方国家有两种基本的住房政策占主流,即选择性住房政策和综合性住房政策。选择性住房政策主要针对特定的某一类而不应用于整个住房部门,如美国即属此类。综合性住房政策则是指政府计划,它考虑到住房的所有方面而不是特定的一面,属此类的有德国、日本。然而,目前的趋势并不是谋求面面俱到,而是追求特定的目标。这主要在于:在考虑到实际的情况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住房短缺状况已经终结,但财政上仍然限制了政府开支。因此,为了住宅的开发和建设,对在住房上的资助必须加以区别对待。西方国家主要住房政策包括:①住房补贴;②租金控制;③政府干预;④公共住宅。

1. 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有3种基本形式:①为降低建房成本对资金部分的补贴;②为降低住房成本对建房过程的补贴;③对个人的直接补助。前两种补贴旨在帮助公房和私房的投资者。在理论上,这些投资者以低房租的形式把降低成本得来的好处转让给房客。第三

种补贴是针对有关家庭的需要而提供的帮助,这一帮助也能使投资者间接地受惠。在现实社会中补贴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直接交给一定的家庭,目的是帮助他们支付自己挑选的私有住宅的费用。住房补贴曾导致1937年美国住宅法案的出台。在1964年的法案中,私有的、新建的或拆迁后重建的住宅单元都可以享受补贴。把房屋租给低收入家庭的地方当局也可以享受补贴。这种补贴限于住宅合理的市场价与房客收入的1/4之间差额。随着收入增长,付给的补贴就会减少。如果居民不买房而改为租房,就得付无补助情况下的全额租金,否则就会被逐出家门。在英国,制定房租法规和对私人和公共住宅租房进行补贴的历史,甚至更为久远。

(2) **老年人住宅计划**

给低收入的老年人进行住房补贴比给一般家庭补贴在政治上更受人欢迎。老年的房客对住宅没有什么破坏,付房租也准时,对左邻右舍几乎没有要求。而且,高密度的公寓住宅很适宜老年人居住。在美国,50年代后期以来所建的大多数公房均为老年公寓。在英国,供老年人用的住宅最初建于50年代;从60年代中期起,许多地方当局和住宅协会开始优先发展这类住宅。

(3) **低于市场利息率的住房抵押担保计划**

1961年的美国住宅法中第221节d款第3点提出了一项享有补贴、以低于市场利率住房抵押担保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私人投资者将为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可以租用的住宅,但这类家庭必须是没有资格住公房而在公开的市场上又买不起好房的家庭。

(4) **住房抵押贷款银行**

筹集住房资金的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住房抵押贷款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银行资金的筹集,并不是通过个人储蓄,而是靠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因而其融资方式不易受市场短期储蓄波动的影响。

(5) 对住宅私有化补贴

70年代西方国家的房价和房租飞速上涨(Bourne, 1981)。多数国家一方面通过对抵押金利息削减的方式对住宅私有化进行补贴,另一方面,住宅价格上扬导致财富从房客转向房主。衡量购房能力的最通常的单个指标,用住房开支占家庭总收入25%的比例也许较为贴切。

(6) 建房补贴

西方国家通常使用下面3种形式的建房补贴:①通过旧房修缮和城区重建来取代原来的全面拆除和兴建公共住房措施。在加拿大,通过制定邻里改善计划来改进日渐衰落的老居住区街道、地段、社区中心及其它公共服务设施。②通过补助房租计划对开发商的住房抵押贷款给予补助,以此作为对房主同意维持低房租的回报。③通过提供出租住宅的计划向住宅开发商提供为期15年的无息贷款,鼓励出租性住宅的建设。近来合资建房和非赢利性的住宅计划为合资建房和非赢利组织的住房抵押金提供近40年的补助,以利于低收入家庭。其它重要的计划都集中在提供服务性的居住土地和基础设施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住房和住宅建设者进行资助更为可取,这与英国同时进行的房租补助试验相类似。

2. 房租控制

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出租住宅的经济成本都被转嫁到房

客的租金中。因此,政府理所当然地应通过对各类补贴的管理而对房租加以控制。房租调控是政府规范私人住宅市场的手段之一。自19世纪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私人住宅租金都有某种形式的约束。例如,在1914年作为战时的临时措施,英国就采用了限制租金的办法。尽管形式上有所变化,但自那时起一直采用至今。

在北美,与英国相反,政府对房租进行调控并不是连续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实行了临时控制措施,但很快就被取消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办法又再次采用,在战后和朝鲜战争期间,租金控制在某些城市和某些州仍继续采纳。联邦政府对房租的所有控制在1959年终于都被取消了。在1971～1972年的反通货膨胀方案中,这一控制措施又被稍稍重提。1975年加拿大的每个省都制定了房租控制法规,以响应联邦反通货膨胀计划的要求。在西欧,房租政策经历了3个明显的阶段:①战后房租控制;②1960年以后对房租控制的解除;③70年代后努力稳定房租。在英国,房租补贴取消后,迫使地方当局提高房租。到1988年颁布的《住宅法》相关条例给出租房屋者带来了新房客,同时也使房租失去了控制(Kilburn, 1992)。租金控制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控制的性质和所采取的方式。有些只是简单地冻结房租,另一些则在一定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增长,而其它则允许租金成倍增加。还有一些地区只对房租进行检查,或在对房租上涨时作一点限制,而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为房客提供投诉的论坛。房租控制也产生了一种长期副作用,其结果是私人出租的住宅减少。但不管怎样,即使房租控制措施并不是永久性的,但房租检查活动和房客论坛正日益受到普遍的欢迎。

3. 政府干预

大多数西方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住房问题。在城市住房中政府干预起了重要作用。主要干预的手段有:①资助贫困者。对由于贫穷而没有自己住房的家庭给予不同方式的帮助,例如,直接提供住房,建立住房补贴基金,或给予福利帮助,部分补助金还可用于支付住房开销。许多特殊的群体,如穷人、老年人和伤残人等都是这种特别优待的对象。②改善总体住房条件。现在人们相信在市场经济中,必须制定一些国家计划来加强改善住宅的总体状况,提高私有市场的能力。③住房购买能力。政府为住户提供补贴和优惠待遇,以便提高住房有效需求。④稳定建设。为稳定住宅建设最常采用的形式有制定条例、财政资助,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干预。保证住宅开发的稳定性是政府对住宅市场干预的重要手段。⑤其它政策。如滚动式城市规划,灵活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加拿大的住房政策不如美国那么集权,省、地方甚至地区的政府所起作用都要比美国同等机构明显得多。因此,在政府对住房的干预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作用不如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大(Goldberg, 1985)。

4. 公共住宅

公共住房是指由政府机构拥有并经营的住房。既然公有就无须要求投下的资金有什么收益,而是允许以低于个人投资的利率借贷资金。尽管这两项有利条件有可能使房租变得较低,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直接包括国家给予低收入家庭的补贴。降低房租的另一个可能渠道是政府以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出租这种住

房,然后从总税收中给予补偿(Mitchell, 1985)。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直接提供的公房或社会性的住宅依赖不一,在美国和加拿大,公房明显倾向于照顾一些非常贫困的人。更为特别的是,美国的公房绝大多数提供给靠失业保险或福利生活的人以及少数民族家庭居住。

五、中国城市住房改善对策

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市住房体制也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曾有过的类似问题。诸如住房的严重短缺、急剧的城市化、通货膨胀及老年人住房问题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政策,能为中国解决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提供借鉴。归纳起来,摆脱中国住房政策困境的途径主要有:

1. 城市住房的商品化

在中国,实现城市住房商品化就要改变城市住房分配制度,把住房从一种福利转变为一种商品。城市住房的商品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把住房作为一种商品来生产;②城市房产部门可以合理的价格或房租出售或出租住房;③住房属于个人消费品,因此应允许自由交易和出租。总之,应鼓励个人买房,住房私有权应受到法律保护。

中国进行住房商品化有3种市场可供选择:①完全市场型。

目前,凡通过房地产开发公司来进行房地产交易的大多数住房几乎都已商品化,住房完全以市场价格出售。住房价格包括:(a)住宅的建设费用;(b)土地、供水、废水处理、道路、供热、供气、供电等的开发建设费用;(c)扣除和弥补包括拆迁、建设税、能源、交通费用等在内的费用部分。因为房价很高,商品房的买主都是些大企业、机关及极少数高收入者。②住房补贴型。这种商品房由国家给予部分补贴,价格比较稳定,买主局限于中等收入阶层。③补贴住宅开发型。合作建房这种方式值得提倡,因为它有这样的好处,就是开发公司的利税不包括在住房价格之中。一些市政府在通达方便的地区划定平整好的土地,配备好供水、供电设施供私人建房,收取较低的土地费用。有一些地方还制定了发展规划,并为私人建房者提供多样的住宅设计图纸及建房材料。

2. 补贴住房私有化

当大部分人住在公房里仍只付较低的房租时,实际上是把住房短缺的负担转嫁到商品房购买者身上,这是有欠公平的。所以,政府已考虑实施住房私有化方案,并按住房的条件(例如,离中心商业区远近,环境是否优雅宜人,交通状况如何,商业、交通、文化和其它娱乐设施状况),以及住房的类型(如住房结构样式、完好程度、配套服务状况、面积大小、房间数、区位、楼层等)来定价。住房私有化是在现有住房体制全面改革之前所采取的重要一步。考虑到私人居住公家旧房的数量,尽可能不经过市场来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居民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他们一直居住着的房子。一般来说,把住房补贴出售给私人,政府和企业要补贴房价的2/3,而私人家庭支付剩下的1/3。收回的资金存入银行供以后建房用。最

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向高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房、分别实行市场价和微利价的住房改革新措施。为了体现政策的连续性，原房改政策中的标准价有所调整，即由“负担价”和“抵交价”组成。负担价按所在城市或地区双职工前一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基数来确定，抵交价按单位资助的住房公积金及住房补贴测算。今后标准价要逐步向微利价过渡，调整机制有两种：一是随着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前一年双职工工资基数确定的负担价相应提高；二是新房负担价与双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基数要逐步提高。并且，统一规定售房折扣政策，包括工龄折扣，按住房职工没有享受住房公积金的年限计算，其实质是对购房职工过去工资含量中住房货币不足的一种补偿。职工以标准价、微利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个人所有，但收益权、处置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即 5 年以后方可依法出售或出租，售价和租金水平分别依据届时的标准价和微利价而定，收入归个人所有。与此同时，国家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低价住房[①]工程，投资 120 多亿元建设 1250 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宅，向低收入者出售。为达到此目的，政府将免费让开发商征用国有土地，同时建设部将提供优惠条件，鼓励海外投资者积极参与这一工程，外商投资低价住房也可免费征地。这些住房将以成本价卖给中低收入家庭，并优先出售给无房户、危房户、住房困难户，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教师和离退休职工中的困难户。为配合售房，银行还将建立个人购房抵押贷款制度，个人首次付款的比例要达到房价的 40%以上。据有关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美国住房私有程度为

① 所谓低价住房就是让部分城市居民可按 1000 元/平方米价格购买新建住宅，每平方米价格比现市价约低 2000～3000 元。

64%,英国为66%,日本为61%,德国为41%。因此,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具有广阔的前景。

3. 改革房租体制

由于中国始终实行"低房租、高房价",尽管各城市房租一提再提,仍然无法完全到位,租售比价不合理现象十分明显。我们知道,住宅作为商品,其价格由折旧、维修、管理、投资利息、利润、房产税、地租和保险8项费用组成。1987年烟台市曾测算每平方米住宅的月租金以上述8项内容计为2.4元。1994年进一步测算包括这8项内容的商品房月租金每平方米大致在4元多。以一套两居室住房为例,其建筑面积按60平方米计算,折合使用面积约40平方米,则月租金在160～200元之间。而实际上中国住房每平方米租金平均为0.87元,月租金仅为52.2元,年租金626.4元,10年租金也只有6264元。若购买这样一套住房,即使是微利房,一般也在2～3万元。如果将这两三万元存入银行,年利息就达2000～3000元。而在国外,房租开支约占家庭收入的18～25%。显然,这就使人感到租房比买房更合算,从而影响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进程。

中国城市住房低租金制度带来明显的弊端:①缺乏足够的基金来保证住房维护费用;②不利于住房的合理分配;③阻碍了私人购房和住房商品化。此外,租金低也使住宅开发商不愿扩大经营。因此必须改革低租金制度。一方面,80年代以来工资增长较快,公有的旧房租金也应该逐步提高,这能抑制某些人对住房的过度需求。假如住户占用的房子比国家规定的标准大,住房管理部门就应该加征额外租金。另一方面,住房管理部门对建成不久的住

宅也要征收额外租金。现行的房租制度享受国家补贴过多使住房的价格与价值背离趋向扩大。对新房加征房租是解决住房紧缺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也是实现城市住房商品化的重要一步。此外，在今后的几年内，政府应该取消黑市住宅租赁市场，达到控制房租的目的。

4. 调整住房单元类型

(1) 青年用住房

在中国，60年代为生育高峰期，如今这批婴儿已长大成人，青年人的住房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国家经济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为满足新婚夫妇对住房的迫切需求，建设青年公寓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典型青年公寓可建建筑面积37～40平方米大小，一般都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带有厨房、浴室和阳台的门厅。这样的住房一对夫妇可以用7～8年，如考虑到将来翻新需要，它可以设计成带有两居室或套间的房间。总之，在今后的10年内应大力建设这类青年公寓。

(2) 老年用住房

自80年代以来，中国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即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2000～202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将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老年人的住房需求会因为多数住宅为高层或中高层单元而成为重大的问题。

5. 逐步全面放开城市住宅市场

放开城市住宅市场就是取消现有的对商品房和土地租赁和购买的大部分约束，在自愿的基础上租赁和出租住房。由于中国再

次放开住宅市场还不久，所以要逐步建立一些城市住房制度。

(1) **住房基金制度**

购买住房靠两类资金来共同保证，一种是内部资金渠道，即来自个人或一些投资者的储蓄；另一种是外部资金渠道，可以通过信贷方式取得。现状资金是住房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鼓励住宅的建设，政府应为城市居民建立独立的住宅开发银行，为住房设立特殊的储蓄业务，并使征收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费合法化。同时，政府也应尽快地创建住房抵押贷款制度。

(2) **房地产业的基本法规**

作为一种新兴产业，中国房地产业需要一些基本操作规则。这些规则包括：①关于房地产(如住宅、土地)交易的法律和规章；②地籍登记制度；③房地产评估制度；④房地产市场管理规章制度。

(3)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土地有偿使用是指由于出让土地使用权而从被使用的土地上收取酬金。为逐步放开城市住宅市场，政府要建立新的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的所有权执行土地有偿使用政策，从而体现出国家对土地的拥有权。

第二十三章　中国城市更新与郊区化

城市，作为高度集约的地域类型，既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阶段产物，又是现代经济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城市、尤其大中城市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新的需求，对城市的职能、设施、景观以及空间利用格局不断地进行调整、改造，推陈出新，逐步形成完善的投资环境和新型的城市风貌，这就是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一批历史文化古城；同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增长、经济高速成长的时期，城市的外向扩展和内在调整，城市的延续与更新都非常明显。

一、中国城市更新

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人造物体，而是与周边环境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城市中心地区是核心，是主体；同时要维持这个有机生态系统，城市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否则居民区的结构就会失衡。城市要发展，必然

要对现存的结构、功能、景观进行保护和改造，这就是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

（一）城市更新动力源泉

城市更新改造的真正推动力来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更具体地说来自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1. 经济发展的需要

城市首先是一个地区物资集散和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大市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拥有便捷优良的交通、水、电、信息传播、商业设施等硬件环境。而且也要拥有管理有序和高效率的社会环境和高素质的人文环境。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城市的不断更新来达到。

2. 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的选择是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各项基本的消费需求，对城市生活质量并不过分追求。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就开始对城市的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包括住房、交通、服务、信息以及娱乐等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断提高，例如住宅组团的完全感、归属感、休闲生活安排、建筑装饰等便成为城市更新的深层次内容。

3. 城市衰退的遏制

城市衰退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是影响城市发展变化的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城市外部环境变化和形成机制的改变，城市原有结构可能发生衰退。例如，一个地区随着它的交通方式和交通路线的改变，可能带来其区位价值的变化，致使原有的土地利用形式发生变化；一个社区邻里随着人口的迁移，原有的社会网络和邻里结构可能会随之改变。城市发展不平衡导致城市衰退主要有3种类型：①物质性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物和设施超过其使用年限，变得结构破损、腐朽，设施陈旧、简陋，无法再行使用，致使城市自然老化。②功能性衰退。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和规模扩大，合理的城市环境容量被突破，致使城市超负荷运转，整体机能下降，导致城市功能性衰退。③结构性衰退。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发生变化，而原有的城市结构又难以适应发展变化要求，城市内部组织系统出现滞后，导致城市结构性衰退。为了有效遏制城市的衰退，有必要对旧城进行更新改造。

（二）城市更新现状分析

多年以来，中国的城市更新在多数城市并没有一个长期的、综合的宏观计划。局部的旧城改造基本上分为两类：①城市主要街道上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需要原地居民拆迁；②应急性的对少量无法再维持的危房进行翻建。旧城改造仅仅停留在物质性改造和物质磨损的补偿，并没有从复兴城市

整体机能的目标出发,从调整城市内部组织结构和土地使用的目标出发,调整城市内部组织结构和土地使用系统,综合整治城市整体环境,进行多目标多因素多途径的综合改建。

近年来,中国城市出现了明显的有计划地进行旧城改造的倾向。例如北京市1990年第27次市政府常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从最危最破的地段改起”,而且尽可能让原地居民回迁的城市更新政策。同年,北京城市规划院制定了4个老城区城市更新规划(图57)。该规划分4期,从最破最危险的地段开始,由易开发地段到难开发地段,从旧城边缘向中心转移。再如天津市从改变城市面貌出发,对旧城主要临街建筑进行装饰。而大多数城市政府则采取下放旧城改造土地开发权,并附带可以进行房地产业经营(包括可以把原地居民移至近郊新区)的政策,由开发公司实施旧城改造。

这种旧城区土地开发权无偿转让的城市更新政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①土地开发权的垄断。由于这种城市更新已经从“解危解困”转化为可赢利的旧城区再开发,各开发公司纷纷争取开发权,最终形成若干市级大开发公司的垄断局面。如北京市东城区已经将80%的待改造危房区的开发权划分完毕,但第一批危改项目还有不少尚未竣工。有些城市的开发公司在争取到土地开发权后,在短期利润不高时则按兵不动,一旦地价上升,便图巨利。②以“实物地租”的方式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土地开发权无偿划拨后,政府认为开发公司的危旧房改造工程赢利时,就用以下手段来平衡地方政府应获的利益:将开发地段周围的基础设施改造的任务与危房改造项目合并考虑,由开发公司承担,同时再征收房屋销售价格15%的大市政费、每平方米81元的“四源”费,以及无偿提供一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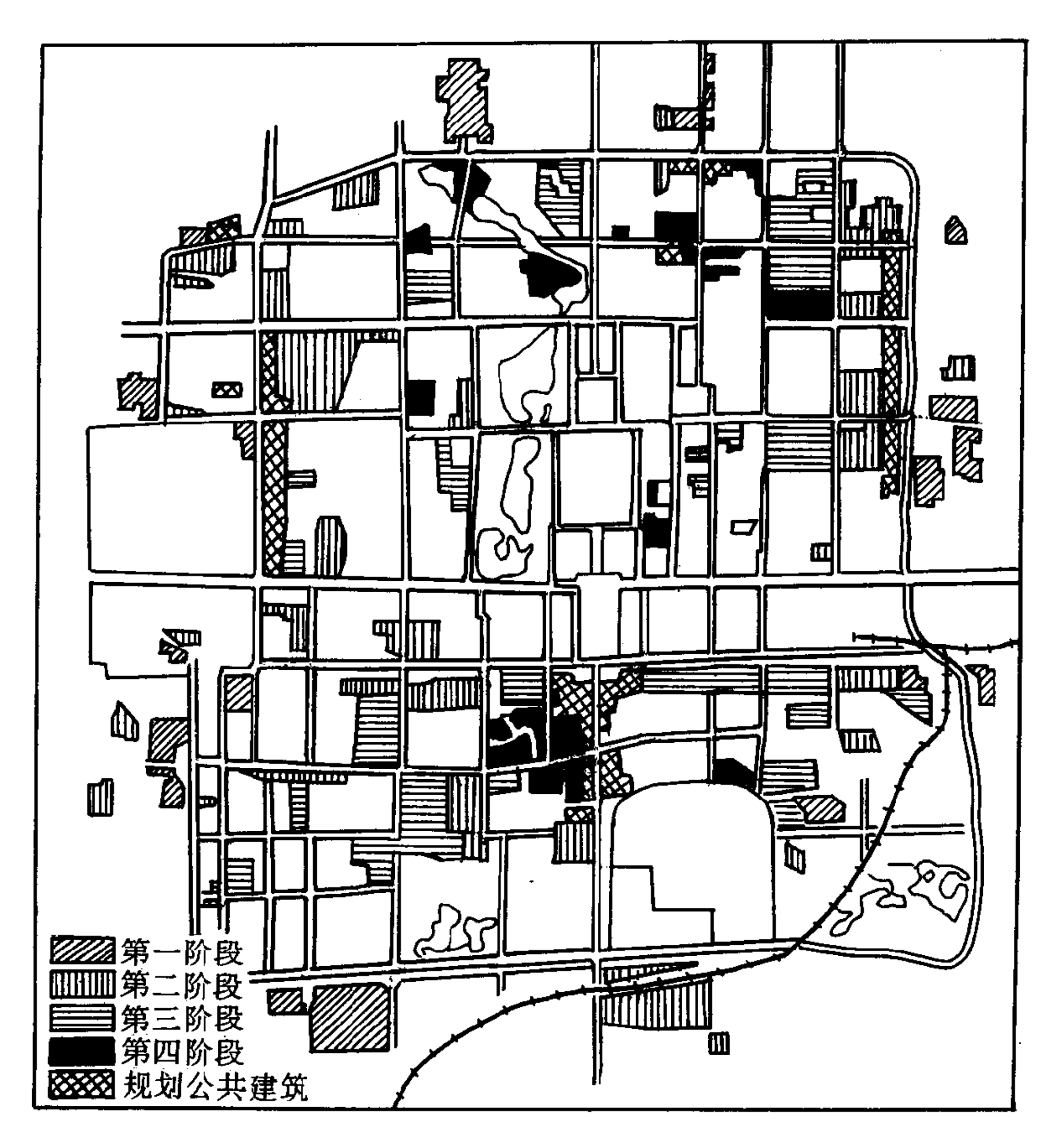


图 57　北京市老城区城市更新规划

由于城市更新过程中房地产开发公司将追求土地增值确定为明显的目标，在增值预期较高的地区，开发者不愿再多建普通住宅，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办公用房和高级公寓。原居民外迁率 70～100%的项目越来越多。

（三）城市更新实例

在中国，城市更新以旧城住房改造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特色，现以南京市传统街区更新、扬州名城保护和北京旧城改造为例介绍中国城市更新进展。

1. 南京市高冈里街区更新[①]

中国传统城市的最大特点都是由最基本的单元——内向的院落式房屋所构成。这种基本单元扩充后形成重院式房屋，重院式房屋的并列组合构成以街巷为边界的地块，进而构成街坊和街区。

传统街区内的基本单元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口”型模式（图58），它通常由两进房屋和两间厢房围绕一个院落构成。另一类基本单元是“冂”型模式（图59），它通常由一进房屋和两间厢房围绕一个院落构成，开口方向由院墙封闭，并设有门洞或门楼。“冂”型模式若与“口”型模式相比较，只是第一进空间简化成了一堵围墙。

中国传统街区通过这两种基本单元组成重院式房屋[②]，继之形成地块[③] 和街坊[④] 而构成。这种传统的城市建筑环境，一方面是中国城市的传统文化象征，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悠久而存在设施老化、建筑结构衰败、居住人口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更新保护

---

① 参见仲德昆、陈洞强：“旧城改造中传统城市建筑环境的更新与保护”，1994年城市更新改造国际会议论文，中国南京。

② 基本单元沿纵轴线向纵深方向以扩充单元的方式“生长”，形成重院式房屋。

③ 地块由三至五进重院式房屋背靠背构成，前后通常为街空间，左右为巷空间，形成一个邻里单元，按传统居住方式通常由10～15个组成。

④ 街坊由若干地块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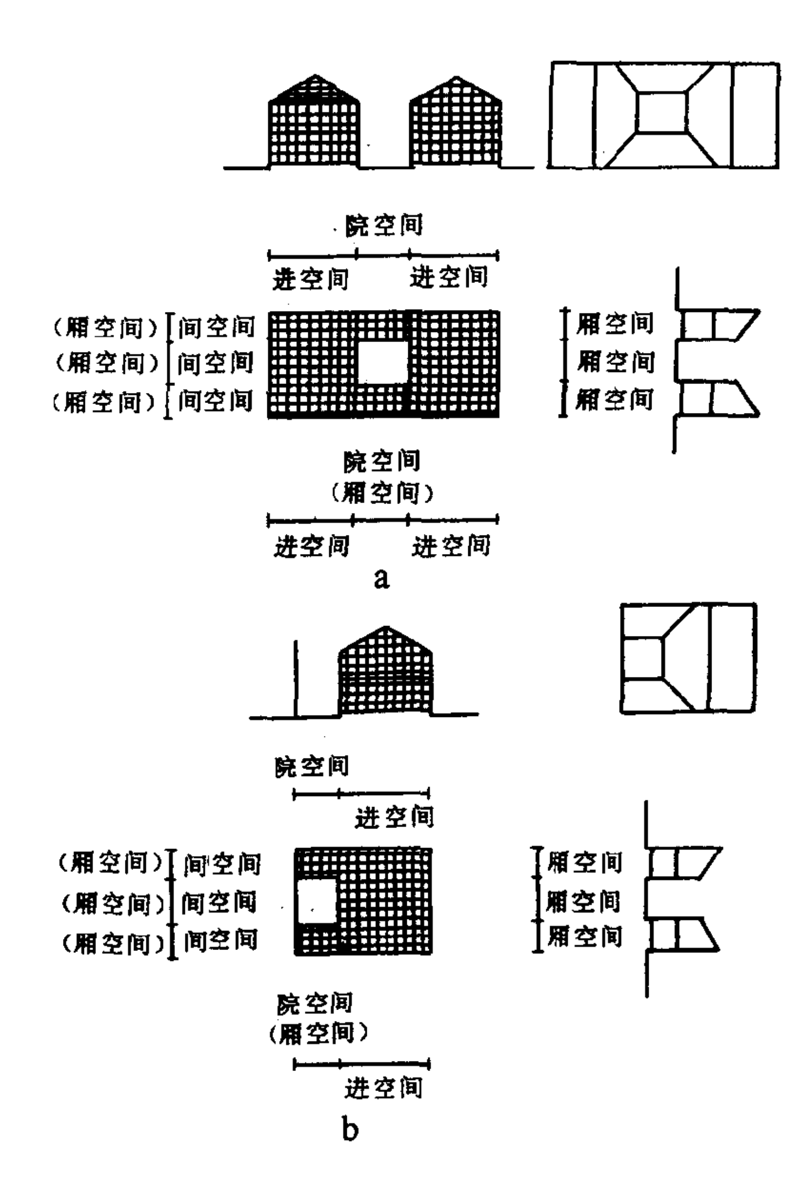


图 58　传统街区基本单元

成为这种传统街区生命力复苏的唯一途径。

近年来在传统街区更新与保护设计方面国内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工程，齐康先生主持的福州三坊七巷保护设计，南京的秦淮风光带及夫子庙工程等均不失为上乘之作。这里重点介绍南京高冈里街区更新改造。

高冈里位于南京城南门西地区，南距明代古城墙约40～50米，该地段保留有晚清潘式故居，共有“九十九间半”。高冈里街区更新实行改造与保护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对具有文物价值的民居采取保护，实行内部改造，增设厨房、卫生间等设施，改善通风采光条件；另一方面，对建筑质量差，居住条件差的民居拆除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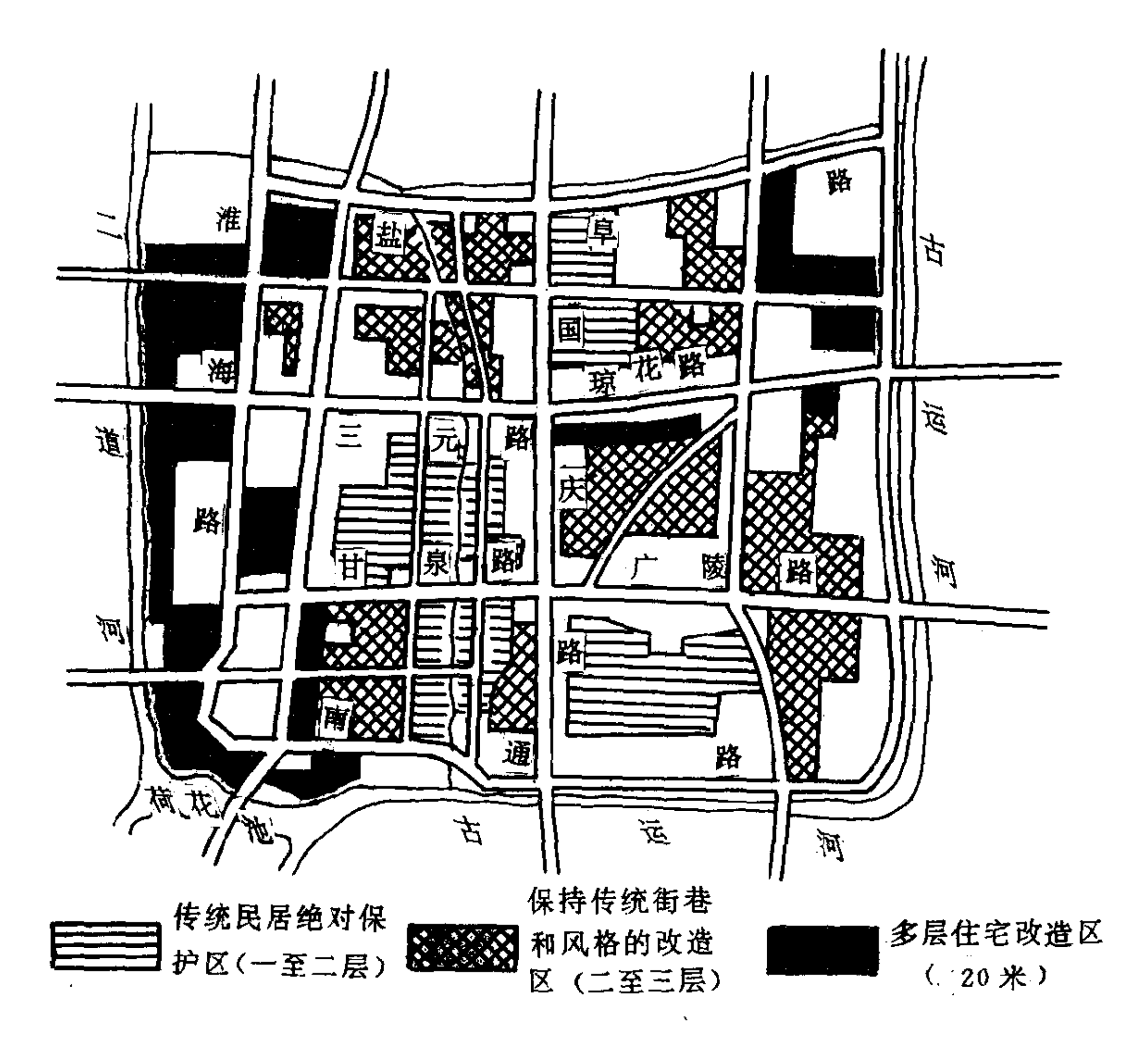


图59　扬州古城民居保护改造图

在街区的空间布局上保持了传统的街巷空间结构，并在局部围绕井台、大树和建筑小品扩大了公共空间，形成小广场和室外游园。传统居住环境中由公共到私密的逐步过渡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建筑的设计采用了传统建筑的合院式布局，保留了传统的邻里关系，而内部设施则沿用了现代公寓的设计，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建筑形式上采用一些传统建筑语汇加以抽象，创造了新民居的风格。

2. 扬州文化古城保护①

城市文化是城市文明的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激发人们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也是文化游憩、旅游的宝贵资源。扬州是一座有24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曾在唐代和清代两度呈现了异常的繁华，为当代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一些遗址、古建筑、古典园林、工艺美术（书画和乡土民俗）都独树一帜，形成一种无形的文脉。

扬州老城区四周被古运河、城河环抱，城内有一内城河沟通南北。城区格局为棋盘式，道路纵横整齐，是典型的传统城市布局结构。它的空间高度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以古运河、环城河、城内小秦淮河等河流水面和沿河绿带为最低点，犹如绿色底座，衬托着整个城市；第二层次为低层建筑群和低层居住建筑，高度3～6米；第三层次为居住建筑和一般公共建筑，高度9米左右；第四层次为主要街道的临街公共建筑，高度20米以下。城市高度的4个层次以低层为主，起伏不大，重点地段空间组合和形态具有城市标志作用，从而形成古朴、开阔、幽静的古城风貌。

扬州的建筑风格秀丽、典雅、朴实自然，兼具"北雄"与"南秀"的特点。老城区居住建筑形式朴实清秀、布局严谨规整，三间二厢，小天井、后花园呈院落式布置，形成独特的地方风格。老城中教场集中体现了扬州民俗文化、游艺与商业服务的场所，小秦淮河两岸茶楼酒肆，"几道画桥萃此聚，沿堤深巷柳荫排，绿水尽于一"。

① 高德山："浅谈扬州老城区及其规划"，1994年城市更新改造国际会议论文，中国南京。

再加上传统民居街坊，传统文化游乐区，乡土民俗商业区，古城老街道，古城新貌一条街，共同构成了具有传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城市景观效果。

扬州文化古城的保护首先对年久失修、生活设施不全的老城区街坊和民居按名城保护和改善居住水平等要求，规划3种类型进行保护与更新(图59)。第一类，保留传统民居，内部设施按"小康水平"配套齐全；第二类，保持原有街巷布局不变，修建1～2层具有传统建筑形式、内部设施配套齐全的住宅；第三类，成片改造危房和棚户住宅，修建3层以下的具有传统建筑形式的住宅小区。为了适应现代功能要求，并保持原有传统格局，古城区内形成一环、二横、三纵交通网络，同时配有分布在古城内的主要街巷，主要商业中心规划有步行街(图60)。

从保护整个古城风貌出发，对老城区内一条主脉、五条保护线和四块保护地段进行重点保护。它们是：①主脉，反映扬州历史和文化的古运河。②保护线，有古城新貌城区主干道石塔路、三元路、琼花路，具有传统建筑风格的名、特、优对外旅游商品街汶河北路，传统文化浓厚的旅游商业服务街盐阜路，水上游览线小秦淮河，古城老街道东关街、彩衣街、县学街、西门街。③保护地段，为传统老街坊仁丰里，扬州乡土民俗、地方风味小商品市场教场，大型传统民居、住宅庭园保护区南河下、广陵路地段，传统文化的游乐小区个园。

这样，通过对老城的保护与更新、新城的继承和发展，扬州古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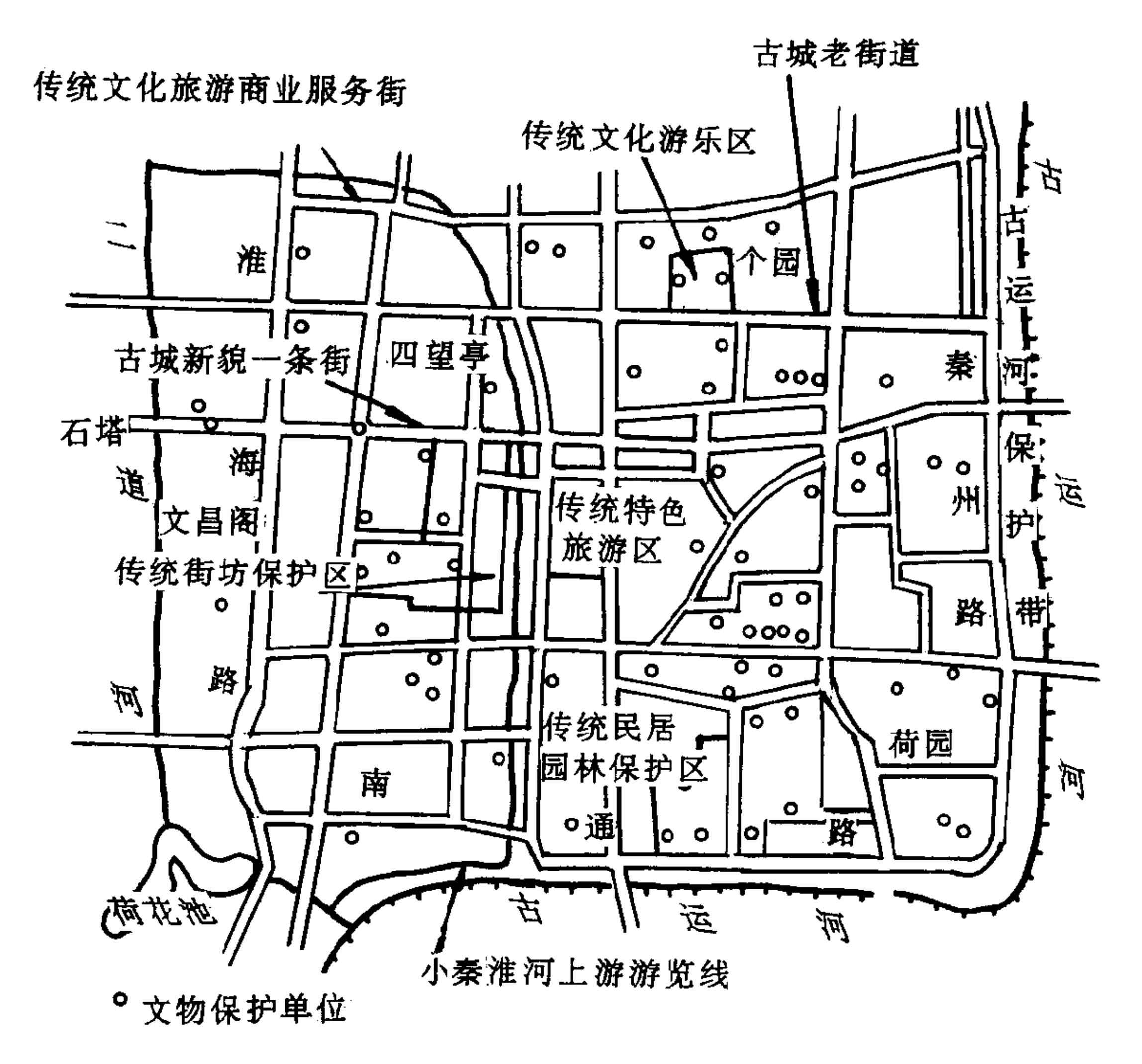


图 60　扬州名城保护规划图

3．北京旧城改造

1984 年以来,北京老城区经历了大量的城市改造和重建,其主要原因为:①历史上,北京缺乏中心商务区(CBD),多数金融和商务写字楼均分散于二环路以外的地区。对北京而言,要实现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和发展服务业,写字楼、商业和服务业用地的要求必然明显增加;②老城区以明、清遗留下来一层砖木结构四合院为主,供水、厨房和供热通常几家合用或缺乏,薛凤旋曾经将该区

描述为“贫民窟区”。1984年，北京旧城改造主要受两方面的推动作用：①大量新驻京机构的建立，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大使馆、外资企业分支机构等；②房地产市场的重新开放。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也促进了城市更新的过程。在1990年，北京市政府编制了旧城改造规划，现已有8个项目开始实施。一些商业中心，如王府井、东单、西单、西四、新街口、北新桥、菜市口、珠市口等被重建，王府井—东单则成为新的购物中心区。

二、中国城市郊区化

城市郊区化又称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在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水平趋向饱和（约70～80%），发展速度变得缓和平稳，人们开始追求理想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城市人口和工业开始向城市边缘或其它地方转移。这种当代大城市因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过程，我们称之为郊区化。

在国外，城市郊区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迅速发展。据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向郊区外迁自50年代起就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到60年代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区进入高潮，在70年代又波及到法国、意大利等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迅速发展的大城市郊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①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超过市区地域的负荷容量，致使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紧张，交通拥挤，居住和环境条件恶化；②郊区空间开阔、地价低廉，能够满足私人住宅、工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在地价、环

境、劳动力、专业化和协作配套生产等方面的需求；③小汽车的广泛使用，现代通讯尤其电话网的扩展，高速公路、地下铁道和城市轻轨交通等现代交通设施建设，为郊区居民通勤提供了方便；④市政当局为获取更多的城市税收而采取自由放任发展的结果；⑤人们喜欢生活在一个广阔空间和独门独院的传统文化氛围之中，也促成居民的郊迁倾向。据统计，美国有些城市 1970 年居住在郊区的人口开始多于市中心区或乡村，1980 年这类城市已经超过半数以上。传统的低密度、独门独院住宅为主体的郊区景观，已经与拥有方便的小汽车停车场的住宅群、超级市场、写字楼和娱乐设施融为一体。如今，美国 2.5 亿人中大约有一半居住在郊区，只有 1/4 的人居住在城区。

（一）中国郊区化机制分析

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由集中发展向扩散发展转化，即开始郊区化。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促进下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目前正处于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阶段。但近年来，在一些大城市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有阶层开始在郊区兴建别墅，一些高收入的工薪阶层也开始在远郊购置周末度假用房，各类开发区竞相在郊区布局，郊区化扩散力量已初步形成，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迁移的现象开始显现，在未来将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主流。对照西方国家郊区化影响因素，中国郊区化机制有所不同：

1. 政治因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部分复员军人和转业干部留城,再加上百废待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建设,城市得到发展,市区范围向外扩展。例如天津市1964年与1958年相比,人口密度提高了99人/公顷,处于人口向心集中阶段。虽然中心区的人口增长率低于边缘区,说明边缘区增长快于中心区,但这主要因为市中心人口密度基数大,增长缓慢,所以天津市边缘区的人口增长应作为城市扩展形成的郊区城市化。50年代末,鉴于西方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现象,受苏联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我国开始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向郊区迁出了一批工业,建设了一批卫星城。这是中国产业郊区化的开始,但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工业的外迁并没有促进人口的大量扩散。60年代中期,随着1949年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进入经济活动人口之列,就业压力加剧,于是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致使许多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它与西方逆城市化不同,是违反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反城市化现象。1977年以后,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城市膨胀日益恶化。为了减轻人口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城市内部的集中程度,解决就业问题,城市工业进一步郊迁。但随着改革开放、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主要定居在城市边缘区。与此同时,大城市人口开始迁往近郊住宅新区。这些均加剧了城市边缘区人口的急剧增长。

2. 经济因素

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当一个城市区域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3500美元以上，城市的郊迁现象才出现，当收入达到4000美元以上，郊区化才明显。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运输工具的结构和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目前我国经济实力与这些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1992年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4868、6840和3930元，私人交通工具仍以自行车为主，出行距离有限。同时城乡间、大中小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尤其在教育、卫生、给排水等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因此郊区生活很难吸引城里人，中国郊区化还不普遍。

经济因素的另一个影响方面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工业扩散往往成为郊区化的先导。工业外迁推动了部分职工的外迁，例如上海彭浦工业区的开发就是以工业为先导。其居住地域的生成和增长是被动的，并由此才带动商业、公共建筑用地的增加，及郊区与市中心区交通联系的改善。这种生产建设与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不同步性，给企业职工的生活以及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部分职工不愿随厂郊迁，造成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逆向通勤方式——在郊区工作，但居住在市中心。

3. 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这部分人的比例还较小，没有形成一个阶层。在郊区购房又往往存在工期拖延、质量低下、配套不全、管理不善等问题，增大了居民的投资风险，打击购买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城市化初级阶段，城乡在生活、文化服务设施上还存在很大差距，使城市人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农村、郊区居民对城市生活十分羡慕向往。大城市居民心理上总认为大城市生活最好，社会上流传着“宁可城里一张床，

不要郊区一间房”等反映人们心态的口头语。

4. 住房因素

改革开放前，住房由国家统包、单位统分。由于片面强调生产、忽视生活等原因，住宅建设与人口增长的比例严重失调，使城市住宅紧张的矛盾日益突出。1979 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国家加大了对住宅建设的投资，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兴建住宅，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筹资建房的运行机制。“八五”时期，中国住宅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5 年完成城市住宅建设投资 7600 亿元，竣工住宅面积 10 亿平方米，完成计划的133.33%，比“七五”期间增长 58%。1995 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9 平方米(使用面积11.8 平方米)，比 1990 年增长0.8 平方米。住宅成套率达到 55%，住房设计、使用功能和建造质量都有明显改进。5 年共解决城市缺房户 500 万户。安居工程已在 59 个城市正式启动；积极推进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全国共有 67 个住宅试点小区，分布在 26 个省区的 56 个城市投建，其中已有 15 个城市住宅试点小区建成使用。根据对沈阳 1981 ～1992 年完成的 2 万平方米以上住宅小区的分布资料，84.1% 的住房建设，即 759.9 万平方米的住宅都是建在近郊区。郊区住宅的大量建设，为市中心区人口的郊迁提供了物质基础，是同期中心区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5. 交通因素

中国目前正处于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为主的“准机动化”时代，小汽车还没有普遍进入家庭。公共交通系统还不够发达和完

善，仅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建有或在建地铁，而且里程有限，仅数十公里；轻轨尚在规划之列。通过对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几个大城市的研究发现，它们的郊区化范围很小，集中于靠近市中心区的近郊内缘。如天津郊区化范围距市中心的半径仅在10公里左右，远远低于西方一般城市20公里以上的水平。

在今后的十几年中，中国私人小汽车会有较大发展。这主要因为：①汽车工业凝聚着现代工业技术的精华，几乎涉及到所有工业部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因此，被列为中国工业化的支柱产业之一。②根据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验，经济起飞往往伴随着小汽车生产的飞速发展，从而促进小汽车的迅速普及。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小汽车进入部分家庭正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据统计，1993年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年收入3300元，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家庭估计占总户数的15～20%（约27～36万户）。专家预测，年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的家庭，在2000年前均有意并有能力购置家用轿车。尽管目前普及程度有限，但中国人口基数大，其数量仍会较大。据统计，近几年城市民用汽车数量增长有不断加快的趋势，一些城市已进入车辆保有量的高增长期。如北京市近年来的车辆持续增长，1995年底全市拥有机动车95万辆，机动车驾驶员100多万名，每天进京和在京的外埠机动车高达数万辆，小客车的保有率已达每千人26辆的水平。与此同时，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1000美元，私人车辆大幅度增长，已占车辆总数的17%。无论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从汽车保有量实际水平看，北京等一批特大城市已经进入了私人轿车导入期，而且很快将进入高增长的敏

感期。北京市近5年来,小客车平均每年增长25%,大大高于全市机动车平均每年14.5%的增长率,尤其是私人车辆的年增长率更高,达40%以上。因此随着私人汽车的普及,这些城市的郊区化现象将更加明显。

6. 通讯因素

通讯业是近几年中国城市中增长最迅速的行业之一,年增长率连续达20%以上。目前中国的公用电话网已基本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城市中电话普及率约每百人13.4部,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要城市的家庭私人电话普及率已达15%以上。另外,近几年中国蜂窝移动电话(即"大哥大")年增长率高达26.3%,约有36万用户。无线寻呼业务网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网,业务量年增长率达153%,寻呼(BP)机持有者约500万人,开通寻呼的城市为476个,其发展势头甚至比欧美国家更为迅猛。

7. 规划和政策因素

中国郊区化的形成与一系列国家政策是密不可分的:(1)户籍制度的改革。改革开放以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城市压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的体制,无法保障城市迁出居民的生活福利、子女入托入学以及就业和待遇等问题,也限制了城市居民向郊区和卫星城的迁移。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造成城市边缘和内城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迫使部分城市"暴

发户”郊迁。(2)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土地无偿使用的制度,没有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造成土地使用的低效率和不合理。改革后,特别是1987年以来城市土地由无偿变有偿使用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逐渐向优化和高效益转化,城市中心区和郊区的土地优势和潜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前者更适合于土地收益高的商业、贸易、金融、旅馆、写字楼等第三产业用地,后者更适宜于土地密集型的工业、仓库和居住用地。(3)住房制度的改革。改革前住房建设由国家统包,采取单位建房、单位分房的制度,不利于住房建设,同时又限制了人们选择住宅的主动性。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台了许多新的住房改革政策,主要表现在:①城市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即住房商品化,采取以补贴价出售住房,提高房租,实施房租现金补贴,居民集资建房,以及建立住房基金等措施,鼓励个人购房;②房地产业的复兴。1992年6月6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对中国房地产作了如下展望:“房地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③城市住房投资主体多元化。城市住房投资从政府预算为主发展到四级投资结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个人,把企业、机关和个人的储蓄投资于新房建设。④“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该政策是借鉴西方城市分散化指导思想,在近郊设立卫星城镇。但由于卫星城普遍规模过小,配套设施不足,与市中心区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没有真正起到吸引中心区人口的“反磁力中心”作用,而实际上市中心成了卧城,人们往返通勤于中心区与卫星城之间,给城市交通带来了更大负荷。另一方面,卫星城却成为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跳板,吸引了更多的

人口，使城市规模进一步膨胀。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再次强调了大城市外围卫星城的建设，主要是扩大其规模，完善配套设施，增强经济实力，分担部分城市功能。只要卫星城建设得好，就会成为人口、产业郊迁的最佳选择点，从而达到相对聚集效应，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二）中国郊区化实证研究

总的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尚处在以人口向城市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初级阶段，但对一些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地区而言，也出现了中心城市的郊迁扩散现象。上海市南京路是全国最具规模实力的商业街，每天客流量达 180 万人次，每分钟有 5 万元的成交额，堪称中国商业第一街。然而，1993 年南京路年销售额的增幅开始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海城郊地区新商业区的形成、旧商业区经营商品高档化，使南京路的客流量相对减少。在北京，老企业大都集中在市区，目前仅在三环路内就有工业企业 358 家，占地上千万平方米，而这些企业多数微利或亏损，有的则因污染、扰民急需搬迁。最近这些工业企业运用地价规律开始大规模郊迁，在郊区的新工业园区落脚，使北京的新兴工业区在郊区连成一片。

周一星通过对北京市 1964、1982 和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在 1982～1990 年间，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 4 城区的人口均转为负增长，而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 4 个近郊区人口年均增长率均超过 4%（表 140）。很显然，内城区人口下降是由于外迁

造成。因此,可以认为北京市已经开始进入离心扩散的郊区化阶段[①]。

根据我们的研究,北京城市边缘区自1953年以来出现了快速的空间蔓延,城市建成区从1949年的109平方公里扩展到1980年的340平方公里。首先,在1953～1957年间,一些新建的制造业集中布局在老城区的外围,形成与老城区相毗邻的新建成区;其次,在1958年根据消灭三大差别的设想编制城市总体规划,12个分散集团被布局在北京的近郊区。这种分散集团实际上是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统一体。从此,北京城市总是围绕这12个分散集团模式发展(图61)。

表140　北京市城区人口增长和密度变化(1964～1990年)

<table>
<tr><th colspan="2" rowspan="2">区域</th><th colspan="2">1964～1982年</th><th colspan="2">1982～1990年</th><th colspan="3">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th></tr>
<tr><th>人口增长(%)</th><th>年均增长率(%)</th><th>人口增长(%)</th><th>年均增长率(%)</th><th>1964年</th><th>1982年</th><th>1990年</th></tr>
<tr><td colspan="2">全市</td><td>21.50</td><td>1.09</td><td>17.2</td><td>2.00</td><td>452</td><td>547</td><td>642</td></tr>
<tr><td colspan="2">城区</td><td>3.00</td><td>0.16</td><td>-3.38</td><td>-0.43</td><td>26748</td><td>27551</td><td>26607</td></tr>
<tr><td rowspan="4">其中</td><td>东城区</td><td>4.80</td><td>0.26</td><td>-6.96</td><td>-0.90</td><td>25169</td><td>26377</td><td>24543</td></tr>
<tr><td>西城区</td><td>3.70</td><td>0.20</td><td>-1.10</td><td>-0.14</td><td>24564</td><td>25473</td><td>25194</td></tr>
<tr><td>崇文区</td><td>8.43</td><td>0.45</td><td>-5.14</td><td>-0.66</td><td>25539</td><td>27692</td><td>26267</td></tr>
<tr><td>宣武区</td><td>-3.80</td><td>-0.21</td><td>-0.94</td><td>-0.12</td><td>34250</td><td>32948</td><td>32592</td></tr>
<tr><td colspan="2">近郊区</td><td>31.13</td><td>1.52</td><td>40.46</td><td>4.34</td><td>1680</td><td>2203</td><td>3101</td></tr>
<tr><td rowspan="4">其中</td><td>朝阳区</td><td>41.88</td><td>1.96</td><td>41.68</td><td>4.45</td><td>1530</td><td>2171</td><td>3077</td></tr>
<tr><td>丰台区</td><td>27.15</td><td>1.34</td><td>34.89</td><td>3.81</td><td>1513</td><td>1923</td><td>2594</td></tr>
<tr><td>石景山区</td><td>32.75</td><td>1.58</td><td>31.39</td><td>3.47</td><td>2037</td><td>2704</td><td>3639</td></tr>
<tr><td>海淀区</td><td>23.48</td><td>1.18</td><td>44.62</td><td>4.72</td><td>1897</td><td>2342</td><td>3387</td></tr>
<tr><td colspan="2">远郊区县</td><td>27.64</td><td>1.36</td><td>13.12</td><td>1.55</td><td>202</td><td>257</td><td>291</td></tr>
</table>

资料来源:周一星:"北京的城市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表1,"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机理研究"第二次协调会论文(南京),1995年。

① 周一星:"北京的城市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经济、人口集聚与扩散机理研究"第二次协调会论文(南京),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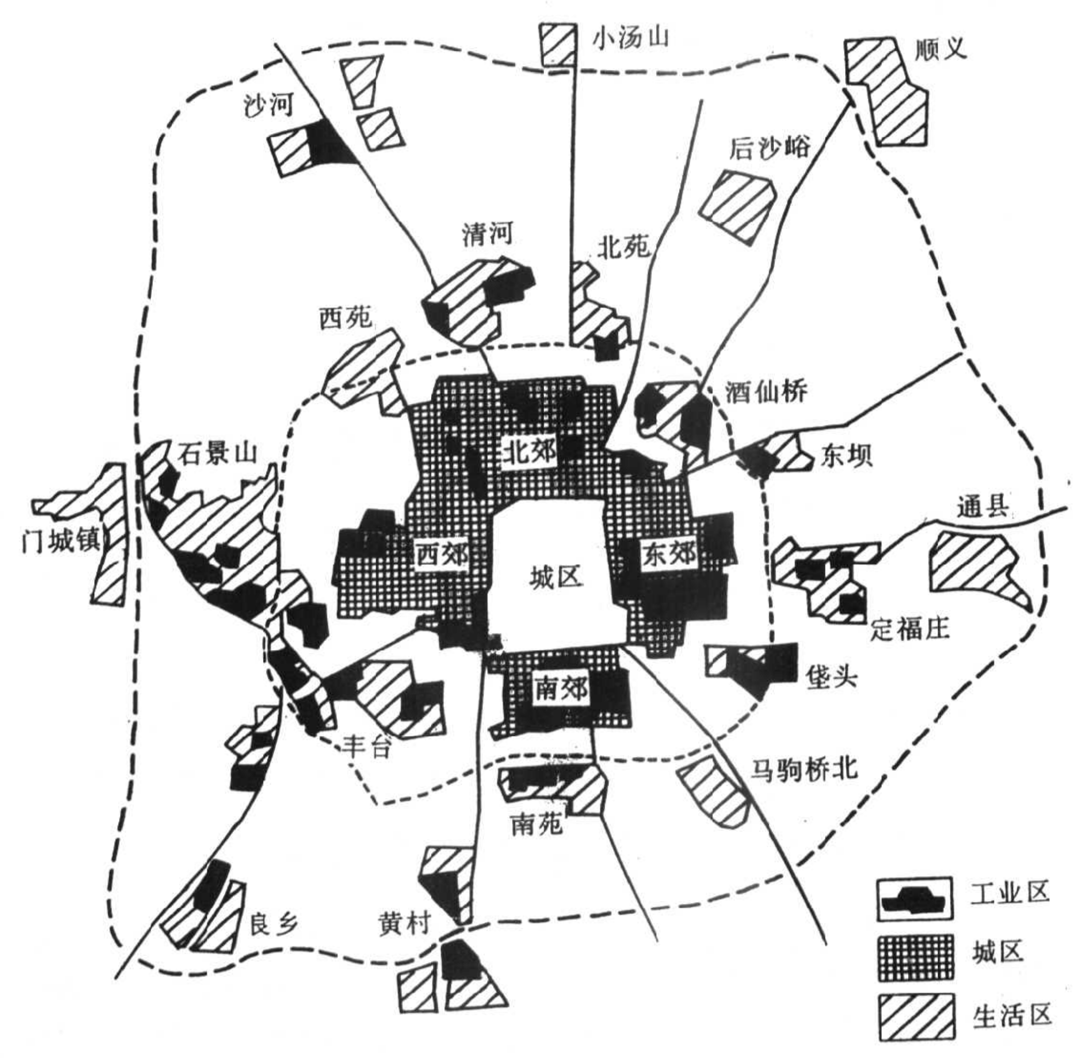


图 61　北京市分散集团模式发展示意图

自 1978 年以来,城市外向蔓延愈益明显,整个城市沿主要干道向城市边缘区和近郊区扩展,建成区面积已由 1980 年的 340 平方公里扩展到 1994 年的 466.98 平方公里,城市非农业人口也从 1980 年的 408 万增加到 1994 年的 570.3 万。图 62 显示了北京空间结构的快速扩展(1980～1994 年)。然而,统计资料显示老城区人口密度变化不大。很明显,大规模的郊区化,即人口从老城区向郊区的迁移,在北京并没有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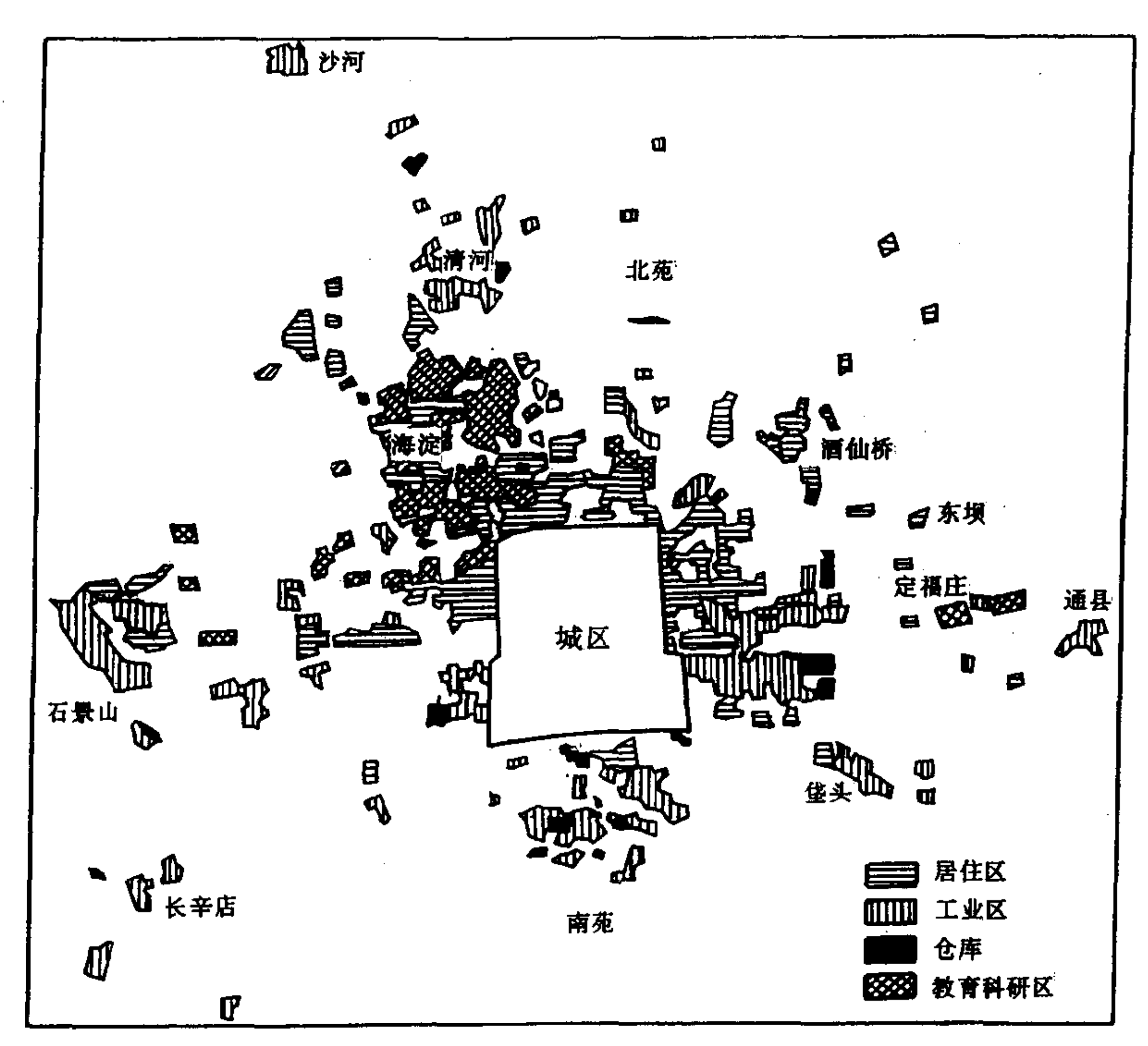


图 62　北京空间扩展图(1980～1994年)

(三) 中国郊区化展望

中国目前正处在集中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伴随着这一总的趋势,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郊区化现象。但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多,城市化潜力大,城乡差别巨大,又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郊区化推动力较弱,郊区化过程也相对缓和得多。

1. 郊区化型式

(1) 被动式郊区化

前面已介绍,美国、西欧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大规模郊区化现象主要基于环境因素:居民实际收入提高后,为了逃避城中心日益恶劣的住房、交通以及工作条件,追求郊区清新、宁静的氛围以及宽敞的空间,将住所甚至工作场所都转移到郊区。以英国内伦敦居民调查为例,有 1/4～1/2 的居民愿意从这个地区迁走,其中压倒多数的是因为包括住房在内的环境因素。"住在小城市或郊区环境中,再拥有小汽车、汽车库,就比住在 19 世纪建筑的只能步行和走马车的拥挤城区中舒服得多,更何况,城区正被交通拥挤、污染和环境恶化弄得焦头烂额"。经济因素,如便宜的住房、制造业工作职位的增加,都只不过是迁移的附属因素。

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在"严格控制大城市"方针的指导下,大城市外围建设了若干以工业为主导的卫星城镇。当时,企业的外迁都是依行政命令而行,一些没有发展用地或污染大的企业被责令从城区迁往郊区,一些新成立的机构和人员由于挤不进城区而先落脚郊区。现阶段土地有偿使用后,旧城改造时外迁的居民和企业常因无足够财力回迁原址。因此,中国郊区化带有明显的被动色彩。

(2) 居住郊区化略迟于工业郊区化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人口外迁时间和就业职位的减少是不同步的。在英国,人口从大城市外迁早于就业衰落的开始时间。在内伦敦,从1931 年起,居民人数就由于人口外迁而下降了,而到 1961 年制造业才开始衰落,1968 年全部就业人口才开始下降,时

间间隔差不多30年。

而中国却与之相反，企业外迁早于人口外迁，这主要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企业办社会的“全包”制度，企业职工的住房由企业提供。当企业被迫外迁后，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却没有同步跟上。很多职工由于不满意郊区的生活条件，如副食供应差、商业设施少、子女入学难等，不愿随企业搬出，而是每日往返奔波。随着企业在郊区建起了大片宿舍，增添了一定的生活设施，部分职工才从城区搬到工作地。因此居住的郊区化略迟于工业的郊区化。

(3) 圈层扩展式郊区化

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主要促动因素是住房、私人汽车和电话的普及，因此人们将住房选择在距市中心1小时车程内的干道边和小城镇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城市沿伸展轴向外扩展20公里以上，城市空间结构呈放射状。在中国，首先，目前私人汽车拥有率很低，北京仅为每百户2部，公共交通系统不完善，缺乏捷运系统，不能满足长距离快速出行的要求。其次，由于低工资制度，城市居民住房仍以政府提供为主，能够私人购房的居民凤毛麟角。据北京市调查，现在郊区别墅区购房户75%为公司，10%为海外华侨，仅5%为城市居民。企业、居民都尽可能选择距城中心区最近点，因此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摊大饼”式的圈层扩展。郊区化的范围有限，仅在10公里左右，居民出行距离尤其小于西方国家，大部分市区居民的活动半径在城区和近郊区之内。这种扩展方式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也带来城市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大规模的郊区化还没有真正开始。

2. 郊区化特点

(1) 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化并存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郊区化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制造业、人口以及商业迁出城区造成中心区衰落的过程,即“空洞化”现象。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在制造业外迁的同时,中心区商业异常活跃,旧城改造大规模进行,分散和集中趋势并存,中心并没有衰落。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吸引了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服务人员;二是大部分工薪阶层的居民在公共交通系统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更乐于选择城中定居;三是城市规划将城中心作为与其它城市、地区进行国际国内联系的商务中心进行重点建设,发展了一批国际贸易、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企业,使城中心比以往更加繁荣。

(2) 社会阶层地域分异不明显

按照同心圆和扇形模式理论,西方城市内部存在依收入水平的社会阶层地域分异,一般收入越高,越远离市中心区。同时语言、宗教、种族等非经济因素也加剧了这种分异。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也出现上层人士首先向郊区迁移的趋势,呈现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地域结构模式。在中国这种分异并不明显,更多地表现为文化与职业构成等方面的差异,这主要与中国在规划时将居住地与工作地接近有关。如50年代以来,北京市在西北郊除扩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外,在附近陆续建起了钢铁、地质、石油、矿业、农机、北医、林业和航空八大学院,并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建设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主体的科研基地,形成北京市科研

文教居住区；在西郊新市区附近，陆续在三里河建成“四部一会”（财政部、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兵器工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关办公大楼，在百万庄建成对外出口办公楼、外贸谈判楼和建设部办公楼，以及复兴门外海洋局、对外贸易促进会、木樨地铁道部等办公楼，形成北京行政居住区；在石景山和衙门口建成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形成北京市西郊机械工业区；在东郊，建有垡头化工工业区，十里堡纺织工业区，通惠河两岸机械、建材、化工工业区和酒仙桥电子工业区；另外，随着东北郊航空港的建设，又建了三个使馆区以及一大批新建住宅小区；南郊丰台正在形成北京对外交通枢纽区。

从总体上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2%，处于初级阶段，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已达40～50%，进入了城市化中期阶段，出现了郊区化迹象。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等几个大城市的研究，更进一步证实这些城市正处于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范围迅速扩展阶段，郊区化已开始。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低，若以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郊区化普及时年人均国民收入4000美元为标准，则中国这些大城市需十几年的发展才能形成大规模的郊区化。另据汽车市场预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汽车潜在市场，到2010年前后，中国一般家庭用车将得到普及，这就意味着城市中心区居民愿意也能够迁往远郊。

从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城市的郊区化与西方国家的郊区化有明显的差异。西方国家的郊区化是在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小汽车普及和追求舒适的生活居住环境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自发性的郊迁现象。而在中国，由于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地区就业岗位增加，正处于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时期。某些城市

所以出现郊区化，是因为近年来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旧城改造，土地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一部分居住在城区的人口被迫向郊区迁移。加以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所需的居住区在郊区大规模开发，加快了城市的外向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将中国城市的这种郊区扩展称为“城市郊区化”，不如称为“郊区城市化”。诚然，近年来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居民已经拥有自己的轿车，并开始在远郊地区新辟的别墅区购置住房，可视为中国城市郊区化的萌芽时期。可以预见，随着轿车进入家庭和人民渴望生活居住环境的改善，中国城市郊区化将会比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郊区化时所需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来得更早、更快、更猛。总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郊区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二十四章　中国城市开发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期贯彻执行“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大中城市一直处于控制发展的状态。改革开放，兴办经济开发区，给突破这种城市发展模式带来了契机。因此，开发区的设置和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外向扩展的主要标志之一。

一、中国城市开发区类型

中国城市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又称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和综合开发区。它们都邻近城市，但又是享受特殊经济政策的地域。

1. 经济特区

中国经济特区吸收国际经验，是兼有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功能的综合性特区。经济特区划定一定的范围，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使之发挥对外开

放的窗口和基地作用。中国现有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中国政府对经济特区实行的特殊经济政策主要有:①特区建设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特区的经济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人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体;②特区的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方式灵活;③对前来投资的外商提供更多的优惠待遇和入出境方便;④特区政府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此外,特区也对内联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待遇。目前,这些经济特区共开发出百余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建成了一大批工业厂房和配套的交通道路、水电管网、邮电通讯、港口机场、商业旅游、居民住宅等设施。近年来,特区外商投资企业中出口型和技术先进型产品明显增多,初步显示了特区"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的发展前景。

2. 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上都是在沿海开放城市(多数为大中城市)郊区划定的专门地段,以新建为主,一般占地3～5平方公里,以外向型工业为主,多数为中小型加工业,兼有仓库及必要的商贸、服务、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机构等。分阶段实施,起步区面积较小,基础设施先行,一般由国内投资基础设施,"筑巢引凤"来吸引外资项目。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旨在形成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引进同老市区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结合的先进技术,举办外商投资的生产、科技项目,增加出口创汇,并向内地传播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开发区所在城市的对外开放功能和实力,加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这类开发区主要是吸引外

商投资项目,其产业导向除鼓励从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外,重点是鼓励外商投资第二产业项目,即创办生产型企业,特别是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经济特区的区别主要在于:①在管理体制上,经济特区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在所在市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和具体管辖下的一块实行某些特殊政策的开放区域。②在经济结构上,经济特区是以外向型工业为主,新建或依托小城市(镇)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依托所在城市发展,必要时,也在区内设立外贸、金融、商业、仓储、运输、生活设施,但这主要是为本区域生产、经营、生活提供服务。③在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上,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只有生产、科技性企业才能享受这一待遇。④在减免关税上,经济特区在管理线内进口的生活消费品和市场物资多数免征或减征关税;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一律照章征收关税。此外,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人口构成上,以国内人员、原有城市市域范围内的人口为主体,境外人员很少;在地理特征上,它既是相对独立、有明显地理界限的用地,又是所在城市用地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城市一般的"建成区"。

3. 保税区

为了使投资环境不受国内经济政策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保税区成为另一种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形式。中国的保税区是有一定范围的封闭式综合性对外开放区域,具有明确的界线,建立完善的隔离措施,区内没有居民,产品100%出口,其管理体制可大大简化,办事效率可大为提高,可创造出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良好投

资环境。中国建立保税区的目的是借鉴国外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的经验,充分利用保税区港口和陆地口岸的地缘优势,发展转口贸易、过境贸易、出口加工、仓储运输、分类包装和各类服务业务,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出口创汇,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加快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保税区投资项目的产业导向是鼓励发展转口、过境贸易行业和加工出口行业以及为开展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整理、包装、运输、仓储、商业性展出等行业和部门。

4.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类似于国外的高技术区、科学园区和科学城,是一种以加速高新技术研制及其成果推广应用、服务于本国或本地区工业现代化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而设置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基地,其实质就是知识密集区和技术密集区。中国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目的,旨在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力量,促进国内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加快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与扩张,从而完善和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推动国民经济骨干产业的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使中国能在21世纪跻身于世界经济和技术大国行列。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一般建在大中城市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附近,在开发上与之相结合,以开发科技产品为主,兼有科、工、贸性质。中国目前阶段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虽然也注意了选址对环境质量的较高要求和接近高校、科研机构等,但大多数仍着重于科技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与发达国家以高质量的环境条件为特征的科学园区有相当不同。

5. 国家旅游度假区

中国的国家旅游度假区是以接待海外旅游者为主的综合性旅游区，国家鼓励能促使区内旅游业尽快发展的创汇型产业的成长，包括涉外房地产业（主要发展以外销为主的别墅、公寓、商品房、写字楼等项目），旅游和文化娱乐业（如兴建度假村和水、陆游乐场所、涉外旅行社及旅游交通业、健身房、疗养房、歌舞厅、保龄球等总汇性或单项式娱乐项目），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及通讯项目等），涉外商业、服务业（如兴建星级涉外宾馆及配套设施、涉外餐饮业、具备世界风味的中西餐馆、食品店及连锁店）等。

6. 综合开发区

进入90年代以后，以上海浦东为代表的综合开发区在中国出现。上海浦东开发区面积200平方公里，港口、工业、贸易、金融、房地产业及其它第三产业全面综合发展，基础设施齐全，预计人口规模将达250万以上，是上海的一个新市区。厦门的海沧（80～100平方公里）、珠海的西区（448.8平方公里）、苏州中新工业园（70平方公里）等，都是在城市外围新发展的大型综合开发区。海南的洋浦（130平方公里）则是不依附现有城市独立新建的综合开发区，浙江省宁波也正准备在北仑开发土地面积达70平方公里的综合开发区。这类新开发区的特点是：①开发面积大，由数十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②以港口和工业为主，多种产业并举，有的还以大型工业为主；③一般都具有建设深水港口的条件和较为宽广的可开发用地；④开发后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有的成为城市的新市区（如浦东、厦门海沧、大连新市区、天津滨海新区），有的成为

现有城市外围具有相当人口规模的新市镇(如北仑、珠海西区),或者成为一个新城市(如洋浦)。

二、中国经济开发区发展过程

(一) 国外经济开发区发展过程

人类历史上最早划定享受特殊经济政策地域的做法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经济特区"是1574年建立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湾雷格亨(Leghohy)自由港。自那以后,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的特区便开始在世界各地风行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些高技术的生产活动达到技术的成熟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高技术产业取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并开始扩散制造业分厂到经济不发达地区来打开便宜、稳定且不熟练的劳动力市场。而取得政治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在既缺少必要的建设资金和工业基础,又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情况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广设以出口加工区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区,通过提供税收及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惠,吸引外国厂商投资,引进工业技术和设备,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业。进入70年代中期,一方面,西方世界强烈的国际竞争,直接的和社会的工资增长压力以及消费市场饱和等导致生产增长缓慢下降,使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进入长时期的经济衰退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自己的经济,进

一步加大了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力度以便推动经济发展，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也日趋完善。80年代弹性生产方式在劳动力、原材料和公司内生产关系等方面更适应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资本和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发展，一些高技术区如硅谷、128高技术带和116个高技术园在美国相继出现。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发展高技术、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园区最终获得对世界市场的有效控制。近年来，在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出口加工区等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工业、科技和教育基础，开始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等地也出现了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的科学工业园区。

（二）中国经济开发区发展过程

1978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80年在东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由于经济特区执行了灵活的开放政策和措施，比较成功地引进了国外资金和技术设备，实施了高效能的科学管理方法，在开发建设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从创立到1984年，上述4个经济特区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6亿多元，开发建设用地近60平方公里，建成一批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设施，使经济特区具备了一定的接纳外商投资的能力。在最初的5年内共引进外资1600多项，利用外资10多亿美元，在区内建起了900多家工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到1990年底，4个经济特区共签订外商投资合同（协议）近6700项，协议外商投资额累计达10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45.7亿美

元，占同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8%。

1984年中国政府在总结经济特区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准兴建大连、秦皇岛、宁波、青岛、烟台、湛江、广州、天津、南通、连云港、福州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便“大力引进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出口创汇，向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① 1986年国务院又在上海批准建立虹桥、闵行两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6年国家批准实施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又批准实施高技术产业开发计划(火炬计划)，并于1988年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同年又在上海市原漕河泾仪表电子工业区和微电子工业区、生物工程基地的基础上，建设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中国经济经过1989和1990两年的治理整顿，1991年转入复苏和快速发展阶段，各类开发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①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置2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14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带(表141)。②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温州、昆山、营口、威海及福建的融桥、东山等6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广州、张家港、海口、厦门、福州、宁波、青岛、汕头等9个保税区。这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也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

①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座谈会纪要》，1983年。

带。③1993年国务院又批准沈阳、哈尔滨、长春、武汉、重庆、杭州、芜湖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2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中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12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④1994年国务院又新批准建设苏州中新工业园和北京、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外，1992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房地产市场的发育相伴，在全国兴起各类“开发区热”，根据各地区清理的情况估算，省级开发区超过300个以上(表142)。

表141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布表(1994年)

地理区	数量(个)	%	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部沿海	26	81.25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⑤、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②、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①、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①、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①、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④、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③、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①、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①、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③、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①、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①、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⑤、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①、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③、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④、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①、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⑤、(福清)融桥经济技术开发区⑤、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①、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①、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部地区	4	12.5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④、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④、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④、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④
西部地带	2	6.25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⑤
合计	32	100	

说明:①为1984年设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②为1986年设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③为1992年设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④为1993年设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⑤为1994年设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表 142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布表(1994 年)

地理区	数量(个)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东部沿海	30	57.69	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市南湖科技开发区*、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科技工业园区*、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厦门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科技工业园*、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南国际工业园区*
中部地带	13	25.00	包头稀土高技术开发区、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襄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西部地带	9	17.31	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合计	52	100	

* 为第一批(1991 年)设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国经济开发区建设经过 10 年的发展,已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逐渐推进。至 1994 年底,全国共兴建国家和省市批准的开发区 700 多个,其中国家级的经济特区 5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32

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2个，保税区13个，国家旅游度假区11个，其中100%的保税区和几乎100%的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表143、表144)。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带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正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加快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表143 中国保税区分布表(1994年)

地理区	数量(个)	%	保税区
东部沿海	13	100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口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青岛保税区、宁波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深圳沙头角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广州保税区、汕头保税区、海门保税区

表144 中国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布表(1994年)

地理区	数量(个)	%	国家旅游度假区
东部沿海	11	91.7	上海横沙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广州南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北海银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青岛市老人国家旅游度假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西部地带	1	8.3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
合计	12	100	

三、中国城市开发区区位分析

（一）城市开发区的宏观集聚趋势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国家大中城市主要分布区，它既是国家高、精、尖、新产业和产品的聚集区，也是中国将创新成果和引进技术有计划地向内陆、沿边地区扩散的理想场所。因此，从总体上讲，这一地区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的趋势；而对每一个大中城市而言，又都反映为明显的外向扩展的倾向。据109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区位分析，其中85个开发区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区，占78%。而且50.5%的开发区设置在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地区，37.2%设置在20～100万人口的大中城市地区，仅12.3%设置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尤其上海市集中了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保税区和1个旅游度假区，经济空间集聚，用地空间扩展的现象尤为突出。此外，广州、大连、青岛、天津、苏州、福州、深圳、海口、杭州也具有明显的集聚趋势（表145）。

从不同类型开发区的区位选址过程看，也反映了经济开发区向大中城市地区的集聚倾向。

中国在1980年兴办经济特区之初，把特区想象为一个全封闭式管理的区域。因此，特区的选址都在小城市、小城镇，或者城市边缘易于隔离的地区。深圳经济特区原为深圳市的一部分，总面

表 145 中国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与城市规模分布

省市区	城市规模分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保税区	旅游度假区	合计
	100万人以上	50～100万人	20～50万人	20万人以下					
北京	北京				1	1			2
天津	天津				1	1	1		3
河北	石家庄					1			1
			保定			1			1
辽宁	大连				1	1	1	1	4
	沈阳				1	1			2
			营口		1				1
	鞍山				1	1			2
上海	上海				3	1	1	1	6
江苏	南京					1			1
		苏州			1	1		1	3
		无锡				1		1	2
		常州				1			1
				昆山	1				1
				张家港			1		1
浙江		宁波			1		1		2
			温州		1				1
	杭州				1	1		1	3
				萧山	1				1
福建		福州			1	1	1		3
				东山(县)	1				1
				福清	1				1
			厦门			1	1		2
				湄洲岛				1	1
				武夷山				1	1
山东			烟台		1				1
	青岛				1	1	1	1	4
				威海	1	1			2
	济南					1			1
			潍坊			1			1
	淄博					1			1

续表

省市区	城市规模分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保税区	旅游度假区	合计
	100万人以上	50～100万人	20～50万人	20万人以下					
广东	广州				2	1	1	1	5
			湛江		1				1
			惠州		1	1			2
			中山			1			1
		深圳				1	2		3
			佛山			1			1
			珠海			1			1
		汕头					1		1
				南沙	1				1
广西			桂林			1			1
		南宁				1			1
				北海				1	1
海南			海口			1	1	1	3
山西	太原					1			1
内蒙古	包头					1			1
吉林	长春				1	1			2
	吉林					1			1
黑龙江	哈尔滨				1	1			2
		大庆				1			1
安徽			芜湖		1				1
		合肥				1			1
江西	南昌					1			1
河南	郑州					1			1
		洛阳				1			1
湖北	武汉				1	1			2
			襄樊			1			1
湖南	长沙					1			1
			株洲			1			1
四川	成都					1			1
	重庆				1	1			2
			绵阳			1			1
贵州	贵阳					1			1
云南	昆明					1		1	2
陕西	西安					1			1
			宝鸡			1			1
甘肃	兰州					1			1
新疆	乌鲁木齐				1	1			2
合计	29	11	18	10	32	52	13	12	109

积 327.5 平方公里。深圳市的前身则是广东省宝安县,1979 年 3 月撤县改市,1982 年全市总人口才 33 万人,其中特区人口不足 10 万。珠海经济特区 1980 年正式设立时,所属范围大部分还是未经开发的土地。汕头经济特区是由在汕头市边缘新划出的两个加工区组成的,是当时几个经济特区城市依托条件最好的。厦门经济特区则是在厦门市以外、厦门本岛西北部湖里地区开发 2.5 平方公里,兴办的出口加工区(图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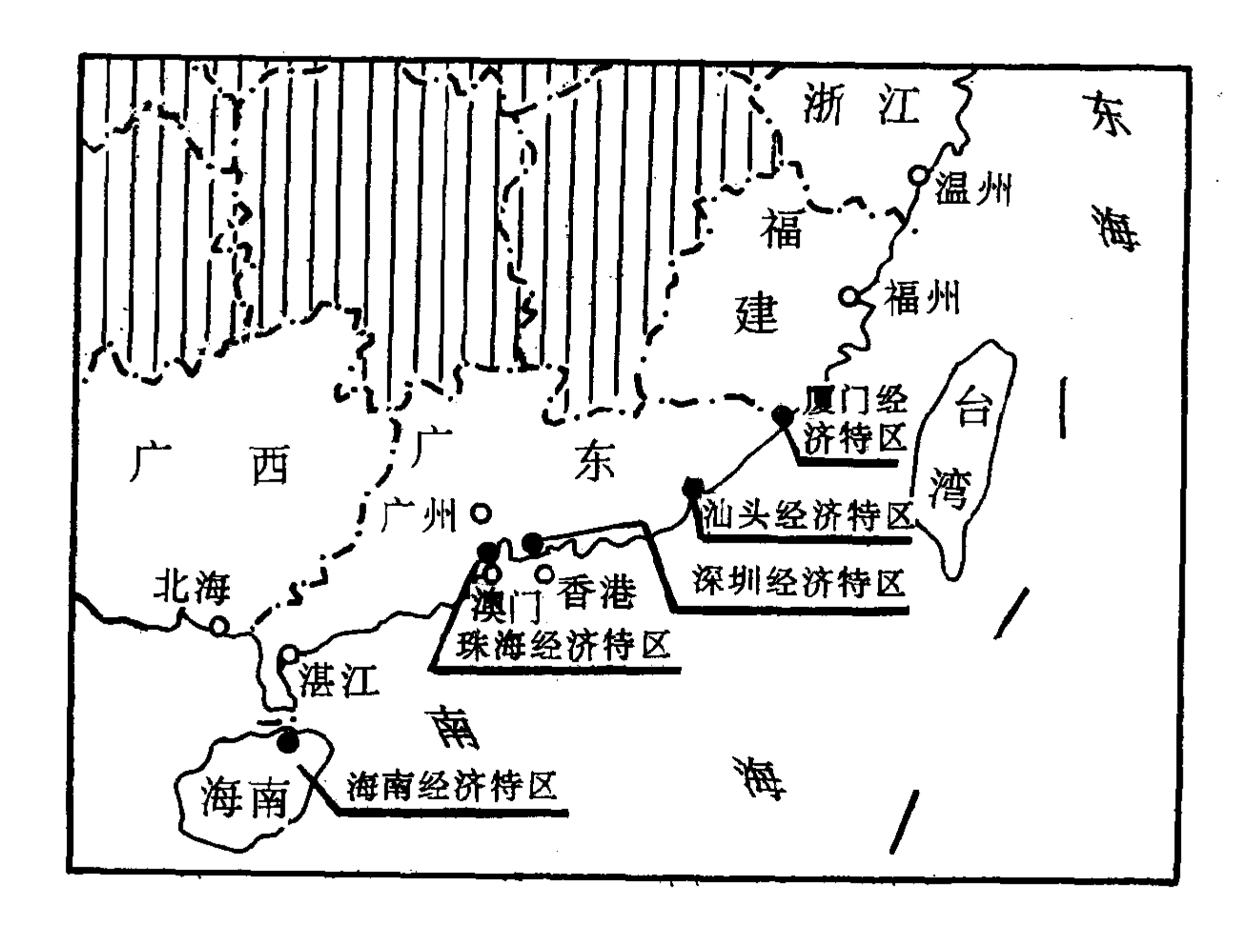


图 63 经济特区与城市区位关系图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选址,开始时曾受经济特区模式的影响,1984 年设置的第一批 1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都选址在远离老城区、与原有港区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地方。它们一般距城市

十多公里到数十公里，青岛经济开发区与市区陆路距离达百多公里。由于这些开发区远离老城区，大部分开发资金都投入到基础设施和银行、税务等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设施中，使得开发费用过高，流动资金缺少，且短期内大量收回投资无望。此后不久，国家很快认识了这些问题，及时地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选址进行了调整，1986 年设置的上海虹桥开发区距市中心仅 6.5 公里，闵行开发区距市中心也只有 30 公里，且紧靠闵行机电工业老区，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工业基地中已建成的电厂、水厂、污水处理厂、电话分局等市政基础设施。这种模式设置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也保持了与原有城市经济的密切联系，为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创造了更大的发展余地。

1991 年以后，中国又陆续设置了 52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其区位选址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同，在总体上都是依托城市布局。

中国的保税区区位选址一开始就曾设想依托城市现有基础，并建立完善的隔离措施，是一个具有一定范围的封闭式综合性对外开放区域。它们一般位于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如深圳的沙头角和福田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都位于经济特区内，而大连、广州、福州等市的保税区都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天津港口保税区则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毗邻。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开发区区位不仅表现为向东部沿海地带和大中城市地区的集聚趋向，而且与城市老区的关系也表现为：最初以孤立隔离发展为主，其后逐渐从远郊向近郊乃至城市边缘地带转移，说明中国现阶段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力大于扩散作用力，城市空间演化仍以外延扩展为主。

（二）城市开发区的微观扩散倾向

中国城市开发区中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主体，因此，它们的区位类型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大中城市的空间扩散形式。

1. 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类型

中国目前设置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其区位大体可概括为如下4种类型：

(1) 独立型

这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如青岛、天津、宁波、连云港、温州等经济技术开发区)远离城市区，有的甚至孤悬海岛，基本上不受中心城向边缘扩展的影响，发展的余地较大，但它们缺乏便利的水陆交通，对母城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依托很困难(图64)。如青岛市薛家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两片位于隔海相望的薛家岛，海上距离4.2公里，渡轮单程耗时50分钟，且每天只有两个班次，海上气候条件也并不理想，平均一年内有雾天将近40天左右，而构筑海底隧道或海上大桥其投资远远超过开发区和城市本身的能力。另一个例子是汕头经济特区，随着龙湖加工区的建设、南海石油基地的开发和特区建设的需要，汕头市又在与现在隔海相望的对岸新选择了广澳片开发区，两岸海上距离15～20公里，但要使两岸有顺畅的交通联系也并非易事。

(2) 远郊型

大城市的开发区一般都选择在卫星城附近，以期能依托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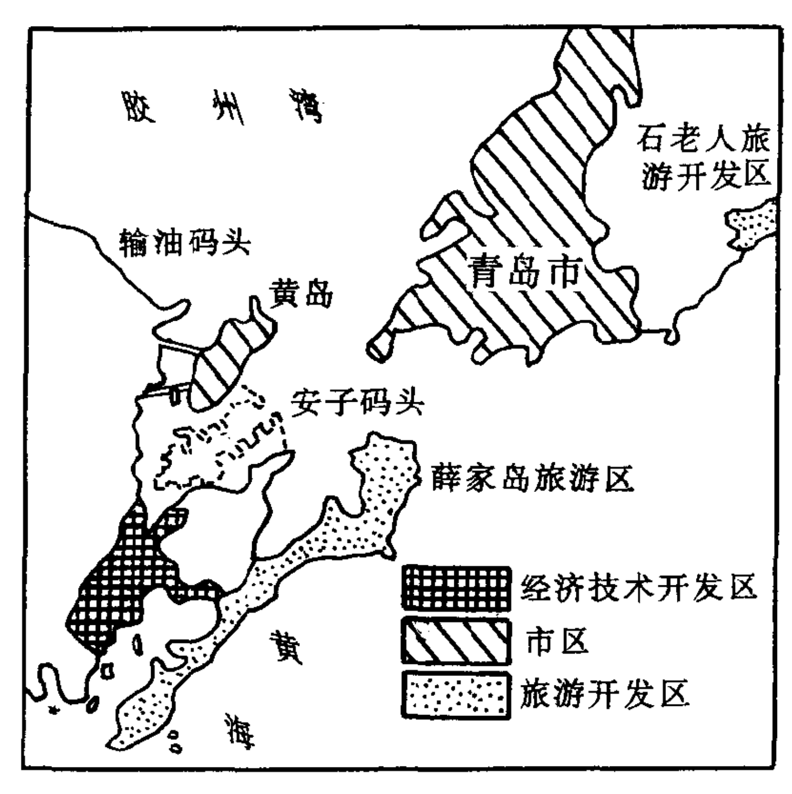


图 64　独立型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也试图通过开发区的兴建来增强卫星城的对外吸引力。这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如广州、大连、福州等开发区）与市区相距较远，但有相对发达的陆路交通与母城相联。这类开发区位居远郊，一方面，受母城服务半径和服务容量制约，依赖母城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程度比独立型大，但功能和效用仍相对不足（图 65）；另一方面，这类开发区的发展受地理环境和工程管网铺设技术的制约，同时又制约城市结构或其某一部分所必须进行的改造。

(3) 近郊型

这类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位居中等城市，在选址时，由于其经济基础、技术力量、原有城市基础设施水准较低，许多城市没有机场和港口，铁路运力不足，公路等级低，但城市周围的用地条件可选择性大，使得中等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选址时尽可能不离开原来的城市太远，而与中心城保持良好的联系和方便的依托关系。这类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秦皇岛、烟台、汕头龙湖加工区和厦门湖里加工区等。它们毗邻市区，交通便利，开发区的公共交通、邮

电通讯、能源、给排水、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以及行政管理、商业、外资、金融、咨询、宾馆、旅馆、办公楼、医院、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系统，完全依托母城。这类开发区的位置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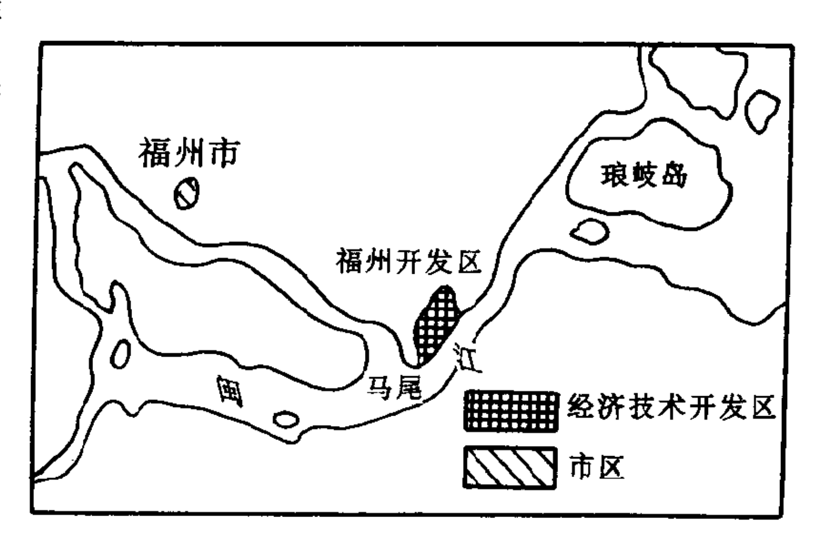


图 65　远郊型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有中心城较接近，受中心城作用相对较大，并且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可能对城市本身的发展有些影响。但由于其依托对象是较强的中心城，所以对开发区的发展比较有利，城镇居民也较容易和方便地进入开发区就业和定居，开发区与中心城之间往返联系也较快捷(图 66)。

(4) 市区型

有些城市受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再加上原有中心城本身尚有较大的发展余地，所以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时就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根据外商的投资意向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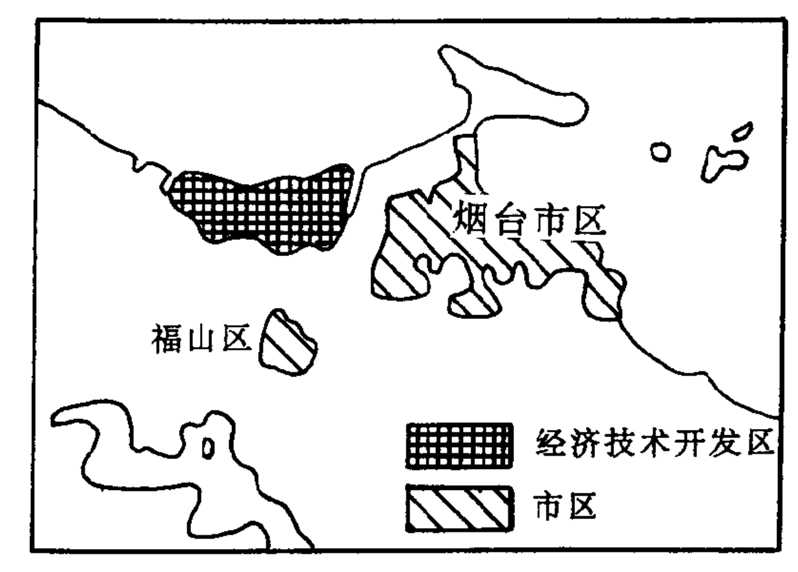


图 66　近郊型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体选择，提供适宜的用地，如湛江、北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图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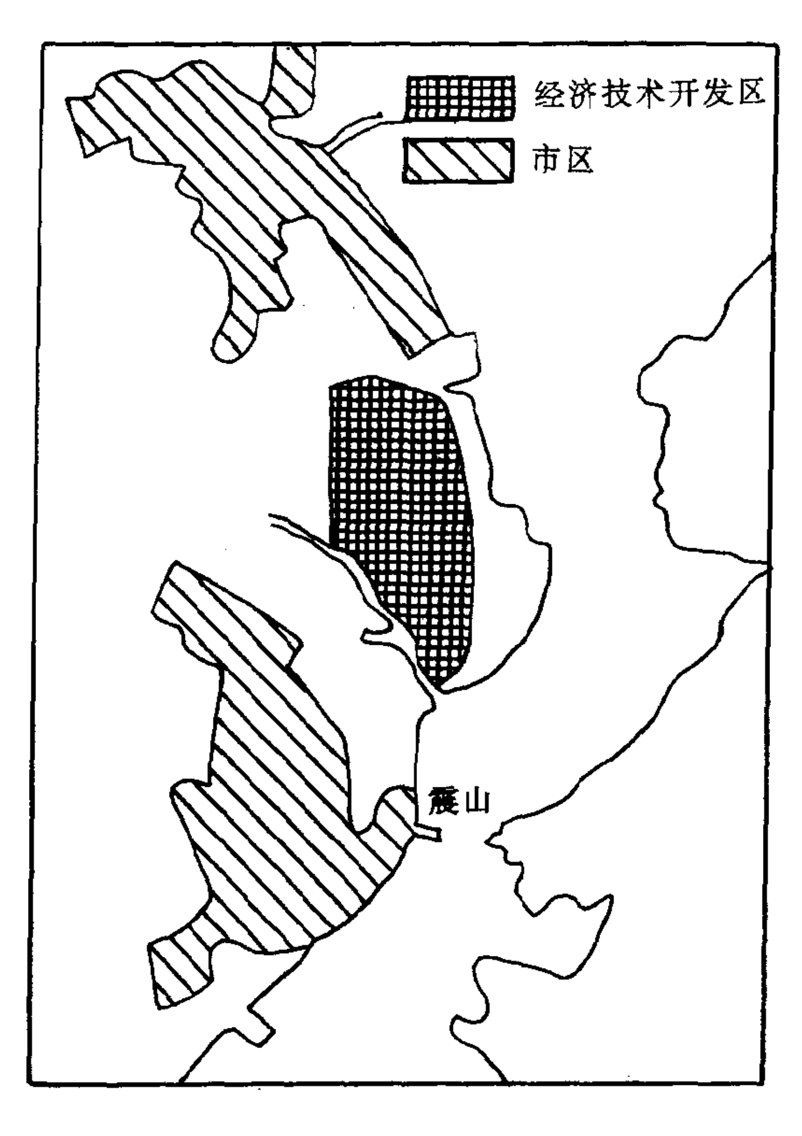


图67　市区型经济技术开发区

概观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类型以远郊型为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①开发区开办之初曾有过实行全封闭管理的设想；②开发区规模偏大，一般用地7～8平方公里，多则20～30平方公里，原有城市用地难以合理安排；③城市现有基础设施的能力远不能满足开发区建设的需要；④以建新城区为主。正因为如此，它们一般均耗资大，建设慢，很难迅速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反之，如果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偏小，依托老城布局在近郊区，则能达到投资省，建设快，收益高的目的。

2. 高新技术开发区区位类型

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总体上布局在城市边缘地带。其具体区位具有多种形式：

(1) 依附城市科教文化区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选址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大学密集的中关村科技文化区，这里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科教文化中心（图68）。石家庄、济南、武汉东湖、兰州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都是依靠城市的文教科研区而逐渐形成的。

(2) 依附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深圳科技工业园位于深圳经济特区西部，东与沙河华侨城相邻，西连深圳大学，北靠北环路，南濒深圳湾，深南大道横贯园区中部，与市区相距15公里，与蛇口港相距8公里，有城市依托，与大学相邻，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图69）。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由凌水科技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和黄河路科技一条街三部分组成。厦门、海南、福州等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是在经济特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界定出高新技术开发区，利用已享受的优惠政策，更有利于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到开发区建厂。

(3) 依附大工业区

这种类型是依托国防工业以及城市原有的一些先进工业基地、高新技术企业，以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兴建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上海漕河泾就是在原漕河泾仪表电子工业区和微电子工业区、生物工程基地的基础上建设的。

(4) 开辟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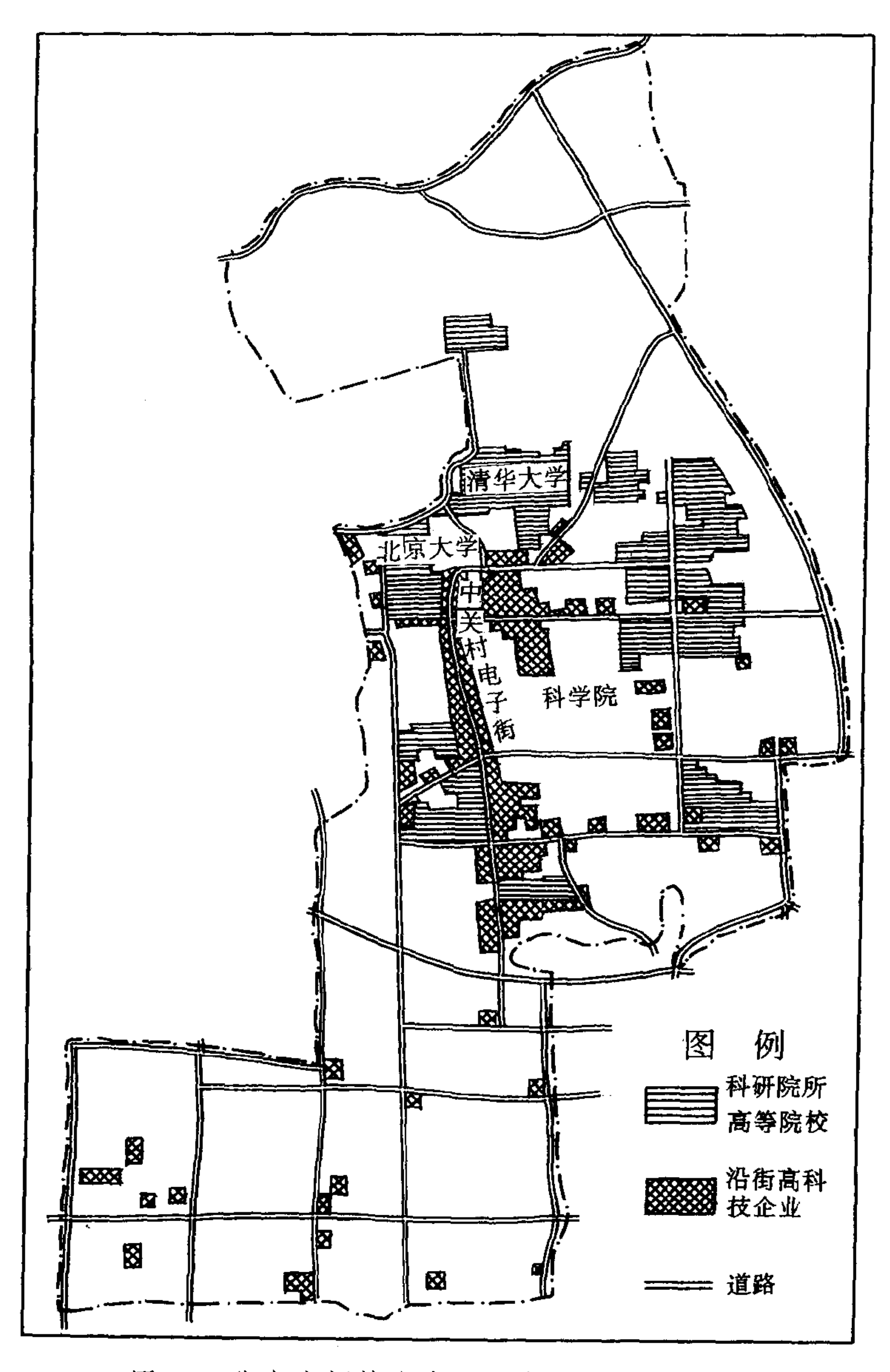


图 68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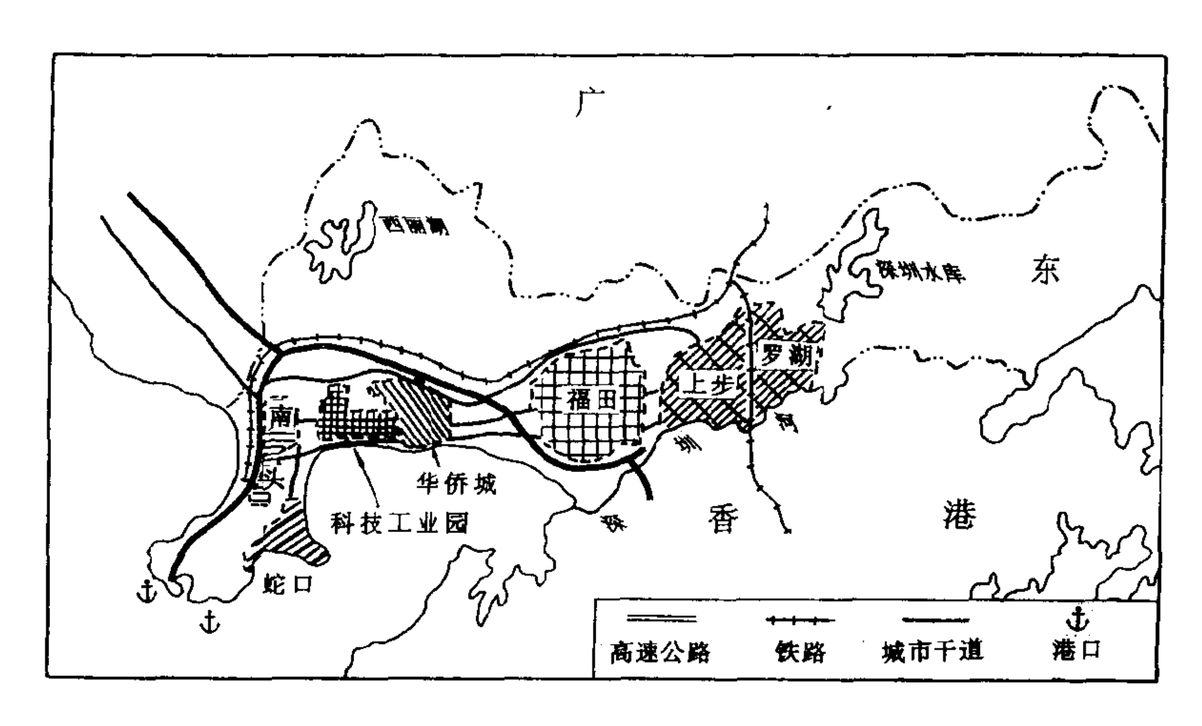


图 69　深圳科技工业园位置图

为了摆脱旧城的束缚，在城市边缘地带开辟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南京在浦口创办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大学分校，创办中试基地和高技术企业等。

3. 高新技术开发区用地组合形态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们的大多数在用地组合上都呈现为一区一园形态。少数高新技术开发区，由于用地和已有的基础，组建时呈现为一区二园或一区多园布局形态。

(1) 一区一园形态

这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依托城市科教文化区，或技术密集的工业区、科技街而形成。例如：①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就是依托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而形成发展起来的。②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虽选

址在西南部城郊结合部，近期发展也呈“一片三点”式布局，即以红旗大街为轴心的高新技术科研开发、生产、培训、服务综合基地“一片”和通信产业园区、微电子产业园区和核应用技术产业园区“三点”。③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城区东部，也按照“一片、一点、两条线”进行布局，“一片”指新建区科技城，“一点”为羊头峪中试基地和花园路、解放路两条科工贸一体化的科技街（图70）。④南京浦口高新技术外向型开发区结合南京的实际，避开了建筑密度饱和的城区，在江北浦口兴办全新的开发区，由科技教育区、纺织工业区、机电工业区、金融贸易中心、珍珠泉旅游区和现代化住宅小区共同组成，远期目标将建成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新城。⑤广州市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广州市东南部，包括了东部工业园区、东莞庄电子小区、赤岗工业小区、五山新材料小区、石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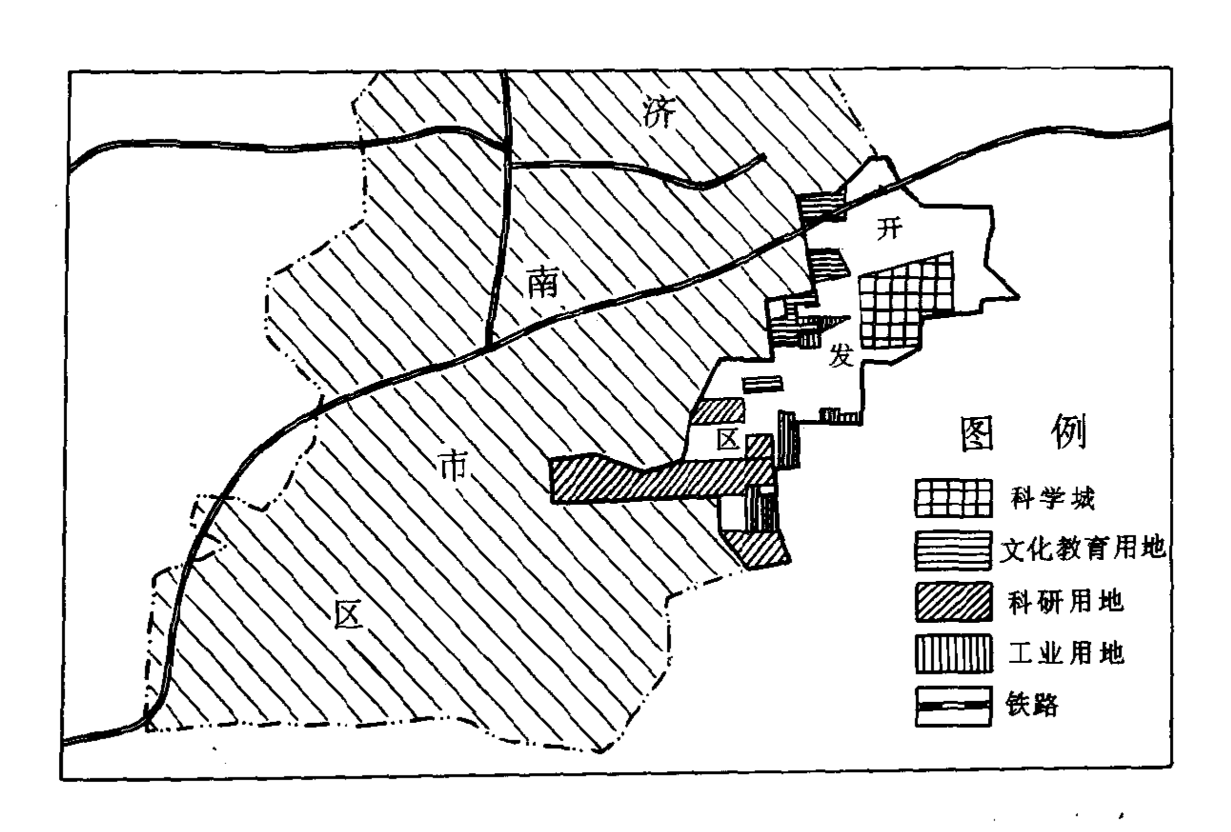


图70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地组合形态

生物小区和天河区五山路科技街，其中东郊工业园区又由科技开发服务区、新技术工业区、对外加工区和生产辅助区4个功能区组成(图71)。此外，威海、厦门、中山、深圳、海南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都是一区一园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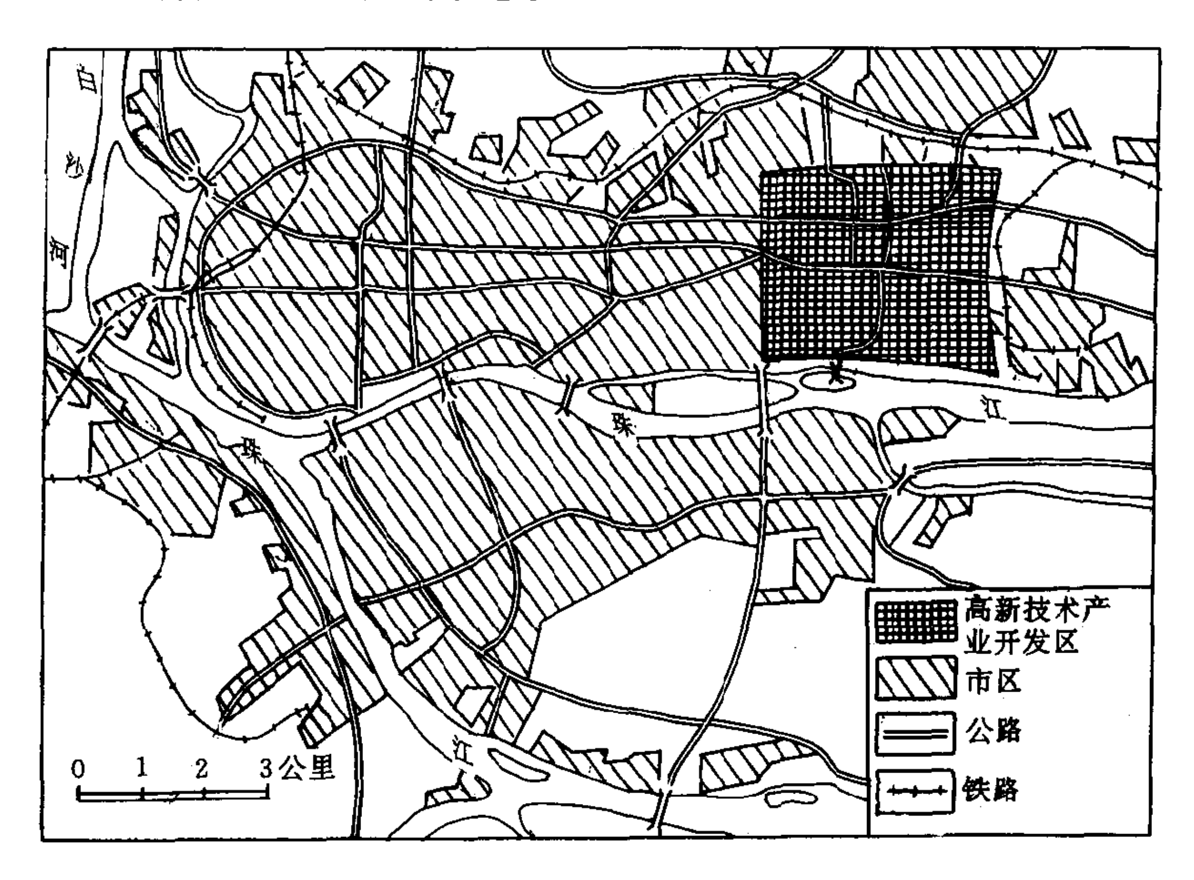


图71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区位图

(2) 一区多园形态

有些高新技术开发区考虑自然环境、工业基础等选择了这种布局形态。例如：①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为两大片、三个组成部分，即位于市区西南部的凌水科技产业园区、黄河路高新技术产业一条街和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马桥子工业园组成，其中凌水科技产业园区又分为凌水小区、黑石礁小区、星海小区、西山小区和七贤岭新区5部分(图72)。②天津新技术产业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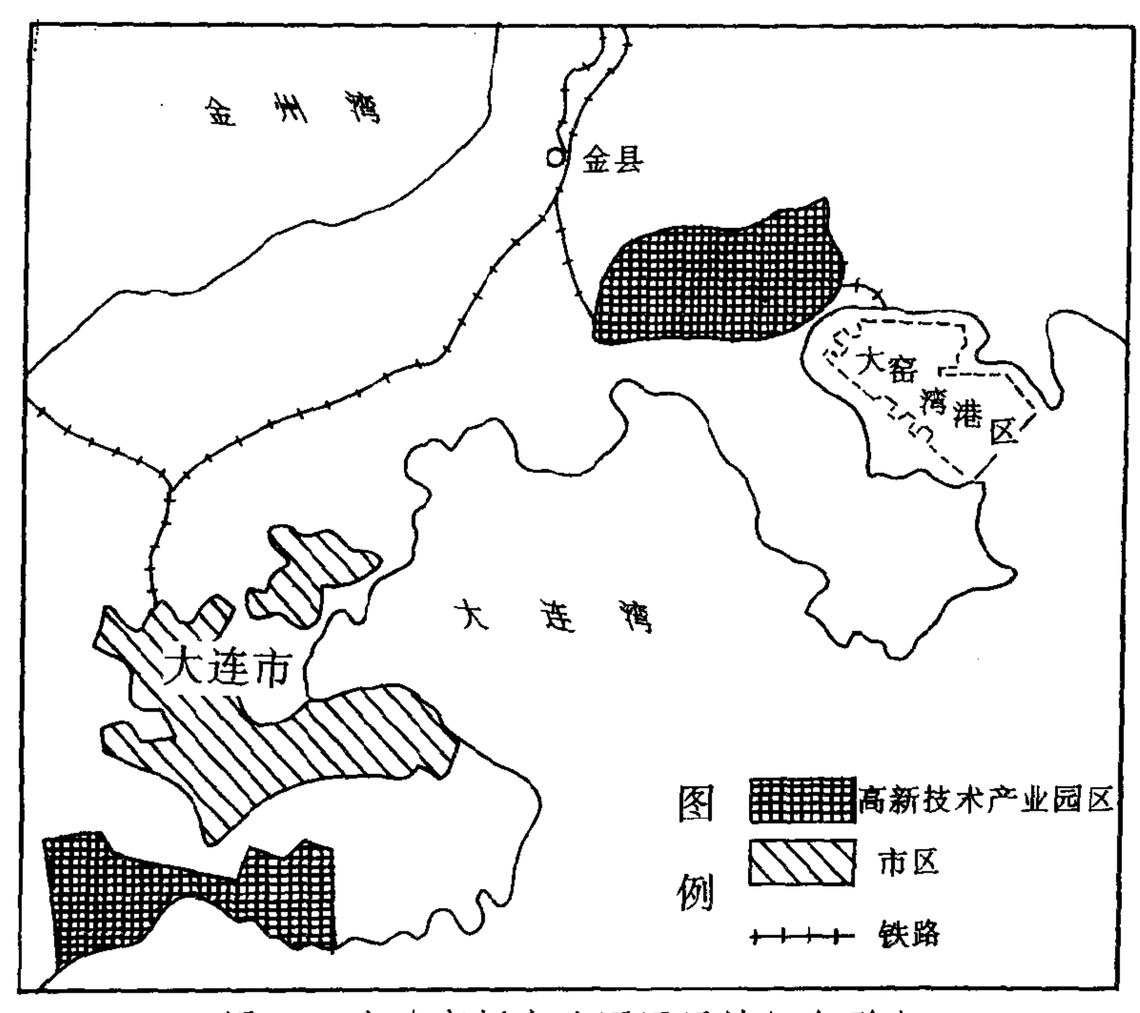


图 72　大连高新产业园区用地组合形态

区也由位于市区西南部的主体区、武清县杨村镇的武清高技术产业区和东郊程林庄化工区的卫国道中试区三部分组成(图 73)。③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 1986 年先行设置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1992 年建设浦东张江高科技园,所以在用地和空间上都表现为一区二园的形态。④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位于市区西北部的文教区和电子仪表工业区形成主区,以及位于钱塘江投资区内的下沙区和浙江农业大学校园三部分组成。主区建设又分为三园一街,即西斗门园、毛家桥园、葛家庄园和科技街(图 74)。

四、中国城市开发区开发规模

城市开发区开发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中心城市向外扩散的能力和范围。中国城市开发区规模,从几平方公里到数十平方公里不等,按规模大小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

(1) 小型

其规模一般不超过5平方公里,以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区为主(表146),用地规模不大,所需资金相对较小。小型开发区主要依托于大中城市,与开发所提供的资金能力相适应,使建设的周期缩短,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成,形成较完善的投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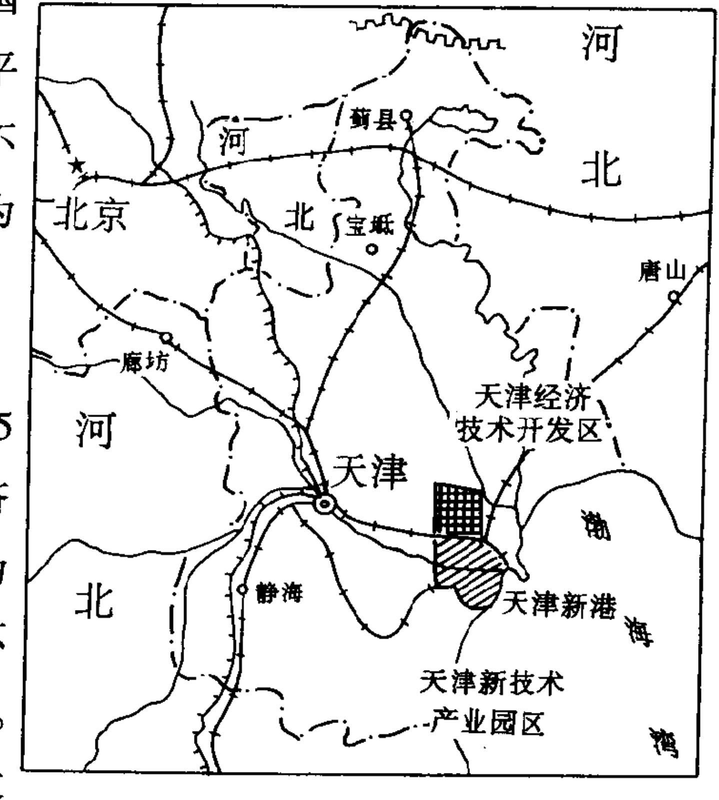


图73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区位图

(2) 中型

其规模在5～15平方公里之间。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般规定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左右,起步区面积1～3平方公里。这类开发区如烟台、宁波、青岛、湛江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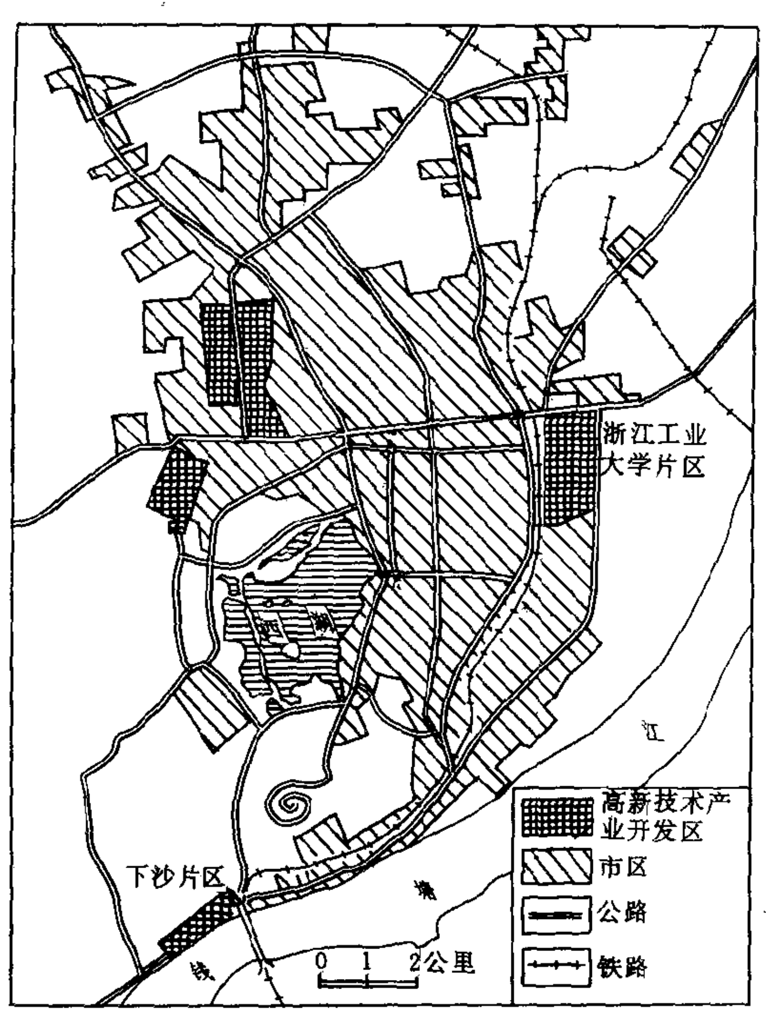


图 74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地组合形态

桂林等高新技术开发区(表 147)。它们大多数以大城市为依托,具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当一期开发面积完成后,有充裕的发展余地,能够成片滚动开发,较之小型经济开发区具有一定的弹性。

(3) 大型

其规模一般在 15～30 平方公里。大连、连云港、温州、福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威海、长沙、中山等高新技

表 146 小型开发区与城市规模关系

城市规模	数量(个)	%	保税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100 万人以上	12	54.5	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口、大连、青岛、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广州	上海虹桥、上海闵行	郑州、深圳、兰州
50～100 万人	4	18.2	宁波、福州、汕头		福州
20～50 万人	6	27.3	厦门象屿、海口	秦皇岛、南通	厦门、海南
合计	22	100.0	12	4	6

表 147　中型开发区与城市规模关系

城市规模	数量(个)	%	保税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100 万人以上	3	37.5		青岛	大连、杭州
50～100 万人	2	25.0		烟台、宁波	
20～50 万人	2	25.0		湛江	桂林
20 万人以下	1	12.5	张家港		
合计	8	100.0	1	4	3

术开发区都属于此类。另外，汕头特区龙湖片的面积也在这一范围内(表 148)。这些开发区大多依托 100 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当然这些开发区均需较长的形成期。

表 148　大型开发区与城市规模关系

城市规模	数量(个)	%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100 万人以上	15	71.4	大连、广州	石家庄、长春、南京、济南、长沙、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
50～100 万人	2	9.5	福州	合肥
20～50 万人	3	14.3	连云港、温州	中山
20 万人以下	1	4.8		威海
合计	21	100.0	5	16

(4) 超大型

其规模超过 30 平方公里，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深圳、厦门、珠海、汕头、海南经济特区，还有近年来出现的综合开发区如上海浦东、苏州中新工业园等，以及在天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连新市区、天津滨海新区

等,它们的规模都已经相当于中等城市。这类超大型开发区大都依托于特大城市(表 149)。

表 149　超大型开发区与城市规模关系

城市规模	数量(个)	%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开发区	经济特区	综合开发区
100 万人以上	6	60.0	天津	北京	深圳	上海、天津、大连
50～100 万人	2	20.0			汕头	苏州
20～50 万人	2	20.0			珠海、厦门	
合计	10	100.0	1	1	4	4

中国经济开发区设置之初,用地规模一般都在 20～30 平方公里,但一般依托中小城市,城市的扩散能力不强,连片开发缓慢,中央政府及时地对经济开发区的用地规模进行了调整,规定规划面积 10 平方公里左右,起步区面积 1～3 平方公里。90 年代以来,以上海浦东为代表的综合开发区出现,其开发规模扩大到 100 平方公里左右,有的甚至超过了 200 平方公里。如上海浦东开发面积 200 平方公里,港口、工业、贸易、金融、房地产业及其它第三产业全面综合发展,基础设施齐全,预计人口规模将达 250 万以上,是上海的一个新市区。厦门的海沧开发区面积达 80～100 平方公里,珠海的西区达 448.8 平方公里、苏州中新工业园为 70 平方公里,它们都是在城市外围新发展的大型综合开发区。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几种类型开发区连片开发形成城市新区的现象,如天津滨海新区等,表明中国大中城市外向扩展作用正在逐渐增强。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开发区根据它们的具体要求,并结合城市的具体条件进行选择,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地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环境质量要求高,对科研开发依赖性强,一般设在科研单位

和高等院校聚集区和环境质量好的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是发展加工业,对环境质量要求不高,一般设在城市近郊和市区边缘地带。保税区重点发展转口贸易,则设立在海陆交通方便,对外联系通畅的沿海港口城市或沿边城市。从总体上讲,国家经济在空间上呈现出向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区,尤其向大中城市地区集聚的趋势,而对特定的大中城市而言,又都明显反映了外向扩散的倾向。这种集聚和扩散作用相辅相成,向大中城市地区集聚作用力愈大,大中城市地区外向扩散的范围也愈大。

第二十五章　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对中国的经济及城市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城市与世界经济体系结为一体。80年代中国经验证明,仅靠国内市场的增长不能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海外投资和先进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有利于提高中国城市的生产技术,并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中国的计划经济正在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开放政策也涵盖了两方面:一是地理位置方面,一是经济结构方面。在地理位置方面,外资最先投资在4个经济特区内,之后逐渐扩展到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济结构方面,外资是最先投资在制造业,之后拓展到房地产业,现在又进一步扩展到第三产业的百货商店及银行等部门。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在1978～1990年期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14.3%,堪称亚洲乃至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此高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经济改革和逐步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沿海省份由于地理区位的优势,经济增长要比内地省份迅速得多。中国的开放政策一方面让沿海地区发挥地理优

势先富起来,然后再由沿海地域向内地省区扩展;另一方面,通过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发展。

一、中国开放政策与引进外资

勿庸置疑,外资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首先,1979年中国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城市)——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如前章所述,经济特区是在严格界定的区域内为了吸引外国资本、企业及科技而划定的,目标是生产出口产品以赚取外汇。同时,特区也是中国城市改革的经济实验室,在此可以吸收外国的技术及管理经验。另外,特区对外资提供优惠,诸如享有免税期、利润能较早汇回本国及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试验的成功,以后发展成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其次,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这些沿海开放城市尽管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对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开发的同样资助,但它们同样拥有与经济特区类似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第三,1988年国家又进一步开放3个"开放地带"——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上海周围地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广州周围地区)及闽南三角洲经济区(厦门周围地区)(图75),以便将从特区的开放政策所得到的好处扩展至国内的其它地区。

由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沿海开放地带空间分布的不均匀,也导致了外资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的分布。外资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尤其是大城市周围,诸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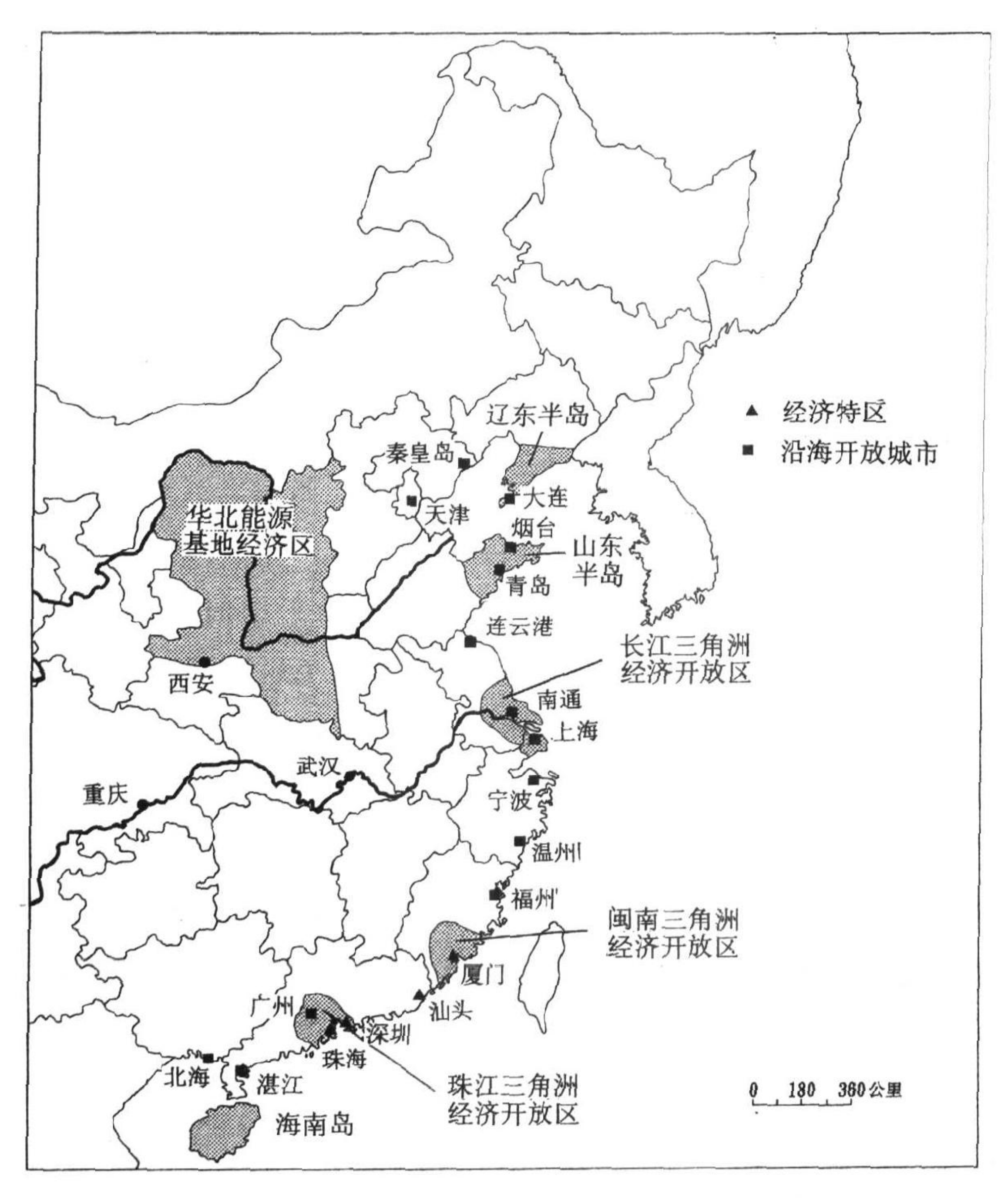


图 75 中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带

门经济特区。

（一）外资类型和结构

外资利用可作为克服城市财政短缺的一种手段，也成为改善中国的管理体制、提高生产效率及竞争力的一种方法。这不但可以通过出口赚取外汇，也可以增加就业和促进早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外资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存在的外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合资经营

外方及中方合作者以约定比例的资金入伙，共同投资及承担风险，按照公平的股本比例分享利润及损失。这是中国较推崇的投资形式。

(2) 独资经营

完全拥有的外资公司的子公司及完全拥有的外资公司可以在中国开设公司。在约定的时期内，投资者对其资本、投入、市场风险及管理负有全责。课税后的利润可以携出中国。

(3) 合作经营

中国的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及劳动力，外国企业提供设备、资本及专业技术。投资期要比以上的方式短，一般 5～7 年。这种方式由于其灵活性及周期短深受外资欢迎。

(4) 合作开发

这种合作方式常见于合作勘探海上石油。在勘探及开采两个阶段，中方和外方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例如在勘探阶段，财政及其它风险由外方承担，在开采阶段双方共同负责。

(5) 补偿贸易

外国企业以提供机器设备、工业技术知识、专利、各种服务、培训人员等作为贷款，待项目投产后，进口方以该项目的产品或双方议定的其它办法清偿贷款。这是类似于实物交易的贸易形式，但是这种以产品支付报酬的形式包括支付最初的风险或提供的设备。中国政府常采用这种形式，因为它可避免支付大量外汇。

(6) 其它投资形式

有对外加工装配，即“三来”工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由外商提供原材料，为外商加工成为产品，中国企业收取加工费。

表150　1979～1989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

（以百万美元累计）

外资类型	1979～1989年	类型比例（%）	占总数比例（%）
外国贷款：			
1. 外国政府贷款	8370.7	21.3%	
2. 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6059.7	15.4%	
3. 出口信贷	2940.9	7.5%	
4. 外国商业银行贷款	16987.9	43.2%	
5. 其它	4962.5	12.6%	
外国贷款总额	39321.7	100.0%	68.2%
外资：			
1. 合资经营	7310.7	47.2%	
2. 合作经营	4754.0	30.7%	
3. 独资经营	749.4	4.8%	
4. 合作开发	2679.6	17.3%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15493.7	100.0%	26.9%
其它外资：			
1. 补偿贸易	1687.3	60.1%	
2. 其它	1121.5	39.9%	
其它外资总额	2808.8	100.0%	4.9%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57624.2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自执行开放政策以来，在1979～1989期间，中国利用了576.24亿美元的外国资本(表150)，其中68.2%是以外国贷款，26.9%是外国直接投资，4.9%是诸如补偿贸易等其它外资形式。外国贷款中以外国商业银行贷款居首位，其次是外国政府的贷款。外国直接投资中主要是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它们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77.9%。

从外国和港澳贷款及直接投资的来源上看，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表151)。1989年，日本及世界银行的投资占外国及港澳台贷款总额的57.6%，香港占外国及港澳台直接投资总额的半数以上。跨国公司的投资所占比例很少，多见于沿海石油开采。来自亚洲的投资中，日本的投资主要是贷款，而香港则主要是直接投资。

表151 1989年在中国的主要外国及港澳投资者

(以总额超过5000万美元计)

国家(地区)及国际金融机构	总额(万美元)		(以百万美元计)外国贷款		外国直接投资	
日本	2951.3	30.5%	2595.0	41.3%	356.3	10.5%
香港及澳门	2648.7	27.4%	571.1	9.1%	2,077.6	61.2%
世界银行	1026.8	10.6%	1026.8	16.3%	0.0	0.0%
法国	794.7	8.2%	790.1	12.6%	4.6	0.1%
美国	390.0	4.0%	105.7	1.7%	284.3	8.4%
英国	374.0	3.9%	346.4	5.5%	28.5	0.8%
西德	234.2	2.4%	152.8	2.4%	81.5	2.4%
意大利	151.5	1.6%	121.2	1.9%	30.3	0.9%
瑞典	95.7	1.0%	92.4	1.5%	3.3	0.1%
新加坡	86.2	0.9%	2.0	0.0%	84.1	2.5%
总计	8753.8	90.4%	5803.4	92.3%	2950.4	87.0%
全部总额	9678.3	100.0%	6285.7	100.0%	3392.6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二）外资的空间分布

1978年以来，吸引外资的地区主要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其它被指明吸引外资的地区。

1. 经济特区

中国经济特区是出口加工区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们的产品多数外销。尽管它们有时吸引的不是先进的技术，而且40%的外资并非用于制造业而是用于旅游业及商业项目，但经济特区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实体和新兴的特区城市。

2. 沿海开放城市

1984年春季，中国宣布14个城市向外资开放。这些"开放城市"拥有类似经济特区的特权，也相继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很快被引向中国4个最大的沿海城市——上海、天津、大连及广州。虽然其它10个城市仍受到优惠，但相对而言，它们不可能达到4个主要沿海城市的同等发展速度。近年来，由于外资和技术的引进，这14个沿海开放城市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3. 其它地区

(1) 三角洲地区

1985年，3个"开放"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闽南三角经济开放区被划定。这些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拥有先进的通讯系统及良好的高等教育设施，有利于

进一步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最快的地区。

(2) **其它特别地区**

如中央政府放宽对广州、重庆、武汉、西安和大连等城市经济计划的管制，使这些城市能够更快地审批外资项目。

尽管外国及港澳投资者可以在中国大多数省份投资，但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开放经济区的设立，表明政府优先将吸引外资的重点放在这些地区。这些地区的聚集经济效益、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与外界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吸引外资，尤其是香港及东南亚华侨的资金。外资的空间分布以高度集中于沿海省份为特征，特别是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以及深圳和厦门经济特区城市。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也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外资有向内陆区域逐渐渗透的迹象，但是外资在大部分内陆省份的影响还很小。

香港及亚洲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与欧美的外资在区域分布上有显著的差别。来自香港及澳门的资金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及广东省和福建省，大多数东南亚的投资(主要是海外华侨)也集中在广东及福建，地理区位的接近及乡情的联系成为这些外资在投资地点决策中的重要因素。这些投资者尤其热衷投资于他们或他们的家族从前所生活的地区，比如广东和福建的小城镇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反地，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投资，则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大城市，例如北京、天津和上海，因为那里拥有较好的城市及工业设施。

二、外资对中国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

如上所述,外资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的中等城市(表152)。然而,从变化系数分析,外资在不同地区及不同规模的城市的投资呈现很大的变化(表153、表154)。外国国直接投资趋向于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大多数地区及城市的变化系数可高达300%。外资在小城市、中等城市及大城市的变化非常大,但是在特大城市相对变化较小,表明大多数的特大城市拥有较多的外资及较小的差异变化。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前20位城市占外国直接在中国城市投资总额的78.3%。并且,这些城市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大部分位于广东省,在前20位城市中有9座城市都在广东,它们占了前20位城市外资总额的52.59%,并占了中国城市外资总额的41.19%(表155)。

中国北部与南部的沿海城市,外国及港澳直接投资的来源也存在差异,这主要是与投资者的距离所致。以深圳和上海为例,深圳的投资主要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香港,而亚洲的直接投资很少在上海(表156)。1985～1989年间,深圳93%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于亚洲,其中85%来源于香港;而上海仅有52%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于亚洲,30.5%来源于亚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尽管香港仍是最大的投资者,但它仅占外国及港澳直接投资的34.7%。日本和美国在上海的投资高于深圳。

在外国及港澳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方面,深圳和上海也存在差异。在1985～1989年间,深圳75%的外国及港澳直接投资是

表 152 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额在城市规模与区域中的分布(1988 年,1990 年)

城市规模	外国直接投资(以千美元计)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		总计	
		1988	1990	1988	1990	1988	1990	1988	1990
小城市 <20 万人	平均额	84	5	88	140	1785	3531	776	1756
	1988 与 1990 平均额的差距	-79		52		1746		800	
中等城市 20~50 万人	平均额	8	286	1606	600	10347	13871	608	7700
	1988 与 1990 平均额的差距	278		-1001		3524		7092	
大城市 50~100 万人	平均额	0	0	122	2424	4966	10058	3666	7790
	1988 与 1990 平均额的差距	0		2302		5092		4124	
特大城市 >100 万人	平均额	11973	3879	3386	4416	38268	44370	26405	28782
	1988 与 1990 平均额的差距	-8094		-1030		6102		2377	
总计	平均额	852	347	587	512	7588	10364	3965	5289
	1988 与 1990 平均额的差距	-505		75		2776		1324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9 年,1991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153 中国城市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1990 年)

(以千美元计)

区 域	总 额	百分比(%)	平均额	标准差	变化系数	城市数目
东部沿海地区	2362930	95.7	10363	34982	337.6%	228
中部地区	74780	3.0	512	1608	314.1%	146
西部地区	32350	1.3	347	1291	372.0%	93
总 计	2470060	100.0	5289	24937	471.5%	467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版。

表 154 外国直接投资的城市规模分布(1990 年)

(以千美元计)

城市规模	总额	百分比(%)	平均额	标准差	变化系数	城市数目
小城市	458750	18.6	1576	9762	619.4%	291
中等城市	900930	36.5	7700	35589	462.2%	117
大城市	218120	8.8	7790	19073	244.8%	28
特大城市	892260	36.1	28782	52735	183.2%	31
总 计	2470060	100.0	5289	24937	471.5%	467

资料来源:同上表。

表 155　外国直接投资前 20 位的城市(1990 年)
(以千美元计)

城市	城市规模	外国直接投资
深圳 *	中等	349200
大连	特大	200750
上海	特大	177190
惠州 *	中等	140230
广州 *	特大	117010
北京	特大	105760
东莞 *	中等	100100
天津	特大	83150
汕头 *	大	81970
佛山 *	中等	79230
海口	中等	73880
厦门	中等	72730
福州	大	65100
珠海 *	中等	62190
南京	特大	57350
中山 *	中等	53280
青岛	特大	30960
江门 *	中等	28340
沈阳	特大	27470
莆田	小	22720
外国直接投资前 20 位城市总额		1934610
全中国城市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2470060
前 20 位城市占全中国城市总额的比例		78.32%
前 20 位城市中广东省城市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1017550
广东省城市占前 20 位城市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		52.59%
广东省城市占全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		41.19%

说明:* 位于广东省的城市
资料来源:同上表。

投资在工业内,而上海仅有 44.2%(表 157)。上海房地产业的外国及港澳直接投资则高于深圳。这主要是决定于香港的外资的性质。来自香港的外资一般是香港小型工业的海外加工,这些小型工业虽然数量多,但每个工厂的资本小,主要是利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的廉价劳动力及土地,生产对外出口的产品。

外国及港澳投资来源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不尽相同。来自

香港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南部的沿海省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它们在乡镇的投资不断增加，一般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农村地区。相反，大多数来自日本及其它国家的投资则分布在城市，而较少在乡镇内。

表 156　深圳、广东与上海的外国及港澳直接投资来源比较（1985～1989 年）

单位：%

国家或地区	深圳	广东	上海	全国
香港	85.0	87.2	34.7	61.5
日本	5.6	3.2	12.6	12.7
台湾	1.0	0.7	0.0	0.0
新加坡	1.2	0.9	5.4	1.2
泰国	0.3	0.2	0.0	0.4
韩国	0.0	0.0	0.0	0.0
菲律宾	0.0	0.0	0.0	0.1
亚洲主要国家（地区）总额	93.0	92.3	52.7	75.9
美国	6.0	4.0	23.7	11.2
加拿大	0.3	0.4	2.5	0.3
英国	0.1	0.1	2.4	1.3
法国	0.0	0.2	0.0	0.9
德国	0.2	0.1	1.6	1.1
瑞典	0.0	0.0	0.0	0.1
丹麦	0.0	0.0	0.0	0.3
澳大利亚	0.2	0.8	0.4	1.1
亚洲以外主要国家总额	6.9	5.6	30.5	16.4
其它国家	0.1	2.1	16.8	7.7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占全国总额的比例	10.2	29.3	10.2	
外资额（以百万美元计）	1332.3	3840.2	1328.2	13099.7

表 157　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1985～1989 年)

单位:%

	深圳	广东	上海	全国
1. 农业	0.5	2.5	0.3	2.9
2. 工业	75.3	76.0	41.6	55.1
3. 地质勘探	0.0	0.2	0.0	3.1
4. 建筑业	2.9	2.3	0.6	2.2
5. 交通/电讯	3.5	2.6	0.3	1.7
6. 商业	3.7	2.4	0.5	5.1
7. 房地产	12.4	12.8	48.9	24.1
8. 卫生与体育	0.1	0.1	0.0	0.5
9. 教育与文化	0.1	0.1	0.0	0.4
10. 科学与研究	0.0	0.0	0.0	0.1
11. 财政与保险	0.0	0.0	0.0	0.6
12. 政府部门	0.0	0.0	0.0	0.0
13. 其它	1.5	0.9	7.8	4.2
14.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三、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由于外资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的大城市,尤其在广东,所以外资在各个城市的影响主要是由吸引外资的水平而定。外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投资环境的改善

4 个经济特区最早定位以利用外资来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经济来源。深圳除了给予外资特惠的待遇外,另一最重要的经验是

以提供土地及基础设施来吸引外资,即所谓的"五通一平"——通路、通讯、通水、通电、通航以及平整地基。这是深圳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深圳的经验已被运用到中国其它城市的发展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它希望成为长江三角洲的另一个深圳。但是这种以提供土地及基础设施来吸引外资的深圳经验,经常被运用到其它希望吸引外资的城市,常常对城市环境造成明显的破坏。

2. 土地批租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增加

外资除了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及介绍新的技术以改善城市的工业结构外,它们还提供相当可观的资金以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利用外资作为城市发展的资金,于 1987 年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后愈显重要。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土地从无偿使用转为有偿使用,而且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及出售。土地使用费最初主要是对涉及外资的土地使用收费。在深圳,每年的土地使用费是根据使用的类型、区位及租用期而定的。最便宜的土地使用费是吸引外资发展工业的工业用地,旅游及商业用地收费最高,教育、文化、科研、技术、医药、健康及公用设施用地可享有优惠待遇,有最先进科技的项目以及非牟利的项目可以免收土地使用费。

土地批租的收入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的资金来源,使之有较多的资金投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实行土地批租,BOT(建设、运作、转让)是当前增加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经费的趋势。如北京、上海等城市以此来吸引外资进行城市更新及地铁建设。土地有偿使用也为城市政府提供了一种新的税收来源,而这在过去土地无偿使用期间是不可行的。在海南省,从房地产市场获得的收入高达税收

总额的 1/4。这些税收可用来改善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许多城市,例如广州,利用土地有偿使用来资助城市地下铁路系统的建设,开发商被允许在地铁站的上方开发住宅及商业设施,而从此得到的利润被用来资助地铁建设的部分费用。

3. 商品住宅及新社区形成

新的"住宅商品化"政策在 1982 年逐渐实施,从而导致全国范围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即"购买者"可以获得房屋的使用权。住房商品化的措施旨在建立一个有效益的住宅体制;减少那些能够买得起住房的人的住房津贴;增加兴建更多住宅的资金来源;将住宅纳入经济之中,使房地产业成为经济的一部分;通过住房所有者的良好维修以改善居住环境;根据收入、需求及偏爱提供住房的选择;根据不同地点土地经济价值的差异使得土地使用更趋合理。住宅商品化主要在大城市中实行,经济特区自然走在住宅改革的前列。

商品房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很不平衡。商品房的开发趋向于城市的边缘地区,因为那里的环境质量较高,征地建房也比较便宜和容易。旧城区的重新开发一般要比开发新区花费高,因为牵涉到原住居民的安置问题:旧城区内人口密度很高,重新开发时补偿给居民的费用高;旧城区有许多私人房产,土地较难征用且需更多的谈判。因此,商品房趋向成组集中在城市的一定地区,特别是城市边缘(图 76)。

商品房的划分是根据是否以外汇出售及住宅价格中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用。商品房的类型各个城市不尽相同。以上海为例,现有 4 种主要的商品房类型——一般商品房、侨汇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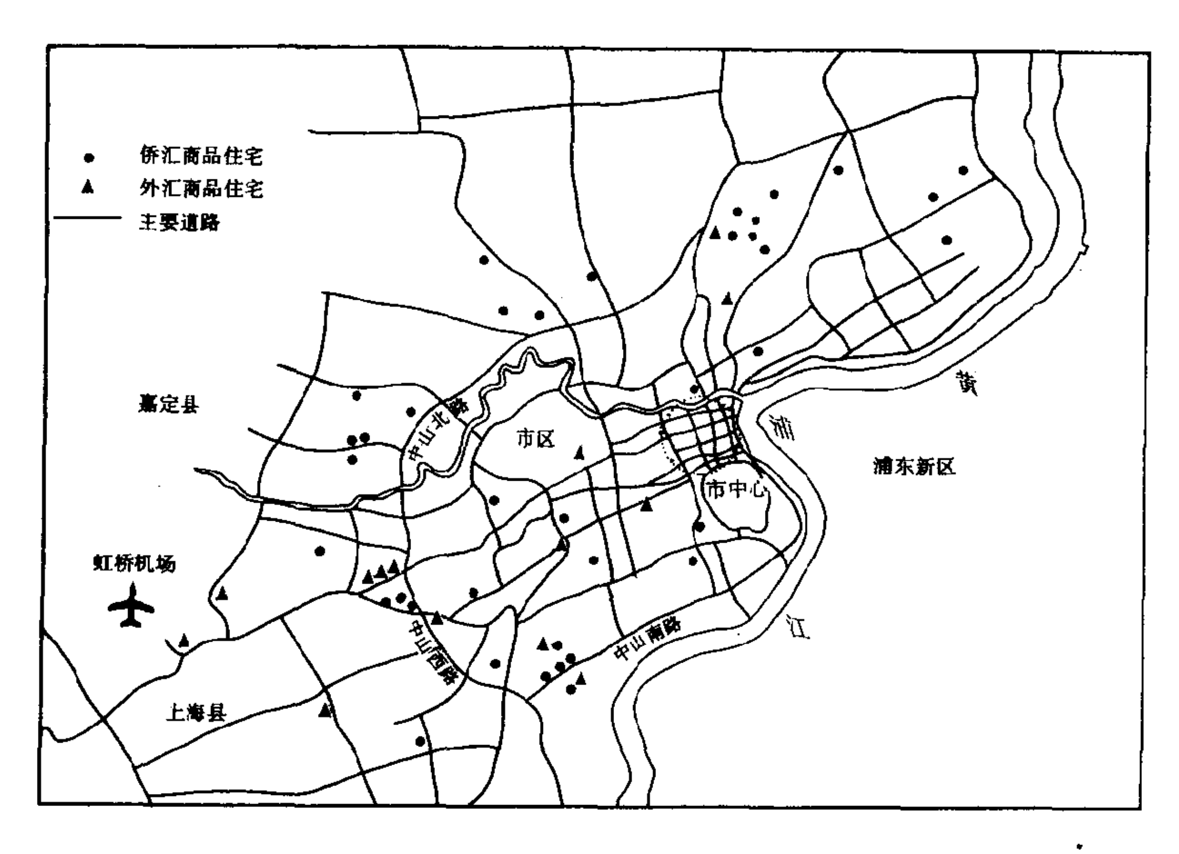


图 76　上海市商品住房区位

房、外汇商品房以及在批租土地上的商品房。一般商品房的销售对象是上海常住户口的居民及在上海注册的工作单位,没有户籍登记的流动人口不能进入此类市场。侨汇商品房主要出售给海外华侨和他们的亲属,或者是持有外汇的上海常住居民。以前由于政府禁止外币兑换,普通市民难以得到外币,因此他们也无法进入这类住宅市场。另外两种类型的商品房也仅出售给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其中,在批租土地上建商品房是商品房的一种灵活类型。它们可以在海外销售,并允许以市场价格转租、抵押及交易,而其它 3 种类型或多或少受到政府的控制。无论是一般商品房,还是批租土地上的商品房,对建设的标准及环境舒适的需求都在增加。过去中国城市的社区是由就业决定的,而并非像西方城市以收入

及家庭结构为决定因素。因为海外华侨及外国人与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及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他们居住的商品房地区构成了新的独立社区。在当今中国房地产业方兴未艾之时,这类商品房及新社区在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及乡镇发展迅速,它们主要针对海外市场,特别是香港。

总之,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可以预言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还会有所上升,今后外资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六篇

城市发展与展望

第二十六章　中国城市发展展望[①]

一、中国跨世纪城市化趋势

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预计2010年中国的人均GNP可望达到8000元以上，将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总量、产业结构水平和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1. 进一步迈向现代化

随着中国人均GNP、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家庭轿车逐步普及和城镇居住环境较大幅度改善[②]，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城市，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表现在：①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全

---

① 本章中关于新增城市数量预测，主要参考了"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课题组的研究成果。

② 根据王健等："2010年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与展望"专题报告的预测，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中，恩格尔系数将下降到40%，家庭轿车普及率将达到20%，城镇居民住房面积将达到12米^2/人。

面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已成为未来20年中国城市发展建设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尤其是道路交通、通讯、能源、环境卫生及社会综合服务等设施建设，不仅涉及数量规模适应与否，而且还在配置标准、管理水平和有效保障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②城市居住社区的现代化。大规模旧城改造已在中国各大城市相继铺开。随着规划思想的转变，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居住社区形式将逐步取代以物质形态规划建设为主的传统的居住社区的组织管理模式。③城市运行与管理的现代化。

2. 加速乡村城市化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来看，城市化水平在进入30～60%的中期发展阶段后，普遍发生城市化进程加速现象。中国1993年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1%。在以往10年间市镇人口每年递增4%，城市化水平上升了6.5个百分点，已高于6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预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很快跨越30%，而进入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阶段。2000年前后城市化水平大致为33～35%，2010年前后城市化水平将跃居44～47%。如从1978年起算，城市化水平由16%上升到30%，约花了20年时间，提高14个百分点；而从2000～2010年，将只用10年时间，提高约11～14个百分点。1995～2010年每年提高城市化水平约1个百分点，年新增城镇人口1200万以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乡村人口比重仍很高的大国，在利用现有城市有序吸纳农村剩余劳力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村二、三产业的合理发展，把农村工业化扩展为非农产业化，合理引导乡村企业相对集中布局，推动各级城镇的健康发展，加速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已成必然趋势。

3. 发展模式多元化

中国东、中、西部地带之间,省(区)域之间以及省(区)域内部地区之间,自然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随着市场机制的确立,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会更加显著地反映到不同地区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要求形成不同的发展机制、发展阶段、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和各具特色的多元化城市发展模式。从全国看,我们既要稳步发展世界级的特大城市和大都市连绵区,来参与和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也要因地制宜地促进中小城市的合理发展,包括为数众多的小城镇;从各省区看,城市发展道路和一定时期的发展重点,都应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体现各自的特点。例如,东部沿海省区,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有强大的中心城市,各等级城镇发育基本齐全、联系网络业已形成,因此,下一步是围绕中心城市,重点组织好 2 级城镇体系。中部省区可分两种类型,①鄂、陕、川 3 省及重庆市,局部地区经济已得到优先发展,1 级中心城市突出(如武汉、西安、重庆、成都),2 级中心城市发育不够,且相对分散,比较薄弱的经济影响力难以对较大地区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所以首要的是明确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轴线和 2 级中心城市的区位布局。②湘、内蒙古、豫、吉、闽、赣、皖等省(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首位城市不突出,中小城市较多,且相对分布均匀,2 级中心城市如合肥、芜湖、南昌、郑州、柳州、南宁等市自身经济实力尚比较薄弱,使整个城镇体系的等级水平比较低。由于长期缺乏明确的空间发展轴线和有限资金的分散投放,在很大程度上迟缓了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因此,要明确中长期区域经

济发展的1级开发轴线,选择1～2个具有发展潜力和区位优势的2级中心城市(或城镇群)重点突出发展,迅速增强其经济实力和区域辐射力,并相应组织城市—区域经济协作区。西部省(区),滇、黔、新、甘、青、藏、宁等省(区)是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省级城镇体系尚未形成;省会城市突出,但经济实力及影响辐射力薄弱;2、3级城市规模小,职能单一,大多仅能作为小区域行政、商贸等区域服务中心。目前区域经济的发展,重在优势资源的开发和加速区域集聚中心的形成。

二、中国新城市发展趋势

据1994年统计,中国大陆除已设市的622个城市外,尚有1735个县(旗)驻地镇和14539个县(旗)辖镇。考虑到今后中国仍将采用整县改市为主的设市模式,因此预计中国新城市设置,除少数因大规模资源开发和交通枢纽建设而发展为新城市外,绝大部分新城市仍将由现存的1735个县(旗)驻地镇中有选择地升格为城市。

1. 新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

根据全国现行设市标准，通过对中国现存的1000多个县(旗)驻地镇及其县(旗)域涉及城镇综合发展水平、城市发展建设条件和城镇发展区域基础等方面的41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排序，规划未来15年(2010年)将新增城市381个。其中1995～2000年预计新增城市102个，2001～2010年新增城市279个。

如果假定2010～2020年平均每年仍新增城市28～30个，那么1995～2020年中国将新增城市661～681个。换言之，预计2000年中国共有城市724个左右，2010年计有城市1003个左右，2020年约有城市1280～1300个。从新城市发展历史过程来看，1961～1980年由于受国民经济总体上的低速增长的影响，20年间仅新增城市88个，平均每年增加4.4个。1981～1990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城市发展呈现加快的势头，10年间新增城市244个，平均每年新增24个。90年代预计新增城市257个，平均每年新增26个，2000～2020年预计新增城市560～580个，平均每年新增28～29个。由此可见，未来20年也是中国城市增长最快的时期。

随着新城市的增长，中国城乡行政区划将发生显著变化，市的数量日益增加，县的数量日益减少。1994年全国城市数占市县总数的26.3%，2010年将达到42.6%，其中东部地带城市占市县总数的比重为55.8%，中部地带为44.9%，西部地带为27.2%。在各省(区)中，以广东省城市占市县比重最高，达到72.7%，其次比重在55%以上的省份有辽宁、江苏、浙江、吉林、黑龙江、山东、海南、湖北等8省。城市占市县比重较低的为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等省(区)。预计2020年全国城市数占市县数的比重上升到54%，其中半数以上省(区)城市数占市县数的比重将超过55%。

2. 新城市职能类型趋于多样化

80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县域中心城市设置的同时，亦对专业性职能突出的旅游、工矿、交通枢纽、边境口岸城市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中心城市的设置给予较大的倾斜。

据初步统计分类[1]，1982～1994年间新增特殊类型城市约76个，虽然仅占同期新增城市的19.5%，但其绝对数量却占到1994年全国特殊类型城市总数的一半。

预测下世纪初，随着中国中西部开发条件较好的能源、有色、水电及旅游资源富集地区相继进入较大规模的开发，同时边境贸易口岸也将进一步开放，将有一批城镇可望晋升为小城市。据预测新兴的工矿城镇有山西的怀仁、阳城，内蒙古的伊敏河、薛家湾，陕西的神木、府谷，贵州的福泉、织金等；旅游城镇有山西的浑源、五台，湖南的桃源，四川的南坪、松潘等；交通枢纽城镇有江西的向塘，广西的黎塘，河北的王滩等；边境口岸城镇有云南的勐腊、河口，黑龙江的抚远、东宁等；以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中心城镇如西藏的昌都、乃东、林芝，四川的黔江、马尔康，青海的共和，甘肃的夏河等。初步预测框算，到2010年中国可望晋升为小城市的特殊类型城镇约90个，其中工矿城镇约42个，旅游城镇约20个，交通枢纽城镇9个，边贸口岸城镇8个，其它类型城镇19个。特殊类型城市约占同期新增城市的23.6%。2010年中国特殊类型城市总数可望达到250个左右，约占城市总数的25%，小城市总数的40%。

3. 新城市区位指向呈集聚趋势

中国尚处在工业和城市加速集聚发展阶段，加上区域间资源分布、开发条件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因此未来新城市发展区位仍呈现以下特征：

---

① 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分类指标，难免有错分、漏分的问题。

(1) 指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周围

受大城市、特大城市直接辐射的推动，大城市、特大城市周围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较高。目前如武汉、沈阳、长春、哈尔滨、广州、郑州、济南、青岛等特大城市周围绝大部分县已改市。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前还有 51 个城镇可望晋升为小城市。

(2) 指向经济发达地区

如京津唐、胶东半岛、辽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福泉地区、北部湾地区、江汉平原、关中平原、成渝地区、松辽平原、淮海地区等经济核心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今后预计还有 67 个城镇晋升为城市。

(3) 指向开发条件较好的资源富集地区

如晋陕内蒙古煤炭资源、黄河上游水能资源、赣西有色金属资源、黔中磷矿、川滇黔接壤地区等资源富集区，预计约 36 个工矿城镇可望晋升为小城市。

(4) 指向主要水陆交通沿线地区

新城市分布具有沿海、沿江和沿线(铁路、公路)的特征。据统计中国约有 70%左右城市的区位由交通指向决定。事实上，无论是国家级交通干线，还是省(区)内交通干线，都已成为新城市集聚分布的发展轴。据估计，2010 年前，仅沿海、沿江等八大交通轴线两侧，约有 80 多个城镇可望晋级。

三、中国城市体系发展趋势

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沿海城市许多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沿海地区原有大、中城市经济实力和区域辐射力将得到加强，旧城

改造、新兴港口城市发展和五大城市密集区调整进程亦将加快。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资源开发和深层利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将形成一批辐射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和工矿城市。据预测,2010 年中国城市总数将达到 1003 个。从 1995 年起,平均每年新增城市 27 个。这些城市的合理发展与分布,将对中国城市体系格局演化形成巨大的推动。

(一) 城市规模结构演变

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呈现良好的幂函数分布。顾朝林曾分别以 5 万以上、10 万以上和 15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样本对 1985 年全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幂函数分布模型进行拟合,均显示出很高的相关性[①]。因此,本文将采用 $P_r = b_0R^b$ 的幂函数分布模型对中国 2010 年城市规模结构进行预测。

1. b_0 和 b 的确定

(1) P_3 的预测。建模时,为避免 $\ln 1 = 0$,首位城市在回归方程中作用减弱,令等级(R) = 实际序位(r) + 2。也就是说,中国城镇体系中的首位城市的等级系列 R = 3,P_3 为中国首位城市上海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

浦东开发为上海市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90 年代以来,上海市非农业人口增长大体保持在 2.5%左右,预计此速度可

---

①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第 421 页,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维持到2010年左右。1994年上海市实有非农业人口824.9万，预测到2010年上海市城市非农业人口约达1224万。

(2) R的预测。根据“全国设市预测与规划”课题组预测，2010年中国大于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总数为1003个，即 $R = b_{0\,1003} = 10$。

(3) 根据 P_3 和R的预测值，可得联立方程组：

$$\begin{cases} 1224 = b_0 3^{-b} & (1) \\ 10 = b_0 1003^{-b} & (2) \end{cases}$$

求解方程(1)、(2)，得：$b_0 = 3036.5$

$$b = 0.8271$$

据此，中国2010年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幂函数分布模型为：

$$Pr = 3036.5 \times R^{-0.8271}$$

$$\Rightarrow = exp(9.6947 - 1.209 \ln Pr) \quad (3)$$

2. 2010年城市规模结构特征

根据上述方程(3)，可推算中国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如表158。

表158 2010年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预测表

等级规模(万人)	序位	城镇数(个)	非农业人口(万人)
1000以上	3	1	1224.00
700～1000	4	2	1766.89
400～700	5～10	6	3204.25
100～400	11～60	50	9008.15
50～100	61～142	82	5648.10
20～50	143～432	290	8730.57
10～20	433～1003	572	7846.99
7～10	1004～1543	540	4480.67

由表158可知,2010年中国将形成9个人口在4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50个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共同构成中国城镇体系的一、二级经济中心,并与82个大城市,290个中等城市和1112个7万以上人口的小城市共同构成中国完整的城市网络。

由表159不难看出,自1986年实行新的设市标准以来,新设城市较多,小城市个数比重不断上升,中等以上城市比重呈下降趋势。1994年与1985年相比,小城市比重由55.2%上升为59.8%,中等城市由28.7%下降到28.4%,大城市、特大城市由16.1%下降为11.8%。

表159　城市规模结构变化比较

城市规模	1985年		1994年		2010年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数量(个)	比重(%)
特大城市	21	6.5	32	5.2	59	5.9
大城市	31	9.6	41	6.6	82	8.2
中等城市	93	28.7	177	28.4	290	28.9
小城市	179	55.2	372	59.8	572	57.0
总　计	324	100.0	622	100.0	100.3	10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另一方面,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变化呈现相反趋势。与1994年相比较,大城市、特大城市上升2.3个百分点,中等城市比重略有上升,而小城市比重下降2.8个百分点。分析其原因,虽然规划新增了381个小城市,但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中等城市、大城市普遍加快了发展速度,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相继晋级,而且80年代中后期新设的小城市,大多数位于沿海地区区位较好的地方,又经过近20年建设,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人口规模扩大而晋级也是必然的。

(二) 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1. 西部地带城市数量增幅较大，城市分布稀少的状况略有改善

预测 2010 年前后，中国新城市设置重点将逐步转向中部地带。西部地带大部分省区地处边远山区，城镇发展比较缓慢，设市条件较差。但为促进西部地带优势资源开发、边境贸易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以边境口岸地区政治中心和能源资源开发型等特殊类型城市的设置占有较大比重(约占 40%)。从城市数量增长幅度看(表 160)，西部地带增长最快，1994 ～2010 年城市数量增幅达 194.7%，其次是中部地带 155.4%，东部地带为 152.5%。西部地带城市占全国同期城市的比重上升 3.73 个百分点。东、中部地带均呈下降趋势，三大地带城市数量分布均衡指数略有提高。

表 160　三大地带城市分布变化比较

(单位：个)

地区名称	1994 年		2000 年 *		2010 年 *		1994 ～2010 年增长幅度(%)
	城市数	%	城市数	%	城市数	%	
全　国	622	100	724	100	1003	100	161.3
东部地带	278	44.69	319	44.1	424	42.3	152.5
中部地带	231	37.14	264	36.4	359	35.8	155.4
西部地带	113	18.17	141	19.5	220	21.9	194.7
城市数量分布均衡指数	I = 0.6294		I = 0.635		I = 0.645		

注：* 为预测规划数；1994 年数据为统计数。

2. 五大城市密集区初具规模

(1) 辽中南城市密集区

这一地区以沈阳为主要发展极，大连为主要口岸和次中心，沈大铁路、高速公路为主轴，包括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丹东等14个城市。土地面积5.52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86.94人。该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是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和大城市最密集的地区。预测1995～2010年新增城市4个，2010年城市总数为18个，占市县总数的75%。

(2) 京津唐城市密集区

以北京、天津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塘沽为主要口岸，京津唐高速公路为主轴，包括唐山、秦皇岛、廊坊等9个城市。土地面积5.2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13.76人。该地区煤、铁等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水平都比较高。预测1995～2010年新增城市10个，2010年城市总数为19个。

(3) 沪宁杭城市密集区

以上海为主要发展极和口岸，宁沪杭高速公路为主轴，包括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47个城市。土地面积9.93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86.11人。该区水陆交通便捷、乡镇企业发达、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高，中小城市发达。预测1995～2010年新增城市17个，2010年城市总数为64个，占市县总数的82.1%。

(4) 山东半岛城市密集区

以济南、青岛为发展极，青岛和烟台为口岸，胶济铁路和高速公路为走廊，包括烟台、威海、潍坊、淄博等23个城市，土地面积

5.84 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568.71 人。该地区乡镇企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轻重工业均较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以中小城市占优势。预测 1995～2010 年新增城市 5 个，2010 年城市总数达 30 个，占市县总数的 76.9%。

(5) 珠江三角洲城市密集区

以广州、香港为主要发展极和口岸，深圳—广州—珠海高速公路为发展走廊。包括佛山、江门、中山、深圳、珠海和东莞等 19 个城市，土地面积 1.41 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173.28 人。该地区外向型经济发达，经济水平为各集聚区中最高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较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中小城镇密集。预测 1995～2010 年新增城市 2 个，2010 年城市总数为 20 个。

3. 八大城市集聚带加速形成

(1) 纵向城市集聚带

共有 4 个，其一是沿海岸城市集聚带。在 1.8 万公里长、50 公里左右宽的范围内，集中有 38 个特大城市(包括香港)和几十个大中城市，城市总数已达 67 个。目前该地带已成为中国工业、金融、科技和外贸、郊区农业比较发达的产业带和对外开放地区。随着沿海地区一大批高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和新兴港口的发展，城市实力、辐射力将明显增强。据预测，未来将有 11 个城市升级为特大城市，12 个城市升格为中等城市。1995～2010 年预测新增城市 38 个，2010 年共有城市 105 个，成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发展轴线。

其二是沿京广铁路城市集聚带。长达 2300 多公里的京广铁路是沟通中国南北的重要通道，其沿线均为所在省的经济发展重

心地带。在沿线50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了6个特大城市、十几个大中城市,城市总数共36个。在北京、武汉、广州三大城市经济区之间,以郑州为中心的豫北城市群、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东城市群在不断扩展。随着京广铁路全线电气化,必然会大大推动城市的发展和新城市形成。据预测,未来将有12个城市升级为大城市,6个升级为中等城市。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12个,2010年共有城市48个,占全域市县总数的60.7%。

其三是沿京沪铁路城市集聚带。京沪铁路是贯通中国东部地区、连接南北两大政治和经济重心的交通大动脉,因此是中国最强大的发展轴。在京津、沪宁杭两大城市密集区之间,分布着济南、徐州、蚌埠等重要地区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目前全线共有城市24个。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5个,2010年共有城市29个,占全线市县总数的64.4%。

其四是沿哈大铁路城市集聚带。由哈大线并经滨洲线至齐齐哈尔段1248公里,是中国东北3省的经济核心地带。沿线集中分布特大城市7个和大中城市5个,共有城市18个。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7个,2010年将有城市25个,占全线市县总数的83.3%。

(2) **横向城市集聚带**

也有4个,其一是沿长江干流城市集聚带。沿长江,自宜宾以下1769公里是中国又一条产业集中且具开发前景的发展轴。沿线有特大城市4个,大中城市19个,小城市8个,并初步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中心的4大城市经济区。随着长江航运及沿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将成为中国经济与城市发展极为重要的地带。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10个,2010年将有城市41

个，占沿线市县总数的65%。

其二是沿陇海铁路城市集聚带。自兰州以东1759公里是欧亚大陆桥中国境内的核心地段，共集聚3个特大城市、2个大城市等15个城市。该线已实现电气化复线，货流密度可达5000万吨公里以上。沿线大部分地段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城镇较发达，是未来开发大西北、实施经济重点转移的重要经济支柱和交通要道。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12个，2010年将有城市27个，占该线市县总数的67.5%。

其三是沿沪杭—浙赣铁路城市集聚带。该线是沟通华东、中南地区的主干铁路，经沪、浙、赣、湘等4省市共36个县，沿线大部分地段工农业发达，人口稠密。1995～2010年规划设市6个，2010年将有城市26个，占全线市县总数的72.2%。

其四是沿蓝烟—胶济—石德铁路城市集聚带。该线是联系鲁、冀、晋3省和晋煤外运的主要干线之一。沿线工农业发达，人口密集，城市化水平高。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4个，2010年将有城市22个，占全线市县总数78.6%(表161)。

表161　中国主要城市集聚带城市分布概况

城市带名称		1994年市县总数(个)	1994年已设市数(个)	1995～2010年预测新增城市数(个)	2010年城市总数(个)	2010年城市占市县总数(%)
纵向城市带	海岸带	132	67	38	105	79.5
	京广线	79	36	12	48	60.7
	京沪线	45	24	5	29	64.4
	哈大线	30	18	7	25	83.3
横向城市带	长江沿线(宜宾以下)	63	31	10	41	65.0
	陇海线	40	15	12	27	67.5
	沪杭、浙赣线	36	20	6	26	72.2
	蓝烟、胶济、石德线	28	18	4	22	78.6

注：未包括京、津、沪3市。

参考文献

1 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 北京测绘院等:《北京市卫星遥感影像地图集》,奥林匹克出版社,1990年版。

3 蔡建明:“对我国人口城市化的预测与展望”,《城市问题》,1992年第5期。

4 蔡建明等:《现代地理科学》,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5 柴彦威:“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地理研究》,第15卷第1期,1996年版。

6 陈步林:“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与不足——兼与新加坡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1993年第4期。

7 陈栋康:“香港人口的若干特点”,《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6期。

8 陈栋生:“论我国工业布局的方针与对策”,《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9 陈光庭:《中国城市住宅的挑战》,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10 陈光庭等:《中国的城乡发展与未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1 陈铎等:“南京外围城镇的建设对市区性质和发展规模的影响”,《城市规划》,1983年第2期。

12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3 崔功豪等:“中国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及演化”,《地理学报》,第45卷第4期,第399～410页,1990年版。

14 崔功豪主编:《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

15 崔功豪、武进:“中国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以南京等城市

为例”,《地理学报》,第45卷第4期,1990年版。

16 崔功豪:“我国城市的特点和发展战略探讨”,《城市和经济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8 邓演超等:《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董黎明、冯长春:“城市土地综合经济评价的理论方法初探”,《地理学报》,第44卷第3期,1989年版。

20 方西生:“夏都探索”,《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21 范耀邦:“北京高层住宅布局与高度分区探讨”,《北京规划建设》,1989年第2期。

22 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23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 高泳源:“新中国的城市”,《地理知识》,1955年第12期。

25 顾朝林等:“ 论城市边缘区研究”,《地理研究》, 第8卷第3期,第95～101页,1989年版。

26 顾朝林等:“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特性研究”,《地理学报》,第45卷第4期,第317～328页,1993年版。

27 顾朝林等:《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研究》, 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8 顾朝林:“城市综合实力指数评价方法”,《地域研究与开发》,第11卷第1期,1992年版。

29 顾朝林:“黄河三角洲城镇体系发展”,《经济地理》,第12卷第2期,1992年版。

30 顾朝林:“济南市城市经济影响区划分”,《地理科学》,第12卷第1期,1992年版。

31 顾朝林:“山东省烟台地区城镇发展历史研究”,《历史地理》,第七辑,1990年版。

32 顾朝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若干理论与方法,《区域开发与国土规划》,1992年第1期。

33 顾朝林:“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46卷第2期,1991年版。

34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5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地域研究与开发》,第9卷第6期,1989年版。
36 顾朝林:《城市经济区理论与应用》,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37 顾朝林:"城镇体系研究及其进展",《城市规划汇刊》,1988年第1期。
38 顾朝林:"地域城镇体系组织结构模式研究",《城市规划汇刊》,1987年第2期。
39 顾朝林、陈振光:"中国大都市空间增长形态",《城市规划》,第18卷第6期,1994年版。
40 顾朝林、顾新华:"长江大流域城镇体系发展总体构想",《南京大学学报》(经济与管理版),1987年第4期。
41 顾立三:"浅谈无锡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城市规划汇刊》,1982年第3期。
42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3 国务院研究课题组:《小城镇发展政策与实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44 郭天沅:"上古至宋中国古代城市考略",《学术月刊》,1981年第6期。
45 郭正忠:"关于唐宋镇市'城墙'问题的考察",《齐鲁学刊》,1986年第4期。
46 郭正忠:"宋代城镇的经济结构",《江淮论坛》,1986年第4期。
47 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8 韩光辉、尹钧科:"北京城市郊区的形成及其变迁",《城市问题》,1987年第5期。
49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古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5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51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期。
52 黄杰民:"解放以来新命名和更名的县市地名分析",《地名知识》,1980年第4期。
53 黄序、崔文:"北京近郊城市化特点、问题及发展方向",《北京规划建设》,

1990 年第 2 期。
54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55 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场的兴衰存废问题”,《学术月刊》,1979 年第 3、4 期。
56 黄以柱:“河南城镇历史地理初探”,《史学月刊》,1981 年第 1 期。
57 黄灼耀:“县制的形成与发展”,《华南师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
58 胡保生等:“关于我国总人口目标的确定”,《人口与经济》,1981 年第 5 期。
59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
60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年版。
61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年版。
62 贾大泉:“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四川师大学报》,1986 年第 2 期。
63 加藤繁、吴杰译:“清代村镇的定期集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3 卷,商务印书馆,1973 年版。
64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65 荆三林:“再论郑州故城址的年代”,《郑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
66 荆三林:“郑州故城时代问题商榷”,《郑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
67 金应熙、刘泽生:“试论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广东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
68 梁思成:“市镇的体系秩序”,《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年版。
69 李佳能、黄吉铭:“上海市中心城市规划结构简析”,《城市规划》,1984 年第 2 期。
70 李如干:“首都北京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国情报告》,第一号,1993 年版。
71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 年版。
72 李民:“郑州商城是亳还是隞都”,《中州今古》,1983 年第 2 期。
73 李梦白、胡欣等:《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年版。
74 宁越敏:“上海市区商业中心区位的探讨”,《地理学报》,1984 年第 2 期、第 3 期。

75 林文益编著:《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年版。
76 林祥瑞:“论清初的‘海禁’与资本主义萌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 年第 4 期。
77 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
78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年版。
79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
80 刘树成等:《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版。
81 刘铮:《中国人口:问题与展望》,新世界出版社,1981 年版。
82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下册),南京中山书局,1935 年版。
83 李如干:“新时期首都北京的发展”,《中国自然条件报告》, 1993 年第 1 期。
84 李浚源等编:《中国商业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85 李先登:“试论中国城市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6 年第 5 期。
86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87 陆逸志等:《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 ~ 1981 年),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 年版。
88 齐康、夏宗玕:“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建筑学报》,1985 年第 2 期。
89 钱林书:“战国时期的七国都城”,《历史教学问题》,1982 年第 2 期。
90 曲英杰:“近年来中国古代城市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7 期。
91 沈汝生:“中国都市之分布”,《地理学报》,第 4 卷第 1 期,1937 年版。
92 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年版。
93 世界银行 1984 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版。
94 史子禄:“对稳定上海郊区农业的浅见”,《上海农村经济》,1994 年第 6 期。
95 宋家泰:“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地理版),1985 年版。
96 宋家泰、顾朝林:“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地理学报》,第 43 卷第 2 期,1988 年。

97 宋健、于景元:《人口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98 孙盘寿:“我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地理学报》,第39卷第4期,1984年版。
99 孙胤社:“大都市区的形成机制及其定界——以北京为例”,《地理学报》,第47卷第6期,1992年。
100 孙敬之等:《中国经济地理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1 深圳经济特区年鉴编辑委员会:《深圳经济特区年鉴199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2 上海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统计局编:《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3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编:《国际化城市与天津城市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
104 汪池:“从‘城市雏形’谈起”,《松辽学刊》,1985年第1期。
105 王慧炯、杨光辉:《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气象出版社,1984年版。
106 王学萌、罗建军:《灰色系统预测、决策、建模程序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版。
107 王云海、张海宗:“宋代坊郭户等的划分”,《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108 魏清泉:“台湾的人口与城市”,《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论丛17),1986年版。
109 魏心镇、史永辉:“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区位比较及推进机制分析”,《地理科学》,第12卷第2期,1992年版。
110 魏心镇:《工业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11 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
112 魏心镇、王缉慈等:《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3 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114 吴汝祚:“夏文化初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115 吴涛:“北宋东京城的营建和布局”,《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16 吴万齐:“中国城镇发展战略构想”,《中国城镇》,1985年第3期。

117 吴郁文等:“广州市城区零售商业企业区位布局的探讨”,《地理科学》,1988 年第 8 卷第 3 期。
118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119 谢文蕙:“我国实现四化过程中城市化道路的探讨”,《城市规划研究》,1981 年第 1 期。
120 谢颖:“高碑店乡乡域规划思想探讨”,《北京规划建设》,1990 年第 1 期。
121 许绍基主编:《广州房地产业的崛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122 徐放:“北京市的商业服务地理”,《经济地理》,1984 年第 1 期。
123 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124 许学强、胡华颖、叶嘉安:“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分析”,《地理学报》,第 44 卷,1989 年第 4 期。
125 许学强等:“我国城镇分布及其演变的几个特征”,《经济地理》,1983 年第 3 期。
126 许顺湛:“夏代文化探索”,《史学月刊》,1964 年第 7 期。
127 杨宝成:“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文物》,1984 年第 3 期。
128 杨鸿勋:“中国早期建筑的发展”,《建筑历史与理论》,第 1 辑。
129 杨述贤:“我国生产力宏观战略布局的理论模式”,《生产力研究》,1987 年第 2 期。
130 杨吾扬:“论城市体系”,《地理研究》,第 6 卷第 3 期,1987 年。
131 姚士谋等:《中国的城市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132 严重敏:“区域开发中城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地理学与国土研究》,第 1 卷第 2 期,1985 年。
133 叶维钧:《中国城市化道路初探——兼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版。
134 叶文宪:“商周城市国家问题讨论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4 期。
135 叶舜赞:《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
136 虞云国:“春秋县制初探”,《晋阳学刊》,1986 年第 6 期。
137 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
138 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年版。
139 张先恩:“我国解放以来设立的新城市”,《地理知识》,1983 年第 6 期。

140 詹子庆:"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问题浅议",《人文杂志》,1982 年增刊。
141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142 赵小兵:"国外城市体系研究思想史发展综述",《国外人文地理》,1986 年第 2 期。
143 郑弘毅、顾朝林:"我国海港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经济地理》,1988 年第 4 期。
144 郑弘毅、顾朝林:"我国沿海城镇体系初探",《自然资源学报》,第 2 卷第 3 期,1987 年。
145 郑杰祥:"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年代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146 郑杰祥:"商汤都亳考",《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147 郑宗寒:"试论小城镇",《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第 4 期。
14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地区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 年第 4 期。
149 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87 年第 2 期。
150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151 邹时萌、顾文选:"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建设经济》,1983 年第 2 期。
152 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国土规划与经济区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15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 4 期。
154 周宝珠:"宋代东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在中外经济交流中的地位",《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
155 周一星:"关于我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经济地理》,1984 年第 2 期。
156 周一星:"中国城市工业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的关系",《经济研究》,1988 年第 5 期。
157 周一星、杨齐:"中国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多因素分析",《经济地理》,1990 年第 1 期。
158 周一星:"中国城市(包括辖县)的工业职能分类——理论、方法和结果",《地理学报》,1984 年第 43 卷第 4 期。

159 朱锡金:“城市的轴向发展”,《城市规划汇刊》,1983 年第 3 期。

160 石川义孝:“日英米における都市圏研究の动向”,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编:《空间·景观·イメージ》,地人书房,1983 年版。

161 加藤繁:“唐代时代の草市及びその发展”,《支那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2 年版。

162 河野通博:“中国における人文地理学の后话”,《人文地理》,第 41 卷第 1 期,1989 年。

163 柴彦威:“中国都市の内部地域构造——兰州市を例として”,《人文地理》,1991 年第 43 卷第 6 号。

164 柴彦威:“中国都市住民の日常生活における活动空间——兰州市を例として”,《地理科学》,第 49 卷第 1 号,1994 年。

165 长尾谦吉:“都市圈の设定に关するノートーカナダの事例在通江”,《经济地理学年报》,第 40 卷第 3 期,1994 年。

166 Albertsen, N.: Postmodernism, Post-Fordis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Vol. 6, pp.339～365, 1988.

167 Allen K. Philbrick: Principles of Areal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in Regional Human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pp.299～336, 1957.

168 Alonso, W.: *Location and Land Us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 pp.20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69 Andrew Kirby and David Lambert: *The Regi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170 Anthory Gar-on Yeh and Xueqiang, Xu: Provinci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imacy in Chin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Vol.18, No.3, pp.1～20,1984.

171 Bassett, K. and Short, J.R.: *Housing and Residential Structure*: *Alternative Approach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1980.

172 Best, R.: Housing Policy Issues for the New Government. *Housing Review*, Vol. 42, No.1, p.10, 1992.

173 Bourne, L. S.: *The Geograpy of Housing*. London: E. Arnold, V. Winston (Washington), Copp. Clark (Toronto), 1981.

174 Buck, D. D.: Ta-Ching: a model industrial community. *China Geographer*, 3:

17 ~36, 1977.

175 Buck, D.D.: Policies favoring the growth of smaller urban pla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1979, in L. J. C. Ma and E. W. Hanten (eds.),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onlder, Colorado: Westview, pp. 114 ~146, 1981.

176 Bourne, Larry 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 Introduction Essay on Concepts and Criteria*.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UP, pp. 28 ~45, 1982.

177 Bluestone, B. and Harrison, B.: *The Deindustri alis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178 Clark, G. L. and Ballard, K. P.: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Labour and Interstate Relative Wag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Geography*, 57:95 ~112, 1981.

179 Clark, G. H. and Meric Gertler: Migration and Capital.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3(1), pp. 18 ~34, 1983.

180 Carter, H.: *The Study of Urban Geography*. Edward Arnold, 1982.

181 Castells, M.: Is There an Urban Sociology? in Pickvance, C. G.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Tavistock, London, 1976a.

182 Castells, M.: Theory and Ideology in Urban Sociology, in Pinkvance C. G. (ed.),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Tavistock, London, 1976b.

183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Basil Blackwell, Padstow, 1989.

184 Chan, Kam Wing: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 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4.

185 Chang, Sendou: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In Skinner, G.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77.

186 Cook, P.: Flexible Integration, Scope Economics,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Social and Spatial Redic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pp. 281 ~300, 1988.

187 Castells, M.: *The Urban Qusetion: A Marxist Approach*. Edward Arnold, London, 1977.

188 Cell, C. P.: The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 in the Maoist era: the Pattern of

Deurbanisation in China. *Comparative Urban Research*, 7: 48—69, 1980.

189 Chan, K. W.: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and Urbanisation Policies in China, 1949—198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 275—305, 1992.

190 Chen Cheng Siang: Geo. Essays on Taiwan, the Commercial Press, Taiwan, 1982.

191 Christaller, W.: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Translated by C. Baski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192 Clayton Research Associates and Scanada Consulatants: The Changing Housing Industry in Canada, 1946—2001. *Canadian Housing*, Vol.6, No.4, pp.46—49, 1989.

193 Cullingworth, J. B.: *Housing Allowance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A Brief Review of the Background to and Provisions of the British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 Research Paper No.95, Center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78.

194 Cullingworth, J. B.: *Essays on Housing Poliey: The British Scen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9.

195 Dear, M. J.: Government Polic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Neighbourhood Change in United States Cities, in M. Harloe (ed.), *Captive Cities*. New York: John Wiley, pp.123—139, 1977.

196 Dvdiyenko, I. Kh.: The New Geography of Industry of China. *Soviet Geography*, April 1960, pp.63—78.

197 Edward J. Taffe: The Urban Hierarchy: An Air Passenger Definition. *Economic Geography*, 1962, pp.1—14.

198 Fairbank, J. 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Stanford, 1953.

199 Fan, C. Cindy: Foreign Trad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Analysis*, Vol. 24, No. 3, pp. 240—256, 1992.

200 French, R.A. and Hamilton, F.E.I.: Is there a Socialist city. in French, R. A. and Hamilton, F.E.I. (eds.), *The Socialist City*. Wiley, Chichester, 1—22, 1979.

201 Friedmann, J. & Goetz Wolff: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6, pp. 309 ~343, 1982.

202 Forrest, R. and Murie, A.: *Selling the Welfare State: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Housing*. London: Routledge, 1988.

203 *Forty Years of Beijing*. Chinese Census Press (in Chinese), 1990.

204 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3.

205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U. K.: Polity Press, 1984.

206 Gaubatz, Piper: Changing Beijing.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5, No. 1, pp. 79 ~96, 1995.

207 Gertler M. S.: The Limits to Flexibility: Comments on the Post-Fordist Vision of Production and Its Geography, *Trans. Inst. Br. Geogr*. N.S. 13:419 ~432, 1988.

208 Gertler M. S.: Flexibility Revisited: Districts, Nation-states and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Trans Inst*. Br. Geogr. N.S. 17:259 ~278, 1992.

209 Gong Hongmian. Spatial Pattern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s Cities: 1980 ~ 1989. *Urban Geography*, Vol. 16, No. 3, pp. 198 ~209, 1995.

210 Gan, G. H.: Perspective of Urban Land Use in Beijing. *Geo-Journal*, Vol.20, No.4, pp.359 ~364, 1989.

211 Goddard, J. B.: Functional Regions within a City Centre: A Study by Factor Analysis of Taxi Flows in Central London. *Trans Inst. Br. Geogr.*, 49: 161 ~180, 1970.

212 Goldberg, M.A. and Mark, J.H.: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Housing Policy.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Journal*, Vol.51, No.1, pp.34 ~42, 1985.

213 Gottlieb M.: *Long Swings in Urb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6.

214 Green, F.H.W.: Urban Hinterlands in England and Wales: An Analysis of Bus Services. *Geogr. J.*, 96: 64 ~81, 1950.

215 Grigsby, W. and Rosenburg, J.: *Urban Housing Policy*. New York: A.P.S. Publications, 1975.

216 Gu Chaolin: China's Urban Housing System in Transitio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Geography*, Vol.6, No.2, 1995.

217 Gu Chaolin: High Tech Parks in China. *Chinese Urban Planning Review*, 1995, No.3.

218 Haggett, A. Cliff and A. Frey: *Location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 John Wiley and Sons, New York, 1977.

219 Hall, Peter: Enterprise Zones: British Origins, American Adaption. *Built Environment*, Vol. 7, No. 1, pp. 5～12, 1981.

220 Headey, B.: *Housing Policy in the Developed Economy*. London: Croom Helm, 1978.

221 Hubert M. Blalock: *Social Statistic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7.

222 Hou Renzhi: Evolution of the City Plan of Beijing. *Third World Planning Review*,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Vol.8, pp.5～17, 1986.

223 Hou Renzh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Harris, C. D. (ed.), *World Patterns of Modern Urban Chan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pp.217～239, 1986.

224 Johnston R. J.: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225 Jordan, B. and Redley, M.: Polarization, Underclass and the Welfare State.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Vol.8 pp.153～176, 1994.

226 Jao, Y.C. and C.K. Leung(ed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olic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7 John W. Alexander and Lay James Gibson: *Economic Geography*. Prentice – 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1979.

228 50 Years of Housing Policy: A NAHRO Bibliography. *Journal of Housing*, pp.20～22, 1984.

229 Keith Hoggart: The Changing World of Corporate Control Centres. *Geography*, No.2, 1991.

230 Khan, Zafar Shah: Pattern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1.

231 Kilburn, A.: Second Inquiry into British Housing Policies, *Housing Review*,

Vol.42, No.1, pp.10, 1992.

232 Kirkby, R. J. R.: *Urbanisation in China: Town and County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1949～2000 *AD*. Croom Helm Ltd, Sydney, 1985.

233 Kueh, Y.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8, pp. 637～690, 1992.

234 Kempen, E. T.: The Dual City and the Poor: Social Polarisation, Social Segregation and Life Chances. *Urban Studies*, Vol. 31, No. 7, pp. 995～1015, 1994.

235 Kesteloot, C.: Three Levels of Socio-spatial Polarisation in Brussels. *Built Environment*, Vol. 20, No. 3, pp.204～217, 1995.

236 Lash, S. and John Urry: *Economies of Signs & Space*. SAGE Publication, London, 1994.

237 Laureence, J. C. Ma, and Edward W. Hanten: *Urban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Westview Press, 1981.

238 Leung, C.K. and Ginsburg, N. (eds): *China: Urban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0.

239 Leung, Chi Kin: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 Investment in China, 1979～1985.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Vol. 42, No. 4, pp. 403～421, 1990.

240 Lewis, J.P.: *Building Cycles and Britain Growth*. London:Macmillan, 1965.

241 Lin Zhiqun, Development of Urban Settlements In China In 1980s'.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8, No.2, pp.14～31, 1992.

242 Lin, Zhiqun: On the Policy of Housing Commercialization. *Building in China*, No. 1, pp. 1～9, 1986.

243 Lo, C.P.: Socialist Ideology and Urban Strategies in China, *Urban Geography*, 8: 440～458, 1987.

244 Losch, A.: *The Nature of Economic Region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 pp.71～78, 1938.

245 Ma, L. J. C.: Anti-urbanis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114～118, 1976.

246 Maisel, S.J.: A Theory of Fluctuations in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Starts. *Ameri-*

can Economic Review, Vol.53, No.3, pp.359 ~383, 1963.

247 McGuire, C.C.: *International Housing Policies*. Lexingtonbooks, D.C.HEATH and Company,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Toronto, 1981.

248 Mitchell, J.P. (ed.): *Federal Housing Policy and Program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New Brunswick, Rutgers New Jersey, 1985.

249 Murdie, R.A.: Factorial Ecology of Metropolitan Toronto, 1951 ~ 1961. *Research Paper* 116,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9.

250 Muth, R.F.: *Cities and Housin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9.

251 Mote, F.W.: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 ~1400. In Skinner, G.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77.

252 Ofter, G.: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ization and the Growth Strategy of Socialist Co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0: 219 ~244, 1976.

253 Pahl, R. E.: *Whose City*? 2nd editi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5.

254 Pannell, C.W., Recent Increase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Urban Geography, Vol.7, No.4, pp.291 ~310, 1986.

255 Peter Hall: *The World Cities* (Second Edi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p.1 ~6, 1977.

256 Phillips, D.R. and A.G.O.Yeh: The Provision of Housing and Social Services in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Vol. 5, pp. 447 ~468, 1987.

257 Phillips, D.R. and A.G.O. Yeh: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Impact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in Cannon, T. and Jenkins, A. (eds.), *The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Impact of Deng Xiaoping's Decade*. London: Routledge pp. 224 ~248, 1990.

258 Rex, J.: The Concept of Housing Class and the Sociology of Race Relations. *Race*, Vol.12, No.3, pp.293 ~301, 1971.

259 Rose, A.: *Canadian Housing Policies* (1935 ~ 1980). Butterworths, Toronto, 1980.

260 Rozman, G.: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C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61 Reed, A.: The Underclass as Myth and Symbol: the Poverty of Discourse about Poverty. *Radical America*, 24: pp.21 —40, 1990.

262 Rex, J.: *Race Rela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263 Romans, J. T.: *Capital Exports and Growth among US Regions*.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5.

264 Room, G.: *New Povert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Macmillan, 1990.

265 Rowthrn, R. E.: Neoclassicism, Neoricardianism and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86:63 —87, 1974.

266 Russwurm, L. H.: Urban Fringe and Urban Shadow, in Bryfogle, R. C. and Krueger, R. R. (eds.), *Urban Problems* (rev. ed.).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Toronto, 1975.

267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68 Sassen, S.: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Pine Forge Press, London, 1994.

269 Saunders, P. and Williams, P. R.: The New Conservatism: some Thoughts on Rec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Urban Stud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Society and Space*, Vol. 4, pp.393 —399, 1986.

270 Sit, V. F. S.: BEIJING: *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1995.

271 Soothill, W. E.: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Lutterworth, London, 1951.

272 Shang Zhiyuan: Prospects of China's Urban Housing Development.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3, No.3, pp.26 —31, 1986.

273 Sen Douchang: Modernization and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Anna. Asso. Amer. Geogr.*, Vol.71, No.2, 1981.

274 Sen Douchang: Some Aspects of the Urba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Hsien Capital. *Anna. Asso. Amer. Geogr.*, Vol.51, No.1, pp.23 —45.

275 Sen Douchang: The Changing System of Chinese Cities, *Anna. Asso. Amer. Geogr.*, Vol.66, No.3,19, pp.398 —415.

276 Sen Douchang: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Anna. Asso. Amer. Geog.*, Vol.53, No.2, 1963.

277 Schwartz, D.C.: Wanted: A New Housing Policy. *Journal of Housing*, pp.109 ~112, 1987.

278 Skineer, G. W.: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79 Smith, L.B.: Canadian Housing Policy in the Seventies. *Land Economics*, Vol. 57, No.3, pp.338 ~352, 1981.

280 Smith, M.: Housing: A Citizen's Progress. *Housing Review*, Vol.41, No.6, pp.102 ~103, 1992.

281 Smith, W.F.: *Hous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l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82 Tang Yunbin: Urban Land Use in China. *Land Use Policy*, Vol. 6, No. 1, pp. 53 ~63, 1989.

283 Tang Yang: My Views on Developing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5, No.1, pp.31 ~36, 1989.

284 Takashi Machimura: The Urban Restructuring Process in Tokyo in the 1980s: Transforming Tokyo into a World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16,No.1, 1992.

285 The Research Group on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the Urban Land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Really Leasing Market in Qianmen and Zhongguancun Areas of Beijing.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8, No.2, pp.31 ~36, 1992.

286 Thomas, B.: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87 Trewartha, G. T.: Chinese Cities: Origins and Functions, Anna. Asso. Amer. Geogr., Vol.52, No.1, 1952.

288 Trutko, J., Hetzel, O. and Yates, D.: *A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Housing Allowance Program and Great Britain Rent Allowance Program*.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1978.

289 Walker, Anthony: *Land, Property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1.

290 Wang Yuqing: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of Housing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3, No.3, pp.14—25, 1986.

291 White, G.: Chine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fter Mao, in G. White, R. Murray and C. White (eds.),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pp.155—192, 1983.

292 Wing Shingtang: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n Chinese Urbanisa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293 Wolman, H. L.: *Housing and Housing Policy in the U.S. and U.K.*,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5.

294 Wu Liangyong: The Megacities in China: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Prospect.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8, No.2, pp.3—13, 1992.

295 Wilson, W. L.: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96 Walker, R. A.: Two Sources of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apital Mobilit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0:28—38, 1978.

297 Xie Yichun and Frank J. Cost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on the Urban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Vol. 43, No. 3, pp. 318—335, 1991.

298 Xu Xueqiang and Si Mingli: China's Open Door Polic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 14, No. 1, pp. 49—69, 1990.

299 Xie Jinyu and Yu Jing: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Planned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Spontaneous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 8, No. 6, pp.25—40, 1992.

300 Yeh, A.G.O.: Physical Planning, in K.Y. Wong and D.K.Y. Chu (eds),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08—130, 1985.

301 Yeh, A.G.O. and Fulong, Wu (forthcoming):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in the Midst of Economic Reform. *Urban Geography*.

302 Yeh, A.G.O. and Xueqiang, Xu (forthcoming):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Urban System with Pacific Asia under the Open Policy, in Fu-chen Lo and Yue-man Yeung (eds.), *Emerging World Cities in Pacific Asia: Growth and Adjustment to Global Restructuring*.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303 Yeng Yueman and Xuwei Hu (eds.):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304 Zipf, G.K.: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Cambridge, Mass., 1949.

305 Zou Deci: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from 1980s to 1990s.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 6, No. 3, pp. 3—16, 1990.

306 Zhang Qiufang: Commodification of Housing: A Major Policy in the Reform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3, No.3, 1987.

307 Zhang Xianqiu: On Urban Housing Problems.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Vol. 3, No.3, pp.3—13, 1986.

308 Zhou Yixing: The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s in China: a Preliminary Hypothesis, in Norton Ginsbukg, Bruce, Koppal & T.G. Mcgee (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s Transition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